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剑桥插图法国史

FRANCE

Colin Jones

[英] 科林·琼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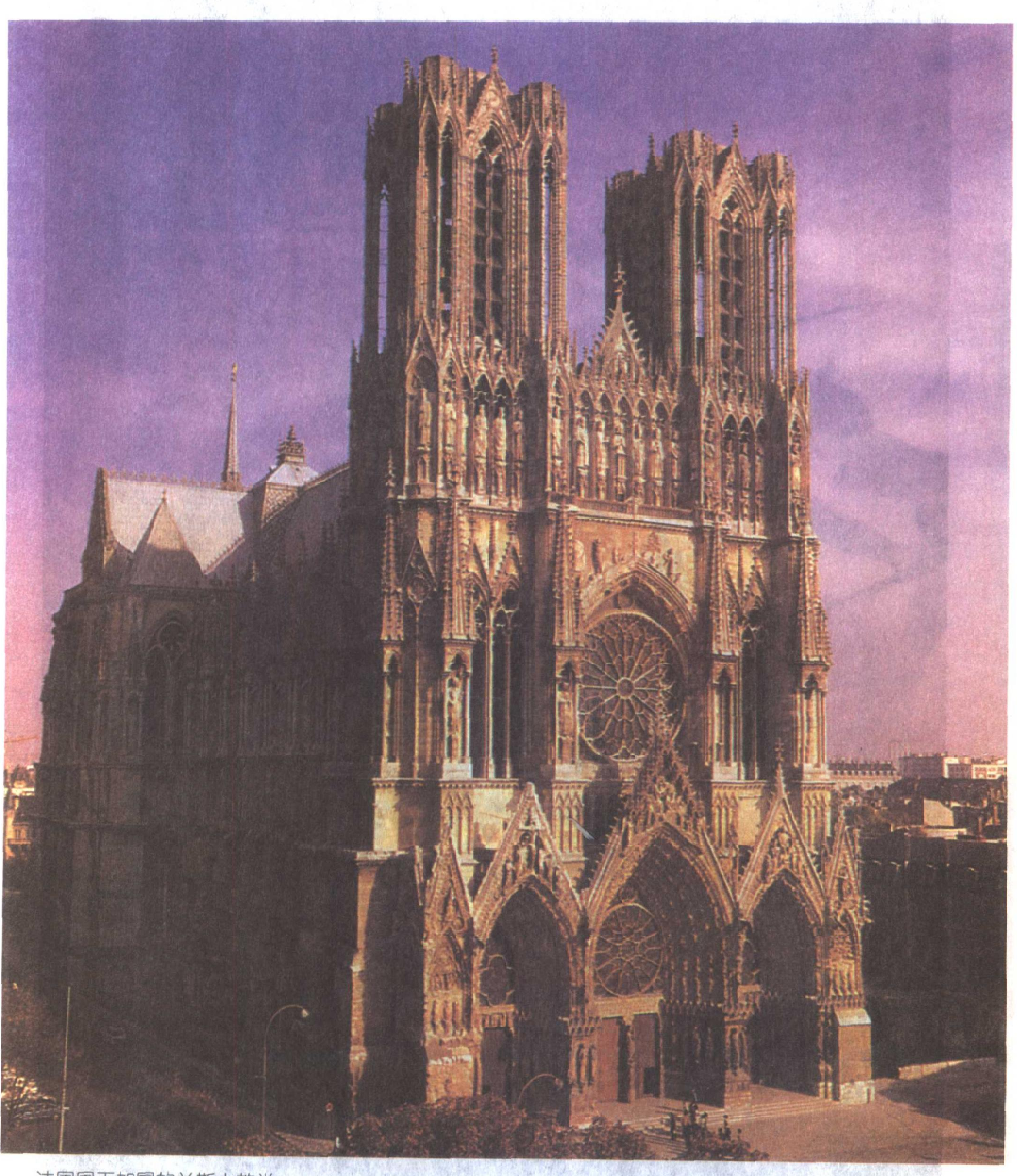
杨保筠 刘雪红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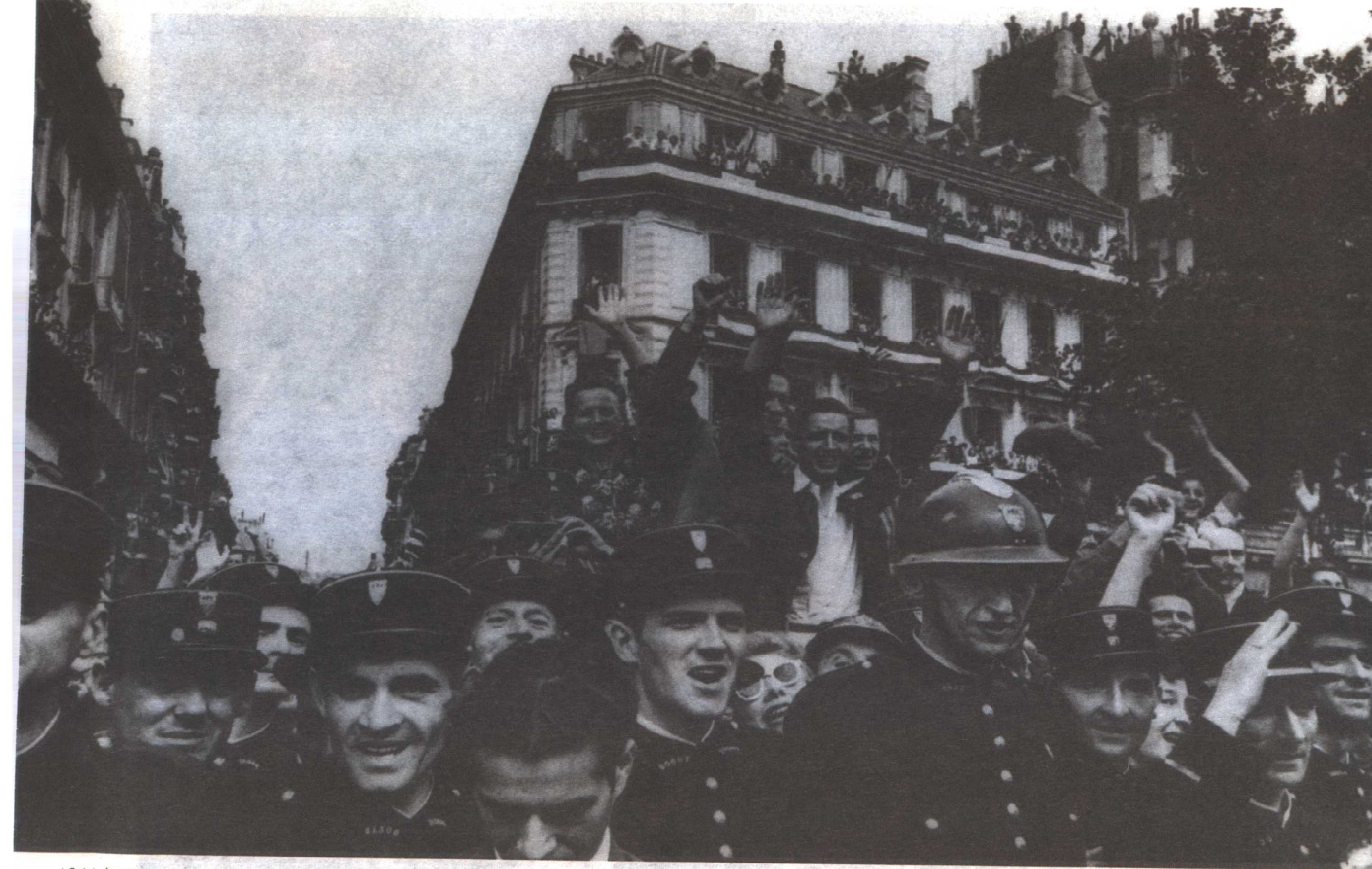
闻名于世的《自由引导人民》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



法国国王加冕的兰斯大教堂



这幅油画表现出年轻的拿破仑在穿越阿尔卑斯山时的英姿



1944年8月25日巴黎市民热烈庆祝巴黎被戴高乐和盟军解放

出版说明

作为学术权威的剑桥插图史的系列丛书，《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剑桥插图法国史》、《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等对英、法、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程都做了全新的阐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艺术、语言、文化及民族蕴育的各种问题。

出版此套剑桥插图史对国内读者了解西方文化发展以及历史影响颇有意义。由于这些作者都是在西方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分别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看待这些国家也以西方人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局限性。因此，他们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随着本世纪历史知识的爆炸，专业历史学者很少轻率地去尝试在单卷 [6] 本中描写法国的全部历史，而是将此工作留给那些很少会像他们那样感到问心有愧的业余历史学家和专业作家。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我曾经试图绕开陷阱，从余热尚存的历史流派中抓住这位灰姑娘。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一部社会和政府精英的政治编年史，而是一些应当予以反映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浅显易懂的篇章；它尊重地区和国家的框架，对各性别、阶层和等级的问题均具有足够的分量。

正如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法兰西史学家理查德·考伯所说的那样，历史包含了“大量的推测成分。它试图倾听不可听到的声音，洞穿人们心中的秘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超越了他们学术专业知识的推测量非常之大，更不用提那些对于法国历史是外行的人。我是如何达到目的的呢？首先，运用民族的成见和偏见；其次，利用我对历史记载的专业知识不可避免的匮乏；第三，利用撰写由读者去判断的新类型的国家史所带来的挑战。

在此，必须最热诚地感谢那些通过阅读打字稿各部分章节而帮助我，并使我避免叙述时未注意的极大错误的同事和朋友们。埃克塞特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乔纳森·巴里、大卫·布劳恩、布里奥·考勒、朱利娅·克里克、约翰·克里什雷、罗伯尔·赫德森、琳达·赫尔贡布、尼古拉斯·奥尔姆、提姆·里斯以及彼得·怀斯曼等，都给予了很大帮助。许多其他的同事和朋友，包括我于 1993 年至 1994 年作为欧洲史访问学者工作过的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也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帮助。书中任何受到批评和尚需解决的问题都由我负责。在撰稿过程中，罗丝玛莉·布拉德利、梅勒妮·怀特和达米安·汤普森提供了建议和支持，苏珊·博尔索姆－莫里斯是位出色的插图学者。最后我应当感谢陪伴我的约瑟芬·麦克唐弗。

科林·琼斯

序　言

伊曼纽尔·利－罗伊·拉杜里

[7]　《剑桥插图法国史》以自己的方式对英法或法英关系这一诱人而又棘手的题目提供了出色的范例。这是一个有许多话可说的题目。

在加洛林时期，当“法兰西”和“日耳曼”是查理大帝所建立的广阔而脆弱的欧洲各国的中心时，英格兰自己使自己——借用一句名言——与大陆“割开”。自 1066 年直到整个中世纪，征服者威廉和他的继任者控制着包括诺曼底的英格兰。尽管这种接触并不总是受到赞赏，然而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出占领、合作与抵抗的错综复杂和时代错误……在导致触目惊心的漫长灾难的“百年战争”之前，金雀花王朝已经将英格兰的影响带到加隆地区。两国之间的接触因此也很少具有爆炸性。尽管宗教不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法国人高度评价与英国的接触。自 1595 年至 1925 年的每一个学术、政治开放时期，都带有亲英的文化和外交色彩。亨利四世依靠他的“伊丽莎白好姐妹”，马扎然是克伦威尔的盟友；迪布瓦和弗勒里的大臣们缔造了一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友好时期，此时恰逢法兰西启蒙时代，受到牛顿和莎士比亚的影响；同样到了 19 世纪，许多经济和政治模式（议会制度、自由贸易和出版自由）也来自英格兰。

然而这一关系的另一面则是冲突。自黎世留时期起，法国总是处于顶峰，但自“七年战争”时起，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将近两个世纪中，法国不断被战败，先是被伙同普鲁士的英国人，继而被日耳曼人（后来也成为英国人之敌）击败。1914 年至 1918 年的战争从理论上讲是法国人的胜利；但是 150 万法国人丧生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此后，1940 年又发生了甚至更加巨大的灾难。

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法国人在 1945 年至 1950 年之后要进行国家清算。他们希望与德国和解，他们自己也无条件地投身到欧洲冒险之中。战后的英国人却与此相反，仍然与欧洲大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对大陆心存疑虑。

科林·琼斯的著作与此看法自然是绝对对立的。他的《剑桥插图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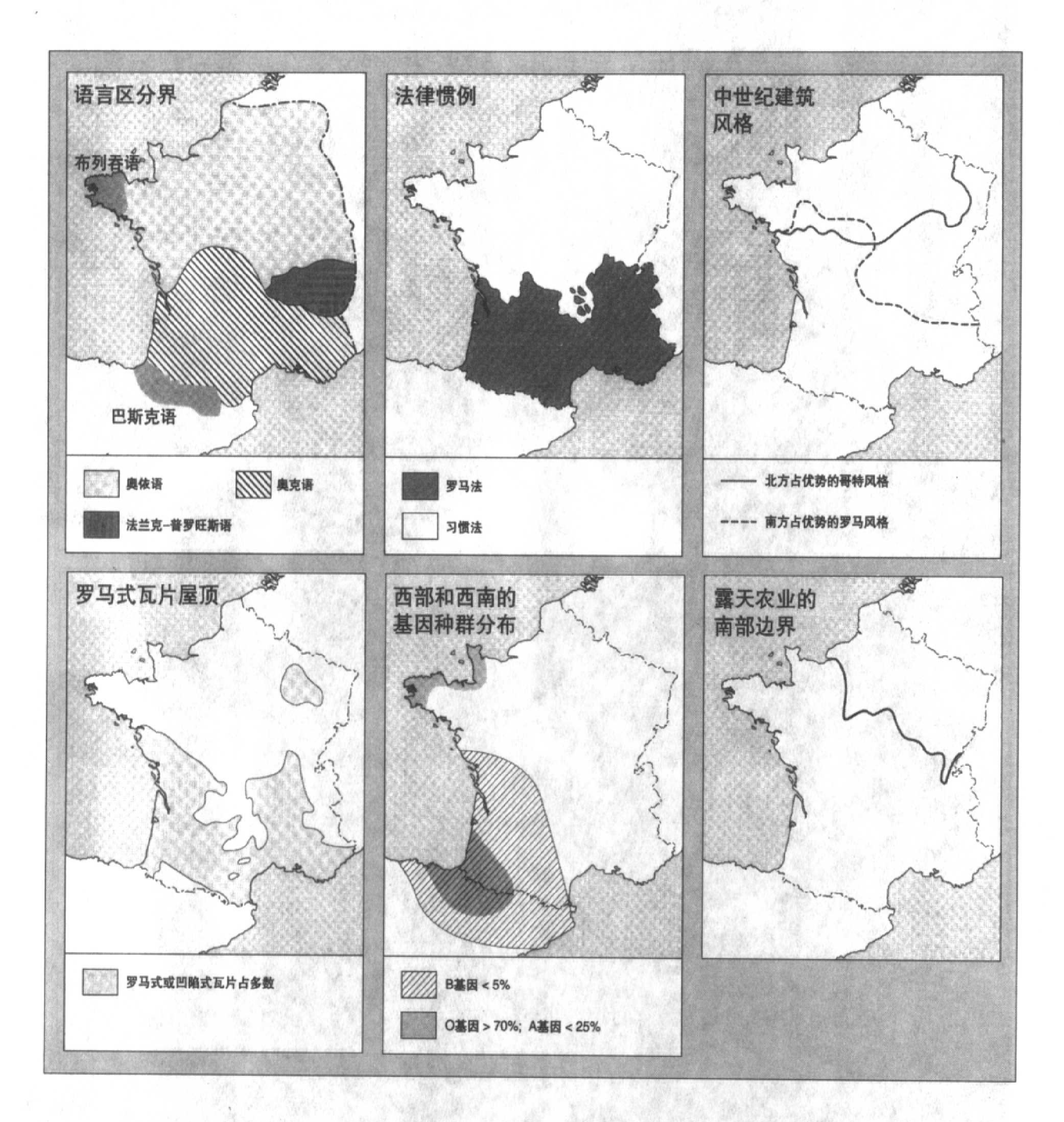
史》是一部使他的同胞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邻居的著作。琼斯用新史学技术手段所发现的法国历史揭示了出乎意料丰富、鲜明的材料，而他们过去却被那些只注重历史事件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既有法国人也有英国人）所忽略。本书具有权威性，文笔流畅，思路扎实，是近来难得见到的关于法国历史的著作，应当为英伦岛以外的英语世界全面了解。

引 言

[8] 我们可以大致上自北向南画线，穿过下朗格多克地中海沿岸的埃罗省中部，将该地区分为东、西两区。在东区，足球是冬季的主要游戏（写作本文时，蒙彼利埃队是国家足联甲级队）；在西边橄榄球具有同样的作用（在20世纪70到80年代，贝基埃是法国头号橄榄球俱乐部）。该省的这一分界——大致沿埃罗河谷画线——从总体来讲，与该地区悠久的历史中所能发现的分裂相一致。左翼选民在西部占优势，这在传统上就有别于东部的右翼支持者；东部的1789年革命支持者不同于西部的持不同政见者；西部16世纪的新教徒有别于东部的天主教徒；西部中世纪末期的纯洁派教徒不同于东部的正统天主教徒。中世纪初期创立的主教区结构再次分裂。这甚至还可能追溯至前罗马时代；考古学家确认这里有一条文化分界线，西部是阿雷克米西组群，其物质文化与东部的台克托萨日组群不同。

这类故事发生在法国的许多地区。如果说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或者是看不到他们，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专业历史学家倾向于对较短的时期从事研究工作，忽略了尽可能宽广的视野。此外，也应归咎于这一事实：即对法国大部分时期的历史研究，更热衷于民族团结，而不是探索法兰西境内的区别、分歧和多元化。这样的历史就会被写成惟有值得探讨的文化边界，才是把法国人和无差异的“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在这一点上，民族历史确实是些沉溺于洋溢着炫耀并常常飘摇着沙文主义旗帜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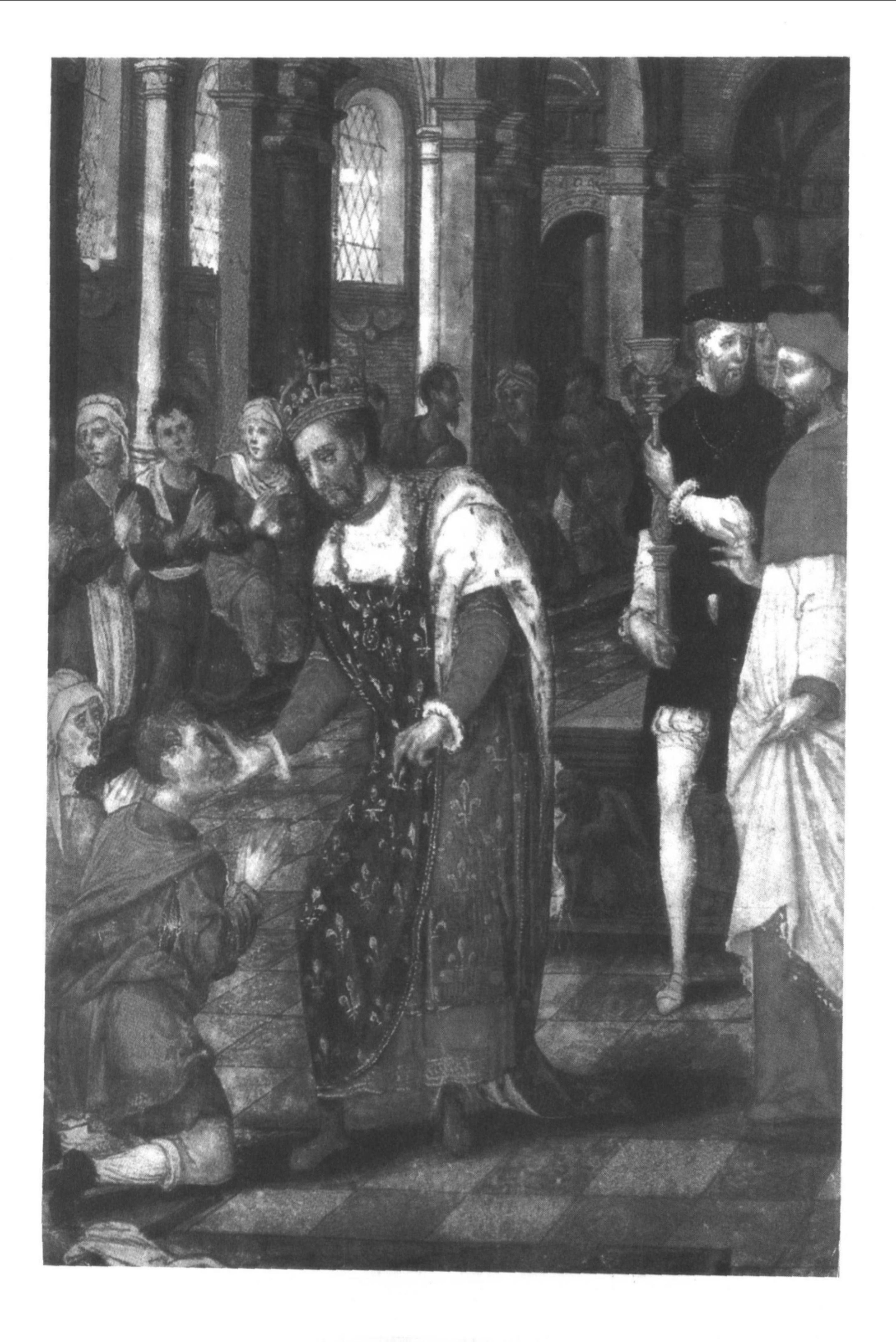
19世纪的历史学家——当民族历史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时——设想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操共同语言、具有共同种族特点和共同文化的人群，有别于他们的邻国。于是，当这些特点过去并没有按现在的国家边界来区分时，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民族国家的万棱镜来显示人们如何能够拥有相同的种族、文化和政治遗产。共同身份往往是以巴黎及其郊区为中心确定的。“真正的法国”，米歇莱（一个巴黎人）曾宣布，“是法国北部”——这无疑和不足为凭的戴高乐（一个北方人）的说法一脉相承，即“非洲从



文化边界线。深刻的内部界线在从语言到建筑风格的差异等各个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这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划分——如人种地理分布的区别较为明显。总体来说，一个人类学家可以毫无困难地画出南北分界线。

里昂开始”。正是在巴黎地区，本世纪来临时一位最享有声望的民族历史学家宣布，“这里是民族历史的主要发祥地”。

确实，如埃罗省所提供的例子那样，假如只盯着这种日趋过时的模式，那么我们就会损失巨大。如果我们想理解过去是什么激励人民，那么考察主要的内在文化分界线就像考察确定国家边界的政治分界线一样有所[9]裨益和价值。甚至在20世纪末期法国的身份属性仍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在某些方面，许多人仍将自己算做奥弗涅人、布列吞人或是巴斯克人，而



不是法国人。这一点证明了地区划分的持久性。

法国国内语言分界线的长期存在，是对直到最近仍然假设法兰西民族从任何重要意义上来说都是统一语言的讽刺。主要的划分——在南方的奥 [10] 克语和北方的奥依语——仅是很重要的分界线之一。19世纪中期，在法国有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并不讲法语，而且还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太懂法语。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北方：离巴黎50公里远的农民们第一语言是皮卡尔迪语；我们还注意到在北方，阿莫尼卡半岛有一帮讲布列塔尼语的人，东部是讲日耳曼语的，与比利时接壤的地方有一小部分人讲佛兰芒语。然而，大多数抵制法语的人在南方的奥克语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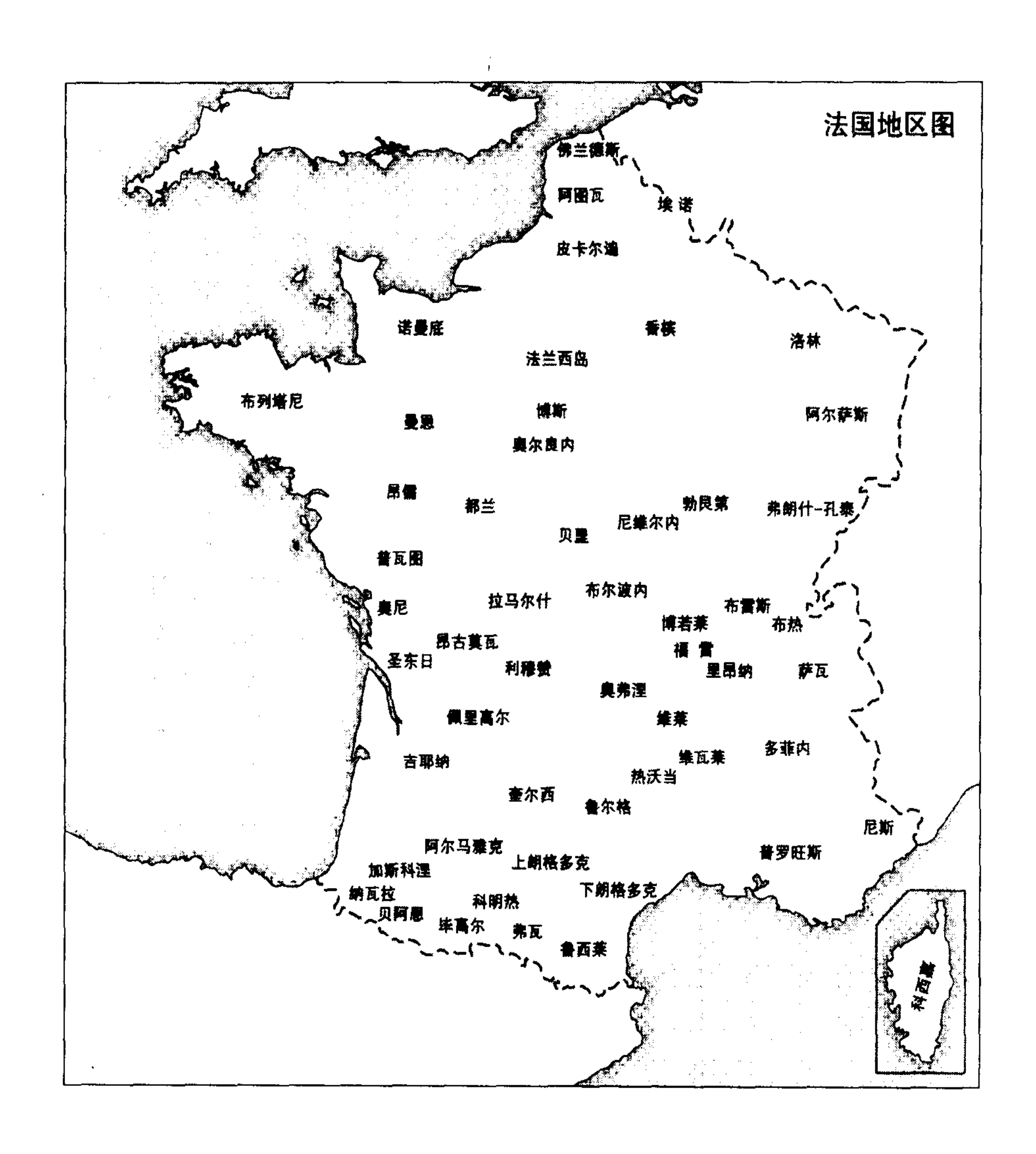
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分界线在法国历史上经常凸现出来。区分采用习惯法的北方与把罗马法作为当地法律规范基础的南方，其在地图上的分界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特点就是与财产传递相联系。这条界线更多地和日常物质文化的区别相吻合，例如房顶和水车。将此与截然不同的中世纪界线相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这表明中世纪哥特式和罗马风格建筑在当地占据优势。

除了南北分界线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例如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巴斯克地区和卡斯科尼西南的人看上去与法国其他地区（以及大多数西欧地区）的人非常不一样，从而形成一条分界线，具有另外一种突出的文化表现形式。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耕种风格和社会结构——从海峡沿岸到日内瓦也有一条界线划分出区别来。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设想文化界线仅仅是在地理上存在，以及只是对地方主义才具有重要性。尽管我曾特别强调地理因素来说明这一点，不过性别和社会阶层与区域等无一不是界线、差异和身份的关键部分。在最近几十年，许多关于法国历史的优秀著作——特别是传统上被称为编年史学家的作品——已经试图揭示工人、农民、边缘人群以及妇女的世界，因此将历史分界线涵盖私人和公共生活变得非常迫切。例如，当我们从这些丰富来源中取材时就可以在法国历史中包括妇女，而不仅限于女王或王室贵妇。农民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促进者”而不是碍事者，是边缘人群而不是需要加以镇压的威胁，是殖民的社会而不是期待宗主国完成文明化使命的“原始住民”。法国历史现在看上去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特别是与只写我们可称之为“北方男性白人精英死者”的少数人员成就的编年史相比。

《剑桥插图史》的版式使它能够很好地对地区性、阶层、人种和其他原则差异等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图示法可以凸现和挖掘出地区差别。另外，插图可以描绘法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多样性：王家加冕礼场面与原始避孕工具并列；哥特式教堂与批量生产的雪铁龙轿车相互叠加（如

（第6页）亨利二世（1547年—1559年在位）治疗“国王魔鬼”（淋巴结核）的仪式。“王室触摸”具有天赐神力的信仰始于11世纪，卡佩王室出于宣传的目的使其成为一种仪式。过去国王触摸病人，口中说道：“国王摸你，上帝治你。”到18世纪这种说法变为“国王摸你，愿上帝治好你”——成为虚拟语气。这反映出如果不把被触摸者算在内的话对触摸者作用的怀疑。这幅图取自一本带插图的16世纪的手稿《亨利二世的岁月》。



自1789年以来，法国行政区域是以“省”来划分的，取代了千年以来古老的领土区域划分。某些省的名字可以追溯到罗马入侵前，例如奥弗涅，就是朱利叶斯·凯撒最可怕的对手阿弗尔纳人的故乡。其他地名也来自于后罗马祖先，例如勃艮第是野蛮人勃艮第人的故乡；或是更晚些时候，通常是中世纪祖先，例如吉耶纳和朗格多克就是始于13世纪。

同我们所见到的后结构派画家罗兰·巴瑟正在将两者进行比较)；艺术理论著作在连环画插图旁有一席之地；中世纪手抄本的智慧之光照耀着20世纪街道上的涂鸦；凡尔赛的王家宫殿旁并列着20世纪的贫民窟；史前巨柱耸立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旁边。

然而我们并不打算将此类想像在本书中仅靠插图来说明。形象既可用来描述，也可用来说明。某些东西如硬币上的国王形象一看就是在讲述着政治力量。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油画中的法国国王正在“触摸”生病的穷人，治好他们所患的“国王的魔鬼（淋巴结核)”。这可以表明长期执著的文化实践；但是，在设想法国国王具有神奇力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王家渲染鼓吹的背景。同样，19世纪末教科书中的法国历史插图也不能仅仅被看做是陈旧的故事，而应当做为一个更广泛的计划，即把都市价值观和民族主义价值观灌输给桀骜不驯的乡下人，就像欧钦·威博所说“把[13]农民变成法国人”。较近时期关于1968年“五月事件”的报纸照片和电视

新闻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记录了发生在首都大街上的事情，而且表明公众舆论的形成及对政界回应的制约。显然，具有镇压性质的体制打算像管制书籍那样管制形象，因为正如形象表达能描绘历史那样它们也能创造历史。

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国历史看上去开始与通常多时期历史的老式描述大不一样。所显露出的不是逐步展示诸如“法兰西”、“法国式”和“国家”等主要真相，而是顺从感，甚至脆弱感这一类日常用语。我们可以乐观地打赌，由于法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弹性和持久性，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类似事件是不可能在法国发生的。然而这些事件使我们产生有时激愤有时恐惧的感觉，因为虽然他们会堕落和破坏——但也会创造甚至发明。正如我们的新闻报纸展示的那样，国家的形成（和变形）过程会对看上去很牢靠的诸如阶级、地区主义、种族划分，及男性和女性等定义，产生撞击效应。在此背景下，人们才开始了解即使是在建立根基最牢固的民族国家，关于身份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被不断地谈判和再谈判，并被永无休止地定义和再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接触到社会和文化经验的核心。诸如“民族”和“民族身份”——在本书中的“法国”和“法国式”——看来与其说是解决办法，不如说是提出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本书试图撰写一部对此事实引起警觉的法国历史。

第一章　罗马人之前的法国

[14] 人类的踪迹几乎是毫无察觉地悄悄进入了法国历史。尽管欧洲不能与非洲的考古记录相比，因为非洲发现了400万年以前的人类遗迹，而在法国发现的人类祖先的遗迹则是200万年以前的。特别是在法国发现的直立人类的生物遗迹大约是属于50多万年以前的；然后发现的是穴居人，他们出现在公元前10万年，特点是身材矮小粗壮，头颅硕大，面部多皱纹，五官突出。直到公元前4万年时才发生变化——其原因完全不得而知——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从他们身上可以认出我们自己。

这些发展是在冰川时代带来的大范围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地质学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即最早期的冰川时期：冰层从北部冲到英格兰和日耳曼北部，以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低地国家；一个较小的冰帽耸立在阿尔卑斯山；冰川从比利牛斯山散布到中央高地；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卢瓦河谷都是四季不化的坚冰冻土。然而随着解冻时期的到来，冰块也四处散布。接着是较暖和的间冰期时代，这一时期大约持续了九万年至九千年之间，人类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由于对早期人类情况知之甚少，我们主要依据的是考古记录。考古学家根据当时社会所使用的工具来区分史前各个时期。石器时代使用石头做的工具，这一时期并被分为旧石器时代（在法国最早是公元前6000年）和使用打磨石器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1800年）。从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特别是从以狩猎、群居为主的生活方式过渡到以定居农耕为特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金属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1800年，当时社会上开始使用铜，后来是青铜制造的工具。青铜器时代（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700年）之后是铁器时代（公元前700年—古罗马时代），这样称呼缘于对这种结实牢固的金属的广泛使用。

在这一段时期，法国承受着移民浪潮，特别是来自东部的移民运动，其原因和范围始终是一个谜团。由于人口增长水平超过食物供应所形成的压力，可能是造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恶化，例如人们作为食物的动物数量减少，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新来的人口带来新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方式，这可能会被当地居民接受并随后传播开。公元1世纪或公元

前来到法国并在那里居住下来的罗马人，随身带来的不仅是他们比较复杂 15 奥妙的文化，还把文字带到了法国。随着罗马人的到来，法国从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进入了历史的范畴。

旧石器时代

早期社会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在冰川时代地质和气候变化的时期。冰层的前进和后退造成了当地植物圈和生物圈极大的变化。冰川时期是以坚冰冰原为主，而间冰时期则可能变暖，随之而来的是冻土带让位于原始森林。令人吃惊的是，大量动物生活在这个时期或更早一些的时期，其品种有极地类（麝牛、驯鹿）至国内亚热带地区的食肉动物（鬣狗、狮子），温暖地区的食草类动物（赤鹿、欧洲野牛），还有山地动物（羚羊、狗熊、巨角塔尔羊）和草地驯养动物（马）；更不用说那些已经绝种的品种，如猛犸象（其遗骸在法国直至地中海沿岸均有发现）、长毛犀牛和各种类型的河马。所有这些动物曾一度是早期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

这段时期常常被称做“狩猎者时代”。然而这种叫法似乎完全不合

洞穴艺术中最著名的范例：公元前 16000 年—14000 年的拉斯库洞穴。





上加隆河地区的“莱皮格的维纳斯”。这个年代约有两万年之久的象牙雕像典型地类似手提之物或壁挂饰物，所塑造的女人形象夸张（肥大的腰、胸和臀）。这可能是生殖崇拜的一部分。

适，因为植物可能比猎物更能为史前居民们提供食物。更主要的是采集植物和浆果是妇女而不是男人干的活，与狩猎相比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如果说妇女们把猛犸象、长毛犀、麝鹿和他们的同类留给了男人，那么她们自己则可能只是去俘获一些小动物，如兔子和其他啮齿动物等。按性别 16 分工可能已经比较发达，男人专司捕捉大动物、进行战争等，大概还制造工具；而女人则采集食物，可能还照顾孩子。我们把这一时期描绘成团体生活的黄金时代非常容易，但群体的生存依赖于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性超过个人主义。我们拥有许多关于最早期先民的直接资料，他们居住在洞穴或石窟中，成群结队进行狩猎，使用石斧、石头和计谋（特别是设置陷阱和悬崖下坠）。事实上，这些人本身既是被追捕对象也是猎人，因此他们更需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这个石器时代的生存方式部分是游牧方式。猎人—采摘者，在法国可能不会超过几万人，他们既是寄生者也是牧群的掠夺者；在寒冬时期，他们是半极地荒原的废物。某些地区可能曾经是大型狩猎区——狩猎者临时居住点，如巴黎盆地、布列塔尼、阿尔萨斯和香槟地区，他们是早期人类存在的仅有证据。那些洞穴居住点形式较多的地区为“智人”提供更合适的栖息之地。例如在道多涅地区，朝南的道多涅悬崖和韦泽尔河流的高坡上发现了两万年前的人类居住点。那里发现的公元前 16000 年至 14000 年的“驯鹿文明”遗迹，揭示出对提供大部分社会所需食物、衣着及居住地的鹿群的极大依赖性。这些遗迹见证了一种惊人的充分表现技巧和想像力的形式——洞穴艺术。

洞穴艺术所描绘的许多冰川时期的动物已最终灭绝。尽管有人辩称这一生态演变是由于人类掠夺者的过度捕猎造成的，但更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公元前 10000 年—公元前 9000 年左右时气候变暖造成了冰川融化，水位上升。连接科西嘉和撒丁岛、法国北部和英国南部的大陆桥变窄，最终被淹没；地中海沿岸的低地变成了大约是现在的形状。冻原和草地让位于森林，促使野生动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猛犸象销声匿迹了；大量游荡的驯鹿群向北移动到拉普兰家乡，并在那里生存下来；羚羊和巨角象迁到阿尔卑斯山；鹿、野猪和其他森林动物大批出现。人类族群采取了相对集中、较少流动的狩猎策略。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弓，并且在公元前 8000 年左右驯养狗作为狩猎伴侣，这些都证明了出现一种获取肉类食物的新形式。这些人群遗留下来的垃圾场表明他们更多地开发、食用森林里的产品浆果、栗子、榛子等；并且日益依靠蜗牛和其他软体动物，他们看来被大量食用。生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为从狩猎采摘转为定居耕种打下了基础。

从狩猎者到农民

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时，先民和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 [17] 变。在新石器时代，先民社会开始生产自己的食物，特别是通过种植可食用的植物和驯养家畜。这对环境产生了反馈效应：人类开始有目的地改造周围环境而不是被环境改造自己，使环境产生变化而不是被动地回应变化。

这一过程使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开来，但也有一些人群从生理上适应了新的挑战。动物群的变化，例如冻原变森林，可能迫使某些人群放弃狩猎而过上牧民或农民的生活，尤其是在狩猎所获难以维系原有的人口数量生存的情况之下。从东部来的已转向耕种的移民也同样起了一定作用。公元前8000年西亚出现农耕方式，并向外传播。在法国，这种变化是以显而易见的钳形运动方式发生的。公元前6000年左右，普罗旺斯沿海的一个地区成为第一个选择定居农耕作为生活方式的地方。看来首先被驯养的是当地野生绵羊，接着是驯养山羊和黄牛，接着是有限的粮食耕种（玉米、大麦和小米）和制陶。狩猎和采摘继续是人们生存的补充方式，但可以明显地看出，家庭里野生动物的消费量明显下降：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其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60%，而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则只占到10%。新的行业也得到发展：出现了工具加工的新形式（当时用的打磨石器和骨制品及木制品）、纺织、碾磨以及制陶。

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另一股东部来自多瑙河谷的变革潮流开始渗入法国北部。在南方，农耕方式大部分经过耕种的缓慢适应过程，而北方的征服发挥了作用。所谓的“多瑙河文化”最初是源之于那些来自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人群。多瑙河物质文化不同于南方：养殖以黄牛和猪为主，而不是绵羊和山羊；而且生产的重点是放在谷物种植上。这种农耕方式在南部和西部流行。例如在公元前4000年传到了皮卡尔迪，后来又流传到中央高地的丘陵地区；当时南方的方式也正在逐步向北方传播，大约公元前3000年时到达日内瓦和弗朗什－孔泰，从而完成了钳形运动。

法兰西民族从四处狩猎变为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以放牧和种植管理为基础，这一过程是在所谓狩猎文化推动下完成的。源自于南方，自公元前3800年至2700年起的这一文化逐步向北方传播，几乎覆盖了法兰西的全部国土，直至法兰西边界以外的许多地方。从某些方面看，拥有狩猎文化的人们是好战的新来者团体，例如他们迫使已有的牧羊团体迁到阿尔卑 [19] 斯山和中央高地。然而向狩猎文化的转化，也被当地团体以和平方式接受，因为这代表了一种对法国全国而言的新生活方式，同时也构成了移民

18

史前艺术：科斯盖洞穴

岩洞艺术是法国境内所产生的最古老的文化表现形式，远远早于希腊和罗马文明，只是最近才被承认作为法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最初考古学家往往认为史前居民是初级原始人，很难接受带修饰的史前器物的真实性。由于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某些展品引起了公众较大的兴趣，专业的评价也发生了转变。与此相矛盾的是，史前艺术进入公众领域恰好略早于印象派主义诞生的1874年。

道多涅巨大的拉斯库洞穴直到1940年才被发现，此后不断有新的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新发现是潜水员让－科斯盖1991年在离马赛东南方12公里处的默尔基乌角的发现。在科斯盖洞穴发现的绘画、雕刻和涂鸦的日期可上溯到18000年和16000年的马格达林时期。该洞穴在马格达林时期可能离海岸只有十几公里，但由于冰川时代海水上涨了100多米，从而切断了正常入口，减少了环境造成的损害。

该洞穴在普罗旺斯的地点非同寻常。尽管北至巴黎和鲁昂，南到直布罗陀海峡和西西里岛均发现过洞穴艺术，但其中大部分位于法国西南部（特别是在道多涅和比利牛斯山地区）和西班牙的东北部，洞穴艺术也往往因此而被称做“法国－坎塔布连艺术”。从另一方面看，科斯盖洞穴绘画内容相当具有史前壁画（或墙画）艺术的代表性。尽管洞穴艺术可上溯至公元前3万年，但马格达林时期却是真正的艺术爆发。其中最出色的样板——道多涅的拉斯库洞穴、西班牙桑丹德附近的阿勒塔米拉洞穴以及法国比利牛斯地区的尼乌洞穴——就是属于这一时期。

在科斯盖洞穴所发现的绘图方法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手指印、手形模、石刻和绘画并存。木炭和其他材料是常用的绘画材料。在科斯盖洞穴中特别典型的是有大量的动物图形：可以列出50多种动物的清单，马匹、野牛和野山羊是最常见的，但是也有小羚羊、猫科动物、巨型兽以及海洋动物，特别是海豹和类似企鹅的大海雀。（作为对照，拉斯库洞穴的“公牛厅”是真正的岩画艺术的西斯廷教堂，有600幅绘画和大约1500幅线刻画。）科斯盖洞穴在可携带艺术品上没有达到样板水平。然而线刻、绘画和雕刻的物品为数甚多。仅在道多涅地区的50个史前洞穴中就出土了2000多件物品：带刻纹的骨头、石头、鹿角、象牙制品，粘土人俑和类似的物品。

尽管由于海水水位上升造成现在难以进入科斯盖洞穴，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过去要进洞也绝非易事。洞穴艺术往往是在黑暗和隐密的地方，离正常的居住地较远，刻意使其只有在燃油灯的照明下才能看见。某些洞穴中岩画离入口约有1英里之遥，要穿过居住洞穴才能发现，这对人类学专家而言都是挑战。更有甚者，在拉斯库洞穴中，某些岩画距离地面达50英尺，只有用梯子才能够得着。

洞穴艺术家的身份和绘画动机仍然是个巨大秘密。在不同的洞穴中岩画风格的相似性令人猜测岩画艺术家中是否有派别存在，或是否有带学徒的做法。可以猜测的是这些画家在他们的社会中具有神秘功能，绘画岩洞是举行祈祷狩猎好运的礼仪场所。岩洞艺术充满含义，然而我们缺乏破解他们的密码。



在科斯盖洞穴（公元前16000年）顶部雕刻的大海雀，他们可能是沿海洞穴居民食物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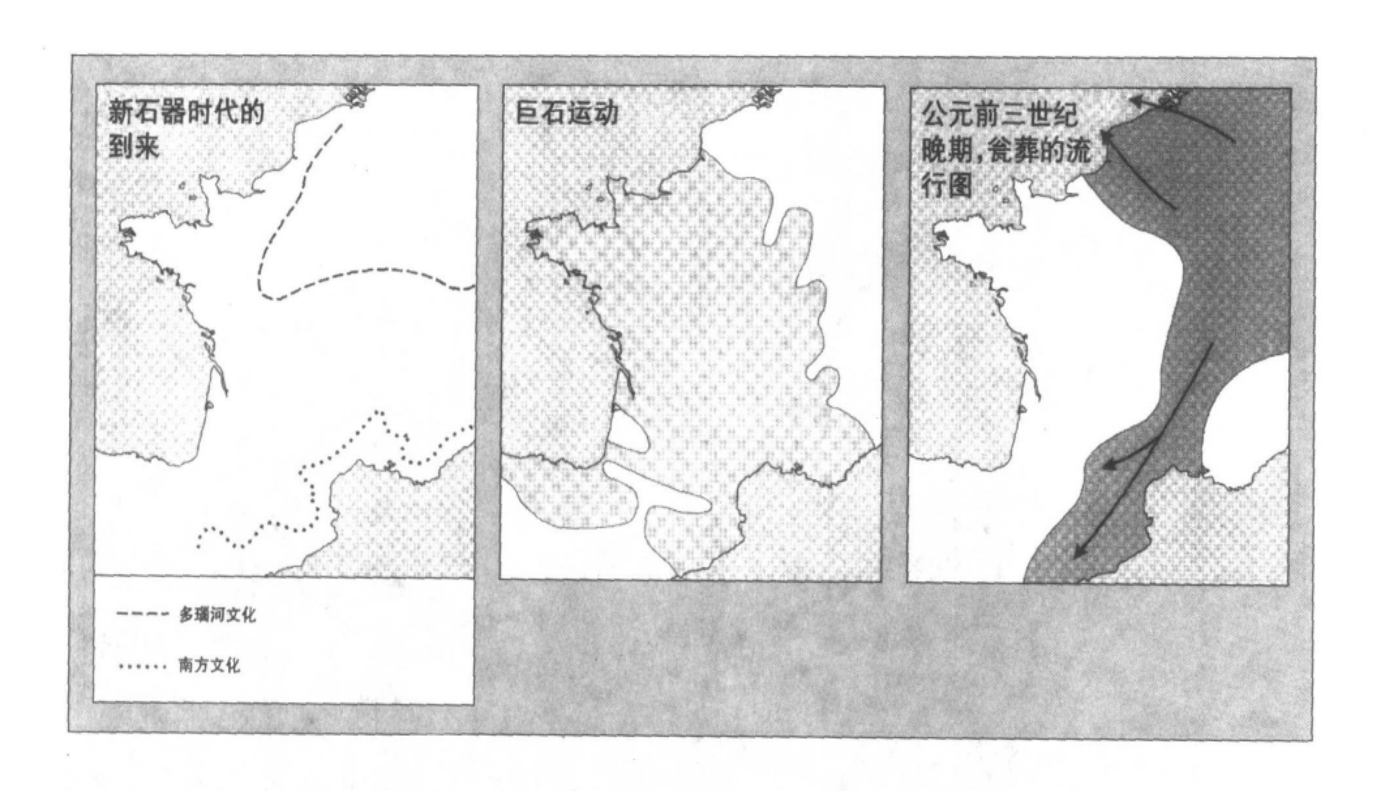


的新阶层。

科西嘉岛费里多萨的巨石纪念碑。该岛上分布的此类纪念碑数量占法国国土上发现的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科西嘉岛的巨石雕刻不仅以其形象原始（如鼻子、眼睛和嘴巴），而且也因其表现了铜器时代的随身用品（头盔、盾牌，短剑）而别具特色。他们看来是用于英雄纪念的。

对农耕方式生存的转变，传统上认为是“男人”们最伟大的成就。然而大量的考古和人种学的证据显示，最初的推动力来自于女人而不是“男人”。选种和栽种看来自然是食品采集活动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妇女所擅长的。当耕种类似于园艺时——也就是说田地邻近妇女养育孩子的人类住所——妇女可能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从各方面来说，这一演变在人类活动范围中影响巨大：人口增长，其幅度达到10倍，随后是百倍；到公元前3700年时达到10万人，在随后的千年中超过了100万，在公元前1000年初期可能达到400万至500万人的最高峰。这一现象同时是社会变化的原因和后果。

向农耕生活转变的文化潮流的缓慢性和复杂性使得考古学家谨慎地使 20 用“新石器革命”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过程。总之，难道任何历时3000年的变化——它是在公元前3000年发生在法国——可以被认真地视为“革



在现代时期之前的6000年中，法国领土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明显的变化。从狩猎采摘到放牧农耕的生活方式分布在两个主要中心（左图）——地中海南部和往东去的所谓“多瑙河文化”。巨石文化（中图）看来最初发源于大西洋沿岸，随着时间推移，分布在法国国内与国外。与此相对照的是骨灰瓮—土葬习惯源于东部地区。

命的”吗？事实上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革命”主要是演变。更重要的是它对地形地貌的影响：早期农耕者从原始森林中清理出耕地，采用刀耕火种技术，经常在一两代人后就迁往新的地区。放牧同样影响生态系统，彻底破坏某些高地的森林植被，使其成为贫瘠的土地。南部的埃居依山和旺杜山被山羊啃得光秃秃的山坡，在今天证明了早期农耕者对地貌的影响。

在公元前3000年的狩猎时期，相对单一的文化形式开始被打破。在阿尔莫尼克半岛，一个独立的部落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1800年处于全盛时期，其最重要的特有文化表现形式是巨石纪念碑。发源于法国北部的所谓塞纳－瓦兹－马恩河文化在同一时期得到广泛和深远的传播。独特的湖边居住者文明在阿尔卑斯山和汝拉山发展演变。从公元前2200年起我们开始看到了“钟杯”文化的残迹，其特点是形状特殊的陶器。后者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这也同样可能是由来自于西班牙或中欧、东欧的新族群携带而来。“钟杯”文化因其使用铜材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铜材用于装饰器皿、餐具、武器和盔甲。超越石器时代的金属时代来临了。

金属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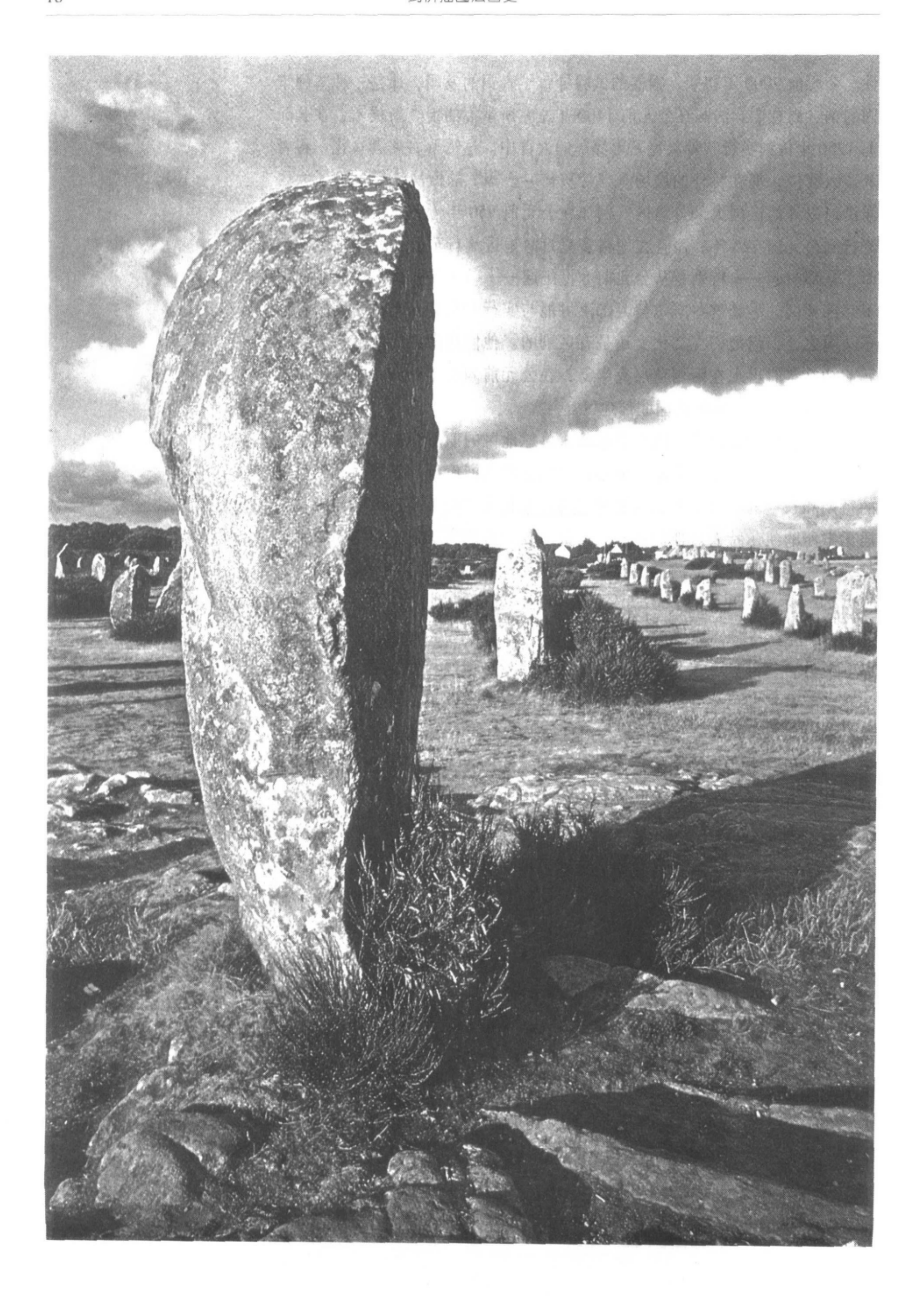
[21] 冶金技术在早期农耕社会的崛起表明了社会和经济日益增长的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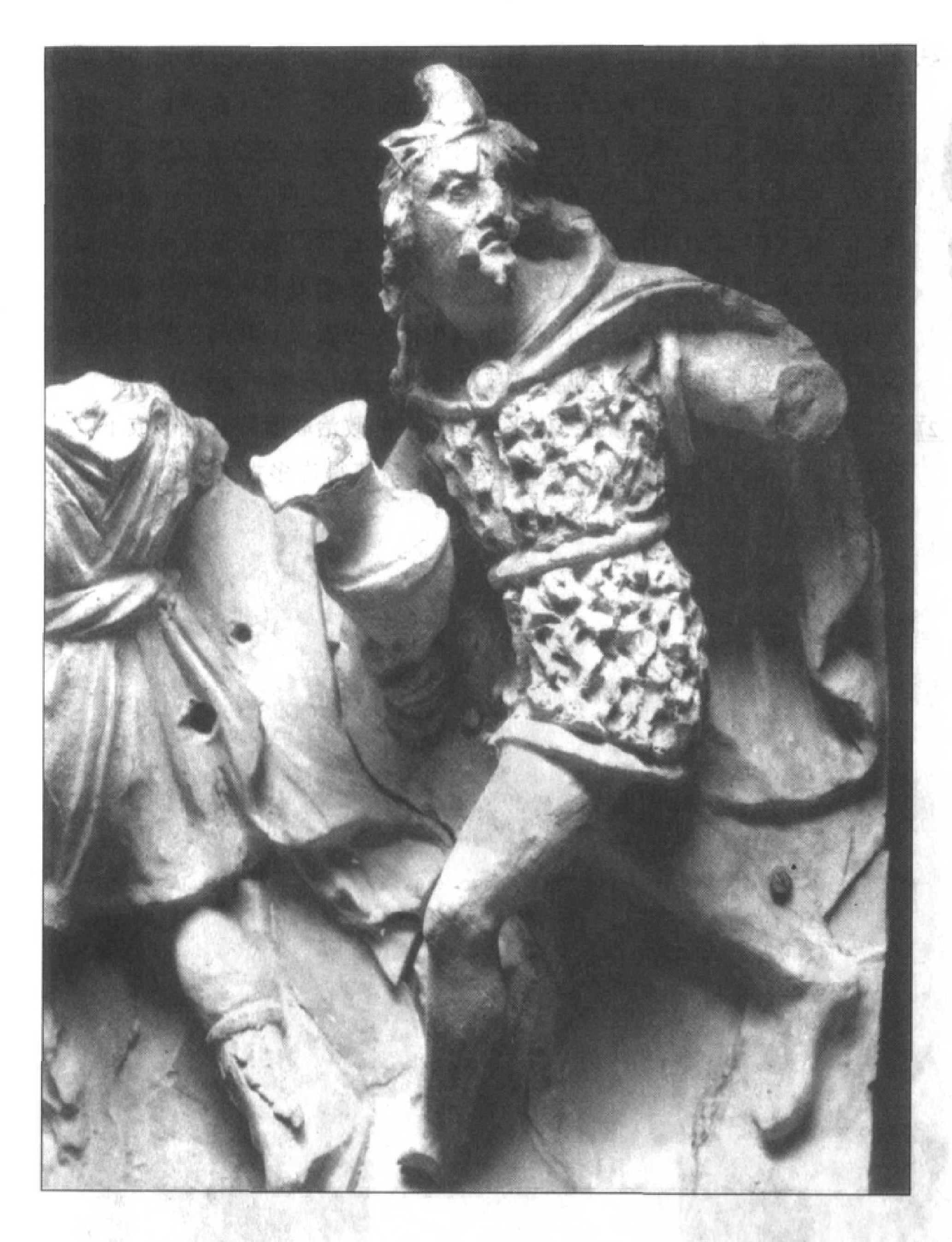
性。公元前2000年初期，铜器的试验导致了青铜的发明，那是一种坚硬牢固的铜、锡合金。法国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所掌握的冶金新技术，在公元前1250年传到实行“骨灰瓮－土葬”的人群中。这需要将死者火化，将骨灰装入瓮中，埋在村外的坟场。“骨灰瓮－土葬”的做法流行于除了大西洋沿岸以外的法国大部分地区。例如在公元前950年传到胡埃格，并一直流行到公元前725年；而且在朗格多克沿海地区流行至公元前3世纪。然而，从那时起——特别是从公元前8世纪起——新来的移民部落已经入侵了北部地区。尽管这些凯尔特人部落可能与实行骨灰瓮－土葬的人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在文化上还是有区别的。他们自南方向西部扩展，公元前700年时出现在阿尔莫尼克半岛，在公元前400年时到达了以克尔卡松和日内瓦沿海为界的法国北部地区。

这一移民阶段的产生植根于东部。草原地区的斯基泰人和近东及中东地区的社会看来是动荡浪潮的中心，他们穿越欧洲旅行，触发了几个世纪的短期和长期的移民浪潮。希腊和罗马作家首先使用“高卢”一词指这些居无定所的凯尔特人。他们在欧洲大量散居，有些人前往东南部和西部，到达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加拉提亚”（“高卢”由此而得名）。另外一批人，即“在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高卢人一路抢劫到意大利，于公元前390年血洗罗马城，然后在珀河河谷定居。还有一些人则进入伊比利亚半岛。此外，一部分人在公元前3世纪落脚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他们是定居在巴黎盆地的巴黎齐部落，到约克郡建立起了殖民地。这些流动人口看上去仅仅使用印欧语言交流。这种语言创立于公元前2000年，大部分欧洲语言都是以这种语言为基础而形成。他们为法国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根基，在此之上几乎没有发生过文化断裂：因为在法语地名中未曾发现任何此前的语言的痕迹。

凯尔特人组成了分散、松散但却强大的族群，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不久后成为罗马高卢的边界。考古学家将公元前8世纪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确定为“赫尔斯塔特”铁器文化（此名称来自奥地利靠近萨尔斯堡的一个地名），即初铁器时期文化。例如他们使用铁制犁铧，可以在坚硬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使用的沉重铁剑，也比用于防卫的青铜盔甲要更坚固，加之他们掌握的骑术，使其成为出色的武士。从公元前5世纪起，一个铁器文化时代的分支——拉代那文化（根据日内瓦湖边的一个村庄命名）时期，其陶器、武器和珠宝与众不同——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凯尔特人带着犁铧和武器而来。凯尔特武士精英组成了地主贵族。他 [23] 们采用租赁安排的方式，立足于大量以拥有大片空旷土地为特征的庄园。他们的犁铧、镰刀和收割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他们到处征战而大幅下跌的人口，从公元前500年最初的200万至300万增长至公元前





这一公元前200年高卢武士的陶俑雕像是在高卢部落几个世纪之前曾入侵的伦巴底发现的。这名狂野勇敢的武士是从不列颠到黑海均可发现的步兵战士典型。公元前58年凯撒入侵高卢时使用了更为复杂的军事技术，如战车、骑兵等。

51年罗马兼并时期的600万至800万。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妇女地位的恶化。凯尔特人的战事主要是男人们的事，只有男人才能拿得动沉重的铁制犁铧。犁地成了男人们的工作，从事大规模的畜牧以获得除了肉类以外的牛奶、皮毛等其他辅助物品的工作也同样如此。铁器时代妇女地位明显下降了。

凯尔特人的军事铁器文化等级非常森严，武士精英统治着下属的租户、食客甚至可能奴隶。在某些南方和中部地区的部落，有势力的贵族用年度选举法官的做法取代了凯尔特人世袭王位的传统体制——这种选举看

(第18页)布列塔尼卡纳克附近建于公元前2000年至前1400年的石垒，占地几平方公里，在世界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最集中。他们是用于祭祀崇拜太阳还是其他宗教仪式或是作为一种天文观象台，均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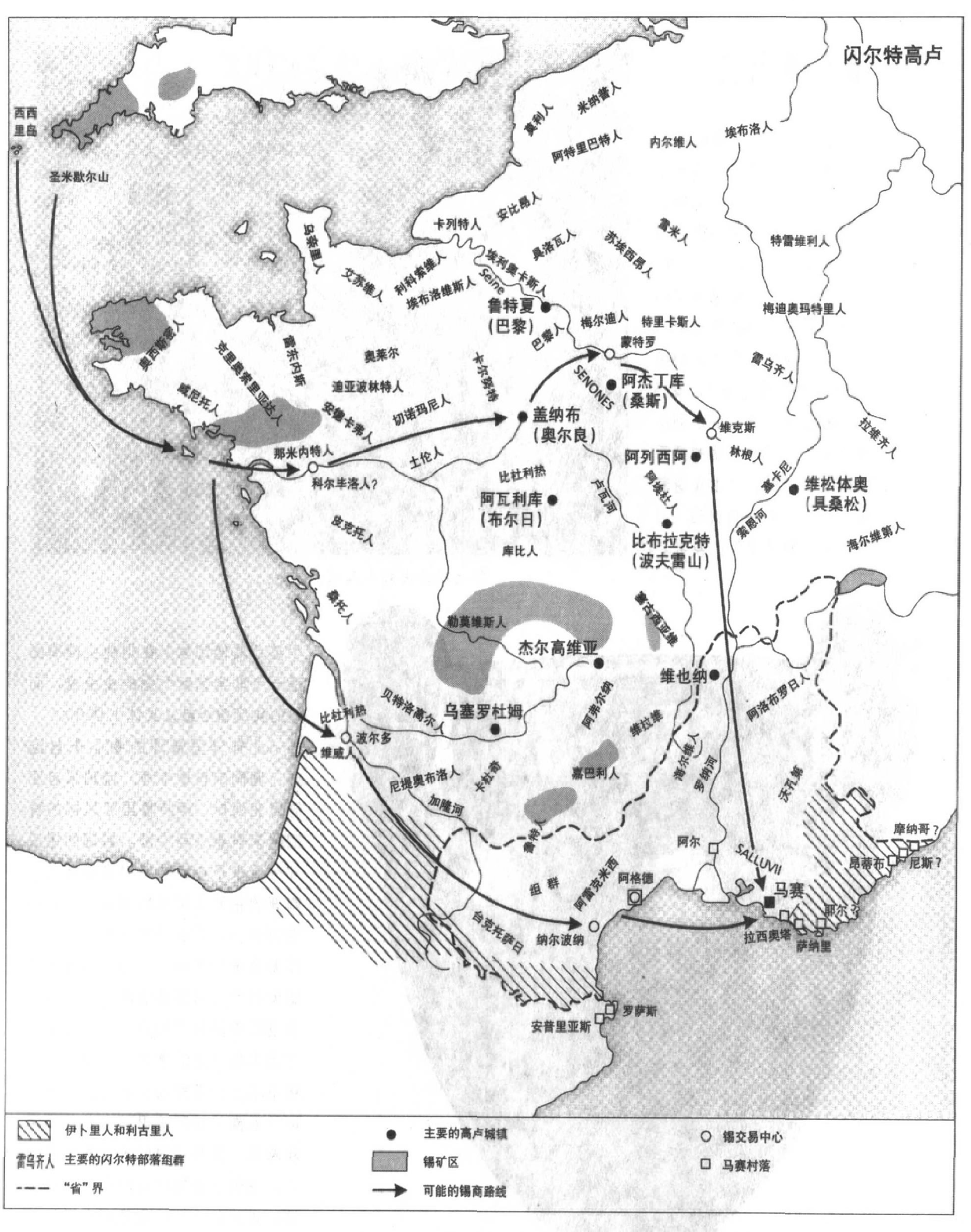


这个表现凯尔特神青铜面具是 1839 年在比利牛斯地区的蒙斯代发现的，年代为公元前世纪。眼部原来可能镶玻璃或陶瓷。

24 来更有助于稳固他们的权力。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以部落为单元的体系被打破，变成令人迷惑的拼拼凑凑的更小的分支部落，各自占领着小小的自然单元。罗马人估计高卢人拥有约 60 个部落，他们各自控制着约 300 多个领地，罗马人称他们为“帕古”（后来演变成为法文词“拜依”，意即“国家”）。在大约 1200 平方公里至 20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些单元组成了政治上各不相同的关键成分，并成为法兰西历史上即便未受到赞扬也是经久不衰的框架，许多地方历史即发生其中。入侵者朱利叶斯·凯撒后来讥讽地提到，这个地区整体上就是“被不同的语言、习惯和法律所分割”。

27 这样的“领地”诞生了，似乎由此而来的政治联盟阵营也形成了。某些部落集团能够通过松散的委托和结盟体系获得许多权力。公元前 2 世

许多古代作家提到尔特族对断头崇拜，从个祭祀之门可以找到明。该门框是在马赛附的洛克贝图斯发现的，于公元前 2 至公元前 3 纪。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门柱之间的门楣可能更长一些，骷髅头是面向房屋，而不是朝向院外。



凯尔特人在罗马人殖民之前已在高卢定居，仅东南和西南少数地区由当地人控制。凯尔特高卢人组成一个奇特拼凑而成的部落和部落分支，他们彼此结盟并经常发动战争；农耕技术相当发达。此外，锡贸易掀起了来自遥远的西部和中部的旅行和交换潮流，通过地中海沿岸那里有锡矿藏。 25

26

维克斯公主

考古学家1953年在勃艮第位于塞纳河上夏蒂荣正北方的维克斯发现了一个墓穴，里面有一个葬在一辆供仪式用的四轮车辆的铁器时代的公主或祭司，时间约为公元前525年。在这座欧洲史前最富有的贵族墓穴里所有无盖随葬物品中，最令人感到自豪的是一个巨大的碗状青铜爵罐（或祭祀容器），高5英尺，重440多磅，饰有展示列队武士的青铜环状条带，容器的把手设计为蛇形女子支撑。公主曾身着祭祀华服，而现存的仅有琥珀、云母、珍珠，和银制的首饰、耳环、项链和其他饰物。在她的头部周围是一个非常精致气派的金皇冠，而她的头颅曾经被从身体上移开。



维克斯公主的金王冠。



公元前550年至500年的维克斯青铜爵罐。

最有异国情调的物品来自远方：珊瑚来自地中海，琥珀来自亚德里亚海岸，伊特鲁里亚风格的青铜器来自意大利中部。爵罐的组成部分看来是在柯林斯湾或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居住地制造，运到维克斯现场，并在那里组装。皇冠可能源自于斯基台人，他们居住在希腊世界之外的黑海沿岸。所有这一切表明铁器时代的高卢人开始卷入了强大的交流浪潮之中。维克斯在锡市场上是重要的交易地点，将英格兰西南部和阿莫里凯半岛的资源和希腊—罗马世界的青铜匠联系起来。它位于塞纳河可航行部分的尾端，正好处于通往索恩河和罗纳河的起点，因此也可前往马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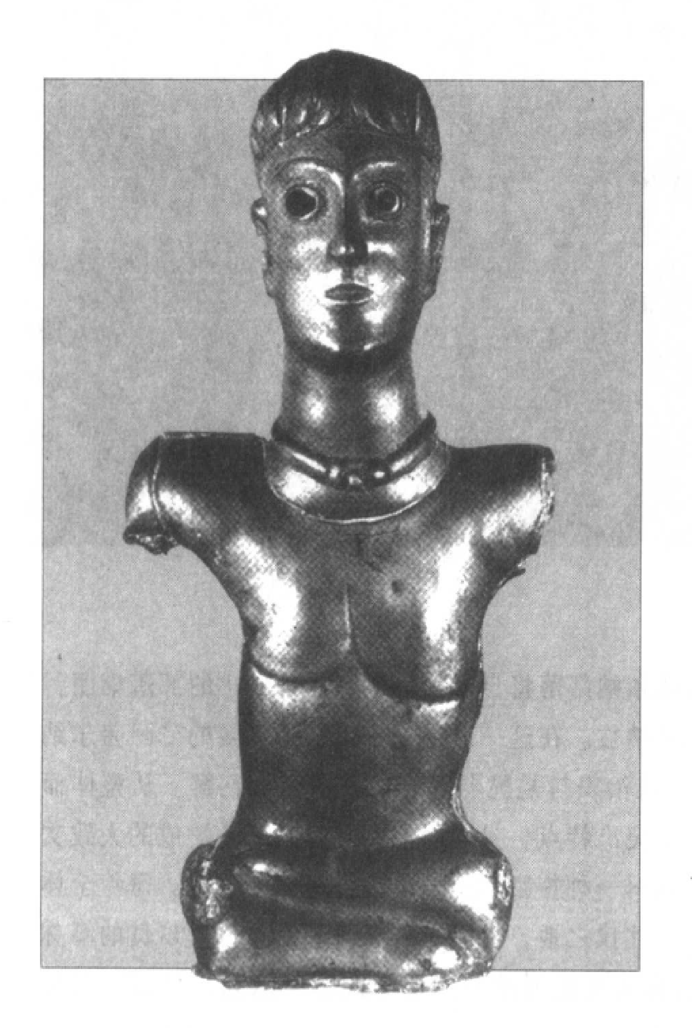


在布尔附近的克利尼发现的青铜历书。他们成于公元前1世纪晚期，是最古老和数量最大的凯尔特人手稿。凯尔特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这里使用的是拉丁字母，但其他时候是用希腊字母。历书可能是德鲁伊教徒为计算举行敬神仪式的日期而使用的。

纪，地处中央高地的阿弗尔纳部落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较小的部落集团，27 强迫他们接受勒索，称臣纳贡。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广阔的“阿弗尔纳帝国”。然而这种松散的政治安排是脆弱的，而且很容易瓦解。从整体而言，政治倾轧是高卢人的突出特点，只是因他们多神论宗教形成的大致文化团结而部分抵消。部落对一种特别教士——巫师，给予重视。每年全体凯尔特高卢人巫师在一个礼仪之地，可能是卡努特部落靠近奥尔良的森林中召开大会。巫师大会作为文化团结的体现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并没有

[28] 广泛的政治意义。尽管凯尔特人有时有粗略的同伴感情，但并没有“高卢民族”。

在公元前600年，一个新的因素引入该地区，福凯亚城市（今土耳其）在马萨利亚（今马赛）建起了希腊人殖民地。马萨利亚在法国沿海附近地区和罗纳河谷帮助建立起类似希腊本地的贸易城市。当时贸易并不发达，沿海地区更是受到严格限制。通过大量的锡贸易——铸造青铜的锡主要来自于康沃尔、不列塔尼和波希米亚——马萨利亚发展成为贸易网络的中转站，法国因此也介入其中。贸易导致修筑法国境内的地面道路，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避开北非的迦太基人的海盗抢掠。为锡贸易所修建的道路也同样为其他商品贸易所利用，南一北普通贸易的方式也逐步放宽，诸如锡、铜、铁、玻璃器皿、皮革制品、粮食、盐、奴隶，可能还有肉制品等北方商品，与地中海地区的首饰、陶罐摆设和葡萄酒等奢侈品进行交换。法国葡萄酒和橄榄树种植的诞生可能就是在马萨利亚商人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法国各地广泛流传的希腊硬币证实了福凯亚殖民地在高卢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戴项圈的高卢—罗马之神，时间为公元1世纪。该青铜像在巴黎地区的布莱发现。

商业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催动了城市的发达。小型城堡和雏形城市开 [29] 始出现。他们的物质结构和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城市发展相比，并不令人瞩目，例如除了石块筑造的防卫城墙，整个城市实际上都是木头建造的。但有些中心，如下朗格道克的恩塞吕纳就给人以深刻印象。凡有助于法国建成城市体系的工作几乎全都已经做了，除了阿登森林以外的北部和最西部的那些地区。拥有商人和手工艺人的邻近城市的诞生和分散的贵族地主庄园的出现，同样意味着进步。在布艮底的维克斯王族墓地的考古发现，从地理上显示出贵族财富的庞大程度。

然而，经济的增长并未与更伟大的政治协调相辅相成。所有道路看来都通向马萨利亚，但福凯亚人是商人而非征服者，更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宁愿建立贸易柜台，而不愿意强加政治统治的新体制。很明显，法语中受希腊语影响的词汇主要大量存在于航海、捕鱼和气象等方面，在地名中则只有极少量的希腊语。

然而希腊商人为罗马军团将士和统治者开辟了道路。马萨利亚人在与迦太基的战斗中支持罗马，如罗马的演说家西塞罗后来写的那样，证明他们是“罗马人最忠诚的盟友”。罗马人赞赏这一支持。他们向阿尔卑斯山最初的扩张就使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与珀河河谷的阿尔比斯山这边的高卢人发生了首次接触，当时向阿尔卑斯以外地区的扩张与当地凯尔特人可能会造成摩擦。罗马人在各部落中寻找朋友和盟友。在弗朗什－孔泰地区的阿埃杜人就是最好的盟友。当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公元前 218 年骑着象群跋涉于阿尔卑斯山一带时，各部落给与不同程度的支持，这使罗马人的控制大为加强。自从公元前 125 年至 121 年间，罗马人应马萨利亚为保护自己之请与敌对的邻居作战，还有一次阿埃杜人部落求助抵抗阿洛布罗日和阿弗尔纳。其结局是罗马人直接控制了整个沿海地带。“行省”（“普罗旺斯”一词的来源）很快被用于称呼跨阿尔卑斯山高卢或纳尔榜高卢，从而表明这是罗马在北部兼并凯尔特部落的跳板，并建立起了罗马高卢。

第二章　罗马高卢

[30] 事实证明，将法国南部纳入罗马势力范围仅仅是长期流传的传奇故事的第一幕，法国成为罗马高卢的核心——一个省，或各省中的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帝国范围内的一员。征服高卢使罗马帝国的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当时帝国的边界北起苏格兰边境，南至上尼罗河之畔，西起摩洛哥和葡萄牙，东达亚美尼亚。罗马当局随车带去了罗马的税收、行政区划、造币、市场、官员、士兵，还有语言和书写。他们所有的不同方式无法估量的丰富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地区的文化建设。这个地区不仅包括未来的法国，还包括比利时和卢森堡，再加上荷兰、西德和瑞士，以及意大利沿着阿尔卑斯山的地区。罗马高卢与罗马人治下的“法兰西”相去甚远。

征服与控制

罗马帝国是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它在高卢和在其他地方的做法一样，征服，和平化和剥削；再加上奖励。罗马和任何帝国政权一样，对自己控制的紧密轨道以外的任何发展都十分敏感。例如，罗马军队击退了公元前109年至101年日耳曼辛布尔人和条顿人对法国南部的占领。另一个据称发生于公元前58年的类似进攻准备——由海尔维第人发起，他们打算从瑞士南部移民到法国南部——向罗马发出危险警报。这和不久以后发生在北方的不安定威胁相联系，日耳曼首领阿里奥维塔斯介入了阿弗尔纳人和塞卡尼人以及罗马的长期盟友阿埃杜人的争吵。罗马派出朱利叶斯·凯撒迎战这一政治军事威胁。

“在一段时期”，凯撒后来在《征高卢记》一书中写道，“高卢人比日耳曼人更好战”。他宣称，那种时候过去了，高卢人要求占领和控制，如果他们不落入日耳曼人之手，他们可能成为罗马不听话的邻居。野心勃勃的凯撒当时已在罗马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并希望有更大的舞台显示才华，于是雄心勃勃地承担了征服高卢人的任务。看来和他的预期相比，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军队，还有更多的运气。高卢人克服了他们致命的分裂本性，在阿弗尔纳安人维尔森热托里克的领导下，开展了比较团结的反抗罗马军队的斗争。凯撒于公元前52年在阿列西阿的胜利

[31]

维尔森热托里克

第一次迁徙是由维尔森热托里克，一个在他的部落中拥有很大权力的年轻的阿弗尔纳人发动的……他将随从们召唤到一起，毫无困难地激起他们的热情。当人们知道他打算去干什么的时候，许多携带武器的人加入了他的队伍……他（还）高举起来自乡下的乞丐和流浪者的旗帜。当他雇用了这些人后，也就把所有他接触到的阿弗尔纳人吸引到他这一边。他很快就有了庞大的队伍，号召他们在捍卫高卢人自由的事业中拿起武器。他很快赢得了塞农人、巴黎人、皮克托人、土伦人、奥莱尔人、勒莫维斯人、安德人和所有其他大西洋沿岸的部落的支持。大家一致同意授予他最高指挥权力。

朱利叶斯·凯撒的《征高卢记》是他在公元前58年至51年间征服高卢的理由和证明。我们可能有理由怀疑，他关于这位高卢对手令人生畏的描述旨在夸大阿弗尔纳人的重要性，从而使凯撒战胜他令人印象深刻。

看来人们并不太怀疑维尔森热托里克是个出色的反抗者，但对他是否为“自由高卢人”的事业而奋斗却充满了疑问。一个来自位于中央高地的有权力的阿弗尔纳部落贵族，他的部落不久前刚从王权转变为极权，他很可能只是为了推动自己的事业。凯撒形容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和“一个严守纪律的人”，采用“野蛮手段”——例如对小小的冒犯即割耳或剜眼——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带维尔森热托里克头像的金币。

不过对高卢人而言，当时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公元前58年，凯撒正在处理战争的主要目标，迫使赫尔维特移民返回瑞士，限制渡过莱茵河回来的日耳曼领袖阿里奥维塔斯的权利。此后几年，他使比利时人和西北地区各部落就范；公元前55年，他平定了西部和西南部，在海战中战胜了强大的靠近瓦恩地区的威尼托人。他在公元前55年和54年分别攻进英格兰和越过莱茵河，取得一些不太显赫的胜利。然而，尽管凯撒在公元前53年奠定了自己的地位，维尔森热托里克联盟却使罗马统治者失去平衡。

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阿弗尔纳领袖获得了一些胜利，但他的队伍最终于公元前51年在（勃艮第靠近阿利兹的圣莱纳的）阿列西阿要塞陷入重围。冲突终于结束，维尔森热托里克被带到罗马，公元前46年作为凯撒的官方战利品受审，随后被绞死。

凯撒完成征服是以许多高卢人的鲜血为代价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场和屠城中丧生；在后来的10年中有大约50万至100万高卢人被带到意大利半岛，充斥着奴隶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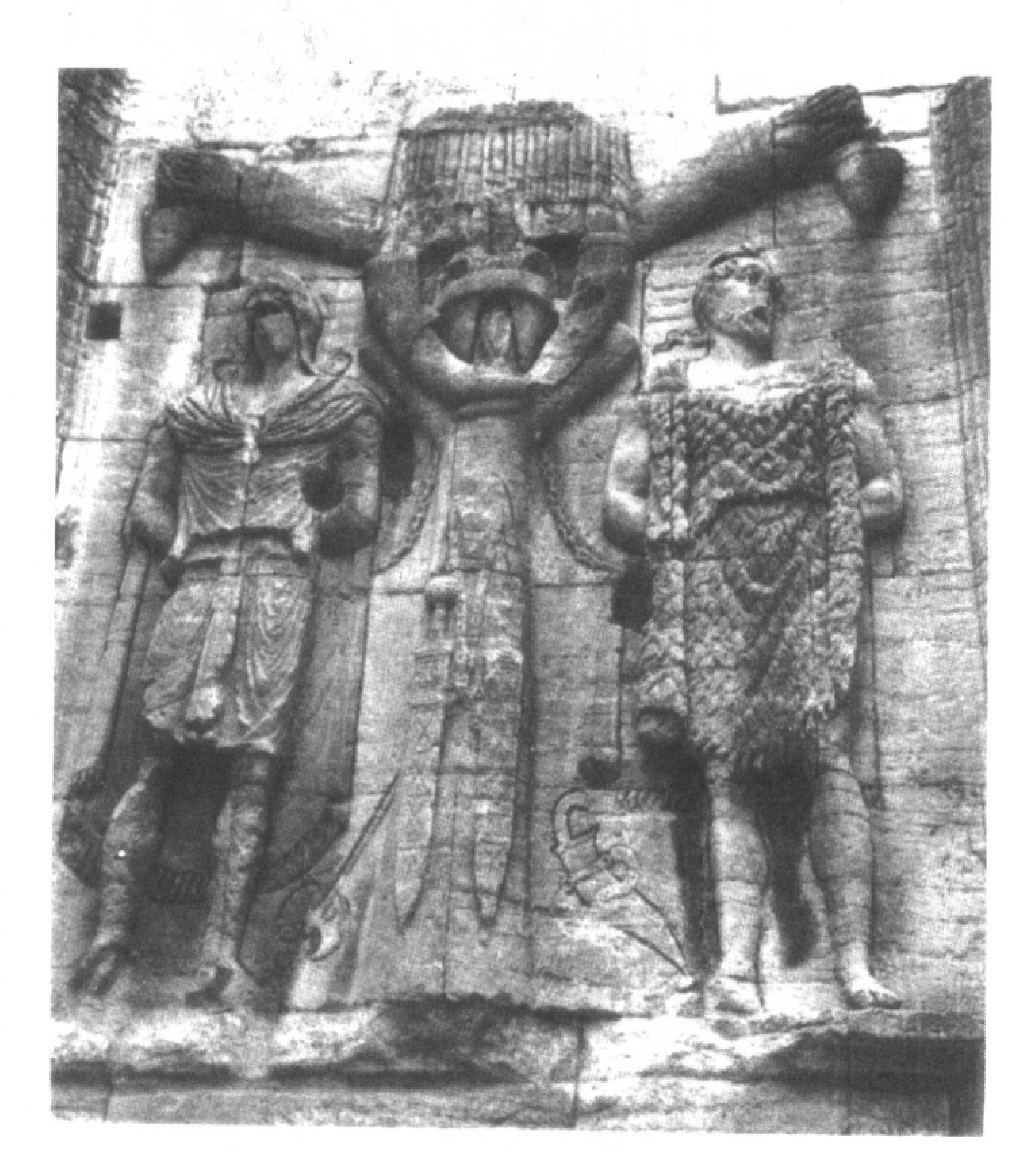
迫使维尔森热托里克投降。扫荡行动在公元前51年至52年继续进行；高卢抵抗力量的反扑又被击溃。

因此，罗马高卢是由罗马军队所创，而且赤裸裸的高压统治的威胁远未离去。莱茵边界的军团士兵始终坚守岗位。军队老兵控制的殖民居住点在给当局打气方面同样发挥了作用。罗马的道路网络已超越了经济目的，更具有政治军事动机：军队可以迅速到达秩序被打破的地方。罗马政权的 [31]

象征性语言具有极强的军事色彩，看来甚至影响了罗马的对手高卢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公元69年至70年最著名的起义者领袖朱利叶斯·萨比乌斯不是以维尔森热托里克的继承人，而是以凯撒后代的私生子的形象出现。总之，高卢人远不像他们伊比利亚半岛的邻居那样喧闹和好斗。“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获得了大多数高卢人的支持，他们可能感到罗马提供的东西要多于他们的好斗野蛮的邻居——德国。

32

止步于莱茵河周围地区的高卢，只是从某些方面看是个单一的地区。凯撒注意到它分为三个部分：（北部的）比利时高卢，（西南部的）伊比利亚高卢，再加上四处分布的凯尔特高卢。然而这张名单排除了已经罗马化的纳尔堡高卢，它是凯撒征战的坚定跳板——正如罗马1世纪时的博物学家老普利尼指出的那样，它“更像意大利而不像外省”。在公元前13年奥古斯都所辖地区的行政区划中，这个分为四部分的组织依然保留着——但



在卡尔邦特拉凯旋门上镣铐缠身的高卢囚犯是罗马武力胜利遗留下来的重大纪念。罗马帝国灭亡后，凯旋门改建为该城第一座教堂的门楣。

是边界已经重划，名字也不一样了（纳尔堡以北的阿基丹，比利时和鲁登西）。除了一些小修改，这一结构保留到公元3世纪。

尽管地区的行政管理进一步划分，但“高卢”的称呼用于表明某一文化实体，至少代表着北部3省。公元前43年，鲁顿（里昂）被定为“高卢三省”的首府。它的作用是高卢－罗马团结的象征，这一点通过公元前12 [33] 年在罗纳河与索纳河交汇点所建造的罗马和奥古斯都圣坛而得到加强。来自3个高卢省的代表们被允许在此召开年会，讨论法律和行政事务，提出需要向罗马呈递的苦情——以及参加罗马皇帝的公共礼拜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皇室崇拜的年度仪式上，最虔诚的祈祷者是高卢人。

类似的措施是帝国战略标准的一部分，目的是无须强压而获得政治一致。在相对模糊的文化联盟中设立行政划分机构是一种典型的更广义的分而治之政策。例如，在高卢战争时期高卢抵抗运动领导阶层的阿弗尔纳人就被分化了；其他部落相互竞争以获得税收和其他优惠待遇。尽管朱利叶斯·凯撒本人或别人以他的名义实行了大屠杀，但却比他的许多敌人表现得更为仁慈，他把这些敌人收入自己臣民的麾下。凯撒和奥古斯都慷慨地将罗马身份授予大法官们——这远早于卡拉卡拉皇帝（公元211年—217年在位），他在公元212年让罗马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成为自由人。在高卢地区，这一身份可以由孩子继承，从而使拥有公民权的人数大增。从军对野心勃勃的高卢人也是重要的职业和晋升之道，同时还可能进入行政管理和地方政府。公元48年，喀罗狄皇帝（公元41年—54年）说服罗马的议员接受高卢人成为其成员。这一决定部分是为了扩大罗马的统治阶层，也是为了搭起可以爬到最高层的梯子：安东尼·皮乌斯(公元138年—161年在位)皇帝的祖父就是来自尼姆。

高卢人从未对罗马中央政府机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罗马统治阶层的所有高卢人都来自于罗马化程度很高的南部高卢地区，他们在议院中的数量远不如其他人，例如非洲人。此外，如果说高卢人在罗马的影响小，罗马人在高卢地区管理和政府中的职位也较低。实际上，高卢地区的罗马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卢人治理的——主要也是管理高卢人。从意大利半岛来的移民看来不多，人数较多的是老兵，他们聚集在高卢南部。总体上看，随着朱利叶斯·凯撒的撤退，罗马当局将地方政府与以前存在的部落形式嫁接在一起，凯尔特部落就变为——往往是完全照搬——高卢—罗马的城市国家。征服前的部落群成为高卢三省的60个城市国家的基础，纳尔堡高卢地区的22个行政区同样也非常接近于征服前的区划。

出于各种最可能的意图和目的，城市国家是披着外袍的部落。高卢精英如果服从罗马的命令就被允许进行统治。法官常常仍然使用高卢头衔“维高布雷”。市政议会被引入每个地方省会，在很大程度上仍沿用征服前



的形式。在村庄这一级几乎发现不了什么变化。新税种可能源自于罗马，但按照现行的体制制定和征收，而且税率要低得多。凯尔特部落精英乐于扮成高卢—罗马贵族，这并不令人吃惊。

古罗马理想——罗马身份——是否因此而更像一张外皮？正如罗马政 35 治组织形式覆盖了旧的凯尔特行政机构那样，征服前的语言遗产一旦受到拉丁文化的影响，就永远不会被抹掉。拉丁语取代高卢语成为书面交流语言，但凯尔特人的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口头语言而非书面语言——德鲁伊教会士虽然有培养高卢政治精英的习惯，但并不注重书写文字，甚至不考虑采用他们自己的字母。罗马时期，拉丁语是精英教育语言，在许多城市，如马赛、奥顿、兰斯、图卢兹、波尔多和其他城市都有这样的学校，高卢-罗马贵族在此通过吸收拉丁语学习权势语言，提高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

罗马政权强加的做法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高卢-罗马文化混合体。但是高卢和罗马成分的混合随着时间、地点和社会等级而变化。对任何与政治和文化机构打交道的人来说，懂拉丁语都是很有用的。在城里，依附有钱顾客的陶工曾一度学习在罐子和花瓶底部写上“费希特”，而不是凯尔特语的“阿沃特”。然而，即使是相当罗马化的社会精英也不会完全丧失与凯尔特根基的接触，一个人越是往社会下层走，他就离城镇越远，在凯尔特和罗马之间他就越偏向前者。在罗马人居住区以外和后来日耳曼人定居点的地名中，高卢词汇成分比较多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当代法语中关于农活和农业技术的词汇就有凯尔特语的来源，如“英亩”和“犁头”等。

然而罗马人占领的时间越长，拉丁语的渗透就越多，甚至到达比较落后的农业地区。罗马商人、官员、劳工和士兵就是日常罗马化的载体。有时双语并用成为许多人的规范：与“上等人”讲拉丁语，而和“下层”说高卢语。但在长时期中，远远偏离正统语言的拉丁俗语开始盛行起来。在公元5世纪时，农业地区显然已经没人懂高卢语了。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日耳曼人侵者将高卢居民称为“罗马人”。甚至罗马统治的衰落也和拉丁语的胜利一样，都为法国语言发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表明，宗教因文化的混合发生了演变，而不是被替代。罗马政府发动了一场反对德鲁伊教的运动，该教的秘密会社性质，用人祭祀的做法以及进行颠覆活动的潜力都显示了其危险性。皇帝颁布敕令，管制帝国所允许的多神教崇拜，同时以所谓帝国宗教的形式加上对他们自己的崇拜。宗教就这样与帝国的体制紧密地连接起来，以至于高卢政治精英如果回避高卢地区看来一度很繁荣的异教和皇帝崇拜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在可接受的框架内，人们努力吸收早期的信仰。所以，高卢三省代表参加在里

（第30页）桑特的这座拱门中包含有一部高卢人家谱。发音像罗马名字的建造者凯乌斯·朱利叶斯·卢夫斯，与他祖父的半罗马化名字凯乌斯·朱利叶斯·热多莫以及其曾祖父不折不扣的高卢名字厄伯索洛维杜斯形成鲜明对照。高卢精英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拥有了罗马公民身份。

在克莱蒙费朗地区发现的墨丘利神雕像，其年代大约是公元1世纪晚期至4世纪之间。墨丘利神是罗马诸神中最知名的神灵之一，可能由于他与一个前罗马的神灵较为接近。犄角代表阳刚、进取和生育能力。



36 昂为罗马和奥古斯都所设神坛的年度宗教仪式，可以被视为在卡努特森林里举行的德鲁伊教年会的回应。这个仪式的日期是 8 月 1 日奥古都斯皇帝诞生日仪式；同时这一天也是凯尔特神祇卢格的节日，里昂就是因对他的崇拜而得名。此外，尽管官方施加压力，仍有许多罗马神祇被“高卢化”。同样，罗马神庙常常建在凯尔特神殿的遗址上；罗马温泉浴建在据说是凯尔特神祇居住的能够治病的泉水处。高卢－罗马的多神教是明显的两种强大而富有弹性的文化形式的结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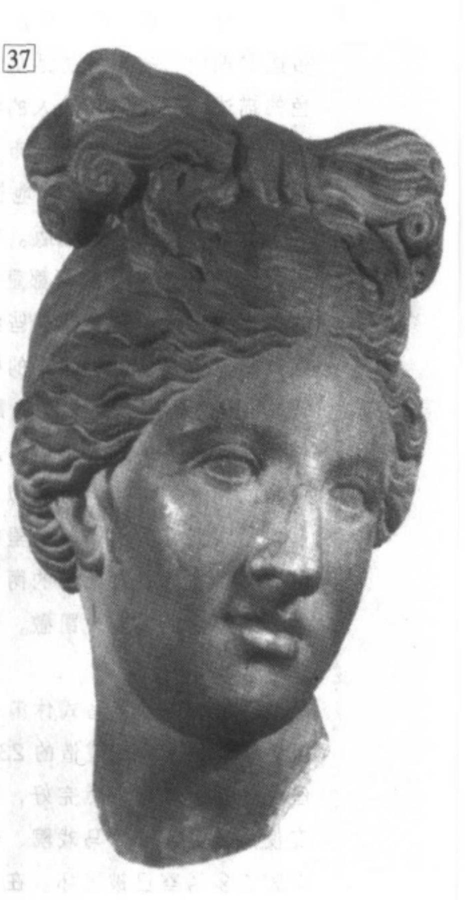
高卢－罗马宗教混合体的强大，也解释了基督教渗入高卢地区何以缓慢的原因所在。基督教仅是讲希腊语的东方神秘崇拜之一（例如：伊希斯和俄赛里斯崇拜，以及密特拉教），它在公元 2 世纪晚期随着贸易和行政管理的路线进入高卢。里昂看来居住着首批基督教团体，起初该教与罗纳河沿岸的城市联系非常紧密。直到公元 4 世纪，教堂才开始致力于组织乡村教区，并向乡村推广宗教——有意义的是拉丁语中“帕加奴斯”一词同时代表“农民”和“异教徒”。教派明显的秘密性质触发了关于可怕的谋杀仪式的流言。基督教单一、排他和不宽容——尽管它英勇地承诺遵守内在道德规范——看来是反对罗马宗教想公然将其吸纳的坚强柱石。

戴克里田（公元 284 年—305 年在位）加大了对基督徒过去只是零星受到的迫害。然而，在 20 多年内基督教从一个少数教派变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公元 313 年利西纽斯和康斯坦丁两位皇帝在“米兰诏书”中还基督徒以信教自由（后者本人就是基督徒）。早期的模式现在又转回来了。公元 4 世纪时，基督教是国家宗教，皇帝杀害异教徒并关闭他们的庙宇。公元 4 世纪时发展起来的主管教区框架强调城市性，将政教权利紧密结合起来。拉丁语不仅是祷告和神学争论的语言，而且是改变宗教信仰的语言。这是对罗马文化如此深入渗透的礼赞，教堂则是将拉丁文化向农业地区传播的重要渠道。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与“永恒之城”

将高卢并入罗马帝国不仅仅是创建了新的政治、行政和文化形式；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同样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朱利叶斯·凯撒创建了政治上无政府状态的高卢，但罗马当局的施压使其经济潜力得以发掘。罗马存在的结果是使地中海以东的财富转移到西边。相对不发达的高卢地区因接受了罗马的投资、移民、城市建设、道路改善、税收需求和军事占领而迅速发展。内部安定时期的延长——既抗击帝国以外的入侵，又镇压内部的土匪——再加上罗马税收一般比较低，而且一直由当地人员征收的做法，这些都有利于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

当时无论哪个地方的经济繁荣程度都明显低于城市，城市生活在罗马 [37] 人控制之下兴旺发达。城市是由石头而不是木条抹泥建造的，而且其规划富有想像力。有时按几何形式布置，往往采用“永恒之城”即罗马城本身的模式，许多建筑物实质上是源自罗马人建筑的翻版。私人建筑与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业和公共建筑群毗邻而立。城市里居住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艺人：除了为数众多的房屋交易商之外，从事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例如里昂有船东、筏夫、酒类进口商、粮油商、制衣商、石膏匠、银匠、玻璃匠、陶匠、毛呢商、织麻匠和制皂匠的行业协会。公共建筑中有论坛、集市和聚会场所、市政厅、法院，以及太阳神庙。与这些高卢先人们祈求的市政建筑相辅相成的还有一系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休闲设施。澡堂是城市风光中的亮点。高卢的城市中拥有不少于 79 个歌剧院，35 个露天剧场；还有 20 多个其他娱乐中心，包括马戏场和音乐厅。建造和维护这些场所对供应和设计的需求是巨大的。例如，在里昂施工用的石材是从 200 多公里外开采来的，而城市用水的供应则来自 75 公里以远的地方。



1853 年在尼姆发现的希腊风格的维纳斯头像。

在城市里物质生活可以很好。然而，全面投入到城市公共生活中的几乎全部是男性。妇女在政治、法律或城市防务问题上完全没有决策权。罗马法律实行严格的家长制。例如，父亲有权决定遗弃不想要的婴儿，也可以剥夺其后代的继承权，有时甚至干涉他们的婚姻。我们很难判断社会实践与法律规定的差别有多大。尽管父权盛行，家庭关系仍然是亲密的。然而国家始终支持提高妇女的社会权利。例如妇女有继承权，她们可以主动提出离婚，而且她们婚后的财产独立。她们在保护委托关系上起到重大作用，罗马的政治和家庭生活对此十分依赖。上层社会的妇女还可以从大量的奢侈品——首饰、金银制品、时装和化妆品——贸易中获利。然而城市以外底层社会的妇女究竟能够从中获利多少，则众说纷纭。

只要有一个按罗马规则的新城市诞生，就会随之有新的市政设施建成。令人吃惊是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了：20 世纪后期法国人口超过 10 万的 55 个城市中，37 个曾经是高卢 - 罗马城市；在 107 处曾经是当时城市国家首府的遗址中，94 处仍是今天的市镇。高卢地区没有罗马那样的大型城市（人口可能达到 70 万人），那里的最大城市——纳尔波纳、尼姆、奥顿、兰斯和特里尔——不超过 2 万到 3 万人。大多数城市要小得多，尽管他们看上去比他们实际上更大一些。的确，那些纪念碑式的城门和城墙与其说是为了军事用途，不如说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休闲设施的设 [39] 计也是挥霍无度的规模：鲁特西亚（巴黎旧称）的人口只有 8000 左右，而它的斗兽场却有 15000 个座位。

城市基础工程出色迅速地建成了。在高卢的纳尔波纳和其他地区（特别是里昂）大量的建筑项目计划由奥古斯都管理，使用他在东方胜利中获

原　书　缺　页

得的战利品。公元43年，当克劳迪亚斯皇帝为进犯不列颠做准备时，完成 [39] 高卢北部的市政和通讯基础建设十分重要。但是建设的狂热也证明了当地城市的繁荣和地方精英的公民自豪感。高卢—罗马精英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贸易和管理中为自己获得很多财富。根据城市设计，用方形巨石修的罗马道路取代了凯尔特羊肠小道，不仅为军队所用，同样促进和便利了经济交流。军队的存在同样也激活了贸易和财富——特里尔的发展和其他3、4世纪时重要的帝国城市一样，来自于它所处的紧靠莱茵河军队的战略地位。这些城市能够很好地从交通基础工程中得到好处：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不存在安全问题，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山城却远离动乱，于是一些城市离开山地，建在河流与道路交汇之处。

城市不仅可以利用其在贸易和行政机构的地位获得财富，也可以从周围的乡村大量获取。作为一个城市，图尔的编年史学家格列高利后来记载到，有人索要“城墙、皇帝诏书和农村土地”。城市和乡村由一种象征性的关系联系起来，即城市提供乡村居民所要求的市场和商业技能。许多乡村劳工当时生活在城里，拂晓时动身前往田地耕作。城市发展要求农业生产和供应达到一定水平：它要求的是养活城里6%—7%人口的前工业化经济。所取得的成果很重要，因为没有使农业生产力造成任何大的中断。因此可耕地面积增加，产量得到提高；更大量地使用罗马征服前已广泛使用的结实的带轮犁铧，谷物种植多样化；在供应和交易方面也有广泛的改进。

高卢－罗马农业的支柱是农庄经济。农庄常常是征服前高卢地产的延续，标准操作是广阔田野的大范围耕种。这种做法甚至一度流传到如不列塔尼等一些对罗马帝国不太友好的地区。农庄是由个人，还有一些奴隶根据各类合同和租赁安排为农庄主干活。许多农庄的规模巨大，类似工厂，附设有农业和加工业（纺织、酿造或编筐）使用的建筑物。有些农庄规模可达400多人，并能做到自给自足。

然而总体来说，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积累的大量财富不是刺激自给自足，而是激发了人们进入贸易安排的愿望。农庄主处于能够很好地 [40] 将其产品商品化的地位，一些独立的农民也利用了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在博斯等地区，重点进行谷物生产。其他地区也开始向专业化发展：朗格多克、鲁西永、阿尔萨斯和都灵以产酒为主，奥弗涅产大麻，贝里产亚麻，阿图瓦养鹅，阿登养羊，诸如此类。罗马人的口味在高卢流传开并带来变化：榛子和苹果让位于橄榄和葡萄的推广，还有樱桃和桃树。拥有土地在社会精英中日益被视为荣誉和身份的象征和潜在的财富，这个时代来临时，“绅士庄园主”的理想成为某种时髦。与此同时，庄园和村庄看来面临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浪潮。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在野蛮人围剿压



此装饰石条来自公元3世纪的加布里埃尔达依格的商人墓穴，其画面展示了迪朗斯河上运酒的队列。酒桶是高卢人的发明——在此以前，酒是装在石条上部所描绘的瓶子中的。

力下走向终结。

罗马高卢的衰落

朱利叶斯·凯撒曾指责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因罗马兼并高卢而发动侵略性动乱。为驱逐日耳曼侵略者而建立的防卫边界——被称为罗马帝国的长城——在形成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公元2世纪晚期，更明显是在公元3、4世纪时，日耳曼压力构成了推翻罗马政治结构的威胁。边界上的防卫长城像筛子一样漏洞百出。然而认为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的陷落仅仅是野蛮人外部施压所致的观点是很有误导性的。罗马当局也是由于社会、政治和人口等问题从内部土崩瓦解的。这的确是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在几个世纪的衰落期中，野蛮人却又是支撑罗马政权的工具，让它得以苟延残喘。

罗马人和野蛮人并不是对立的两极：他们曾经几个世纪生活在水乳交融的文化氛围中。历史学家常用地震学的词语如“洪水”“波浪”和“吞没”等来描述日耳曼人入侵（或者是移民?），是相当不合适的。这会把较早时期的“移民细流”和公元3、4世纪的规模相对较小的日耳曼队伍混淆起来，他们可能只有上万而不是上十万。如同我们所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不过是想要以罗马高卢的方式定居下来，况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具有很重的罗马特征。洪水的隐喻同样混淆了一个事实，即直到公元5

世纪，很多地区只经受了野蛮人有限的破坏的经历：在紧邻罗马帝国长城的弗朗什－孔泰部分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过侵扰，西南许多地区在公元3、4世纪时度过了其黄金时代。

过于强调“野蛮人”对罗马衰落的作用，掩盖了帝国内部困难的严重性。自公元3世纪中期起，中央政治混乱使稳定的政治结构难以为继，而且问题已经超越了政治意愿。帝国还面临人口素质下降的困境。罗马家庭的法律地位对大家庭不利。由于妇女有继承权，人们可以在生命终结前选定继承人，这意味着与通常出生死亡率高的社会相比，人们生育的动力较低。罗马家庭法在影响城市精英大家庭的同时，农业地区因财征和社会压力而导致人口更为减少。

罗马帝国的建立对纳税人而言付出很少：经常性的掠夺使创建成本从纳税人身上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然而当抢夺已到尽头，军队的开支和帝国官僚机构的开支负担就都落在了罗马人身上。罗马税收体制是递减税体制，这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而农民生活已经接近等待救济的水平。从公元3世纪起，征税变为按个人征收而不是团体征收，问题日趋严重。高 42 度通货膨胀和传染病蔓延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农民被迫将土地卖给大地主，有的人还放弃了自己的少量家产而移居城市，那里提供公共救济——从面包到马戏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业的可能性也大一些。有些地区有重返中石器时代洞穴居住的迹象。一些农民投身绿林，过起土匪和拦路抢劫的阴暗生活。名为巴高达的农民闹事运动贯穿了公元3世纪中后期的高卢农业史。劳动力短缺使得庄园主强化了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规定——

41

罗马时期的古长城

将日耳曼与罗马世界区分开来的防卫边界——被称为长城——起初是一条散布着零零星星瞭望站的边界。后来逐步增加了复杂的防御系统、城墙、栅栏和支援通道；公元3世纪时，每500米建一座瞭望塔，辅之以精密而广泛的军事化行政体制，部署着罗马帝国密度最大的军队。

从军事上来说，城墙只要能够使军队待在其后面就是有效的。这也构成一种行政性和象征性的标志，而并非攻不破的屏障。自公元2世纪以来，这道城墙在野蛮人袭击中的命运无常，就体现出它在军事上的局限性。称高卢－罗马文明源自于被罗马人视为野蛮之乡的地方的说法并不是一种侮辱，因为不可能完全阻止边界两边的人员接触。贸易穿越了分界线：野蛮人提供奴隶、动物制品和琥珀，而罗马帝国则向对方提供贵金属、银制饮水器具、武器和盔甲，以及其他奢侈品；这些最初都是提供给日耳曼部落的武士精英的。罗马时期的古长城也未能制止移民的定居。的确，当罗马当局越过边界保卫长城时需要依靠日耳曼部落。

最初，古长城可能代表确定界线的政治意图，并使流动的世界拥有秩序和稳定。当把罗马人从日耳曼人世界划分出来，建立地区安全而非扩张时，罗马将“日耳曼”的定义作为野蛮的象征，就如同在一个分裂而特殊的地区之外建立一个虚幻统一的罗马高卢。

这是罗马支持的做法；其后果则是掀起了心怀不满的难民离开土地的潮流，他们投身到巴高达的起义队伍之中。



这个生动而栩栩如生的公元 2 世纪陪葬物来自高卢西南部，描绘出一个 10 岁的男孩捧着他的玩具：一只猫和一只驯养的小公鸡——也是复活的象征，小公鸡轻轻地叼着小猫的尾巴。

大量农民离开生产性岗位转入服务领域工作，或在经济上依赖社会，加重了一个有争议的过度城市化帝国的负担。如果农业生产效率能够保持稳定水平，只需依靠罗马出色的分配和交易的基础设施即可保持繁荣。然而在公元 2 世纪末就出现的大规模饥荒表明这一体系已经被打破。巴高达运动加剧了农村的动荡；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日耳曼人的移民运动带来的不仅是对财产和人员的破坏，还摧毁了运作良好的交易系统，而经济的繁荣正是有赖于此。

日耳曼人于公元 162 年至 174 年在斯特拉斯堡入侵莱茵河以外地区，但从公元 2 世纪中期起局势就面临着威胁持续加剧的现象。公元 253 年，莱茵军团向意大利发动进攻，为瓦勒里安夺取皇帝称号，从而使边界人手不足。有两个部落，即（位于下莱茵河）的法兰克人和（住在上莱茵河）的阿拉曼人穿过了罗马帝国长城，前者甚至到达巴黎，导致鲁特西亚人退守城岛。高卢沿海地区也开始受到法兰克人和其他日耳曼海盗的骚扰。公元 260 年，罗马将军波斯图姆自封为皇帝，在莱茵军团的支持下，建立了独立于罗马的高卢帝国。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高卢人无疑感到与冷漠而又惶惶不安的罗马皇帝相比，他会做出解决日耳曼人问题的更多承诺，因而对他表示支持。波斯图姆确实阻挡了野蛮人的进攻，但在他死后，罗马皇帝奥雷利安（公元 270 年—275 年在位）又将高卢置于罗马的庇护之下。几乎与此同时，在公元 275 年，持续的威胁再度突出，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又前来攻打，他们血洗了 60 到 70 个城市。

罗马皇帝终于开始重视莱茵河地区的问题，并试图找到更合适的行政管理结构，以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困难。特别是戴克里田（公元 284 [43] 年—305 年在位），全面彻底地重建帝国行政管理结构。他将帝国分为东部和西部，各部分由皇帝（奥古斯都）治理，由副统治者（凯撒）协助。这一打算在“四人执政团”中引起争议，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尽管康斯坦丁皇帝（306 年—337 年在位）暂时将帝国统一在他的领导下，将首府转移到君士坦丁新城，但这已成为公元 395 年将帝国彻底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序曲。

戴克里田还对高卢地区的行政管理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革。他决定建立一个更为分权的结构——在特里尔和维也纳设立两个超级省，下辖 17 个省和 112 个市——从而拥有更为灵活和迅速反应的机构。边界的军事防卫得到更多的关注；还引入了重大的财政、货币和军事改革，以便使帝国能够更好地抵御外来入侵。他通过允许军队更多缴获来满足需求，从而弥补维持庞大军队所需的开销。他还允许用实物纳税，采用这种办法他降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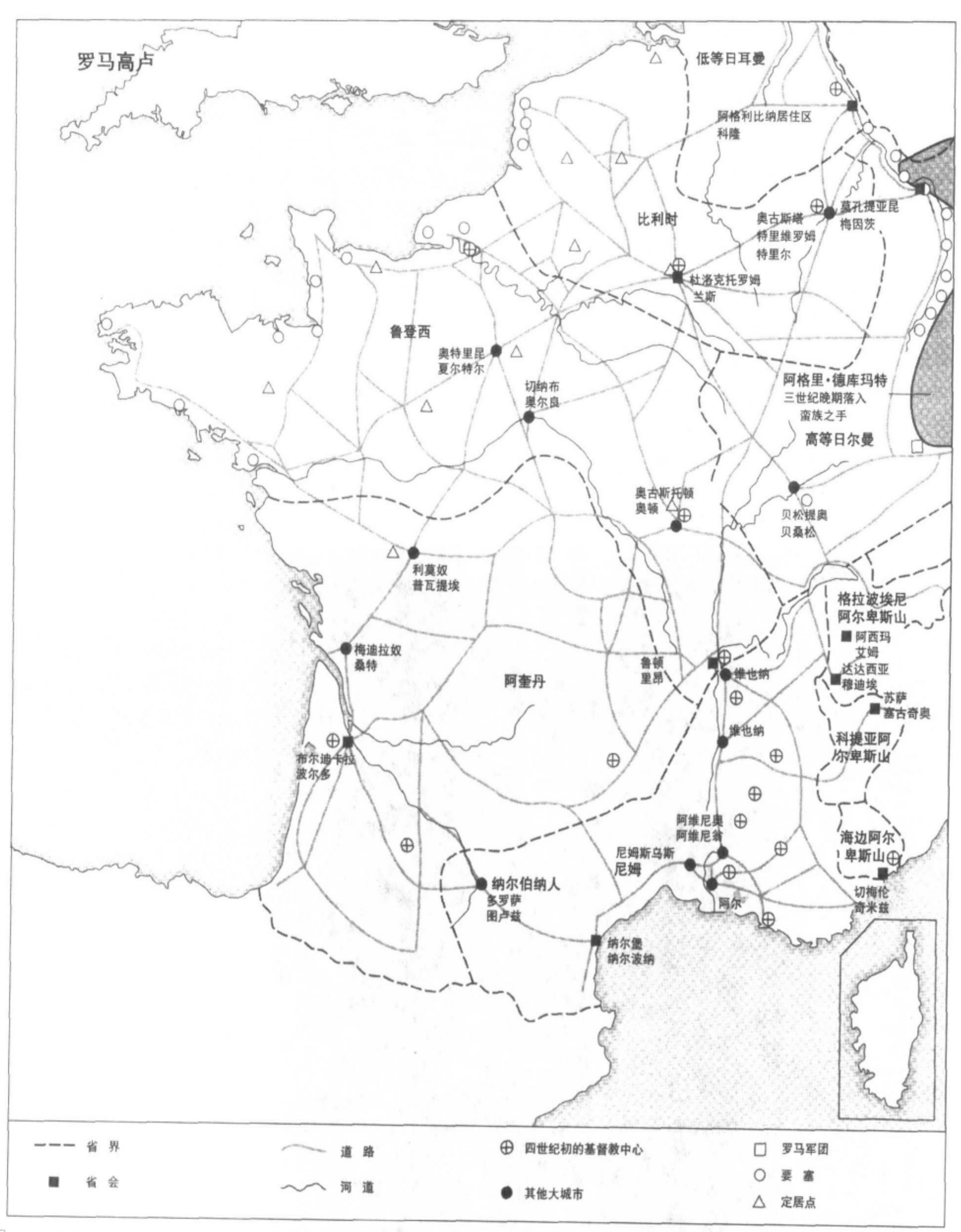
税收。他努力控制通货膨胀，尽管代价是使经济部分非货币化，但经济的 [45] 活力仍然倚重交易。

尽管采取了这些大胆的努力来支撑正在走向崩溃的体制，边界暴力却愈演愈烈。在决定性的公元 406 年，一大群部落穿过结冰的莱茵河，杀入高卢地区，在他们喜欢的地方落脚。此后，法兰克人在法兰西土地上建立了安全的立足之地，阿拉曼人在阿尔萨斯落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穿过高卢奔向西班牙和非洲，勃艮第人则在高卢北部安营扎寨。公元 412 年，西哥特人走出意大利来到图卢兹地区。公元 416 年翻过了重要的一页，当罗马当局被迫承认西哥特人王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小国家时，这标志着因帝国大厦崩塌而流下的第一滴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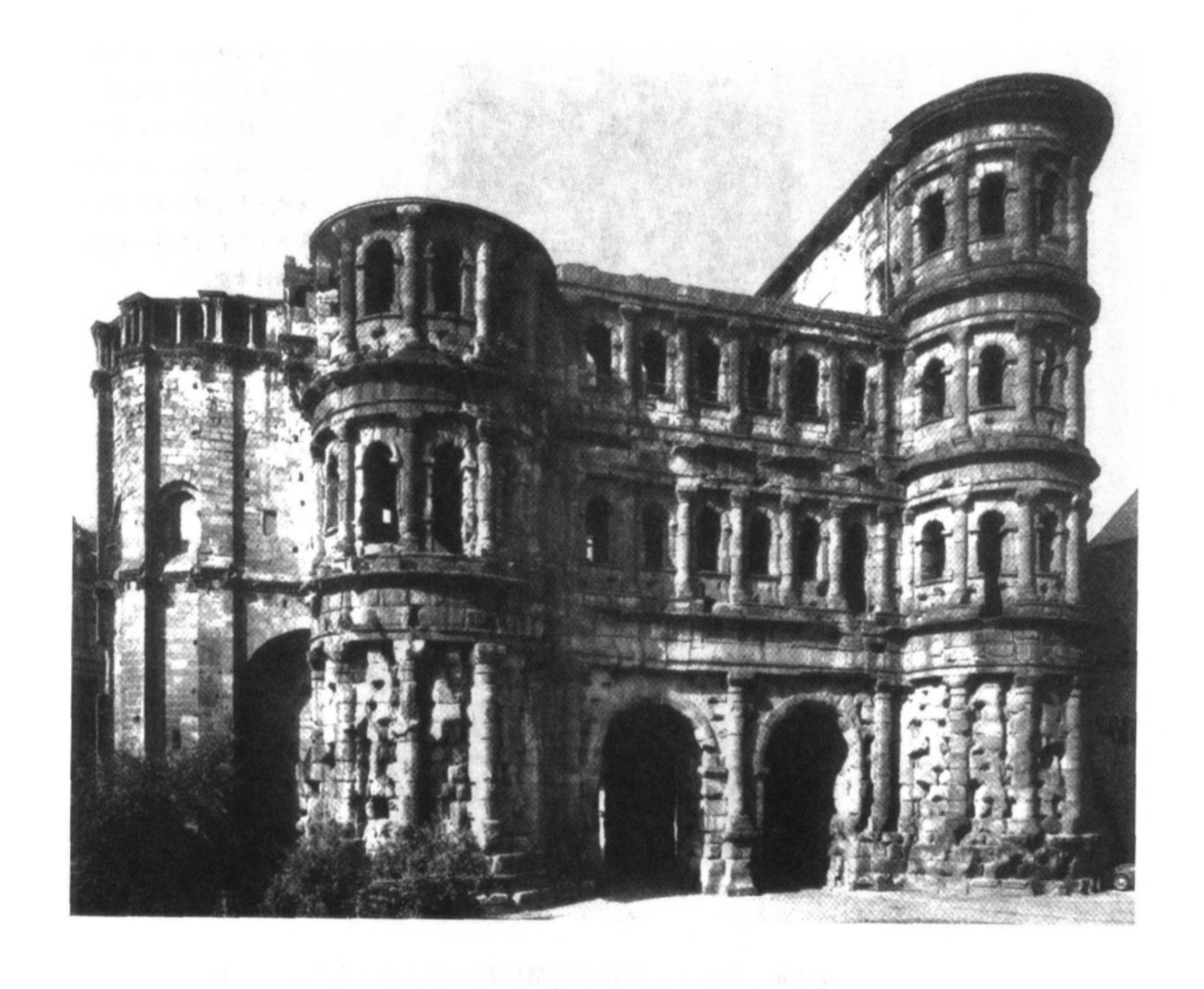
然而，野蛮人夺取土地恰恰与帝国需要劳动力相呼应。这并非出于阴谋：日耳曼部落帮助一个陷入人口减少的社会增加了人口。尽管野蛮人移居数量超过从前，但罗马一度因人口减少而受到惩罚。事实上，从 3 世纪 [46]



烤面包的马赛克镶嵌画。高卢地区的土地特别肥沃，小麦和其他谷物是广泛种植的作物。这使凯撒在历时长久的高卢战争中能够做到不出现严重的食品供应问题。



44 罗马纵横交织的道路和水路将军事和经济功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北部和东部作为军事设施要保证高卢行省的安全，免受日耳曼攻击。在南方则突出为主要的贸易交往服务。沿着这条商旅之路，基督教——东方的舶来品——自公元2世纪渗透到该地区。



开始，罗马人就在人口下降的地区建立了难民和野蛮人战俘定居点。高卢－罗马和野蛮人的交易逐渐采取了令人欢迎的方式。公元358年，撒利法兰克人在莱茵河和马斯河流域作为军事人员得到认同：野蛮人现在是构筑边界长城的劳工。公元430年，占领图尔内和康布雷的法兰克人被视为“联邦成员”，或被称为协议同盟者。公元443年，勃艮第人以“联邦成员”的身份在汝拉－日内瓦地区定居，后来开始扩张，控制了里昂的大部分地区。同时“联邦成员”西哥特人开始从西南部同津辽阔的帝国，在公元470年和472年兼并西南部，公元474年和475年间兼并奥弗涅，然后决定进军西班牙北部。

在现德国特里尔的“黑门”。该城作为“高卢的罗马”建于公元3世纪和4世纪，罗马时期的古长城就是以这里为中心进行控制的。然而自公元460年起它却落入法兰克人之手。这座最初用发光砂岩所建的城门得名于其长期受到煤尘堆积而形成的颜色。

在这些高卢－罗马的省里各族人混合居住，特别是军队发生了变化。法兰克人作为士兵尤获成功——其中一名法兰克将军西尔瓦努斯一度篡夺了皇帝称号（355年）；而且作为老兵，他们可以在高卢退休并获得土地。在公元5世纪40年代，西哥特人镇压了南部巴高达起义运动。公元



凯尔特神灵往往与数字3相联系：有时神灵表现为3个一组，有时神灵有3个脑袋。这个公元3世纪的粗劣的三人浮雕可能在凯尔特宗教中代表着延续，抑或是复活的希望。

451年，匈奴王阿提拉在特洛伊被一支有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参加的军队打败。从那时起，看来已经被野蛮人同化的罗马帝国也在抵抗野蛮人的挺进和内部分裂分子方面遇到了困难。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严格说来对高卢地区的影响很小，因为这里的解体和结构重组已经相当深入了。

由于罗马帝国政权面临内忧外患，高卢－罗马生活在日益增长的焦虑情绪中。在公元476年以前很长时间里，已经出现了对罗马是否有能力应对野蛮人袭击和农民暴动丧失信心的报警信号。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非军事化做法，使城市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不得不举步维艰地重新学习。例如在公元258年鲁特西亚（巴黎）受到进攻，导致迅速加强城防工事建设。许多高卢城市的城墙曾为威望和虚荣而不是军事目的而建，但现在全都变了。有时城市的规模需要缩小：因为防卫性城墙将所有居民区圈起来的成本太高，所以城市决定只保卫中心地区。桑特城中心设防的地区占地18公顷，而城市以前曾扩展到168公顷；亚眠城则从100公

顷减少到10公顷。在桑斯、图尔和佩里格，市政当局从露天剧场和神庙拆取石块用于建造内城防御工事。那些露天的大规模的娱乐场所如今耗子出没，杂草丛生，成为流浪者的栖身之地。更为不祥的是城市又开始向山坡蔓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年代，靠近道路和河流的地方是城市的首选之地，而如今更加偏僻、易于防卫的傍山之处却更具吸引力。长期袭击造成的破坏常常使得起码的修复也工程庞大，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很快风光不再。自从野蛮人的袭击者如蜂逐蜜般叮着城市浮财集中之处不放，许多贵族大户从城市中心搬到新筑工事的乡村城堡，尽管不迷人，但希望逃避周期性的袭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以理解为何凯尔特语和文化能够获得复兴。当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东方宗教向城里发展时，凯尔特异教徒的神珎在某种程度上也杀了回来。社会精英远没有放弃古罗马理想。但是这些发展表明，帝国崇拜看来并不能够使“永恒之城”常盛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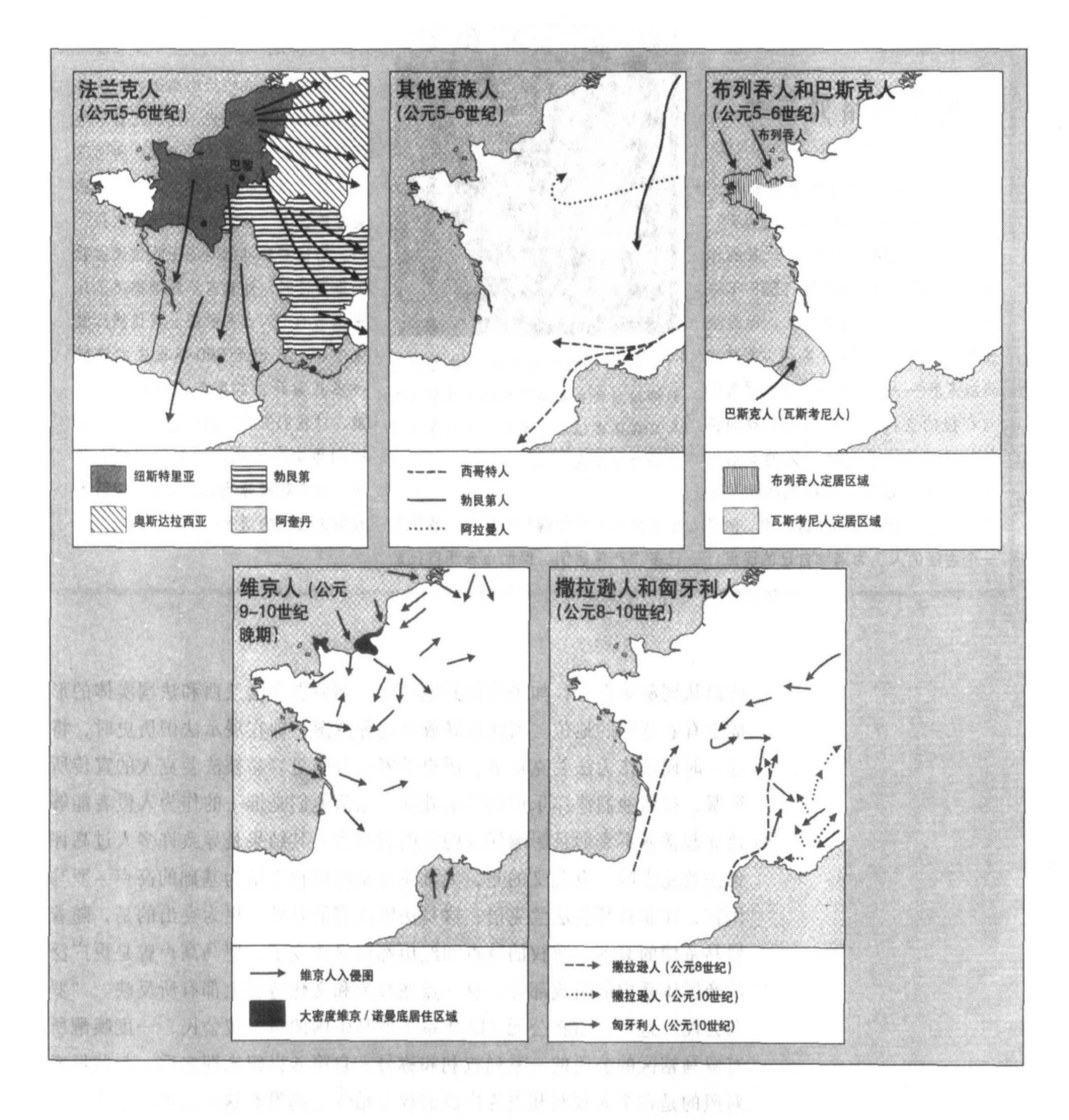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从法兰克高卢到西法兰西王国

[48] 传统上，历史学家将罗马帝国衰落后的公元500年前后至987年卡佩王朝建立的时期称为法兰克王国。从公元5世纪晚期，一个法兰克人克洛维（公元481年—511年）创建的墨洛温王朝在他及其继承者统治下扩张到罗马高卢以外，抵达德国和意大利北部。尽管墨洛温王朝的政治体系在公元7世纪时明显衰落，但法兰克人的控制由于加洛林王朝的崛起而得到保证。这个强大的家族创建了西部欧洲王国，该王国后来在查理大帝（768年—864年在位）时期又得到扩展；然而查理大帝死后又再度衰落。在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中对加洛林王朝的遗产进行三方分割后，崛起了一个新的西部集团“西法兰西”，这就是形成法国的历史基础形式。

法兰克人、墨洛温王朝和其他

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占领罗马高卢的过程是粗野、崇武、英勇的胜利——尽管一些人称之为粗暴地谋财害命。法兰克国王首先是伟大的战争斗士，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向臣民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他们保留武装随员，这些随员宣誓效忠主人，以换取在家中的地位或是抢劫来的战利品。传说中来自于神王墨洛维克之后的克洛维国王将对手法兰克统治者在莱茵河地区连根拔起，这是格列高利在《图尔编年史》的“法兰克史”中粗暴地——以及多姿多彩地——记录下来的。克洛维王在486年战败了苏瓦松的西阿格里国王，后者大概是罗马前线的最后一名指挥官，然后南下扫荡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克洛维在巴黎建都（公元511年），打下了墨洛温政权的基础；他（在公元500年前后）皈依东正教，并发布了基本法——萨利克法。

克洛维的事业由他的儿子们继续进行：公元536年他们包围了勃艮第，公元537年从东哥特人手中夺取了普罗旺斯，并向德国南部、中部以及意大利北部扩张。除了下朗格多克和鲁西永仍被最初到达的西哥特人所掌握（后来转入撒拉逊人手中），以及桀骜不驯的阿尔莫尼克半岛的西部之外，墨洛温王朝在公元6世纪中叶征服了全部罗马高卢，同时还有欧洲中部。



入侵时代。法兰克人对罗马高卢的征服并未阻止公元5世纪至10世纪连续不断的侵略和袭击。结果是其他族群——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布列塔尼人和维京人，在许多地区留下了长远的文化影响。

君主们走马灯般轮换。王国在王储之间分割的做法意味着政治安排的大幅度变化，只有少数墨洛温统治者——如达戈贝尔特一世，在632年至638年是统治着法兰克的全部领土的惟一国王。然而，法兰克政权作为一个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实体，统治着高卢的前罗马各省；而且从总体上讲，[49] 墨洛温确实统治西欧达两个半世纪之久，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继承者们又统治了同样长的时间。

“法兰西”一词源自“法兰西亚”，系指法兰克人的王国和文化领域；

图尔的格列高利

我们了解5世纪和6世纪高卢最生动最深刻的来源《法兰克历史》（593年—594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图尔的格列高利（538年—594年），并不是法兰克人，而是奥弗涅人。他出生于一个高卢-罗马的贵族家庭——他们对法兰克入侵者给与积极的支持。"野蛮人世界的英雄"见证了一个封闭地区的政治生活：自公元573年起他是图尔的主教，在墨洛温统治者身边工作。他是一个古怪的人：为消除自己的弱点，



14世纪的一幅彩绘，描述图尔的格列高利主教和阿尔比主教萨尔维乌斯在惩戒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国王西尔贝里克。

他饮用圣人骨灰调制的药水，致使自己多次严重病倒。但他也表明自己是一个固执而独立特行的高级教士。通过他的法兰克编年史，他非常直率地面对那些绞刑、谋杀、谎言、两面三刀、贪污腐败和个人暴力。当他描述克洛维国王"从大人物转变为大兵"时，当他清楚地阐明国王皈依天主教的重要性时，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几乎病态的个人权力欲望。仅仅偶然发生中断：在记录580年发生的造成许多儿童死亡的痢疾流行时，他写道，"我们失去了那些对我们非常亲密和甜蜜的孩童，我们曾用爱心关照、哺育和抚养他们。写到这里我不禁擦去流出的泪水……"

所以从词源学上看，如果没有其他含义，则后者在法兰西和法国实体的形成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此最好放弃这种意图，即在展示法国历史时，将这一时期仅作为法兰克章节。历史学家也可能更容易被法兰克人的宣传所征服，相信他们津津乐道的军事胜利，相信他们是惟一的作为入侵者能够建立起常盛不衰而且影响深远的王朝的事实。其结果是导致许多人过高评价法兰克影响。有意义的是，大批民众是操以拉丁语为基础的高卢-罗马语言，而非日耳曼法兰克语，这是法国语言的基础。更为突出的是，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政权的特点和经历都明显改变了。罗马高卢曾是更广泛的帝国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政治和文化特征上都有所反映。"罗马公民"这个短语在公元212年系指罗马帝国的每一位公民，一度唤醒所有罗马辖区的公民的一系列权利和称号。自第4世纪末期之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个人权利和更为广泛的权力结构上则没有这样的紧密结合。罗马高卢不再是一个比较辽阔的国家的一部分。与此相反，它是由光怪陆离各式各样的地方特点组合而成的千疮百孔的集合体，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很少标有任何深刻的"法兰克式"的形式。

与法国历史相汇合的民族历史加上法兰克人的编年史同样低估了非法兰克野蛮人和外界的影响力。在罗马衰落后的几个世纪中，西南部以远的历史很少讲述法兰克人入侵的故事，更多的是涉及加斯科涅政权结构的建立，布列塔尼的建立，以及来自英格兰南部布列吞人的移民。其中部分是

罗马高卢在第一次受到侵略时，来犯者是勃艮第人、西哥特人、阿兰人、阿拉曼人、撒克逊人、匈奴人和其他民族。在8世纪晚期的第二轮入侵浪潮中，侵略者则是撒拉逊人、匈牙利人和维京人。每一批入侵者都留下了各自特有的文化印记，并凸现了后罗马时代的法国政治文化特征的多元性。

而且法兰克人和其他移民族群的人数比一般估计的要少。“野蛮人入侵”没有在罗马高卢的民族成分上造成巨大变化。新来的法兰克人约有15万至20万人，占约有600万至700万人口的2%至3%。其他族群的人数甚至更少。法兰克人在国中的分布也很不均衡。他们在北方和东北部影响最大——的确，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影响比在法国大。以地名为证，可以看出如果自西部和南部从莱茵河、索姆河和马斯河地区旅行，日耳曼影响所遗留的痕迹较少。法兰克人控制的影响不是建立在人数上，也不是对族群成分的影响上，主要是在政治上。但即便如此，也是有限的。 [51]

法兰克人的价值体系也并非与高卢人过去的古罗马理想水火不相容。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标明从前罗马政权边界的“帝国长城”并不是一条“卫生警戒线”，以免日耳曼文化和罗马文化相互感染。这道墙更类似于花园围墙，便于交流和相互影响。法兰克人在“侵略”之前已经居住在边界的两侧。来自东边的人口压力更有助于过去较小的零星部落——如萨利人、夏马维人、布吕克特人、查图阿人和其他人——集合起来组成共同防卫体，以“法兰克人”为称呼。他们很容易被吸引，在罗马帝国的长城沿线组成军事辅助队伍。

早在发动侵略很久以前，罗马对法兰克的影响就显而易见。罗马的奢侈品为法兰克部落贵族所青睐。罗马的政治形式也能感到其自身影响的存



（左图）7世纪初在罗马文化影响尤为源远流长的阿奎丹首府图卢兹铸造的墨洛温金币，图案为正在吃奶的罗缪吕斯、雷缪斯和他们的狼母。

（右图）7世纪初达戈贝尔特一世的铸币。他重建了法兰克的团结，并证明是亲自治理全部法兰克领土的最后一位墨洛温国王。该币的样式更像一枚纪念章而不像用于交易的货币。它证明了后罗马在商业活动中的衰落。

在：法兰克法典，即被称为《萨利克法》的法典深受其罗马前任的影响，并以拉丁语撰写（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也编撰了类似的法典）。其中含有处罚袭击邻居葡萄园的条款（表明典型的罗马人对美酒而不是日耳曼啤酒的爱好早已存在于法兰克人的社会精英之中）。甚至在日耳曼王室的崇武传统上也有罗马色彩，例如将新国王的形象镌刻在战盾顶部，即是借鉴罗马军队的做法。

[52] 法兰克人从来没有放弃对罗马遗产的迷恋之情，也没有丧失作为最有权力的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继承者的骄傲。从克洛维接手王位，到查理大帝（公元800年）登基以及此后的历代国王，法兰克人一直试图将他们自己视做被上帝挑选出来，以发挥原来由罗马人承担的作用的人民。统治者是上帝所选，是神权在人间的血脉。他披着长发，可能是魔法象征。克洛维王曾收到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称他为“执政官”或“奥古都斯”的来文，克洛维的子孙们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外交使节；在公元7世纪初期的墨洛温硬币上铸有罗缪吕斯和雷缪斯的像；后来的辩护士甚至把对王朝的胜利解释为法兰克统治者是特洛伊城陷落后的难民的后裔：他们因此可以自诩与罗马帝国的继任者同样合法。

罗马皇帝曾经描述过的——作为延续标志的——长发国王以及正统基督教，被证明是他们获胜的王牌。克洛维从异教徒皈依天主教，获得了当时的罗马高卢社会精英的长期支持。在南方，后者感到受雅利安异端邪说的威胁——他们质疑耶稣的神圣性，而这是西哥特人和许多其他日耳曼部落笃信不疑的——他们企图诱使南方的法兰克人对他们给与支持。法兰克统治者开始自由使用教堂。世俗行政管理的边界与4世纪建立起来的主管教区的结构相吻合。在南方行政管理中主教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往往担任大法官职务，这是法兰克政权时期主要的地方办事处。

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无疑强化了王朝意识形态的号召力。通过垄断书籍发行，对印刷和书写艺术的培训，收藏手稿和教育文件，教堂在传播罗马价值观方面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法兰克王朝选择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墨洛温时代进一步扩大神职人员的好处和赠与。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教堂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慷慨大度确实成为法兰克统治的润滑剂，理想的墨洛温统治者是双手摊开的馈赠者。统治者使用各种手段来奖励他们的办事人员和追随者，无论他们是知名的教职人员、皇室贵族还是他们所依靠的那些取得军事胜利的战功卓著者。分配战利品和贡品——浮财（金、银器和首饰），还有土地、免税以及其他税收优惠——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依赖抢掠的政权使它带有军事化，甚至粗野的色彩。然而如果他们仅仅依靠了粗暴的高压统治和有选择的政治谋杀，法兰克人就不能够做到保

持其辖区的完整。总体来看，他们更热衷于融合而不是清洗，入乡随俗而不是殖民统治，而且他们确实在大多数地方处于低等地位，这对他们也是 53 有利的。他们甚至可以通过降低罗马人的税收要求而以农民解放者自居。在 5 世纪后期，马赛的神职作家西尔万描绘农民欢迎日耳曼入侵者的场面时称，“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罗马统治时期所感受到的野蛮无情”。

尽管越来越多的崇武军事价值观被法兰克人和其他部落所接受，宗教的榜样表明法兰克人之前的状态仍有实质性的延续。依靠军队的日耳曼定居者向高卢城市居民提供保护的转变也不像预想的那么粗鲁和突然：后者原有与帝国的伊朗人、伊比利亚人、非洲人和日耳曼人的军队长期相处的经历。在这些被迫的“好客”的接待下，野蛮人“保护者”不是分得部分当地税收就是获得商定数量的当地土地。由于罗马人将大量土地抛荒，所以有充分的空地分配给新来者而不会造成过分的摩擦与争端。不久以后，他们就和定居村落的居民相互通婚，并按同样的丧葬仪式埋葬在同一片墓地。

在行政管理的框架结构和人员上也有延续性。行政管理仍然延用城市国家的框架，而今被称为“帕吉”。每一地区有一名可召回的皇帝代表，即大法官。他的工作是执行并落实统治者的愿望，主持处理诉讼纠纷，收税（如果有可能的话），偶尔征兵，监督公共工程施工等。在南方，高卢－罗马家族借过去掌有地方政权大量征买大法官的位置。主教的位置也同样如此，法兰克统治者允许这一职务享有许多特权。高卢－罗马贵族对世俗和教堂等级的依附也是后来有助于两个部落结合的因素。

日耳曼的王权也给权力的定义带来了变化。在罗马治下的早期帝国统治时期，军人与平民、私人和公众范围有重大和明确的区别。而法兰克人则完全与之相反。例如萨利克法建立的体系是依靠家族和亲属，而不是无私的国家来执行法律。在这一点上也或多或少的成为其延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日耳曼国王是崇尚武力、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罗马帝国政权则在公元 3、4 世纪时也发展了类似的观念。更进一步来看，野蛮人的法律规定并不是强行扩大到高卢－罗马人头上，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罗马法判断后进行选择。这在南方是很普遍的做法，那里野蛮人的影响是最弱的。

这些法律上的变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则很不明显。她们可以从法律规定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成分。某些野蛮人法律强调对妇女身体的尊重：萨利克法规定一个男人压住妇女的手罚款 16 个金币，如碰到肘部以上则罚款 32 个金币。这种尊重主要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被视为奖励给丈夫的 55 财产，特别是作为生育工具。她们拥有的合法自主权比罗马法规定的要少，尽管她们可以独立控制某些形式的财产。作为婚姻伙伴，她们可以被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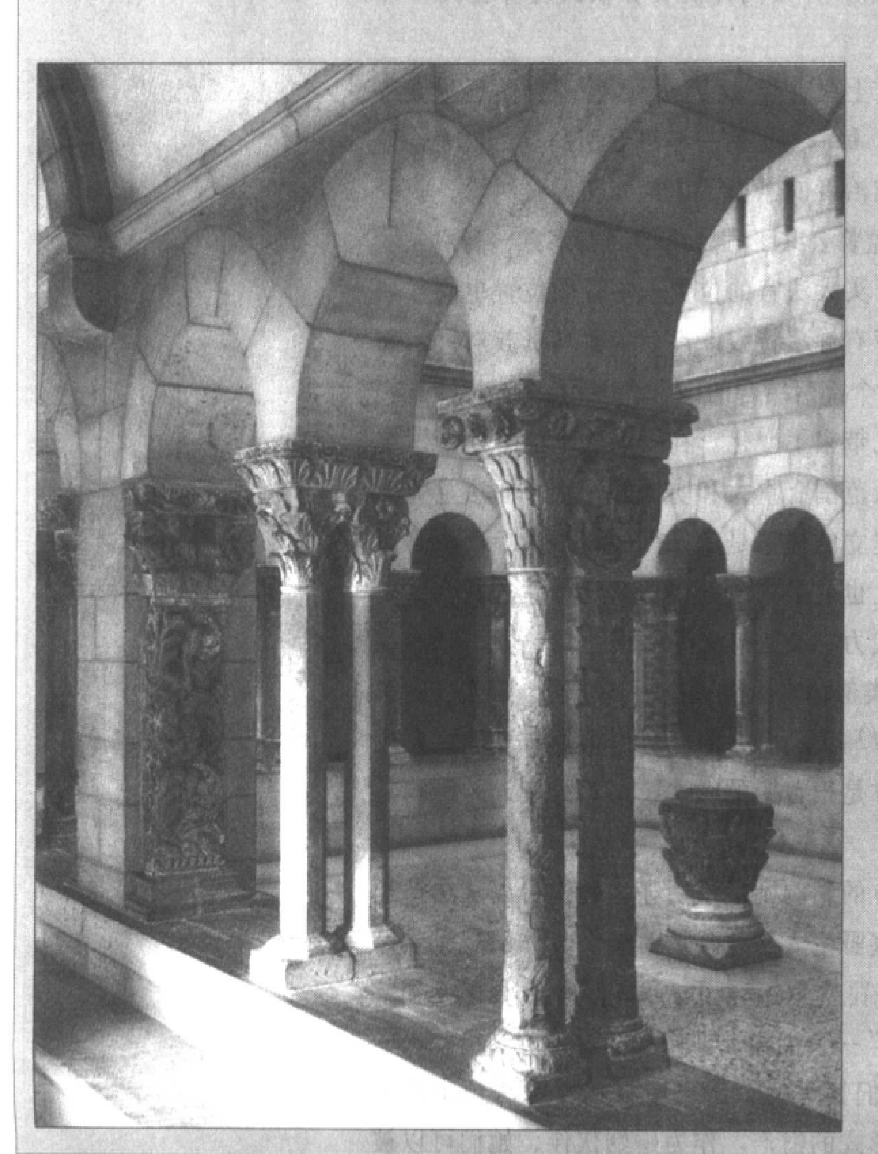
圣吉埃姆－勒－代塞尔修道院

公元 804 年，这座本笃会修道院由奥地利贵族塞普提曼尼亚公爵，即杰罗纳的圣威廉（公元 755 年—812 年）建造于下朗格多克的圣吉埃姆－勒－代塞尔。后来的《行动之歌》称他为奥兰治公爵，将他描绘成查理大帝的骑士之一，战胜撒拉逊人的英勇胜利者。他曾经把军队藏在酒桶中夺取了尼姆城。这位创建者退隐后来到他的教堂。据说他去世时周围各省的教堂铜钟不敲自鸣。修道院成为去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德贡波德拉朝圣途中的驿站。自 13 世纪起，由此而带来的财富用于多次重建，进行了许多精美的内部装修工作。

圣威廉皈依本笃会的修道院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始于努西亚的圣本尼迪克（公元 480 年—547 年）。阿尼阿纳的圣本尼迪克（公元 750 年—821 年）进行了改革，在"虔诚路易"的 817 年诏令中规范化，帝国内所有修道院均遵守其规定。他强调安贫、独身、服从和坚定：修道士要像奴隶守着土地一样守在他的修道院中，并成为团体的完全成员；修道士的日课分为祷告——要求做大量的祈祷，和劳动（努西亚的圣本尼迪克要求 7 小时的体力劳动）。

修道院的中央庭院——由回廊环绕的露天院子——是修道院生活围绕的中心。修道院的各主要房间和场所均从这里通过：餐厅、祈祷室、图书馆、工作室，等等。修道士们在这里沉思散步，讲课学习，可能还抄写经书。

1789 年大革命时期所有教会土地国有化，许多教产被售。该修道院被一位石匠购去，建筑物被无情破坏，用于提供建筑材料。19 世纪时在阿尼阿纳附近的一个法官的花园中发现了作为存酒架的修道院中央庭院的遗物，后来他们被拼接起来在纽约大都会现代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出。原建筑中只有修道士教堂还在原地。



重建的圣吉埃姆－勒－代塞尔修道院的中央庭院。



这幅公元10世纪或11世纪的绘画描绘的是法兰克王后圣拉德古恩（约公元518年—587年）。她坐在丈夫克洛泰尔（公元558年—561年在位）和儿子克洛维之间，面前是放着面包、酒和鱼的桌子。拉德古恩放弃宫廷生活去过简朴的隐居生活。

更随意地加以处置。一夫多妻制已经建立起来：4位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包括达戈贝尔特一世都以拥有不止一个妻子而闻名，查理大帝有4个妻子。抛弃妻子或与妻子离婚都变得更加容易。勃艮第法规定妇女要求离婚将被扔进泥沼中使其窒息而死。在这种不计后果的暴力背景下，妇女的生活处境艰难，只有40%的妇女寿命超过40岁，而男人则将近60%。

在墨洛温王朝，以及后来的加洛林王朝时期，中央政权弱化以及公众与私人领域合并的做法使得政治权力又回到贵族的家族手中。由于缺乏正式的国家结构以及统治者家族的重要性，致使有个性的妇女也得以发挥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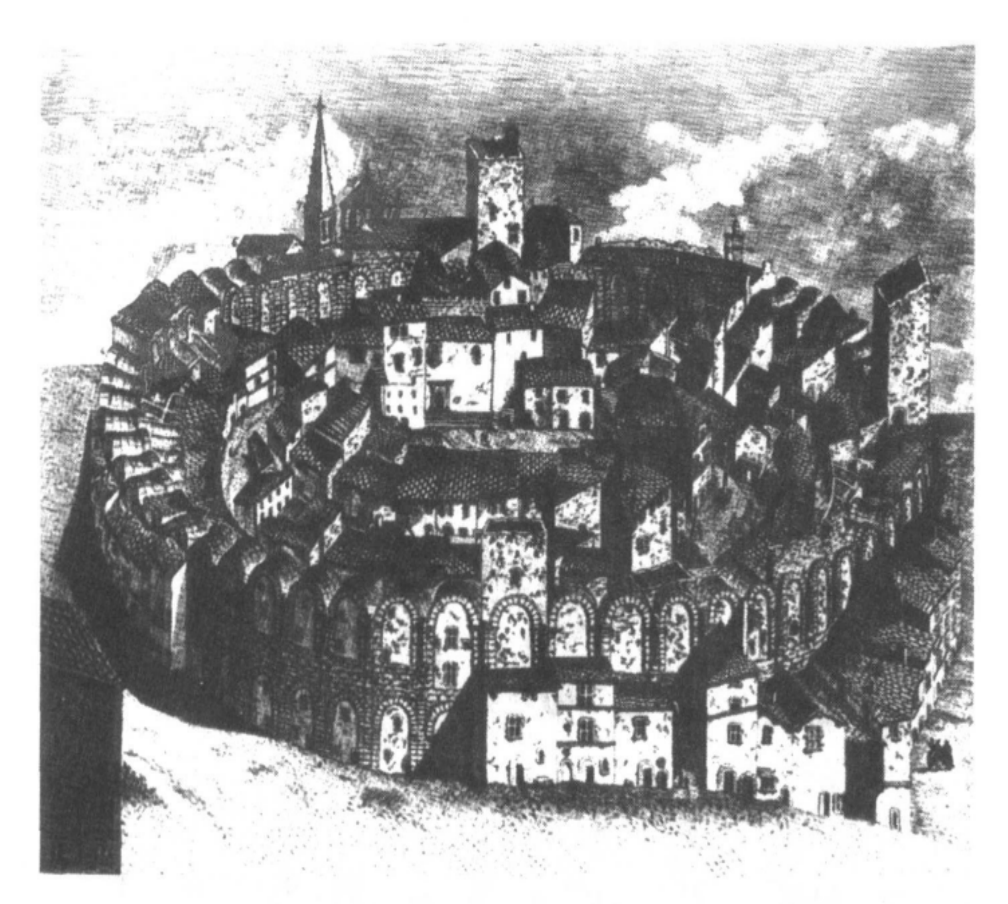
[56]正的影响力。一位编年史作家充满敬畏地写到外人是如何难以处理野蛮人的妻子与丈夫的争吵："更别说她脖子青筋暴起，咬牙切齿，挥动着粗大粉白的胳膊，雨点般的拳头连拍带打。"由于公法与私法之间区别很少，出身高贵的妇女与权势非常接近，从而可以利用她们所处的地位。

在教堂中也出现了妇女的身影。大约有四分之一，即约650到750位圣徒是妇女——这个比例高得异乎寻常。妇女是基督教最虔诚的支持者，产生了软化严格的大男子主义的日耳曼法规的影响。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达费尽心机使其丈夫克洛维转信正统基督教，并为此被封为圣徒。教堂更强调婚姻的神圣性——离婚对丈夫来说变得更加困难。教堂还向妇女提供令人羡慕的婚姻替代方式，即作为修女在修道院生活。公元6、7世纪时，出家当修女的做法广泛流行。修道院常常与当地信教家庭建立密切联系，例如富孀可以建立修道院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地。

当野蛮人和高卢-罗马人的文化相融合时，经济也迅速发生变化。城市生活结构起初没有受到很大的波及，但是与以前相比不那么活跃。自公元3世纪以来被难以估量地削弱了的城市，在公元6、7世纪也保持了财富的稳定。显而易见，从那时以后，由于罗马帝国独特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制度的中断，来自东方的滚滚财富也无可挽回地减少了。而公元7世纪伊斯兰狂热分子的作用更加速了城市衰落，他们破坏了地中海经济和文化的统一。高卢向东方的出口价值很少，少到没有什么值得纳入到西方经济体系中，除了掠夺的战利品和强要硬索的贡品。

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统治者和贵族世家更喜欢乡村别墅而不是城市生活，因此城市失去了许多先前所拥有的吸引力，随之而来的是大庄园决定着经济发展速度。尽管城市仍然是行政管理和神职的中心——尤其是在南方——但已经不再融入市场和贸易的国际体系，而被拉回到农业的乡村之中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远程贸易仍在继续进行：对马赛、纳尔波纳和波尔多的城里人来说，还可以获得来自东方的胡椒、调料、日用品和丝绸。希腊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后者以令人称道的方式牵着骆驼商队在法国转悠——在分销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在那时仅仅是具有异国情调的边缘性活动。

货币仍在流通；公元700年以后黄金已不敷使用，被广泛流传的白银取而代之。贵金属的流通日益来自于进贡和交换礼品的副产品，是作为确保政治忠诚和稳定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活生生的货币经济的指数。经济中心的重点已从地中海转移到法国北部农业地区，墨洛温王室和最富有的法[57]兰克家族都在那里。离统治者的慷慨赠予最近的那些人，也是花销最大的人。饥荒的不断发生表明以交易为特点的货币经济日渐衰退。"许多人用葡萄核和榛子皮做面包"，图尔的格列高利在记载585年时的饥荒时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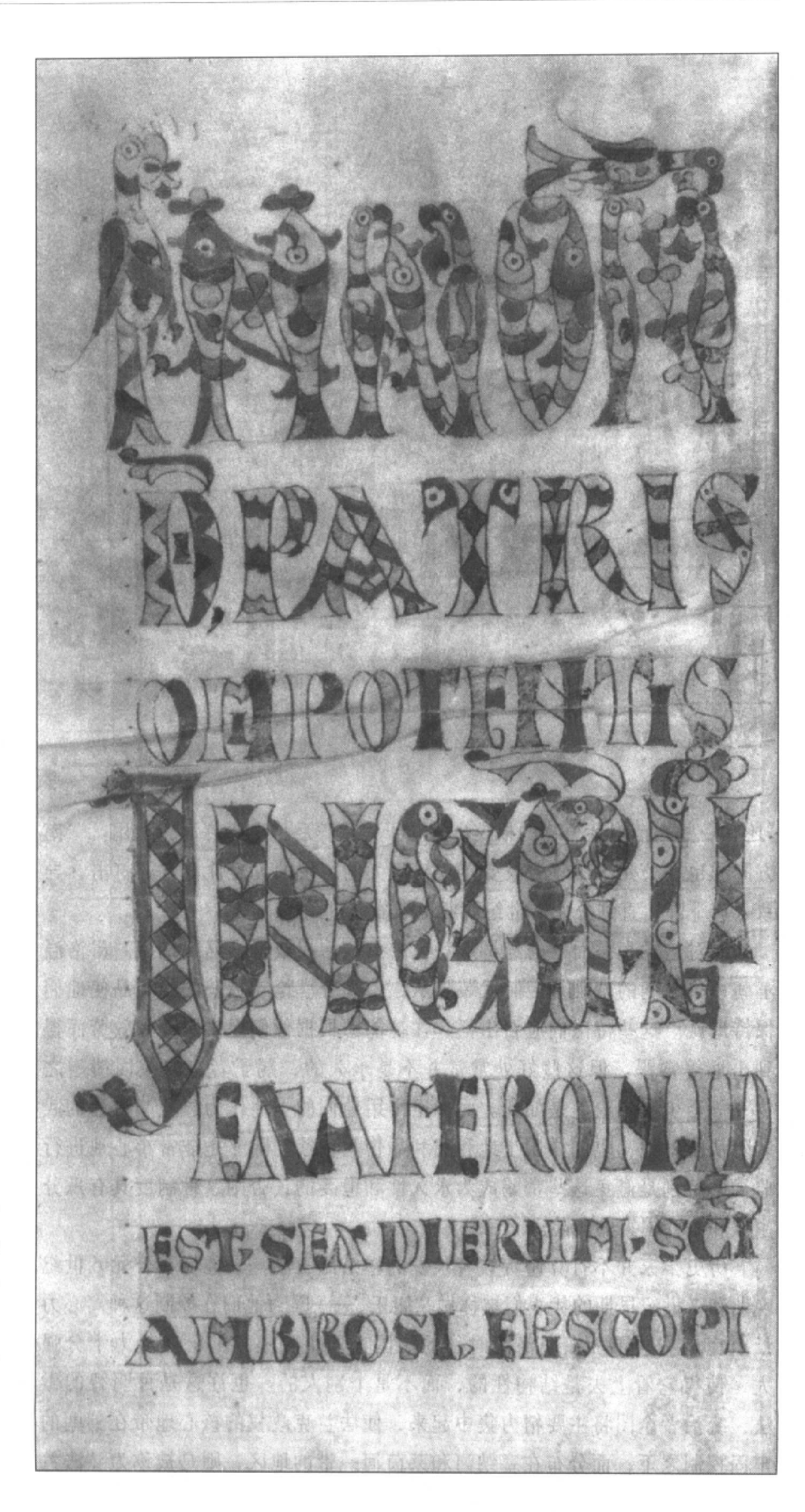


阿尔在罗马统治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在西哥特人于480年垮台前曾经历多次屠城。野蛮人的攻击使城市建筑大大缩小，大型露天剧场被废弃，后成为建筑物颇多的居住区，辅以中世纪建造的教区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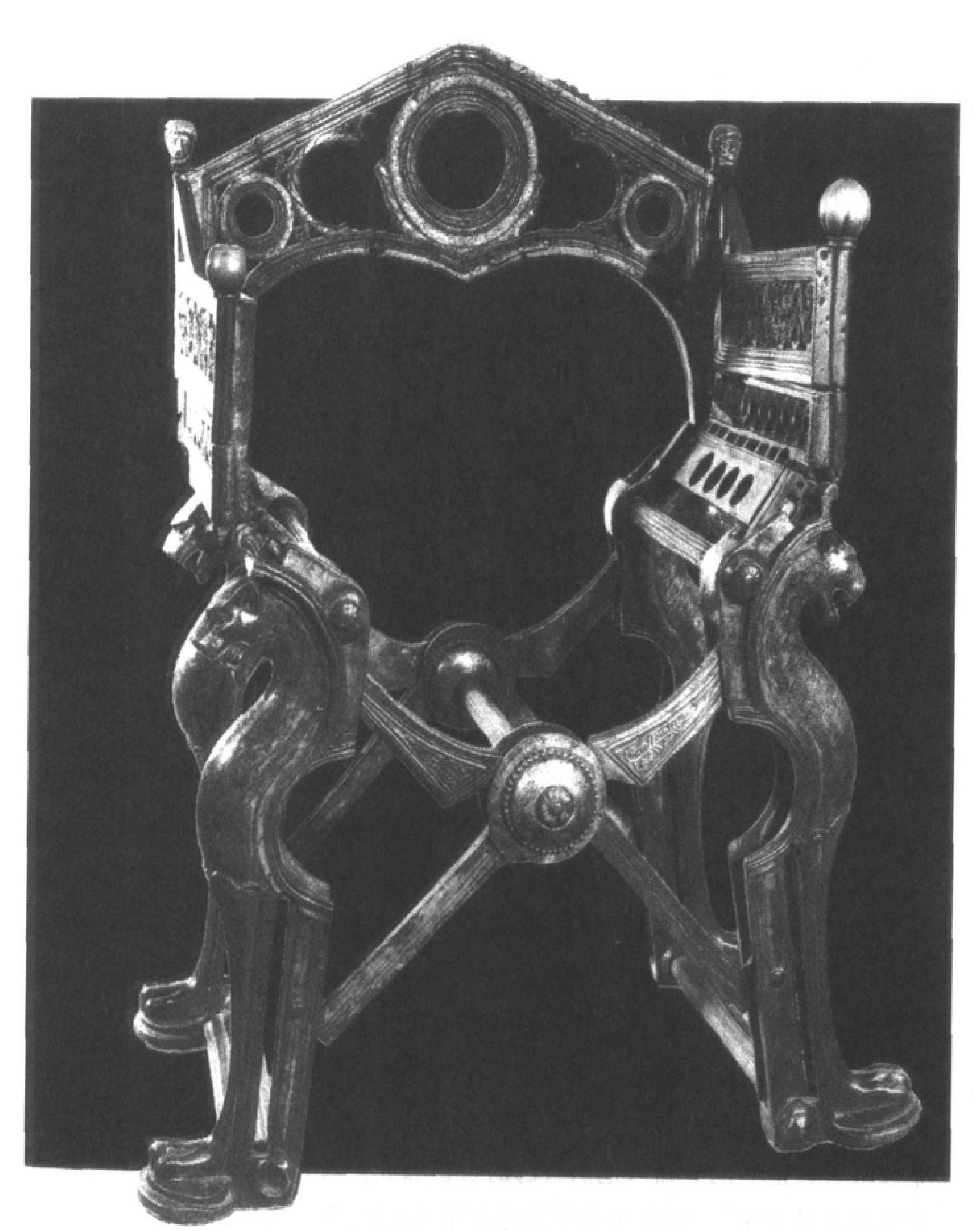
“还有一些人把根茎植物的根挖出来晒干，捣碎后掺上少许面粉食用。”南方同样也在公元542年后蒙受了规模巨大的突发的灾难性鼠疫的打击，导致人口下降，直到公元7世纪后期也未能缓过劲来。

面对这样直泻而下的经济形势，中央政治权威很难继续维持。墨洛温王朝军事胜利的基础是控制武装随从，依靠分享抢劫猎获的战利品使他们保持忠诚。这些侍臣们应召出征，往往能够根据他们提供服务和效劳而得到土地等赏赐。但这些好处常常并不是永久的，赐予者有权收回馈赠之物——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而侍臣则用他们的土地作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随从的基地，也同样用土地和战利品作为赏赐。除非是非常小心地进行监视，特别是避免这些赏赐成为永久性和世袭的，否则这种制度具有瓜分主权和蚕食国家的风险。

历史学家并不打算谴责披着长发的墨洛温王朝——他们在公元6世纪晚期和7世纪早期的代表们被称做“庸王”——因为他们在控制这种离心力量上完全失败了。在墨洛温时代的法国，非中央集权的潜在势力十分强大，使得它看上去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别人的。也许这是种明智的做法，统治者企图将主要精力集中起来，使法兰克政权的核心地带在王朝的牢固控制之下；而分布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一带的地区，则是被称为“法兰 [59]



58 公元8世纪“赫普塔特克的圣奥古斯丁”手稿中的墨洛温风格的插图。墨洛温艺术具有十分出色的形式，将动物形象和几何图案以充满想像力的方式结合起来，似乎在暗示与地中海东部的联系。



达戈贝尔特的宝座。9世纪时添加，在11世纪被卡佩王朝的考古学家苏格修士重新发现。这件礼仪性的家具成为加冕仪式的标准家具。拿破仑在1804年为自己加冕时就曾使用过它。

西亚”的地带。这一地区经常被划分为奥斯达拉西亚，即在莱茵河和马斯河之间的地区，是被克洛维征服的法兰克人的莱茵河故乡；纽斯特里亚，即“新法兰克人故乡”，在西部处于马斯河到卢瓦尔河之间，这里的主要城市有巴黎（克洛维国王定都于此）和苏瓦松。

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曼人、图林根人和巴伐利亚人不断要求从这一中央核心里独立出来。在高卢地区也一样，许多地区开始起而效仿。在阿奎丹，被克洛维和其继任者所击败的西哥特人也不安于停留在塞普提曼尼亚，一块穿过罗纳河三角洲沿地中海盆地的低地。他们不断试图进入南方的伊比利亚人地盘，而不是融入法兰克邻居中去。自公元700年以来该地

区在他们自己的大公欧多的统治之下。相邻的普罗旺斯几乎同时宣布了对 60 北方的事实上的独立。最西南端的特点因瓦斯考尼人（或称巴斯克人）的到来而变化，自公元6世纪后期，他们就从西班牙的纳瓦尔向该地区移居。法兰克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平息巴斯克人的动乱，但是未能成功。

勃艮第和布列塔尼是另外两个法兰克人认为难以施加影响的地区。纽斯特里亚人在公元7世纪早期试图将勃艮第更多地置于墨洛温的控制之下，结果激起了反抗的潮流。布列塔尼也发生了同样的麻烦。公元4世纪末和5世纪以来，布列吞人从英格兰南部迁移到阿尔莫尼克半岛的西段，可能是为了躲避撒克逊人的镇压，也可能是为了响应高卢地区的罗马－高卢当局发出的提供防海盗和偷袭保护的号召。高卢北部的其余地区则实践着法兰克式的统治。阿尔莫尼克半岛实际上由新来者布列吞人再次罗马化了。在瓦恩地区西部只有很少的法兰克影响残留，在公爵或副王的治理下，保持着高度的自治权利。

此后，法兰克人在维护周边地区对其效忠方面，问题不断。一个从纸面上来看貌似横跨大西洋沿岸到多瑙河的庞大帝国，日渐成为一个由半自主而且桀骜不驯的领地拼凑而成的结合体。甚至在其传统的权力核心地区，权力也正在从长发国王们的手中滑落。因为墨洛温的地盘在继承人之间分割，彼此对立的派别丛生，统治者精英内部的裂痕扩大。例如，克洛塔二世国王（613年—629年在位）只是在他不得不作为奖励给与其权力的富豪们的帮助之下，才打败布伦希尔特女王的。

王室领地的管家被称为“王宫总管”，成为有分量的统治力量。如同在公元7世纪常见的那样，国王尚在稚龄，是王宫总管执掌权柄。在监督王室收入时，他们能够列入他们自己的财富和庇护者。“财富和权力都掌握在王宫总管的手中”，编年史家艾因哈德后来在论及这一时期时写道，“他们拥有最终否决权。国王除了津津乐道于所拥有的头衔和满足于坐在宝座上之外，没有其他权利。他披着长发，拖着胡子，只是造成他在统治的印象。”

达戈贝尔特顾问的后裔阿尔努芬家族，在当时拥有作为奥斯达拉西亚的王室管家继承人的巨大权力。他们成为北部最大的地主，不久又在墨洛温王朝的各个领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后来他们被称做“加洛林王朝的人”，因为在家族中不断有人取名为夏尔。这个朝代当是在公元7世纪后期推翻墨洛温后取而代之的。他们更进一步打算——尽管为期不长，降服强大的法兰克社会的离心力量，以实现征服欧洲的野心，即曾经被罗马征服的辽阔无垠的帝国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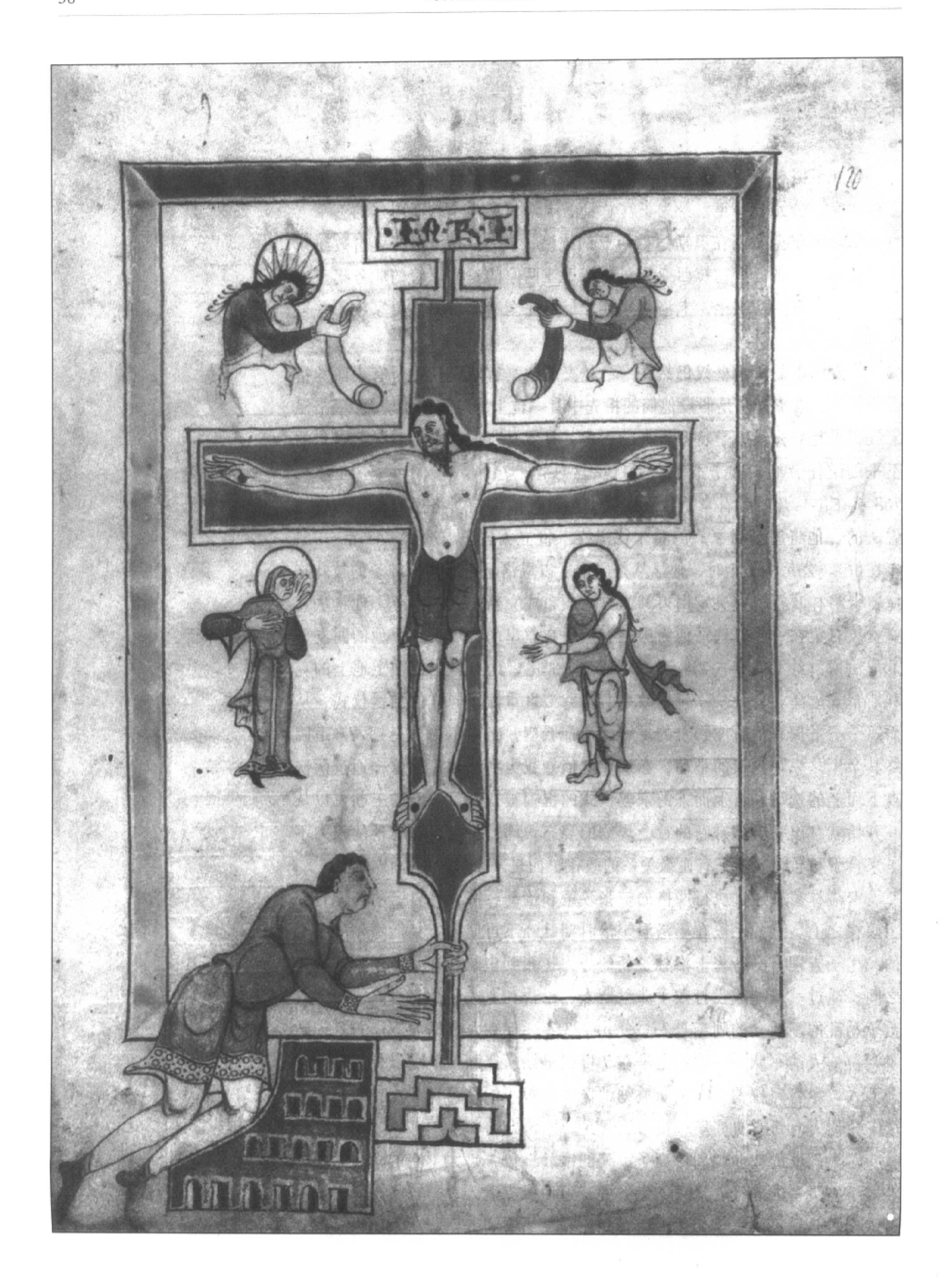
卡洛林王朝

建立卡洛林王朝的人从王宫总管崛起到成为帝国君主，这意味着墨洛[61]温被架空。公元679年，身为王宫总管的卡洛林家族、赫斯塔尔的丕平二世终结了墨洛温王朝在奥斯达拉西亚的统治，687年在特尔特里击败纽斯特里亚军队，将奥斯达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两家的王宫总管的职务集于一身。然而，直到751年，卡洛林家族才最终完全清除了墨洛温家族，并全面掌权。

长发国王的所谓皇权仍然在卡洛林家族中享有威望。对所有表面的错误与过失，老王朝总是假设他们的祖先中有一位上帝（墨洛维克）。墨洛温家族仍是足登祥云，是特罗吉人的后代，是罗马帝国的王储。赫斯塔尔的丕平的继任者们，矮子丕平三世（王宫总管，741年—768年；751年—768年在位）开始时看来是认可接受卡洛林的战剑与墨洛温的光环结合的说法的，他将墨洛温家族的希尔德里克三世立为国王（公元743年—751年在位）。公元751年时，他显然是厌倦了以墨洛温家族作为神圣的枝叶来掩盖卡洛林政权，并决定用追溯的方式颁布成立新王朝的命令。他将法兰克贵族召集在一起，选举他为国王；然后在教皇的许可下，由他的朋友圣卜尼法斯（约680年—754年）为他涂油加冕，地点是在德国土地上的克利斯蒂安尼泽。公元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重演了同样的加冕仪式，从而赋予丕平拥有他所能赐予的足够的精神威望，将希尔德里克打入修道院终其余生。一个篡权的举动，赤裸裸地依靠权力为基础，就这样通过两次自下而上的选举和自上而下的宗教仪式的祝福被摆平了。新的王朝可以从一开始就拿出一副拥有新的社会规约的姿态，同时也可以宣称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和异教徒国王有血缘关系的政权，而是来自神灵的恩赐。

卡洛林家族通过执行严格的扩张政策和抢劫经济，将自己的印记打在了政权之上。这种手段在墨洛温统治时期已经不再使用。赫斯塔尔的丕平的私生子查理·马特将卡洛林王朝的势力扩张到中欧，在724年到738年之间，通过一系列战役打败了弗里斯人、巴伐利亚人和撒克逊人。他曾统治了动乱的闹独立的阿奎丹人。公元723年，他在普瓦提埃遭遇并且击败了阿拉伯人的军队——他们是早在7世纪早期从比利牛斯山以外的地方渗透而人。尽管阿拉伯人在纳尔波纳地区仅有很小的地盘，但这次胜利制止了阿拉伯人向西欧的扩张。

对异教徒的战斗胜利提高了王朝的宗教地位，扩大了它的军事影响。“矮子丕平”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迫使撒克逊人、阿拉曼人和巴伐利亚人向希尔德里克三世俯首称臣，并使勃艮第人和普罗旺斯人更可靠地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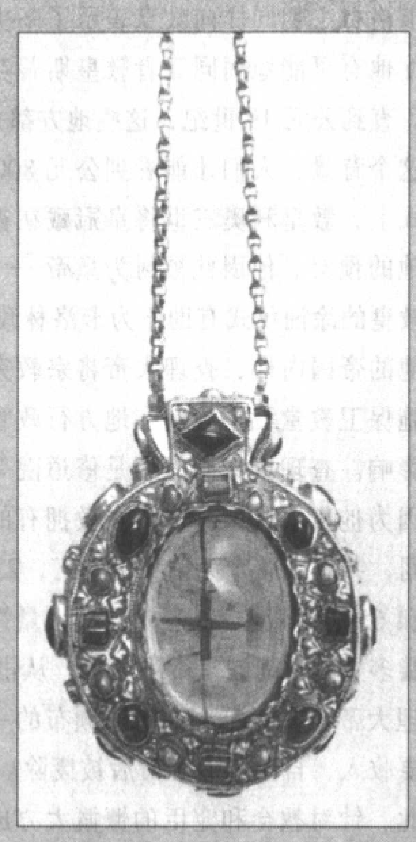


[63]

卡洛林时期的文艺复兴

如同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历史学家确定的查理大帝和他9世纪继任者们统治时期的文艺复兴的特点是：对古代传统艺术和文学怀有极大兴趣。古典拉丁语在被日耳曼语言排斥并在西法兰西亚演变为“罗马乡下话”后，重新作为表达语言进行学习。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点是其非天主教的艺术和文化形式的魅力，卡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却渗透着神学价值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觉接受拉丁化的教会人士所倡导。

卡洛林文艺复兴的根源是查理大帝喜欢以王家以外的身份行事；教会和国家在许多方面交叉。卡洛林的法令（或布告）有许多法律诉讼，对道德改革也很有发言权。法律看来可以使帝国臣民基督教化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会在这一任务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教会向卡洛林王朝提供行政管理者、顾问、皇家代理人、学者、法律专家、教师和神职顾问。在文艺复兴中教会人士确实是重要人物。出生于约克的曾经领导王室学校的教士阿尔昆——据记载他“用红酒和啤酒涂喉咙，以改进教学和使歌声更加动听”——据说梦想将亚琛的王宫变成新的雅典。



这个精致的镶嵌宝石的金护身符挂件因曾经属于查理大帝而闻名，圣骨放在中央的空心处。

通过抄写拉丁文手稿来抢救古典传统是关注的中心，古籍中大多数未被毁掉的作品确实被卡洛林人所转录。法律编码、书写改革和乐谱改进是后来进一步关注的方面。除了在亚琛建造王宫外——大量抄袭拉文纳教堂——很少其他大型艺术和建筑项目留存下来。卡洛林艺术的作品往往都尺寸较小，展示细微的艺术技巧。我们所看到的壁画、首饰、插图手稿和书籍，是将古典风格与罗马后期、拜占庭、凯尔特和日耳曼遗风结合的艺术形式。

身墨洛温-卡洛林的统治之下。查理大帝被证实是最成功的扩张主义者。在他共同执政的兄弟加尔洛曼（公元768年—771年在位）适时死去后，查理大帝于771年作为惟一的统治者崛起，在世纪之交时建立起包括全部 [63] 原法兰克人领地的庞大的欧洲帝国，并将其扩张到西南欧和意大利。公元744年他进入意大利半岛后，在伦巴底战役中获胜，并成为伦巴底国王。他使卡洛林家族获得欧洲的统治政权；他还进一步北上易北河和波罗的海，对撒克逊人展开血腥战役。

卡洛林家族对他们以十字架和刀剑征服土地感到十分自豪——这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可能，因为阿拉伯人的政权当时被限制在伊比利亚半岛。查理大帝同样强迫战败的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在让日耳曼人皈依的过程中，圣卜尼法斯的传教士极其热情，表面是温柔谦和，事实上毫不妥协，

（第58页）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虔诚”路易的圣诗集细部。路易的统治与宗教改革，特别是与修道院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

残暴狰狞：公元728年异教徒撒克逊人战败后就遭受了几乎是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公元785年，查理大帝下诏，命令对撒克逊人有任何拒绝受洗或有冒犯教堂的行为举止，一律格杀勿论。作为镇压异教徒和不忠者的战胜者，卡洛林王朝同样向教皇表示了坚决的支持。查理大帝在意大利半岛的胜利使他有可能稳固同盟者教皇斯蒂芬二世的地位，同时也能划给他教皇封地。直到公元19世纪，这些地方都是教皇势力拥有的临时性基地。正是由于这个背景，人们才能看到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时的景象：在罗马举行的仪式上，教皇利奥三世将皇冠戴在查理大帝的头上，查理本人却宣称这出乎他的预料。他因此被封为皇帝——自公元476年以来的第一位西部皇帝。教皇的涂油仪式有助于为卡洛林政权添加神权色彩。

64

在他的帝国内外，查理大帝将宗教完全置于股掌之中。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保卫教堂。主教们在地方行政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作用超过大法官的影响。查理大帝同时还是修道院等的重要主人——而不仅仅是略微介入，因为他将这些地方视为主教拥有的巨大世俗权力的平衡力量。在他统治期间，共有304个大型工程动工，232个是修道院（与此相对应的是7座教堂和65座宫殿）。王室向教会大量馈赠：从751年到825年，教会在克里斯滕多姆的土地看来翻了3倍，从占可耕地总数的10%增加到30%。根据查理大帝在779年至801年颁布的一系列命令，农产品什一税成为教会的主要收入，自法国大革命后被废除。

因此，针对教会和宠臣的慷慨大方成为卡洛林王朝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够这样做，财产来源很多，主要是来自战争获胜而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和进贡。自查理·马特到查理大帝加冕，每年都有战争。查理大帝于796年掠夺而来的匈牙利阿瓦尔王国的珍宝非常丰富。土地就像金银首饰一样，是权力的流通手段。土地扩张为赠送领地提供了来源。卡洛林后期的慷慨馈赠，特别是向教会的馈赠，其部分来自于查理·马特早期大量没收的教会的土地。最后几位墨洛温的“庸王”在751年被废黜后，被收的土地成为卡洛林王朝可支配的巨大资源。同样，统治者也惯于赠予免税特权。

卡洛林的挥霍慷慨刺激了一定的经济复苏。自7世纪晚期发生的鼠疫消失后，人口得到增长：从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人口由750万增加到900万。得到卡洛林慷慨馈赠和庇护的修道院的地位，由于城市功能不断消亡而得到强化。他们确实常常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代理城市行事，筹集资金，组织劳工，便利交易。有些集市是由修道院组织的，例如在（靠近巴黎的）圣德尼、（梅斯附近的）科尔比、（亚眠附近的）圣里基埃和（阿拉斯附近的）圣瓦斯特——拥有国际影响。这些与修道院结合起来的活动位于城市郊区，如巴黎的圣热尔曼－德－普雷、兰斯的圣雷米和图卢兹的圣塞尔南。这样甚至为相邻的城市招财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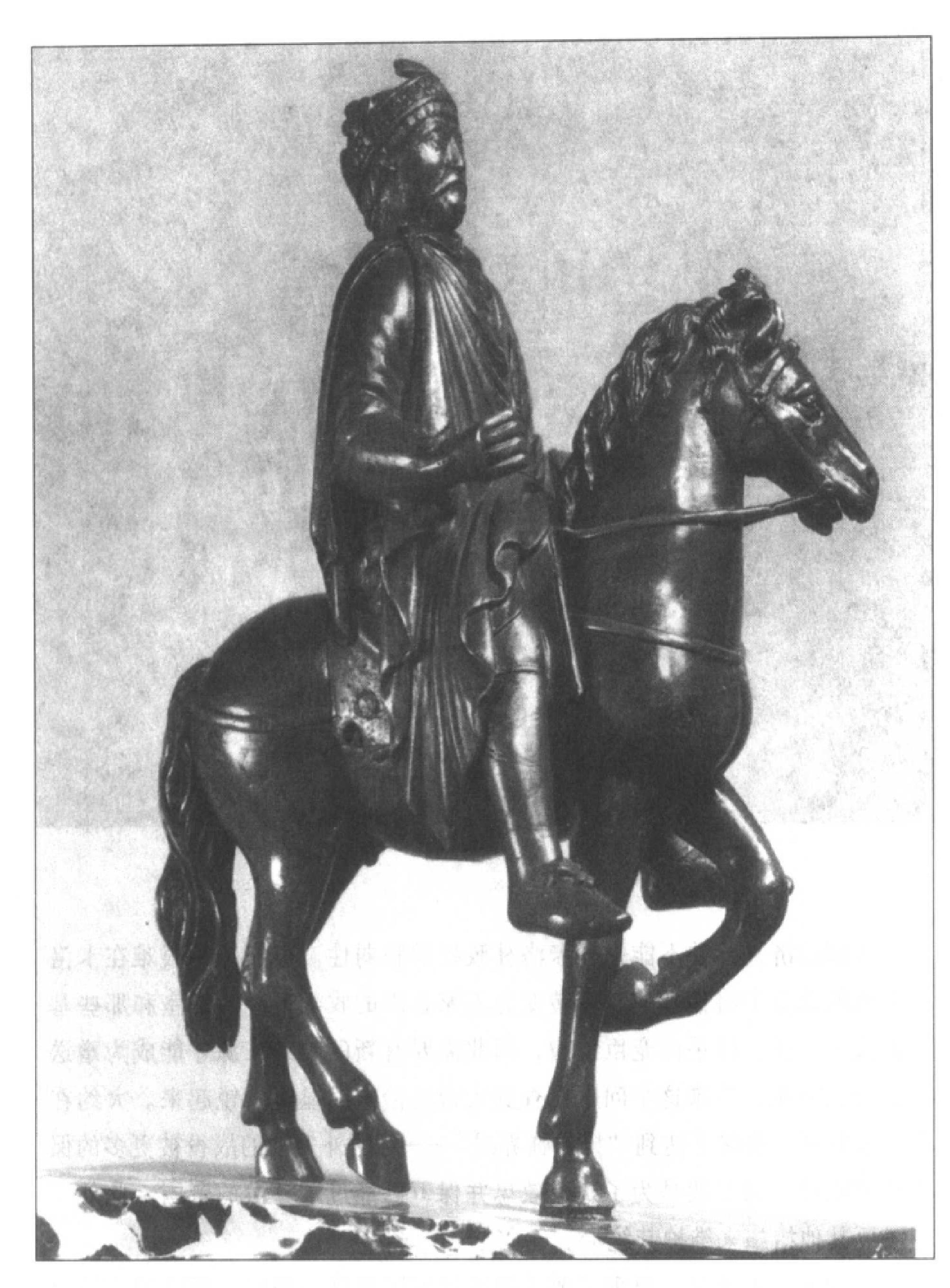
65



“虔诚路易”之子阿奎丹的丕平（817年—838年在位）的遗骨匣。根据丕平遗嘱捐献给贡科的修道院教堂。画面上耶稣的两侧是圣母玛丽亚和圣徒约翰。

然而经济复苏并不能弥补卡洛林政权的脆弱性。事实证明很难在卡洛林王朝的社会中将额外的财富转变为王家金库的收入来源。王室和那些基督教武士一样，随手向宠臣馈赠，因此需要有新的收入来源才能成为赠送贡品的大施主。看来这个问题在查理大帝统治末期显得尖锐起来。大约在公元800年，他终于达到“抢劫临界线”——对国外发动的战役被更多的保卫战所取代。保卫战是为了确保效忠并保卫已经过于分散的帝国。此外，还需要其他措施来维护其统治。

当战利品短缺时，出现了要求帝国紧密团结这一问题，而政府官僚主义风格的发展则是其潜在的答案。卡洛林王朝的行政管理有很强的神治倾向。在德国起用传教士就像在卡洛林政权起用神学家一样，他们很快就可以像确定对上帝的原罪一样确定反对王室人员的罪行。卡洛林王朝还认为教会人员是能干的文学行政管理人员。所谓的卡洛林文艺复兴——艺术和知识的复兴——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并且是为国家官僚机构利益服务的。例如公元775年的革新就是在法官和主教的日常行政管理体制上定期任命巡回皇家执政官。一般说来他们是两个人，其中一位是有影响的教会人员。这些官员被赋予监督行政管理的责任。他们对错误进行判决、惩罚和纠正，接受宣誓，有时还可以招募军队。他们特殊的使命是宣布作为法 66



这个西罗马皇帝（860年—870年在位）式的骑在马背上的理想化的人物，可能代表查理大帝，或“秃头查理”。这件作品看来是在其统治期间制作的。许多方面——长鬓角胡子，特有的衣着、发型——有法兰克人特点。这件作品使人联想起罗马骑士雕塑。

规的卡洛林法令并使之落实。这些法令是在自由民年度大会时写就，并成为帝国法律的主体，涉及宗教、道德和世俗范围。巡回执政官的作用就是对查理大帝自己永不疲倦的旅行的补充。自789年开始引入的宣誓效忠皇帝的做法，要求男性从20岁起发挥团结一致的作用。同样，作为一种他强加给他最有权力的下属的特别效忠誓言——表扬令，从理论上讲是使他们成为忠实的仆人。

67 宣誓、法规、巡回皇家执政官，皇帝巡视和利用教会作为王室代表，及卫道士只能暂时控制：但还是被证明无法彻底根除强大的离心势力。统

治者可以摆出罗马帝国继承者或基督教的圣徒的姿态。然而，在查理大帝统治末期，日益明显地表明首要的政治凝聚力仍然来自于战利品，主要是使国王有权势的下属和他们的随从高兴。猎获物和战利品短缺就会出现问题——这对查理大帝的继任者甚至成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

查理大帝之后

卡洛林政权的本质主要是团结，这与“无能国王”的软弱和分权自然形成了明显对比。查理大帝死后，宫廷权力瓜分的新阶段破坏了已经脆弱的帝国政权的主流。公元 817 年，查理大帝的继任者“虔诚”路易（813 年—840 年在位）宣布，在他去世后帝国将由他的后裔们分享。这引起了他的孩子们的不满：自公元 830 年起，在权贵们的支持下内战不断，先是反对他们的父亲，后来在他于 840 年去世后又相互残杀。公元 843 年，《凡尔登协定》正式决定将卡洛林帝国分为三个部分。皇帝封号留给洛泰尔，他的封地洛林从意大利半岛到波罗的海，其中包括亚琛和罗马；其领地被称为“东法兰西亚”。相对的日耳曼人路易的西部领土“西法兰西亚”，当时在“秃头查理”的统治下；他于 838 年至 877 年以国王身份统治这里，其中 875 年至 877 年为皇帝。

“法兰西亚”一词有时也指从塞纳河到洛林边界的地区，但更普遍的“西法兰西亚”称呼的使用是从老卡洛林帝国的西部领地开始的。很明显，随着时光流逝，这块土地脱离了法兰克人统治的日耳曼化的东部，蛮荒而模糊的未来法兰西形象开始渐渐显露出来。当然，牵强附会地来理解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从政治地理的水平来看，目前法国的四分之一的地方在 9 世纪后期是在日耳曼人或洛林国手中，而且变化缓慢。《凡尔登协定》的王权分割对民族居住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有的话，也就是将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分开。在西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 - 高卢 - 罗马混合体还占优势时，这是两个最明显的民族。）《凡尔登协定》更主要的是划清当时很脆弱的政治边界，划界是沿马斯河、斯凯尔特河、索恩河和罗纳河的流向而定，并没有考虑民族或文化的边界。

然而，《凡尔登协定》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文化分界。在协议签署前，即在 842 年的斯特拉斯堡誓言中，日耳曼人路易的军队是用日耳曼语解释誓言；“秃头查理”则是用“乡村罗马话”——源自于拉丁语，是后来法国语言的基础。法兰克人建立的王国在公元 6 世纪慢慢地因 [69] 语言而分割：10 世纪末，“法兰克”一词代表法国人；“法兰西亚”一词一般是与东部的“条顿国”或“日耳曼国”相区分；西法兰西亚国王和日耳曼国王需要翻译来使他们相互沟通。



[68] 公元843年签署的《凡尔登协定》对未来法国的版图在卡洛林帝国西部一侧划分得很清楚。协定除了把“西法兰西亚”从东部日耳曼地区的“东法兰西亚”划分出来，也表明了一块不确定地区的轮廓——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双方政权都在尽力向那里渗透。卡洛林王朝在确定和巩固法国后来发展的宗教和行政管理的框架上起到重要作用。

后来在法兰克人的领土上发生了动乱。王室的争吵不和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威信和权威。洛泰尔王于855年去世后，又一轮领地的瓜分开始了；简言之，从881年至887年，软弱无能的“胖子查理”（西法兰西亚的国王，884年—887年在位）拥有皇帝称号并统治着全部帝国。他在政治上的软弱导致一个贵族集团选举他们自己的人任国王，名叫奥多，是个“罗伯尔丹”（即大法官强人罗伯尔的后裔）。他死后王位传回到卡洛林政权“好人查理”（893年—922年在位）手中。但在卡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个世纪，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由卡洛林和罗伯尔丹家族分享王位。

这些王室纠纷发生的背景是黑暗的政治气氛。卡洛林领地受到外来民族，如撒拉逊人、匈牙利人，特别是维京人的不断攻击和抢劫。来自北非的萨拉桑海盗的攻击自793年开始，攻击的地点是下朗格多克地区。科西嘉在806年受到屠城，整个法国南部在838年和842年遭到野蛮攻击，撒拉逊人杀入罗纳河谷，直抵阿尔。他们在拉加德-弗雷内和圣特罗佩地区建立了常驻基地，从这里他们继续烧杀抢掠，直到972年至973年间被驱逐出去。在10世纪时，匈牙利部落同样从东边攻入法国领土。他们于10世纪初抵达德国和意大利，从919年到30年代后期，他们闪电般地攻进法国，造成了大量的破坏。

异教徒维京人，或称“诺曼人”，是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和最大的外国威胁。这些斯堪的纳维亚海盗们于8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法国的西海岸和沿着英格兰南部海岸发起海盗攻击，并且很快攻入法国内陆。844年至845年他们攻击离海岸较远的城市，如图卢兹、图尔和巴黎。自851年起，他们在法国过冬，经常袭击法国的西南部。

维京人造成了巨大破坏，搅乱了经济。卡洛林王朝认为他们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人口下降，物质破坏，经济动乱，政治道德沦丧；帝国的贵族不能真正地控制他们，因为维京人只是一味地烧杀抢掠。而卡洛林家族过去就是行家，如今掠夺者变成被掠夺者，强盗变成受害人。也许编年史作家大部分都是教会神职人员，而教堂和修道院是异教徒维京人的抢掠目标，因此他们对维京人的看法有偏见。维京人在法国几乎各个地区都进行过攻击，经常是非常分散的。皮卡尔迪在835年到925年期间受到17次攻 [71] 城，这就意味着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内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无攻城之虞。

然而有一种情况也使人认为攻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抢劫作为富人仓库的城市和修道院等中心，维京人将财产释放到公开市场上，从而刺激了经济。就像卡洛林家族所做过的那样，抢劫只是贸易、易货和交换礼物的更广泛的一种形式。维京人抢劫可能被看做对卡洛林政权的破坏性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它统治下的老百姓；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当将法国人民群众的命运和它的主要统治者的财富区别开来。

70

维京人

公元 885 年，巴黎居民焦虑不安地退缩到斯德岛上，等待大批维京人军队的到来，他们血洗城市并以刀剑逼向居民。巴黎人已经知道关于丹麦海盗水手的事。公元 845 年，后者将他们令人生畏的大船开到城市，“在两侧扔下各种废物”，一位编年史家写道，“没有遇到哪怕是最小的抵抗”。他们稍作停留，用从圣热耳曼－德－普雷的教堂砍下来的椽子修理船上的木桩，然后沿塞纳河而上。

这些异教徒水手——法国人称他们是诺曼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功绩是在 885 年结束了统治达一个世纪的卡洛林王朝。在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沿海袭击中，从 9 世纪初他们就开始利用法国稠密的河流系统将战利品运回自己的国中。皇帝以及西法兰西亚的国王们努力与这场灾难作斗争。自公元 845 年起，“秃头查理”定期向攻击者进贡，换取他们撤退。然而诺曼人来的次数却更多。公元 860 年后，国王开始实施在河上筑坝的政策，以制约陆地袭击。

公元 885 年维京船队到达巴黎。据说有 700 艘大船，外加小船组成的船队，随船的军队有 3 万至 4 万人，他们或者在船上或者在沿岸。由罗伯尔丹家族的首领奥多领导的一小支武装队伍英勇地捍卫通往岛上的两座桥头。维京人进行了长期的围困，他们采取了所有的进攻手段，包括用火船攻击桥头堡。对巴黎人来说，基督的神祇站在他们一边。一个维京战士在进入圣日尔曼教堂的墓地时被打死。有人看到圣徒的鬼魂在夜里撒着圣水沿城墙走动。圣骨被送到巴黎的战斗前线。最后“胖子查理”皇帝率军赶到，但他更愿意谈判而不是战斗。维京人满载勒索的物品，不久即退回塞纳河。

巴黎是幸运的。强奸、抢劫和大肆破坏是这些海上出生的强盗的特点。“没有一条路上”，一位卡洛林编年史作者写道，“不是洒着被杀害的教徒身上的鲜血”。此后的几十年中维京武士们终于定居下来。在首领罗洛的率领下，诺曼人于公元 910 年至 911 年定居在靠近塞纳河河口的地方。经过几代人，他们把自己改造成了真正的“诺曼底人”。



有关诺曼底大公威廉 1066 年征服英格兰的 70 米长的贝叶挂毯。有意思的是，诺曼人被称为法兰克人。看来，他们是完完全全地被同化了。

西法兰西亚的中央政权危机，更广泛地说是帝国危机，既有其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特别是在“秃头查理”（838 年—877 年在位）统治期间。由于他对付维京袭击所表现出的软弱无能，而使情况变得非常紧急。有钱有势的臣民们不断摆脱中央政权的统治，因为它无力保护自己的子民们。卡洛林政权试图像墨洛温王朝在此之前所做的那样，返回到卢瓦尔河与斯凯尔特河之间他们政权的心脏地带。公元 10 世纪时，统治者们鲜有走出这一地区的——这与查理大帝永不停息的旅行征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确实，罗伯尔丹家族被北方的贵族挑选为君主以反击维京人的袭击，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布列塔尼和卢瓦尔河地区的承认。在 10 世纪中期，巡回执政官制度被打破。至 884 年起牧师会法规终止了。自 889 年以后没有召开过国家议会。

王家权力代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理论上讲可以按照国王意愿撤销召回的大法官职务已经日益变为终身制，然后具有世袭性和封号性。公元 877 年，他们不再向中央政府上交报告，从而表明他们的地位从国家官员变为世袭领地的封王。他们中许多人过去得到王室馈赠（拥有王室封地）。这类王家馈赠在早期从理论上讲是可以被收回的——这种想法是说作为对他们提供服务的回报，皇家侍臣可以获得临时的来自土地的物质收入，但并不拥有土地本身。这一区别已经日渐消失。权臣们随着拥有的土地不断增加，开始取得公爵封号并以王宫总督的身份行事。确实，有些人开始拥有王室封地，甚至模仿他们的国王豢养私人随从亲信，以实物方式对他们进行奖励，并以类似的效忠宣誓确立亲信们对自己的人身依附。这批势力一度受到监督检查，但后来王室发现难以对付他们，因为他们能够付出的东西很少。地方权贵在行政和教会建立了充分、大量的控制体系，卡洛林王室无法将他们除去。馈赠品现在都绕过王宫发放，而过去所有的战利品都被送进王宫。

地方领导者的号召力为国王所无法企及。对防卫的需求导致当地权贵们修建碉堡式的城堡；在城堡高墙后面，他们以防止外来者为名以当地群众的保护人自居。他们一度将国家的，甚至地区的领导当局视为外来者甚至将其等同于维京袭击者。在罗马帝国后期，马赛的萨尔维帝国曾经记载农民们盼望抗缴国家的税收要求，避免乡村的强盗和野蛮人的袭击，“他们因此将自己置于强大的保护之下，使自己成为投降于富人的俘虏，并在他们的管辖之下。”维京人的袭击和中央政权在公元 9、10 世纪的崩溃使许多农民做出了同样类似的选择。他们和主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从而为我们后面将看到的中世纪封建主义奠定了基础。 [72]

看来，卡洛林王朝的领土被分割成较小的组成部分，甚至于连“庸王”时代都不如。洛林中部帝国被证明已经灰飞烟灭。在公元 9 世纪晚期



公元843年《凡尔登协定》签署后，“虔诚路易”之子洛泰尔一世（公元840年—855年在位）以中央为界划分为东、西法兰西亚王国，并保留了帝国称号。

西法兰西亚一度被纳入版图，但在10世纪时又滑向东法兰西亚，这是后来的洛林命运的预演，一如法国和它的邻国德国之间无休无止的争端。

勃艮第绝大部分土地被凡尔登的洛泰尔家族所控制。然而877年，“秃头查理”的妹夫、维也纳的波索自封为勃艮第和普罗旺斯（后者原来也是洛林的一部分）之王。波索的王国很快就崩溃了，但他的儿子路易在890年成为普罗旺斯国王。进入公元10世纪，地方权贵之间的派系斗争一直在继续。例如勃艮第的鲁道夫二世于933年建立了阿尔王国，囊括了巴塞尔到地中海沿岸的地盘。这从理论上看起来权势显赫，实际上鲁道夫和他的继任者们大部分处于仰当地权贵鼻息的地位。

在这些政权分裂、各自为政的年代里，与东、西法兰西亚的区别一样，另一种文化区分也日益公开，这也就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分化。一条宽带穿越法国中部，大约是从普瓦图到莱芒湖，明显地表现出了两个日益明显的不同文化区域。在北方，法兰克人从数量上看很强大，而且政权基础更为牢固。这是北方地区，法国语言作为奥依语是最终取胜的一支，而且也是习惯法占上风的地区。而南方，作为对比，则是操奥克语，这一地区占上风的是更接近于古典拉丁语的一种“乡村罗马话”的语调；法兰克人在这里数量少，影响小，更具有罗马人的遗风，带有更为明显的城市历史，罗马法规是基本法律。

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日益明显。兰斯的编年史家弗罗多阿在公元10世纪初的记载中写道，高卢人是由除法兰克人以外的“勃艮第人、阿奎丹人、诺曼底人、布列吞人、佛兰德斯人组成，是那些来自哥特和西班牙边境地区的那些人”。他们正是在卡洛林王朝最后一个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单元。诺曼底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例子。在910年至911年时，维京首领罗洛先是围攻巴黎、后是夏尔特尔均告失败后，与“好人”查理国王谈判达成协议，维京人被允许在塞纳河下游定居，但要皈依基督教并对王[73]室保持忠诚。维京人融入了当地群众之中。特别是在理查德一世时，他将该地区作为卡洛林世袭领地来组织，他的继承人则拥有公爵称号。同样在北方，“铁腕”鲍德温在诱拐并娶了“秃头查理”的女儿后，自己于879年建立了拥有佛兰德斯爵位的领地。他的儿子鲍德温成为佛兰德斯伯爵，在北方地区融入了密切结合的政治集团。

在南部和西部，政治分裂过程则更为激烈。勃艮第在西法兰西亚的部分在公元9世纪还在奥顿公爵们的统治之下，而965年时该地区则暂时在罗伯尔丹家族手中。阿奎丹人则保持着独立的古老传统。887年后，当地的王室贵族们，如普瓦提埃、图卢兹和奥弗涅的公爵们卷入了无休止的控制该地区的宗派斗争；与此同时，分布在比利牛斯山两侧的加斯科涅人则尽量保持回避。“哥提亚”，即原先的塞普提曼尼亚由图卢兹公爵统治，

然而却无法抵挡西班牙人的进军。

西部的布列塔尼人继续我行我素。在卡洛林王朝从753年至824年发动的一连串袭击后，布列塔尼人同意向法兰克王朝俯首称臣。但这毫无意义。地方统治者很快就自封为公爵甚至国王。为防止布列塔尼人的扩张，他们向马延河挺进，卡洛林王朝在那里设障。自公元8世纪60年代起，洛林的贵族"强人"后来成为昂儒、都兰地区以及曼恩的公爵罗伯尔，他在那里实施统治，其任务是密切监视维京人的扩张。

罗伯尔丹家族的状况是说明分裂割据达到何种程度的很好例子。"强人"罗伯尔对昂儒和曼恩的控制持续到9世纪晚期，当时"秃头查理"让罗伯尔的兄弟于格为圣·德尼的男修道院院长，控制了奥斯达拉西亚的大部分。罗伯尔的儿子、巴黎公爵以及他的叔叔于格的继承人奥多，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于888年被选为国王。898年奥多死后，他的家族放弃统治，但他们强化了在法兰西岛的地方势力。奥多的兄弟作为罗伯尔一世在922年至923年实行统治，罗伯尔的女婿于936年称王。罗伯尔一世的儿子"伟人于格"，帮助卡洛林王朝的路易四世于936年称王，为此他被称为"法兰克公爵"（或"法兰西亚公爵"）。甚至在"伟人于格"的领地范围内，不祥的分裂趋势让罗伯尔的权力结构分崩离析。昂儒、莱芒和布卢瓦的公爵和独立意识强烈的寨主的崛起，使罗伯尔丹家族的权力在挺进布列塔尼的进程中销蚀。公元987年，当于格的儿子于格·卡佩悄悄地披上国王的外衣建立起卡佩王朝时，西法兰西亚的政治日程已是权力下放和分权而治。

第四章 中世纪

74 在世纪之交时，没有任何足以表明西法兰西亚将会成为西欧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条件。新的卡佩王朝只是在西法兰西亚的范围内召集民众和政治团体，对他们加以疲弱的控制，而西法兰西亚则被主要的文化差异所分割，而且不断被分解成很小的政治团体。法兰西国家可能因此而发展成一个像巴伐利亚或比利时那样的较小的二流国家。987年以后，这是它的明显弱点，它可能完全消失，被一个更大的集团吞没。在一定阶段，例如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初期，看来西法兰西亚可能要并入以英国为基础的“昂热帝国”。昂儒的伯爵亨利控制着大陆，而且在1154年到1189年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从最好的方面看，西法兰西亚看上去更像潜在的未来国家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国家。

“西法兰西亚”在公元1000年至14世纪早期发展成为“法国”，一个潜在的、站在前沿的国家，从很多方面看归功于它的统治者。卡佩王朝开始发展缓慢，后来变得特别善于进攻性地管理国家、扩张疆界，更强有力地控制臣民。路易四世（1108年—1137年在位）和路易七世（1137年—1180年在位）将法兰西岛建成王朝权力中心；菲利浦二世奥古斯都（1180年—1223年在位）打破法国西南部的界线；然后是路易八世（1223年—1226年在位）和路易九世（1226年—1270年在位）将卡佩王朝的势力扩大到南方，使这一过程达到顶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一位意大利观察家在14世纪初期写道，“法国的国王举世无双”。

更重要的是中世纪还标志着“法国”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整体。卡佩王朝特别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将法国作为领土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单位的国度。罗马高卢曾在地理上看更像未来的法国，政治上它是一个大单元，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西法兰西亚同样只相当于更大的法兰克人集团领地的三分之一——它比后来的“法国”更小。在12和13世纪，法国第一次被承认拥有政治和文化地位。

编年史关于卡佩王朝如何达到它所做到的这一切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我们需要评价他们这些活动的背景，那些往往在卡佩王朝直接控制以外的集团和人群的生活，他们开始了导致“法国性”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理解封建制度的运作方式，理清催生了“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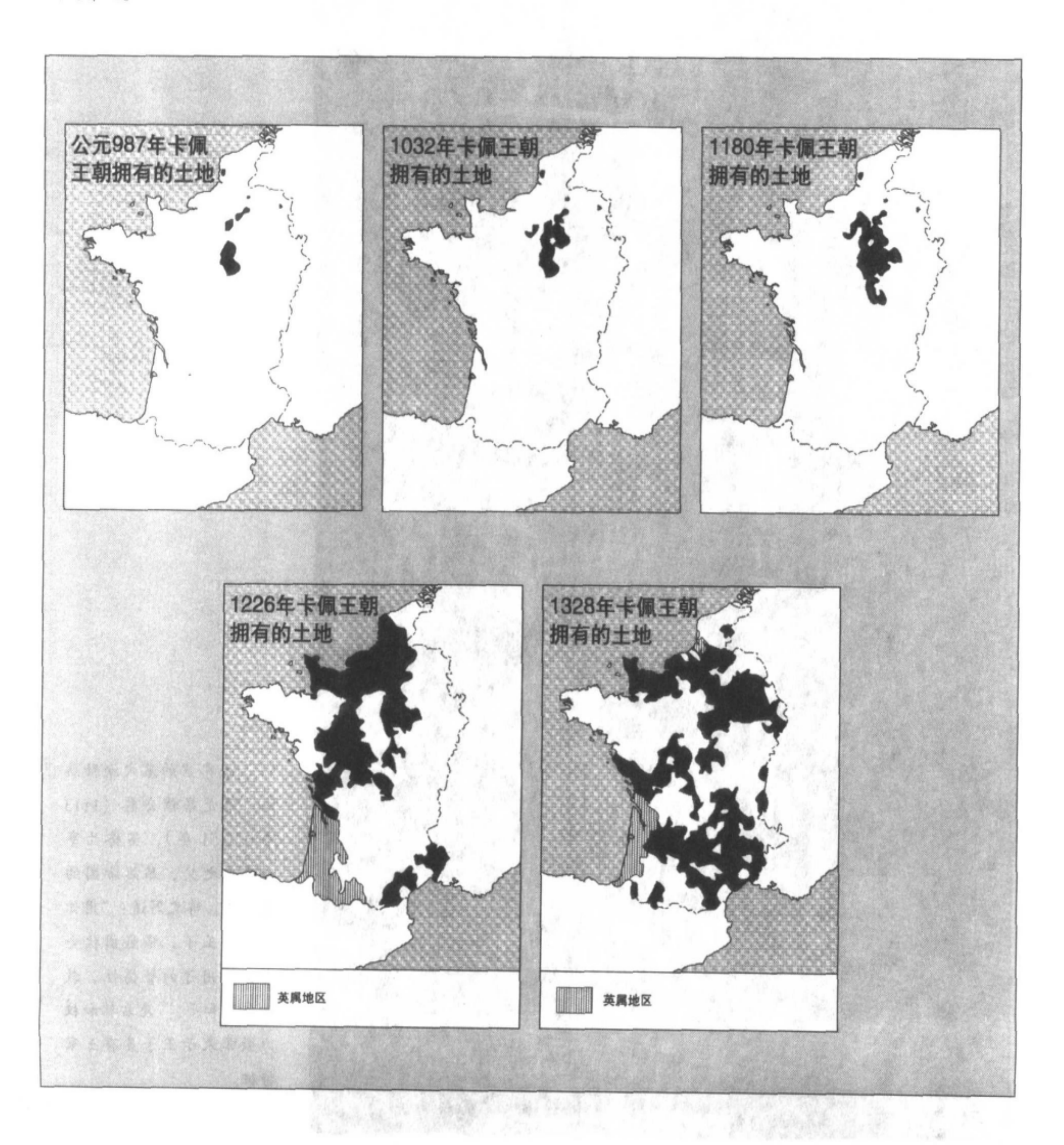
75 杰弗里的墓穴涂釉画片。他是昂儒公爵（1113年—1151年），英格兰亨利二世之父，昂热帝国的建筑师。碑文写道："用你的剑，王子，强盗团伙会离开；用你的警惕性，教堂会有和平。"座右铭和权力徽章表示王子具有王家特征。

卡佩王朝时期法国的形成。尽管卡佩王朝早期只拥有西法兰西亚国王的头衔，他们在很狭小的地区行使权力。通过施展外交诡计和加强军事实力，王朝将自己治理的王国扩大到伐卢瓦王朝的边界处。

年代”的教会的运作方式。我们需要解释法国在这几个世纪中强大的经济和人口复苏的来龙去脉。我们还需要理解西法兰西亚时地区生活的复杂性。

卡佩王朝的封建界限

76 公元987年西法兰西亚落入于格·卡佩之手，当时的西法兰西亚大致



拥有843年签署的《凡尔登协定》中确定的地盘。于格·卡佩是一个比他的法兰克祖先更注意将领土与控制权相结合的统治者。他听不懂“东法兰克人”（不久以后被称为“日耳曼人”或“条顿人”）所讲的语言，也不太懂拉丁语。法国，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西法兰西亚”很快就不再使用），已经失去任何人种上的意义。在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时代，种族特 [77] 征逐渐消除，而地区间的区别却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也反映出国家高度分裂割据的特点，直到公元1000年，国家仍被分为约50个明显的政治区划。

公元987年的法国仍然只是地理上的表达方式。除非我们相信某种“隐藏的高卢之手”所写的不可言喻的作品，我们还是应当确信运气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它使许多地区归了法国，成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实体。西法兰西亚的某些部分不再与发展中的法兰西国家维持长期的联盟。例如佛兰德斯人仍然愿意追随日益增强的独立路线，直到16世纪宣布自主（尽管法国在17世纪想把这个地区的一部分抢回去）。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是如此，它至少在名义上是西法兰西亚的组成部分，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放弃了对它的权利。不过法国人在17世纪时又想把这一地区的部分土地夺走。

西法兰西亚的许多地区还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化轨道中。例如，直到12世纪，阿奎丹和加斯科涅尼更像亚平宁半岛而不像卢瓦河以北的祖国法国。在1066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诺曼底的历史属于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昂热影响的扩张同样使许多地区直接处于英格兰影响之下。吉耶内在1154年和1453年间完全是英国的；利姆赞有大约一半的时间也是如此。通过王朝联姻和外交权谋也进一步建立了外部的联系。例如1234年，香槟公爵成了纳瓦尔国王；1261年，昂儒伯爵成为那不勒斯国王。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后来的法国的东部和东南部由日耳曼统治——在9世纪中叶起以“神圣罗马帝国”著称。例如奥托一世皇帝（936年—973年在位）就将阿尔萨斯并入斯瓦比亚，将洛林分成两个地区。佛兰德斯是由当地的公爵们建立起的强大的自治地区，1056年他们作为帝国公爵得到承认。自843年以来，勃艮第被分割：西法兰西亚勃艮第仍然保持自治，但在很大程度上效忠卡佩王朝；东勃艮第则属于皇帝。帝国的勃艮第与四分五裂的阿尔王国相连，包括普罗旺斯。在中世纪大部分时期，普罗旺斯由当地权势家族所争食，例如1125年它分属于巴塞罗那公爵和图卢兹公爵。

因此，卡佩王朝的大地一直是即便算不上非常惊心动魄，但也可称是高度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公元987年，于格·卡佩直接控制的领地可能比加洛林王朝后期拥有的土地多，但仍然相当有限。例外的是英吉利海峡沿岸蒙特勒伊一带的领土，他们分布在巴黎地区。尽管国王拥

有巴黎本身，但他并不控制城市，城市是在小的王公们手中。他对许多大型修道院拥有权力，而且有权任命大约三分之一的法国主教。

78 作为权力的基础，这样是牢固的，但它在西法兰西亚范围内与其他权贵相比，则只能算是拙劣的表演。例如在公元1052年时，普瓦图公爵将加斯科涅和阿奎丹合并，他们创立的公国远远大于卡佩的领地。1154年时，布列塔尼和邻居诺曼底与阿奎丹和英格兰合并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昂热帝国比属于法国卡佩王朝及其联盟的土地要大得多。由于离家较近，卡佩家族可以在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宣称受到包围。1125年时，有权势的布卢瓦公爵们要求获得重要的香槟县。在南部，图卢兹公爵同样控制着在12世纪早期法国南部从罗纳河到昂古莱姆，以及从比利牛斯山到奥弗涅地区的大块地盘。

如果说卡佩政权的地域是拼凑而成的，那么它的协调能力也是如此。有时作家们在描绘卡佩王朝时称之为“在他们自己家乡的皇帝”。然而他们要求主权的呼声也空洞无力；统治者不再立法，通过可召回的官僚来授权，或者是迫使自由人进行效忠宣誓。他们的王权完全没有领主们的权力有效。确实有一种说法，认为于格·卡佩及其后的继任者——“虔诚”罗伯尔二世（996年—1031年在位），亨利一世（1031年—1060年在位）和菲利浦一世（1060年—1108年在位）——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靠的正是王国的衰弱而不是强盛。他们对领地里权贵的地区权力威胁完全无所作为，也不能阻止他们单独行动及打造自己的忠实随从，这就使得“统治者”能够容忍那些更有权势的权贵们。

政治权威的形式就是编织人身依附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卡佩王室是封建权利的金字塔顶端，王国内的权贵们和教会高级人员以个人忠诚依附于国王，作为他的仆从。这种纽带有不同的等级，而且只是在西法兰西亚流行，并经常在实行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发展起来的这种靠赏赐封地以换取人身依附的做法，给执掌权力造成了问题。一个地主拥有土地，其余的地主却同时也对这片土地拥有权力，如法国国王的仆臣香槟公爵的领地还有另外9个主人，其中包括日耳曼皇帝和勃艮第公爵。

对人身忠诚和依附日益变为与地产相连的荣誉称号。创立这类“授职”采用传统的效忠形式：仆臣要跪在主人面前，将手放在主人手中，以圣物或圣经进行效忠宣誓，从而就成为他的“人”。主人除赏赐土地外，还要保护他的臣仆。作为回报，臣仆向主人贡献“建议”和“帮助”。“建议”是指臣仆参加主人的会议，向主人提出建议，并对争议提出裁决和解决办法。“帮助”则是同意随同主人出征，可能的话带着武装的追随者；偶尔也提供财务帮助，包括主人一旦被绑架的话支付赎金，主人女儿结婚



佩剑仪式是日益程式化的仪式的一部分，并结合骑士授衔仪式。此图是一部13世纪手稿中的插图。

时送礼，等等。这种关系的军事作用非常重要，看来骑马的臣仆必须提供 79 武装支持，加上他可能带来的持刀随从——从加洛林王朝起，骑兵就是战场上的重要军队。

这样的安排使得中央集权控制只是在国王的臣仆认为有理由感恩和效忠时才会有效。加洛林王朝时期，赐地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收回的，权利也并不是绝对的。然而到10世纪时，封地可以被继承，并可以全部转到法律和政权之下。人身依附的链条通过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效忠关系被向下发展，国王的臣仆也招收自己的仆人，后者与国王的关系甚微。拥有大量土地的王公们，比他们的国王更甚，管理着他们行政领地的忠诚宣誓。例如勃艮底的居民只对他们的公爵宣誓效忠。

对大多数法国男人和女人而言，法国国王仅是徒有虚名。他们的权利

被分解，又没有军事力量，王室对他们的臣仆们的权力有限。他们拥有的臣仆数量远远少于他们的臣仆们自己所拥有的仆人。这种靠宣誓臣服的关系是一种低水平的联系。“你是我的人”，11 世纪 20 年代，普瓦图的威廉公爵告知他的一个仆人，“你的义务是满足我的愿望。如果我命令你向一位农民致意，你的义务就是服从……”



在第戎的圣贝尼涅教堂地穴柱头上的 11 世纪人像，显示了在第一个千年时广为流传的祈祷姿势。后来逐步被更加平常的双手合一的姿势所取代——那是一种向主人致意的封建礼节的动作。

对权威的蚕食愈演愈烈，因为获得领地的王公们在控制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权力上失败了。尽管封建分权制最初有利于领地上的王公，他们利用直接的王权保护自己，在但9、10世纪，他们发现难以控制驾驭自己的仆人。城堡的建立在开始时是王权发展的组织过程的一部分。一旦建成后，[81] 城堡就被好斗的城堡主人和骑士们用作基地。从这里出发，他们可以和骑士团伙把他们的愿望强加给周围的农民，并在火拼和抢劫中侵犯邻居的权利和特权。

于是，保持法律和秩序、惩罚犯错者却成了区区小事，远远脱离了日益成为名义上的国王和王公的管辖范围。城堡主人和骑士阶层一般都有办法在对他们有利的领地上建立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地主们建造的城堡为躲避维京人、撒拉逊人和匈牙利人的袭击和其他小领主的攻击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但从长远看，其代价是农民要接受更大的服从。骑士阶层的高超军事技术意味着农民几乎无权反对最沉重苛刻的封地负担。

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民的合法地位一落千丈。自由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即不用向封建领主交租的土地，在北方日益减少。大部分农民是“塞尔夫”——农奴，他们在包罗万象的庄园或领主体系中生活。奴隶制逐渐衰落；权力现在管土地而不是管人身。地主们更愿意自己的农奴有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被称做占用地，或租耕地），他们可以维持自己的家庭。作为报答，农奴必须承诺种地，并被迫为地主的土地，例如，领地提供强制性劳务。这种领地和占用地的区分在查里大帝时就已经存在，但在中央权力崩溃后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现在也要像仆人那样宣誓。一旦有召唤，他们有义务参加他们主人的军事远征，或当主人夏天外出野营几个月时在城堡中放哨。还有其他的杂役要干，有时非常怪异，例如晚上在池塘拍水，不让青蛙发出求偶呱噪，以使主人得以安睡。除了劳役外，农奴还要支付各类的债务和赋税。地主还实行经济垄断：他们强迫农民使用领主的榨酒机、磨房和面包房。这些权利对地主有多么来钱，对农民就有多么讨厌。地主对占用地和领地享有司法权，能够对一系列的过错强加罚金。

对大多数这样的法国居民来说，权力是掌握在马背上的骑士阶层手里的。自9世纪以来，中央权威式微；10世纪时甚至连地方王储都囊中羞涩，保卫土地和法律裁判都由当地的王公领主进行，那里的公爵和桀骜不驯的骑士城堡主的自主权日益增长。“你在王国里有如此众多的同伙和同类”，9世纪末期，兰斯的主教辛克马向“秃头查理”报告，“你与其说是实际上的统治，不如说是名义上的。”由于权力的分割甚至到达了王公领地以下的水平，这一说法更适用于卡佩王朝早期的情况。



1095年10月25日在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教堂，由教皇乌尔邦二世主持主祭坛献祭仪式。教皇在左侧；右侧率领众教徒的是修道士圣于格，他在1088年开始着手进行当时在西方世界最为雄心勃勃的教堂建筑工程。

教会和十字军东征

[82] 从许多方面来说，10世纪和11世纪的欧洲社会是分化为两个阶级，即由武士和农民组成的社会。但自10世纪以来，教会人士把社会概念化，他们把自己增加为一个额外的层次或阶层。除了“战斗者”和“劳动者”，他们将自己列为“祈祷者”。教会因此成为封建社会的结构性成分——他们确实一直如此，直至1789年革命者向封建主义发动了打倒一切的进攻时为止。教会人士享有与武士一样的地位，而与农民不同。只有“劳动者”才需要纳税，农奴无权祈祷。最富有的家族可以得到最显赫的教会头衔，这是大人物的恩赐。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地产掌握在教会手中，按封建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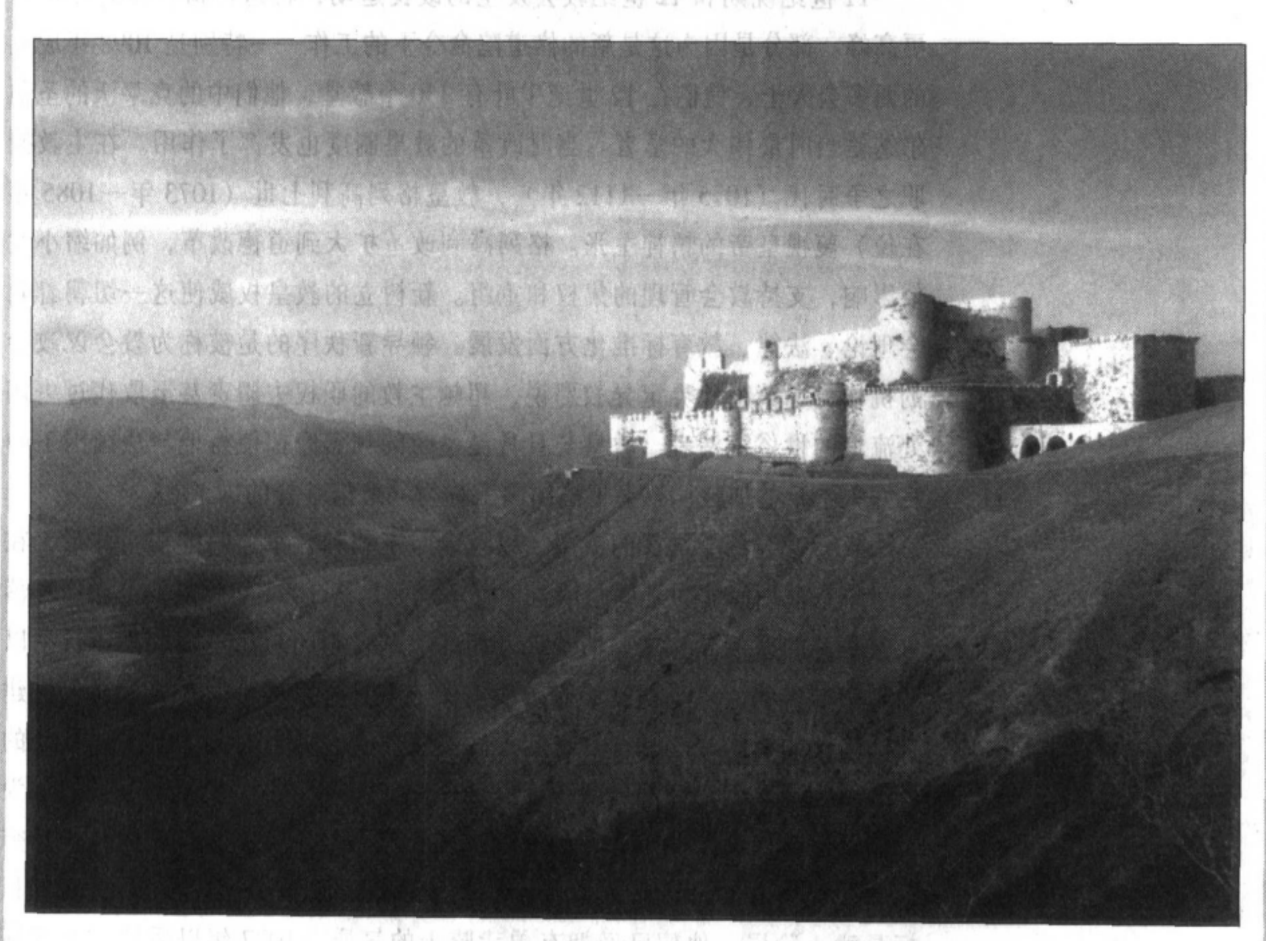
克拉克骑士城堡

“我们过去是西方人，现在成为东方人。他过去是罗马人或是法兰克人，现在是加里勒人……我们已忘记了自己的出生地。”在12世纪早期，耶路撒冷王国接近宫廷的一位牧师悼词般的评论，突出表明了许多法国骑士在十字军东征与圣城接触的经历带来的巨大文化冲击。

他们带着自己的文化碎片，在陌生遥远的土地上战斗。位于现在叙利亚的威武强大的克拉克骑士城堡、十字军将士的帕台农神庙，就证明了这一点。用石料建城堡在欧洲始于10世纪末期、11世纪初期，在法国所学习的建筑学课程的内容，加上拜占庭和阿拉伯的影响，在克拉克城堡的设计上反映得十分明显。某些内部建筑物的特点使人想到哥特式风格。当时，建筑贸易是双向的，东方的经验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城堡的设计。

克拉克城堡位于高高的山嘴处，是一系列相似城堡的网络，控制着山谷的南部和东部的入口。城堡所在地曾是当地的工事，1099年被法国骑士雷蒙·德-圣吉尔夺取。城堡的主要防卫工程建于12世纪，而外墙则到13世纪才建完。1142年特里波利公爵将它转给圣约翰的奥斯比塔勒骑士。十字军命令它的成员献身于救助贫穷并在圣地战斗。

在一位阿拉伯作家的眼中，克拉克城堡是“扎在穆斯林喉咙中的一根刺”。城堡是对阿拉伯人占领该地区的威慑。甚至萨拉丁也围攻它。城堡同时也是——如同类似的法国城堡——令人心满意足的封建权力的象征；它高踞于据法国编年史记载“各种物产都很丰富”的富饶山谷。骑士们建了一座风能磨坊，清楚地表明它拥有必要的资本抵抗任何攻城战。1271年，城堡最终由于人手不够而陷落。在12世纪初期，能够容纳几千名骑士的城堡仅仅由200多人防守。



克拉克骑士城堡。

[84] 式对土地进行管理。教会对农业生产征收什一税，和地主收取他们土地的租金和租粮一样。甚至宗教和圣餐仪式都穿着封地制服；在期望为圣徒进行祈祷时，已经远远脱离了宗教的激情互应，祈祷仪式与寻求封建保护结合在一起；祈祷时的手握手是个表示敬意的姿态。

尽管教会被封建领主及其价值观所主宰，但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取更大自主权的改革运动。在中世纪，最有权威的机构之一——修道院——在其中引领道路。由于地方公国和大公及公爵领地的行政管理被城堡里的地方当局所破坏，所以更广泛的教区结构逐步由修道院组织替代。在教皇的直接领导下，909年后的本笃会改良运动由勃艮第的克吕尼发动起来，并且蔓延形成国际性机构网络，到11世纪晚期有1500家强势机构。克吕尼派修道院是很大的地主，它引以为傲的独立性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其表示敬意。他们所代表的虔诚形式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教皇、王公和贫民都以慈善捐赠的方式表示支持。他们的豪华建筑、装饰和圣餐仪式引人艳羡；他们提供的奖学金、发行的图书和手抄本插图赫赫有名；普通人则认为他们所收藏的圣人遗骨拥有无可匹敌的神圣力量。

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教会发生的改良运动，将这种精神独立性推向更高峰。部分是因为这是新的修道院命令下的工作——特别是1098年成立的西多会人士，他们在12世纪中叶有350个教堂，他们中的克莱沃的圣伯尔纳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当时改革的教皇制度也发挥了作用。在主教授职之争时代（1075年—1112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年—1085年在位）蔑视皇帝的精神主张。格列高利改革扩大到道德改革，例如缩小世俗影响，支持教会管理的集权和重组。新树立的教皇权威使这一切朝着教会理论、法律、教育标准化方面发展。领导新秩序的是被称为教会议政会的机构，更清晰地界定异教邪说，超越主教的职权去谴责甚至取代过去四处流浪的世俗统治者。教皇与日耳曼皇帝的频繁摩擦使得他与法国国王的良好关系日益加强：教皇把法国国王称为“最信基督的国王”。

教会普遍日益增长的威望，以及卡佩王朝和教皇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尤为光辉彪炳。十字军东征是从1095年收复耶路撒冷和落入土耳其的塞尔茹克之手的圣地开始的。基督教的想法是采取集体行动以达到精神目的，在早期发展时的根本做法就是将宗教价值观逐渐输入封建社会精英的头脑中。从989年起，教会议政会开始号召划清与封建社会的[85] 固有暴力和毫无法理的界限。在“和平上帝运动”中，主教和公爵们认为他们可以替代实质并不存在的王权权威。对非斗士（祈祷者，但也包括穷人和妇女在内）的保护是这一运动传达的信息核心——这个信息针对的目标是武士阶层，他们已经拥有勇武骑士的气质。1027年以后的“上帝休战”运动则是号召在四旬斋、基督降临节和星期日及其他基督教节日时休

战，并将这一运动推向前进。

从总体而言，这些运动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废除暴力，而是遵循教堂赞成的指令进行限制和疏导。可以说正是依据同样的精神，教会发展了骑士生活仪式的基督教版本。给新骑士授封和授腰带的仪式具有很强的圣礼味道。神甫按剑祝福并引导宣誓，在誓词中未来的骑士发誓尊重教会，保护寡妇和儿童，热爱和平并遵守战争的初期法律。很清楚，这并不是向宣称正义和神圣战争的大步跳跃；基督臣民应受到保护，但异教徒则是军事威力的攻击对象。

如果说教会订立骑士行动准则的目的是限制武士阶层的暴力，那么宣布进行十字军东征则是采取了教会利用暴力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做法，而这也被卡佩王朝巧妙利用。“让那些到现在为止只知道与基督徒打仗的人们走开吧!”（1088年—1099年在位的教皇）乌尔邦二世宣布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说，“现在拿起武器反对异教徒”。这一号召在法兰西精英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乌尔邦二世本人就是来自于马恩河上游的夏蒂荣的法国人，他在法国（在克莱蒙）举行的会议上宣布进行十字军东征。全国激情澎湃，在南方特别是通过隐士彼得的弥撒引起更高的热忱。在后来的两个世纪中，没有其他民族如此积极地投身于十字军东征中。在高峰时期，可能有半数的法国贵族投入十字军的战争，或者投身于伊比利亚半岛上反对穆斯林异教徒的战争之中。有一些十字军东征几乎全部是清一色法国人的行动。

在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在圣地上逐步形成了欧洲；在1291年，基督教统治在那里（在阿克）失去了最后的地盘。在那200年中，十字军东征充斥着绝望幻灭和每况愈下的愤世嫉俗的气氛。其高峰大约是在12世纪的头30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夺取了耶路撒冷，在圣城建立了4个讲拉丁语的国家。但突出代表是耶路撒冷王国，在1099年首先是布永的洛林人高德弗雷统治，从1100年—1118年他的异母兄弟鲍德温成为国王；从12世纪40年代起，发生了长期的衰退。北部厄岱萨县的失守引起了犹豫不决的二次东征（1146年—1148年）。1187年萨拉丁攻陷耶路撒冷在欧洲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大约有4500名武士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第三次东征（1189年—1192年）则有15万人在一位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二世巴巴罗萨）、一位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德一世）和一位法兰西国王（菲利浦二世奥古斯都，1180年—1223年在位）的指挥下参战。但这次远征的收获却不大，少量的沿海地区在东征军的控制之下。尽管在1192年萨[86]拉丁同意让基督教朝圣者自由进入耶路撒冷，但城市已不在东征军的控制之下了。

除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8年—1221年），当耶路撒冷被部分地再

次占领——是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功——城市仍是可望而不可及。更重要的是，十字军东征运动核心中挥之不去的物质动机在战略计划和实施中变得日益重要。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十字军队伍错误地开往君士坦丁堡，他们把城市投入火与剑之中。在最后一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他们通过袭击埃及的权力基础来处理圣地问题的冒险意图越来越强。“耶路撒冷的钥匙”，有这种说法称，“要到开罗去寻找”。战争一直打到北非沿海的沙滩上。

十字军东征也有利于卡佩王朝。它将崇武的能量从法国释放出去，从而减弱了内部的暴力水平。发扬光大抢劫精神可以针对异教徒而不是基督教徒，针对外国人而不是法国人。“过去基督徒出发到海洋以外的地方”，本笃会僧侣、诺让的吉贝尔说，“法兰西王国永远受到骚扰和敌意的折磨。”这一运动有助于加强团结，分享封建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最伟大的封建地主习惯于卡佩王朝的领导。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萨拉丁（1138年—1193年），取自1180年的一幅波斯画。他可能是十字军最出色的敌手。他鼓动一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以团结阿拉伯民族，但对弱者施以武士气概的慷慨仁慈。



1249年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圣路易指挥的法国骑兵袭击并攻下埃及城市达米埃塔。1251年圣路易被捉，十字军溃败。他直到1254年才被赎回。

卡佩王权的崛起

13世纪末，法兰西王国走过了卡佩家族成员首次统治以来的漫漫长87路，当时它曾被看做是那些更有权势的达官贵人的掌上玩物。例如在1100年时因不能靠赤裸裸的强制手段来制服，佛兰德斯地区的公爵们拥有的家仆军队比法国国王的军队要多50%。此后的卡佩家族只能靠不同的实力降服他们，特别是他们将自己与最强大权臣的较量集中在王朝的神圣性上。国王和教会利用这一点作为王朝威望的宣传武器。他们聪明地将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传统结合起来，使卡佩国王的加冕成为一种主教的授

职仪式。这是个神圣的仪式，其特点是在此之前的751年至754年丕平王时就采用过的王室的涂油加冕礼。这样，他们的统治不仅仅是“上帝的恩赐”，而且卡佩王朝是上帝指定授权，如同大卫和索勒那样——王家的宣传大力鼓吹《圣经》中的前人范例。百合花和所罗门王被选定作为王室徽标。 [88]

自9世纪“秃头查理”以来，507年克洛维的兰斯加冕仪式就被视为神佑形成法兰西民族的一幕。后来其精神威望奇迹般发扬光大的力量，则归功于在兰斯接受神圣涂油加冕礼的卡佩王朝。自于格·卡佩之子“虔诚”罗伯尔二世时期起，王国中流传着关于他具有触摸即可治愈瘰疬病人的说法。通过触摸驱赶“国王的恶魔”这一说法，是由圣德尼修道院的王朝编年史学家学派所建立。路易六世（1108年—1137年在位）和路易七世（1137年—1180年在位）的亲密顾问苏格修士特别将王权描绘成是被上帝施以涂油礼的，而法兰西人民则由于艺术的安排成为上帝所选择的臣民。僧侣罗伯尔以救世主的语言召唤：“上帝选择了神圣的法兰克种族作为他的臣民和遗产。”



菲利浦·奥古斯都坐在达米埃塔宝座上的印章，其中12世纪中叶以来作为王朝标志的百合花绚丽夺目。

法兰西是由一个具有自己特点和属性的实体的观念开始发展起来。如查理大帝的12个武士之一罗兰在12世纪时在《罗兰之歌》中所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甜蜜的”法兰西。法国不仅是拟人化和几乎是个性化的，而且人们也认为王室就是法国的象征。圣德尼学派确定了法兰克王国是以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为起源。苏格修士广泛传播的习俗看法将王权视为是法国国王而不是法兰克人国王的。“最信基督的国王”和“最信基督的人民”合为一体。

卡佩政权的神授特点，是任何封建领主都无法以此自居的，使其在行使职权时具有宗主或封建主的地位。甚至最强大的领主也要在其宪章上拥有国王签名，代表封建等级金字塔顶端统治者的威望仍然有一定的用途。在12世纪的进程中，统治者们自己也越来越善于利用他们的封建地位以强化王权统治。1124年要求领主提供40天军事服务的权力被提出来，当时路易六世受到日耳曼皇帝亨利五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联合进攻的威胁。采用这种办法，路易四世击退了德皇，王家编年史学家很快就将其作为道德的胜利而大肆加以鼓吹。在世俗事务中，国王们利用他们拥有的封建仲裁权，在领主之间有纠纷时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例如菲利浦·奥古斯都于1185年收复了蒙蒂迪耶和亚眠，作为介入佛兰德斯伯爵案的回报。国王们还没收了因败诉而未能到庭应诉的领主的财产。更有甚者，自12世纪晚期以来，法国国王享有充分的威望可以自行定夺迎娶任何女继承人。因此在公元1137年，路易七世娶了他的最有威望的大臣阿奎坦公爵的女儿伊丽娜，而1180年菲利浦·奥古斯迎娶佛兰德斯有权势的伯爵女儿、埃诺

的伊莎贝尔为妻。

卡佩家族起初与傀儡无异，但他们以重要人物自居，自视为整个地区利益的象征，从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他们的运气不错。在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欧洲表现出难得的平静，主要的竞争势力正在别处忙碌。诺曼底人正与英格兰人纠缠，较少顾及到西西里岛；日耳曼皇帝的朝廷卷入与藩属、教皇和在意大利半岛的争斗，并对开放东部边界更感兴趣。卡佩王朝幸运的是他们的地盘位于法国北方中部的主要交通联络通道的枢纽之地，其领土是全法国最为丰饶肥沃的土地。他们甚至在婚姻之床上也十分走运。于格·卡佩创立了在国王在世之时为男继承人加冕的做法，使选举国王和瓜分遗产的传统消退，而这在上个世纪加洛林王朝时造成了诸多的内讧。但为了避免有争议的继承，主要的是必须拥有无可争议的男性继承人。自于格·卡佩以后的11位继承人也都设法做到了这一点。 89

卡佩王朝知道如何驾御自己的运气。他们充分利用书中的每一个计谋——从以总领主的地位运用权力到公开的强迫——在他们的地盘和周围的地盘行使权力。在卡佩的领地上旅行是很难避免城堡歹徒的袭击，或被强迫缴纳买路钱和赎金的。甚至有时国王也难以逃此厄运。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在他们的领地上镇压了这些桀骜不驯的城堡主和藩属。他们控制了巴黎的小领主，将城市建成王朝的首都。8世纪时，王宫建于克里希（在查理大帝时期）或亚琛，9世纪时建在圣德尼，秃头查理时期在贡比涅。巴黎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有1.5万至2万人，但卡佩王朝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在14世纪初达到15万至20万人。当菲利浦·奥古斯都于1189年至1190年间在首都四周构筑城墙时，巴黎的面积是从前斯德岛城堡围墙内面积的25倍。

卡佩王朝由于通过长期持续不断斗争控制了强大的盎格鲁-诺曼底王朝而焕发新活力。1152年路易七世休了妻子阿奎坦的伊丽娜，她很快嫁给了昂儒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亨利·普朗达日内，她带走了几乎占到法国全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的土地。1154年亨利继承英格兰皇位而成为亨利二世，领导着从巴永纳直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的以海为界的庞大帝国。所谓的“昂热帝国”在12世纪80年代甚至进一步扩大，当时王室联姻使布列塔尼在金雀花王朝控制之下。

1159年可以看到公开的对抗，即历史学家们所称的“第一次百年战争”（1159年—1299年）。卡佩家族在12世纪最后几年摧毁了昂热帝国。菲利浦·奥古斯都运用他的一切韬略颠覆其对手。他鼓励亨利二世的儿子们与他们的父亲作对，然后当他们即位时又暗地里搞阴谋，挨个儿地整他们。尽管在第三次东征时他站在狮心王理查德一世（英格兰国王，

90

兰斯大教堂

著名的“微笑天使”在兰斯教堂入口表示欢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世纪法国哥特式建筑中最出色的代表作之一。教堂自1211年起建造，这是教堂建设兴旺时期的典型作品。夏尔特尔教堂可能因彩色玻璃而更引人注目，其他许多教堂的建筑成就也可能超过兰斯大教堂，但兰斯教堂丰富的雕塑——哥特建筑的另一个特点——确实出类拔萃。许多雕塑家工作室的作品影响了从阿西西到威斯敏斯特，从布尔戈斯到斯特拉斯堡的教堂建筑物。



卡佩王朝与哥特式建筑风格紧密结合，这在兰斯最为明显。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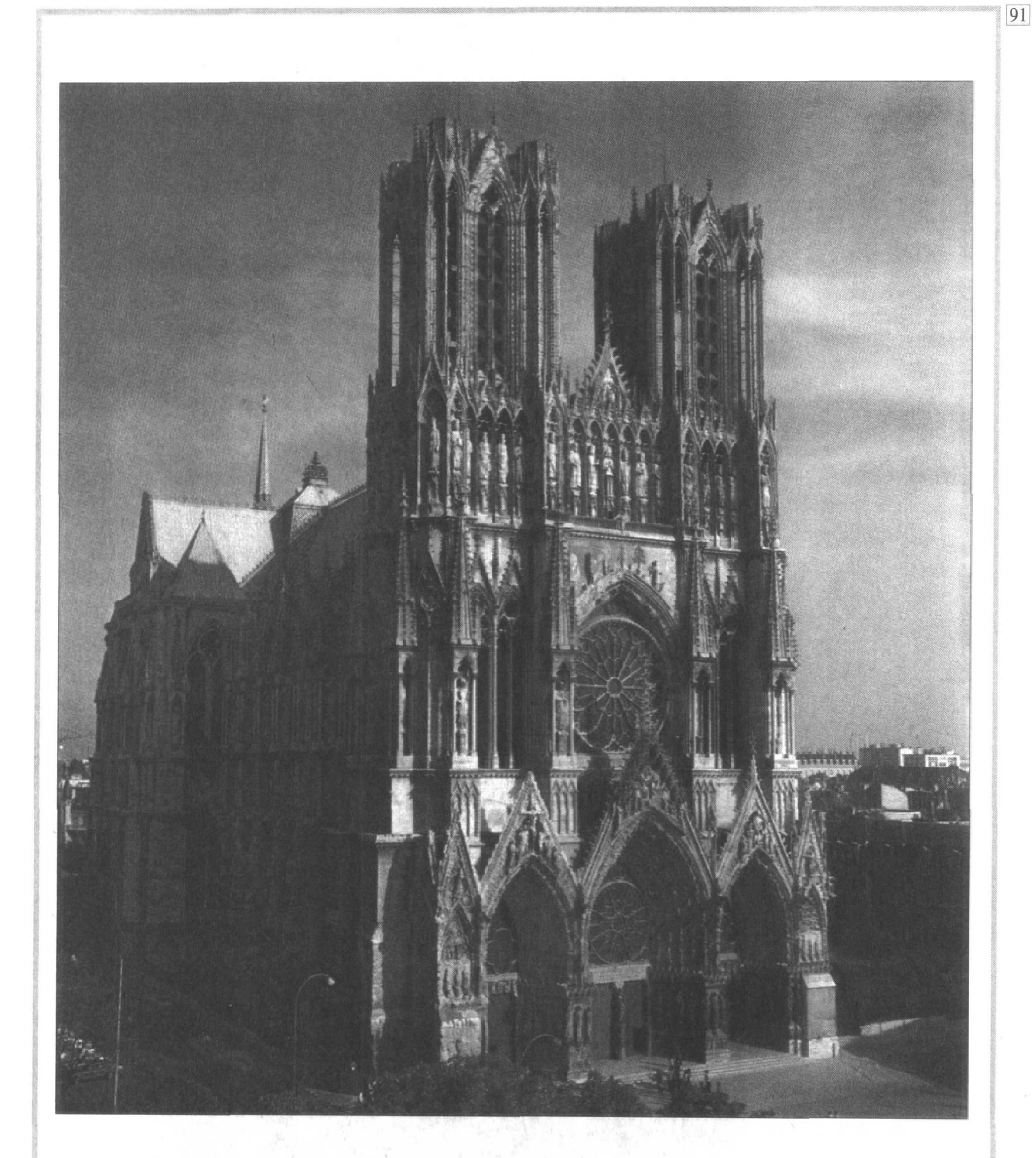


风格的创造者和拥护者圣德尼的苏格修士，是卡佩王朝路线特别有权力而且充满想像力的宣传鼓吹者。这种建筑风格被称做“法兰克作品”。哥特征服欧洲加强了王朝在意识形态上的色彩。

兰斯大教堂——以及圣德尼修道院和圣母教堂——是卡佩王朝三个主要象征地点中的一个。圣德尼修道院自达戈贝尔特一世以来，是安葬法国国王的地方。巴黎是活着的国王之家，他们在巴黎圣母院做弥撒。轮到兰斯，卡佩诸王在这里加冕为王，并得到神佑。卡佩王室以宣称是第一个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继承者而自豪，而后者就是在这里由兰斯大主教圣雷米加冕的。从9世纪起，这里宣称有一只鸽子自天而降，衔来了举行圣涂油礼的圣油瓶。圣油奇迹般地永不枯竭，法国历代国王都用其涂油。在兰斯，国王也成为奇迹创造者：由于接受圣油，他可以通过触摸来治疗患有“国王的魔鬼”（即淋巴结核）的病人。

在圣路易统治时期，一个复杂的由象征性行为和联想组成的网络强化成“永恒的”传统，没有一个王朝愿意打破。兰斯教堂对王朝而言成为“纪念之地”（Pierre Nora语），以此推至国王的臣属。直到1825年这里一直作为加冕之地，卡佩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人查理十世就是在这里加冕。

91



（第86页左下图） 兰斯大教堂的微笑天使。

（第86页左上图） 这幅中世纪的画作表明一个鸽子衔着圣油瓶自天而降，克洛维受洗和涂油后立即成为国王。作为发生在兰斯的显圣事件的结果，王室拥有“国王触摸”的能力。

（上图） 兰斯大教堂，法国国王加冕的教堂。



92 西蒙·德-蒙福尔（约1160年—1218年）在1209年领导南方反对阿尔比派异教徒的内部十字军之前，是东方十字军将士。他在图卢兹围攻战中被杀，他的墓葬在卡尔卡松教堂。

1189年—1199年在位）一边作战，但却早早从东方返回，以煽动理查德的 [93] 法国臣仆们起来反对他。理查德一世也意识到了卡佩的威胁，他在靠近诺曼底地区的领地上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加亚尔城堡，并于1198年至1199年与佛兰德斯的鲍德温合兵一处，企图将菲利浦置于其控制之下。但菲利浦却又杀了回来，攻击理查德的兄弟和继承者约翰（英格兰国王，119年—1217年在位）。1202年时，由于一场琐碎的封地争端，菲利浦拿出约翰主子的架子，宣布约翰是个犯有重罪的仆人，因为他无法对宫中关于他的指控做出答复，还下令没收了他的土地。他从军事上打击约翰，击败了加亚尔城堡的抵抗，并于1204年将诺曼底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于1206年取得了昂儒、曼恩、都兰地区和布列塔尼，还夺得了普瓦图和奥弗涅。

英国人并没有温文尔雅地投降。卡佩王朝在法国北方（特别是在阿图瓦和皮卡尔迪）的扩张，引起了当地的敌意，约翰加入了佛兰德斯和布伦伯爵以及日耳曼皇帝的反卡佩同盟。在1214年的布汶战役中，菲利浦打败了联盟军，随后签署的“希农协议”（1214年）迫使约翰接受卡佩的管辖。13世纪时，在菲利浦的继任者们，即路易八世（1223年—1226年在位）、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1226年—1270年在位）、菲利浦三世（1270年—1285年在位）和“美男子”菲利浦四世（1285年—1314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战争绵延不断。钟摆继续向着对法国有利的方向摆动。在1259年的“巴黎条约”中，英格兰的亨利三世承认了卡佩对除吉耶纳外所有原英格兰属地的兼并，在1299年的“蒙特勒伊协议”中又得到广泛确认。

菲利浦·奥古斯都打败了昂热政权的反扑，将卡佩王朝的领土扩大了四倍。他的继任者不仅继续了他的事业，而且将王朝的势力扩大到南部地中海沿岸。在权势熏天的图卢兹伯爵的广阔土地上，异教徒在12世纪时有着深厚的根基。韦尔多派异教徒——其名来自于其创始人里昂商人韦尔多——宣讲使徒的贫困，攻击教会的等级和财富。流传广泛的是纯洁派的阿尔比派异教徒，他们集中在阿尔比、克尔卡松和图卢兹之间的地区。纯洁派教徒相信二元主义，即认为物质世界是固有的恶魔，只有“十全十美”的精英可以焕发纯洁的生活。这就使常规的基督信仰和天主教神甫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虽然反对教会神职人员的运动获得被教会权力的傲慢专横激怒了的精英阶层的支持，但“十全十美”的美德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崇敬。由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领导的西多会士布道团把纯洁派运动扼杀在萌芽中的企图终于失败。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纯洁派比撒拉逊人还要危险。

菲利浦·奥古斯都也卷入了昂热帝国的这场斗争，他公开支持反对纯

洁派，但他暗地里支持由西蒙·德·孟福尔领导的好战的北方武士阶层，后者在1209年袭击图卢兹伯爵，以保护异教徒。这个内部的十字军运动以毫无心肝的残酷无情方式进行——“把他们全杀光”，一名教皇使者命令北94方武士攻打贝基埃时说，“上帝会认出自己人”。德·孟福尔暂时控制了图卢兹伯爵的领地，但路易八世却攫取了别人在北方的胜利成果。1224年国王从孟福尔继承人手中买回伯爵权利；然后在1226年发动了南征，带着教皇的祝福，沿途夺取了阿维尼翁，并迫使整个朗格道克承认他的统治。不断增强的对抗最终迫使他们在1229年达成和平妥协，这是由年幼的路易九世的母后、摄政王卡斯蒂的布朗什组织的。阿维尼翁周围的威奈散县割让给了教皇。卡佩王朝将下朗格道克的大部分据为己有，而普瓦图和奥弗涅则让给路易九世的兄弟普瓦提埃的阿尔方斯。路易九世通过1258年与阿拉贡国王签订的“科尔贝耶条约”保住了自己在南方的地位：路易宣布放弃对加泰罗尼亚和鲁西荣的宗主权，以作为阿拉贡放弃对图卢兹和普罗旺斯要求的回报。在西班牙边界，一个过去归加洛林王朝所有但至少自12世纪以来就与法国其他地区失去联系的地区复归卡佩王朝。这一协议有助于卡佩王朝确定其在伊比利亚的边界。

国家和社会

自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初，卡佩王朝势力的地理分布及其协调能力均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由卡佩王朝直接管理的土地激增。于格·卡佩享有神授权力的威望，同时又是西法兰西亚的总领主；与其对比，“美男子”菲利浦则以西欧最大国家的国王而骄傲，甚至狂妄自大。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腓特烈·巴巴罗萨（1152年—1190年在帝位）死后，东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内外压力之下解体之时。

王权之星在法国无与伦比地冉冉升起。统治者仍然强调其权力源自神授和封建领地。12、13世纪，传统的古典利益观被重新提出，导致了《罗马法》的发展以及对主权概念的进一步建立。这样，王权不仅是封建领主特权，而且也是对罗马帝国的承继——他是“自己国家的皇帝”，正如此话所指，他对贯穿全国的共同利益负有责任。从圣路易开始，这一点已经被纳入立法权。菲利浦二世之所以取名“奥古斯都”，就是为了要表明从根本上转变王权。这也是王室在造币时所关心的。为了降低其他人铸币的合法地位，1266年圣路易引入了较大的银币，它以“图尔币”的称呼而知名，后来成为法国货币的基础。皇室形象的流传超过了他们最强大的臣仆，并与王国内新出现的繁荣紧密相连。发展大规模的王家宫廷与奢侈豪华铺张摆阔结合，同样表明王权代表性的变化。例如菲利浦五世（1316年—1322



年在位）的宫中拥有 5000 人，几乎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

宫廷的扩大部分地反映了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普遍进步。卡佩政权 95 的扩张导致新的官僚机构增加：王室税收收入在菲利浦·奥古斯都统治的 1180 年至 1203 年间增长了 80%，王室获得昂热帝国的领土之后更是大幅度增长。圣路易和菲利普四世对国家官僚机构发展的贡献尤大。会计和档案程序得到很大改进。王室管家的书记员被集中到会计院，而其他法律事物的专门人员则由最高法院，即王国终审上诉法院来进行管理。法律标准由大学培养的法学家制定后在最高法院内进行广泛的审议，其地位高于各封建领主自定的法规。最高法院的作用在各省则通过被称做执政大法官，即领取王家薪俸的法律人员（在南方称为司法总管）组成的网络来补充和加强。这类人员长期以来属不定期派遣，但自 1190 年起他们则被派到固定的地区；同时他们的权力——特别是代表国王并转达国王命令以监督当地行政和法律程序——也得到了更为仔细的界定。

随着卡佩王朝权威性的扩大，许多实际上限制了中央权力的做法也产生了。其中包括将领土赠给王室近亲并由其控制的习惯做法，名为"封地"。1226 年路易八世去世时，将阿图瓦、昂儒、曼恩、普瓦图和奥弗涅作为赠给儿子们的封地。这种转让——他们的后人们也继续这样做——一般是考虑到如果某一支系中断的话，这些领土将归还王室。这也意味着领地的拥有时间是可变的。路易九世的兄弟阿尔方斯于 1271 年去世时没有子

皇家法律、城市规定和文化禁忌都要求人民与麻风病人保持距离。在这幅 14 世纪的插图中，一个麻风病人摇着告知他出现的铃舌和讨饭碗，希望得到城市的救济品；旁边是一个残疾乞讨者。

嗣，封给他的广阔无垠的普瓦图封地于是归还给了王室。另外一个返还的[96]例子则历时甚久：阿图瓦和昂儒于1226年作为封地转让，但一个世纪后才返回王室。

随着王国行政管理的发展，王室作为司法源泉的观念开始复活。从此不再是仅仅有利于大人物和好人的封建法律大行其道，而是更加公正和易于理解的法律占上风。有一个关于圣路易的值得纪念的（可能是神话的）故事，讲他坐在文森森林里的一棵橡树下，为所有来者判案的事。这个故事在尚维勒关于国王生平的理想化叙述中被提到之后，就一直流传下来。圣路易因其神力而名声大噪。为了表示他的虔诚，他也参加了国内和东方的王国十字军的部分活动。他在国内彻底击败了阿尔比派教徒。

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卡佩王朝的崛起以及不断强调其集权法制的神圣性，也同时伴随着对广泛的不同政见、不合常规形式日益增长的不容忍。像他的父亲（曾经下令将所有犹太人从王国中流放出去）一样，圣路易引入了严格的反犹措施；对麻风病人也采取了镇压性措施，确保他们只能在麻风病院。对患病者关禁闭的做法是一种“活死人”的方式，将他们完全从社会中排斥出去。性异常者也遭到鄙视。妓女与麻风病人的待遇差不多，卖淫被正式禁止。（圣路易的继任者则试图采取不同做法，让妓女置于宗教的监督管制之下，她们被关在城市的指定地区，就像犹太人和贫民窟一样。）

性是特别令人担心的，而这种担心主要针对妇女。教会改革，特别是强调神职的纯洁性，造成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在宫廷爱情文学中对“女人”的理想化，以及对圣母玛丽亚日益增长的崇拜，都是围绕着性纯洁而不是放纵，都是有关特例而不是规定。对关心自己纯洁性的教会人员来说，妇女是应当避免的风险。一位教士优雅地将她们定义为“粪袋”；另一位则称她们为“疯狗”。以男性为中心的神职精英的做法可能导致某些妇女加入异教徒队伍。不过，看来妇女特别受到认为男女均可以达到精神圆满的纯洁教派的吸引，以及一些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派别和异教的吸引。妇女总是被排除在战争和祈祷之外——武士和牧师只能是男性。她们还被排除出组成了国家管理和自由职业的文学精英阶层：确实，政府的职业化严重减少了高层女性的影响力。

在11世纪和12世纪，教会和国家联合致力于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婚姻是神圣的，是常用订立契约的世俗方法。封建财产持有的规则日益使出身贵族的妇女成为封建棋盘上的一枚卒子——她们所带来的陪嫁被看做男性管理经营的遗产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另一方面，那些不利于家族财产计[97]算的妇女被遣送到修道院。事实上，一些来自社会高层的妇女仍然可以利用她们作为妻子、寡妇和母亲的身分在公众中发挥作用。例如，在男人参

加十字军东征的情况下，有的妇女继承了家庭财产的全部管理工作。圣路易的母亲卡斯蒂的布朗什在她儿子统治期间，多次替儿子执政。这算得上是最典型的例子。类似的还有一些贵妇人将不利形势变为对自己有利，使她们以宗教规则为跳板而在宗教，有时甚至是政治权力方面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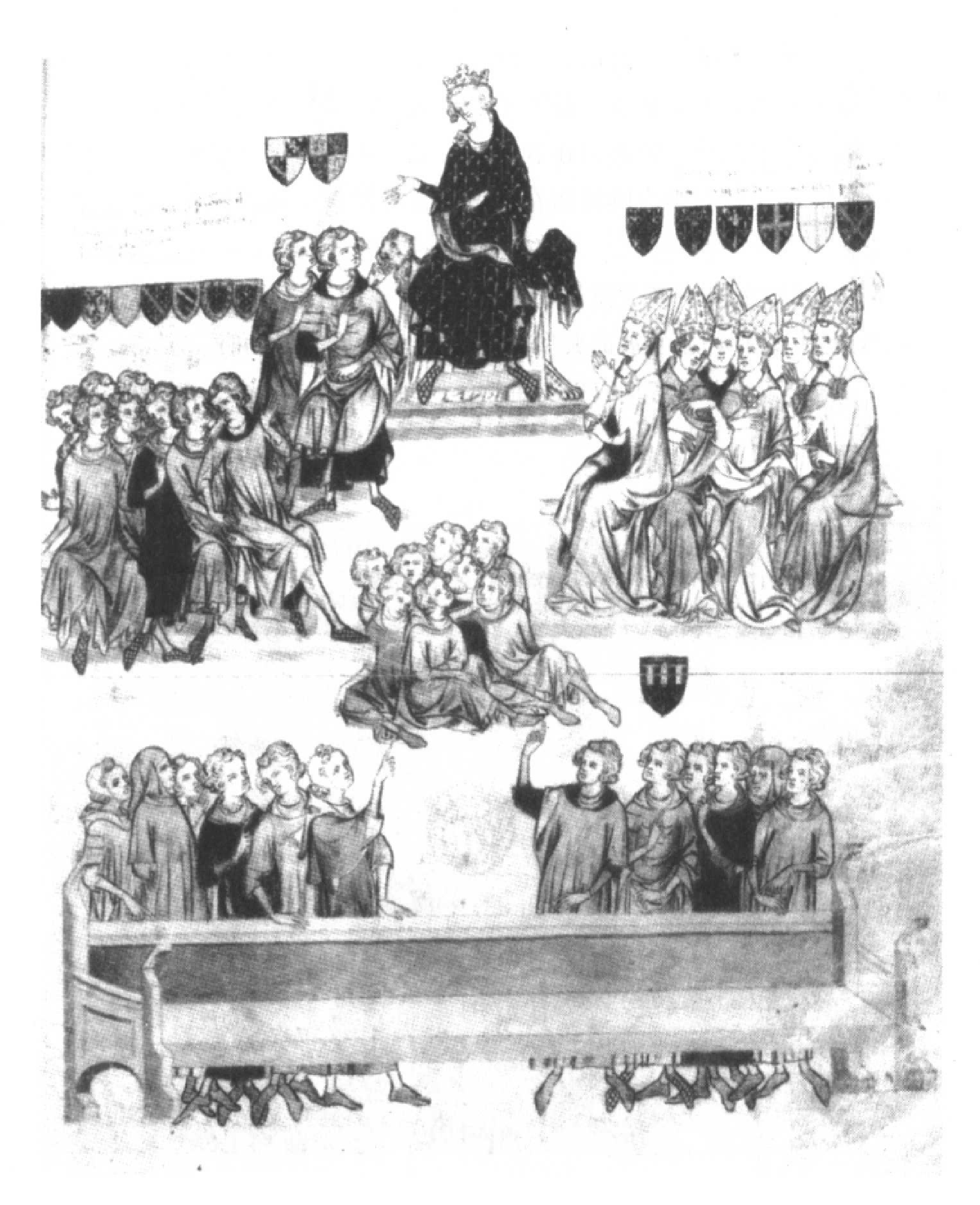
当时，妇女被允许发表意见成为罕见的例外，这与男人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的典型特点是产生了新的咨询和代表办法。统治者过去对国家事务仅咨询权臣和主教，他们是封建“咨询”礼仪的组成



受特许的城市在当地的法律诉讼中拥有很大权力。来自图卢兹的这幅民间作品上是两个通奸者被游街，他们犯了错误的器官被拴在一起，喇叭声则让他们蒙受羞辱。

部分。1302年，“美男子”菲利普召集了国家的三个等级——神职、贵族和“第三等级”，或城市代表——专门为此目的开会。“三级会议”从此成为法国国民的代表机构，直到1789年被推翻。由大造声势的机构和具有分量的神职人员聚会组成的三级会议，成为征求更大范围（男性）政治团体的实用工具，从而可以获得——甚至可能制造——对国王政策的批准权。

表明王朝希望与法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睦相处的其他措施也出现了。召开三级大会征求意见的做法后来在14世纪时发展到各省。王室还批准了地方法律惯例，例如韦芒杜瓦地区和博韦西的法律在13世纪末期得到 98 批准。甚至从11世纪起，卡佩王室在批准城市宪章时就十分慷慨大方。作



图上所画是“美男子”菲利浦召开咨询会议。这个专横的君主第一个定期咨询各个阶层代表，作为了解对他的法令的意见并使其获得一致通过的手段。图中教会和世俗的领主在一起，穿着他们饰有纹章的外套。

为接受王室保护的回报，城镇可以获得财政和法律的特权。

王室利用这些政治机制来了解如何与全国的舆论保持一致，而不仅仅是听取封建领主的观点。例如在1303年，菲利普在“三级会议”提出批准卡佩王朝首次征收常设税种，对商品征税，同时也包括替代执行军事服务的税种。尽管批准了，但征收十分困难。这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财政同样也与早期三级会议争论的另一个内容——宗教，产生分歧。即使“最信基督的国王”也不乐意接受干预王室特权的教皇。而圣洁的路[99]易九世则坚决捍卫法国教会，因为他自己的权力就在其中。13世纪晚期，教皇势力发展强大，特别是在神圣罗马皇帝权力崩溃和阿尔比派十字军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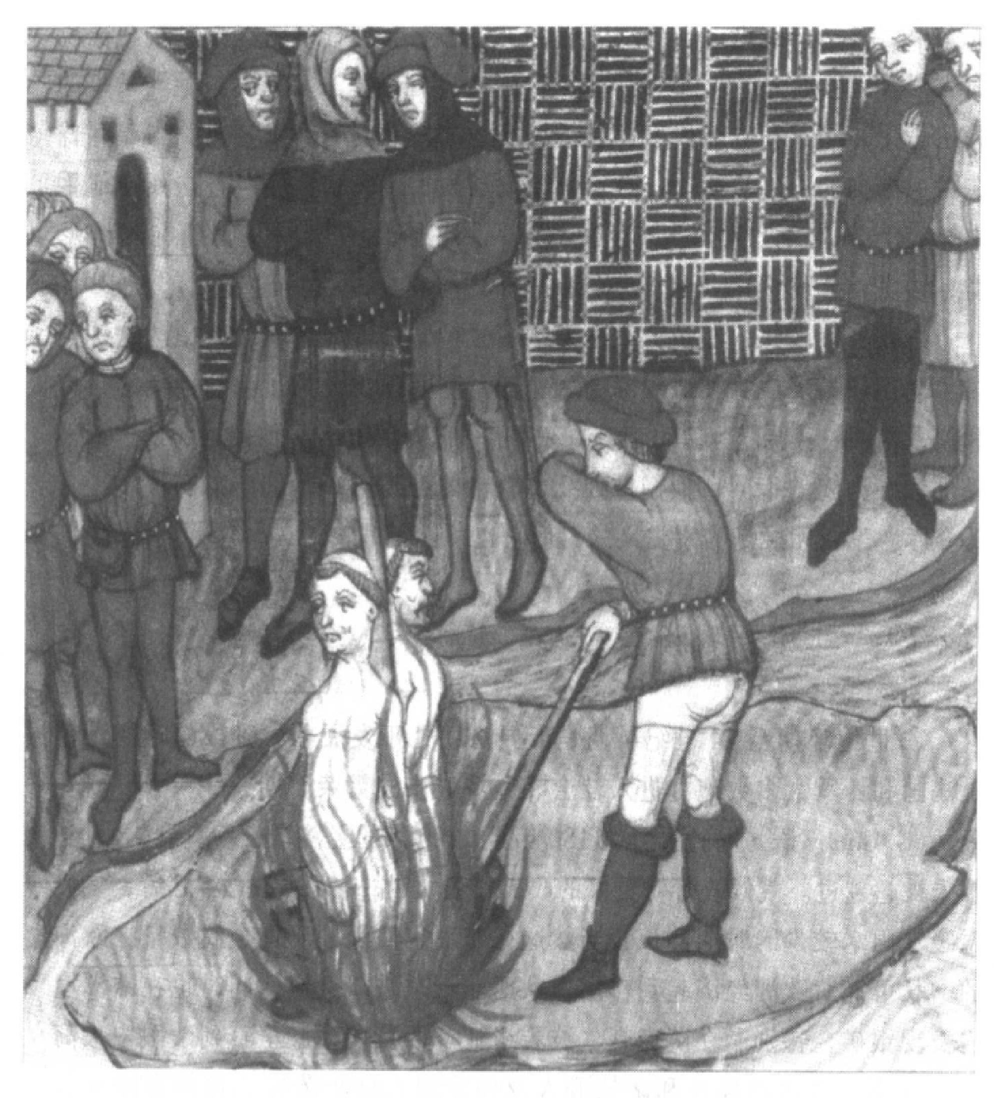
征结束后，又得到进一步推动。当“美男子”菲利普试图提高对教会征税而遭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年—1303年任教皇）反对时，他与教皇的关系恶化。国家和省级代表都义不容辞地站在他们的国王一边。当菲利普在阿加尼拘押卜尼法斯时，这场争论就已失控，教皇因受到打击死在他手中。1305年选举产生了一位法国教皇，他在1309年将皇宫建在阿维尼翁，这使天平摆向有利于王朝的方向。

财政和宗教问题在国王攻击十字军救护团骑士时也纠缠其中。这一征讨团体已经发展成为类似国际金融家的营利性组织。为了获得他们的财产和关系网，“美男子”菲利普于1307年用捏造的罪名将他们的领袖逮捕。经过惊心动魄的审问，他们被处死，骑士团遭解散，他们的财产被转入宫廷金库。王权无疑是实用主义的，但它也可能是残暴的。

“新春天”：中世纪经济

12世纪晚期至14世纪早期是卡佩王朝处于发展壮大阶段的时期，也是法国和西欧大多数地方进入社会和经济进步的繁荣时期——一个“新春天”（G. Gduby语）。确实，从1180年至1220年的经济增长率直到18世纪都未被超越过。气候改善对更好的收成作出贡献——在1160年之后，气候温暖、雨水较少的时期甚长，当然这并非决定性因素。贵金属数量在欧洲的增长可能对欧洲经济起到作用：从西非近东进口金银，同时也在欧洲境内发现银矿，特别是在萨克森、波希米亚、西班牙，甚至直到法国中央高地。维京人攻击的停止和萨拉逊人及匈牙利人终止袭扰，也都有助于发展；因为他们的干扰，许多地方可能推迟了经济发展。以往未受到过攻击的奥弗涅早在第9、10世纪就得到发展，而首当其冲的普罗旺斯则发展较慢，那里受到撒拉逊人进攻的严重破坏。

工艺改进也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不仅有新的方法和技术被发明创造，而且非常迅速地得以广泛流传和使用。推广使用较重的铧犁轮子，加上更有效的牲口挽具，提高了可耕地的产量，这在北方地区特别明显。农作物三年轮作法的引入对这一地区可能也有所裨益。12世纪晚期在诺曼底最先使用的风车和水车更加普及：仅皮卡尔迪一处，水车就由245台增加到后来的1175台，而全法国可能共有2万台。在粮食加工方面，水力利用也达到工业操作的水平，如带动锤子和风箱。推广使用家用手纺车也是制 [100] 造业发达的另一个因素。先进采矿和冶炼技术的引入，不仅制造出更好的武器和盾牌，同时也生产出更耐用耐磨的犁铧等农具。不断发展的技术革新，例如从12世纪起开始使用指南针，能够建造航程更远规模更大的船只。



1314年，十字军救护团骑士的主人莫莱的雅克在遭受酷刑后被当众焚烧。救护团根据十字军令，其成员向王室宣誓像士兵一样生活，保卫圣地和朝圣者的安全；具有极高的敛财手段。他们的势力和财富引起“美男子”菲利浦的愤怒。

经济的增长和多样化与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密切相关。如果按现在的法国边界计，在查理大帝时代可能拥有750万—900万人，尽管在于格·卡佩于987年执政时减至500万—600万。在卡佩王朝统治末期的1328年，人口达1800万—2100万，其中大概有1500万直接在法国国王的统治下。这些数字可以与英国当年300万—350万，或是意大利半岛800万—1000万人口相匹敌。

人口在三个世纪中大约增加了三倍与经济组织的变化也有关联。其间的关系既复杂又相互作用。嘴巴多了，也就使农民有了多生产粮食的积极[101]性，他们作为农奴而拥有自己的土地，尽管还是处在封地条件之下。当时还是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劳动力增多就可以扩大生产，当然，也就有更多的土地得到耕种。可能在987年时，法国的土地有一半是森林；后来就大幅度减少了。从菲利普·奥古斯都时代起，法国王廷就对森林进行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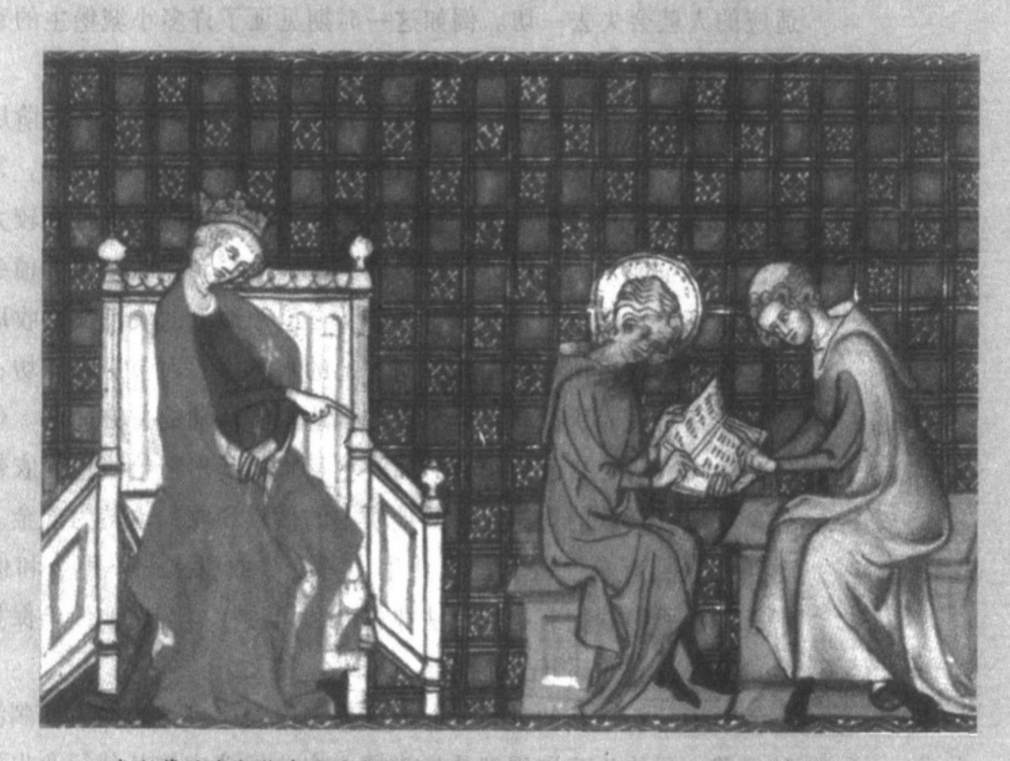
因为他们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应当得到监控管理。土地扩大的形式多种多样。某些寺院团体，如西多会士就是在大片的远离文明的荒芜之地进行垦殖的专家。因此，圣诺贝尔于1120年在圣戈班成立了会所，特意选择了“可怕的孤独……恶臭的沼泽地，贫瘠而又无法耕种的荒地——那里 102 是热病和野兽之家。”然而，对土地的要求多半是从可耕土地向闲置土地和在村庄空旷地带的土地的延伸。例如在皮卡尔迪，六分之五的土地申请

101

卡斯蒂的布朗什

卡斯蒂的布朗什（1188年—1252年）是卡斯蒂的阿尔封索八世的女儿，阿奎丹的伊丽娜的孙女；她于1200年12岁时结婚，嫁给后来的路易八世（1223年—1226年在位）。她丈夫自愿指定她作为他们儿子的导师和顾问。她于1226年至1234年摄政，当时路易九世（1226年—1270年在位）尚在稚龄。直到1244年她始终处于政府中心位置，当其子1248年至1252年率十字军出征后，她再次执政。她多次粉碎了贵族权臣的叛乱图谋，他们认为“一个妇人不应该领导像法兰西王国这样伟大的事业”。她借机使自己成为王家军队的首领。她确保政府的连续性，为其子所有的重要行政改革提供可靠的支持，但她儿子政治改革的成就掩盖了她的成就。

圣路易的编年史家尚维勒强调了布朗什与路易的王后、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关系恶劣，所以她成为典型的恶婆婆。实际上布朗什极为看重养育子女的宗教意义，并且亲自负责孩子的教育。她的长子被封圣，一个女儿（依莎贝拉）幸福美满，她自己也被视为卡佩王朝日益耀眼的圣火。编年史家评价她像男人一样治国，是最后一个幕后骑士。



卡斯蒂的布朗什在陪伴年轻的儿子路易九世读书。取自14世纪一手摹本。

都是这种形式。

其结果是对地貌物理特点的改造。面包是法国十分之八九的男人和女人们的主要食品，耕作方式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北方和东北方，大田系统种植粮食的方式牢固地树立起来。居住地往往围绕一个中心地带群居——在新开垦地带兴起的新团体所倡导的居住形式。在巴黎盆地约有500个被称做“新城”的群居地建立。在阿奎坦，有600个被称做“村堡”的村庄建成。法国在这一时期还建有1000个麻风病院，而往往采用农垦点的形式。开垦荒地势必要在沼泽地排水并砍倒大树，为此目的在佛兰德斯发明了堤坝建设体系，后来传播到下索姆河、塞纳河和普瓦图、布列塔尼和卡马格的沼泽地带。这些发展对建立起三万多个村庄的基础网络做出了最后的完善工作，法国的乡村历史就在其中——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法国历史——一直发展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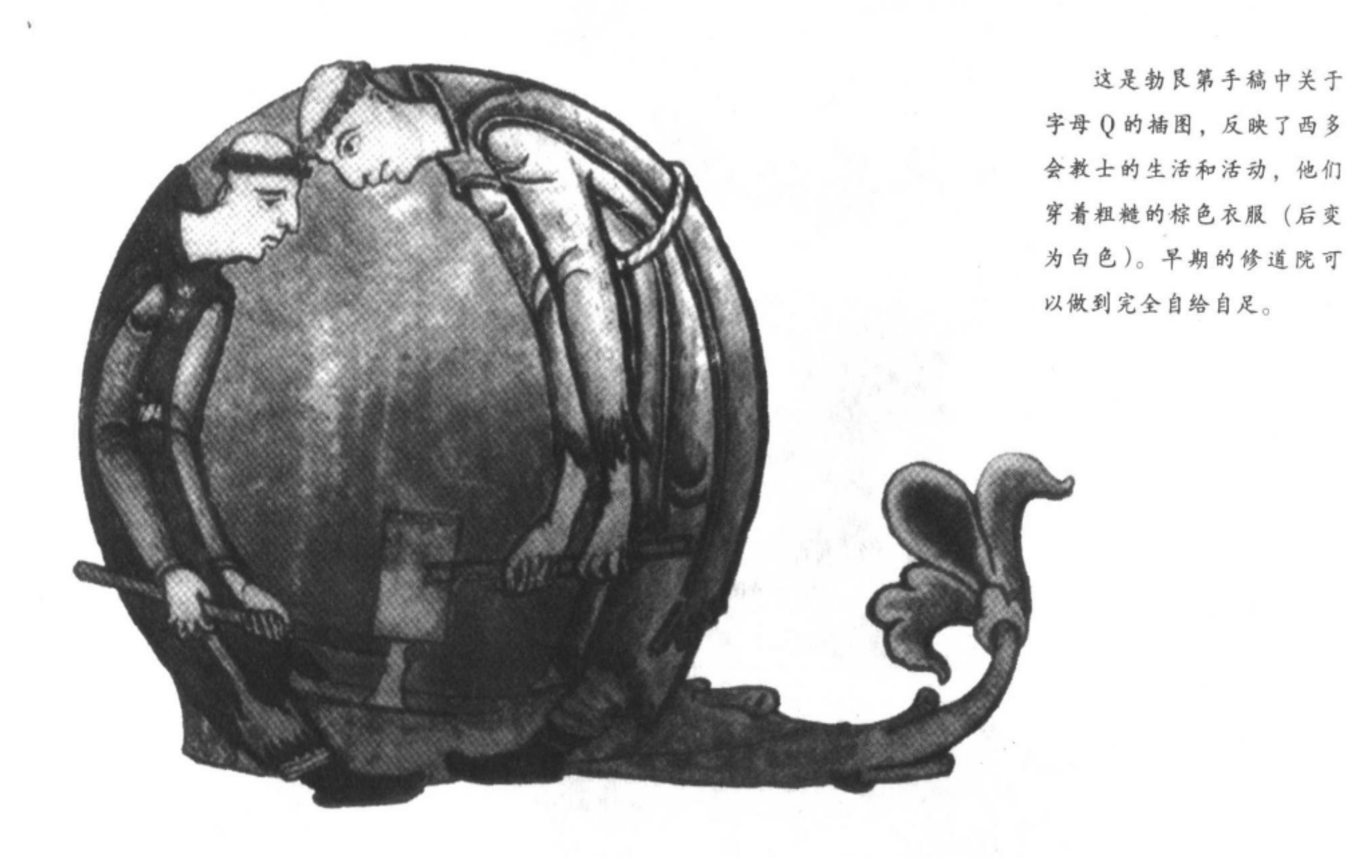
可耕地的扩大并不是简单的土地和劳动力供需关系的直接操作。已有的封建势力结构在这些活动中的创造性和建设性正逐渐显现出来。抢劫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十字军已不再是军事抢掠的长期舞台。军事设备的成本也在盘旋上升——骑士所需的复杂的防护铠甲在11世纪晚期相当于一座庄园的价格。许多十字军将士将庄园卖掉以便能够参加东征。贵族的生活方式同样促使人们去适应；狩猎、郊游、欢宴和宫廷娱乐变得日益昂贵。领主们千方百计运用他们在乡村的权力来应付更多的开支。那些无法适应的人就会失去一切。例如这一时期见证了许多小城堡主的衰落，他们的地位依附于军事活动，仍然指望着依靠抢劫过活。

在中世纪，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领主阶层对农民施加的压力。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到封建掠夺处处皆有。例如，领主可以同意扩大土地，只要农民付给他们更多的地租。他们之中野心较大的人则让农民申请土地，给他们以种种激励、税收优惠和免除领主的债务，有时甚至给家畜和农具。兴旺的领主不仅从自己领地上的农民那里收取各种各样的物资和税收，他还开发和控制当地的水车房、面包房和酒坊；牧场和森林也往往由他们所控制：他掌握着当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他不是利用[103]封建劳役来耕种自己的领地，而是更喜欢将其出租给当地佃农耕作，采用分享收成或贷款的安排。对其他领主的债权和收入也转为现金。结果是封建领主从拥有自己权利的农业生产者变为收租人——租金和债务的收取者。他们所继续拥有的广泛法律权利和司法权，帮助他们确保把农民的剩余价值中最好的部分全部捞走。

领主日益增长的贪婪同时也成为农民农业耕种的动力，刺激创新并多种经营。谷物生产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经济中的其他行业也因此受益。羊毛成为特殊的专业领域，特别是当纺织品贸易扩展时。领主和主教们也

广泛介入酿酒业的发展。盐和金属生产遍地开花。尽管经济扩张中主要的受益者是社会精英，但许多农民的状况也有所改善。特别是那些生产可以创造市场剩余价值产品的农民更是大受其益。村社团体表明他们很善于从领主手中取得优惠，因此在某些地区来自封建领主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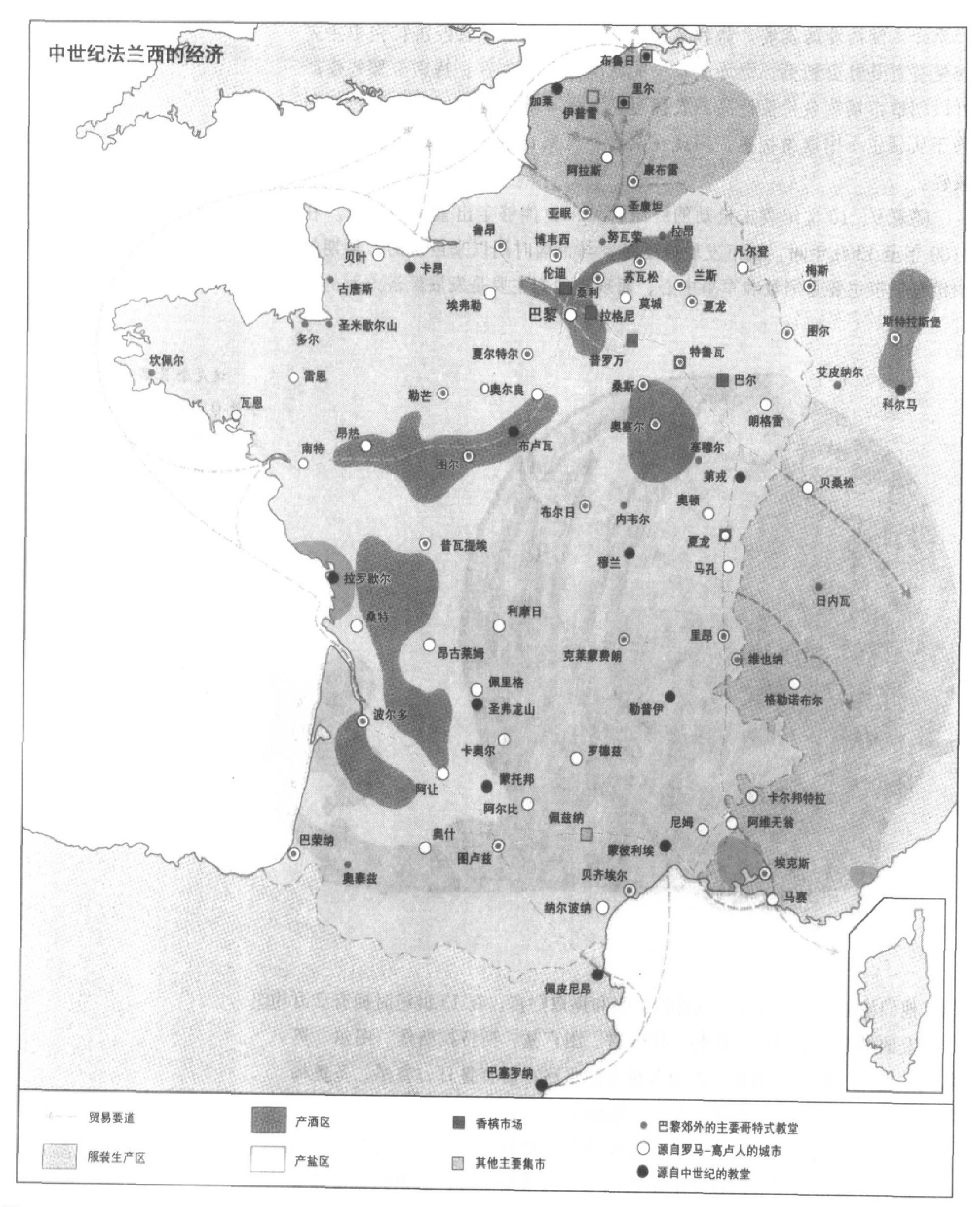
随着9、10世纪袭击抢劫的终结，城市也能够走出紧闭的外壳。在1100年至1300年间，城市发展速度是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最快的。早期的中世纪城市主要是宗教和军事中心，而现在他们主要是发展经济方面的功



这是勃艮第手稿中关于字母Q的插图，反映了西多会教士的生活和活动，他们穿着粗糙的棕色衣服（后变为白色）。早期的修道院可以做到完全自给自足。

能。他们注重河流与海洋，以进行扩张和谋取财富。在13世纪时拥有2万人以上的城市，如巴黎、根特、伊普雷、图卢兹、斯特拉斯堡、图尔、奥尔良、里昂、里尔和梅斯，控制着重要的水路；而布鲁日、鲁昂、圣奥梅尔、蒙彼利埃、纳尔本和波尔多全部都临海。 105

在中世纪高峰时，封建精英们对经济发展拥有很大权力，他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领主们不断地感受到市场潜力，意识到城市和集市的出现会给他们的地区带来更多的财富，他们可以通过收税等办法捞一把。城堡主的石头城堡在10世纪时是为了对抗当局、欺压农民，现在常常变为当地集市的所在地。城堡建设的样式成为封地权利和商品交换的日益



104 中世纪法国的经济地图突现了巴黎地区的重要性。这里通常从发达的香槟交易会和佛兰德斯地区的成衣制造业中获益，同时也是重要的谷物和酒类的产地，因此位于主要的贸易物流之中。巴黎城市是正在形成的中世纪城市中心总体版图中最重要的一员，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或以外的地方。

增长的象征。带防御工事的城墙得以扩展，商人和手工艺者可以据此为家来反抗封建依附。商业财富成为封建贵族生活的支撑体系，甚至也是对贵族高成本生活方式的警钟。贵族们对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样吸引了许多手工艺者，他们将市场上出售的原材料加工成人们喜爱的奢侈品。这对居住在城里的寺院和修道院的教士们也一样。上层神职人员属于最挥霍的消费者，对城市的发展和多元化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过去以三个阶层，即“神职人员”、“武士”和“劳动者”作为社会的划分，开始过时，即使这三个阶层还完全存在。军人和神职人员的精英们仍然在社会上为所欲为，但“第三等级”的标签却代表着一个广泛阶层的存在。土地造成的社会区别使得一小部分农民劳动者崛起，他们通过市场使产品的剩余价值升值。他们的地位与大多数种地仅够糊口的农村劳力形成对照。在城里，那些傲慢的领主和教士们现在要为富裕的商人和生产者安排居住之地。长袖善舞的商人作为实实在在的形象出现在中世纪的誓词和文艺作品中，表明社会流动性变得更为重要，那种固定类型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其位置了。其他的社会阶层也开始出现。特别是在服务领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教堂人员、书记员、法官、医师、财产经纪人和公证人。如同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官员一样，这些人也对都市环境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



1195 年默朗公社的徽章。首任官员的头像组合在王家百合花之下。徽章、钱柜、铃铛和公社财产（特别是市政大厅）是公社权力的四个主要的特有象征。

公共法典通过扩大结社权以适应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例如各省有自己的国家支持的法律，这样城市与经济、工作相关的社团就具有法人地位，并被赋予高度的自己立法的权力。1268 年，仅在巴黎就判决了不少于 100 例的案子。法国开始变为——像与它同类的欧洲伙伴那样——“有秩序的国家”；在国家的社会构架中有许多行会组织，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得到公共法的承认。

尽管许多城市像当地封建主手中的哈叭狗那样开始有了生机，但他们 106 很快就急于挣脱束缚，要求自由和自主权。城市居民的联合会(或称“公社”)靠兄弟立誓而结合起来，而不再靠封建效忠，他们向统治者要求自治权力。1070 年，勒芒成为首个提出这一要求的城市。世俗的和教会的统治者对此类运动往往采取鄙视态度。在一位教会人员的眼中，公社是“制造动乱的阴谋家”，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粗暴的和讨厌的”——而城市有时确实是各类异端邪说的庇护所。封建领主不久就发现如何利用公社为自己服务。香槟伯爵蒂博四世在 13 世纪初期时曾经说过，“建立市民和农民组织的公社，我对公社的信任超过对自己骑士的信任”。卡佩王朝也特别善于利用成立公社以扩大其权威的做法，同时削弱竞争对手。路易六世更被称做“公社之父”，他承认并授权成立了大量的城市公社，包括拉昂、博韦、努瓦荣、苏瓦松和兰斯。

这一发展触发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在拉昂市，当地居民于 1112 年要求通过城市宪章，甚至杀害了他们自己的神父。有时会引发一场“钟声之战”：市政大楼的大钟奏响“商人时代”，而教堂钟声则奏出“教会时代”与之竞争（Le Gott 语）。南方城市压力并不尖锐，当地已经有市政管理体系的强大传统，地方贵族和市民相处融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布列塔尼，直至公元 15 世纪之前都没有市政管理体系。但从总体而言，此类斗争表明封建贵族已经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行事了。

君主政体、文化和地方主义

法国在 12 和 13 世纪的经济腾飞使之变得像人间天堂。编年史家菲利普·莫斯克写道，这个国家“遍布着森林、河流与草地，到处是处女和美女、佳酿以及令人生畏的骑士”。卡佩王朝的宣传家们宣称经济繁荣是新建立的强大威武的王朝的直接反映。他们对法国文化的繁荣也采用同样的说法。当时法国文化的精华通过法语不断表现出来。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拉丁语曾经是西方的惟一保留的书面语言。由于拉丁语在口头上已停止使用，当地方言大行其道。来源于拉丁语的法语最初是法兰西亚语，是法兰西岛的农民和工匠的大众语言。由于卡佩王朝的权力，法语成为具有较广泛的欧洲代表性的语言，尽管拉丁语仍然作为教会、法院和大学的语言。

法语的国际地位从来无法与拉丁语较量，尽管从 1066 年诺曼底人入侵 [107] 直到 13 世纪末，法语成为英格兰社会上层人物的官方语言；而且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从 11 至 15 世纪的“双西西里”（这是个包括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最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国家），而且贯穿于圣地上的法兰克王国的生活之中。13 世纪时法语在官方文件的使用表明它已与王朝相结合。法语文学开始出现，其中包括编年史。例如若弗鲁瓦·德·维尔阿杜安的东征故事和圣路易的尚维勒生平，以及各类宗教作品；但其中最有名的是诗歌和散文两种体裁的传奇文学。著名的《罗兰之歌》（约公元 1100 年—1125 年）以加洛林王朝的勇士、十字军东征的英雄故事和骑士风度成为最受欢迎的 [109] “动作之歌”。更为雄心勃勃的是王室爱情类的作品，其中最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是纪尧姆·德－洛里斯和让－德·默恩，他们是 13 世纪中叶广为流传的《露丝浪漫史》的作者。14 世纪时的神职人员尼古拉·奥莱默自豪地写道：法语已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的语言”。

巴黎地区的语言在当时作为法国精英语言而崭露头角。即使法兰西社会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该语言仍忠实于其各具特色的语言和方言。巴黎自身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的文化影响力也发挥了作用。到 1300 年时，巴

行吟诗人

“在朗格多克”，但丁后来写道，“日常用语的使用者就是最早的诗歌作者”。的确，从1100年后期直到1300年（特别是从1130年至1200年），法国南方流传着一种方言抒情诗。将诗歌和音乐结合的行吟诗人来自社会各阶层：从流浪的杂耍行吟诗人到贵族。如第九世阿奎丹公爵威廉，是第一个坚定的实践者；更有甚者，行吟诗人中大约有20个女性诗人。

“我的女士考验我试验我，她因此可以知道我是如何爱他。”在行吟诗中，阿奎丹的威廉的这句格言表明情人求爱和“女士”的兴高采烈。在一个通常是理想化的妇女和她的情人、勇士之间的爱情得到庆祝：这种关系曾被认为反映了社会现实，大批没有财产的骑士云集在贵族的官邸周围。爱情关系中的色情部分明显地与正统教会教导的道德观相冲突。在吟唱的诗歌中常常有两性相悦的内容，例如比阿特丽斯·德-迪在哀悼失去她的勇士时回想起当时情景——

用赤裸的双臂我紧紧搂着他，
深夜他枕在我的胸前颚下
用我的抚摸给他欢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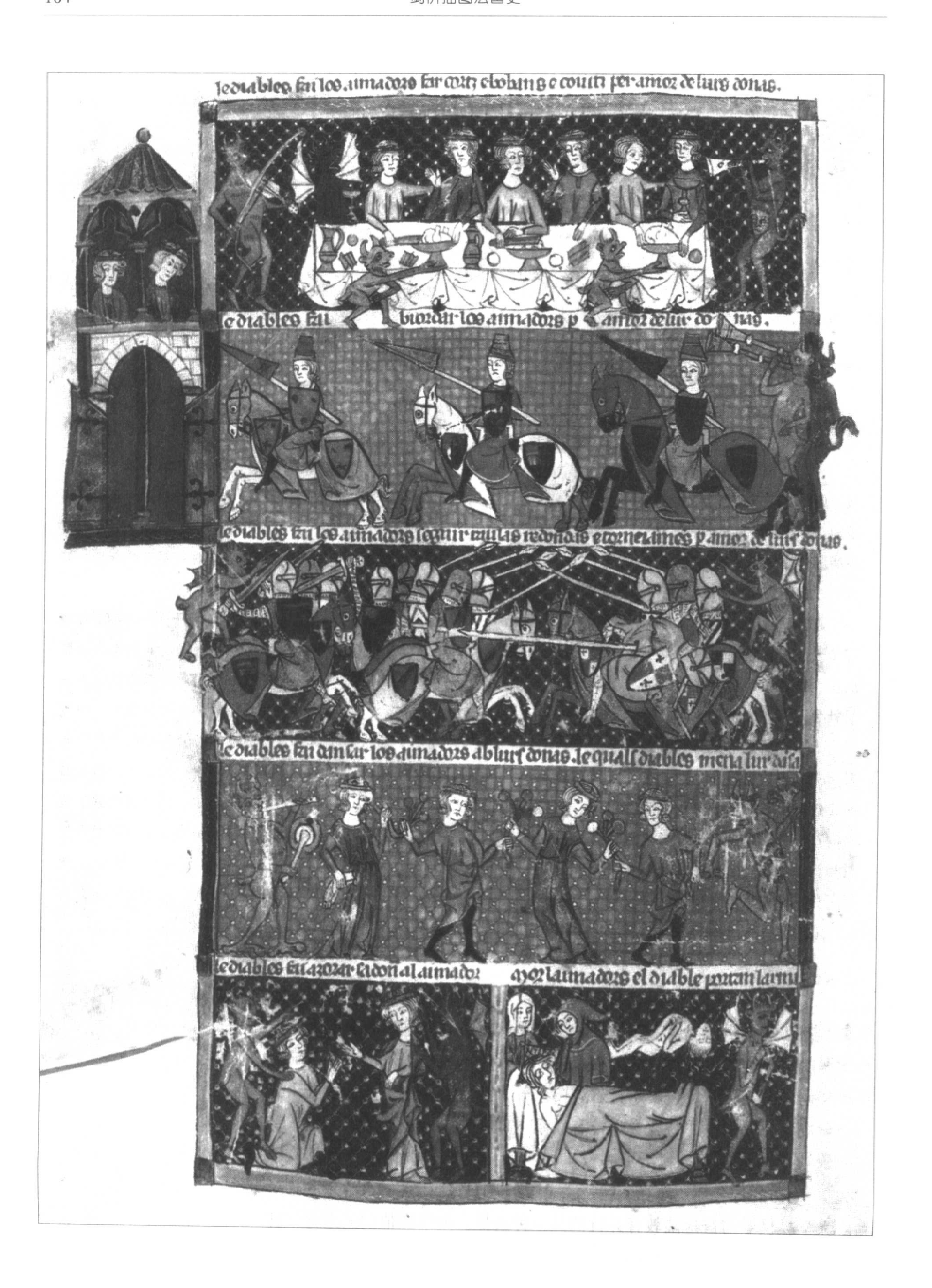
这一派诗歌的生动活泼和明显的群众性，证明了南方朗格多克文化的活力。当时对讲奥依语的贵族阶层也产生了影响：阿奎丹的伊丽娜和她的女儿玛利·德-香槟是将抒情行吟诗歌传到北方的主要渠道。她们也致力于把诗歌变为典雅爱情的形式，较少强调性欲欢情，而是追求保持距离和理想化的女士的情调。

将妇女置于受人尊敬的地位，与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相联系。这与我们对中世纪社会大多数妇女形象知之不多相符。典雅爱情的发展使我们对妇女的了解比对男人要少。妇女的声音在诗歌中越来越少，妇女的形象主要是男人激情的对象。典雅爱情是塑造男性新形象——侠义、勇敢、绅士风度——的舞台。



11世纪，做杂耍的游吟诗人。最早的时候，那些游吟诗人是武士，像其他的显贵人物。

黎是西方基督教国家中最大的城市，用教皇戈雷格里九世的话说，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是“智慧的特殊工场”。在12世纪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许多其他城市（奥尔良、夏尔特尔、图尔等）以教师为中心的松散的个人协会形成了，教师往往与教会学校有联系。这类非正式的集团逐步要求讲授、施教的权利，并得到国王和教皇的承认。巴黎的教育团体则具有像“大学”一样的行会性质。在13世纪，大学里拥有法律系、医学系和神学系。大学提供了与修道院教育并行的另一种选择。大学像他们的老师一样



优秀：巴黎拥有其中最优秀的教师，特别是才华横溢、魅力超凡的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他对神学的大胆推测给城市带来一个世界主义的活力四射的学生团体；他们有兴趣致力于被视为前沿知识的研究。

大学是“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最杰出的产物，包括了艺术、建筑、宗教的复兴和本土文学以及求知教育。如 9 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祖先那样，这一运动反映了对古代文学文化的兴趣的复活，特别增强了与东方、阿拉伯文化的接触的古代世俗知识的魅力。卡佩王朝支持大学运动：发展国家的官僚制度，向教会开放法律和皇家服务作为替代的职业前途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在神学和哲学领域，巴黎大学的名气在欧洲如日中天。教师们试图将基督教信仰和古代世界的知识调和融会在一起。13 世纪中叶在此授业的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将阿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义结合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教会正统理论流传，直至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

哥特式建筑成为体现卡佩政权的另一种载体。如同法语一样，其来源是法兰西岛上的建筑模式，并且与卡佩王朝紧密结合。这种建筑崛起的根源，就是典型的王家宣传家、圣德尼的苏格修士。他在 12 世纪 30 年代重建修道院教堂时，将尖穹顶结合进来，这往往是用在勃艮第建筑中的来源于盎格鲁－诺曼底模式的罗纹穹顶。这种风格出现在 1140 年建成的夏尔特尔教堂西端。曾经在那里工作的建筑队后来又到了桑斯，于 12 世纪 70 年代在该城建造了第一座哥特式教堂。

此后，在教堂建筑中就采用这种风格：有努瓦荣（建于 1140 年—1186 [110] 年)、桑利（建于 1167 年—1191 年)、拉昂（建于 1150 年—1223 年)、夏尔特尔（在一场大火后整座教堂从 12 世纪 90 年代重建)；巴黎圣母院则从 12 世纪 60 年起开始以这种风格建造。进入 13 世纪后，这种建筑风格流传到法兰西岛以外的地区亚眠、博韦、勒芒、鲁昂、塞斯、古唐斯、昂热、特鲁瓦、兰斯、斯特拉斯堡、布尔日等地。圣路易在巴黎的斯德岛营建圣夏佩尔教堂以安放基督宝座上的王冠的计划，给这种风格赋予新的名声。该教堂建于 13 世纪 40 年代，是建筑、雕塑和彩色玻璃的综合范例，成为哥特式建筑的精华。在卡佩王朝向南方的扩张过程中，这种建筑风格也得到发扬光大。例如出现在克莱蒙、罗德兹、阿尔比和卡尔卡松，随后流传到从乌普萨拉直到法马古斯塔的整个欧洲。

（第 104 页）贝基埃的修道士马特弗·埃尔芒古的《爱情圣典》(1288 年)中的一页。诗歌试图用正统基督教的精神恋爱取代典雅爱情传统中的色情主义。图中可见：魔鬼跟踪爱人们（从上至下)，在宴席上、狩猎时、战场上、跳舞时和求爱时，最后（右下角）魔鬼将垂死的爱人的灵魂运走。

卡佩王朝由于哥特式建筑在欧洲的胜利，加之法语影响的增大，巴黎大学知识的光芒，以及城市的财富和文化氛围，而一时名声大噪。然而，仅仅关注巴黎与王朝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发展就可能错过法国中世纪经济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

中世纪法国的强劲经济能力肯定不会随着王朝的胜利而减弱。法国从

其国界以外，特别是佛兰德斯、意大利北部，但也有加泰罗尼亚和具有强大商业行会“汉萨同盟”的德国北部的商业权利中获得经济上的帮助。法国商业与更广泛的欧洲贸易网络融合在一起，贸易并不跟随百合花（指王权）。莱茵河和罗纳河——一条完全在法国境外，一条仅部分在法国境内——既是法国，也是欧洲经济交流的主动脉。法国贸易最兴旺的地区是香槟，从12世纪30年代起，那里就是连接来自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北部这两个中世纪最大的经济势力之间的中转站。在香槟地区的特鲁瓦、拉格尼、奥布河畔巴尔和普罗万城连续六个星期的交易会，使其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易的场所。意大利人和佛兰德斯人生产的服装在那里大量展示，还有来自勒旺（香料、丝绸）、较远的北方（斯堪的纳维亚的木制品、裘皮）和南部（西班牙的皮革制品）的商品。此外，兑换服务也开始进行，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卢卡银行的能力尤受重视。

法国其他许多地方仍然看着国家边界线以外的地方。法国的佛兰德斯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与帝国一同觊觎着国界以外的地方，并与英国的经济联结在一起。例如敦刻尔克开发建造了为盎格鲁－佛兰德斯贸易所用的重要港口。在南方，吉耶内的经济发展通过波尔多与英格兰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酒和盐贸易使双方都受益。在下朗格多克和鲁西永，在阿拉贡国王时经济欣欣向荣；佩皮尼昂是主要的成衣生产地。在皇帝的权力范围下的法国东部的城市同样也迎来经济的蓬勃发展。阿格努曾有一段时间是皇帝行宫所在地，而斯特拉斯堡通过与德国中部和瑞士的贸易联系，成为主要的国际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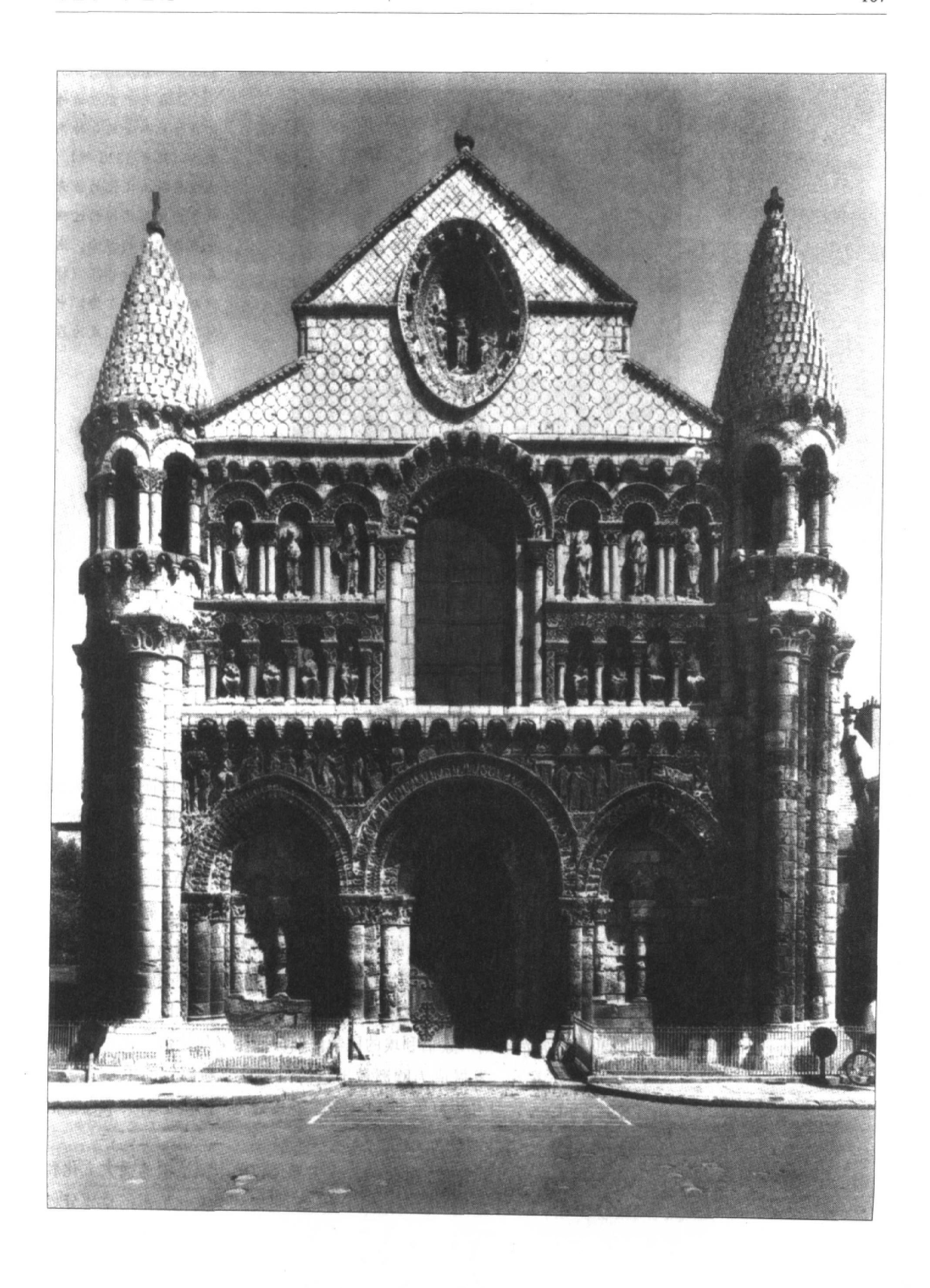
112

多元化成为文化发展的强音。长期占据优势的法语已经沦落为纯粹文学表达的形式。在12世纪的法兰西，许多文学作品是用法兰西亚以外的语言和方言写成的。奥克西塔尼语，在南部更多被称做“奥克语”的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游吟文学的载体。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见证了最初的宫廷爱情传说的流传。尽管这种运动没有在阿尔比教派东征军带来的独断的不容异说中幸存下来，但它表明了对北方传奇作家的重大影响。

（第107页）普瓦图和道多涅有极其精美的罗马风格艺术。在1130年至1145年建造的普瓦提埃大圣母院有法国雕塑最丰富的外墙。罗马建筑风格进一步扩大了它在文化上的影响，而且往往与10世纪和11世纪时宗教复兴运动有联系。

在法国内部，法语的竞争者是奥依语和奥克语。皮卡尔迪语，一种与法语非常接近的分支语言是重要的文学语言，如编年史学家佛洛亚沙就是用这种语言写作。特鲁瓦的克雷蒂安用一种修改的形式的香槟方言写作。在西部，布列塔尼语留下了关于亚瑟、特丽斯当和伊索尔德以及圣格莱的口头传说。在东部，阿尔萨斯语在11世纪、12世纪时期，在日耳曼环境中迎来了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

如果说卡佩王朝推动文化的发展，那么许多势力强大的各省权贵的宫廷也同样如此，他们积极主持艺术活动。1234年，香槟王朝继承人纳瓦尔王国时期，香槟公爵的宫廷是骑士文学的积极赞助人。例如，正是在那





正在王子宫中读诗的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死于1230年）。他在将骑士文化的传奇故事传播到德国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所著的传奇作品《特丽斯坦和伊索尔德》中写了两万行诗，成为后来诗歌的典范。

113 里，阿奎丹的伊丽娜的女儿玛丽·德-香槟主持发动了来自特鲁瓦的克雷蒂安的传奇《兰斯洛特》的撰写。维尔阿杜安与尚维勒在那里也很活跃。同时，克莱尔沃附近的西多会士总部的存在掀起了宗教艺术和作品的热潮。诺曼底是另一个文学活跃地区。那里曾经推动了罗马建筑风格的推广，其中杰出的建筑物远离法兰西岛（特别是在勃艮第和奥弗涅，不过同时还有普瓦图、佩里格尔和普罗旺斯）；在推广哥特式建筑风格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南方，图卢兹公爵的宫廷是游吟诗歌的中心——在它成为异教徒之乡之前。如果说巴黎大学保持着哲学中心的首要地位，那么其他大学也是非常活跃的。蒙伯利埃的医学院充分利用与阿拉伯、犹太和希腊学者的良好关系，发展成为欧洲最出色的医学科学和教育的中心。（从1229年开始的）图卢兹大学和（从1303年开始的）阿维尼翁大学也都值得一提。

当时存在着抵抗表面上北方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卡佩法国的强大文化和经济逆流。1328年最后一位卡佩国王查理四世之死是文化变革的重要分界

线，政治精英中发生了继任权的辩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对法兰西宝座的觊觎遭到普遍的反对，正如一位作家所写的那样：“法国人不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臣服于英格兰的想法。”卡佩王朝在政治精英中树立起了法国身份的观念，从而有利于觊觎法国王位的伐卢瓦公爵菲利浦。从此，法国的文化一体性的要求在后来的世纪中受到了严峻的检验。

第五章　伐卢瓦王朝的法兰西：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

[114] 卡佩王朝曾促使法国成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然而它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看来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都受到破坏。接二连三的大规模瘟疫、饥荒给法国各地造成了难以计数的问题。在与英格兰的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的最黑暗的日子里，国家的生存看来成了问题，发生类似当时德国出现的分裂也大有可能。王朝幸存下来（尽管传到了旁系的伐卢瓦家族），并能够再次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体系——一个结束与英格兰对抗，加强对法国社会控制的体系。然而新生的国家很快又卷入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争夺欧洲统治权的冲突之中。

与幻想的辉煌时刻——伴随着文艺复兴的文化涌动——接踵而来的是冲突和分裂。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德国发动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分裂了法国社会宗教的团结；新的内乱浪潮，即宗教战争（1561年—1598年）使其影响进一步加剧，而法国则毫发无损地胜出。幸存者通过改朝换代终于诞生了：伐卢瓦王朝的末代君主亨利三世传位于旁系波旁家族的第一位国王亨利四世。

从好年景到坏年头

自1328年起，卡佩家族婚床上传奇般的好运气一去不复返。拥有11个无可置疑的儿子的王系，在“美男子”菲利浦的统治之后宣告中止。菲利浦的三个孩子路易十世（1314年—1316年在位）、菲利浦五世（1316年—1322年在位）和查理四世（1322年—1328年在位）先后在位，但无人留下长寿男嗣。有关继承人争论的结果是最终选择了“美男子”菲利浦的侄子菲利浦·德-伐卢瓦，他的王号为菲利浦六世（1328年—1350年在位）。

菲利浦·德-伐卢瓦登上宝座后发生的宪制之争表明了争夺政治优先权的潜流。律师们辩称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爱德华三世更有资格继位——他是“美男子”菲利普的外孙，血管中流的是圣路易的鲜血。封建继承的常规法律是允许将封号传给女性继承人的，即使法律禁止她们使用自己的姓氏。但反对英国这一继承权要求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政治精英中日



英格兰爱德华三世国王为阿奎丹正式向法兰西的亨利四世致意。法国国王在周围朝臣同意之下与他拥抱。

益增长的法兰西身份感的仇英情结。宫廷法律专家也追溯回顾克洛维的《萨利克法》和法兰克人，反对将王位传给女性继承人。当时《萨利克法》只不过像是古董玩意儿。然而从那以后，它就成为王国宪法的基础，并使王后执政或是传位于女性继承人的可能性完全排除。所以伐卢瓦王朝[115]的开创不仅表明法国政治身份意识的发展；同时它也表明和确认了如我们所看到的性别关系上的变化。

菲利浦六世的合法地位足以诱使爱德华三世在1329年向法国新国王致敬。但这只是英格兰国王暂时的想法。当菲利浦六世试图效仿菲利普·奥古斯都对付英格兰的约翰所采用的战略，指称爱德华是罪臣，并企图没收他在吉耶纳的土地时，爱德华进行了激烈的反抗。1340年，他宣布菲利浦六世为篡位者，并给自己的头衔加上了法国国王的封号。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开始了。

伐卢瓦王朝和金雀花王朝之间的国际战事和王朝之争，出现在形势最为糟糕的时刻。在14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以中世纪繁荣为基础的经济循环走到了尽头。造成经济下滑的某些原因是偶然的，然而因为他们正好同时发生从而变得更加严重。例如：香槟的集市在1310年后走向衰落，这是由于意大利商人更喜欢借道阿尔卑斯通道和莱茵河水道，或者经过直布罗陀海峡从海路抵达低地国家。英国也在佛兰德斯和加斯科涅崛起成为法国的商业对手。

中世纪人口增长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开垦土地以及借助技术和经济发展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大粮食生产。相对当时的农业技术而言，13世纪的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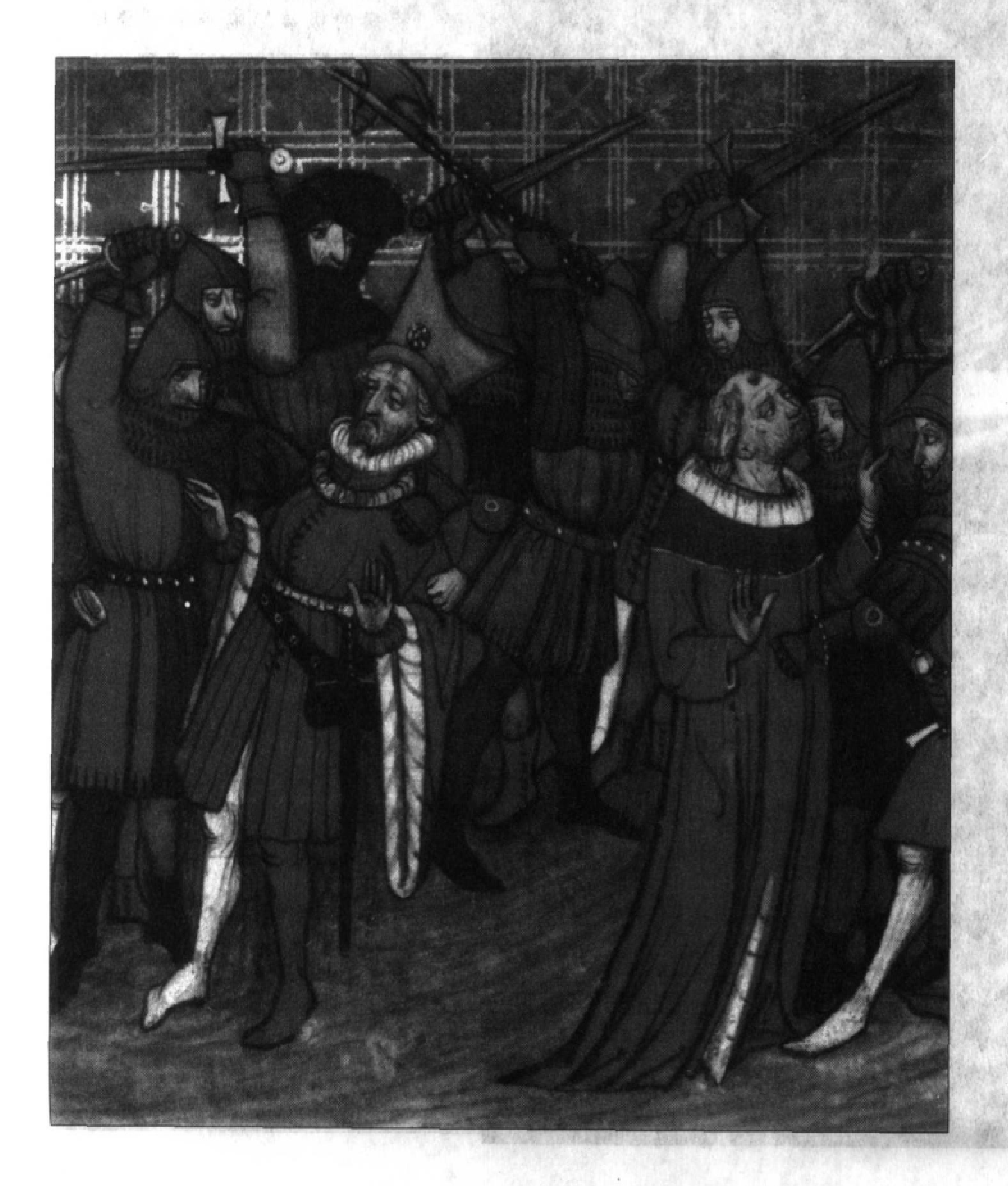
瓦朗斯附近的圣保罗莱－罗曼村子里的一张14世纪的税单，上面有描绘妇女当家的画。高死亡率意味着单亲家庭数量众多。

食产量看上去已达到最高水平。人口增长导致闲置的土地被开发耕种，而一代或几代人的持续密集耕种不可避免地耗竭地力。14世纪30年代后期在洛林继续进行着开垦土地的计划，70年代多菲内地区仍在建造城堡；但 116 更明显的是自13世纪30年代起这些项目却在巴黎地区消失了。人口增长意味着土地的划分低于自给自足的生存水平，农民日益依赖市场生存。面包价格大幅度波动造成需求下降，对贸易和制造业产生了严重影响。1315至1317年间法国经历的饥荒——当时的目击者记载了犯罪猖獗，惊现人吃人的现象——并不单纯是恶劣气候造成的后果。这也是一个社会已经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面走到尽头的症状。

饥饿孕育不满，不满孕育反抗、动乱和寻找替罪羊。1321年发生了大规模攻击麻风病人的事件，这些人因在格兰纳达的穆斯林国王策划的阴谋中向井中下毒而被抓获。在城市里，对控制城市生活的城市贵族敌意日增，杀害搞金融欺诈的犹太人的事时有发生。1349年在斯特拉斯堡有2000名犹太人被杀害。1323至1328年间，在佛兰德斯乡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矛头指向农村的庄园主。起义以农民血流成河而告终——在1328年的卡塞尔战役中，佛兰德斯公爵杀害了1.2万至1.5万名起义者。但与1358年镇压“雅克雷起义”（因贵族称其农民为“雅克”而得名）的规模相比却又相形失色，当时法国北部农民袭击领主并焚烧城堡。

在社会灾难的前兆中，税务官的身影隐约出现。1341 年开始征收盐税，在 14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税收成为法国国王朝臣们钱袋中的定期收入。统治者们还操纵钱币价值来平衡收支：在 1358 年至 1360 年间，铸币的变化不少于 22 次。金融领域出现了反对派。14 世纪 80 年代在鲁昂 [117] （“阿莱勒”暴动者开玩笑似地选举一位裁缝为他们的“国王”）、巴黎（“铅锤党人”用铅锤赶走了税务官）、下朗格多克的城市皮卡尔迪和香槟都发生了城市抗税暴动。

更有甚者，当时的社会状况也由于相隔六个世纪发生的“黑死病”（淋巴腺鼠疫）出现而一片黑暗。疾病夺去了法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事实上，每过三个世纪——后来是在 17 世纪中叶——在法国的某个地方总会发生鼠疫。人口的变化情况为：15 世纪 50 年代，法国人口从 14 世纪 20 年



1379 年导致两名王室官员死亡的蒙彼利埃动乱。在经济困难时期的高税收做法导致当时许多城市发生动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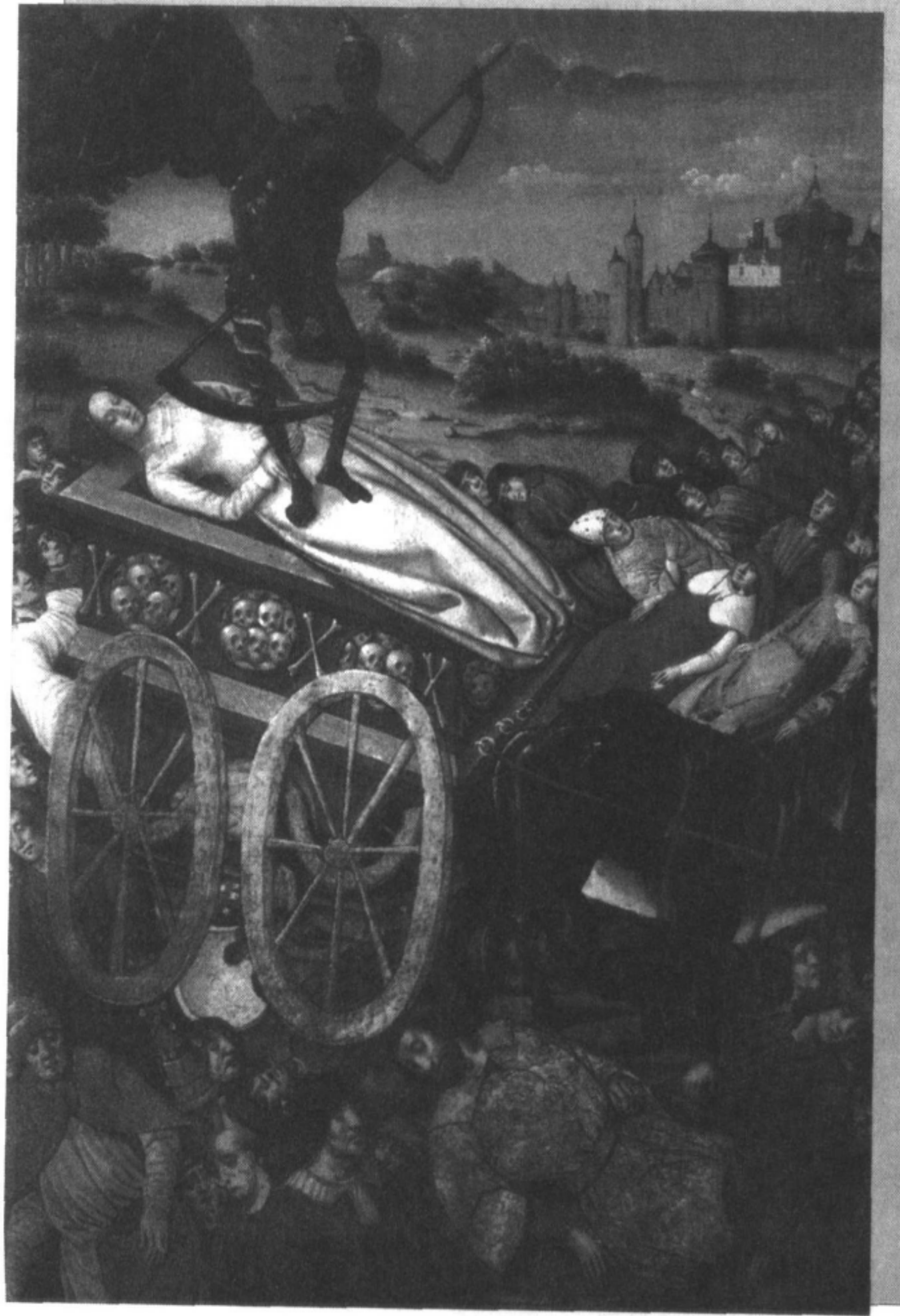
黑死病

"在这个死亡的时候,"1348年—1352年时的编年史家弗洛亚沙写道,"鼠疫流行。人们突然死去,至少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那时死去。"弗洛亚沙的天真猜测得到人口统计学家的充分证实。整个西方世界人口损失重大。欧洲人口肯定有五分之一,可能是三分之一,也许有二分之一,死于那场五十多年没有在西方出现的腹股沟腺炎鼠疫的复发之中。

尽管我们难以确认称瘟疫最初是因蒙古人将感染鼠疫的尸体推到克里米亚半岛被包围的卡法城而造成疾病流行的传说,但看来热那亚商人是在1347年底将鼠疫从那个地区带到西方的。疾病残忍地置人于死地,患者被残酷的死亡痛苦所折磨,而且可怕地有效:患者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皇家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后来写道,"鼠疫是一种疯狂、迅猛、残暴、讨厌、可怕、恐怖和奸诈的疾病。躲过它的魔爪靠的是上帝,而不是人间机构。"医疗界给出的最好的药方,就是一旦出现鼠疫"早早离开,离得远远的,晚些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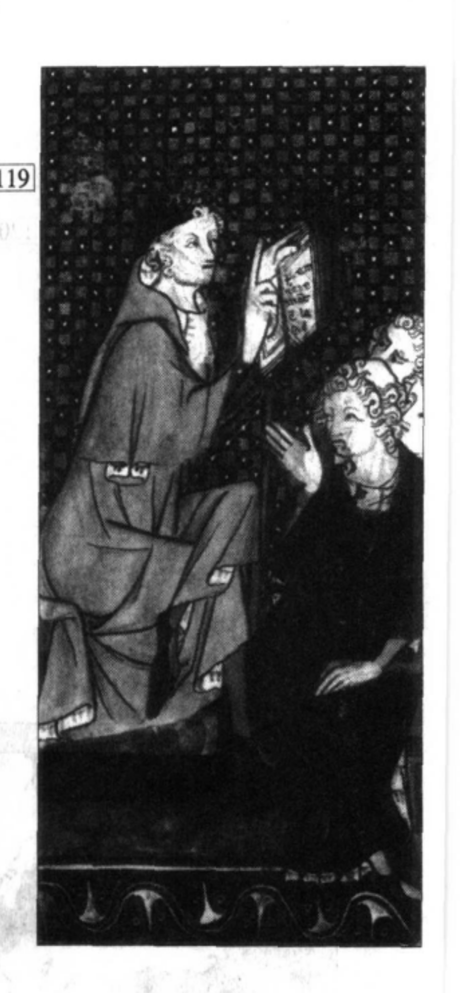
疾病的极端影响带来极端反应。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恶毒屠杀认为,是他们针对基督徒而在水井下毒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疾病。疾病还激发了赎罪意识,一些鞭笞队在法国东部、东南部和德国流浪,他们鞭笞自己以号召人们忏悔罪过。"灾难将恐怖深植于男人和女人的心中。"佛罗伦萨的薄伽丘写道,"哥哥抛弃弟弟,叔叔抛弃侄子,兄弟抛弃姐妹,妻子常常离开丈夫……甚至父母离开他们的孩子。"

在法国,只有贝亚恩、皮卡尔迪的部分地区和中央高地躲过了1348年—1358年的大批人员死亡。人口恢复增长的好运被疾病的再次降临一扫而光,特别是1360年—1362年、1374年和1382年—15世纪有十多年的时间是特别糟糕的。



《死神的胜利》,令人回忆起1348年死亡无数的黑死病的16世纪作品。直到1720年,法国继续遭受沟股腺炎鼠疫的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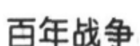
代的2000万左右降到1000万至1200万。



中世纪大学里讲授医学主要是照本宣科，由加朗和伊波卡特等人以经书为基础撰写的书本是标准教材。它们面对黑死病根本无济于事。

因这一致死性传染病造成的人口锐减，使已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工作中断。在城里，由于需求减少，人力昂贵，许多工厂被迫倒闭。劳动力突然 [119] 成了稀缺昂贵的商品。在鼠疫中幸存的农民和工人做得很好，他们从突然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上获益，工资增加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例如吃肉成为很普通的事。然而他们还是要承受封建阶级对他们生活标准的克扣压榨。某些庄园主企图强压农民为危机付出代价，减少他们的工资，提高封地税负。1351年引入的国家立法就是对工资封顶。这样的努力一般都于事无补。某些领主所做的适应现状的调整办法是减少耕种，发展使用劳动力较少的畜牧业，将劳役改为支付现金或向农民提供优惠租金来吸引劳动力。还有一些人不愿意让封建利益下降而更喜欢采用老祖宗的办法：出击抢劫。百年战争的爆发可能是由于敌对王朝之间的需求和反需求的斗争所造成；但同时也是在封建阶层（同时包括许多流离失所的农民和城市市民）企图获取新的生存和致富手段的推动下发生的。

对英国人来说，抢劫是重要的。1355年，爱德华三世之子“黑王子”在南方抢劫返回时带回了满满1000节车厢战利品的车队。而抢劫对法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交战双方的军队带走了所有拿得动的财富，扣押个人和村落作为人质，并经常将农村劫掠一空。在仅有的和平时间里，退伍士兵们组成警醒的武装团伙——14世纪50和60年代的“劫道者”、15世纪20和30年代的“扒皮者”，他们所到之处均造成破坏。尽管每4至5年仅有1年为战争之年，军队数量也相对比较少，最多不超过5万人，但军队的路过、逃兵、退伍士兵和食客都成为人口增减的晴雨表。中央高地、巴黎盆地和诺曼底地区遭受的破坏特别严重。百年战争对诺曼底而言堪称“广岛灾难那样的规模”（Guy Bois语）。特别是在15世纪“从迪埃普到鲁昂”，一位诺曼底的城市居民悲叹道，“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辨认得出来的迹象；没有庄园，除了少数强盗之外，没有人烟”。全法国的道路都荒凉得空无一人，被遗弃的村庄、田野和小村子里荨麻和荆棘丛生，成群的野狼出没其间，十分凶残。



百年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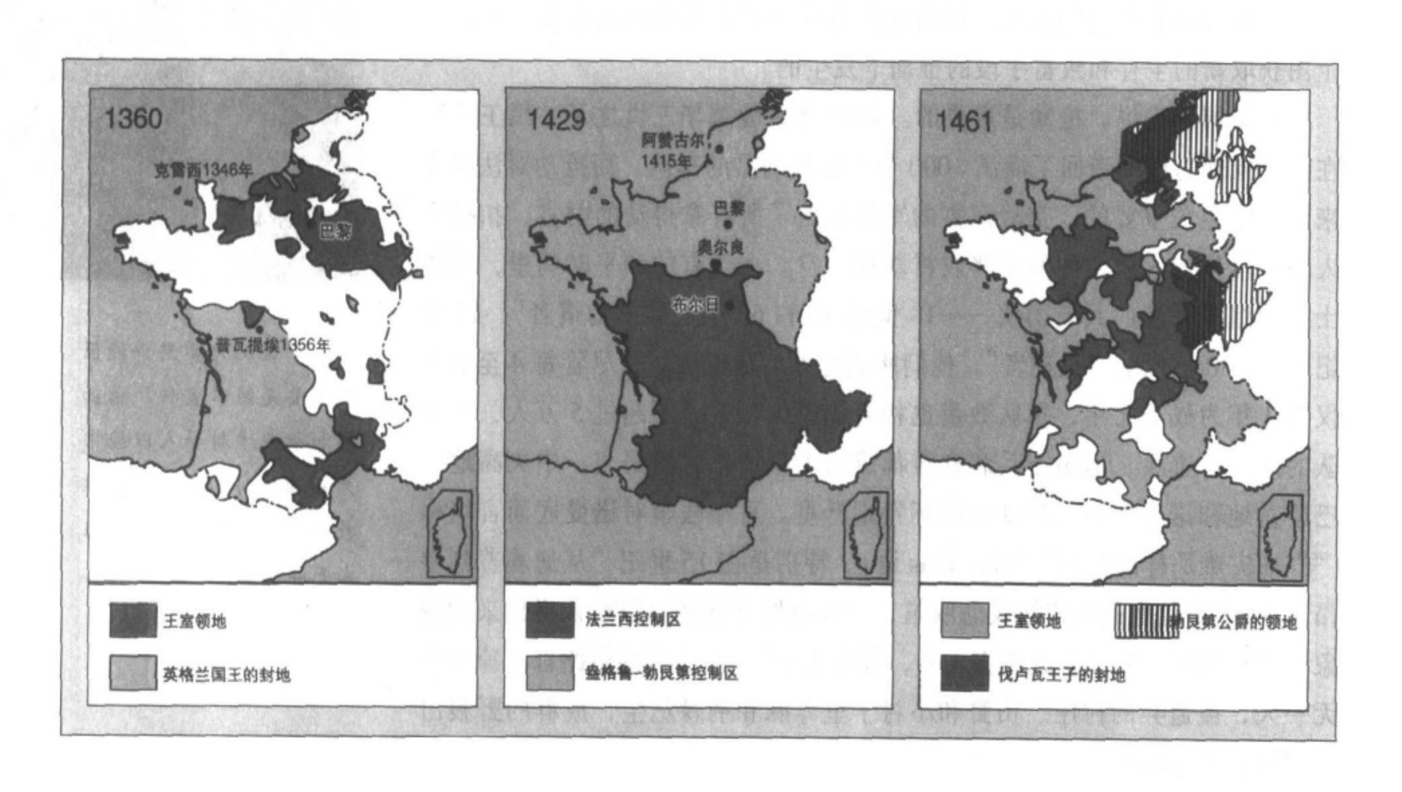
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对法国人而言，从一开始就是灾难性的。1340年法国舰队在布鲁日外海被摧毁，爱德华三世的远征军分别于1346年在克雷西和1356年在普瓦提埃沉重地击败了法国人。法国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困难日益加重，1347年加莱落入英国人手中，1358年“好人”约翰二世国王（1350年—1364年在位）被俘。由于没有国王，南部（奥克

百年战争。卡佩王朝（见原著第 76 页）千辛万苦拼凑起来的强大国家在百年战争中四分五裂。《布雷蒂尼条约》确认了英国作为法兰西王国主要对手的地位。法国的运气在 15 世纪 20 年代末降到最低点，当时英国国王和勃艮第公爵看来正在策划瓜分王国。到 1461 年伐卢瓦王朝时运气又来了。

语地区）和北部（奥依语地区）地区的公国煽动改革；而在巴黎，艾蒂安·马尔塞领导了城市运动，要求更大的自主权。英国人则更是得寸进尺，要求为他们的战利品支付巨额赎金，因此税收的压力在全国引起不 120 满，导致 1358 年发生了“雅克雷起义”。在 1360 年签署的《布雷蒂尼和约》中，约翰被迫同意向英国割让将近三分之一的王国土地。

斗争不仅是王朝斗争，也是一场内战。法国约翰王的封臣利用他的窘境扩大自己的势力。路易十世的外孙、路易女儿冉娜之子，同时也是埃夫勒公爵和诺曼底的大地主纳瓦尔国王“恶人”查理提出了继位要求，并长期成为伐卢瓦王朝的肉中刺。在 1341 至 1365 年间发生了争夺布列塔尼爵位继承权的斗争，亲英国的继承人查理胜出，俨然以独立于法国国王的身份自居。在勃艮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好人”约翰的继承者查理五世（1364 年—1380 年在位）领导了坚决



的重整复苏。伟大的军事指挥家伯特兰·德·盖斯克林毫不留情地在北方和西南方驱赶英国人，在 14 世纪 70 年代末期将他们赶回到少数几个港口。查理六世（1380 年—1422 年在位）的统治却较为困难。他的叔父们自私地统治，当他尚在冲龄时期即彼此攻讦。尽管查理全面执政时显示出一定的能力，但他却于 1392 年开始精神失常，直到统治末期只是偶尔地表现得理智一些。他的病态使得派系之争加剧。在与英格兰休战的 1407 年，主要的王族斗争突现出来，当时勃艮第公爵“无畏”约翰组织谋杀他的主要

对头查理六世的兄弟奥尔良公爵路易。英法斗争在一段时间里因被称为阿尔马雅克（对奥尔良派的称呼）和勃艮第人之间的斗争而被甩在一旁。1415年英国人又杀回纠纷之中。亨利五世（英格兰国王，1413年—1422年在位）进入法国，提出王位要求。1415年在阿金库尔战胜法国人是其有力的一击，1419年“无畏”约翰组织的阿尔马雅克谋杀案促使勃艮第人与英国人结盟。他们强迫倒霉的查理六世将女儿嫁给亨利五世，剥夺了他自己儿子的继承权，让亨利五世成为其继承人。可怜的王储，即未来的查理七世（1422年—1461年在位）只保住了南部领地，法国北部的大部分领土落入盎格鲁-勃艮第人之手。

121



贞德肖像，取自关于奥尔良的查理诗集（1455年）中一位无名法兰克-佛兰德斯画家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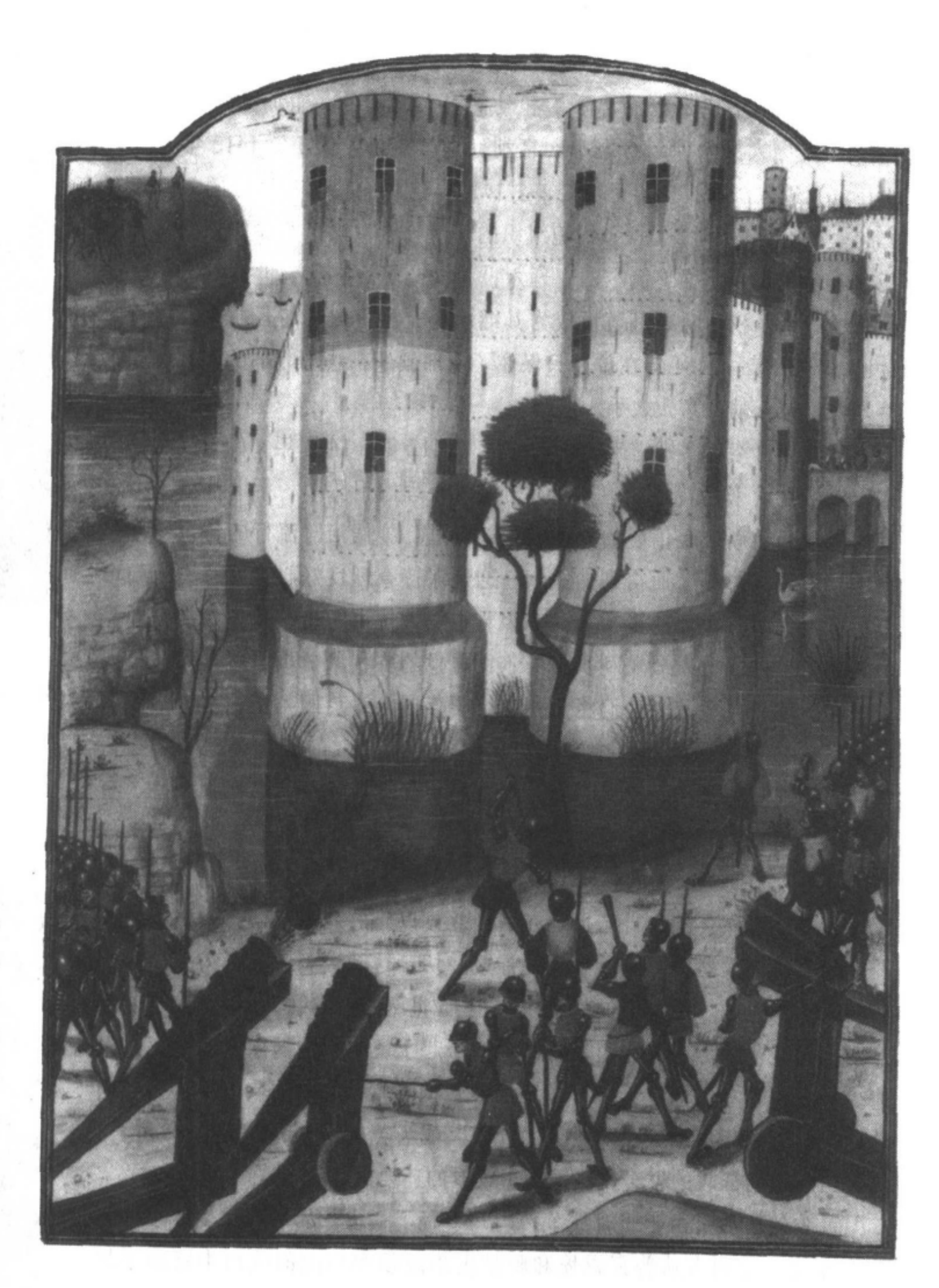
随着来自洛林多姆雷米的村姑贞德（1412年—1431年）的出现，法国人奇迹般地时来运转了。她乔装打扮进入查理的卫队中，帮助他破了奥尔良的围攻。重新鼓起信心的查理向兰斯挺进，根据当时流行的传说，他是由于“上帝的恩赐”而得到加冕——这是保持查理良好心理状态和王朝声望所必需的极其重要的步骤。他作为君主的地位由于传统礼仪而加强了，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发展顺利。当奥尔良之役的胜利象征贞德落入勃艮第人手中时，他有点慌乱。他们将贞德交给了英国人，英国人把她作为巫婆施以火刑。贞德与国王随从中赞成与英国人全面作战的那一小撮人关系密切，而查理却主张采取外交手段。他的外交有所斩获，1432年他战胜了布列塔尼公爵，1435年又把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浦（1419年—1467年在公爵位）招回到法国的阵营。

事实证明靠英国人自己很难在法国北方以外的地方定居下来。法国人开始采用焦土策略，军队所到之处摧毁一切。这既遏制了英国人抢劫战利品的愿望，也破坏了他们的供给线。在15世纪20年代，当英国人企图将一场抢劫战争变为占领和殖民时，他们激起了反抗。法国国王的封建遗老遗少们希望独立，而不希望改换统治者。英国人对他们同伙的恩宠引起当地许多的不满怨恨——“英国人的儿子”成为英国辖下的鲁昂最严厉的咒骂，当时他们征收的税金比法国国王收取的还要高。



15世纪英国统治下的波尔多城徽章雕刻。豹子是与英国国王关联特别密切的纹章图案。

税收的增加是由于当时战争费用几乎翻了一番。战争方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法国人从普瓦提埃和阿赞古尔战役中付出的代价中吸取了教训，一支精良的法国骑士团被歼灭，骑兵作战已经成为过去。骑士们身穿的是沉重的板式盔甲而不是锁子甲，像抵御弓箭那样来抵御枪药推进的火箭。而近距离作战时步兵比骑兵更有优势，一旦骑兵从马上掉下来，盔甲使他们无法行动。但是，骑兵的消失既是因为军事变革也是由于政治变化。国王已经不再能够依靠封地征兵作为召集可靠军队的方法。封建关系的衰落意味着士兵的，甚至包括臣仆的需要得到支付，而且当战利品不可靠时要有现金支付。尽管代价昂贵，但雇佣军并不总是可靠的，特别是他



百年战争中的攻城战。1346年克雷西战场上出现了大炮，但直到15世纪，他们才作为有效的攻城武器而导致军事工程设计的改变：基础墙体厚实；出现了角楼，用于防卫的大炮可以从垛口开火。

们在战争尾声中解散而进行大肆劫掠的时候。自1439年起，查理六世设立了一种直接税——人头税，但正规军毋须缴纳此税。

[122] 查理七世的正规军组成了15世纪40年代赶走英国人后的法国军队的骨干。他们得到1449年建立的弓箭手连队和炮兵的加强。德·盖斯克兰曾在14世纪70年代首先使用炮兵。在15世纪40年代，大型火器成为战场战术和攻城的关键因素。法国人于1453年在卡斯蒂荣使用了不下300门大

炮来见证百年战争的最后一役。而英国人已经被赶出诺曼底，正从西南撤退，在欧洲大陆仅仅保住了加莱的弹丸之地。

王朝复兴

将英国人从法国赶出去的斗争证明，一个进行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 123 王朝实验室建成了。靠设立人头税而创建的正规军，被伐卢瓦王朝发展成后来成为王家极权主义的一个关键部门。更有代表性的是，军队的经费来源不必再求助于三级会议，军队被视为王家主权的象征，而不是国家随意指挥的机构；纳税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出于好心。

极权主义的行政体制的雏形同时也在这些年代以及 1453 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形成。在查理七世和他那诡计多端、精明过人的继承人路易十一世（1461 年—1483 年在位）的统治期间，王家顾问团显得封建性较少，但更具官僚特点。国王依靠由专业律师组成的团体提供咨询意见，而几乎不依靠趾高气扬的朝臣。在王家事务上也有更大的区别。金融和司法的功能是分开的。司法大臣掌管着司法武器，即按王家法庭的等级所组成，巴黎最高法院最重要。金融是一群“金融将军”的责任；同时专业机构（如审计会，救济院）也发展起来，处理金融纠纷和税收事务。地方行政管理也进行了改革。四个主要纳税区或财政区于 1390 年成立，这些区划逐步增加，管理也更加复杂。在 12 世纪创立的由执政大法官和司法总管掌管的法院数量增多，业务也在扩大。

事实上，尽管国家的正式结构日趋官僚化，与此相对的却是一种非正式的卖官制度在运作。这种做法主要发生在王室宫廷，同时也蔓延到教会及世俗的事务之中。在 1438 年的“布尔日国事诏书”中，法国国王可以保留对许多高级教会职务的任命，并可动用教会收入，因为他现在有权对此课税。国王还充分享有宫廷、军队和官僚体制的官员任命权力——尽管自 16 世纪初期，君主已将有组织地卖官鬻爵作为增收手段。

百年战争及其后果导致了一个 1420 年看上去已步入末路的王朝东山再起。英国人的问题被解决，但地方贵族的问题仍继续存在，他们反对伐卢瓦王朝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努力。驱赶英国人的行动使许多封建领主可以准确计算他们所提供的支持的代价。1440 年，上层贵族领导了所谓的“普拉格利”运动，强烈反对军事改革，例如他们用土地行贿。布列塔尼则在 15 世纪初高度自治，要求分离出去，拥有主权国地位。他们发展了类似伐卢瓦王朝的中央集权的组织机构，拥有更为专业的行政管理体制、复杂的税务系统，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他们的民兵“弓箭手”的建立（1425 年）实际上比法国的同类组织早 20 年。

124 封地——赐给君主年轻的儿子们的地产——仍然是以立宪的方式赐予，在此范围内出现许多针对伐卢瓦王朝专制的反抗。圣路易的一个兄弟的后裔和昂儒的公爵们，是15世纪转折关头的民众动乱中的主要活动分子。勒内“国王”、巴尔和洛林的公爵、普罗旺斯伯爵和那不勒斯的挂名国王，以及昂儒公爵，在15世纪中叶都是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主要角色。然而，对伐卢瓦王朝主要的威胁，无疑是在1363年被作为封地赐给约翰二世的一个儿子“勇敢者”菲利普（1364年—1404年在伯爵位）的勃艮第。菲利普与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结婚以后，成为佛兰德斯和阿图瓦大片土地的继承人，他于1384年合法地继承了这些领地。这成为他后来扩张的基础。



这是勃艮第公爵的权臣尼哥拉·罗兰的肖像，取自描绘他和夫人在博恩捐赠新医院典礼祭台上的画作。这幅佛兰德斯画派大师罗热·冯·德·韦登的作品至今仍挂在医院里。

菲利普的孙子、“鲁莽”查理（1467年—1477年在伯爵位）继承了业已强大的北部和东部的政权实体。他们之所以成为威胁并不仅仅在于勃艮第领土的大小。伯爵领地的经济实力也非常强大，这一地区在百年战争的洗劫中受到的损失小于伐卢瓦政权的心脏地区，当时在佛兰德斯的城市里聚集了大量财富。当地建立了与法国国王同样复杂的那一套行政管理体系——大法官管辖区、独立的司法体系、审计院、地方等级、正规军队，等等。勃艮第王室当时在欧洲是最为辉煌的。

肆无忌惮的争富斗阔成为统治者与他过分强大的臣仆展开微妙战争的战场。模仿是阿谀奉承最直接的形式，也是政治野心最可靠的信号。布列塔尼的公爵和阿尔马雅克伯爵所戴的金冠，在正常情况下属君主专有。在普罗旺斯，勒内“国王”刻意模仿君王的行为举止。伐卢瓦王朝的“骑士团”被少数国家和准国家所模仿：布列塔尼公爵们从1381年起有了自己的“貂皮团”，而勃艮第则在1429年建有著名的“金羊毛团”。

“鲁莽”查理致力于复兴一个位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中间国家洛林，并想得到王室承认他为勃艮第国王。他失败了。他的失败和他1477年在南希城墙外之死，也打破了勃艮第人的梦想。法国国王在破裂的勃艮第领地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在1485年—1488年的“疯狂战争”中他要对抗野心勃勃想把勃艮第失败转化为自己利益的王公们的努力。在1482年的《阿拉斯协议》中，君主将勃艮第公国以及索姆河沿岸的城市都并入法国。同时，还安排了储君（法国王位继承人）与查理女儿和继承人玛丽的婚事——这样一来，弗朗什-孔泰、佛兰德斯和阿图瓦将可能转入法国人手中。

由于事情发生了变化，婚礼从未举行。女继承人与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结婚，她的领地作为陪嫁落入了哈布斯堡而不是伐卢瓦王朝之手。尽管这个计划失败了，15世纪依然见证了法国统治的飞速扩张。14世纪获得125的成果还算是很小的：里昂于1312年被兼并；1349年蒙彼利埃也被吞并，同年多菲内落入法国的控制之下，尽管它保留着作为储君封地的形

勃艮第公爵的皇宫

“200头壮牛，63头肥猪，1000磅猪油，2500头小牛，2500头肥羊，3600扇山羊，1.18万只小鸡，1.864万只鸽子，3640只天鹅，2100只孔雀，1688只仙鹤。”这仅仅是1468年勃艮第公爵“秃头”查理举行盛大婚礼宴会所消耗的部分食品。从1363年至1404年“秃头”菲利普公爵时起，勃艮第宫中宴会的铺张豪华就享誉欧洲。

公爵们是文化活动，如建筑、绘画和雕塑的热心主人。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潮流没有影响勃艮第，主要的文化影响来自于低地国家。勃艮第派雕塑大师克劳斯·斯鲁特和画家罗热·冯·德·韦登及冯·埃克兄弟都受到张开双臂的公爵帝国的召唤。

宫廷的铺张浪费完全是刻意而为。首先是乐于给当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为来访的达官贵人和大使们举行的豪华铺张的宴会成为一种餐饮外交。像法国国王一样，勃艮第公爵们也有自己的编年史家，他们一边倒地以夸耀的笔调记载主人功绩。中世纪骑士文化和典雅爱情受到刻意欢迎。诗人和游吟诗人并不仅仅是讲述詹森、赫拉克勒斯、查理大帝、罗兰、阿瑟、兰斯洛特及他们同类人的故事；画家、雕塑家、织毯者、首饰匠、珠宝商以及各行各业的艺术家，都来表现他们自己，编织出将神话人物和当代英雄混合在一起的寓言故事。在举行展示、游乐、赛马、舞会、演出、狩猎、重大仪式和宫廷活动时，所有的服装和陈设都极其奢华。例如1429年成立的金羊毛骑士会成员，根据詹森和亚尔古传说在一次名为“野鸡宴”的活动中成为核心。宴会于1454年在里尔举行，中心事件是当成员们宣誓举行十字军东征时，出现一只活野鸡，戴着金项链，身上挂满各种宝石。勃艮第宫中同样热衷于将神话英雄和场景营造得栩栩如生。

勃艮第的“好人”菲利浦公爵——可从他帝王般的神情上认出——正在接受佛兰德斯浪漫史作家让·乌克林奉献的诗集。后者在勃艮第宫中营造骑士气氛方面是个重要角色。

式。路易十一将该省直接处于王室的控制之下。英格兰和“鲁莽”查理的失败使王朝的版图扩大到吉耶内、诺曼底和勃艮第。封地和其他公爵的土地复归王室，1456年阿朗松领地和1473年昂儒领地复归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1481年，在经历了一番关于继承权的冲突之后，普罗旺斯和洛林的巴尔公爵领地也均在法国控制之下。1491年，路易十一的继承者查理八世（1483年—1498年在位）战胜挑战，得以娶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的遗孀布列塔尼女伯爵安娜为妻。查理的举动确保这个高傲独立的省份将来属于法国。查理英年早逝而未留下后嗣，使他来自奥尔良家族的侄子路易十二 126 （1498年—1515年在位）离开了自己长期厮守的妻子，改娶查理的遗孀，



克里斯蒂娜·德·比桑将她的诗集献给法国王后、查理七世的妻子、巴伐利亚的伊莎贝尔。在寝宫中，墙幔上有法国的金合欢花和巴伐利亚钻石的图案。舒适的私人空间——嵌镶板的天花板，带百页的窗户，铺着地毯的地面，带装饰的椅子：可以看出对物质舒适的追求态度。

以便控制该省；1532年这个省完全并人法国版图。

一个像布列塔尼的安娜这样的女人，在国际权力关系的游戏中只是个道具而已。这是当时许多非常杰出妇女的命运。贞德的榜样在男女两性地位方面，总体上没有什么影响。贞德身穿的男装比她精神上的召唤更让英格兰法官感到不安，而法国人则可能被她是一个已死去的烈士而不是抗议妇女地位的活着的问号所感动。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娜·德·比桑的影响力很小。她所写的《女人城》（1404年）是对男人厌女癖的彻底批判，她对妇女本性被男人（往往是教士）的想像所改变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进行了令人不安的分析："书上是这样说的"是她一再重复的话，"女人偏让它变了样"。然而她的信徒寥寥无几。

伐卢瓦王朝15世纪的扩张彻底改变了法国的形状和版图。兼并多菲内和普罗旺斯，加上对洛林的遮遮掩掩的兼并，代表了在六个世纪前的843年在凡尔登解决边界问题上第一次重大决裂。这些地区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方式被兼并到法国，地方自治得到尊重是为了培养忠诚度的需要。各省允许成立自己的高等法院：图卢兹于1443年成立，格勒诺布尔于1456年成立，第戎于1477年成立，埃克斯于1501年成立，鲁昂于1515年成立，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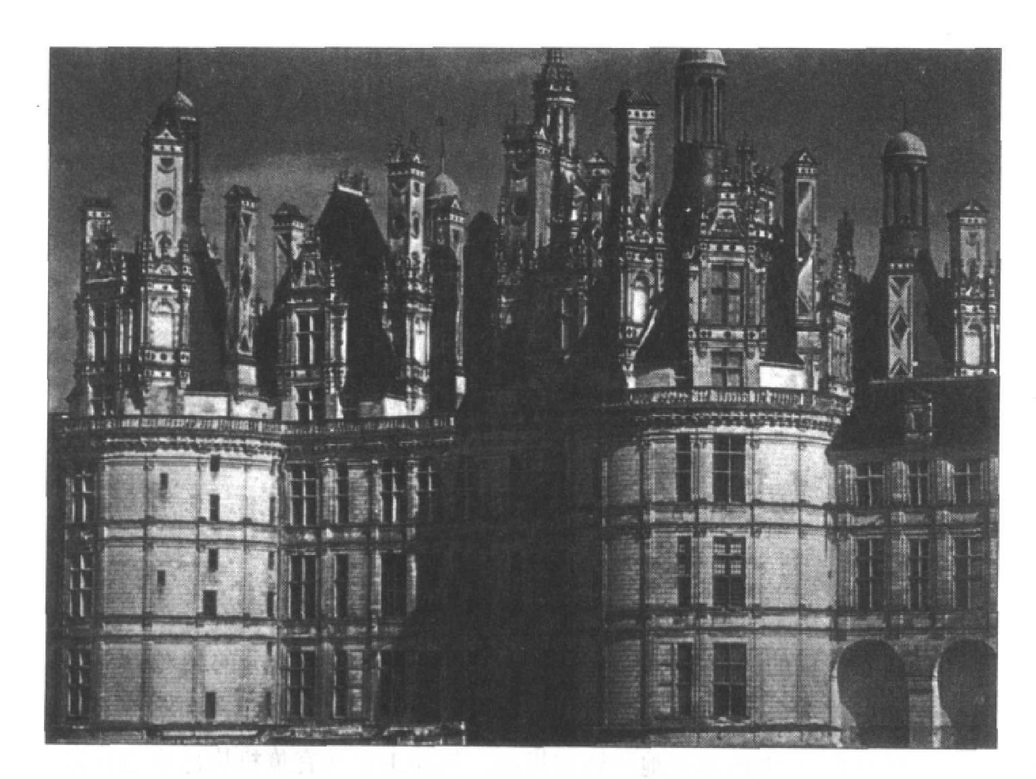
恩于 1551 年成立，等等；以及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审计院和救济院。在某些 [127] 情况下，这是新的管理机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是对法国控制前已有的管理机构的官方支持。投奔法兰西国王的各省也被允许保留他们的代表大会，或是封地。所以勃艮第在 1477 年被兼并后封地仍然保留，多菲内、普罗旺斯和布列塔尼也同样如此。在 16 世纪时王室颁布编撰习惯法时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各省民众”，法律专家居伊·科吉耶辩称，“有权制订属于自己习惯的法律”。到 1789 年时，约有近百种类似汇编的文件具有地方法律效力。地区身份的意识就是在这种行政体制的基础上缓慢发展起来的。

复兴的君主，复兴的社会

君主权力在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仍然像自 789 年以来的那样，是封地、神权和主权的混合物。如果有变化的话，就是各种成分的相对力量、所处背景和现实含义。统治者仍然将自己视为“老爷中的老爷”，坚持封地仪式，而且直到 1695 年封地税还被提起。然而王室和官僚机构已成为权力的发动机；教会和大封地领主被限制得更紧：更有效控制各省的手段正在不断发展。特别明显的是，最初作为封地协商形式的封地大会成为日渐强大的国家的受害者；大会自 1484 年以后就没有召开过，仅仅在 1560 年发生继位危机时才临时复活开会。君主头顶神圣光环：通过国王触摸来驱赶妖魔（淋巴结核）仍在继续。但王权现在的基础是主权，如同路易十一所称：“王国全体政府和管理机构……还有我们的好市镇……都只属于我们。”

公共威望现在体现在君主身上，而王冠则是主权的体现。同时还要唤醒统治者领导的大众。“这是多么艰难痛苦啊！”在 1360 年将他们置于英国人之手的《布雷蒂尼条约》签署后，卡奥尔的议员这样写道，“放弃自己天生的领主，而去接受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主人。”王朝在百年战争期间巧妙地用国王来操纵身份意识，并激发起对英国人的刻骨仇恨。这一点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许多当地居民对法兰西国家的要求和军队，也如同对其他任何王朝一样满怀敌意。

保持地区的特有形式——地方等级、高等法院、海关等等——成为主权的一种义务。“绝对”权力，一个不断被王朝宣传家使用的措词，意味着不仅仅是立法，同时还要在立法时遵守“王国的基本法律”。这些基础法律包括了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甚至教皇在位时起所要求的王权独立性，他们所包含的中世纪的国际主义已经过时。法国国王是“他自己国家的皇 [128] 帝”，他视自 15 世纪中期以来拥有世袭皇帝封号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为平起平坐者，而不是高高在上者。教皇职位也算不了什么：国王的极权主义意



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最引人注目的杰作尚博尔堡。弗朗西斯一世于1519年和1547年间建造。城堡正面非常宽阔，树立着不少于365个烟囱。路易十四对城堡的魅力尤为迷恋。

味着教皇的相对主义。“美男子”菲利浦自1309年起在阿维尼翁将教皇置于自己保护之下；自1378至1417年，敌对的罗马教皇和阿维尼翁教皇分裂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教皇庇护五世（1504年—1572年在位）动员的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不光彩地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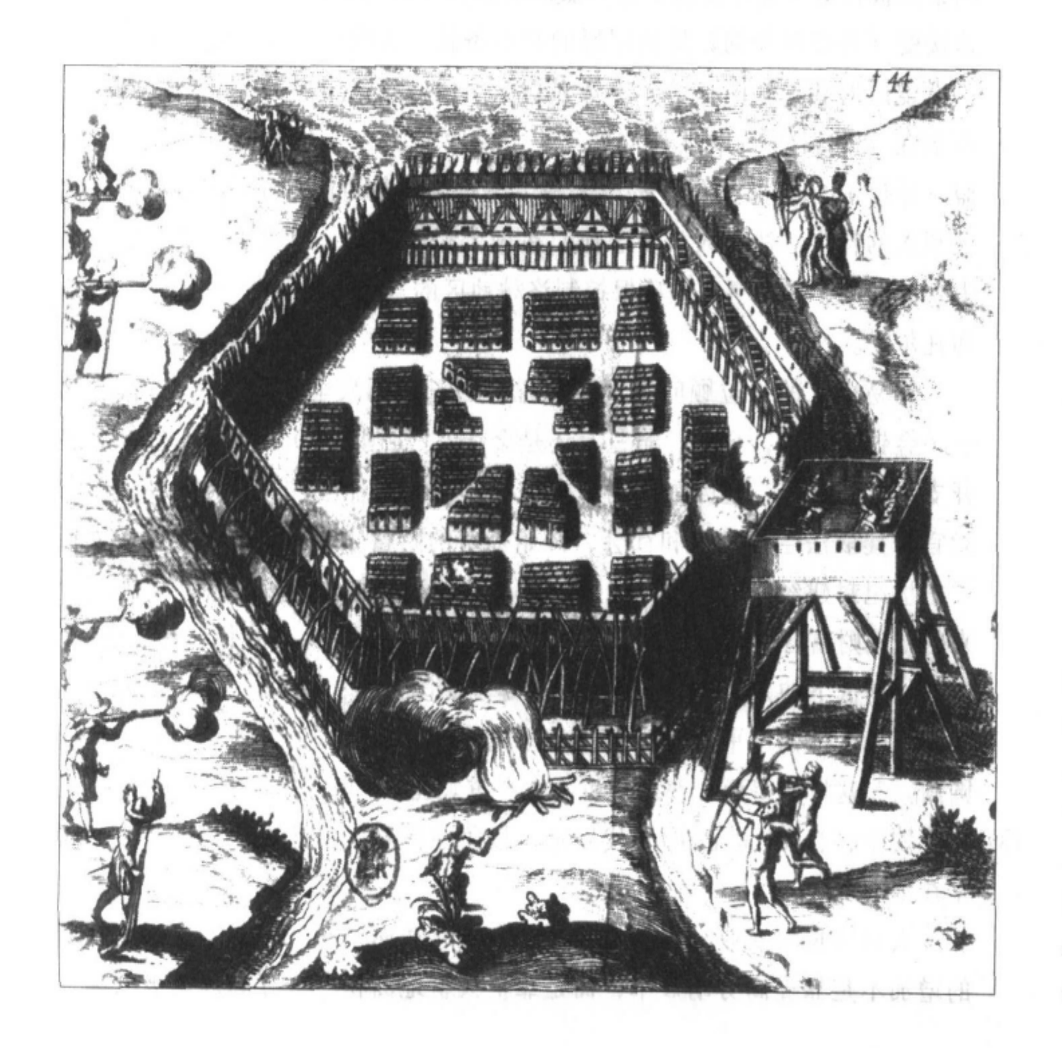
过分强大的臣仆热衷模仿王家气势，迫使国王们走上了政治上耀武扬威，大吹大擂和摆阔显富之路；在体现王权方面采取了精心策划的大摆排场的政策。国王们的穿着与众不同，他们参加的宗教典礼使他们离尘脱俗。王室仁慈象征的金百合，国王加冕礼上身着的天蓝色王袍，加上王冠、国王的权杖和国家长剑，是典型的主权标志。王室礼仪更为铺陈豪华。骑士团——“星骑士团”（1351年）和“圣米歇尔团”（1469年）——是特意展示的集中表现。

宫廷对艺术大张旗鼓的庇护恩宠，使得王宫成为继中世纪教堂后的最精美繁复的艺术之地。自15世纪后期起，骑士艺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开始渗透法兰西王室。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对艺术和古代经典知识的再评价，原来部分由于百年战争的关系而影响有限，然而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廷和普罗旺斯勒内“国王”的宫廷却成为扩大意大利影响的渠道。弗129朗西斯一世（1515年—1547年在位）更是一位意大利艺术的爱好者，他将意大利的艺术家、画家和学者引入法国；当1519年莱奥纳多·达芬奇在安布瓦斯去世时，班文努多·切利尼是来访者。弗朗西斯一世建立了王家学院（后来的法兰西学院），成为除意大利首创的人文学大学之外的一个灯

塔般的创举。建筑受到意大利的影响相对较慢，部分原因是因为哥特式火焰建筑风格充满活力。然而意大利风格已经开始在卢瓦尔河谷宫殿的设计中产生影响。安布瓦斯、布卢瓦、尚博尔、阿扎勒里多和神农索等宫殿城堡充分证明了意大利风格的成功植入。此后，在弗朗西斯于 16 世纪 20 年代后期所建造的宫殿里，“枫丹白露学派”——主要是意大利画家所带来的城堡装饰艺术——对本地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

如果说意大利给法国王室带去了文艺复兴风格和价值观，作为回报法国国王则将战争出口到意大利半岛。从 1494 年持续到 1559 年的意大利战争对，一个能否掌握自己内部问题的王朝的信心是一个考验。在这一时期，其他国家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扩张领土，进行殖民——由于建成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和 1492 年发现了美洲，世界打开了。1534 年靠法国人撑腰的雅克·卡蒂埃宣布征服加拿大；但总的说来，与世界上欧洲以外的地方相比，法国王朝更关心意大利半岛。

意大利战争成为折磨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世的大贵族们宣泄其侵略倾 [130] 向的通道。战争起因于一个王朝问题——伐卢瓦王朝要征服年轻的新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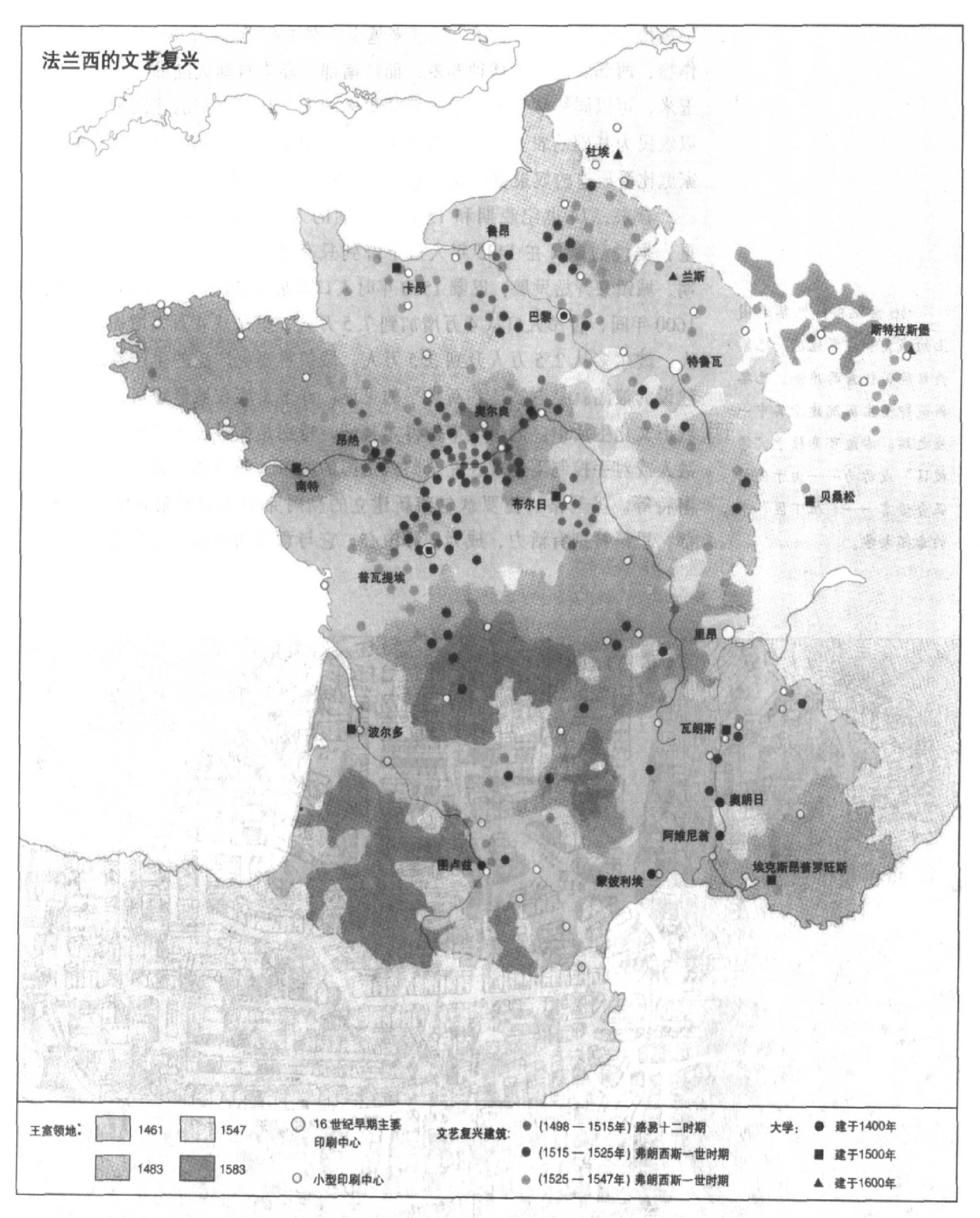
魁北克的创立者、法国探险家萨缪埃尔·尚普兰领导的对奥内达加人的易洛魁堡的攻击。尚普兰于 1608 年在圣劳伦斯河上游登陆，联合当地部落，特别是休伦族部落，进行了几次征讨，终于在该地区站住了脚。

查理八世（1483年—1498年在位）领导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法国君主在发动战争时常常援引“国家”利益，但法国军队却只不过是来自瑞士、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或其他地方，甚至是本国的持有武器的冷酷的雇佣军；战争宣告了骑兵战时代的终结：作战者是应召而来的职业军人，或称雇佣军；他们还分别装备了便携式火力装置，用的是火绳枪，后来是滑膛枪，加上战场上大量使用的长矛，而弓箭则已成为历史。1494年查理八世把大规模的炮兵转入半岛，很快胜利地攻破意大利城市的城墙。教皇朱利叶斯二世（1503年—1513年在教皇位）联合了地方势力，并招募骁勇善战的瑞士军队，展开了抵抗运动。然而，弗朗西斯一世于1515年在马里尼昂对瑞士雇佣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为了确保这一优势，逼迫教皇于1510年签署了《博洛尼亚教务条约》，确认国王的权力在法国教会之上。

意大利战争已经超越了意大利的范围，意大利半岛成为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授权的哈布斯堡政权发生全面冲突的舞台。1519年，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国王查理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法国面临被包围的威胁，特别是在查理的辖区包括弗朗什-孔泰和南部地区。152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被打败并被俘虏后，这一威胁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了。他于1526年被迫接受《马德里条约》里的屈辱的和平条款。法国统治者在低潮中败退。“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并不嫌弃与德国信仰路德教派的王子结成联盟，甚至在1543年——欧洲外交编年史上的第一次——与奥托曼土耳其人结盟。导致1559年战争终止的《卡托-康布雷奇条约》充分突出了他们非意大利人的特点。法国人放弃了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一切利益，从英国人手中要回加莱，并在事实上确保控制洛林地区的“三个教区”——图尔、梅斯和凡尔登。

路易十二的一位顾问曾经对他说，国王发动战争需要三件东西：“第一，金钱；第二，金钱；第三，还是金钱”。法国在60年中能够进行这些开支浩大的战争，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使得统治者可以通过税赋、举债和卖官来攫取法兰西经济和社会，开始拥有的财富。15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中世纪封建经济危机后，经济复苏开始出现，与探险者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欧洲财富普遍增长遥相呼应。复苏的精确指数是人口规模：在1450年左右长期低下的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在法国南方；在16世纪中期几乎达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1572年布朗多姆写道：“法国的发展就像鸡蛋那样圆满。”这样使得死亡率的危机不太严重。在16世纪上半叶，鼠疫和饥荒较少发生；自15世纪90年代以来，战争往往发生在法国边界以外，而不是在国内。

人口增长与农业复苏密切相关。在黑死病瘟疫和百年战争之后，产量的增加不是靠提高劳动效率，而是靠扩大耕地面积——荨麻荆棘被砍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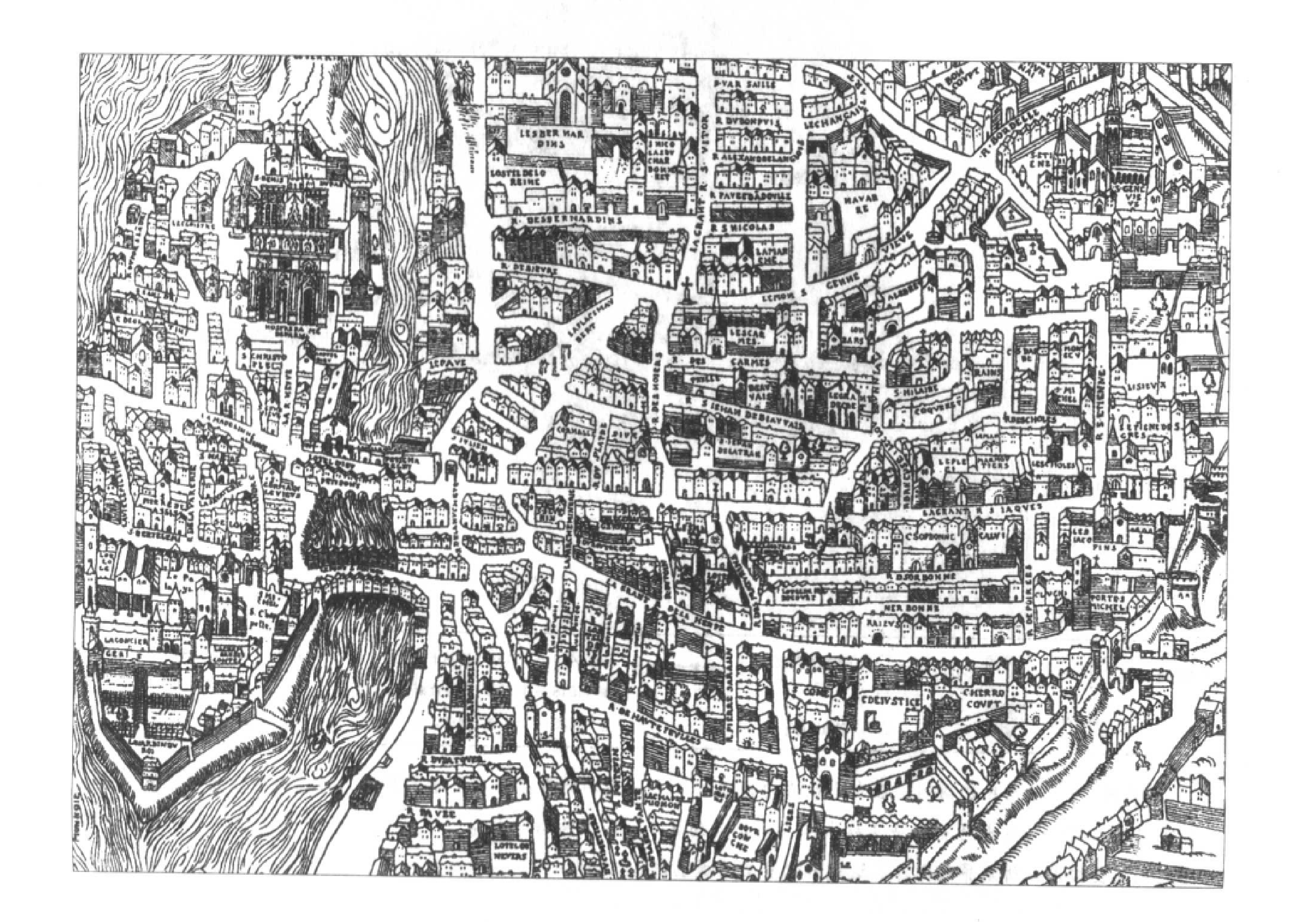
15世纪和16世纪法国国王在自己权力的传统核心地带巩固其权威性。这也是首次将其权威持久地扩大到843年《凡尔登协定》所划界线之外。这是知识和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印刷技术的影响力与日益增长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结合起来；伐卢瓦王朝特别是在城堡建设上紧跟后者。

131

攀援植物也被清除，肥沃土地越来越少。在1600年以后开始推广种植双季作物：西部农民开始播种荞麦；而在南部，靠来自新大陆的一种神奇作物玉米，可以同样数量的耕地来养活更多的人。从中世纪的庄园种植转变到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好地增加产量的环境。半独立的农民家庭比受压迫的奴隶更有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扩大的食品市场的积极性。

看来，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的人口灾难在城市和村镇更加严重：据说利摩日在1435年人口下降到只有最后5个居民。在15世纪后期，城镇又开始发展：巴黎1550年时人口增加到25万人以上；在1500至1600年间，鲁昂人口从4万增加到7.5万人，里昂从4万人增加到5.8万人，波尔多从2.5万人升到3.5万人。城镇需要更广泛的生产基地，城市建设的浪潮就是财富达到新水平的见证。许多贵族在城里建房，并参加到城市文化生活中。港口城市做得尤其好，特别是那些过去在伐卢瓦王朝的敌人或对手控制下而现在完全归入王国的城市，如马赛、鲁昂、波尔多、南特等。圣马洛、拉罗歇尔和新建立的勒阿弗尔也都繁荣兴旺。在东南部，里昂特别有活力，成为国际中心；它与意大利和瑞士交界给它带来各

[133] 16世纪中叶巴黎地图上的城岛和左岸地区。巴黎圣母院俯视着两座桥，巴黎医院即圣主医院建于其中一座之端。右边可见位于“学校区”或称为——由于使用混合语言——“拉丁区”中的索邦大学。



种各样的佛兰德斯、瑞士、日耳曼和意大利移民，他们被活跃的交易集市、银行以及制造业的高超技术所吸引。

由于在这样广泛的业务领域进行频繁的经济交流，西欧在15世纪晚期尝试进行信息交流方面的革命。印刷代表着书写诞生以来人类在交流领域最伟大的成就。自1450年美因茨的工匠约翰·古登堡首次使用活字以来，印刷术就从13世纪以来的补充性创新——生产纸张，发明墨水，使用木模印刷和发明眼镜——中脱颖而出。法国第一家印刷所于1470年在巴黎建立（尽管1458年已有一家在讲德语的斯特拉斯堡成立），到1490年时法国共有9家印刷所，是世纪初的3倍之多。在出版业更为活跃的莱茵兰和意大利，出版的书籍也大量流通。在16世纪上半叶，巴黎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印刷出版中心，而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里昂在欧洲也享有盛名。

比手抄本更便宜、数量更大也更便于管理的印刷术创造了书籍市场。自路易十一统治以来，邮政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使阅读者的圈子与手稿时代相比，扩大到了学者和专家以外的人群。交流用的语言也有所变化。若阿香·德·贝莱的《法兰西语言的辩护与说明》(1549年）反映了读者的变化，并使法语成为有时甚至超过拉丁语的学习和文明辩论的合法手段。七贤人（贝莱、隆萨尔、若代尔和其他人）在世纪中叶所写的诗歌，奠定了法语作为诗歌表达手段的基础。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出色作品突出表现了语言的丰富多彩。印刷术使得圣经同样可以在方言地区广泛流传。在中世纪曾产生过文学的奥克西塔尼、皮卡尔迪，或其他语言及方言，现在陷入混乱，大部分变成了口头语言。1539年使法语成为所有法律和官方文件语言的《维雷－科特莱敕令》表明法语现在是权力，也是文学的表达语言。

对这些经济文化变化在法国国内产生的影响评价过高是错误的。尽管法语有作为书面语言的优越地位，但长期以来这是法国少数人的口头语言。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四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不会讲法语，许多人不能够用法语进行长篇对话。布列吞语、德语、西班牙语、巴斯克语等统治着奥克西塔尼地区和许多地区的方言土语，仍然在使用，特别是在农 [134] 民、城市工人和妇女之中大行其道。同时对所有世界重大发现、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交流革命而言，五分之四的法国男人和女人只是在他们出生地直径15英里的范围内（许多甚至是在同一个村庄）找对象结婚。此外，90%至95%的生意和贸易往来也只是发生在半径25英里至50英里的范围内。对法国大众来说，文艺复兴的固定性和稳定性一如其流动性和交换性。

也许比突然发生巨变的文化革新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中的新经济事实——名为通货膨胀。其根源是由于人口增长，需求超过资源，再加上从

拉伯雷

先是方济会教士，后是本笃会教士，最后在巴黎郊外的默东市以本堂神甫终其一生的弗朗索斯·拉伯雷（1494年—1553年），将自己的教会生涯化作关于《巨人传》中高康大和庞大格吕埃的极其丰富和多种多样的作品，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比教会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在评价甚高的蒙彼利埃大学的学医经历。他作品中放肆嘲笑和黑色幽默的特点总是关于医学院的学生，例如他们所热衷的喝彩、厕所笑话、经常酗酒和无情玩弄女人。



拉伯雷的《高康大和庞大格吕埃》（《巨人传》系列丛书）一卷中的卷首插图。

所有这些特点使拉伯雷作为醉鬼和小丑的名声常盛不衰。

如果是小丑，他就是一个非常博学的小丑。他的作品与中世纪的滑稽剧和戏剧有联系，而且成为文艺复兴所关注的许多问题的榜样。他在巴黎和蒙彼利埃居住，并去过意大利，所以他与人本主义接触密切。他是第一个在蒙彼利埃大学用希腊语教授古典希腊语的人。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大量创造性的滑稽语言，加上无尽的如同脱口而出的巧妙双关语和文字游戏。他的黑色幽默对当时发生的荒唐事做了无穷无尽的讽刺评论。

新大陆进口的贵金属。1566年，人类学家让·博丹的文章估计，与上个世纪相比，商品的价格上涨了10倍。他夸张地写道：从整体来看，尽管粮食在一个世纪里增加了700%，但年增长率仅为2%—3%。虽然与20世纪的经验相比，这看上去低得可怜，然而这就是早期现代社会环境下的经济考验：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它制造了赢家和输家。

对于商业高手，通货膨胀却能够产生利润。这个世纪发生了许多成功的故事，如都市贵族、商人、从事加工和管理的资产阶级的便便大腹就是见证。在土地方面，将地租以现金支付，那么不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整租金的领主就会受到损失，而那些以实物代租金者或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整租金的人就有机会干得很好。那些为食品市场而扩大生产的农民同样能够挣到[135]钱；那些“村庄雄鸡”，即交了好运的农民，不断在伙伴面前称王称霸。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而形成了资产分散低于自给自足水平的压力，小农被迫在卖方市场购买每日的面包。工资无法与物价同步，造成农村社会下层的长期贫穷，这从食肉明显下降中即可略见一斑。同样，城里所有拿固定工资的人——无论他们是仆人或是大学教授——都受到生活水平恶化的威胁，尽管比较贫穷的城市劳动者和制造业者受害最大。市政当局对街道上大群一贫如洗的农民、失业工人和一事无成者的贫穷困苦，感到日益焦

虑不安。自16世纪20年代起，他们就制定了穷人救济计划，对那些他们认为"配得上"的穷人提供救济金，惩罚那些"配不上"的人，尽可能为失业者提供工作。这些措施与问题的规模相比是不相称的，当时的人广泛谴责穷人丐帮造成瘟疫蔓延和城市骚乱。这些问题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

尽管许多人认为似乎是下层威胁破坏了文艺复兴社会的辉煌，但实际是社会精英内部的分裂终结了这一乐观时代。《卡托-康布雷齐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在法兰西国界内好战贵族卷土重来。他们整整两代人向意大利半岛大举侵略，他们的再度出现预示着宗教战争时期的内战重开。

宗教战争：从伐卢瓦王朝到波旁王朝

亨利二世（1547年—1559年在位）在一次比武事故中的去世，造成伐 136 卢瓦王朝的长期衰落。直到新王朝，即波旁王朝完全建立，才终结这一局面。亨利二世的继承人、多病的弗朗西斯二世（1559年—1560年在位）在位时间不长，在后来的15年中王位传到他弟弟之手，起初是年幼的查理九世（1560年—1574年在位），继而传给颇受非议的亨利三世（1574年—



1539年塞巴斯蒂安·格利夫所作的《里昂的布道施舍图》卷首插图的细部。16世纪早期城市在救济穷人上重新组织的做法广为流传。这是里昂的官员在向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发放救济品。

1589年在位）。来自佛罗伦萨的亨利二世的遗孀卡捷琳娜·德·美第奇从1560年就开始统治，她自1574年起担任摄政王，在宫廷政治中有权有势，直到1589年去世。一位外国妇女的统治——在一个日益赞赏法国身份，妇女在公共领域地位很低的国家中——加剧了王朝衰落。

正如在这种时期常发生的那样，政府成了家拥巨资、权势熏天和各省拥戴的贵族家庭的掌中玩物。他们或多或少都控制着国家各个部门——金融、法律、武装部队、教会——的要职，而且是皇家慷慨馈赠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拥有大量良田，通过代代相传的领主特权（税赋、经济垄断、司法豁免等等）控制着乡村社会。官官相护和相互提携巩固了大人物的权力；他们往往沾亲带故，是各省贵族的顶梁柱。一种奉献服务的封建骑士精神将保护人和侍从联系在对国家具有潜在威胁的关系中——获取对他们的军事支持，甚至反抗君王。保护人通过摄政委员会的影响，把获取馈赠、年金、官位作为维持他们保护体系的回报。伐卢瓦王朝的家庭问题使得这些根深蒂固的贵族生活的破坏性特点强烈地突现出来。

那么，谁是争夺统治权的贵族斗争的主要人物？宣称是查理大帝后裔的吉斯家族，可能是这些权力集团中最不安分、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个家族有两代人卷入了宗教战争（1561年—1598年）。当时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弗朗索瓦·吉斯，和他的兄弟洛林地区主教、法国最富有的教士夏尔·吉斯，掌握着1559年由卡捷琳娜·德·美第奇建立的摄政委员会的关键职位。弗朗索瓦的儿子们吉斯，公爵亨利、吉斯主教路易和马延公爵夏尔，在战争后期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自己评价为“基督教界第一男爵”的蒙莫朗西王朝，在1559年前很长时间就是吉斯家族的对手。新教徒加斯帕·德·克利尼集团在16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曾受摄政王的宠爱。最终，在15世纪中靠继承、婚姻和运气使，波旁王朝得以成为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封建王朝。当弗朗索瓦一世的侄女，也是法兰西小公国纳瓦尔的皇后冉娜·德·阿尔布雷嫁给波旁-旺多姆公爵安托万时，她确保了两个庞大家族的封建继承权结合到一起。他们的儿子纳瓦尔国王（1553 [137] 年—1610年）是16世纪60年代后期王朝斗争的主要角色，并且最终继承了亨利三世的王位，成为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1589年—1610年在位）。

皇室成员的冲突由于四个因素而加剧。首先，臣仆紧盯着其保护人转，为自己向他们提供的支持索要年金、馈赠和好处，而且经常倾向于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其次，各方都期望得到外国支持。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对吉斯的事业给予武装支持，当时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和低地国家也进行过 [138] 干预。第三，1584年，亨利三世的弟弟阿朗松伯爵的去世意味着亨利三世的婚姻没有孩子，也就没有直接的继承人。许多人竞相自称是继承人。例如有着卡洛林祖先的吉斯家族甚至宣称（有的说是通过法律渠道）于格·

137

巫师苏珊·戈德里

苏珊·戈德里，一个佛兰德斯当地人被蒙斯法院判处死刑……

在这同一天（1625年6月27日），在受刑的地点。犯人（苏珊·戈德里）已经被捆住，被训斥要她记住自己（为行巫术）所作的第一次忏悔……

——她否认所说过的一切……

——她感到自己被捆住，她想哭，说自己不是巫婆。

——据说……她宣称自己要当巫婆，没受到威胁。

——说她为此忏悔，她不是巫婆，她被拽住（到拷问台）不停地尖叫，说她不是巫婆……

她被更紧地拽到拷问台上，要她承认自己的忏悔。

——说这是真的，她是一个巫婆，她要承认自己的忏悔……

巫师审判的令人厌恶的记录表明这些受害者承受严厉的十字架审查和司法刑讯。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通行的司法程序进行的所谓询问规定未作忏悔就不能宣布处罚。

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晚期欧洲流行的询问审判方法可能至少宣判了10万桩死刑。法国北部和东部，还有低地国家瑞士和西德，提供了大量案例。他们之中如同苏珊·戈德里那样因巫术罪而被判死刑者，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妇女。这种倾向部分是由于妇女往往采用配草药治病及其他类似操作等出于善意的法术，这就被严格审查的法官将其与纯粹的巫术，包括与魔鬼签约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巫师形象——淫荡，热衷报复，因激情而多变，因理智而固执——与牧师和社会精英所树立的妇女普遍形象相距不远。

16世纪欧洲广泛的宗教不宽容精神，为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有效环境。17世纪由于宗教热情下降，审判数量也减少了。



1634年，因对卢登修道院的修女施巫术而被判刑的教区牧师于尔班·格朗迪埃被公开焚烧。

卡佩是篡位者！最有法律依据的人是竞争中的君主、纳瓦尔的亨利。这看来很糟糕。但更加糟糕的还在于亨利是个新教徒。宗教是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在宗教战争中点燃王室纷争之火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16世纪末期的内战是老故事；宗教使它成为新故事。国王和贵族的斗争，中央和外围的斗争，由于宗教改革而产生的天主教与新教（也称为胡格诺派）的教派分裂而纠缠不清。克利尼和蒙莫朗西家族，以及纳瓦尔的亨利和其他波旁家族都是新教徒，而吉斯家族则是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徒。



16世纪晚期匿名画家所作：16世纪最后几十年捍卫极端天主教的勇士吉斯三兄弟的油画肖像。中间的是洛林的亨利（1550年—1588年），右边是洛林大主教（1555年—1588年），左边是马延公爵（1554年—1611年）。

自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进行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分裂。如果不是交流更为便利的话，路德的信息在后古登堡时期的欧洲传播将是不可想像的。最重要的是1534年的"揭帖事件"：当时揭露弥撒的印刷品传遍巴黎，这使得王家政府制定了公开镇压新教的政策。自1523年以来有少量路德教派的信徒被焚于火刑柱，自1540年起审判四处蔓延。亨利二世加大了镇压的力度：1547年在巴黎议会建立了险恶的"焚烧室"来处理异教徒案件；1551年颁发了对路德派信徒判处死刑的法律；1551年同年，心怀嫉妒的反改革派耶稣会士被允许在巴黎建一所学院。

敌视新教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国外较为流行的不宽容精神，它嘲笑文艺复兴的人本观念。[139] 16世纪40年代，在阿尔卑斯山谷地区对韦尔多派异教徒的攻击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所谓的"疯狂巫师"也受到全面打击。许多人因与魔鬼般的反宗教人员为伍，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妇女；妇女同时也由于16世纪早期开始的有组织卖淫而受到攻击。特兰托公议会（1545年—1563年）同样转向天主教会对新教的看法，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像传播人文和文明价值观一样传播偏见和成见的印刷术，为敌意日增的宗教斗争添火加薪。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充分运用印刷术——采用印刷品、张贴画、木刻、书籍、画册——来作为口头表达（宣誓、辩论、表演、审判）和形象宣传（宗教仪式、列队游行、节日活动）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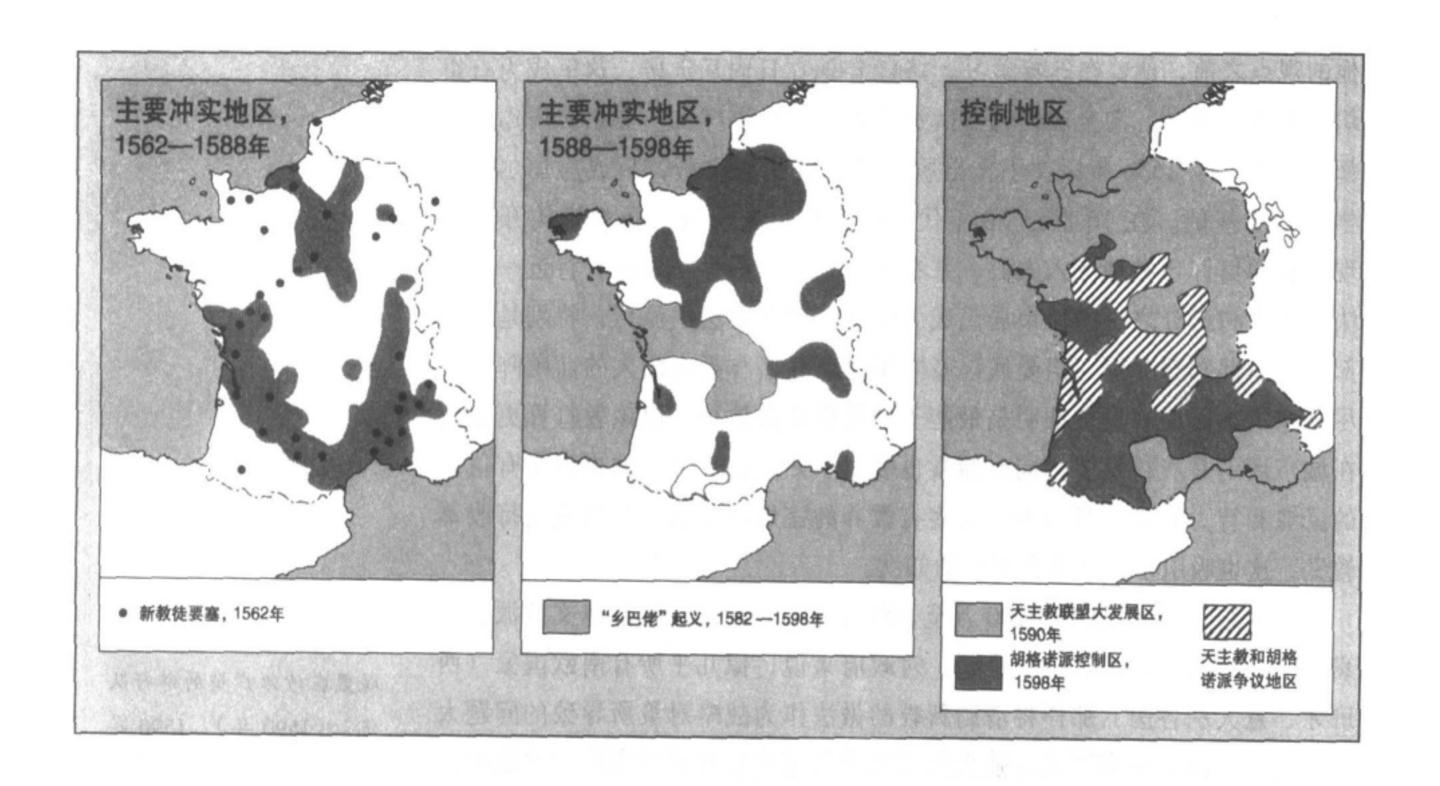
法国新教最终追随的是加尔文的道路，而不是路德的道路。让·加尔文出生于靠近贡比涅附近的努瓦荣，在意识到首都的不宽容气氛难以容忍

他的观点之前，他曾在巴黎学习。1541 年他在日内瓦定居，这里成为有组织的新教的罗马，向全法国和西欧派遣传教士布道释义。加尔文所作《基督教原理》于 1536 年以拉丁文出版，1541 年出法文版，后成为加尔文神学理论的基础。在 16 世纪 50 年代后期，广泛的全国性新教机构开始出现。新的信仰巧妙地深入人心，并在全国传播，赢得了可能有将近一半的法国贵族和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成为信徒，并在全法国流传；特别是在南部、西南部和普瓦图、诺曼底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拥有强大的前哨阵地。尽管塞汶山区的农民被证明是最能干的胡格诺派教徒，但该教打算更多地 [140] 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发展。同时新教也吸引了妇女；它强调的提高所有信徒的灵魂和智力特别有吸引力。某些有教养的宫廷命妇从一开始就支持改革教义，这也吸引了许多来自底层的妇女。

有着约 2150 所教堂、100 万至 200 万左右教徒的法国加尔文教派，给衰败的伐卢瓦王朝出了一个难题。对政府来说，像几乎所有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各国）那样将清剿新教的做法作为战略对策所导致的问题太大。另一方面，国家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采用某些日耳曼国家的“北欧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新教徒掌握了政府机构。王亲贵族（在经过一度徘徊后）、重臣高官、高级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和首府城市都是坚定的天主教。当国王转向宗教宽容态度时，这些集团让国王的政令不通来猛拖其后腿。

比奈尔画作《天主教联盟在沙滩广场的游行队伍》（1590 年）。1590 年巴黎的天主教联盟的支持者、1300 名全副武装的修道士，在教皇使臣面前游行，表明他们与胡格诺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宗教战争。在宗教战争初期几十年（左图）的宗教冲突，往往发生在倒新月地区，从西部偏南的拉罗歇尔通过阿奎丹和下朗格多克，然后沿罗纳河而上到达位于东部的里昂城北部。胡格诺派贵族，如蒙莫朗西，在这里有坚强的支持者；但这一地区的城市、（特别是）大学却是加尔文派信徒的温床。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战斗（中图）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巴黎地区，那里天主教联盟占主导地位（右图）。

在摄政期间，宗教和政治压力迅速露头。在1560年安布瓦斯篡政时期，胡格诺派教徒策划绑架年幼的弗朗西斯二世，好使他脱离年长的吉斯兄弟的影响。这一举动使出席普瓦西讨论会寻求两大宗教妥协条件的首相米歇尔·德·奥斯比塔的勇敢尝试功亏一篑。信仰自由的让步确实很脆弱，特别是在双方以鲜血划出了分界线之后。1562年，弗朗索瓦·德·吉斯在经过正在瓦西举行祭祀仪式的胡格诺派社区时，派出他的军队，造成了上百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妇女。

在1562年至1598年间，一连8场间以8次休战的黑暗宗教战争 141（1562年—1563年；1567年—1568年；1560年—1570年；1573年—1574年；1576年；1577年；1579年—1580年；1585年—1598年）冲击了国家。在上层政治之下，一个忏悔暴力和屠杀的恶性循环遍及全法国的草根阶层。起初武力斗争战线以城市为基础，但是很快战线本身就瞄准了来自上层贵族的“保护者们”。卡捷琳娜·德·美第奇企图以毫不退缩的胜利驾驭冲突，她于1572年故作姿态地来到声名狼藉的“圣巴托洛谬大屠杀”的天主教战场。她纵容谋杀著名新教徒，包括曾在巴黎为国王之妹玛格丽特与纳瓦尔的亨利结婚组织集会的克利尼。但后来事情变得无法控制，大约有3000名胡格诺教徒在巴黎被屠杀，接着有8000名在各省城市被害。纳瓦尔的亨利在巴黎皈依天主教，但一旦安全地离开首都，他立即宣布放弃信仰。这一举动使得教皇废除了他王位继承人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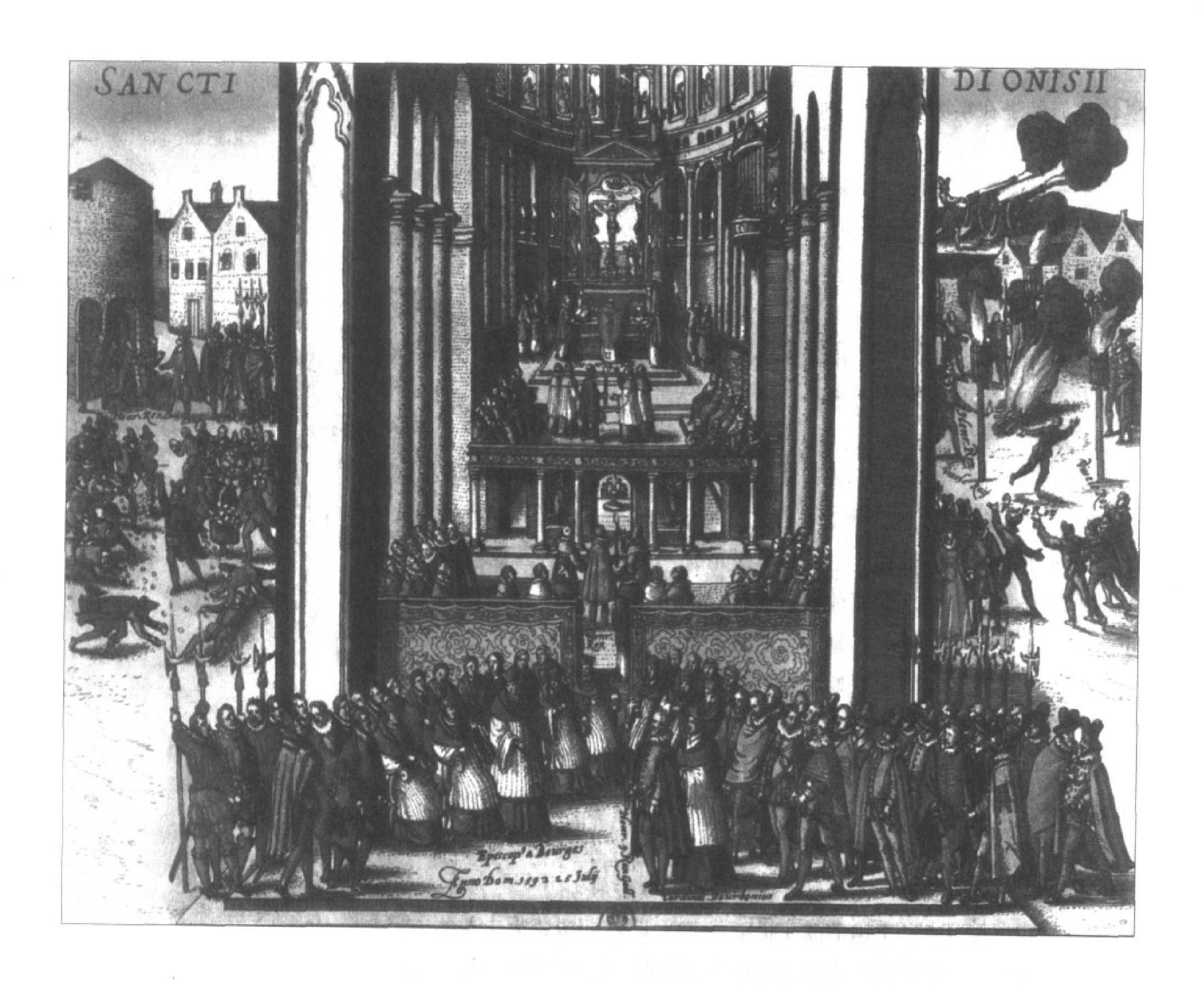
由于纳瓦尔的亨利看来不能被天主教徒接受，很明显又没有活着的伐

卢瓦继位人，斗争更是变成孤注一掷。在那些新教徒掌握政府大权的城市里，他们亲手在牢固的城墙后面挖掘战壕，作为自卫工事。极端的天主教徒在吉斯兄弟的煽动下组成了天主教团；他们反新教徒的攻击政策和日益激进的宪法理论，使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亨利三世。1588年，亨利三世使巴黎摆脱吉斯支持者的尝试，导致发生了亲吉斯的“街垒日”。当绝望中的亨利三世在布卢瓦将吉斯兄弟谋杀了后，统治巴黎的“十六人委员会”号召“诛灭暴君”，并大搞宗教恐怖；当时马延的伯爵组织北方城市加入了天主教城市会。亨利三世联合纳瓦尔的亨利团团围攻巴黎。由于天主教团的狂热支持者雅克·克莱芒遇刺，纳瓦尔的亨利才被迫解除屠城，巴黎人为此额首相庆。

1589年亨利三世之死看来造成了法兰西国家的崩溃。他临死时指定纳瓦尔的亨利、“萨利克法”规定的合法继承人为他的继任者，后者随即就拥有亨利四世的王号。极端天主教徒不予承认，推荐了许多其他候选人，并诱使西班牙出兵援助。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由于并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明确候选人，同时巴黎“十六人委员会”逮捕并处决了巴黎最高法院的成员，巴黎的天主教联盟社会极端派疏远了坚定的中产阶级支持者。天主教联盟宣传赤裸裸的城市民主精神，而亨利四世也可以不断依靠温和天主教——所谓的政治家。如果这意味着社会和睦，结束杀戮，他们愿意给新教留一席之地。“啊，巴黎！”一本巴黎出版的政治宣传册悲叹，“已不再是巴黎，而是野兽的黑漆漆的山洞；是西班牙人、瓦隆人和那不勒斯人的城池，是强盗、杀人犯和刺客的避风港、收容所……”

亨利四世保卫自己王国的战斗很艰巨。他1593年皈依天主教的决定，使他得到支持并为那些政治家的立场提供了依据。他于1594年在用自己特 [142] 有的语言做出著名的巴黎“值得为它做弥撒”的判断中进城。反对派逐渐分化，亨利后来用了四年时间对闹事者进行威胁、谈判，和收买他们的支持。他于1598年颁发的“南特敕令”是典型的双方折中的产物。信仰自由和权利平等得到圆满宣告，但基督徒只能有选择地在教徒势力强大的地方举行宗教活动；同时他们被允许在151个“安全之地”保留他们的城墙，作为宗教自主权的保证。

“南特敕令”对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具有更长远的合理性，而大多数当代人并未意识到：教皇尖刻地宣称这是“所能想像的最糟糕的敕令”；最高法院尤其关注敕令的宪法含意，鲁昂最高法院直到1609年才最终表示赞成。甚至人数从200万减到100万的许多胡格诺派教徒也很谨慎。针对国王的谋杀——在他统治期间大约有20次——继续此伏彼起。然而，这部敕令使亨利有机会于1598年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签署了《韦尔万条约》，从而终止了外国势力对法国内战的干预。《韦尔万条约》支持1559年《卡 [143]



这幅为日耳曼接见仪式所作的版画反映了亨利四世在圣德尼教堂做弥撒，宣布与新教信仰决裂。该图为连环画形式，可见国王在许多地方出现，例如在左边分发救济品，同时又在教堂里。

托－康布雷齐条约》的基本立场。法国几乎奇迹般地从40年的内战中走出来，而没有向贪婪的邻国做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然而，如果说政治结构很快地建立起来，那么经济确实处在十分糟糕的状况。贸易停滞不前，制造业的产量几乎下跌了一半。但这些战争并不是另一场百年战争：死亡人数有限，总体人口基本停滞而不是明显下降。然而，战争、饥荒和疾病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人口下降严重。战争与恶化的气候同时发生：1550年（可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出现了特点是冬天又冷又湿的“小冰河时期”。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农业收成减产和物价上涨时期（尤其是在1563年、1565年—1566年、1573年—1577年、1586年、1590年—1592年和1596年—1597年）。雪上加霜的是，在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开始流行鼠疫。这些灾难，加上国家对税赋持续不断的要求，触发了不满。因此在1594年至1595年

间，西南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所谓的“乡巴佬”起义；另一起类似的动乱发生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

亨利四世终结宗教战争的胜利表明，法国社会即使只是暂时地告别了建立单一天主教国家的目标，其代价是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和社会动乱。现在出现了建筑在渴望社会安定基础上的崭新政治版图，法国男人和女人焦急地希望知道和平与新王朝能带来什么。

第六章　从反改革运动到启蒙运动

144　起初，从伐卢瓦王朝到波旁王朝的更替，似乎对政权问题以及相伴而来的社会和经济紧张程度和后果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战争的精神直到投石党运动时期(1684 年—1652 年)才完全结束，这一时期的几大特点是国家破产、内战以及民众起义的组合。然而，在表像之下，重大的结构性改变正在发生，这主要是通过“红衣主教大臣”黎世留和马扎然。此二人在 1624 年到 1661 年路易十四掌权期间控制着国王参议会。主要归功于此前的几位国王，“太阳王”才能在从 17 世纪 60 年代到 1715 年驾崩这段时间内主导欧洲国际关系。然而他能做到这一切的代价是为他的继承人留下了相当多的财政、经济和政治问题。

如果说这段时期见证了从革命预备阶段到 1789 年革命这段时间政治风气的衰落，那么这一时期还包含了两个显著的文化运动：一个是反改革运动，它对法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个是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即这一时期源于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具有多样性的知识和文化运动。此外，启蒙运动在对待宗教和政府的态度转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而这种态度的转变对 1789 年革命有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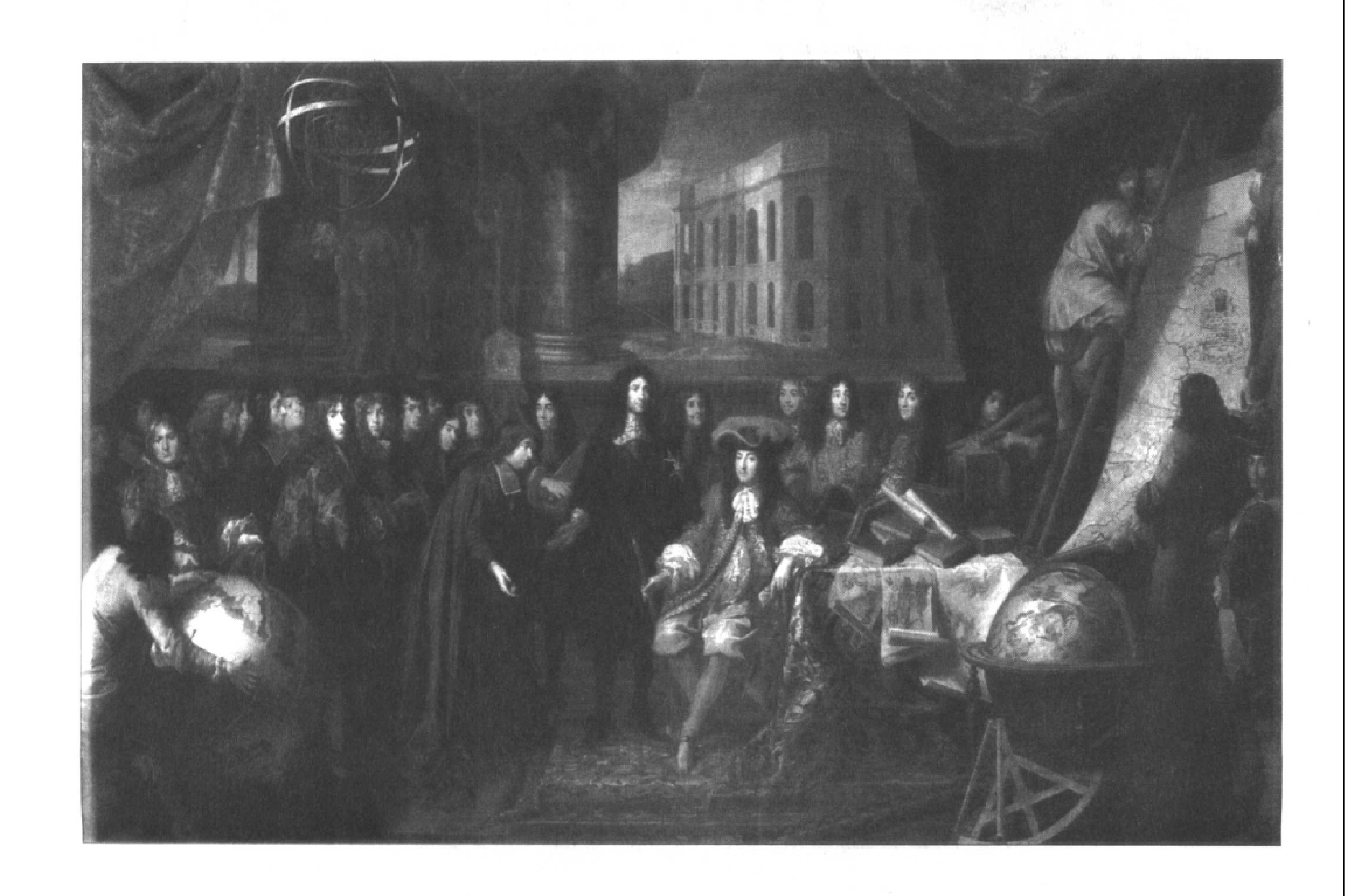
反改革运动

从伐卢瓦王朝到波旁王朝，法国朝代的更替以偏狭的极端天主教教义的胜利为显著特征。宗教宽容受到权位仍很脆弱的君主的挑战。实际上，直到 1607 年亨利四世才对其王权有足够的安全感，从而批准将其政权的根据地贝亚恩加入法国。这是 17 世纪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一方面法国君主的名望不断提升，以至于成为整个欧洲最有权势、声望最高的君主；而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则是天主教的复兴和宗教上的不容异说。这种反差从亨利的继承者路易十三（1610 年—1643 年在位）开始加剧，到 1685 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时达到顶峰。通过这一法令，路易十四（1643 年—1715 年在位）正式废除 1598 年的“南特敕令”，并重新把天主教确立为惟一的合法宗教。

1610 年，亨利四世被天主教极端狂热信徒刺杀。此后不久，通往“枫

丹白露敕令”的道路就开启了。第一个波旁王朝早先对于新教的拥护，是亨利四世能够抵制法国向极端天主教教义蜕化的保障。该教义因为人们对天主教联盟令人生厌的记忆而黯淡无光。路易十三则刚好相反，他生下来（1601年）就是天主教徒，把权力献给了圣母玛利亚；年轻时候娶西班牙国王的女儿、奥地利的圣安妮为妻，从而与哈布斯堡王室结盟。1620年，145路易十三受宠臣德吕依纳公爵的影响而作出决定，在当时还是新教地区的贝亚恩实行“南特敕令”（胡格诺教派在该地区的宗教信仰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南部地区广泛的武装反抗。国王坚信其建立国中之国的尝试，在1622年“蒙彼利埃和约”时将新教徒的保留地减少到两个城市——蒙托邦和拉罗歇尔。17世纪20年代，胡格诺派教徒愈演愈烈的反抗在1627年达到了顶峰。这一年，德罗昂公爵在朗格多克领导起义，而拉罗歇尔市的市长则与路易十三刚刚与之宣战的英国人结盟。尽管有英国人的协助，路易十三于1628年对拉罗歇尔的包围造成的饥馑，仍然使该市居民从3万人锐减到6000人。虽然1629年签订的“阿莱斯和约”再次肯定了1598年的宗教宽容，但集会的权利和新教保留城市的权利被撤销。

亨利·台斯特兰所作的《1667年科尔伯向王家科学院介绍路易十四》的绘画。1667年这一日期完全是凭空想像的，因为国王直到1682年才去参观王家科学院。为光大他的圣明而设的王家科学院，还起到国家科技咨询机构的作用。





路易十四听取穷人诉求的王家宣传画。图中文字将他比做所罗门、查理大帝和圣路易。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由路易十四主持的国家代表性机构正在消失：他在位期间三级会议从未开过会，许多省份的同类机构的活动也中断了。

阿莱斯时期宽容对待胡格诺派信徒反叛的决定，为国王带来了额外的好处，之后法国新教徒变得几乎比国王还忠诚，并且放弃了涉足政治。新教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威胁得到了有效的压制。在这一朝代，为了在“三[146]十年战争”（1618 年—1648 年）中对抗奥地利和西班牙而决定与新教的国王们结盟，这一决定似乎支持了胡格诺教派的立场。然而形势还远远谈不上稳定。尤其是在特兰托公议会（1545 年—1563 年）之后，天主教一直处于复兴的进程之中。该公议会以近乎反新教的立场明确了天主教教义，同时也开创了一场精神论战。教会想让大众树立起对正统教义的虔诚，因为大众日益明显地显示出对天主教教义的无知，从而极易转信新教。虽然这一教义从未被波旁王朝接受成为国家法律，但从 16 世纪末往后，特兰托的精神渗透了法国教会。

从 17 世纪 50 年代开始，路易十四本人对新教的敌视态度，也使胡格诺教派的地位受到削弱。1659 年之后，他禁止国家一级的教会开会，而省一级的教会也成为令人生厌的东西。有 600 至 700 个教堂（或称“寺院”）

被毁——这也许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最大规模的建筑物破坏运动。新教徒参加工作和进入行业协会的规定更加严格了。1676年，建立了一个皈依基金，它向那些重新宣布其信仰的新教徒提供少量的金钱。当贿赂手段失败，强力镇压就出现了。政府官员开始强迫新教徒们缴纳额外的税款；从1681年开始，驻扎在普瓦图的士兵们被安排到新教徒家里住宿。后者就是147众所周知的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这在朗格多克以某种令人欣慰的方式实行，因为在那儿，军人的野蛮带来了成千上万新教徒的“皈依”，当然其宗教改宗的真诚度值得怀疑。这一景象足以使得路易十四确信，全面摧毁新教的尝试在顺利进行。1685年，“南特敕令”被撤销，新教的牧师必须离开法国，新教信仰被禁止。

“枫丹白露敕令”的颁布受到了来自国内外令人惊讶的热情欢迎。然而路易十四所投下的新教徒能够被轻易征服的赌注，却使他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武力反抗很快被粉碎，但大范围的镇压仍不得不继续进行。这造成了大量移民，他们得到了牧师们的支持，后者提出的口号是：“离开巴比伦”。大约20万到25万人，大致相当于法国胡格诺教徒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许多人是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离开法国而去投奔法国的经济对手英国、荷兰和德国。镇压在塞汶山区激起了卡米扎尔战争(1702年—1704年)，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农民教徒进行了野蛮但却有效的针对政府的游击活动。

新教转入地下，“荒漠”时期开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15年路易十四临终之际，幸存教会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宗教会议在塞汶山区举行，预示着整个18世纪全国秘密组织的复兴。1788年，在大革命前夕，许多制定于1685年的限制被取消，此时新教教派拥有成员60万人。

根除新教只是17世纪复兴天主教派的目标之一。反改革运动在路德和加尔文之前就有了广泛的改革运动作为其根源。改革致力于消除教义的错误和对教义的无知，并且传播对上帝的虔诚，以达到社会的天主教化，甚至是基督教化。这场运动显著的特点是实行这些新准则的一般信徒，通过在世界上寻求基督教的完美，带来一场完完全全和清教徒鼓吹的一样彻底的“行为的改革”。这场运动后来在莫里哀的剧本《达尔丢夫》里被讽刺性地描写为伪善的所谓“虔诚”。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都在上演这部戏，在17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前期的圣礼会时代尤其活跃。

圣礼会由旺达杜尔公爵于17世纪20年代赞助成立，它由激进的牧师和非神职人员的网络组织构成，包括一些贵族的上层人士和巴黎的国家官僚以及各省的地方精英。这一组织采取秘密行动，麾下有50多个分支机构由巴黎总部协调行动。其活动分子们成为在“南特敕令”撤诏之前减少新教徒在地方的权利运动中的先锋。但是他们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范围很广

148

卡米扎尔

“我有许多灵感，所以我打算拿起武器，和我的兄弟们一起与我们的迫害者斗争。我将高举铁与火反对罗马教会的教士们，我要烧掉他们的祭坛……在薄暮黄昏……我们到圣安德烈·德－朗西兹家外面，执行我口中发出的另一项命令，就是让当地的教士去死，烧掉他的房子，推倒祭坛，焚毁教堂……”

这是卡米扎尔新教徒造反者最早的领袖之一阿伯拉罕·马泽尔的宣讲。1685年，他反对路易十四强制推行天主教，宣讲如何烧毁教堂杀害教士。在当时文化宗教冲突时期这种残酷做法司空见惯，1702年和1704年终于演变成中央高原脚南部余脉塞汶山区的公开起义。17世纪80年代王家龙骑兵迫使他们的牧师离开法国，使新教徒士气受到打击，失去领导。一个在（主要是农民的）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口口相传的流行预言和说法，使这场运动千年不衰：世界末日看来不远了。

地方管理者关于严厉镇压造反者的决定使得冲突升级。“卡米扎尔”们得名于“夜袭者”(camisades)一词，或因为他们身穿农民的紧身短衫（Camisoles）；他们盲目地跟从领袖们的灵感打仗。他们唱着圣歌（一种可能有效的精神战方式）与久经战火的军队打仗。由于塞汶山地和沼泽的地形使得正规军无法适应，他们取得了胜利。卡米扎尔曾多次尝试在军事上与他们的来自英格兰的信徒联合，那样他们将会成为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威胁。公开起义在软硬兼施中并未成气候，1704年告终；但零星游击行动持续了十来年。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塞汶山区成为重新抬头的秘密新教教会的据点之一。



一名胡格诺派教徒被迫签署皈依天主教协议。

的慈善活动：帮助穷人，探访囚犯，为妓女赎身，改革收容所，教育穷人的孩子，对宗教节日期间的亵渎施加压力，压制民间传说以免其发展为基督教之外的异教，等等。一大批新的慈善基金——收容所、弃儿养育院、妓女教养所、慈善学校等——是他们不朽的业绩。

虽然圣礼会的全国性机构在1661年被马扎然彻底破坏，但各地的活动分子在这以后很长时间仍继续着他们的道德说教和慈善工作。“虔诚”的目的在于使得虔诚的信念与社会要求的道德和精神需求相协调，得到广泛传播。这一路线也是后特兰托时期新教会和新生的世俗（或者说非僧侣）

神职人员所做工作的特征。新形式的激进虔诚主义在特兰托时代之后出现的教会中比较明显。起关键作用的是牧师的关注，而不是神秘主义的作用。充满想像力和活力的组织者们继续前进，比如红衣主教皮埃尔·德·贝律尔，他是奥拉托利布道会在法国的创始人；圣弗朗索瓦·德·萨勒，149 他是天罚会组织的合作建立者，也是《虔信生活导论》(1608 年)的作者，该书是后特兰托时代敬神方面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还有传教士遣使会和护士组织“慈善之女”的创始人圣万桑·德·保罗。这些法国实体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比如耶稣会，该会开办的学校专门为精英人物的子女提供教育。牧师的敦促在实施这些任务中成为典范。这是针对异教徒的，但也乐于帮助法国社会的贫困者，他们的需要教堂无法满足。比如遣使会会员和圣·让·厄德创建的天主教修会士就专门从事帮助乡村贫困者的任务。

反改革时期与传教相关的工作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这些活动由许多在现实中和宗教上具有相同偏好的女性所从事，如圣冉娜·德·尚塔尔——圣母往见会的合作创始人；或者圣·路易丝·德·马里亚克——慈善之女会的合作创始人。女性教育得到了特别关注：乌尔苏拉会吸纳了中层和上层的寄宿生，还有另外许多新的女教导会为穷人家孩子提供教育。类似的女性教会还从事穷人救济活动。典型的例子如圣万桑·德·保罗和路易丝·德·马里亚克创建的慈善之女会（1663 年创立），它是倡导信奉宗教的女性从事社会活动的先驱。这一运动使得收容所和慈善机构对病人的照料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这一运动也带来了新教会的气象。许多类似的组织接踵而上，并且渐渐接管了穷人救济工作。这一时期，宫廷贵妇和其他一些富有女性主持这类机构，还为其所从事的各项教育和慈善事业提供经济资助。

路易十四也很仁慈——虽然更多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他在 1670 年创立的老兵收容所——荣誉军人院，既是为了防止退伍军人在社会上制造混乱，也是对他们以往良好服役的奖励。这是一场收容穷人和其他被认为有危险的团体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路易帮助建立了“收容救济总院”的全国性网络，这一活动最初得到圣礼会的支持。他们不仅收容了穷人，为他们提供住所和保护，还同时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害怕工作的人进行改造。一系列压制性的王家法令出台了，特别是在 17 世纪 80 年代，那时反新教运动达到顶峰。这些法令专门用来收容吉普赛人、无业游民、疯人、所谓的女巫、妓女、少年罪犯和其他被认为不正常的人。从 1650 年起，建立了将近 200 个这样的机构。然而他们所收容的 10 万人仅仅是法令所针对的人群的一小部分。

宗教改革期间国王重新设立在俗教士的目标具有两重性。正如“穷人大收容”（M. Foucalt 语）所指，国王要求他们灌输社会纪律和正统精神。



“大禁闭”发展成卖淫和乞讨，这些人通常最终被运往法国殖民地路易斯那。上图是1687年巴黎的妓女和妓院老板——有些人的名字可在图中找到——从巴黎收容救济总院出发，在新奥尔良登陆。与妓女和她们的情人温柔告别形成对照的，是医生和药剂师（手执水蛭和灌肠针筒者）的苦涩表情，可能他们关注的是正在治疗中的性病。

特兰托公议会敦促建立了一批神学院，培养了一些杰出的牧师。从17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法国的主教开始建立教区神学院进行神职培训。这些神学院非常有效地培养了受到良好教育、经得起考验、热心而且对牧师职业尽责的教区牧师。以往的文盲、神职缺位、一人身兼数个神职以及对教义无知的比率大大下降。“好牧师”们，即那些良好的教区牧师，传播正统的信仰。他们的任务是培养教区内优秀而虔诚的基督徒——对国家来说则是听话、顺从的臣民。

还有大量证据进一步说明这些反改革的突击队确实对其教徒产生了影响。特别是私生子和婚前怀孕率令人吃惊的下降：18世纪初，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出生的100个孩子中只有不到5个是婚外生育。这表明对于虔诚信仰的鼓吹并非毫无作用，社会习惯的基督教化是非常有效的。17世纪末叶，在一个世纪前屡见不鲜的暴动和社会骚乱已经在各省衰落。这大概也和分布更为广泛的有效、热心的在俗教士有关，他们不仅能够管辖宗教意见，也能够左右政治舆论。

然而，天主教会为与国家建立这样的紧密联系是付出了代价的，特别是它冒着失去自主权和必须按照国家需要行事的危险。当神职意见过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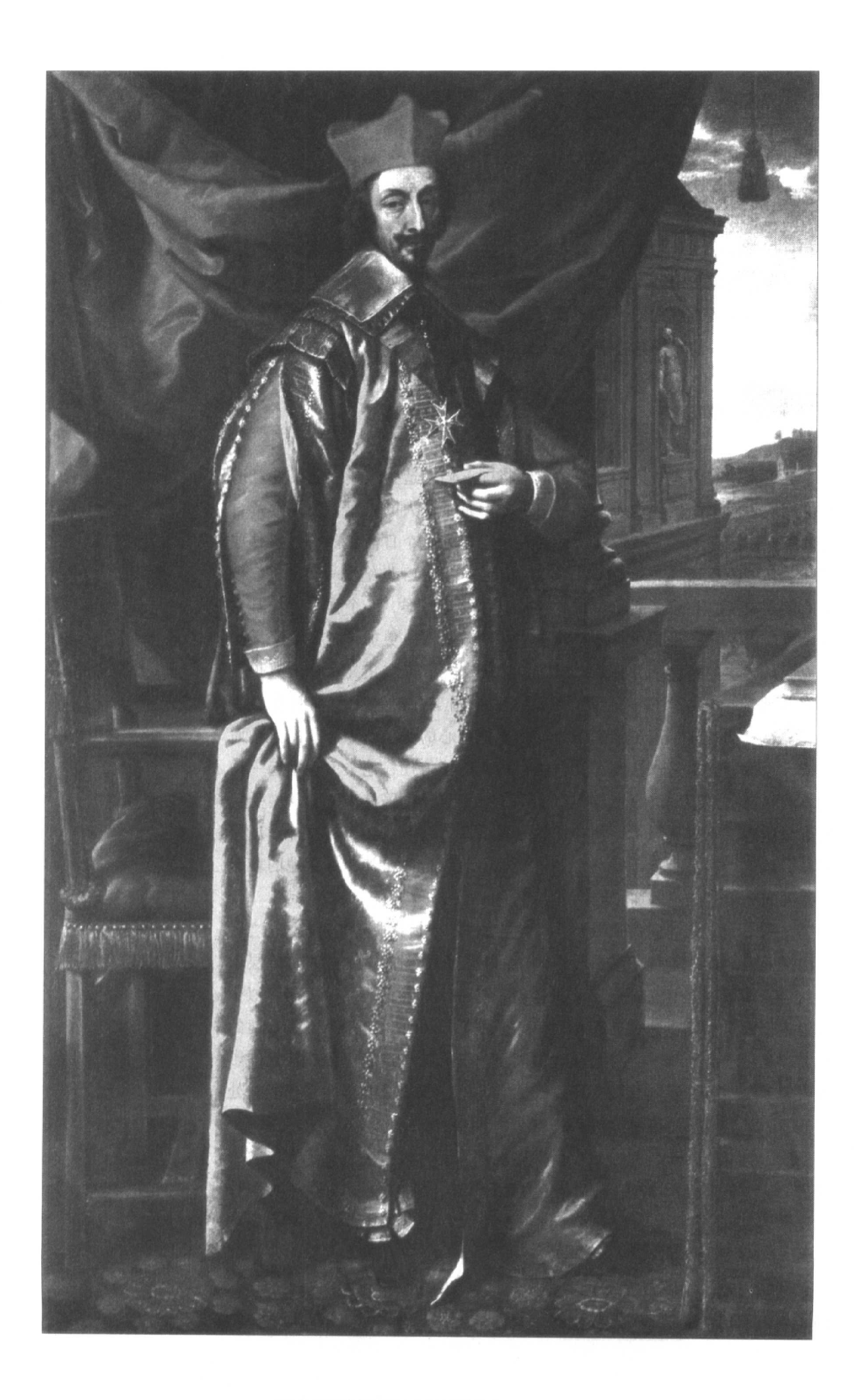
胁到独立的时候，国王毫不犹豫地剪除他们。1652年，国王逮捕了巴黎的大主教并把他关进监狱（即红衣主教雷茨大主教，被公认是主要的阴谋者）。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他还确信天主教的一种清教徒形式詹森派信[151]条是祸端，他觉得它使其信徒倾向于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他在决定建立其特权的时候，既不利用教皇也不利用法国教会。实际上在17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他曾领导法国教会几乎脱离了罗马。

专制主义的形成

“王室的权力是神圣的。……上帝将国王们塑造为他的大臣，并且通过他们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王冠不是某个人的王冠，而是上帝自己的王冠。”博絮埃主教的这些话强调了教会和这个日渐专制的国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专制主义一词当然不是新词，它与13世纪罗马法中主权概念的复兴有关，在宗教战争中得到传播。在那个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惟一可行的替代。那时的政治演讲更加强调需要毫无疑问地服从君主的意愿，并怀疑对君主权力的制约。人文主义者让·布丹在巴塞罗缪节前夜的大屠杀之后写道，“一个国王只对上帝和他的良心负责。”率直而现实的国王亨利四世遵循着他良心的指示，为了他的人民而皈依天主教。面对最高法院和其他既存机构的不信任，他努力建立起一种宽容的氛围，最后他终于能够提交了路易十四（经过路易十三）从中受益的王权版本。不过路易十四用神圣的光环刷新了它。虽然有君权神授理论存在，但这个路易可能不是一个圣人，也不认为自己是神，尽管他的表妹“伟大的小姐”讽刺地称“他就是上帝”。

路易十四采取的新形式专制主义的实施并不顺利。亨利四世遇刺之后有段时间由玛丽·美第奇摄政。摄政期的君权总是弱的，一个将军阶层于1614年号召募集社团的支持，更加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玛丽·美第奇似乎滥用了作为亨利四世遗孀而获得的信任，她把权力托付给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大利暴发户孔西诺·孔契尼和他的妻子莱奥诺拉·迦利盖依，他们的影响引发了洪水般的贵族起义。1617年，路易十三通过孔契尼突然遇刺并处死他的妻子以及流放玛丽·美第奇，证明了自己的成熟。

从17世纪20年代起，一个新人出现在国王参议会中：吕宋大主教阿尔芒·让·德·普雷西斯。他后来在1662年成为黎世留红衣主教。黎世留不仅做了20年首相（从1624年到1642年），而且留给路易十三和年轻的路易十四一个他的继承者——茹尔·马扎然。马扎然从前只是个教皇的外交人员，从1630年开始为黎世留服务，后来被黎世留提拔为红衣主教。直到1661年去世前，红衣主教茹尔·马扎然一直担任首相。从1624年到



1661 年，两位“红衣主教首相”在位所形成的政治优势，对于专制君权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收拾亨利四世残局的基础上，他们首先与宗教战争后的闹事分子达成妥协。我们看到的具有决定性意味的是，主张把新教作为国中之国，同时也堵住了吵吵嚷嚷的贵族们的嘴；但是第二点，他们也减少了代表机构的影响，并建立起了中央君权的机构框架。[153]

黎世留在创立专制主义方面被誉为具有超人的远见卓识。但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专制主义模式是从一系列复杂而矛盾的形势中零散地和偶然地产生的。而且改革的过程往往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战争。黎世留担心一个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权可能利用“三十年战争”（1618 年—1648 年）作为包围法国、建立欧洲霸权的工具。因此他把反奥地利和反西班牙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虽然这意味着必须与新教结盟，并且承担为其提供财政支持。

1635 年黎世留参战了。几乎从一开始战况就不好。1636 年皮卡尔迪的科尔比失守，帝国的骑兵先锋队包围巴黎，看起来真有西班牙从低地国家大举入侵的威胁。军事威胁夹杂在其他困难中间。到 1639 年—1640 年的时候，战事开始对法国有利。1643 年德·孔代亲王在罗克罗瓦对西班牙军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紧接着又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法军在北线逐步推进，同时占领了南部的鲁西荣和加泰罗尼亚。这些努力通过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取得胜利：法国自 1552 年实际上合并的“三个主教区”（梅斯、土伦和凡尔登）得到国际法确认；法国也得到了阿尔萨斯的一大块土地。1648 年后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直到 1659 年《比利牛斯条约》签订后结束。通过该条约，法国获得了南部的罗西荣和塞达涅的一部分，同时还获得了推进其北方疆界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英吉利海峡的加弗里纳和摩泽尔的提翁维尔之间，包含了阿图瓦和皮卡尔迪的大部分。

这些胜利是在法国军队进行了改革、政府和行政管理进行了重大改变之后取得的。法国军队虽然偶尔达到 5 万人，但在 16 世纪很少超过 2 万到 3 万人，17 世纪 30 年代大约在 2 万人左右。科尔比战败刺激了整个国家，使之拼命采取一切措施。到 17 世纪 30 年代末，通过强制征兵、召集令和雇佣外国军队，使近 10 万人走上战场。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到 17 世纪 50 年代后，军队力量已经达到了 25 万人。

这次军队规模上的“军事革命”（M. Roberts 语）导致发生向集权官僚政府的巨大转变。红衣主教大臣们在国王参议会中发动了一次政变，赶走了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得到位置的封建权贵，换上他们的自己人——那些忠诚、可靠、管理有效，而且愿意使个人意见服从于主人意志的人。参议会[154]的人事管理大大官僚化。国家事务由枢密大臣掌握，审查官辅助处理。后

（第 148 页）由菲利浦·德·尚帕涅作的黎世留画像。黎世留除了在中央政府担任发挥作用的职务之外，在反改革运动中也担任了重要角色。他 1606 年任吕宋岛主教，1622 年起任红衣主教，在其教区内多次领导反胡格诺派的传教活动。

者是大臣们挑选管家和代理人的苗圃，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就被选派到各省监督国家机器的运作。虽然这些官员早期为君主所用，但在黎世留时代，他们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从而减少了贵族家庭的自由并建立起各省的权力基础。他们的权力不断扩大，例如从1642年开始，他们被授予广泛的估算和收取直接税款和人头税的权力。审查官开始对每一个财税区进行仔细检查；他们也涉足军队，监督高级将领，检察纪律和军需供给。

这次因战争需要匆忙上马的行政改革非常不受欢迎，甚至超过高额战争成本。从1630到1648年，税款增加了3倍，增加最明显的是在1635年前后；到17世纪末又增加了50%。这还和一系列财政战略措施相关：降低政府债券的价值，特别需求税，借贷，货币贬值，等等。最受欢迎的措施是出售财政或者司法机关的官位或者职位。亨利四世1604年采用的被称为“官职税”的措施——从而使官位可继承——标志着迈向国家操纵卖官鬻爵的重要阶段。虽然官位曾经被作为一种奖赏，高层贵族在宗教战争期间曾用它来奖赏代理人，但国家的控制使得官位持有者在政府稳定而不是动荡上获利。国家珍视这一制度，因为它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官僚。16世纪这样的官员有1.2万人左右；到1650年有将近5万人。通过这个途径获取的国家收入从17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增长了4倍。

然而这种规模的卖官产生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官员拥有减税的权力，因此这些职位人数的增加导致了国家税收基数的减少。这一体制可能会使行政官员把他们的职位当作私有财产而不是一种公共职能；官位提供过滥致使其市场价值降低，于是先前的买官者抱怨其投资缩水。任用审查官的本意在于使官僚机构的工作更加有效，但却被看做干涉私有财产而激起了怨恨。军队中审查官的角色使司令和将军们产生了敌意：“以剑为贵”的老贵族憎恨“以官袍为贵”的新贵族。后者在官僚机构拥有好工作，而且现在似乎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力。亨利四世在向经济上困难的各省贵族发放养老金和救济品方面非常大方，但到17世纪30年代，国家已经没有现金可以显示慷慨了。战争把国家推到墙角：它正在失去社会上最有影响的阶层，即贵族的本能的支持；而同时又激起了自己雇员的反对。国家财政的需求引发了一系列望不到尽头的骚乱、起义和暴动。从17世纪头10年到1648年，每一年在法国的某个地方都会有一次波及甚广的针对税收政策的骚乱。有时候，像1636年卢瓦尔河与加伦河之间的克洛堪（乡下佬）农民暴动（它可能是自1358年扎克雷起义以来最大的农民起义），或者像1639年诺曼底的“赤脚汉”起义那样，这些骚乱常常蔓延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这一时期，政府不得不学会在不得人心的环境中生存。例如，那时有



17世纪无名画家的版画，描绘了战争的恐怖。在"三十年战争"中（1618年—1648年），一支脱离了土地而生存的贪婪军队给平民百姓，特别是给法国东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很多针对黎世留的暗杀阴谋。他的反对者常常被描绘为一群保守自私的人，玩弄"圈外人"对"圈内人"的游戏。然而双方之间在政策上的确存在很大的分歧，在1630年取代红衣主教大臣的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马里亚克兄弟——御玺官米歇尔和军队司令路易——成为反对黎世留政策的核心人物。他们和反对法国与新教国王结盟而希望与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室联合消灭欧洲新教的"虔信者"圈子的人联合起来；他们还获得了国王的弟弟、惹是生非的奥尔良的加斯东的支持，还有国王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1629年—1630年间物资匮乏造成的穷困引起了另外的争论，该争论支持摒弃黎世留的战争优先和中央集权政策。在1630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中，似乎路易十三采纳了马里亚克的观点，黎世留失宠。然而，国王又突然改变主意，重新支持黎世留。所谓的"愚人日事件"使黎世留的权力更加稳固，并且允许他清除异己：米歇尔·德·马里亚克因叛国罪被斩首，他的兄弟路易被流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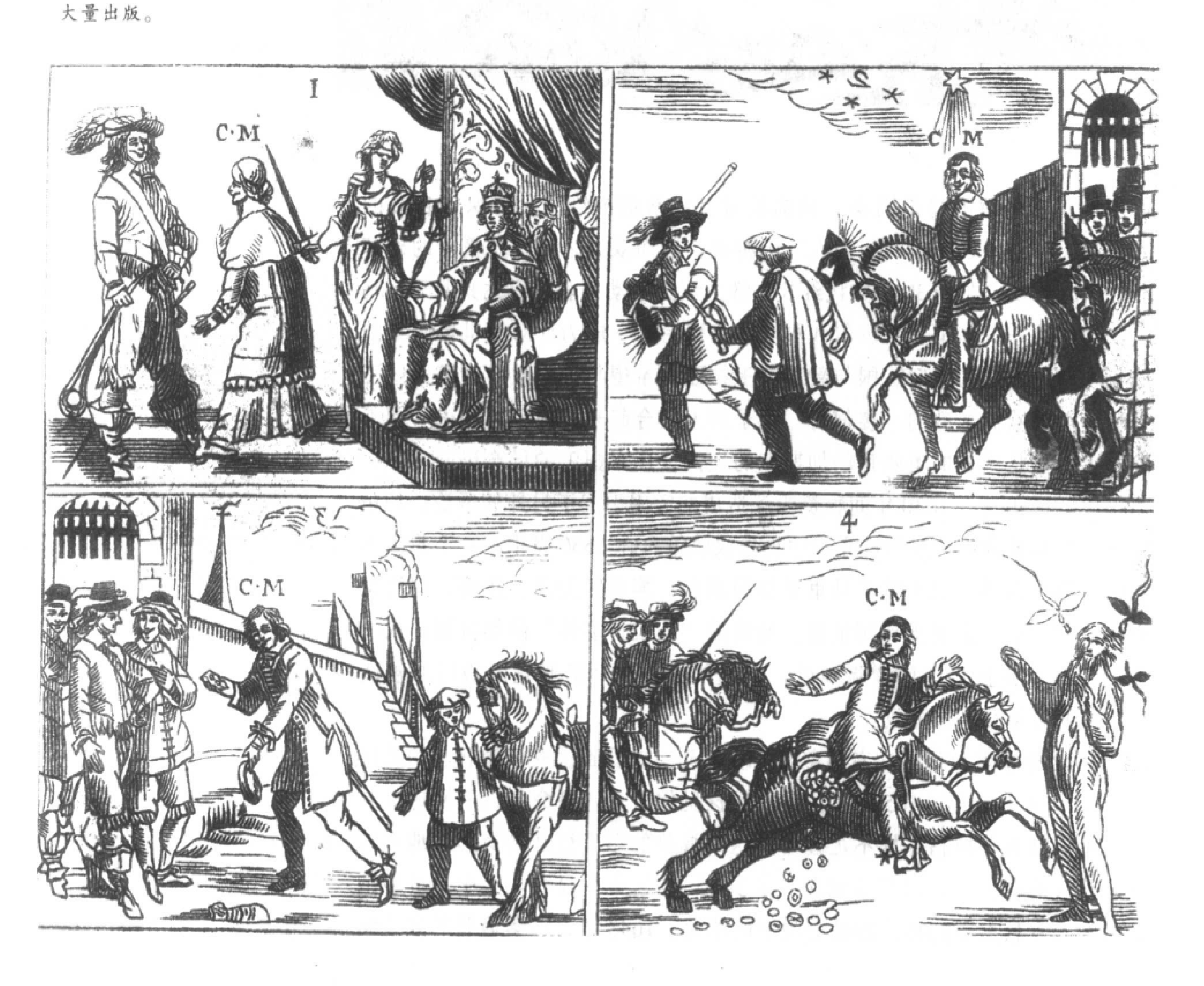
1642年黎世留死后，专制主义的基础又一次受到挑战，最著名的是投石党运动（1648年—1652年）。虽以小孩玩的投石弹弓命名，然而这次内战远不像其名称所指那样不足挂齿。这场战争的军事行动给受影响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巴黎盆地和波尔多周围地区更为显著。其中更危险的是与红衣主教大臣们相关的整个政府的革命。1648年，对奥地利的战争结 [156]

这部投石党运动时期（1648年—1652年）的喜剧风格的连环画上描述的是来自奥地利的摄政王安娜的首相马扎然。1651年他被迫流放，与年幼的路易十四告别（左上图），离开巴黎（右上图）。但他在勒阿弗尔驻足，释放了孔代王子领导的他过去的政治对手们（左下图）。在他离开法国时，被杀害的孔契尼的鬼魂出现在他面前。投石党运动时期政府舆论审查放松，攻击马扎然的政治漫画小册子大量出版。

束。这使得马扎然（黎世留的继任者）这一愿望失去了意义：想通过征税来满足继续同西班牙争斗的财政需求。巴黎最高法院争辩说，在摄政期间国家税收的异常提高是违反宪法的。这一时期路易十四还是未成年人，政府掌握在其母奥地利的安娜和马扎然手中，而他们二人都是外国人。

1648年，最高法院联合了“剑派”贵族。这些贵族希望利用对马扎然征税需求的普遍不满来赶走他，他们暂时使得国家从政府改革的路上撤回来。审查官被召回，并被宣布为违宪；马扎然自己也被流放（到1652年被三次流放）。有一段时间，卢浮宫里年轻的路易十四似乎成了巴黎暴徒的囚犯。然而，事实证明，要使“剑派”和“官袍派”贵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更中庸、不那么集权的国家基础是不可能的；而且，1652年马扎然和奥地利的安妮又重掌政权。然而17世纪50年代麻烦不断：红衣主教德·雷茨的被捕引发了巴黎所谓的“牧师的弹弓运动”；最高法院继续谴责政府的宪法地位；地方好战的贵族举行暴动集会，而大众的抗税起义一直持续到

157



1661 年路易十四（1643 年—1715 年在位）主掌政府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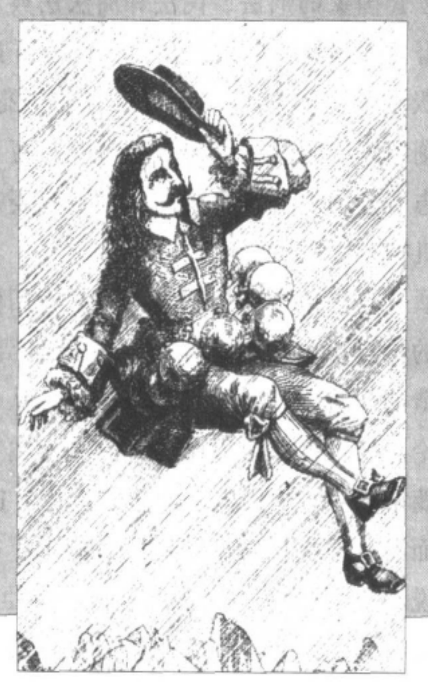
国家在长期斗争中取胜的部分原因是它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具有优势。16 世纪世袭贵族在地方举起起义大旗，他们以恩主身份和血族关系征召武装党羽，与王家军队竞争。然而到了 17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没有一个世袭贵族能与国家控制的、经过“军事革命”的庞大军队竞争；而且国家军队可以定期为国内政策服务。黎世留为实现他的目标，不回避利用国内暴力。他处死了一个蒙莫朗西贵族，因为他竟胆敢公然反抗对于贵族决斗的禁令。其他的国家敌人被处死或者监禁，主要关押在巴士底狱。例如詹森教派领导人圣西朗神父从 1638 年到 1643 年间被关在狱中。

但是红衣主教大臣们所实施的变化并不单单是靠武力实现的，他们也设计出一些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来使新的政府形式获得支持。他们小心翼翼地防止代表机构成为王室政策反对者的活动舞台。三级会议于 1614 年以后再也没有被提及过（直到 1788 年—1789 年间的危机时期）。另一个伪全国性代表机构，即贵族大会，在 1626 年以后再也未再召集过。神职人员大会受到密切监视。地方那些持有不同政见阶层的会议也未曾再举行（多菲内 158 自 1628 年后，诺曼底自 1655 年后，如此等等）。在投石党起义之后，最高法院提起针对王室法令是否符合宪法的争议的权利被严重削弱，以防止其

西拉诺·德·贝热拉克

西拉诺·德·贝热拉克（1619 年—1655 年）远不如大鼻子江湖英雄或是浪漫小说家埃德蒙·洛斯兰的剧本（1897 年）以及近来出名的人那么光彩夺目，千变万化。他是一个小贵族，军队军官，出名靠的是决斗和吹牛；还是一个能写几笔的文化人，在文学和科学领域做出了独特和不同寻常的贡献。

自 17 世纪 30 年代起，他与巴黎的自由思想家们建立联系，在与伽桑狄和笛卡尔及其他人的接触和冲突中他掌握了唯物主义观点。他还热情地投入到科学革命的辩论中。由于黎世留对知识阶层的审查制度日益加强，他的那些最大胆的著作只能在其死后以简写本出版。他为新科学的合理化主义带来了绚丽的想像力。他的《月亮王国》（1657 年）和《太阳王国》（1661 年）可称做，也曾经是太空旅行和早期科学幻想的预言。尽管有些典型的大胆夸张的段落被指责为鼓吹奇迹和巫术，他们还是为当代天文学和物理学提供了想法，引起了辩论。



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的太空旅行：他的《月亮王国》一书 1709 年版中的插图。

成为反对派的掩护者。

言论不仅受到压制，而且受到捏造和操纵。黎世留的审查制度将法国那一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莱恩·笛卡儿逐出法国；他的著作《论方法》发表于1637年。黎世留利用雇佣的文人为政府做宣传，并且还雇了一群好争辩的小册子的作者。他准许蒙特利尔的一个内科医生兼乐团指挥。有趣的德奥法斯特·雷诺多于1631年创办了第一家全国性报纸——《法兰西报》，该报专门为官方新闻做宣传。黎世留对文人的资助体现在1635年法兰西科学院的成立，它被用来支持纯正的法语。他和马扎然还鼓励和资助那些吹捧他们和王朝功绩的剧作家、画家和建筑师们。路易十四在挟艺术以为政治服务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

1661年马扎然死后，路易十四决定不再任命首相，而由自己直接统治。这相当于为那块红衣主教大臣们辛辛苦苦混合好成分的蛋糕最后浇上糖衣。它代表了一种高度集权的政府：国王的大臣们各自单独向国王汇报工作。对那些野心比地位还高的人，1661年被路易判处监禁并破产的那位过分自信的财政大臣尼古拉·富凯算是一个前车之鉴。路易十四表彰那些忠诚、高效的大臣，利用马扎然为他留下的能干的官僚们，让·巴蒂斯特·科尔伯可不是其中惟一的一个。国家参议会被进一步精简。各省的审查官被固定下来；最后一个任命永久审查官的地区是1689年的布列塔尼。他们都有各自的副代表做助手，这些副代表听从审查官的命令。科尔伯致力于创建国家的刑法、民法和商法法典。地方权力机构受到上级更加严密的监督。在路易十四最直接感受到投石党骚乱的巴黎，1667年任命了一个大臣级别的警察总监，专门负责减少犯罪和参与城市建设；而在地方各省，则组织了国家骑警队。救济所与穷人习艺所相结合的网络遍布全国，这标志着全国性济贫政策的一种重要姿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机构。

通过自己担当首相职务，路易十四使得所有那些哪怕最顺从的政治反对派的论点再也站不住脚了。从1624到1661年间，王室政策的反对者们所编造的礼貌说法是，是他们把国王从他的大臣们手中“解救”出来。但这一论点已不再可信。1670年在布洛内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或者1670 [159] 年在朗格多克对于历史上的达尔达让（1611年—1673年）叛乱的惩罚，更是显而易见地将反对派和叛国者画上了等号。当时的超级思想家博絮埃主教的说法是，“不管王子如何不好，其臣民叛乱都更有罪”。

王权的专制本质和家庭中父权发展密切相关。国家的发展方式对男人

和女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新教和天主教都以“神”的名义强调历史悠久的家庭在女性生活中的地位。有句古老的名言“要么嫁人，要么进修道院”，对于新教的女性来说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没有为她们准备的女修道院。特兰托公议会强调女性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设置修道院的重要性；或者至少给那些在社会上活动的女性，如慈善之女那样的组织，一个抵抗肉体欲望的盔甲。在妇女性纯洁的名义之下，新教和天主教领导了一场反对有组织卖淫和任何形式的性越轨的运动。



参加1651年举行的巴克科斯酒神节狂欢晚会时，身着太阳神阿波罗服装的年轻的路易十四。

国家支持这些运动，增强了家庭在控制和管理女性成员行为方面的作用。就像穷人和不正常的人被限制在收容救济所里一样，妇女和儿童为家庭权力所限制。大约在1550年到1700年间，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加强家长的合法权力，并且常常用与波旁王朝的宣传家们用来描述君主的“绝对王权”等相同的语言来证明其合法性。1666年的一道敕令阐述称：“婚姻，是国家力量和庄严得以产生繁衍的源泉。”父权在民事上而不是在宗教法庭上受到支持，它涉及到两性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配偶的选择、财产和遗产方面的权利、离婚，等等）。这种状况促使法庭支持男性对于从属于他的女性拥有更大的控制权。1684年，父亲被允许使用可以绕过法庭的王家授权，来将那些他认为违反了传统的性道德或者破坏了家庭荣誉的人送进监狱或者修道院。这种“家庭－国家契约”（萨拉赫·亨雷语）使得王权自身的概念更加家长化。一个律师指出，“国王是公共利益的丈夫和政治配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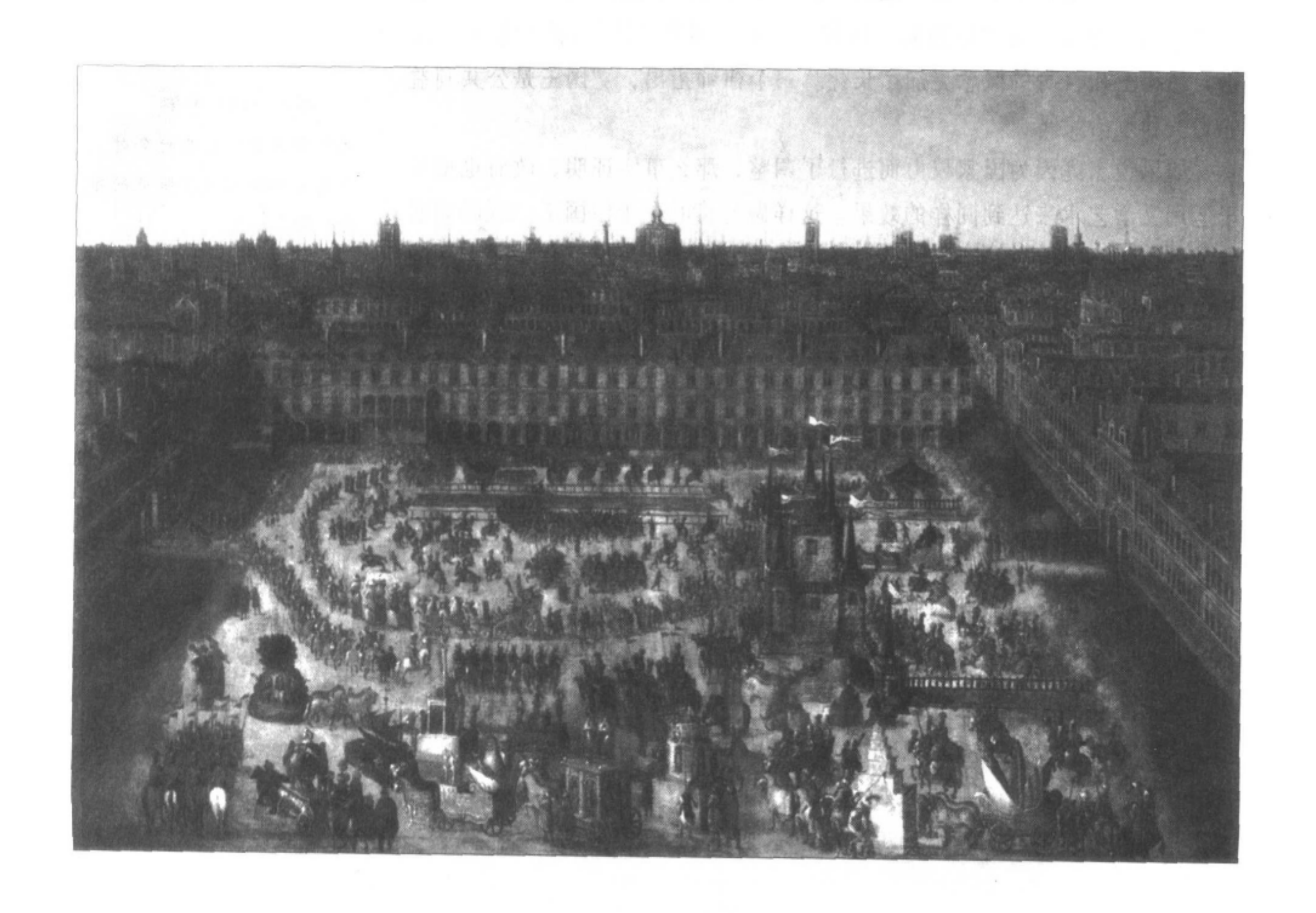
如果说家庭因为国家权力而进行了调整，那么事实证明，政府也擅长于运用文学艺术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国王“耀眼而宏伟”，就像博絮埃说的那样：以此来“使人民尊敬他”。城市化是受关注的一个领域。亨利四世通过在巴黎修建项目来吸引人们对于其权力的关注。比如，他完成了新桥——巴黎第一座跨越塞纳河的大桥，之后在桥中间安放了他骑马的塑像；他还开始修建王家广场(现在的孚日广场)。路易十四的忠臣科尔伯提醒他：“陛下知道，在没有显赫的战争行动时，没有什么比建筑更能体现国王的伟大。”路易十四对此应付自如：重修了卢浮宫；新建了路易大帝广场（现在的旺多姆广场）和胜利广场；在老城墙堡垒的位置上修建了林阴大道；荣誉军人院、天文台和许多其他建筑也纷纷建起来。在这种城市化的促动之下，巴黎城市人口增长到50万以上。但是，这种繁荣还是因为路易兴建凡尔赛宫而显得黯然失色；他于1682年将王室迁入凡尔赛宫。 160

凡尔赛宫被全欧洲雄心勃勃的专制君主所复制，从波茨坦到汉普顿王宫，从斯堪的纳维亚到那不勒斯。然而砖瓦砂石只是王宫作为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机制的一个方面。国王自己在一种“国家戏剧”的中心，作为主

角表演一系列权力的仪式。王宫中的生活方式——辉煌而庞大的王室，仪式化的公共活动，日常生活的表演，乃至起居餐饮——都被当作权力的效果而被贵族和其他竞争国家的君主竞相仿效。太阳的隐喻——凡尔赛宫绘画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是为了制造“太阳王”而采用的，所有的权力和景观都在“太阳王”的照耀之下。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古典风格上。王宫聚集了如此多的财富和声望，以至于最高级别的贵族也想居住在那里。路易十四修建了一个镀金的笼子，宗教战争中狂暴的武夫在那里变成了太阳王身旁的纨绔朝臣。

1612 年在巴黎举行“骑兵竞技”——一种王室和骑士风格的消遣活动——以庆祝路易十三与哈布斯堡公主、奥地利的安娜的订婚。这一活动是在当年时尚的王家广场、今天的孚日广场举行的。这里的建筑是亨利四世从 1604 年起开始营造的。

当古典式的对称将一片原本前途无望的沼泽变成欧洲最伟大的宫殿的161时候，王室也开始进行教化和文化“复古”。路易十四在其统治的头 20 年中，出现了两个法国历史上文学最多产的时期，还有数量最多的重要人物——高乃依、拉西内、莫里哀、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和拉封丹。他们享受政府津贴，科尔伯使之成为制度。路易十四将画家和历史学家带上他的军事战场，因为他想控制那些反映他权力的东西。所有媒体都被用来赞扬君主，甚至利用肖像、史书、勋章和硬币、宫廷芭蕾（路易直到 1679 年一直是他自己的首席舞蹈家）、骑士塑像、凯旋拱门、外交通道、触摸以



消除“国王的魔鬼”的庆典，所有这些都为路易十四增添了光彩。法兰西喜剧院于1680年建成。路易十四沿用黎世留在学术方面的观点，并把它运用到知识和文化的专业分支中：1661年成立了舞蹈学院，紧接着又成立了碑铭（1662）、科学（1666）、建筑（1671）、音乐（1672）学院。这 163 些学院设立了评价标准，就像在国王的指导下组织起来学习上面提到的学科。

在将重要的科学变化介绍到公众领域方面，国家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7世纪，西方知识界正经历历史学家们所称的科技革命。与开普勒和伽利略联系在一起的天文学的进步，导致产生了宇宙是以太阳而不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新概念。威廉·哈维在人体血液循环方面的研究改变了以往

161

病人德·塞维涅夫人

“在治愈后，”德·塞维涅夫人对她的一个侄子说，“我把健康作为头等大事。”然而在她那个时代，医生们受到剧作家莫里哀的无情讽刺挖苦；况且人们普遍认为医生杀死的病人多于他们治愈的病人，她的健康又如何得到保证？

书信作家和宫廷贵族玛丽·德·拉布丹－尚塔尔，即塞维涅伯爵夫人（1626年—1696年）。她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位妇女如何回答这一致命问题的格外丰富的说明。她对疾病的重视通过她试图向自己最爱的人，特别是她可爱的女儿德格利昂夫人，提供最神奇的健康忠告而体现出来。

德·塞维涅夫人对那些在莫里哀作品中被描写成知识渊博的医生表现出流行的蔑视。巴黎医生喜爱对各种疾病采用的治疗方法是放血，然而德·塞维涅夫人血管太细，很难扎针，是不易放血的人。她看不起宫廷和首都中最受尊敬的放血医生，还有那些被捧得很高的医生，如因成功治好了路易十四的痔疮而名声大噪的费里克斯；时髦的男接生婆茹贝尔；以及推荐各种东西，从蛇粉、虾眼到人尿的药剂师们。她无休无止地尝试着饮用各种类型的“水”：祖母绿宝石的、鸡的、匈牙利女王的、火药的，等等。她还是温泉城市，如维希、阿利兹圣莱那的居民。



一名外科医生摆弄好一位夫人的手臂，准备为她做静脉切开放血。

和宫廷中许多人一样，德·塞维涅夫人对那些非正统行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他们有些药方具有长久的价值，如英国人、“骑士”托博特以支持使用奎宁而出名。但一些夸夸其谈的骗子也受到她的接待，包括各种鼓吹神丹妙药的卡普辰修会教士。来自路易十四著名的财务大臣的母亲德富凯夫人的各种民间药方和建议都被她认为是睿智的。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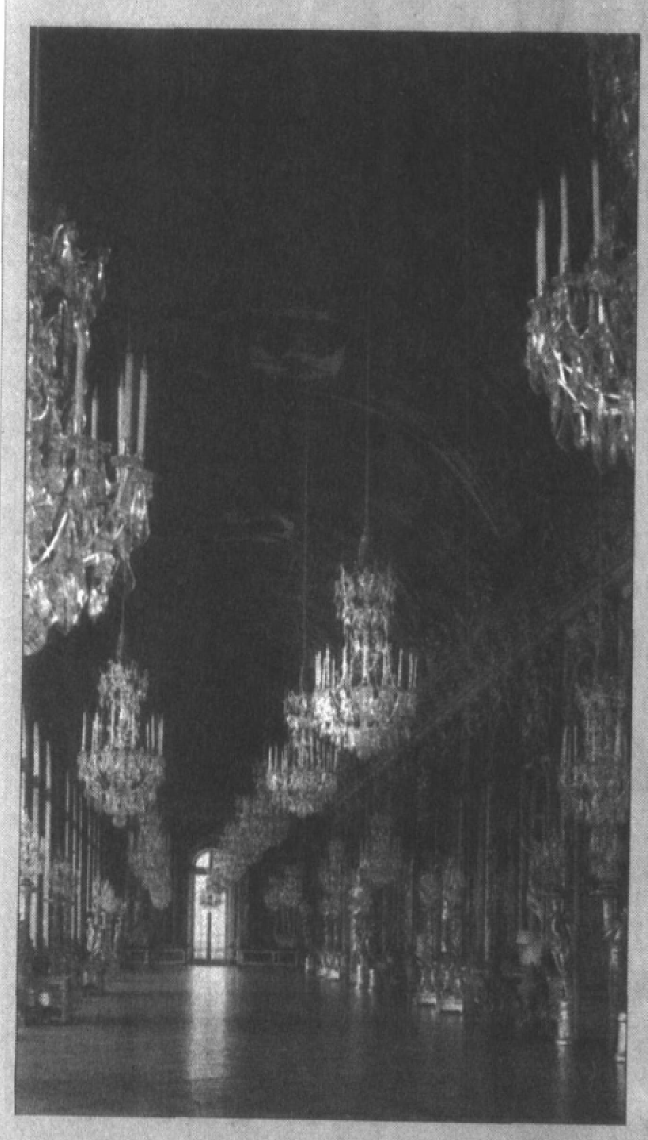
凡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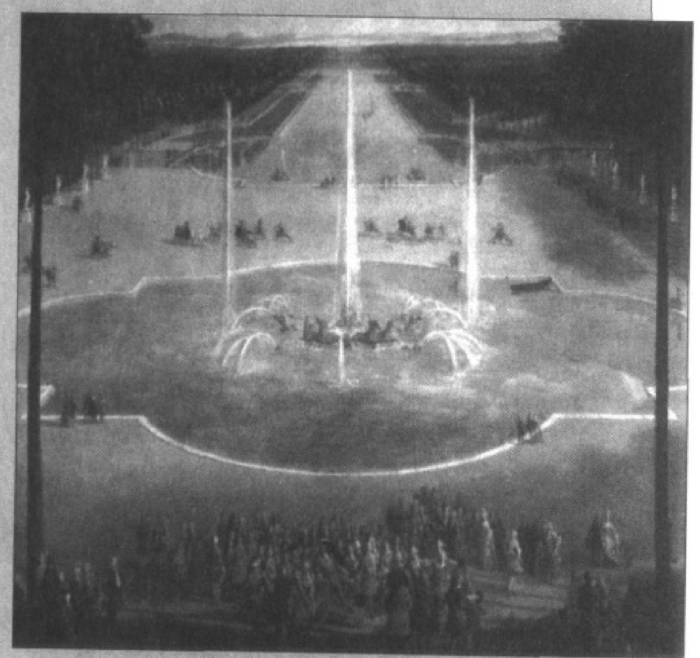
“凡尔赛，最悲惨恶劣的地方之一，没有视野，没有森林，没有水，没有土地；所有的一切，只是流动的沙地和沼泽，因此没有空气，在这里没有什么好处。”

路易十四时，在凡尔赛的宫廷中最高傲的编年史家圣－西蒙的这段酸楚的评论并非没有依据。该地区环境恶劣：1661年至1682年间大批在此施工的工人死于瘴气弥漫的沼泽地。在此期间，这个只有路易十四的父亲路易十三的简陋狩猎小屋的地方，被改建成了法国历史上体现政治权力的最宏大的建筑之一。

路易本人喜欢这个地方。在经历了投石党运动（1648年—1652年）的黑暗岁月后，当时还是孩子的他被那些喧嚣的巴黎臣民投入杜伊勒里宫，他仇恨巴黎。为了将宫殿建成出众的艺术之地，他吸引了当时最著名的大师：园林设计大师勒诺特尔，画家查理伦勃朗，建筑师勒沃和芒萨特，喷泉设计师弗朗西纳兄弟。在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国王将超过5%的国库收入用于该建筑工程。在军事战役中，他为宫中的柑桔树苗和织锦挂毯而操心。他甚至为宫中的花园编写了导游说明。

“我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托付于你们，这就是我的名声。”路易对他的艺术科学院成员的讲话，凸显了政治事务的分量。凡尔赛宫是王朝自身的光环，而不仅仅是私人的休闲之地。路易通过让他的高官显贵们居住在那里成为宫廷亲信，而他自己则处于永恒的接受觐见的状态。他在那里召见使臣，举行盛大的欢宴舞会，为穷人触摸驱赶“国王的魔鬼”：凡尔赛宫成为炫耀路易个人荣耀的看得见的放大器。





（上图） 1713年—1714年让－巴蒂斯特·马丁所作的《路易十四在凡尔赛花园》。前方是国王，和朝臣们在一起；背景是阿波罗喷泉——太阳神服务于太阳王——和大运河。

（左图） 凡尔赛宫中的镜厅。

对于医学的神化假设。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都有重大进步。逻辑归纳和科学推理向以神的启示和教会权威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发起了挑战。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一小部分国际团体的科学家的作品。他们也不得不应付偶尔成为权威的反对者所造成的麻烦，伽利略就曾因为自己的观点而受到教会的干预。法国政府通过建立一个学院体系，使得科学研究相对自由；在适当的资金和政府的支持下，科学研究得到了相当大的推进。科技革命也很好地为君主服务——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正好反映了太阳王的光辉。

在国内渲染伟大是为了寻求在战场上的更大、更广泛的荣耀。法国扩张主义的目标自15—16世纪在意大利半岛遭遇其对手哈布斯堡王朝之后，转移到了北部和东部边境。一系列重大战争——遗产战争（1667年—1668年），对荷战争（1672年—1678年），对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9年—1697年），还有西班牙王位战争（1701年—1713年），都是为了实现王室的目标。

倘若路易十四死于17世纪80年代，他本可得到极高的声望。除了1648年和1659年的收获之外，他还扩张了法国的北部疆界，特别是取得了佛兰德斯（1678年），在东部得到了弗朗什-孔泰（1678年）和斯特拉斯堡（1681年）。这些收获是其"重新统一"进程的一部分：国王想通过努力吞并那些在前几个朝代成为法国附属地的城市和领地。他还致力于殖民扩张。也许不幸就在于路易侥幸地一步步实现其野心，但是超越这一点就会遇到几乎全盘失败：他的"重新统一"政策在1697年破产；他所支持的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一无所获；将法国和西班牙君主联合起来的尝试也于1702年功亏一篑；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中，法国不得不接受丢掉北美殖民地的事实。

这些没有成果的循环战争，在17世纪80年代后耗资更加巨大。在17、18世纪之交的时候，法国不仅在多处欧洲前线作战，而且在殖民地和海上也有战事。科尔伯将法国的海军从18艘战船扩大到1683年的276艘，维持这些战船的开销非常庞大。在作战大臣勒泰利埃和卢弗瓦父子的领导下，军队增长到40多万人，这至少是将战争的直接影响维持在法国边 [164] 境以外。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所修筑的规模宏大的防御工事保卫了北部和东部的边界。所有这些都以庞大的经济支出为代价。从1683年到1715年，公债增加了10倍之多；官职滥卖，税种增加。1695年新增了人头税，1710年又新增了"什一税"来避免即将降临的金融灾难。

路易十四所支撑的这种范围和时间的战争，检验了由红衣主教大臣们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构。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经济政策的成果。这些政策——通常被历史学家们冠以重商主义之名而凑集到一起——目的在于通

过有组织的进出口实现贸易平衡，从而用金块充实国家的保险柜。路易享受了前人的成果。亨利四世的大臣苏利和黎世留都致力于改善交通和鼓励奢侈品制造工业（丝绸、织锦、玻璃）的计划。路易十四的大臣科尔伯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米迪运河（1665 年—1681 年）是工业化之前给人印象最深的民用工程。高品质的制造业——织锦、玻璃、优质布料、铁制品等等——可以获得支持，法国的这些产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从 1667 年开始采用侵略性的关税政策。贸易公司成立——著名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64 年——并得到广泛的支持，以此开拓更大份额的欧洲和殖民地贸易。改革后的海军为新殖民地的建立出力不小。少量的殖民开始于加勒比海岛，加拿大成为新法国的一个省份，在路易斯安娜也建立起殖民地。在西非和印度建立了贸易站。南特、波尔多、布雷斯特和圣马洛海港的新财富见证了殖民地的冒险对国内经济的提升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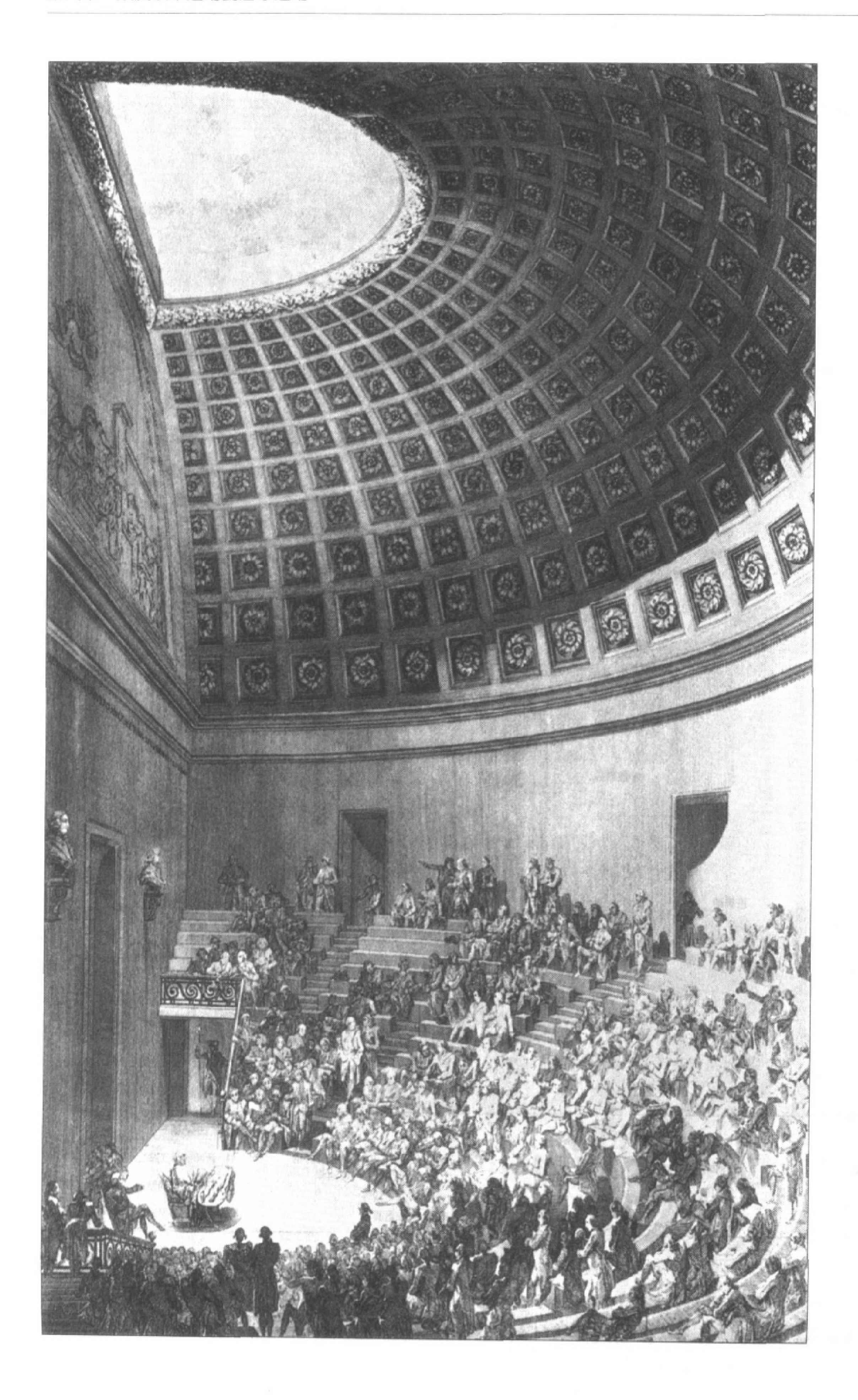
但是，这些成功还不够补偿从 17 世纪 90 年代到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期间由于战争而带来的损害。在国家实行宗教不宽容政策时期失去的胡格诺教派熟练工人，使情况更加糟糕；而 1693 年—1694 年间和 1709 年—1710 年间的坏天气，则造成了法国历史上最后的真正饥荒。战争导致沉重的财政负担，而战争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就像 1713 年的乌德勒支条约中令人失望的条款那样。费内隆在路易驾崩前夕抱怨道：“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荒凉的、缺乏供给的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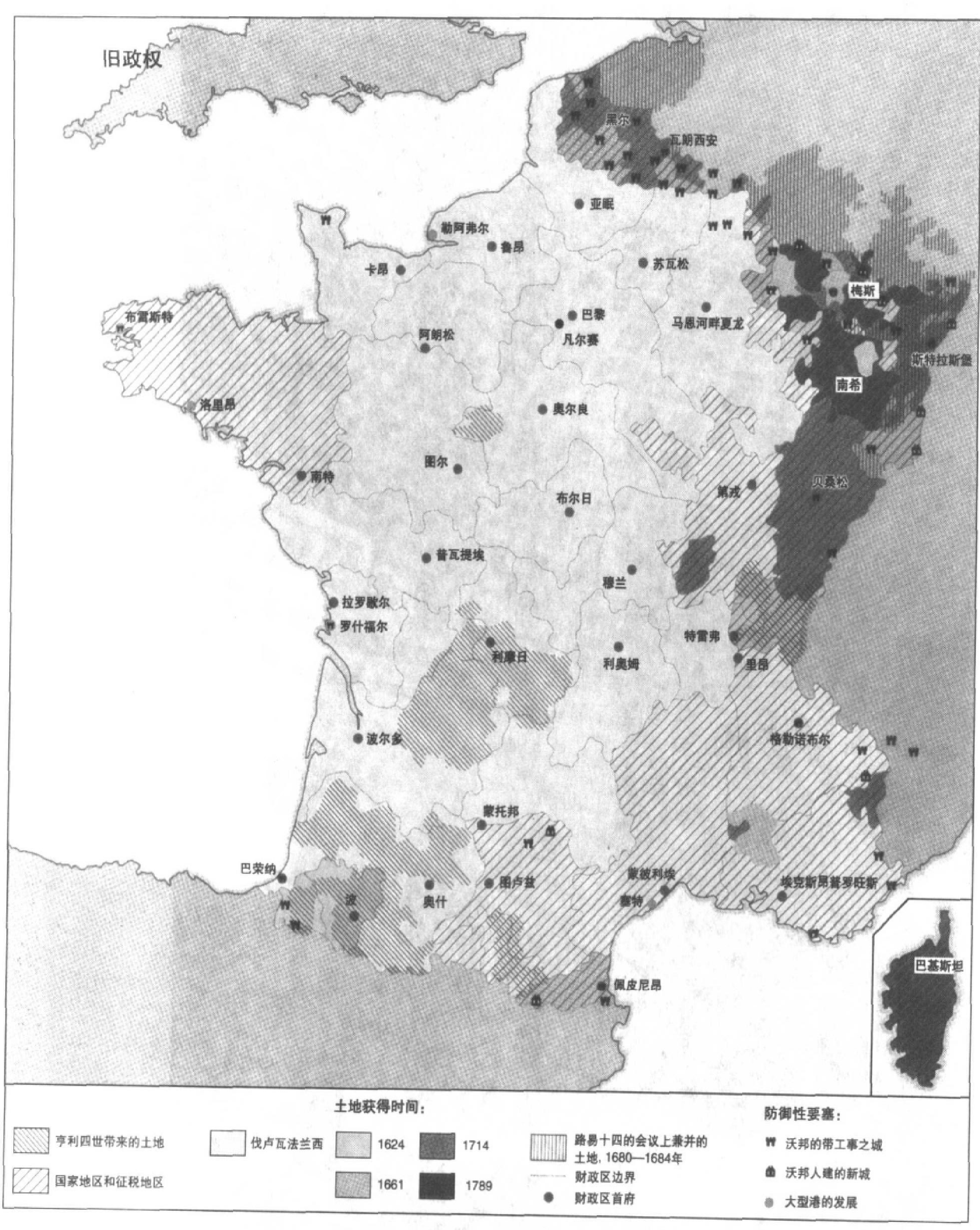
启蒙时代

1715 年路易十四之死，和他的曾孙、1710 年出生的路易十五的继位，可以作为一个潜在权力的隐喻。路易十四摆出专制统治者的姿态，但他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子孙；他的意志被巴黎的最高法院废止，而把他的对头奥尔良公爵立为摄政。路易十四极力控制舆论，但他去世的新闻却公开以欣 [167] 喜的语气报道；他在坟墓中的尸骨未寒，名声却已经大大下降了。他曾志在消灭贵族权力；但是摄政政府却眼睁睁看着巴黎的最高法院将向王室提出抗议的权力交还给了贵族，而贵族不久后就能竞争国王参议会的位置。这令人回想起当年投石党运动时期的状况。

事实上君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高层贵族。但是不管是路易十五（1715 年—1774 年在位）还是路易十六（1774 年—1792 年在位），都没能再现路易十四时期的辉煌。他们仍在运行着由黎世留和马扎然创立、并由路易十四完善的出色行政机器，只是在这里那里做些小修小补。但是他们无法触动贵族统治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基础。官僚政治的水平提高了，国家对于工业和贸易的扶持仍然继续。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政府政策反映

（第 161 页）1769 年至 1775 年由贡杜安所建的巴黎外科学校中的解剖课。18 世纪法国外科在欧洲享有盛名，外科医生中的精英与领衔物理学家享有同样的盛誉。应用科学与公众需求的结合，使外科医生赢得进步舆论的支持。





166 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边界可以看到法国“伟大世纪”的扩张。在路易十四的工程师沃邦修筑了工事后，这代表了对法国权力的不断扩展。在此期间王家派出的主要官员“总督”扩大到各省，“财政区”成为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法国仍然划分为中央核心区和中央控制较弱的周边地区。



这幅安托万·瓦杜的画作《热尔圣的画铺》(1721)的细部上有一幅路易十四的肖像画，在他统治末期被取下打包。店主当时正在请他的顾客们看瓦杜的洛可可风格的画作。太阳王的形象终于黯然失色。

在一些“重农主义者”(魁奈，米拉波神父，杜尔哥等人)的著作中，他们敦促政府支持农村的利益。审查官体制被简化了，审查官发起了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改良。警察部队工作顺利，——但从1789年事件看出，这或许是一种欺骗性的顺利。除了詹森教徒零星作乱外，国家仍然可以利用神职人员作为基层的行政和道德代理人。科技政策也得到了发展，科技学院由其他一些国家支持的机构充实起来。巴黎的王家植物园开始作为科学研究机构，从1739年起由伟大的自然学家毕封领导。桥梁公路工程局于1726年成立，负责民用工程。还成立了诸如外科学(1731年)、海军(1752 [169] 年)、农业(1761年)和医药(1778年)等各种学院。此外，政府还资助大量的其他科学和实用的事业，包括军事学校、兽医院、天花疫苗接种运动，等等。

如果说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扩大了他们的绝对权力统治范围，那么在其管辖领土范围内，他们实施权力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他们并非采用正常的手段扩展法国的疆界。1766年获得的最重要的领地洛林就是通过外交威逼，并非使用军事手段；它的末任统治者、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拉斯·列琴斯基遂女婿之愿，将它卖与法国。1768年归属法国的科西嘉岛实际上未花任何代价就从热那亚人手中获得，因为他们已疲于镇压岛上的连



168 1756年考耶神父的《高贵的贸易》一书的卷首插图。他辩称贵族应当放弃对贸易和工业神圣的蔑视态度。尽管中世纪末期许多贵族是活跃的企业家，但是国中大多数贵族在财务上更多的是依靠他们的特权而不是他们的产业。

年战乱。

与欧洲为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付出的努力和代价相比，这些回报微不足道。史学家曾经把从 1688 年到 1815 年这段时期称为英法两国之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与第一次不同，这次完全是世界性的战争，两个国家不仅在欧洲比拼，甚至将战争扩大到海上、非洲、亚洲和美洲大陆。然而，这次再没有圣女贞德出现，法国被打得一败涂地。

法国原来在欧洲的殖民地也逐渐丧失。新崛起的东部国家普鲁士、俄国和重建的奥地利夺走了波兰。通过三次瓜分（分别在 1772 年—1773 年，1793 年和 1795 年），他们成功地将波兰从欧洲地图上抹掉，而法国对此却束手无策。在 1756 年到 1763 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屈辱地败给英国，损失惨重：加拿大割让给了英国，路易斯安娜让给了西班牙，加勒比群岛大部分归英国所有；除科里岛，西非所有的贸易口岸也归属英国。相比之下，法国就只剩印度大陆上为数不多的殖民地。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1778 年—1783 年），法国同英国殖民地的起义军一起作战，使英国失掉了 13 个殖民地，算是报了仇，泄了愤。在 1783 年的《凡尔赛条约》中，法国重获塞内加尔和西非众多岛屿。尽管如此，这个世纪的抗衡的天平还是偏向了英国。

尽管国家衰败，经济却强大起来。万幸之至而且始料不及的是，路易十五的财政大臣制定的“斯科特·约翰法案”，有效地勾销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许多战争债务。该法案是为经济增长而设的一种“涨跌”策略，以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基础，与殖民扩张息息相关。然而，由于策划不善，并且遭人投机，该策略于 1720 年失败。由于借助毫无价值的纸币，债务难题得以有效解决，“低谷”反为“高峰”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殖民企业里。从 18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法国经历了新一轮的增长，就像 13 世纪起那样充满生机。这着实令人费解。

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人口增长的基础之上的。人口数量在世纪之交由于战争和收成不好，受到人为控制。然而，从 1700 年到 1789 年，人口增长 170 了三分之一，从 2150 万增长到 2860 万，数量之多实在惊人。其增长主要是由于灾乱死亡人数的减少，战争、饥饿和瘟疫不再像以前那样抑止人口增长。战争通常都在法国边界以外爆发，只有少数一两个例外。疫症也不再使人口剧减。法国绝大部分地区在 17 世纪 50—60 年代经历了最后一次瘟疫爆发。尽管 1720 年最后一次瘟疫在马赛出现，据称夺去了城市 9 万人口中一半人的性命，但它被控制在普罗斯旺地区。1709 年的那场大饥荒算是一个句号，此后收成虽仍不见好，而且食物价格昂贵，但这些仅造成了人们的饥饿，还不至于饿死。

国家为促进人口增长而作的努力也不可低估。路易十四时期的战争建



18世纪时，尽管外科手术和医学知识发展很快，但靠祈祷作为祈求健康的做法仍广为流行。这个1741年的瘟疫之神圣罗什的雕像表明，在黑死病最终停止流行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对它的担忧仍然存在。

立了坚固的防御国界和一支常备军。这些措施犹如在疫区周围设置了一条防疫线，为防止瘟疫在全国广泛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在缓解饥饿问题上，政府也显得极为老练，通过任命监督官以确保食物缺乏地区的粮食得以正常供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惊人的死亡率，政府改善了粮食的生产和经营状况，其中以小麦为最（因为面包仍然是绝大部分人的主要食物）。食物产量在18世纪里增加了大约40%。这是因为部分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北部和东北部尤为显著，因为这些地区在1750年后采用了现代科学种田方法。而且，食物生产更具多样性，这使得这个农业国家不易再受恶劣气候的影响。例如，种植玉米在南方进行得如火如荼；虽然土豆那时仍普遍地被视为猪食，路易十六却曾经勇敢地用它来招待朝臣以做宣传，土豆在中部和东部的较贫穷地区得以广泛种植。

人口增长促进了食物产量的提高，改善食物的销售和分配状况就变得非常必要，因为食物必须廉价而快捷地被消费者所获取。建造和修缮水渠、道路，缩短了行程时间，这有助于形成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粮食市场。于是贸易便蓬勃发展起来。欧洲的贸易增加了4倍，但这与殖民地贸易额的增长相比却不算什么：殖民地贸易额增加了10倍，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如波尔多、南特、拉罗歇尔、圣马洛以及地中海城市马赛。奴隶、糖和其他殖民地产品是这些地方的主要商品，港口的内陆地区以提炼和加工某些商品为主，从而逐渐形成了内陆地区的工业。

丰厚的利润使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在港口城市诞生，当地的贵族则急于跟他们攀亲并合伙做生意。因此，为数众多的贵族成了企业主。而鬻官制度使一些有钱的普通人能花钱成为贵族，这使更多的社会精英聚集到一起。1669年科尔伯允许贵族从事海上贸易，并仍可享有特权；而1701年，这一特许还扩展到了批发贸易。在采矿和冶金业，贵族尤其具有代表 171 性，他们几乎掌握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地皮。而且，他们还投资改进农耕技术，尽管大部分贵族可能更关注增收其领地的税赋收入，而非提高农业生产力。

尽管18世纪一些锐意进取的资本家享有了贵族的地位，经济发展的重担仍然压在坚强的资产阶级肩上。资产阶级的数量从1700年的70万人增加到1789年的230万人，这显示出这个阶级旺盛的生命力。资本家去世后留下的遗物反映了他们所过的极度舒适和略显奢侈的物质生活。这个阶级的构成相当分散，不仅有商人和实业家，还有自由职业者。他们多是从事法律、医务、行政管理、运输和其他行业的人，因为这些行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因此他们大获其利。除此之外，由于粮食市场状况大有改善，价格偏高，一小部分农民从中盈利。如果他们种植的谷物除了供自己和家人所需之外还有盈余，用马车运载到当地市场出售，就能大赚一笔。然而

许多城市居民却很难衣食无忧。于是大农场主们逐渐富裕起来，并开始效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整个18世纪，法国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英国，而那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前夕。尽管法国的行政管理十分奏效，它却不能善用新聚敛的财富来确保政府的偿还能力。面对开支更大的战争，国家的赤字也在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增愈快。

为了补偿法国在奥地利继承战争（1740年—1748年）中所受的损失，172 财政大臣马绍·达尔努维尔于1749年采用了对所有收入征收“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的税收制度。这一制度在教士和贵族当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贵族们宣称（根据一些不真实的古老传统）他们有权仅支付战场上的“流血税”，而教士们认为税应该由他们自己收。于是巴黎最高法院轻车熟路地发起一场反对政府税制改革的运动——现在巴黎最高法院以能代表国家意志为荣。1756年，税收再增加了二十分之一，升至10%，以便为“七年战争”筹集军费；1760年又增加了一次。由于正值战乱时期，那时的增税与战后的两次增税相比，并未引起很大争论。路易十五决定战胜最高法院对他的税收制度日益公开的批评，于是他指使首相莫波进行大规模

（左下图） 日内瓦出生的让-雅克·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提出了进步的“启蒙”信仰和完美的人性。他的畅销小说和其他著作，使他作为一个热爱独自散步和山区风景的人而赢得巨大声望。他对“自然”的热爱包括强调妇女留在家庭中，攻击“女学究”式的女性。19世纪“分隔的世界”的意识形态即受他很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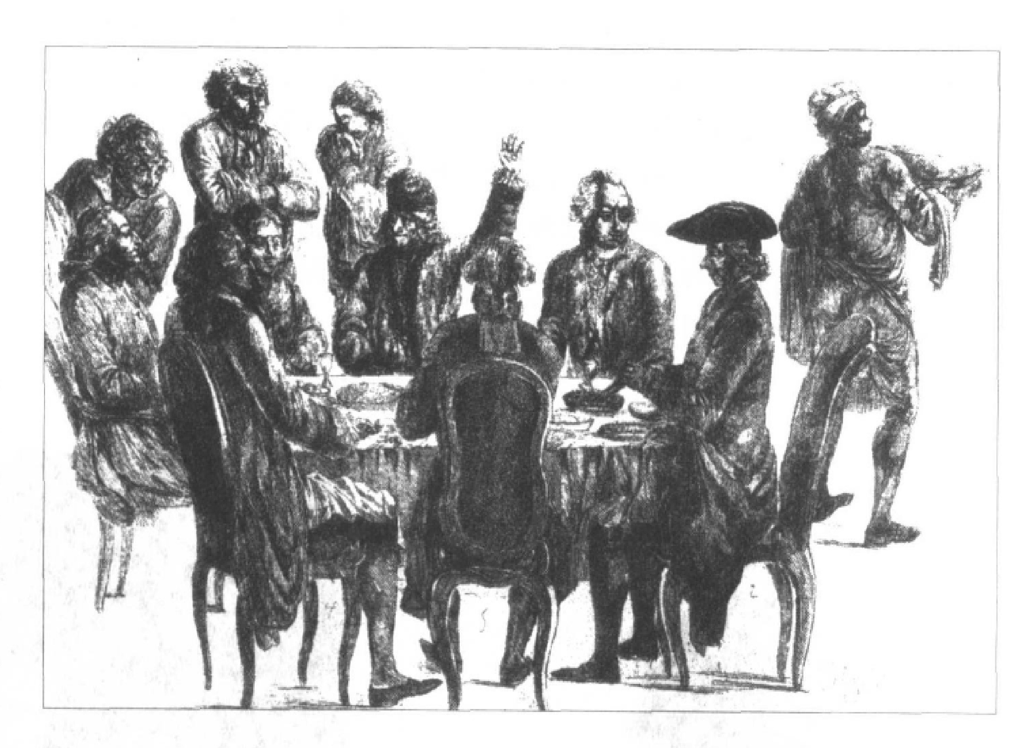
（右下图） 著名的变性人埃翁骑士，着共济会成员服装，1780年。





的立法改革，剥夺了最高法院所宣称的政治权利。路易十五去世后，政治危机使政府举步维艰，他的继承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决定罢免莫波并重新召集最高法院。新国王后来会对他的这一行动感到后悔，因为最高法院不久以后就带头与国王解决18世纪80年代末期的财政问题的意图作对。

18世纪的法国未能成功地在一个变化的经济环境中解决政治、财政问题。这个世纪也成为法国历史上有争议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世纪里，法国对欧洲乃至全球事务的影响之大，足以与任何一个时期媲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此的辉煌与伟大并非基于路易十四精心营造的专制主



让－于贝尔于1750年作的版画《哲学家的午餐》。举手要发言的是餐桌旁主持这个时髦沙龙的伏尔泰。可以认出来的还有狄德罗（在伏尔泰的右侧）、达朗贝（左侧靠边）和孔多塞（背对者）。

173 义之上，而是植根于一场乐观的思想改良运动——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国主要思潮的空隙中发展起来，有时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路易十四这位太阳王便是文化传播的源头；然而决定这段“光辉岁月”基调的，却是背景相对卑微的作家和知识分子。

启蒙运动是一种相当多样和兼具数个职能的文化现象。正如得到这一运动高度赞扬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那样，启蒙运动也强调运用人的理性，并且在任何适当的地方采用科学方法。然而，17世纪的思想家把精力集中于“硬”科学上，比如物理、天文、医学等；而启蒙运动的重点则在于整个社会生活，将其作为理性探索的领域，并尽一切所能进行改善。

启蒙运动的作家们——他们称自己为哲学家——勇敢地撰文以弥补他

们的缺失。孟德斯鸠在他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机敏的讽刺了宫廷上流社会；继而在他博大精深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前景。伏尔泰则一生致力于进行社会批评。他对社会、宗教和政治罪行进行了机智而俏皮的讽刺，这给他带来了一次牢狱之灾和一段时期的流放。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个他称做"能躲避危险的地方"：那里离瑞士边境很近，万一他的著作惹了麻烦，可以及时逃离。伏尔泰非常成功地为新教徒让·卡拉洗刷了罪名。让·卡拉为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而将其杀死，于1762年被图卢兹最高法院判处死刑。这一事例充分显示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与宽容，并揭露了已有的宗教和司法机构的昏暗。

狄德罗也不甘示弱。他编撰35卷《百科全书》(1751年—1772年)，可谓启蒙运动的圣经。该书还是一个用尖锐的理性思想对物质和社会世界进行有条不紊地探索的一个尝试。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

> 我们应该采用这样的策略：不给任何迷信者、盲从者、无知者或愚昧者、罪人和暴君以容身之所。我希望看到我们的同胞为追求真、善、美而团结起来。我们不仅要知道比基督教更多的东西，我们还必须显示出我们更好，显示出科学带给人类的恩泽远远胜过神的恩惠。

这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勇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时对言论控制非常严格，哲学家就是在这种缝隙中发表言论的。当时巴士底狱经常关押作家，没收"危险"作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厉。报纸上没有政治新闻的摘要，《法兰西报》上的新闻全是经政府认可可以印发的。哲学家们运用寓言和虚构小说——伏尔泰最广为传颂的是他的短篇小说或小故事——表达出了对言论审查进行反抗的决心，以及希望得到广泛阅读的决心。尽管教会机构经常发现哲学家的科学理性主义难以容忍，反教权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们仍战略性地采用含糊的方法，攻击一个虚构的政治机构，实则攻击现存的 [175] 教会。越来越多不关心宗教的人也成为了读者。于是在有文化阶层里，对17世纪狂热的虔诚让位于一种更唯物、更文雅的态度。对宗教的热情越来越被视为无价值的形式。

对哲学家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他们说他们做什么，而是他们所说的有人听，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听。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社会流动性，伴随着更广泛、更多样的文化活动。这个世纪里，受教育率增加了一倍，尽管全国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女人受过教育，但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在大城市中高得多的比例。上世纪的科学家与成百上千的同行对话；哲学家把"光辉"传播给更多的民众。《百科全书》和毕封的《自然史》拥有成千的读者，而伏尔泰的短篇小说和让-雅克·卢梭的教

乔弗兰夫人的晚会

"乔弗兰夫人非常从容不迫……她的悟性很好，只谈那些她有所了解的事，其他所有的话题都让那些比她知道得多的人去谈。……在这个圈子中最出色、最活跃和最有趣的人是达朗贝。一上午，他解代数题或是解决动力学或天文学的问题。他离开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像一个男生离开教室，只想让自己快活……不管这是乔弗兰夫人的刻意安排，还是这些作家聚会的愉快和光彩所带来的自然的影响，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男女名流，没有不希望能得到邀请在她家中参加一次晚宴的……"

乔弗兰夫人（1699 年—1777 年）位于巴黎时尚的圣奥诺雷大街的沙龙，自 18 世纪 30 年代起就是最显赫最出名的文学沙龙。艺术家和文学家在这里混迹于宫廷贵族、政府高官、城市富绅和外国嘉宾之中，展开讨论和辩论，进行上流社会的交流沟通。

参加这些聚会的开门钥匙是名望而非出身：出名的是乔弗兰夫人使黎世留元帅居于下风，因为他没有声望。是智慧、风雅、艺术水平和礼貌，而不是身世可作为敲门砖。乔弗兰夫人的访客确实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哲学家中的达朗贝、封特奈尔、孟德斯鸠、伏尔泰、爱尔维修和马蒙泰尔，社会名流有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未来的俄罗斯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拉斯·波尼阿托维斯基。

沙龙成为文化手段，从而也是政治和权力的手段。例如，据说要想成为法兰西院士，首先要得到朗贝尔夫人沙龙的批准。沙龙对公众喜好也有强大的影响力：据说乔弗兰夫人的沙龙对想要得到好评的艺术和文学新作至关重要。如同被称做"巴黎的女沙皇"那样，她是启蒙价值观和尖锐的公众舆论的重要传播者。

自 18 世纪 70 年代起，由于新的社交组织（共济会社团、俱乐部等）的出现和舆论的发展，沙龙逐步衰落。妇女控制权成为挨批评的靶子。沙龙女主人被视为贵族女学究，使政治和政治家女性化。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发起仇视女性的攻击。作家兼政治理论家让－雅克·卢梭有关妇女应当退出政治而呆在家里带孩子的观点，在政治圈中很有影响。后来在大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期更产生了"分隔的世界"的理论。



《1812 年乔弗兰夫人的一个晚会》，A. G. 勒莫尼埃的这幅画描述的是首次诵读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的情景（1753 年—1754 年）。

化小说则被几十万读者所阅读。印刷成为当时最具经济活力的行业，传统的书刊行业也分化为周刊、杂志和各种短命的读物。

如果说报纸作为文化和知识交流的场地首当其冲，那其他组织则紧跟其后。经过这个世纪发展了许多省级学院，科学争论便在这里进行。而相对通俗的咖啡馆、阅览室和共济会会所成为社交的中心，各种思想在这里得到检验并相互交流。通常由聪慧机敏的女性主持的沙龙，也成为文明的知识交流的论坛。

一种新的公共场所开设起来，以便进行思想讨论。路易十四统治下，王室自认为是公正思想和公众品味的惟一产生者。有人曾说过政治只能在专制统治者头脑中形成（K. Baker 语），而公共事务通常被视为朝臣、部长和外交官的禁地。然而经济文化的变化改变了公共事务领域的局限和精英特性。有文化有风度的精英现在也参加讨论和辩论。同时代的人们开始察觉到公共舆论是一股政治力量，不容忽视。18 世纪 70 年代末期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瑞士人雅克·纳克认为，公共舆论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需要利用国库、士兵或军队，就能对城市、王室，甚至是国王的宫殿发号施令。……”

聆听君主的言论，人们会感到专制主义条律如同镌刻在青铜之上：“所有的公共号令都是由我发出的，”路易十五在 1766 年就曾这样冷冷地告诫巴黎最高法院，“你们想脱离君主，建立独立的体制，但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全都掌握在我手中。”无独有偶，路易十六在最高法院被质询一项法令是否合乎宪法时也曾说：“当然合法，因为我是这样希望的。”然而事与愿违。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尽管专制主义甚嚣尘上，法国国王也被公共舆论所束缚。不管愿意与否，宫廷不得不向咖啡馆让步，从而咖啡馆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仲裁者。经济增长与启蒙运动为 1789 年的政治革命铺平了道路。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时期

这是欧洲欢欣鼓舞的时辰
法国立于金色时代的顶峰
人性仿佛又获新生。

176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席卷欧洲，后来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称之为"春天般的乐观主义"。正如两个世纪后，也就是 1989 年—1990 年在东欧发生的革命，它带来的变化令人难以预料而又触目惊心。引发 1789 年革命危机的原因，只有回溯这段历史才会显现出来，"革命"——在国际事务辞典中是一个新词。它听起来"法国味"更浓。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中期之间，法国经历了四种不同形式的君主政体（1789 年之前，1789 年—1792 年，1815 年—1830 年，1830 年—1848 年），两个共和政体（1792 年—1804 年，1848 年—1852 年），以及两个帝国（1804 年—1815 年，1852 年—1870 年），这期间包括七次革命或者说主要的军事政变（分别在 1789、1792、1794、1799、1830、1848、1851 年），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暴力事件。尽管法国是欧洲诸国中最具革命传统的国家，但仍然是一个以富裕资产阶级精英和地主为主导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惯性的突变还是由具有连续性的稳定因素来平衡。

1789："伟大的革命"

在 18 世纪，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变化带来了好处和优势，但也带来了弊端。谷物价格的长期上涨，给那些能为市场提供多余产品的农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但是，这样的农民数量相对比例较小；随着人口的增长，意味着没有太多的土地可使农民自给自足。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了没有土地的城市工人的行列，这就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兵团，就算经济再膨胀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消化。整个世纪以来，人们的收入跟不上价格上涨的脚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面临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也许来自于正常时期多变的生活方式中：更努力地工作，让妻子孩子去赚钱，但挣钱太少而放弃，转而犯下轻罪（偷窃、偷猎、卖淫等）。但是，这种"权宜一时的经

济”（Olwen Hufton 语）却年复一年地重复着。

然而，从 18 世纪 70 年代开始，形势每况愈下。在路易十六（1774 年—1792 年在位）统治初期，世纪中期的繁荣时代让位于经济不景气。不景气给许多社会精英们造成重创。许多贵族和资产阶级地主利用食品价格的提高，对农业新技术进行试验，以提高产量。然而，他们不愿意去改变现有的封建体系，以及它那复杂的税赋制度，而宁可与之共存。这就意味177着，当经济不景气袭来时他们处在有利的地位，让农民们承受冲击，而他们提高赋税，以及采用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例如围栏圈地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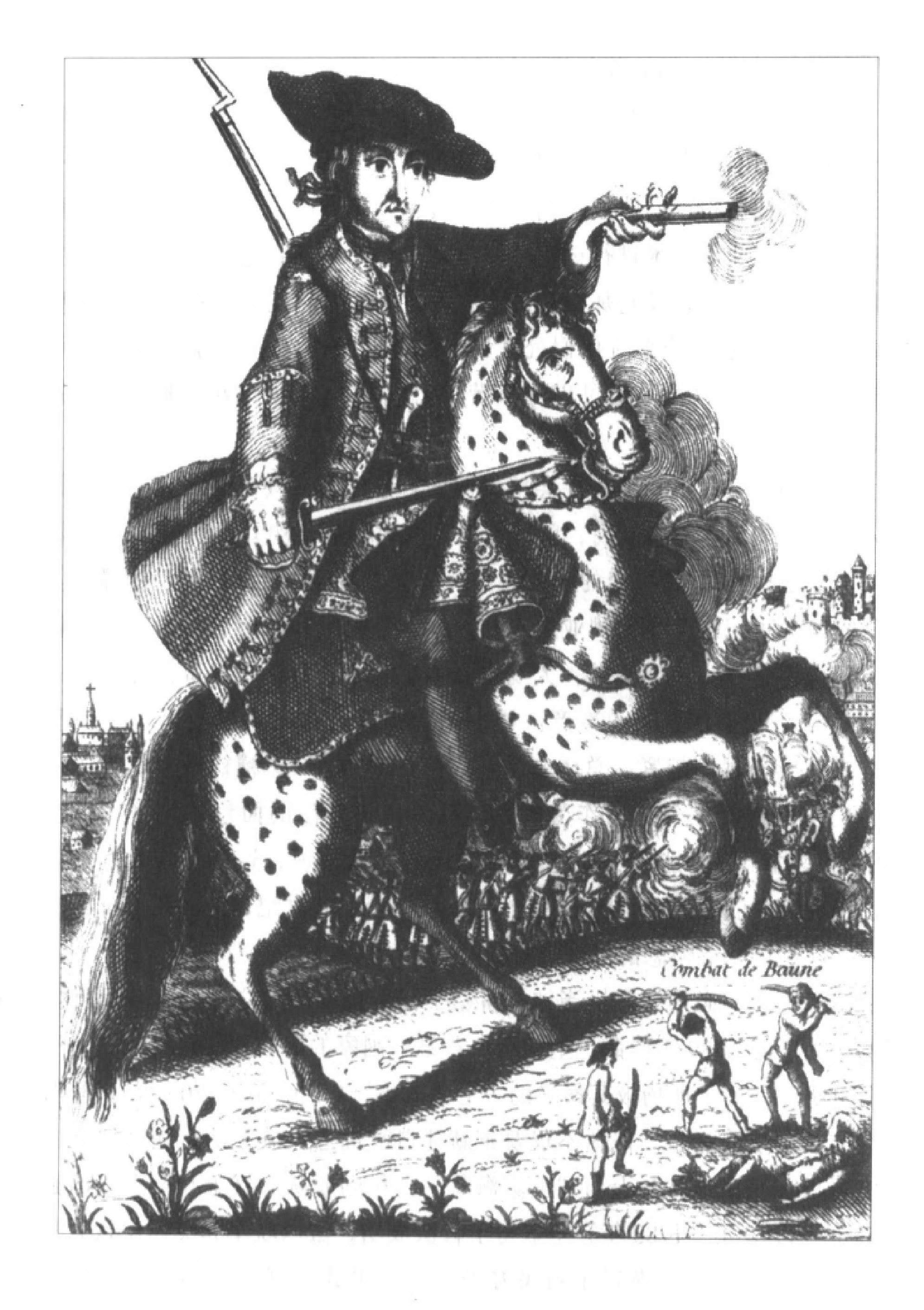


这是加斯科涅的萨都南教区一对身着周日盛装的资产阶级夫妇的插图，取自 1772 年的一本土地登记簿。男人刻意做出的彬彬有礼的姿势，以及他妻子身上的饰带、鞋和扇子，表明他们是城市以外日益增长的市民消费生活方式的代表。

农民的承受力不及那些社会精英们。封建赋税和教堂的什一税在他们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就算在最好的时期也不例外。1775 年，爆发了“面粉之战”，那是抗议的农民和城市消费者因谷物短缺而发动的骚乱。其他农民在世纪中叶转向酒业生产，结果却是眼睁睁地看着由于生产过剩而引起价格暴跌。更糟的是，大规模牛瘟疫的爆发引起了家畜饲养业的一片混乱。工业生产也陷入减产。犯罪率和流浪者人数急剧上升。“旧制度”的弦看来越绷越紧。总体来看，1787 年和 1788 年糟糕透顶的收成使面包的价格螺旋上升。而作为多数法国人主要食品的面包的价格，也在 1789 年 7 月中旬上涨到了 18 世纪最高点。准确地说，这就是当代人确认的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时刻，因为巴士底狱——自 14 世纪以来刺眼的王权标志——已经被一群愤怒的民众攻占。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恰当评价价格上涨和民众革命之间的本能反应。我们必须考虑 1789 年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国家的财政和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危机。经历了那场极其昂贵的“七年战争”（1756 年—1763 年），政府开始与英国展开竞争。但这不仅要重新建造欧洲最大的军队，还必须建立一支可以在殖民地和海上与“王家海军”相称的舰队。这个政策在美国独立战争（1778 年—1783 年）中取得了首次成功，法国联军和美国反叛者一道取得了胜利成果，夺得了殖民好处。一些贵族军官，如侯爵德拉法耶特，曾和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带着多年的作战经验回到了法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同时支持一个巨大的军队和强大的海军，是超出政府能力范围的。毕竟没有一个对手能够拥有这样的实力，要达到这些只有依靠大量举借外债。到 18 世纪 80 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

政府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1777 年路易十六任命新教银行家雅克·内克为财政大臣，他并没有通过提高赋税来资助美国独立战争——这是史无前例的辉煌成绩。因王室阴谋，他于 1781 年被赶下了台。他后来出版了《致国王》以作自我辩解，这本书被怀疑对法国财政状况作了太过乐观的



路易·芒德兰（1725年—1755年）是个非同凡响的走私犯，在投身犯罪生涯之前从军队开小差出来。他被抓获和处死前的功绩——带进未上税的烟草和便宜的纺织品，与士兵和收税者展开激战——可以被看做是为了将消费品带给日益增长的消费大众的一场战争。伏尔泰和其他人试图无视他毫无道理的粗暴而放大他死后的名声，将他视为劫富济贫的“仗义强盗”。

评价，因为他只是通过除去他的“特别开支”（特别是战争）来说明问题。而他的继任者卡隆上任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的是国家破产的困境。绝望中，他召集了精心挑选的“名士会议”——一个从1626年起就没有再开过会的组织，来证明有必要通过一项和平时期实行的土地征税新方法，试图 178 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不过，许多人并不相信他所讲述的政府财政困境，因为这和人们普遍相信的内克的《致国王》的论调是截然矛盾的。此外，卡隆的计划还被看成是旨在加大君主政权，扩大寄生的贵族小圈子权力的措施。这些人通过在王室担任闲差，接受馈赠和领取年金，即使在经济困



奥地利的科学骗子佛朗茨－安敦·麦茨默的“动物磁力”理论，在18世纪80年代的上流社会中风行一时。催眠师使用催眠疗法的疗程，被嘲讽为他们与那些轻信的妇女发生性关系的手段。

难时期也毫发无损。

政府面临的既有信贷问题也有信任问题。公众舆论——我们看到，现在是不容忽略的势力——被巧妙地调动起来，集中在和国会征税相关的每一件事情上，而国会一直宣称这是为了捍卫“民族”的利益。虽然王室的铺张开支充其量只占国家所有开销的很小比例，但是，人们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他们。因此王室生活的秘密性和喜好看来是逆“民族”利益潮流而动的。这些看来更具丑闻性质，因为国王需要不断依靠“民族”来借债让国家的大船扬帆前行。王室的财政开支太大，以至于光靠社会精英们

根本无法满足，他们还需要国际货币市场的帮助，需要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慷慨解囊。但是，当国家需要社会更广泛的支持时，王室却成了一个贵族寄生阶层。上层贵族自私地从日渐衰败的王室获取好处。改革派大臣发现自己成了王室阴谋的牺牲品。贵族们加强了对教会、军队和国家管理的控制。例如1781年颁布的"塞居尔法令"就对军队中那些最古老的"佩剑贵族"的高级军衔做了严格的规定。

在1789年6月20日的"网球场宣誓"中，第三阶层的代表意识到王室的攻击，非正式聚集在凡尔赛的一个网球场上，发誓在新宪法的基础未确定之前决不解散。这是雅克-路易士·大卫画派描绘这一庄严场面的著名画作。

1788年，政府承认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国家摆脱财政危机，除非以"三级会议"的形式与国民协商。"三级会议"最后一次开会是在1614 [180] 年。一直是"内阁专制"反对派的包括议员在内的大多数贵族，都在设想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集会议——当时会议被贵族和教会上层人士操纵。他们没有估计到启蒙思想给政治心理造成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和经济变化对执迷不悟的贵族以外的阶层所带来的利益。"三级会议"将被禁锢的"公众意识"释放了出来。按照正常情况，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第三等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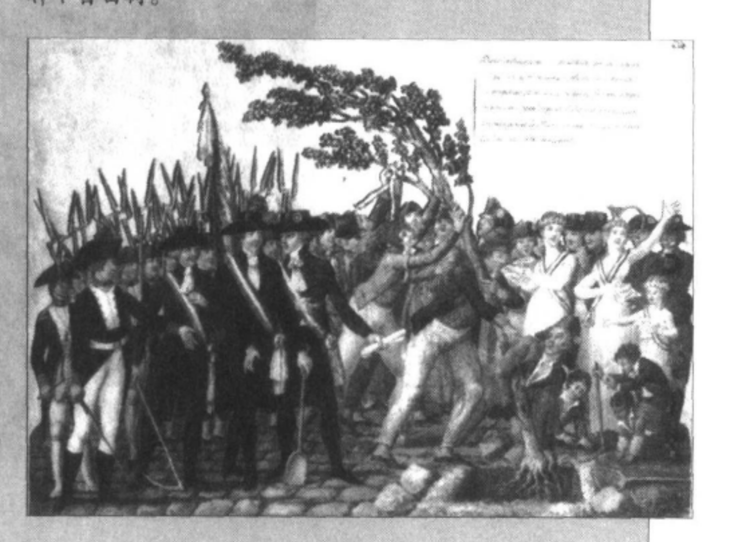
男人权利，女人权利

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被证明是一部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文件。它将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结合——个人言论、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还有躲避专制政府的自由，——为现代自由主义文化提供了蓝图。《人权宣言》是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的主要来源。

自1789年以来，人权的自由范围在不断变化。例如在18世纪90年代，家仆由于缺少必要的经济独立性，因此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解放。1789年宣言还和奴隶制度和平共处，尽管据信1794年的国家宪法要铲除奴隶制，宣布奴隶买卖为非法（至少是临时性的）。妇女也在"男人权利"范围之外。剧作家奥林普·德·古热发行了一本宣传册《妇女权利》（1791），要求扩大跨越性别区别的权力："一个女人有权力上绞刑架：她也应当有权力登上论坛。"这种观点无法影响革命文化，它与不同性别不同领域的思想意识密切结合。法律、政治和经济是男人的领域，妇女只局限于性贞洁、服从和抚育子女的私人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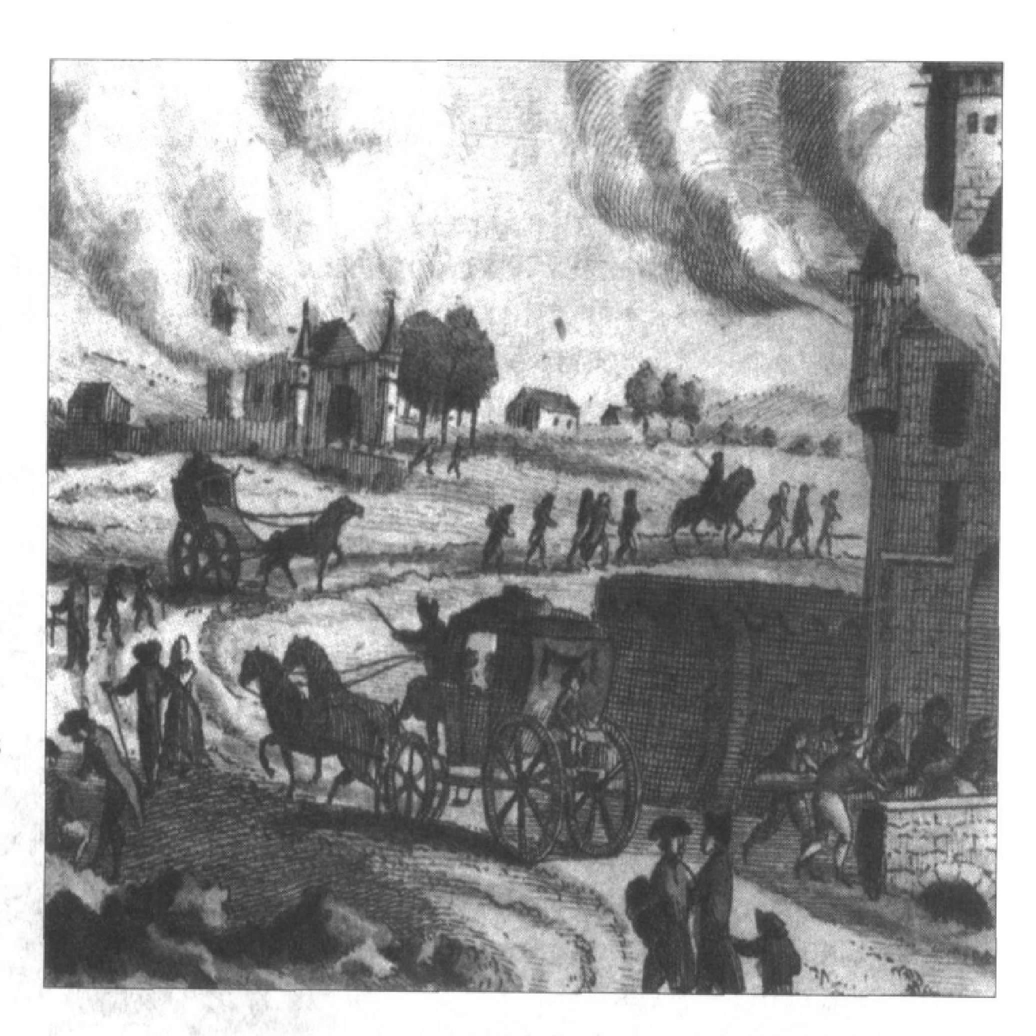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古热在1793年被革命法庭宣判为叛徒，她自己被送上了绞刑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在法国才获得选举权。在1789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在法国，政治"人权"只限于男性的"人"。

男人而不是妇女主宰新的革命仪式。在这幅勒絮尔的水彩画中，妇女只是文雅地作为点缀而观看男人们栽种下自由树。



级）分头开会。这种做法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过时做法，因为这会威胁到僧侣和贵族的代表们得以浪费无与伦比的大好改革时机的机会。"什么是第三等级？"1789年初西哀耶斯神父在一个同名的著名宣传册里问到；只能回答："一切。那在政治规则中它又是什么？什么都不是。那它将来是什么？某种东西"。

国家财政危机当时引发了一个新的政治演说。这个演说——对所谓"特权阶层"的批判和与民众协商的要求——已经传遍国中。当时审查制181度于1788年7月被放宽，大批政治宣传册和报纸如洪水般遍布法国。"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程序要求召开教区会议和撰写"陈情书"。所有这些，在面包价格飞涨的影响下，新的政治语言融合了较贫穷等级的饥饿和愤怒，产生了早期革命狂热。在1789年5月各等级开会时，很明显已不是仅限于上层贵族政治安排的投石党运动的重演，而是出现了更为广泛和更



在1789年7月底和8月的农民大革命中，农民在向城堡进攻并抢劫。最典型的农民行为就是焚烧他们领主的账册，尽快推动国民大会彻底废除封建制度。

具挑战的现象。

惊恐不安的路易十六试图把引发革命的时钟倒转。虽然他同意“三级会议”变成国民大会，负责起草法国的新宪法，但是却从1789年的6月底开始策划旨在解散三级会议的政变；下一步是与已变得顺从的贵族控制住局面。巴黎爆发了起义，巴士底狱被攻占。“这是造反，以后呢?”国王听182到从巴黎传来的消息后说。但他只得到了冷冷的回答：“不，陛下，这是革命！”国王败下阵来，新的国民大会正在商讨如何起草一部新宪法。

宪法的全部前景改变了。国王现在是被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上帝的恩赐所支配。主权不是在统治者手中，而是在人民手中。“王国的基本法律”很明显已不足以包容民众权利的内容。民族是由拥有权力的公民组成而不是由特权集团私下批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特权阶级原来是反对暴政的壁垒，也是自由的同义词，现在却成了一个肮脏的词。和它相对立的是“权力”是所有的人——并不是挑选的少数人，人人都应当拥有：《人权宣言》庄严地记载了这一点。

夏末的政治危机也席卷了整个农村。一场（毫无根据的）贵族雇佣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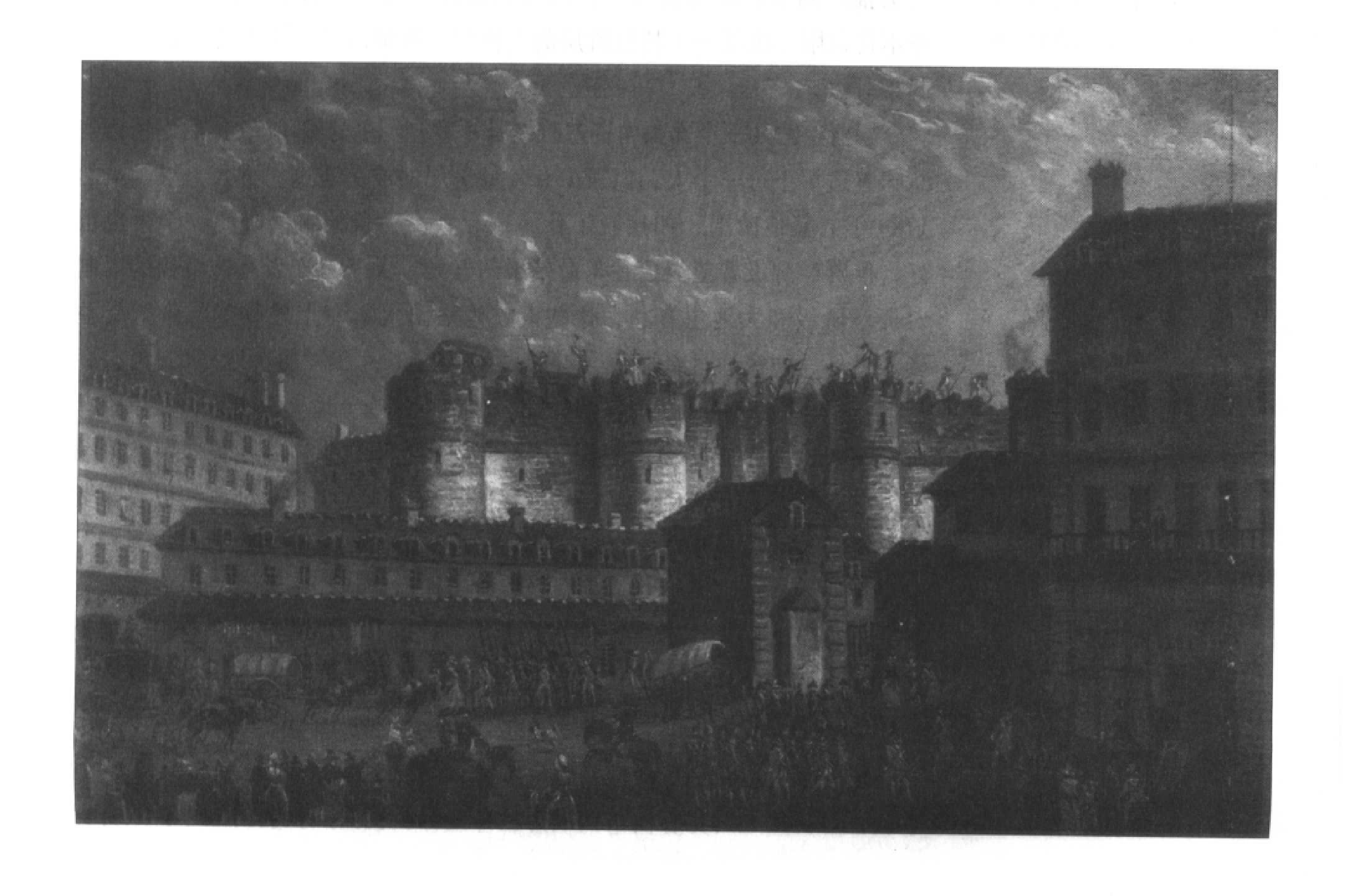
徒在农村破坏收成，并挫败一切改革希望的“大恐慌”把农民动员起来，直接采取行动反对他们的领主。城堡被攻，地主被打，领主和封建主的账册被焚。在 1789 年 8 月 4 日的新国民大会上，不仅正式通过废除“封建专制”，支持农民革命，而且在积极开明的贵族德拉法耶特领导下，大会还废除了许多“旧制度”时的做法（如教会什一税、卖官鬻爵，等等）。这是对焚烧已被称为“旧制度”的大火上添柴。一种新政治文化的基础已经产生。

从王权到共和

革命也是一次词汇的革命。一些旧的被人们痛恨的词汇（如特权、封 183 建制度等），与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词如“公民”、“民族”，形成对比，更遑论新诞生的政治文化基石的三和音“自由”、“平等”、“博爱”。未来长期使用的词汇或者得到锤炼，或者具有现代色彩，例如：“左派”和“右派”、“恐怖”、“恐怖分子”、“官僚主义者”、“征兵”、“毁灭文化”、“革命化”和“中央集权”。

如果说革命是一次词汇的革命，那它也是一次符号的革命。从刚开始

皮埃尔－安托万·德马西的画作《拆毁巴士底狱》。巴士底狱被占领后即被命令拆除。清除国王暴政象征的工作，给那些在巴士底狱所在地的巴黎东部圣安托万郊区的失业和饥饿的工人提供了一份受欢迎的工作。





在共和国批准成立时宣布的法国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被证明是直到今天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图上是流传最为广泛的爱国主义的象征：红帽，三色飘带和（代表公平的）束棒。

政治就渗透进日常生活。专制皇权的标志巴士底狱转化成为武装民众的标志，出现在旗帜上，墙纸上，商店招牌上，便携小刀上，扇子上，钮扣上，书籍封面上，以及日常生活的所有旧货上。三色旗是在巴士底狱被攻陷后，路易十六视察巴黎时发明的；巴黎人在城市纹章的红蓝条形上又加了代表波旁王族的白条，作为团结的象征。几个小时内这个图案当成帽徽佩戴，成为爱国主义标志。而红帽子——模仿弗里吉亚人古代获自由的奴隶所带的帽子——也成为革命者另一个通行证。佩戴白帽徽，或身着过于考究的贵族服饰，被视为反革命的政治表现。随着革命的进展，往往是集 184 体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精彩表演，也在不断发展。种“自由树”成为革命节日的活动场合，而雅各宾派创建的政治俱乐部则成为爱国者社交或举行仪式和辩论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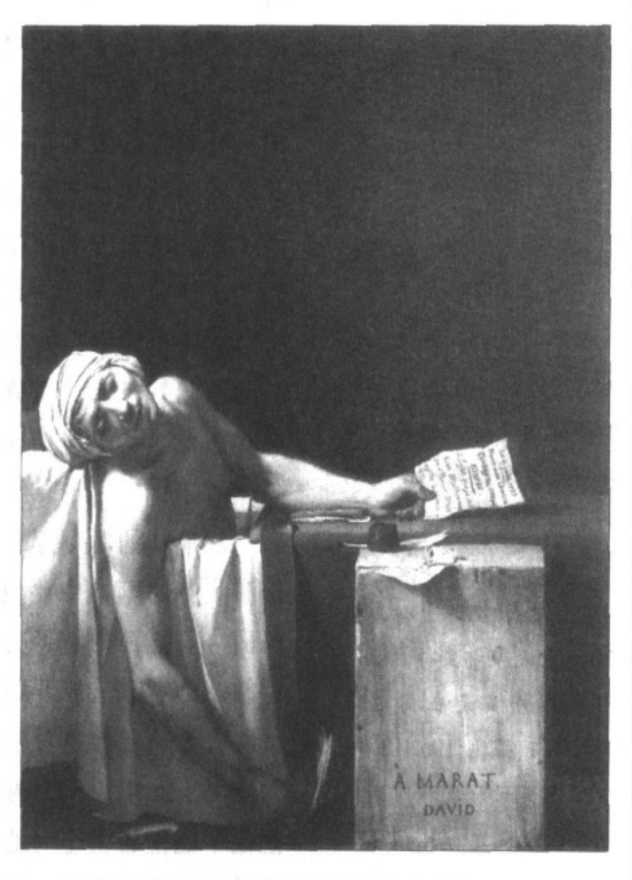
1789 年至 1791 年国民大会所施行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了由表及里的许多内容，成为法国历史上给人印象最深刻、最富有创造力的改革之一。这次改革在法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过去的东西被会议决定抹得一干二净。彻头彻尾的行政改革导致法国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旧行省被撤销，他们被 83 个省所替代，成为——至今依然是——各种管理形式（财政、司法、宗教、军事等）的基础单位。行政管理职务向所有人开放。选举制度被推广到宗教和司法领域，同时也延伸到政治生活中，国家的高级职务不再仅限于由某一个特权阶层的人担任。所谓的“任人惟贤”制度建立起来。

职业生涯几乎全部都向资产阶级贤才敞开。尽管按 1789 年的通用语言意味着适用于每一个人，但很少有较低阶层的成员通过它进入上层。虽然 1789 年的其他阶层，如摆脱了什一税和领主税负的农民阶层，干得也很好，但资产阶级希望能独吞革命带来的好处。关于有产者有选举权的限制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有利，这些人成为法国大革命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另外，国家通过将原教会财产(占全国 6%—10% 的耕地)收归国有，使自己摆脱了 1789 年所面临的破产。通过将这些土地分块出售，城市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腰包鼓了起来。尽管有一些土地的集体属性被保留，但是私人财产权被视为绝对权利。1789 年前货物在国内运输中征收的税收和费用都被废除，从而形成一个真正开放的国内市场。“自由行动，自由通行”的思潮盛行。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在贸易、生产领域与干涉主义一刀两断，资产阶级雇主们获利，但却对工人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效果。尽管老板们的同业联盟并不容易被取消，行会和工人联合会仍然受到禁止——工会直到 1884 年才合法化。

经济自由化伴随着根据《人权宣言》规定的立宪自由。宗教宽容得到承认：对犹太人的宽容使法国成为世界上保护犹太人权利的冠军。人身保

185

马拉，"人民之友"



雅克-路易士·大卫所作《马拉之死》

让-保罗·马拉（1743年—1793年）是启蒙时代后期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大革命给他们机会获得新的生涯。直到1789年马拉事业失败，他生活在巴黎的枪手作家和"蠕虫街"作者的怪异阴暗角落。他曾在法国和英国学习物理，在18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试图以激进科学家身份制造影响；但他对牛顿学说的攻击惨遭失败，也没有为他赢得声望。他的政治论文，特别是他的自由主义的《奴隶的锁链》（1774年），也未能在公众中激起反响。在18世纪80年代，他苦涩地抱怨学术机构阴谋剥夺他的事业。

马拉通过政治报刊使自己成为革命先锋。他的《人民之友》自1789年9月起成为最著名的激进小报之一。和其他的政治记者一样，如埃贝尔和他的平民报纸《迪歇纳神父》，或卡米耶·德穆兰和他的《老科尔得利》那样，他成为和他的报纸名字结合起来的人。《人民之友》不仅号召进行激进民主的改革，而且鼓吹让那些挡在改革道路上的贵族、保皇派和教会人士血花四溅。他革命前的经历使他成为抨击能手。直到1792年大革命，他早熟的共和、恐怖言论对革命尚处于自由化阶段的市民还显得过于极端，但此后却仿佛是预言。马拉参与了可怕的1792年9月大屠杀，当时高度警惕的匪帮杀害了巴黎监狱中几千名囚犯。

马拉是一个高效率的政治记者，而不是政治家。当他可能在1792年被选入国民大会时，事实证明他完全没有效率，轻易地被排斥。然而他的死却使他名声大振。1794年7月，年轻的夏洛特·科黛将他在浴缸中谋杀，当时他已处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被科黛视为巴黎极端运动核心人物的马拉，成为革命事业的烈士。他的身躯在全国极端分子中永垂不朽，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革命者为民族英雄建立的神坛先贤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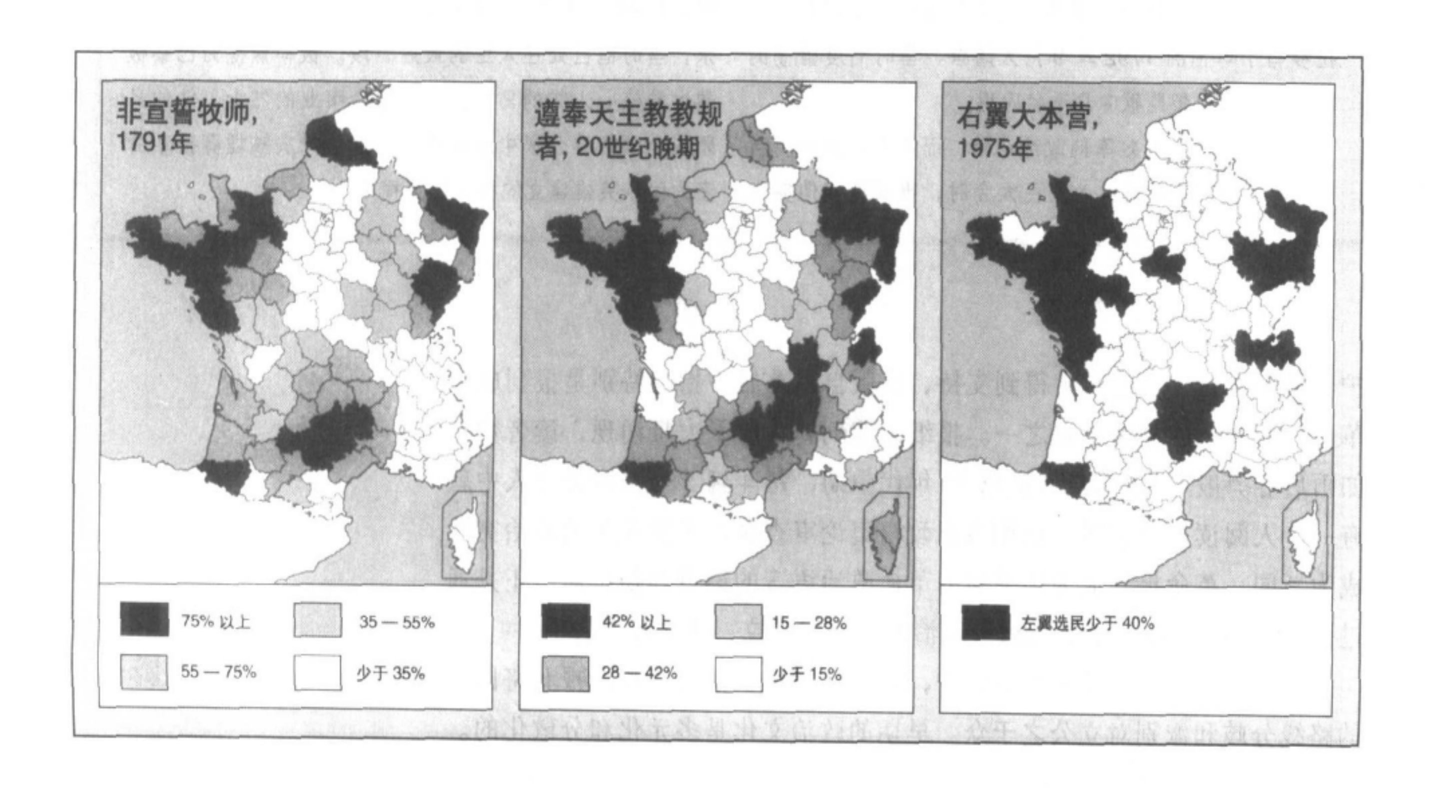
护令得到实行，言论自由得到支持，出版自由首屈一指。特别是报刊成为革命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报纸、期刊和小册子大量涌现，读者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每4到5个法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阅读革命报纸。长期被旧政权舆论审查制度排除在外的政治突然成为新闻。革命报刊成为传播新的革命政治语言的渠道和扬声筒。正是通过革命报刊的词语，新生的激进政治家，例如马拉，建立起了名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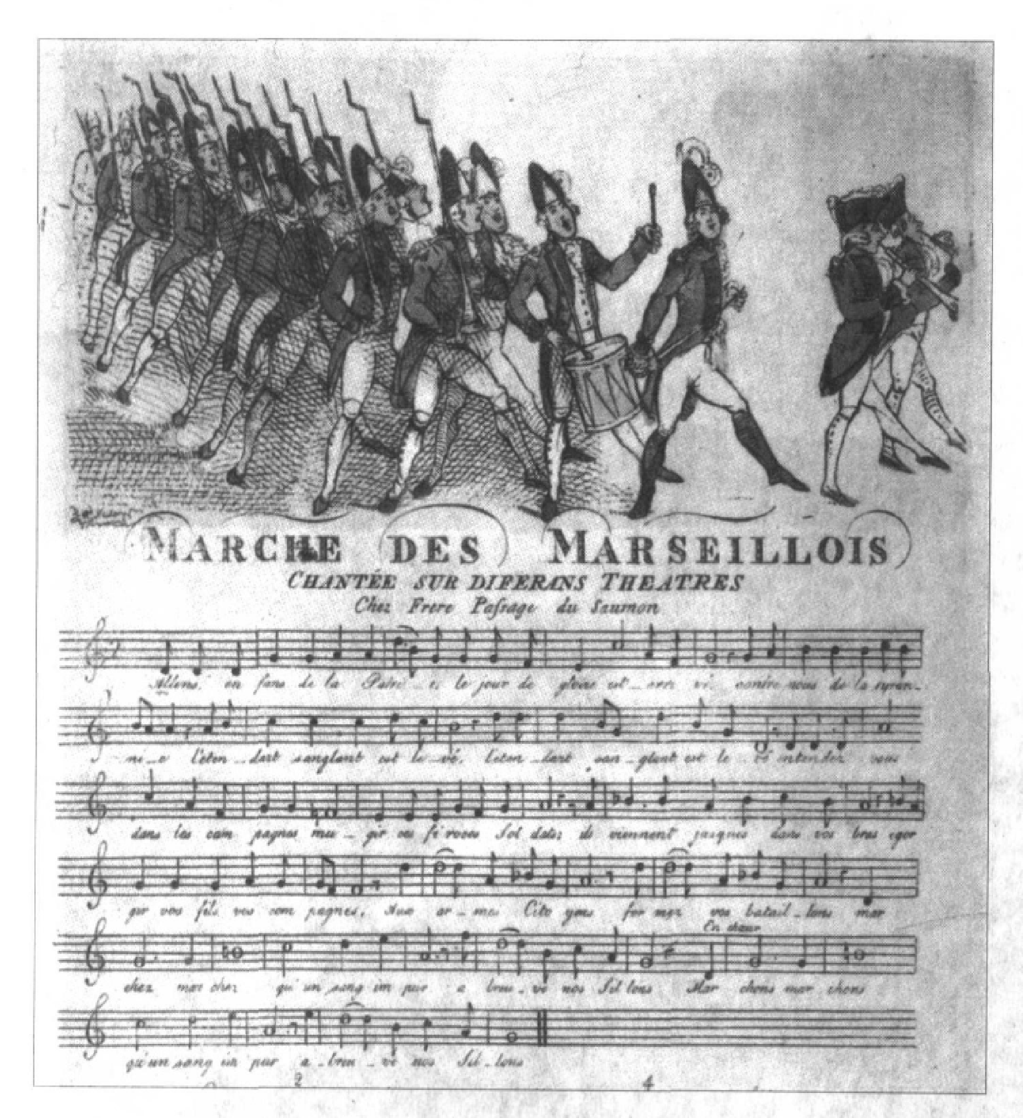
报纸不仅报道和反映政治事件，而且还塑造了他们。革命报刊将国内 185 的路线分歧和派别对立公之于众。早期的政治文化是多元化和分散化的。

选举的原则给地方团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个人自由的实现激发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往往是分歧的喧闹声音。然而革命讲演本身——如在国民大会的言论和报刊的回响——强调团结的调门越来越高。国家对霸权的胜利远不像展示的那样处在黄金时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186政治问题很快就凸现出来。许多贵族出于愤怒而外迁，造成奢侈品贸易破产；加勒比海上的产糖岛屿也因政治不稳定而处于公开对抗的状态。国内外的革命敌人无疑在恶毒地为寻找替罪羊而摩拳擦掌。由于要弄阴谋，使得对繁荣稳定社会的期望与更为惨淡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差距。于是，所有问题被归咎于流放贵族、国外势力、敌对朝臣、心怀不满的教士和所有的男女恶棍，甚至包括国王和王后（对他们是不幸的）所策划的秘密反革命阴谋。

从最初的时刻起，善良但却令人失望，软弱的路易十六就被证明无力扮演大革命剧本中要他成为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特别是在有心怀忌恨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谗言相劝时，要路易十六将自己从一个具有奇迹能力的专制统治者改造成开明的立宪君主，超出了他的能力。1791 年 6 月，路易十六夫妇从巴黎逃往法德边境。他们在瓦伦被不光彩地抓回来后，路易十六恢复了原位，但为时不长。甚至在 1792 年 4 月法国与奥地利开战以后，他也未能使自己全身心地拥护革命事业。当阻挡奥地利军队向巴黎前进的最后一个堡垒凡尔登即将陷落的消息传到巴黎时，他们的危机来到了。在此形势之下，“无套裤汉”（他们的敌人对平民街头激进派的称呼，因为他

革命、宗教和政治。根据对 1791 年“教会民事宪法”誓词回应情况而进行的宗教划分，被证明是最有影响的法国宗教、政治地理指南。反对宣誓的地区是广泛遵守天主教教规的中心，直到 20 世纪晚期都支持右派。这些地区许多是在周边省份。然而有些边远地区——如在下普罗旺斯省和朗克道克地区以及波尔多地区——在传统上更为支持共和价值观和反对教会主义。





由鲁日·德·里尔在1792年谱写的《莱茵军战歌》被从马赛出发北上的起义者高唱；他们于8月10日推翻国王，然后上前线。1795年这首被称做《马赛曲》的歌曲被定为国歌，但1815年后被抛弃；1879年再次定为国歌。

们不穿代表贵族身份的长及膝盖的套裤)将民众召集起来。1792年8月10日国王被推翻，9月21日由全体男性公民选举产生的立宪大会宣布成立“独立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武装的民众书写了创立第一共和国的神话。“无套裤汉”的爱国之矛挑翻了王权。1792年9月21日共和国在巴黎宣告成立之时，志愿军与正规军的重炮兵并肩战斗，在瓦尔米的炮声中战胜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187 “一个新纪元开始了，”目睹这场战役的德国作家歌德对战友说，“你们可以宣告见证了这段历史。”法国官兵不是用庄严的军歌庆祝胜利，而是用一首鲁日·德·里尔为志愿军前往巴黎后又奔向北方战场所作的进行曲来加以庆祝。“团结起来，筑成我们自己的防线!”《马赛曲》像它歌声中指出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战斗国歌。

好战，是保持“独立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重要关键。自1793年起，法国与欧洲大多数国家交战；同时经历了国内，尤其是西部的反革命


LE ROI

189

朱安党人和旺代党人

1789 年革命给法国带来了新的政治文化，这种特征始终存在，它所激起的强大反对势力在现代法国也很有影响。根基最深、持续最久的反对势力位于西部，即朱安党人和旺代党人的故乡。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期间，这一地区执行了 15 万到 20 万例死刑，后来发生的内战中死亡人数高达 50 万人。

暴乱的先决条件是“教会民事宪法”造成的；因为西部是正统天主教地区，反对宗教改革。最后，1793 年 2 月，政府的阴谋要求激起了公开起义。革命并不是值得为之而战的事业。尽管农民从封建领主债务下解放，但新国家的税负却给这里的农民带来更重的负担，教会改革又取消了大量的慈善保障体系。地方贵族很晚才想到利用起义，他们更喜欢绅士间的战争而不是游击队行动。然而，1793 年夏天，在旺代省和周边地区爆发了全面的“教会与国王”暴动。

新成立的共和国当时为对付与国外的战争已困难重重，西部起义像是在背后来了一刀。当公安委员会（战时内阁）的权力得到集中，恐怖政策已制定，这件事就成为头等大事。强大的镇压和反击很快降临西部。1793 年 8 月 1 日的法令考虑全面摧毁起义地区。某些历史学家将其后发生的流血事件视为种族灭绝：当然是因为妇女和儿童都与男性作战人员一样不加区别地被杀死。然而这种说法既夸大了镇压的范围，又低估了暴力的双向特点。双方都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

直到 1794 年早期，恐怖笼罩着西部起义。但要镇压非正规的行动却更加困难。如同 18 世纪早期那些反对路易十四的卡米扎尔起义者利用塞维诺尔沼泽地那样，西部的灌木丛——灌木和树林覆盖的地形——提供了绝好的游击战场。洛里昂、勒芒和圣布里厄之间的三角地带成为朱安党（该名称可能来自于法语“猫头鹰”一词，起义者晚间联络信号模仿猫头鹰叫声）之乡。人们偶尔将其与外国军队和英国人登陆的威胁相联系，这只是大量发生的没完没了的反对革命官员的仇杀、当强盗土匪、拦路抢劫和政治暗杀的一个小标签而已。

尽管拿破仑坚决地控制了该地区，但在共和党派中，西部作为褪色的反动派和原始野蛮人的名声却长期流传。

势力暴乱。面对危机，一系列错误路线出台，特别是关于宗教、社会极端主义和政治中央集权化，产生了使国家四分五裂的威胁。他们同样导致产生了持久的分裂观点，从政治上看，这种观点在国民中到 20 世纪时仍持续存在。

教会财产国有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教会制度的彻底改革。对教会结构重组的“教会法”（1790 年 7 月颁布）得到教会的大力支持，但也有不少 189 直截了当的反对。对该法令的效忠宣誓演变成关于革命的全国民意测验，因为教区强迫教士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都要投票。结果出现了“宣誓者”（宣誓投票者）和“不宣誓者”（拒绝投票者）各占一半的现象，与“两个法国”的地理分界线相符。拒绝宣誓的地区——绝大多数在西部和北部——赞成教会和传统，在后来第四共和国时的选举中投票给右派。与同意宣誓地区形成对比的其他地区则反对教会，后来成为共和党人。“不宣誓者”在战争年代与反革命结盟，使得分界鸿沟进一步加深。“教会和国王”的农民，尤其是西部的旺代人，于 1793 年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他们

（第 184 页）“如果我前进，跟着我；如果我后退，杀了我；如果我死了，为我报仇。”这是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1772 年—1793 年）的话。这个年轻的贵族成为旺代起义者最早的指挥官，是西部保王党毫不妥协态度的典型。他战死在南特城外，但却在皮埃尔－纳西斯·盖兰这幅 1817 年的油画中永生。



Tresca Sculp.

PLUVIOSE

$\frac{21}{22}$ Janvier. *Le Soleil est au Signe du Verseau* ♒

[illegible]	Lever du Soleil	Coucher du Soleil	Soleil au Méridien
Paris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Rom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Madrid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Sous un leger tissu s'achemine au Boccage.
La Nymphe au doux Nectar apportant son trousseau,
Bravant Pluie et Hiver, brulante en ce bel âge
Des feux qui vont l'unir à son cher Pastoureau.

1er du Mois.	Lever du Soleil	Coucher du Soleil	Soleil au Méridien
Londres	7h 43	4h 17	8h 34
Pétersbourg	8. 32	3. 28	6 26
Vienne	7. 34	4. 26	8 52

A Paris chez l'Auteur, rue de Sorbonne N° 389

因为反对宗教改革，同时也对新赋税和其他大革命的要求心怀怨恨而起义，但被血腥镇压。

如果说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宗教问题是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那么在战争时期，它仍然是社会各个阶级和政治激进派的主要争论点。雅各宾派认为，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应该不惜与较低等级和那些对这一战略心 191 存疑虑的人建立联盟。如果说需要拯救 1793 年中的共和国，“我们要团结所有人民”。虚伪的文质彬彬的雅各宾律师、巴黎“无套裤汉”的宠儿、来自阿拉斯的罗伯斯庇尔作如是说。但是国民公会里的温和派代表们，即吉伦特派，则害怕对巴黎街头的激进分子过多让步会让暴徒掌权。雅各宾派的意见占了上风；清除无套裤汉的行动使国民公会摆脱了吉伦特派领袖，而雅各宾派控制了指挥战事的战争内阁公安委员会。为了获得巴黎和各省的支持，他们还出台了广泛的激进政策：建立确保收入和固定价格的政策；最后的封建残余被肃清；在国内和国外废除了奴隶制度；激进的离婚法律被确立；一个福利国家初具雏形。1793 年 8 月国家征兵法的实施证明了雅各宾派所推行的战略是成功的。这次征兵共募集到 75 万人，使法国军队士兵及后勤支持人数超过 100 万，这也是 20 世纪大规模战争的前奏。人们决定为革命而战；国家政策以完全崭新的方式深入每一个城市和村庄。

中央集权政治是那个年代共和文化的第三条重大错误路线。吉伦特派曾经抵制雅各宾派的民粹改革，理由是他们侵犯财产权和 1789 年的自由权；他们又以同样的理由反对雅各宾派的中央集权战略。于是一种最无情的中央集权（这个特别的词句明显源于大革命）使雅各宾派的社会激进主义付诸实施。恐怖成为“日常命令”：公安委员会掌握广泛权力，巴黎成立了革命法庭，当时在全法国发生内战的地区许多人被处死。虽然在巴黎被处死刑的不到 3000 人，但国中尸体数则以几十万计。在 1793 年—1794 年大恐怖时期被关押狱中的“嫌疑犯”可能达到 50 万人；还有 13 万—15 万人逃亡国外。这些受害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旧政权下的特权阶层受到的打击尤为严苛。

尽管这些事实令人不快，但大恐怖拯救了共和国。吉伦特派的反对社会激进主义、中央集权和镇压，看来是任性的苛求刁难，对包括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人的激进派是不公正的。许多温和派代表也将共和国的生存置于僵化的地方分权和自由之上。公安委员会的战争部长、被称为“胜利的创造者”的拉扎尔·卡尔诺，控制着右翼——主要是保王派——舆论。雅各宾派将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对手吉伦特派定性为“联邦主义”的罪人——即主张削弱公安委员会激进的中央集权化措施，并将他们等同于那些叛国的反革命者。

（第 186 页）1793 年推行的革命日历中路易·拉斐特版的月份牌。革命者坚信他们的行动是人类，而不仅仅是法国历史上的开创性日子。他们的日历起始日期是 1792 年 9 月 21 日——宣告成立共和国的日期。从前的日历——特别是与基督教有关的日历名称——全都换成与自然有关的名称。例如，“雨月”是下雨之月，时间是在 1 月底到 2 月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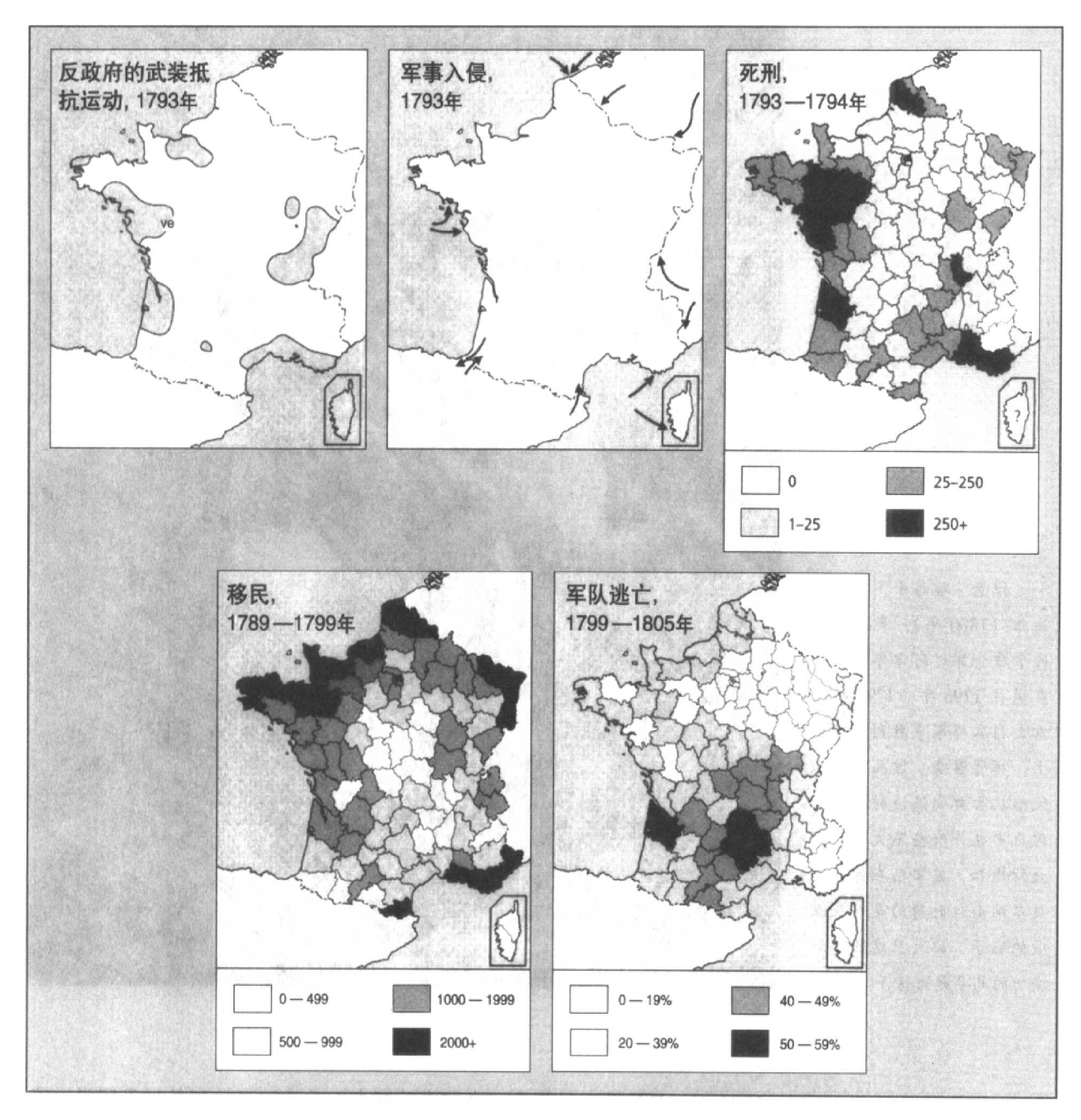


拿破仑于1800年设立的“省督”职务，在某些方面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巡回皇家执政官和“旧制度”时期的总督的继承者。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是现代官僚的先行者——职业化、受过理论和实践培训；绝对服从和忠于王室。

192 共和国刚刚幸运地度过动荡的襁褓期，雅各宾派却没有多少时间沉浸在战胜反教权主义、社会激进主义和政治极权化的喜悦之中。公安委员会的胜利动摇了雅各宾派的地位。国内反革命联盟和联邦主义被击退；到1794年春天，法国军队已经将外国军队驱逐出境。缓和恐怖的要求似乎加强，但罗伯斯庇尔和他在公安委员会的同僚们反而加大了镇压，甚至处决了昔日战友，如呼吁采取怀柔政策的丹东。不喜欢现存教会的民粹主义者看来是推动雅各宾人向一个千载难逢，或先知预示的不可能实现的“道德共和国”前进：制定了“革命历法”，规定了新的度量衡制度；建立了一种新的人民宗教形式，特别是罗伯斯庇尔所热衷的“超人崇拜”。这一切显然都无法令国民公会中地位坚固的资产阶级代表满意，于是他们起义了。1794年7月27日——革命历法02年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和他的盟友被在国民公会中策划的阴谋推翻。

公安委员会制定的政策立刻全部被彻底抛弃。幸存的吉伦特派重返国民公会，解散了“无套裤汉运动”，瓦解了大恐怖的关键组织，并制定了尽可能适合赢得欧洲战争的分权政策。一个新政权设计产生——督政府（1795年—1799年），它企图建立以1789年到1791年自由理念至上的时代。但是，法律并不能稳固新的政权；自由反而给了政权中的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派以充分的活动空间。1796年，一场由格拉丘·巴贝夫策划的基于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破坏性运动被挫败。右翼保皇派分子在南部发动了一场血腥的针对前雅各宾派支持者的“白色恐怖”，天主教会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立宪保王派也在选举中收获颇丰。督政府的支持者使自己摇身变为八面玲珑永不倒下的政治精英，而在这场恐怖中幸存下来。他们在选举中做手脚，控制投票过程从而握紧大权，并不断地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以保持足够强大的实力应对欧洲战争。

18世纪90年代晚期，一个新的令人担忧的现象从战争中浮现，其形式是产生了一批政治将军。例如，比歇格吕和莫罗属于保王派；奥什，一个旧制度时的马夫、大革命“任人惟贤”的活样板，被视为雅各宾人。同样，早年的科西嘉年轻军官拿破仑·波拿巴——他名字中意大利语发音的“U”字母在18世纪90年代晚期才拿掉——赢得右派的器重靠得是“凭借几发小霰弹”在1795年9月镇压了巴黎暴动。1796年—1797年间，波拿巴在意大利北部的一系列战役中大获全胜而声名鹊起，法国因此在同欧洲势力的对抗中取得上风。随即，波拿巴试图在近东削弱英国人势力的决定导致双方于1796年—1797年在埃及开战。当他的计划在那里受挫后，193 遂返回巴黎，发现督政府介入另一轮危机中。于是，他被要求领导一次政变，旨在保卫1789年的胜利果实而避免回到1793年—1794的混乱年月。他这样做了，但却以他自己的方式。1799年11月2日（法国革命历法纪



"恐怖时代"的影响范围。"恐怖时代"在各地造成不同的反响。处死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发生内战和外国入侵的地区。有关军队开小差者的地图充分显示出传统的东北部与西南部的界线；边界的设立造成了移民比例加大。

元8年雾月18日）的政变推翻了督政府，并建立了新政权执政府，他在其中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力。法国大革命仿佛一下子落入了一个科西嘉冒险者的手中。

拿破仑帝国

尽管他的统治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拿破仑——起初是执政官，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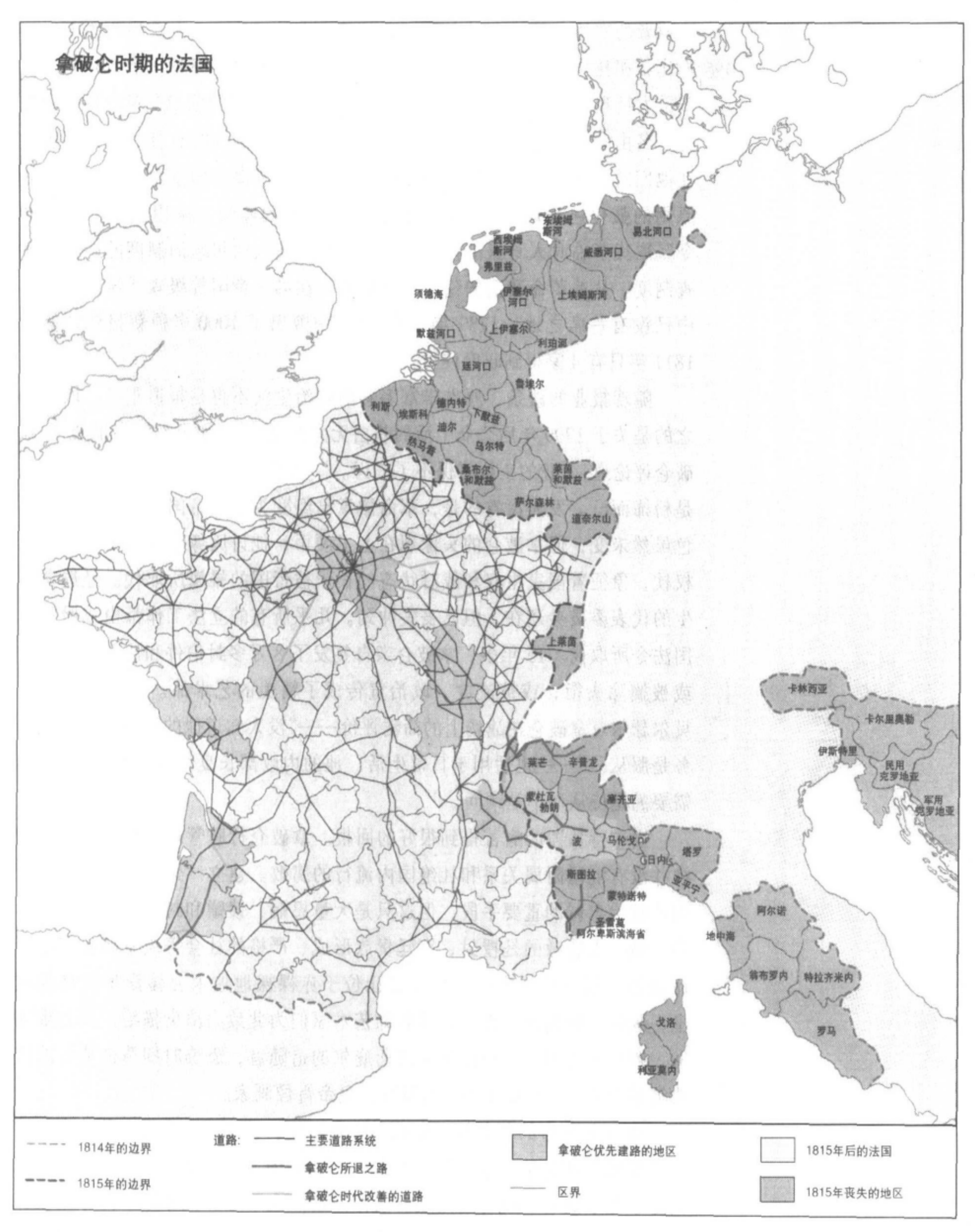


雅克-路易士·大卫的油画（1800年），表现年轻的拿破仑穿过阿尔卑斯山，在通往1796年—1797年在意大利取得军事胜利的道路上，挥臂召唤。该画的艺术风格从古典向浪漫转变。可对历史也许有些不太公正：众所周知，波拿巴在穿越圣贝尔纳山口时骑的是一头温顺的骡子，比大卫这匹腾跃嘶叫的马要稳当得多。

1804年起是皇帝——作为一个非常独断专行的统治者，却并未采用很多军事独裁的做法。法兰西第一帝国是法国历史固有的又一个中央集权的典型代表，其最新的表现就在“恐怖统治”时期。“从克洛维到公安委员会，”拿破仑以这种以其名字吸引了偏执狂的傲慢无理的口气写道，“我拥抱所有这一切”。

194

从他的话中不难读出，拿破仑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法国大革命胜利之上的，尽管他为自己提供了以法国传统为基础的替代政权而自豪。“我就是革命。”他宣称——但同时又辩解道：“革命已经结束。”他签署了“革命土地条令”，将教会土地出售，从而得到所有农民和资产阶级



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分散的欧洲权力体系的中心，1815 年以后很少保存下来。然而拿破仑政权将法国边境的许多地区置于革命时代的宪法和改革（取消封建制度，法律改革，等等）之下。通讯的改善使得落后地区在经济上 195 （常常也是政治上）能够更紧密地结合进来。政权的基础单位是当时以“省督”为首的省。

购地者的支持。1803年法兰西银行的建立有助于稳定金融。税收体制得到[196]简化，相比18世纪90年代的旧税制更加富有效率。同时，革命时期的许多重大行政改革成果也被维持下来，只是在1800年的独裁变革中每个省均有一名由拿破仑亲自任命的省长。省长其实是旧制度时总督的现代翻版，在他们的辖区内，他们扮演小皇帝的角色，以确保帝国意志的实现。独裁原则的强化还表现在自由权方面：不经审判的监禁，采用精致的“诏书令”取代了临时人身保护权。拿破仑采取了使人回想起旧制度的严格的审查制度。从前革命政治的论坛——报纸，在第一帝国等级森严压制的世界中已没有一席之地：1789年后的10年中曾出了1000多种新报纸，但到1811年只有4家得到政府许可。

随着报业的萧条，原本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不再是报道重点，取而代之的是关于1799年后公众生活的苍白无力的报道。“如果不管住报纸，”拿破仑评论道，“我的王位将保不了三天。”尤其在拿破仑称帝后，政治仅仅是粉饰而已。发人深省的是，革命徽章已经变为个人帝国的象征物。三原色虽然未变，但拿破仑的头像现在上了硬币；他讨厌像卡佩国王那样手执权杖，象征着国家主权和战时状态的长矛被帝国的雄鹰所取代。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委员会还在，但已丧失冲劲。几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由成册的帝国法令所取代。15年多，拿破仑亲自签发了8万多封信件和法令。政敌们或被摘除头衔，或被流放。政治宣传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也许马歇尔·贝尔瑟尔对拿破仑在战场上的简洁评价——“没人知道他的想法，我们的义务是服从。”——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他的内政部长夏普塔尔后来说：“他需要的是侍从而不是顾问。”

当“侍从”的痛苦得到很好的回报。拿破仑行政管理的精干有效的精神并没有混淆附属关系和杜绝国内流行的腐败。建立“荣誉勋位团”成为保证政治忠诚的重要手段，但这只是大量恩赐、馈赠和封地当中的冰山一角。最令人感激的是授封、宫廷贵族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重新建立。革命联盟所倡导的朴实的平均主义让位于赤裸裸地追求奢侈豪华和富丽堂皇，画家、雕刻家、作家以及装饰艺术家们为此致力渲染描绘。例如雅克斯·路易·大卫——曾经是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恐怖时期革命节日的庆典策划大师——转而变为令人赞叹的皇帝肖像画家。

1804年颁布的著名的《拿破仑法典》（或《民法》）成为这种革命理性主义和独裁原则混合的缩影。经过革命时期10年间无数次的会议讨论，法典终于在拿破仑当政时期完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惟才是举的原则被保[197]留下来，但从新法典确定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的规定上，反映出拿破仑对等级制的推崇。在《罗马法》的影响下，父系家庭的权威将女性权利抛在一边。



卡通漫画《跨越地球的停顿》。自18世纪90年代起，英国人对意大利战役的年轻胜利者的敌意，在大量的卡通漫画中表现出来。法国的扩张要由“小约翰牛”来检查。

女性在大革命10年间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的作用——组织俱乐部，直接参加战斗，宣传了解革命事件——超过了近代欧洲的任何革命时期。但是，启蒙时期“分隔的世界”的意识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激进政治家遣责像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样的女人们使政治变得女性化，是在王权政体下对政治的亵渎。就连雅各宾派也把女性俱乐部视为左翼组织，主张女性应该留在家中培养有教养的爱国者。拿破仑认可这一观点，并在《法典》中将女性归于次要地位。按照政治精英的家长观点，许多妇女到宗教中寻找寄托毫不足怪。事实上，从1815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修女的数量增长了10倍。通过教育，天主教、慈善事业甚至个人爱好，为妇女在私人范围以外提供了空间。

其他措施也是如此。此外，靠类似旧制度“诏书”的无审判监禁也被用来对付有过错的妻子、女儿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大革命期间，“家庭法”曾主张平等、消除性别差异；但在拿破仑当政年间，女儿在家庭中的权利被有系统地大大剥夺。为战争寡妇、老年人以及未婚母亲提供的相当 198 慷慨的社会福利也戛然中止。18世纪末制定的为遭到殴打、遗弃的妇女改

善法律地位的自由离婚法，以对女性不利的方式加以修订。1815年妇女受教育状况远不如1789年；妇女只能通过教会接受教育，国家只关心教育男孩。拿破仑创立的中学主要是为了培养男性社会和官僚精英。拿破仑帝国对妇女是坏消息，哪怕是开始恢复和改善她们的境地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女性头脑愚笨，”拿破仑宣称，“还变化无常，意味着她们只能通过宗教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历时10年激烈的反教权主义之后出现的宗教复兴，被认为具有很好的稳定家庭和社会的功能。对基督教义，拿破仑宣称没有“发现升天的秘密，而是社会秩序的秘密”；他甚至笑称自己要皈依伊斯兰教，因为后者对实现政治统治更有利。1801年，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署《教务条约》，对拿破仑帝国的统治给予重大支持。《教务条约》表明罗马教皇已经对1789年大革命中宗教资产国有化表示认可，同时也弱化了反对派“教会与国王”的立场。天主教得到恢复并成为“大多数法国人信奉的宗教”，受到政府的监控。（但这并没有影响拿破仑政府对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认可和资金支持。）所有的努力都致力于让主教成为“紫衣省长”，教区牧师成为“黑衣市长”。

第一帝国是能够在法国社会重建大革命时期所失去的社会和谐。教士融入国家之中，宗教少数团体也得到安抚。流放贵族们现在回国，投入和新兴资产阶级争夺他们在帝国阳光下的地位。拿破仑试图在西印度群岛重建奴隶制，但却因此很快失去了许多海外殖民地。尽管如此，拿破仑在欧洲发动的无情战争仍然缔造出只有查里曼大帝能够与之媲美的法兰西帝国：130个地区受制于巴黎；众多卫星国和联盟国点缀在版图上；他的家族成员自由地占据着欧洲各国王室的头把交椅；只有大不列颠仍然固执地保持敌对状态。18世纪90年代末，战争已经不再是保卫祖国，而成为赤裸裸的扩张战役。可以说，是拿破仑的个人才干使得加洛林王朝风格的对战利品的渴求，转变为对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政治支持。拿破仑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断地在所征服领土上转嫁战争成本（以提高税率和征兵的形式），做到了发动战争而无须在法国征收高额税收和陷入使国家破产的举债之中。他所提倡的“大陆体制”为采用半殖民方式剥削许多欧洲国家提供了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他使被征服领土的经济利益无条件地从属[199]于法国需要。这样一来，拿破仑使被征服的欧洲支付法国的战争开销，而法国境内的民众则免遭战乱，独享繁荣。正如拿破仑所言，他“宁愿面对战场上的2万名士兵，也不愿面对里昂大街上的2000名工人”。

拿破仑政权因此聪明地平衡了国内稳定和外部扩张。“但愿这一切能够长久。”当拿破仑的母亲看到自己令人骄傲的儿子成为欧洲大陆的仲裁者，其他儿女也都成为欧洲统治阶级的骨干力量时，不由得这样感叹道。



但事实并非如此。1810年前后，帝国遇到了严重问题。虽然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法兰西控制之下，但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大的英国却不在此列，并不断破坏并阻挠拿破仑的经济统治。拿破仑曾到达抢劫边界——在他之前的查里大帝也发生类似的征兆，但没有对他自己后勤上和政治上的过度支持则无法进一步扩张。自1808年开始的西班牙半岛战争证明他被触到了痛处。和罗马教皇的争吵则导致法国在1809年接管教皇各处封地，这是一个失去天主教在许多方面支持当局的行动。大陆体制开始崩溃。自1794年以来法国第一次独自承担战争开销，高税收和重兵役接踵而来。更致命的是

200

弗朗索瓦·热拉尔的油画表现的是1825年查理十世的加冕仪式。衣着华丽的教会人士和摹仿古人的动作，凸现了艺术中的浪漫主义与右翼的紧密联系。夏多勃里昂是这一事件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

发生了经济危机，导致面包涨价、企业破产、工人失业。

拿破仑企图重整旗鼓的战略出击——1812年—1813年的莫斯科战役——证明是一场灾难。他在军事上惨败，损失了50万人的队伍，又发现自己要面对已捐弃前嫌最终合作的欧洲各国联盟。败仗接踵而至，1813年在德国和1814年在法国境内战败。1814年底，拿破仑被赶下王位，并被送到意大利小岛厄尔巴。1815年，拿破仑出人意料地重返法国，许诺创立新的开明宪法，并采取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行动。开明的拿破仑像换了一个人，然而，他无法使已经厌恶他的召唤的民众信服。他的“百日执政”以滑铁卢战役而可耻告终。这一次，他真地走到了尽头。

从重建到共和

随着拿破仑乘船远去贫瘠荒芜的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度其余生，拿破仑帝国也分崩离析。现在回到它1792年边界内的法兰西政权，通过路易十六的兄弟路易十八（路易十六未登王位的儿子“路易十七”1795年死于狱中）倒退回波旁王朝。来自“欧洲联盟的行李车”中的“合法”王朝，看来要重建曾被雅各宾派分子、无套裤汉和权迷心窍的将军们无情破坏的自然秩序。然而把时钟拨回到1789年大革命前的愿望显得令人吃惊地不合时宜；不管怎样，1789年和此后的岁月是围绕政权合法性这个问题度过的。事实证明，把在大革命的车间里建成的“国家”解体绝非易事。自1789年以来的岁月在波旁“合法主义”之外产生了政治合法化的新形式。“当然的”统治阶级已不再那么当然。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法国将生活在法统的各种替代形式的冲突与竞争中，每一位继承者都要靠自己的语言、象征物和支持者，在政治文化上开展竞争。

在这种过于沉重的气氛中，表面微不足道的政治举动会引起轩然大波。例如波旁分子和波拿巴分子都反对具有共和风格的《马赛曲》。同样，波旁分子在重新将王朝的白色定为国旗颜色方面，赢了永远遭人痛恨的共和党人和波拿巴分子。波旁分子对他们祖传白色的疯狂钟爱则使他们失去[201]1830年后重新掌权的机会。路易·菲利浦（1830年—1848在位）较理智地恢复三色旗和《马赛曲》，尽管他因未将攻占巴士底狱的纪念日7月14日作为国庆日而冒犯了共和党人。作为一个敏锐的法国政治的观察家，卡尔·马克思指出，正如1789年和1794年法国革命家以古典希腊和罗马作为效仿对象，1848年这一代人“以史为鉴，写己诗篇”，以革命年代的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们——还有波拿巴分子们——打造自己。政治家们在整个19世纪通过后视镜来看待自己的未来。

然而，如果说政治生活危险地变幻莫测，那么在法国社会内部也蕴藏

着包容冲突和确保高度连续性的力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任人惟贤”的做法，确保专业阶层和官僚机构提供社会生活的稳定性。虽然省长们来来去去，但省长的行政体制却依然如故，坚如磐石。1789年—1815年间的行政管理成就——各省区划、新法院、税收体制以及法兰西银行——都保存完好，而《拿破仑法典》则在整个世纪及以后为财产转移和公民权利提供了框架依据。

在巴黎政治肉搏战中生存下来的那些大革命的胜利者，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官僚以及富农，组成了社会生活的骨干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1789年法国大革命可以被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岁月中损失最惨重的教士和贵族们只有努力适应新社会才能求得发展。即使那些复辟的波旁人也不敢重塑旧秩序并拥有特权。他们革命前的权力大多拱手让给国家监护。教士们只得接受失去土地的现实，一如许多流放贵族眼看领地被没收：从1789年到1815年，贵族土地占国家土地面积从25%降到20%。波旁王朝的复辟也没能扭转贵族势力长期减弱的趋势。

政府中的要职日渐落入专职人员和资产阶级，而不是1789年以前垄断要职的贵族上层之手。复辟王朝的路易十八（1815年—1824年在位）和查理十世（1824年—1830年在位）竭尽全力取悦贵族。他们挑选贵族作为他们的大臣，将他们安插在最重要的行政、军事和宗教位置上，致力于打造新的“皇冠与圣坛”联盟。但这种努力只能引来怨恨。波旁人越是远离革命成果便越是变得脆弱。路易十八称自己不愿成为“两个民族的国王”，并颁布了和1791年宪法十分相似的新宪章以博得可靠支持，挑选温和派和斡旋顾问。然而坚持强硬路线的波旁支持者们和“过激派”，比路易十八本人还要保王，他们在1824年查理十世登上王位之前便开始兴风作浪。

查理十世，一个晚年才皈依宗教的浪荡子的表现十分拙劣。他毫不顾 [202] 及宗教行为早已失去魅力，在兰斯举行传统加冕仪式，包括举行触摸礼以消除“国王的魔鬼”的仪式。这种象征主义看上去令人尴尬地虚假和过时，正如1825年的将亵渎罪判处死刑的“渎圣法”那样。即使是最听话和极其安静的反对派，也对如此重建君权神授感到难以接受。但是，直到1829年—1830年，农业歉收、价格暴涨和商业崩溃，他们的抗议才获得较大的支持。查理十世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以及以君权神授取代人民意志的做 [203] 法，无疑使宫廷政变呼之欲出。在为期三天的巴黎起义中——1830年7月27日—29日“光荣的三日”——孤家寡人的国王被迫退位。

正当欧洲的各激进派和保守政府都认为1794年的情形很可能再度上演的时候，波旁王朝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中的政治活动家的迅速行动，避免了恐怖统治或波拿巴独裁的可能性。君主制得以延续，——但在新人手中。为了取悦巴黎人，“两个世界的英雄”、年长的拉法耶特将王位传给奥尔良



欧仁·德拉克洛瓦的画作《7月28日：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是纪念“光荣三日”的作品之一，表明浪漫主义艺术从右翼转向左派。这幅画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在1831年的沙龙中展出。

公爵路易·菲利浦——波旁王朝旁系的后代。在恐怖时期，他的父亲虽然自称“公平的”菲利浦，并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却仍然没能逃过走上断头台的命运。新国王18世纪末曾在革命军队服役，并赞成温和、自由的革命理念。

“公民国王”将领导一个“资产阶级王朝”。路易·菲利浦自诩能够平衡“过分的民权”和“滥用的王权”。查理十世曾试图像圣徒般治病；路易·菲利浦则拿着伞。查理十世暗中破坏自由主义；路易·菲利浦则大力推行之。审查制度因此得到缓和，财产税负担有所减轻，以及选举产生的

议会被允许立法。然而这并非社会革命。选民有所扩大，但很有限：仍然仅是25万大地主拥有选举权。但是，统治阶级的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律师、商人、中等地主和金融家。资产阶级王朝鼓励资产阶级的金融家、商人、自由职业者、自耕农以及政客之间相互交流。新政权并不在贵族沙龙或乡村豪宅逐利，而是流连在股票交易市场、商业大楼和资产阶级富豪的私宅。

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为法国创立了无与伦比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废除封建制，统一国内市场，建立国家法律体系，统一度量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建立国家银行，等等。但是，当工业革命正在邻国大不列颠如火如荼之时，法国却不知不觉地落在后面。一方面，煤矿和铁矿资源的稀少阻碍了工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1789年—1815年事件之后法国经济大调整。在那些年月中，曾经是旧制度下最活跃的经济因素——殖民贸易——受到冲击。法国在18世纪努力打拼建立的殖民帝国，实际上被一扫而光。1815年后，法国试图重建一个全球帝国。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路易·菲利浦也先后在西非、马达加斯加岛以及南太平洋诸岛有所收获（例如塔希提岛成为殖民地）。尽管如此，1800年后的法国较1789年之前拥有的是更多地以土地为基础的大陆经济。事实上，经历 [204] 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大西洋沿海逐渐转移到东北部边境地区。曾经在18世纪受益于殖民地统治和贸易的大港口波尔多、鲁昂、拉罗歇尔、圣马洛、勒阿弗尔等，在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上已衰退，而斯特拉斯堡、里昂等东部城市则繁荣腾飞；北部靠近煤矿带的城市也开始扩张。

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同样对1800年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绝大多数农民都将自给自足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1817年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滑，以及殖民地经济的衰退，使得农民们很难在开放的市场中获利。曾经被城市人指责的“传统主义”和“古典主义”，成为农民们回应当时特殊经济局势的理性选择。短期和季节性迁徙也成为主要谋生手段之一。全法国最落后的地区中央高地、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山脉地区，提供了流动性最强的部落，出来的有收割人、挖沟人、仆人、零售商、教师以及演艺人员（许多比利牛斯农民资产清单上拥有的奖赏是露天市场上的狗熊），他们获得的报酬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现代人视为陈腐、短视的农民事实上选择 [205] 了最“现代”的行为方式：系统性的计划生育。在19世纪之前，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拥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18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人口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这种趋势延续到19世纪。营养状况的改善是主要原因；医疗水平的提高，如天花疫苗（1798年后）的推广，也产生影

204

奴隶暴动

圣多明戈（现为海地）在18世纪时是法国兴旺的殖民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西印度的成功来自于黑奴的蔗糖种植；但在18世纪90年代却成为黑人解放运动之地。这和法国自身无关：1790年发生了首次奴隶抗议，1791年即被投入黑人的血泊之中。国民大会1794年初决定取消奴隶制度，只不过是接受了既成事实：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奴隶军队已经控制了相邻的前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戈。

杜桑在18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领袖。他自己就是奴隶，1777年在30多岁时得到解放。他既是黑人的偶像，也受到白人的尊敬。他试图与白人团体和睦共处，重建岛上的繁荣。但形势很不稳定，包括法国人、黑人激进分子和驻扎在加勒比海的英国军队纠缠在一场复杂的游戏中。杜桑坚持自己是法国人，但在1800年，他作为一个忠实的波拿巴分子并不能避免被抓获，并流放到法国本土，投入监狱。拿破仑打算恢复奴隶制作为恢复岛上经济的基础。“我自己是白人，”他扬言曾经说过，“我站在白人一边。”

“通过推翻我，”杜桑给拿破仑写信指出，“你已经将圣多明戈的自由之树的树干砍倒。但它的根还将会长出来，因为他们很多很深。”尽管他死在法国的监狱中，但他在殖民地的黑人反对派们却靠黄热病的帮助，让法国武装部队付出了代价，并于1804年建立了独立的黑人国家圣多明戈。



杜桑·卢维杜尔。他的名字卢维杜尔意为“打开通道”，源自他在与敌人进行的战斗中靠凶猛杀出血路而得名。

响。1800年以来，虽然法国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但它的人口出生率却在下降：从1750年前40‰的出生成活率下降到复兴时期的32‰，再到世纪中期的26‰。这场发生在农民床上的无声性革命，与远离教会戒律的农民对宗教日益无动于衷相关；更重要的是《拿破仑法典》引入平等继承权，使农民产生缩小家庭规模的动力。当时农民们控制生育——看来主要是靠体外射精——可以避免过多的继承人分割家族土地，从而拥有足够的土地以保证下一代人能够继续自给自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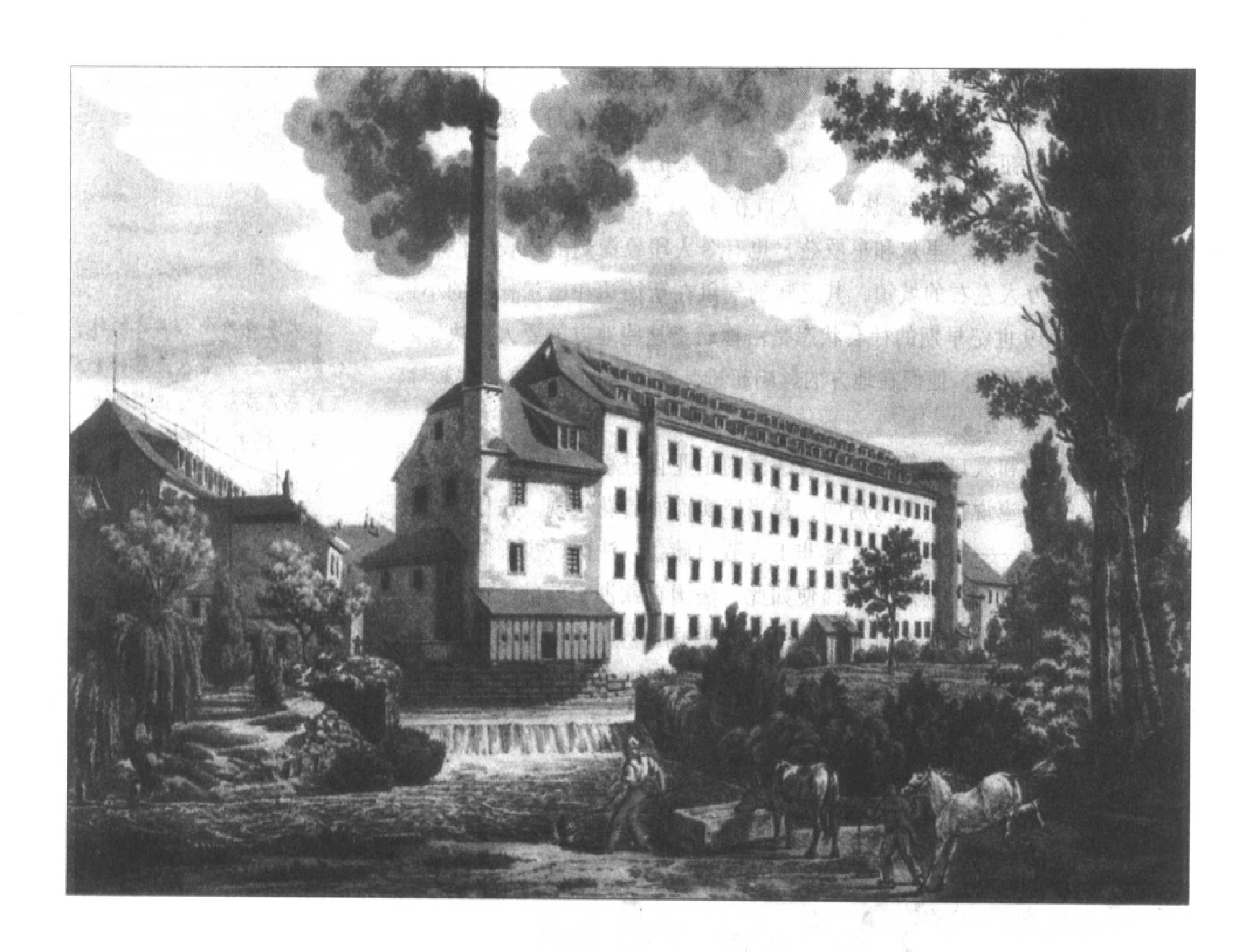
此时，法国仍然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小城镇遍布全国。法国的农206业人口比例高于它的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在英国，城市人口数量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在意大利是在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是1900年左右；在美国则是20世纪20年代。但是，法国直到20世纪30年

代才迎来这一时刻。法国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仍然靠种地为生。在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法国确实有将近一半的省份拥有全日制的农业人口。更重要的是，除了某些例外，城市规模也很小。巴黎算发展快的，人口在1800年—1850年间增长了一倍；工业城市如里昂、里尔和牟罗兹，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但更具代表性的是一万人左右的城镇，其乏味的气氛在斯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得到描绘。19世纪早期的社会状态是由称霸于这些地方的要人所决定：地主（包括许多贵族，他们在地方的影响超过其在国家范围的重要性）、高利贷者以及职业阶层。

因此，社会和人口的背景决定着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即便拥有合理的管理框架，也应当说仍然是滞后的，稳当坚实而非昙花一现。法国的机械化程度低于英国——因为拥有大量非工人劳力储备，法国较少面临劳动力瓶颈，这是实行机械化的动力。即便如此，法国在欧洲大陆的英国各经济207竞争对手中仍然走在前列，到1870年前后，法国已经成为欧洲第二大加工产品出口国。英国出口的是大批量生产的中等质量产品，而法国则专门提

火车成为令人满意的社会象征。一个令人羡慕的繁荣的资产阶级家庭正在看火车头，代表工程成就（隧道、桥梁）、社会混合（旅客）、速度和科学进步。背景可以看到需要换掉的法国象征：一个城堡、一架风车、一座教堂和一个赶着骡子的农民。





自18世纪中叶起，考克林王朝就在独立的帝国城市牟罗兹率先进行棉花加工制造。1798年并入法国后，该市在19世纪成为法国最发达的纺织业中心之一。

供久负盛名的精细加工的奢侈品（例如丝绸、手套、瓷制品等）。

19世纪30和40年代，更是在完善经济的基础建设方面长足发展，为日后的腾飞打下基础。公路和运河建设伴随方兴未艾的铁路投资。1842年，国家和商界以伙伴关系联合投资兴建铁路的重要法律颁布。在1848年七月王朝覆灭之际，以巴黎为中心的密集铁路网已经崭露头角。看似沉寂的法国实际上进行着大量贸易和通讯业务。法国每年有7000场交易会，首推3000场每周定期开设的集市。19世纪20年代旅行推销员的出现，媒体广告的发展也推动了通讯和流通。

经济的平衡发展掩盖了工业化带来的剧痛。后者虽然不及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么残酷，但也给工人阶级施加了巨大压力。农民固守农田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然而生活条件依然严酷。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在1830年《光荣三日起义》的作品中，描绘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并肩作战；但是资产阶级很快便在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与过去的盟友拉开距离。建立激进共和国的呼声被平息。

1831年陷入贫穷的里昂丝绸工人起义被无情镇压。对穷人生活条件的社会关注因赞成“自由贸易”态度而遭反对。政权支持者们攻击一切工业立法的主张，称工厂为“父亲之家般神圣的圣殿”。“无论工人们的命运如何，”贸易部部长在1833年如是说，“改善它并不是资本家的责任。”看上去也不是政府的责任。在城市中，像样的房子却有着不像样的设施，供水和卫生条件以及工作环境造成令人绝望的不卫生环境。在牟罗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新生儿的平均寿命超过30岁；而对织布工孩子来说只有4岁。1832年霍乱再次出现，给城市人口带来浩劫，仅在1853年—1854年间就有约14.3万人死亡，这看来是城市化风险的可怕警告。

穷人严酷的生活条件得到右派一定程度上的回应。牧师费里西泰－罗贝尔·拉梅涅鼓吹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天主教”；同时，查理·奥扎南则创建了“圣万桑·德·保罗协会”，以开展慈善事业。虽然右派对慈善事业作为赢得大众支持手段的政治潜力有所警惕，但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天主教徒却更渴望回到旧制度，而拒绝适应工业社会。尽管工人阶级觉得来自右派的号召没有吸引力，但1789年的革命传统看来被资产阶级上层精英绕开，他们对城市的糟糕状况无动于衷。结果是新的激进传统发展起 208 来。三色旗与奥尔良分子的“银行统治”而不是“人民统治”相结合，新的象征出现了。1831年，在里昂飘扬起无政府主义的黑旗。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街垒战中，成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象征的红旗也出现了。

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社会主张得到广泛表达，城市工人阶级和部分清醒的资产阶级分子联系在一起。他们基于往往不同于18世纪末的激进传统，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社会主义者路易·布兰克倡导以全民公决为基础的温和纲领和社会改革。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却反对国家作为改革的代理人，倡导工人之间互相合作的形式。边缘作家们为人所知，他们写的廉价小册子广泛发行，社会主义报纸《大众蜂箱》和《车间》也发表言论。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833年的“基佐法”规定在每个乡镇建立小学，是对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推进。

这时浪漫主义的文化运动给这些反对派力量添加了几分光彩。复辟时期的浪漫主义尽管是反对传统价值观的运动，但是在夏多勃里昂和博纳尔的手中，也具有政治上保守的一面。这个运动确实主要涉及摒弃艺术领域 209 的古典主义。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新一代将浪漫主义的目光转移到政治左倾上来。其中艺术方面有欧仁·德拉克洛瓦；戏剧和其他作品方面有维克多·雨果；还有斯汤达，他对拿破仑的赞赏是建立在对个人主义、精力和英雄主义崇拜的基础上。浪漫主义运动中玩世不恭的波希米亚派——在巴黎左岸的学生圈子中力量较大——对“资产阶级王朝”追求物质的单

208

弗洛拉·特丽斯当

“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一个处在最底层的男人也能压迫一个人——他的妻子。”这些女权主义观点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弗洛拉·特里斯当（1803年—1844年）根据自己的经历提出的。作为秘鲁领主和法裔西班牙人的私生女，特里斯当很早便成家，并在1816年回到法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废止了革命时期通过的自由离婚法。

好运降临使她结束了受丈夫虐待的日子：她丈夫在街上试图射杀她，于是在宣布她丈夫患有精神病后这桩婚姻也被解除。从那时起，特里斯当和追随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的一些女活动家建立了密切联系。19世纪30年代，特里斯当到英国访问了工人阶级邻居；她



的《伦敦漫步》（1842年）一书可以和恩格斯的《论工人阶级的状况》相比较，对工人阶级深受剥削的现实进行了尖锐描述。

她无所畏惧，精力充沛，周游列国向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组织传播女权主义思想。然而她所鼓吹的妇女和工人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理想却遇到无情的现实。工人们觉得她以恩人自居，许多社会主义者既是性别歧视者也是反革命。甚至许多主张打破妇女社会规范的女性，如以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和穿长裤而在资产阶级阶层引起轰动的女小说家乔治桑，也反对女权主义。弗洛拉从生到死都是局外人；她的著作《流浪者遗嘱》（或《女性的解放》）在她死后于1846年出版。

调生活进行间接的批判。这种波希米亚主义最初是为了产生震动，即如诗人奈瓦尔拿着一只拴着的龙虾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时在上流社会产生的轰动效果。（当问他为何这样，他的回答“它不叫，但却知道深处的秘密”显示了某种无可指责的荒谬逻辑。）

1848年，路易·菲利浦的走中间道路的王朝支持者寥寥无几。知识分子阶层对政府所代表的任何东西都意见不一。右翼分子仍然怀念大革命前的价值观，左派则发展了自己的新政治传统。即使在政治中心，中层资产阶级感到被政府高层精英甩下来，自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就批评不断，因为经济走上了下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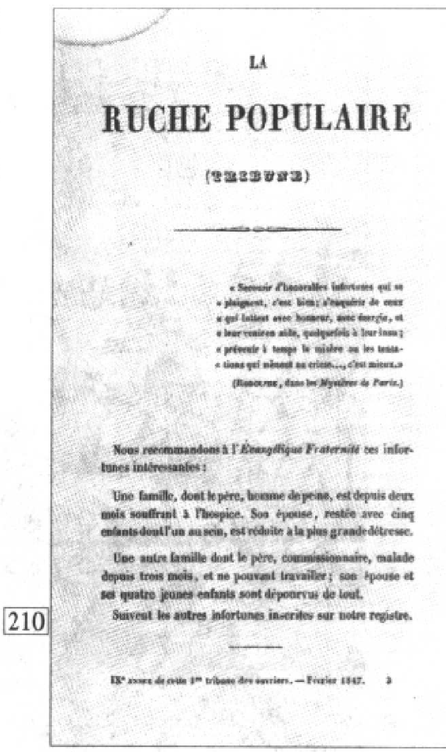
第二共和国

没有波旁王朝分子势如破竹的勇气，缺乏波拿巴派世袭的华丽，奥尔良派分子发现难以树立坚实的、即便只对许多他们自己同类有吸引力的资产阶级中间派形象，——且不提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贵族和工人阶级。19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困难开始展露，和历史上的经济困境相

似：农业歉收，食品价格暴涨，加工的产品供大于求；出现工业危机、破产和失业。脆弱的政府威望终于坍塌了。

在受教育阶层中，围绕号召扩大选举权的不满达到白热化。政治性公共会议被禁止，所以交锋的“前线”是在各大城市公共宴会上。1848 年 2 月巴黎举办的一个宴会演变为一场政治游行，1794 年无套裤汉运动的后代们走上街头展开街垒战。惊慌失措的路易·菲利浦宣布退位，一个由记者、自由政治家和律师在巴黎组成的临时政府立即宣告成立共和国。

“当法国着了凉，”奥地利大臣梅特涅说，“全欧洲都要打喷嚏。”仿佛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二月革命在全欧洲范围内掀起了起义和革命浪潮。第二共和国的早期历史（1848 年—1852 年）并非游离于反对造反活动的背景之外，因而革命分子们指望法国提供类似 18 世纪 90 年代派出军队那样的军事援助。在巴黎，政治活动分子也像在上演一场大革命戏剧。此时的政敌已经不再是 1789 年旧制度的贵族，而是“资产阶级贵族”；他们巧妙 210 地从新政权中获利——是“集权的资产阶级”而不是集权的王室。斗争已经不再像 1789 年围绕着等级和土地展开，而是阶级斗争。“三个等级”，巴尔扎克写道，“被我们所称的阶级替代。我们有文化阶级、工业阶级、上层阶级以及中间阶级，等等。”目睹了 1848 年政治危机前前后后的托克维尔宣称，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类似一种奴隶战争……”


LA

RUCHE POPULAIRE

« Secourir d'honorables infortunes qui se plaignent, c'est bien; s'enquérir de ceux qui luttent avec honneur, avec énergie, et leur venir en aide, quelquefois à leur insu; prévenir à temps la misère ou les tentations qui mènent au crime..., c'est mieux. »

(Rodolphe, dans les Mystères de Paris.)

Nous recommandons à l'Évangélique Fraternité ces infortunes intéressantes :

Une famille, dont le père, homme de peine, est depuis deux mois souffrant à l'hospice. Son épouse, restée avec cinq enfants dont l'un au sein, est réduite à la plus grande détres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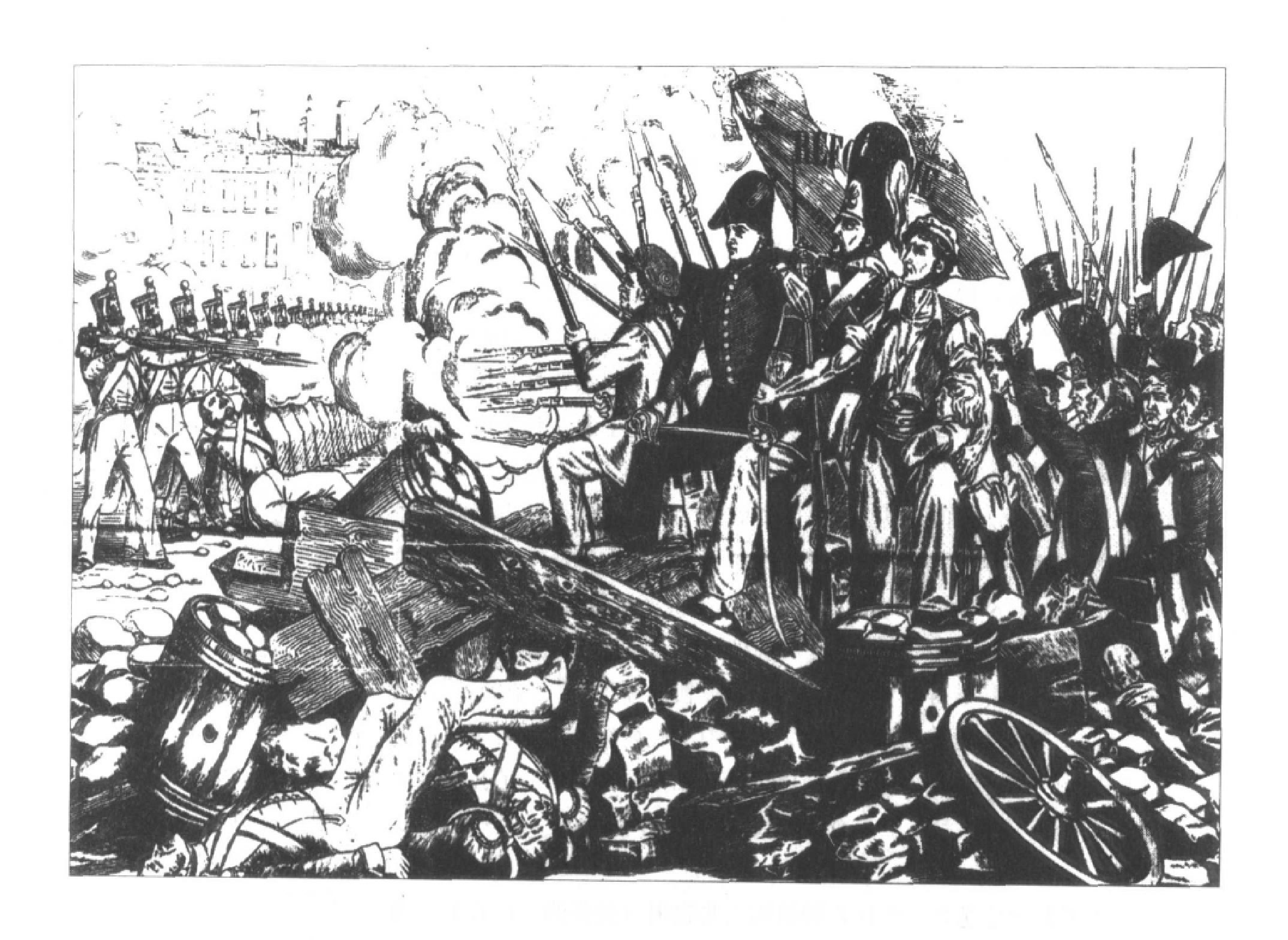
Une autre famille dont le père, commissionnaire, malade depuis trois mois, et ne pouvant travailler; son épouse et ses quatre jeunes enfants sont dépourvus de tout.

Suivent les autres infortunes inscrites sur notre registre.

《大众蜂箱》的首页，1847 年 2 月。七月王朝期间大量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纸杂志问世，但都是为农民和工人而出，并由他们写作。

斗争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第二共和国而展开的。巴黎街头激进派支持社会主义者路易·布兰克：他被选进临时政府，在他的影响下导致建立国家工场，对缓解巴黎严峻的失业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举动激怒了全国的温和派，他们理解巴黎激进派的影响。后者主张建立一个“社会共和国”，再搞恐怖统治，在“落后”、“狂热”和“吉伦特派”的省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反宗教独裁统治。红色恐怖将温和派和右派的观点在全国动员起来。当政府关闭国家工场，导致巴黎激进分子走上街头时，冲突在 1848 年 6 月终于公开化。尽管设置路障，激进分子还是被卡芬 211 雅克将军率领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约 5 万人参加了“六月数日”革命，1500 人被杀，1.2 万人被捕，另有 5000 人后来被流放。

在“六月数日”的血雨腥风中，红色恐怖被驱除。即便在当时，政治格局也因选举而改变：社会主义代表不到 100 人，温和共和党 500 多人，君主派约 200 人。在这场向右转的选举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引入全国男性公民公决，选民数量从 25 万猛增到 900 万。新出现的现象是农民比与巴黎工人运动势均力敌的激进派更多地参与投票。继承人也发生了变化。1848 年 12 月以同样条件选举产生了总统，获胜者是——以 700 万张选票中的 570 万票当选——“伟大人物”拿破仑的外甥路易·波拿巴。保王派由于



1848年2月的街垒战成为共和及进步的爱国力量相逢的地点：士兵、市民和孩子战胜了君主花钱雇的军事走狗。这是一个明显的男人世界：在共和主义的改革派时期和王权时期，妇女都被归入到私人生活领域。

意见过于分散而无法推举出可靠的候选人；而冒牌的波旁王位继承人，曾经被查理十世选为继承人并授予亨利五世头衔的尚博尔伯爵则过于强硬。共和党人也因在“六月数日”中自相残杀伤痕累累而毫无效率。看来因持续不断的经济困境而疏远了共和国的广大农民选民怀念波拿巴，是有一定依据的。拿破仑曾支持革命土地法令，在他统治期间有过——尽管带有怀旧的模糊性——低税收和“光荣的法兰西”。

路易·波拿巴证明一只帝国的杜鹃落入了共和国的鸟巢。他在1832年拿破仑之子、所谓的“拿破仑二世”无后而死时作为波拿巴继承人时，被广泛地视为小丑。他在1848年之前的记录——几次以失败告终的波拿巴“起义”，一些模糊的自由化观点——使他受到政治阶层的广泛轻视。意识到根据1848年宪法选举的总统任期仅为4年，他竭尽全力树立自己的强权形象，并培养坚定的支持者。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使自己成为终身总统——通过全民公决由他批准的决定。一年之后，他又自命为皇帝，给自己的封号为拿破仑三世。虽然他最初靠潮水般的农民选票掌权，

但 1851 年政变立即激起了农村，特别是南部和西南部左翼势力的强烈抗议。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左派在乡村的宣传取得一定成功。为了消除不满，32 个省份宣布实行军事法，约 2.7 万人被捕，其中至少 1 万人被流放。这个“农民皇帝”是面对着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型农民起义而掌握权力的。

第八章　从第二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

[212] “我愿意受普选权之水的洗礼，但我不打算站在泥潭中生活。”拿破仑三世的这句可能不足以凭信的话，一语道破了他统治的特点，即民主和独裁主义的混合。他为自己站在政治活动的喧嚣之上感到骄傲；为自己超越左派和右派感到骄傲；为自己不是对选举出的立法机关——新宪法使得他的议会失去了权威——而是对人民负责感到骄傲。但他实际上还是忽略了与民众协商，除了少数已经由他的官僚幕后安排的公民投票。他同时保持着对报刊的严密束缚。尽管他炫耀其关于工人和农民的进步观点，他的权力却是建立在由1848年“六月数日”引起的有产阶级的恐慌思潮之上的。而且，他用惩戒性的暴力手段压制住了对于他1851年政变的普遍反对。

左派被吓倒并沉默了，但在多数政治民族的想像中他仍是可怕的鬼怪式形象的代表。拿破仑对1850年“法卢法”的有代表性的支持，给予宗教学校更多的运作自由，使得教学僧侣和修女的数量在他统治时期分别增长了8倍和4倍。甚至像开明政治人物阿道夫·梯也尔这样的宗教自由思想家都认为，教会在维持“卑劣的大众”走在善的轨道上起着作用。拿破仑的内务大臣甚至禁止教师蓄须，因为这被当成是无政府主义者观点的显而易见的标志。第二帝国是这样一个政权，它由于对政府体面的损害而遭到审判（见于1857年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古斯塔夫·福楼拜的伟大小说《包法利夫人》）。

就像事实所展现的那样，这个最终发展成为无生气的独裁主义和社会性倒退的政权，一开始是以一个生气勃勃而且繁荣昌盛时期的面貌出现的。历史学家们仍在争论该政权的成功在多大意义上归功于“矮子拿破仑”个人。“矮子拿破仑”这个称号是维克多·雨果赋予他的。无疑，一些主要的成就可以记在他的名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于巴黎市的改造是由他任命的人，即奥斯芒男爵执行的。然而，这也与他上台的时候正巧碰上经济大复苏有关。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开采热潮的推动下，



坐在圆形厚垫椅子上、身穿军装的拿破仑三世摆出骑士的姿态。这张照片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显示了拿破仑三世具有超越一切最热衷自我宣传的人的傲慢的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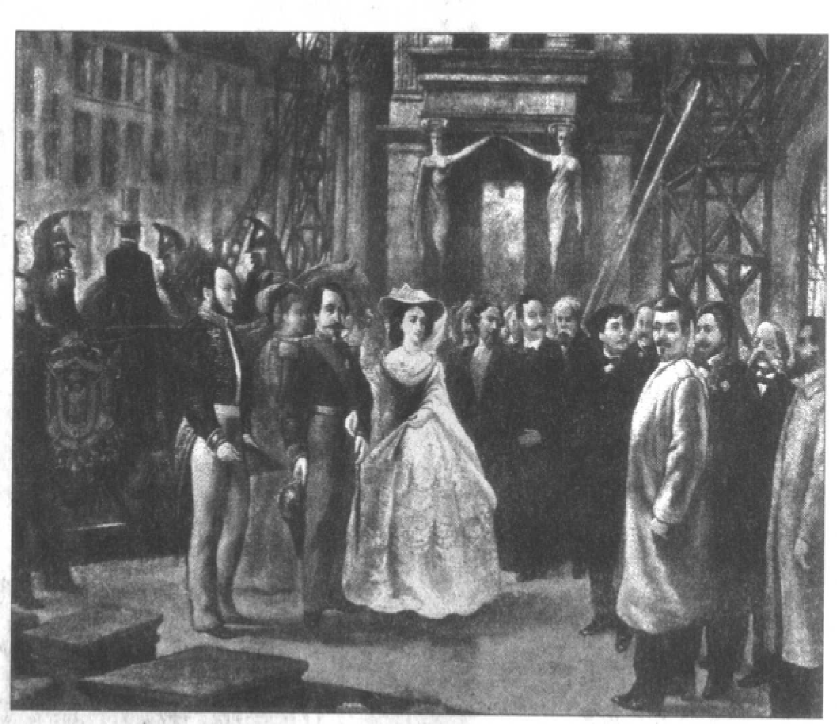
世界贸易十分兴旺。从 1817 年开始的低价格时期到 1951 年画上了句号，这刺激了企业的发展。到 1870 年第二帝国灭亡前夕，工业产品的价值翻了一番。

动力开始转为蒸汽的巨大变化发生了。工业中的机械化马力增长了 4 倍，达到了比其他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加在一起还要高的水平。受 19 世纪 [213] 60 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原棉进口量下降，但是法国的棉织品产量仍然仅次于英国排在第二位。铁路的里程数同样增长了 4 倍；1870 年铁路运输占到了国内贸易运输量的一半，而在 1850 年只占十分之一。铁路的繁荣带动了煤炭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并推进了贸易发展；之后在 1860 年，与英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促进下，贸易量增加了两倍。国家铁路网的密集和可靠程度，以及物价的足够上涨倾向，鼓励着农民从他们固守的壳中走出来，并且放弃自给自足而转向市场生产。下朗格多克的葡萄酒生产者，靠着供应巴黎市场发了财；他们很快就热衷于使用那些可以使他们获得资产阶级尊敬的装饰品。这里有的农民家庭现在拥有两台三角大钢琴。

经济繁荣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银行的发展，银行提供信贷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皇帝与私人资本的关系促使铁路的繁荣，他

巴黎的奥斯芒规划

巴黎是法国的心脏。让我们尽一切努力让这个伟大的城市美丽。让我们修筑新的道路，让拥挤的缺少光明和空气的邻居更健康，让仁慈的光芒穿透我们每一堵墙。



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在奥斯曼行政长官的陪同下，为新的大歌剧院奠基。

拿破仑三世关于巴黎现代化的号召，是由1853年至1869年任塞纳省的行政长官奥斯曼公爵付诸实施的。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是一个年久失修、遍布贫民窟、没有卫生设施、霍乱等传染病流行、过度拥挤的形象。对它的改造被提到议程上。有些人从审美的角度反对这些改造；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普鲁东指责“奥斯曼先生的新的、单调的和令人乏味的城市”。同样左派中许多人觉得城市变化中隐藏着政治目的——特别是摧毁老的工人居住区，那里都是具有巴黎革命传统的激进分子和无套裤汉们集中的地方；街垒和林阴道不能并存。

现代化只是让首都成为帝国政权橱窗的总体进程的一部分。历史性建筑与新的街道设计融为一体，如大歌剧院、国家图书馆、卢浮宫的扩建、中央市场的钢铁建筑物，加上扩建露天休闲场所（万森森林公园、布伦森林公园等）。这些变化具有榜样的力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大城市追随“奥斯曼规划”和“城市林阴大道化”。

现代化同样考虑到使巴黎成为全国的经济发动机。巴黎是新铁路系统的核心这个事实，强化了拿破仑的承诺。就像铁路将全国市场连接起来并给全国经济注入活力一样，新林阴道和宽广的道路穿过中世纪的狭街窄巷，缔造了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城市社会和经济。事实上这些变化的后果是各阶级间的社会距离更大。历史上各阶级在城市中是纵向的结合：一层和二层的房间住着资产阶级，顶层和阁楼住着穷人。奥斯芒规划在穷人区和富人区之间带来新的区分。内城更加中产阶级化，而工人被推向围绕城市周边的无产阶级“红色腰带区”。奥斯芒没有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将他们移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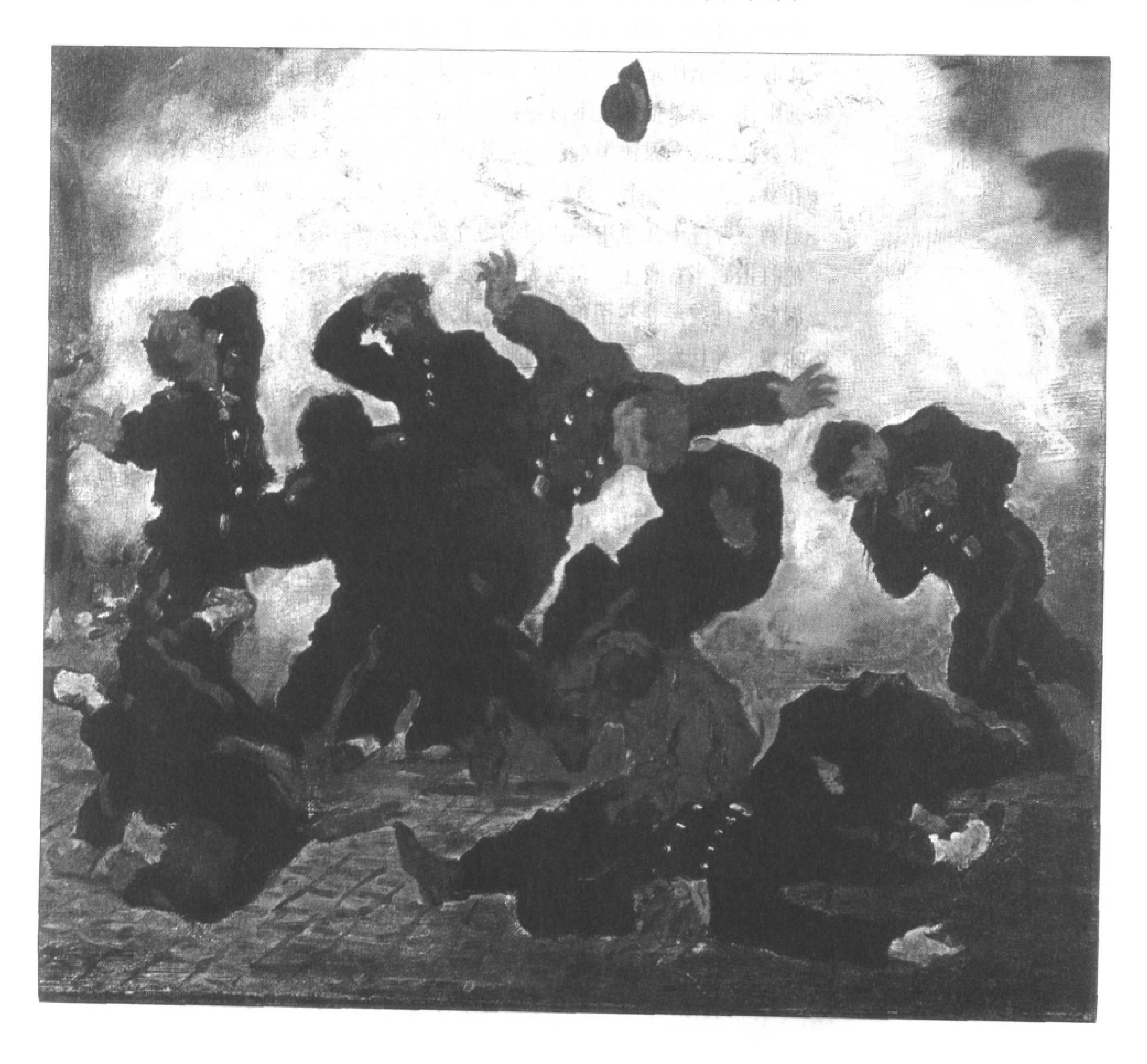


以拾破烂者形象出现的霍乱向奥斯曼抗议：巴黎的现代化使它无家可归。

也在建立现代银行体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创建了这样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私人资本可以投入银行系统。这个银行系统包括国立贴现银行(1848 年建立)、地产信贷银行(1852 年)、里昂信贷银行(1863 年)和兴业银行(1864 年)。钞票的发行量——现在发行更方便的小面额——增长了 5 倍。储蓄者现在将钱存在信用机构，而不再是放在诸如床底下的家庭秘密储藏处，这使得银行得以为国内增长提供资助。

拿破仑曾在 1852 年宣称："帝国意味着和平。"然而，尽管无法在系 215 统化的侵略性上与第一帝国相匹敌，第二帝国却确实有一种强烈的军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被拿破仑用和平主义的华丽言辞间歇地掩盖了。他消除了此前几十年里法国外交政策中缩手缩脚的特点，确立了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他使法国的殖民财产增加了一倍，尤其是在印度支那、中部和

马奈的画描绘了 1871 年巴黎公社遭到杀戮的场面。



西部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这为1880年以后法国争夺殖民地做好了准备。新的银行机构同时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投资。1869年由拿破仑的妻子欧仁妮皇后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就是一个名为费尔迪南·德·莱塞普斯的法国人的功绩；而且，这项工程得到了来自这个国家资产阶级储蓄的大力资助。但是，拿破仑没能从英国那里夺取世界范围内贸易和殖民的主动权。而且，他想19世纪60年代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帝国的拙劣的计划，也以耻辱性的惨败收场。

216 在欧洲他做得也好不了多少。拿破仑在1859年（从邻国的皮埃蒙特－撒丁那里）得到了尼斯和萨瓦，这是法国边界从滑铁卢一役到现在惟一的一次大扩展。但即使是这次成功也没能使他获得多少称赞，因为其他失败盖过了这次成功。这其中最大的失败证明了他在控制欧洲呈上升趋势的民族主义浪潮方面是多么的无能，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德国。他得到尼斯和萨瓦的交换条件是，给予皮埃蒙特军事援助以反对奥地利对实现意大利统一的阻挠。结果他两边不讨好：承认将教皇领地强制并入新意大利惹恼了天主教徒，后来派法国军队到梵蒂冈保卫教皇的行为又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在欧洲这个舞台上，他轻易地被普鲁士的俾斯麦击败；而且，在1866年奥地利－普鲁士战争中以法国的中立做交易的企图，让他自己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当普鲁士正在成为中欧头号大国，并创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时候，他曾经希望用他的中立交换获得卢森堡公国。但他遭到了羞辱性的怠慢，并且发现自己正受到来自两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威胁。

而此时的羞辱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民意正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重新浮现。19世纪50年代的独裁岁月已经被一段自由主义改革实验的时期所代替。新闻审查制度放松了；《巴黎人报》的发行量在1830年一度停留在5万份上下，到了1868年则达到了70万份。有关公开集会的法律也日益放宽，1864年罢工权获得许可（尽管仍不能组织罢工和在罢工时派出纠察员）。激进主义在车间里稳步增长；19世纪60年代法国工人组成了第一国际中最大的民族代表团。一个共和主义反对党也开始形成，它的拥护者主要是那些拒绝社会主义但计划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人。这个党还因为具有带教条主义特性的反教权主义而平添了一些趣味，而这种反教权主义正在成为法国共和主义的传统特征。拿破仑准许大臣们就他们的政令向议会负更大的责任，而且引入了许多的措施，这些措施使得下议院有了更多的自治。

结果，对于对政权的不满迅速增长，特别是法国的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个较前十年的黄金期稍有下滑的阶段。其间拿破仑日益令人忧虑和鲁莽的对外政策也招致了批评。在1869年的选举中反对党派赢得了40%的普选票。在1870年5月举行的一次计划成为完全议会制政体的公民

投票中，这些反对党赢得了5比1的压倒多数。这些转变可称得上是对这个一开始在本质上就独裁的政体的民主凭证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检验。然而，宪法实践仍胎死腹中，在第二帝国可耻地垮台以前这些宪法实践都以失败告终。

崩溃是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19世纪60年代的军队改革，未达到所寻求的在军事组织和士气方面的改进和提升，因此一旦拿破仑（接防）走向战场，他就发现自己的军队不是俾斯麦装配精良、高度有效的普鲁士战斗机器的对手。色当被阻，拥有将近10万军队的拿破仑投降了，并被送到了在德国的监狱。他再也没回到过法国。这次失败的程度导致了在巴黎的 [217] 政客们宣布拿破仑政权完结，并同时设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他们宁可签署一份羞辱性的和约，在这份和约中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让给了新生的德意志国家。于是，这个曾经得到尼斯和萨瓦的政权，被迫与自百年战争以来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领土丧失这个罪名联系在一起。而新政权不得不对付持续不断的政治分裂，以及因丢失强大繁荣的北方两省带来的羞辱和经济上的损害。

巴黎公社和第三共和国的政治

第三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法国正处于伤痛之中。从1789年以来政权的更迭与短命，不是一个好兆头。即使是该政权的助产士和第一任总统，即领导这个临时政府的阿道夫·梯也尔，也没有给予这个新生政权多少生存的机会。结果，第三共和国维持到1940年，成为近代法国历史中最持久的政权。尽管它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是不平静的，但是该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签署和平条约以前一直都享有非常高的声望，这也的确是事实。到那时，它已经实现了它外交政策中的主要目标——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它主持了广泛的殖民扩张。它维持了令人艳羡的财政稳定。它给大多数法国人民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物质进步。它也像法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一样，与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只需举出其中几个最出色的人物便能说明这一点：绘画方面有塞尚、莫奈和马蒂斯；雕塑方面有奥古斯特·罗丹；文学方面有左拉和普鲁斯特；诗歌方面有韦莱纳、兰博和马拉美；音乐方面有德彪西；医学方面有巴斯德；物理学方面有居里家族；数学方面有普恩加莱；哲学方面有柏格森；神经学方面有夏尔科；社会学方面有迪尔凯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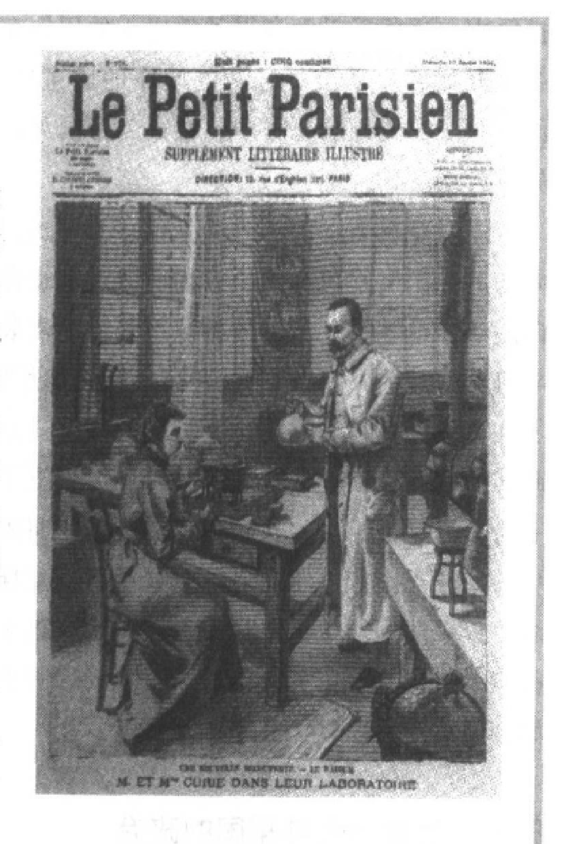
在1870年和1871年则乏善可陈。推翻拿破仑以后，战争仍在继续，巴黎竭力坚持抵抗普鲁士的围攻。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政治家莱昂·甘必大乘坐气球，从一个居民已陷入吃老鼠境地的城市逃离；但是，他在南部

218

居里夫人

出生于斯克罗多夫斯卡的玛丽·居里（1867年—1934年）是法国大批国际知名科学家中最出色的一位，她的学术生涯照亮了第三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历史。她生于波兰，1891年来到法国。在参加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领导的科学小组工作之前，她是成绩优异的学生；后来她于1895年嫁给了居里。伦琴只发现了X光射线，居里夫人发现了除铀以外的产生这些射线的化合物。1898年她发现了镭元素，她和她的丈夫在1902年将其成功分离。他们共同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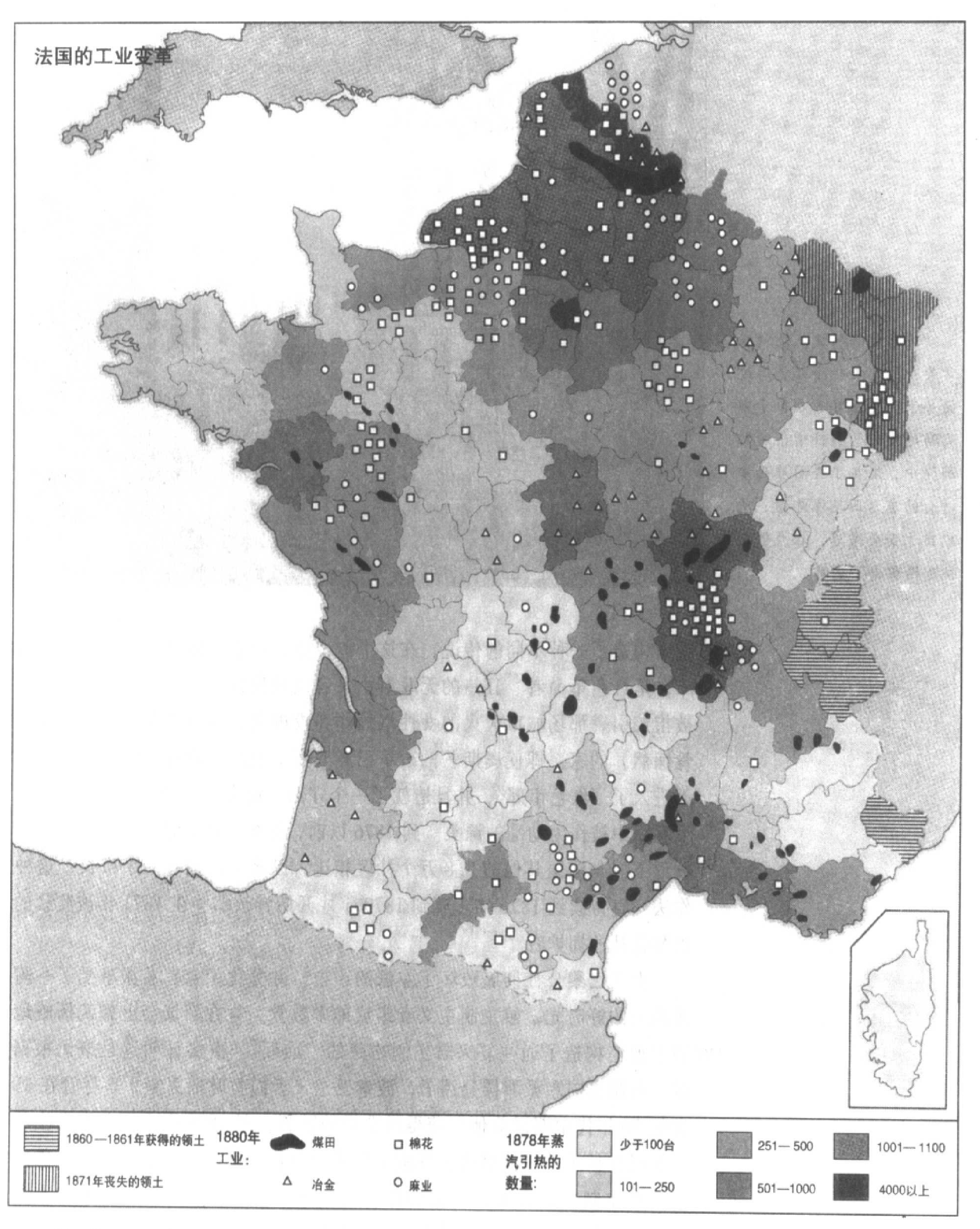
居里夫人在丈夫于1906年去世后继续工作，并于1911年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她对镭在医学上的应用特别感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亲自监督为法国军队提供的便携式X光机的生产。尽管1908年她申请加入法兰西科学院遭拒——可能是由于性别，但在战后她还是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她去世后，她的女儿伊莱娜·约里奥-居里继续从事她的工作。



大众报纸在宣传居里夫妇的“爱国”科学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密特朗总统宣布将她的遗骸移葬先贤祠。

组织一支军队的尝试则徒劳无功。1871年1月临时政府有条件地投降了，签署了一个和平条约。在该条约中，法国认可了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并被迫承担500万法郎的赔款，这迫使法国在赔款总数付清前忍受德国占领军带来的屈辱。在这样的重击下，巴黎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并选举了一个市政府；寓意于1792年的国防精神，这个政府冠名为“（巴黎）公社”。然而，这次历史没有重演。梯也尔在一个最近选举出来的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保王派的扶植下，在凡尔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对巴黎进行了新一轮的包围。此时在巴黎，巴黎公社正在引入激进的社会法规，并号召进行战争。在德国占领军的冷眼旁观下，一场血腥的死亡舞蹈继续上演。在将近5月末的时候，梯也尔的军队攻入了巴黎城，开始了对这座城市兽 218 性般的野蛮征服。1792年到1794年的革命法庭，导致了不到3000人的死亡；但仅在一个星期里发生在巴黎大街上的，由反对公社给予的审判，就导致了2.5万到3万人被草率处死，并有超过4万的巴黎人被投入监狱。公社掌握的人质，包括巴黎地区的大主教，都被射杀。战火席卷了这个城市，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市政府大楼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物。

有关巴黎公社的灼人回忆既影响了左派，也影响了右派。对左派来说，这种回忆变成一种传说，其史诗般的回响可以被他们长期利用。而右



1815年以后，法国的政治版图变化不大，但工业版图却发生了改变，突出了地方供应煤炭的重要性以及对蒸汽动力的接受。当北部、东部和里昂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心脏地区，许多传统加工业制造地区——例如朗克道克的呢绒纺织业——却难以适应。在“现代的”北部和东部与“古老的”南部和西部形成了对比。



新的大歌剧院建筑（在背景处）需要拆除大量周边的房子。1858年，在位于勒贝勒迪埃街的拥挤嘈杂的歌剧院中，发生了企图炸死拿破仑的奥尔西尼爆炸案，所以出于安全考虑，在大歌剧院周围留出了空间。

派则构造了一种不同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巴黎被描述成煽动暴乱的温床，是红色革命者、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疯狂女人（女纵火者们——被指控引燃那场城市大火的女性汽油炸弹投掷者，她们特别令中产阶级毛骨悚然）的家。即使奥斯芒的改革已经改变了巴黎城的社会构成，迫使工人进入了“红色市郊”，并且造就了一个守旧、稳定的内城，巴黎公社仍在下意识中被作为动乱的源头。到1876以前，巴黎一直都处于一种被包围的情形下。与法国其他的3.8万个社区相比，巴黎无权拥有一个市长，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1876年。直到1879年才开始特赦那些在1871年被监禁的巴黎公社的拥护者。

由于巴黎公社彻底败坏了左派的声誉，并分化了它，右派享受了一阵政治上的好时光。君主制主义者组成的多数党，竟在新议会上耀武扬威地220假定他们构造了通往复兴君主制之路的“前厅”。事实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右派也同左派那样分裂了，波拿巴主义者们暂时地失宠了。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获得过选举的胜利，但1879在南部非洲发生的一支祖鲁长矛杀死波拿巴派觊觎王位者的事件，削弱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威信。君主制主义者更甚，他们像以前一样处于分裂和互不理解的状态之中。年老而顽固的正统王位觊觎者，即那个无儿女的尚博尔伯爵，拒绝接受三色旗；因此尽管他的奥尔良派对手巴黎伯爵对做事是否符合良心较少顾及，他本人的支持者还是很少。而保皇主义则摆脱不了与天主教会那最

彻头彻尾的倒退的联系。罗马教皇的职位逐渐成为了拒绝变革和现代化的关键性的聚焦点。一种有关教义的非常神秘的论调盛行其道，圣灵感孕说教义的新近采用，以及 1858 年在卢尔德由圣伯纳黛特的圣母玛利亚显圣所激起的崇拜，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870 对教皇不谬性说教义的接受，使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在 1864 年编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该书中，他攻击了理性主义、言论自由、宗教容忍、社会主义以及对科学的崇拜。天主教徒们不仅拒绝各种政治制度，限制共和国的社会目标，而且他们也谴责大部分现代生活。

政治领域普遍分裂，用 1873 年以来是总统的梯也尔的话来说，共和国是作为一个"把我们分割成最小"的政体而存在的。他的接任者马歇尔·麦克马洪是一个彻底的君主制主义者，他任命布罗伊公爵为他的首席部长。这个公爵的曾祖父，曾经在 1789 年的 7 月指挥过那支路易十六试图从国民大会手中收回权力的军队。即使是在"公爵共和国"时期，右派的表现仍然糟糕得引人注目；共和主义则静静地一点一点地巩固着自己。1875 [221] 年，议会通过了（尽管只以 1 票优势）一项宪法法令，规定了建立两院立法机构，还规定总统由议会而非选民选出。麦克马洪被借故绕过，并且随着 1879 年共和党人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他的总统职位被经验丰富的茹尔·格雷维所取代。茹尔·格雷维的中庸之处正在于他是防止君主制主义者政权的一道堡垒。到 1900 年，君主主义一直走在转变为一种温和的怪僻的道路上。警钟时常响起。特别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晚期，布朗热将军的人民党主义的煽动行为预示着一种波拿巴主义者风格的反议会的政变威胁，这位国防部长曾经为了发动一场反德国的复仇战争而调整战争机器。他极大地错过了时机，"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幸存了下来。

负责维持这艘共和主义政府大船在这些波浪起伏的政治水面上漂浮的人，是温和主义者们。甘必大是这一群大体呈灰暗的中庸之才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他于 1882 年英年早逝。新宪法制造了一系列的软弱总统和不稳定政府，在 1870 年到 1914 年间产生过大约 60 个政府。然而，就某种重要的意义来说，这种反复无常只是一个错觉，在很多革命以后的政治活动中都曾出现。实际上，政府部门变更的表面泡沫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作为整体的政治阶级的连续性。这些政治阶级的组成成员有相似的背景，持有相似的观点。早几年，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或者被称为"机会主义者"——控制着部长级的职位，每当共和国看似处于右派的威胁之下时，他们就与那些更多一些进步性的激进派分子联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提供比起初呈现在眼前时更大程度上的稳定性。尽管他们对于共和国都是极为支持拥护的，机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还是将他们自己与极端主义者及巴黎公社的拥护者拉开了距离，而为自己代表法国中产阶级的利益感到自豪。议

会现在充当着被甘必大称为“新社会阶层”——商人、地方上的生意人、政府官员、医生、律师以及新闻记者——的代言人。这个阶级的地位比自1830年以来掌握国家政治的金融和商业精英阶层低一层。

男性普选权也维持了法国内部最大的社会成分——小农阶级——对其政策的影响力。事实证明要使农民保持快乐是很难的。一场农业萧条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并持续到了世纪交替的时候。对于法国农民来说，从美国轮渡进口的粮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随着葡萄根瘤蚜病的流行肆虐全法国的葡萄园，种葡萄酿酒人的繁荣时期消失了。城镇的大量增加促使乡间的农村化，那些地方的就业正在变得完全建立在农业活动基础上。一些农民离开了土地，在一些地方这种潮流由涓涓细流演变成滔滔洪水，特别是来自阿尔卑斯山脉、中央高地以及阿奎丹的农民。有些农民则转向更极端的政见。在法兰西民族主义之后，地方民族主义也被当地的知识界发展起来。比如，作家米斯特拉尔帮助发展了奥克西塔尼民族主义，该民族主义发展成一种依附于教会和极右派的反共和主义。在别处，在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下，传统主义者的“白色”地区变成了“红色”，因此激进的农民可以与城市工人联合在一起反对政治中心。

222

机会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如19世纪80年代的法律保证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但是即使是他们，也向来自农民的压力低头，表现在他们重新引进某种程度上的农业保护主义——特别是1892年的梅利纳法——以安抚农村地区；相对来说，他们较不情愿抚慰无产阶级。尽管他们在1884年使工会合法化，他们倾向于否定“社会问题”的存在。社会保障措施在法国的发展是可悲地慢，特别是在与英国及俾斯麦的德国的比较之下。到1914年，社会改革方面的成就可说是微不足道：1900年开始才规定，妇女和儿童每天工作10小时；1905年开始，矿山实行8小时的轮班；1906年开始，每7天强制休息1天；1910年开始有了可选择的（未被充分利用的）社会保险措施。结果，互助社团得到了高度发展，到1914年包括了超过200万的工人。



机会主义将军布朗热的原型邮票虽未发行，却仍是一种很少有人能企及的宣传方式。1849年该邮票开始发行，并在特许的烟草店出售。

暂且撇开社会改革不谈，机会主义者还是珍视统一共和国这个思想意识的。1879年，《马赛曲》成为国歌，1880年巴士底日（7月14日）成为国庆日，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法国各市镇厅都安放了玛丽安的半身像。玛丽安是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团结而非分裂的共和国的象征，并成为诸如1883年巴黎共和国广场揭幕的雕像的模本。机会主义政客利用共和国的神话以强调反教权政策。甘必大的呐喊“教权主义，这就是敌人！”牢牢地根植在共和党人的传统中。在这个传统中，没有必要迎合激进的社会改革，就可以在左派中寻找到支持者。教育变成了竞争的战场：必须把玛丽安的孩子，从一个向后看和反共和主义的教会的、分裂并且复仇心重的

控制下营救出来。在 1881 年到 1886 年间，茹尔·费里通过立法发起针对 6 至 13 岁儿童的免费公共初级教育，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都应上世俗或者是教会学校；针对女孩的公共的中级教育首次有了正规的立足点；教师培训和学校建设获得了慷慨的供应。这些重要的法律得到了更加明确的反教权措施的补充：1850 年对给予宗教宣讲社团较多活动自由的法卢法进行了重要修改；将牧师从大学的委员会（大学委员会也进行了改革和扩充）中免职；禁止教会机构授予大学的学位，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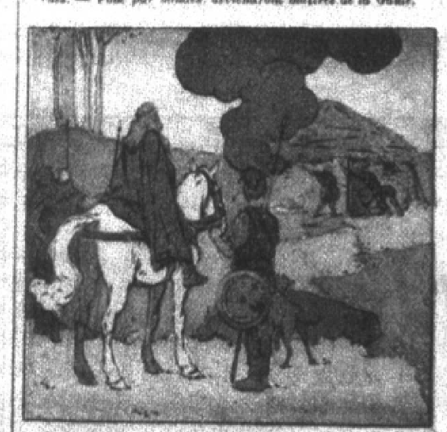
8 **La Gaule envahie. — Les Francs.**





1. Un chef, Clovis. — Où est le chef? *Sur bouclier ou pavois, c'est Clovis.* — Qui le porte? *Quatre guerriers francs, d'autres l'acclament, dire pourquoi.* — Armes des guerriers? *Angon ou lance à crochet, francisque, bouclier.* — Vêtements? *Toile, peaux.* — Visage? *Cheveux, moustaches.* — *Vont par bandes, deviendront maîtres de la Gaule.*

2. Les Francs pillards. — Où sont entrés les Francs? *Riche villa.* — Que font-ils? *Meurtre, pillage.* — Qu'emportent-ils? *Coffrets, belles étoffes, vases précieux.* — Que vont-ils en faire? *Partage.* — La Gaule n'était donc pas défendue? *Mal défendue, longue paix, peu de soldats, proie facile. La Gaule, pillée, ruinée, malheureuse.*





3. Les Francs cruels. — Que fait l'homme à cheval? *Regarde hutte en flammes.* — Pourquoi des soldats poussent-ils la porte? *Gens enfermés qu'ils empêchent de sortir.* — *C'était Chramne, fils révolté du roi Clotaire. Son père le faisait brûler vif avec sa femme et ses enfants.* — Que pensez-vous de ce roi franc? *Barbare, sans pitié.*

4. Le roi Dagobert. — *Cent ans après Clovis. Dagobert dans son palais; à ses côtés, évêque.* — Les habits du roi? *Comme anciens chefs romains; en outre, couronne.* — Geste? Pourquoi? *Un trône d'or.* — *Saint Eloi avait reçu de l'or pour faire un trône; très habile et très honnête, il en avait fait deux; devint ministre de Dagobert.*

Résumé. — 1. Les Francs, commandés par Clovis, battent les Romains et deviennent maîtres de la Gaule.
2. Ce sont des Barbares; ils rendent la Gaule malheureuse.
3. Cependant le roi Dagobert aima l'ordre et la justice.

— En 5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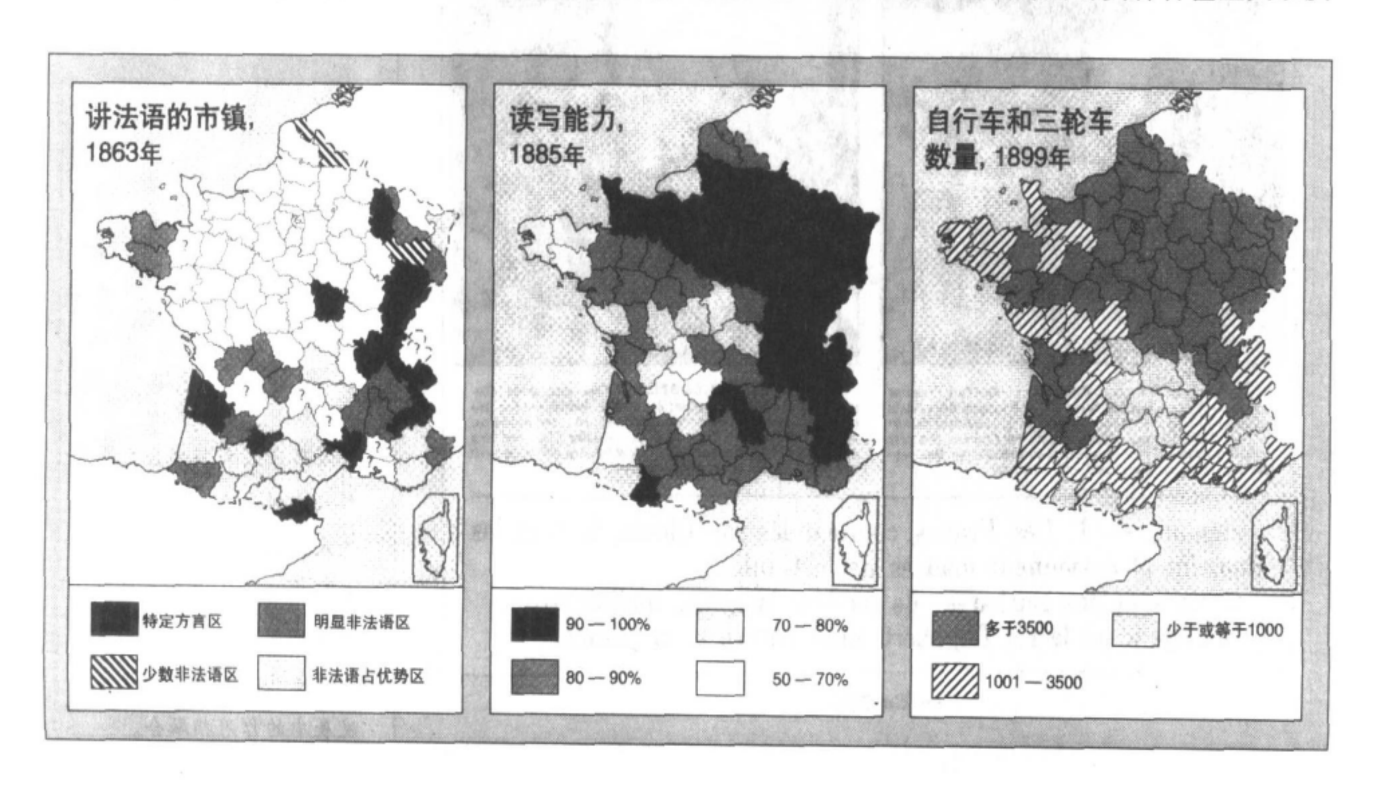
第三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在克洛维的法兰克人伪装下的日耳曼“野蛮”抢劫者抱有敌意的激烈观点，很难与众所周知的法兰克人在法兰西民族发展中的作用相融合。

牧师们激烈地反对费里的“没有上帝的学校”，因为费里把学校简单化为新教徒和互济会会员的工作，而这两个团体都是共和国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不管他们竞争的开始，这些学校都是第三共和国早期最持久的文化成就之一。乡村校舍仍然作为19世纪晚期共和主义价值的不朽见证巍 223 然矗立。对于教区教士而言，教师代表着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焦点，而且他们也被证明是共和国最热心的拥护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教师志愿兵的死亡率（大约是五分之一）高于任何其他社会团体的死亡率。

世俗学校被视为使儿童从教堂中离开的一种手段，此外也使他们远离妇女的有害影响。反教权主义在更多情况下存在于男性领域，遵循正统则在妇女中更加普遍。因此，妇女被视做执行教会任务使年轻人信仰上帝的女仆。世俗学校的目标是灌输城市以及男性价值。小资产阶级的诸如努力 224 工作、奖赏优点、可靠、节俭以及尊重所有权等美德都受到了宣扬。此外，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丢失激起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体育及运动，可以保证保卫法国领土完整的战斗迟早有一天在运动场上获胜，如在帕拉瓦－雷－弗洛的运动场上。历史教学宣扬一种对祖国及保卫祖国的崇拜。在教科书里，诸如德盖斯克兰、贞德、菲利浦·奥古斯都，甚至罗伯斯庇尔等，“爱国主义”形象地位显著；墨洛温王朝的君王们则受到蔑视，因为他们虽身为国王，却天生缺乏维持其王国完整性的能力。

然而，对许多来上学的人而言，这些学校必须显得既是有关共和的机构也是殖民机构。他们提倡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对于多数农民、工人和妇女来说，都是毫不相关的。尽管在费里立法背后有实行普世主义以及

“两个法国”。经济和工业变化（见219页）描绘出了“两个法国”的轮廓。北部和东部为一方，与南部和西部为一方的区别既是文化上的也是经济上的。北部和东部的文化水平（中图）要高得多，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南部和西部非法语长期存在（左图）。区别既是态度上的也是语言上的：北部和东部更容易接受现代生活方式和个人自由的象征——自行车。



知识精英教育的假设，但上述三个人群在教室内的表现仍是明显地较差。这使得学校既成为培养职业技能的手段，也同时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这一点在远离首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明显。社会评论员已经对在圣马洛至日内瓦一线两侧“两个法兰西”的存在做出评论。此线以西以南的人身材较矮，营养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具有更多的暴力犯罪倾向，以及更有可能逃税和当逃兵。19 世纪 60 年代的调查显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法国社区——大多数在西南部——仍不讲法语。普罗旺斯、布列塔尼以及利穆赞的法庭仍不得不使用翻译来处理“本地”农民的证词。1789 年革命前夕，半数的男子和四分之三的妇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在第三共和国的早期，相应的数字为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世俗学校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就要补救这些缺陷，并使法国抵制资产 [225] 阶级大都市文化的那些人适应这种文化。在这里，一个突出的战略就是强调在学校中法语是交流的惟一手段。尽管这个方法激怒了地方主义知识分子，后者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不能说法语与文盲等同，反共和主义就是无知。机会主义派利用了 18 世纪 90 年代革命者的修辞，对于他们来说，法语就是“自由的语言”，而“大量的腐败的方言”代表“封建制度的残余”。如果要将因受折磨而变得冷酷无情的农民带回到文明范围之内，语言就必须像共和国那样变得“单一且不可分割”。那些在学校围墙内不小心使用了本地土话的孩子，将被羞辱及惩罚。1872 年引入的国家强迫征兵制度，也成为语言控制的一项重要辅助措施。文盲比例的显著下降证明了该文化同化计划的成功，如到了 20 世纪早期，只有少于 10% 的入伍士兵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第三共和国政客的“教化使命”在殖民地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尽管有些人反对在殖民地冒险，认为这分散了从德国手中赢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基本任务的精力。但不管怎样，1914 年法国已经将其海外财产增加了 10 倍——这个帝国扩展到了 300 万平方英里，并拥有 5000 万居民。法国参与了“争夺非洲”，扩大了在东非和中部非洲的利益范围，增加了在北部的财产；在印度支那实行了有效的殖民统治，并从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获利。值得注目的是，使法国获得对这些地区控制的关键人物是茹尔·费里这个教育第一主义者。费里曾经评论说，帝国唤起法国人激情的惟一方法就是肚皮舞。然而，尽管他哀叹他的同胞们缺乏对这些新控制地区的热情，他仍然帮助法国使之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帝国。

“美好时期”的新物质主义

1889 年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国际博览会，其中最壮观的是由勃艮第的工


CHEMINS DE FER PARIS-LYON-MÉDITERRANÉE
EXPOSITION UNIVERSELLE
1889
DE PARIS
INAUGURATION DE L'EXPOSITION
BILLETS D'ALLER & RETOUR
1re, 2e et 3e Classe
25 % DE RÉDUCTION
Délivrés du 1er au 15 Mai 1889
POUR PARIS
PAR TOUTES LES GARES DU RÉSEAU


VALIDITÉ
Jusqu'à 200 kilom... 4 Jours | De 301 à 400 kilom. 8 Jours
De 201 à 300 — ... 6 — | De 401 à 500 — 10 —
Au-dessus de 500 kilom...... 12 Jours
Y COMPRIS LE JOUR DU DÉPART
LES BILLETS D'ALLER ET RETOUR SONT REÇUS
DANS
Tous les Trains (Express & Rapides compris)
AU MÊME TITRE QUE LES BILLETS A PLEIN TARIF
FRANCHISE DE 30 Kos DE BAGAGES



这幅菲尔曼·布依塞为梅尼埃巧克力所作的广告，无意中证明了"美好时期"女性文化程度的提高。海报在当时作为一种出色的新的艺术形式开始走红。

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建造的铁塔。该塔高度超过 300 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金属建筑物。在揭幕式上，埃菲尔铁塔被超过 2 万盏煤气灯装饰照亮，它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对其革命传统的依恋。在 1789 年革命的一百周年纪念年里，埃菲尔把一面三色旗插在了该塔的最高点上，这标志着该塔的落成开放。铁塔是对圣心大教堂的建筑物——长方形基督教堂——在世俗上的敏锐回击；该教堂位于蒙马特尔高地，是狂热的教权主义者为 1871 年巴黎公社时的巴黎大主教之死赎罪而建的。铁塔的现代派设计及电梯说明了第三共和国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尊敬。同时，铁塔也表现了对大众娱乐——在铁塔开放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蜂拥而至——以及一种赤裸裸的有些自我放纵的物质主义的新狂热。

（第 222 页）1889 年巴黎国际博览会海报。顶上插着三色旗，象征工程技术胜利的埃菲尔铁塔是引人注目的明星。其他展览建筑物后来大都被拆除了。

在第三帝国的前 50 年里，大多数法国男人和女人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巨227大的变化。作家夏尔·佩吉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评论中估计，法国从他上学的 19 世纪 80 年代算起发生的变化，比从罗马人时期以来发生的变化都要大。物质水平的提高是以持续的工业化进步为基础的。法国经济继续缓慢且稳定地发展。到 1914 年，总体上，法国从第二工业大国下滑至

第四位，但这仍然代表着可观的增长。除了第二帝国时期已有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外，工业产量又增加了两倍，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896年以后的时期增长最快，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前的10年内。19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中的蒸汽动力增加了7倍。这些增长的动力被用于逐步发展的钢铁、化学和汽车工业，他们都是工业化进程第二阶段的关键部门。电力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包括水电工业。标致公司最初投资于纺织工业，随后转而制造自行车，1914年转向汽车生产。标致、雷诺、雪铁龙连同其他汽车工业一起，仅次于美国的汽车业排在世界第二位，其产量是英国的两倍。米其林已在橡胶工业中建立了声望，为摩托车提供检修。而1909年布莱里 [228] 奥著名的飞越英吉利海峡的行动，也标志着法国在航空工业领域所扮演的先驱者角色。

就像后面的这些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在经济领域，交通部门的进步尤其显著。1878年起动的所谓的“弗雷西内计划”着手改善法国全国的交通。打个比方，该计划结束了将铁路网的中心置于巴黎的惯例；且1881年到1914年，铁路里程从2.4万公里增加到6.4万公里，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支线，这些线路延伸到了以前遥不可及的地区。运河的修建和改善，使水路的货运量比同一时期增加了一倍；而大规模的公路建设也帮助整合及扩展了国内市场。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有轨电车在城市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00年巴黎引进了地铁系统。随着自行车的普及，个人的机动性也增加了；1898年自行车的数量是37.5万辆，1914年则是350万。在这些经济的分配和交通部门发生的变化，导致了职业模式的巨大转变：1850年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工人占总工作人数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数字上升到将近三分之一。

这也反映了在其他形式的通讯部门中发生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电报得到应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用它传送洲际信息成为可能。电话也发展迅速：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公共电话亭；电话的总数从1889年的1.2万台上升到1913年的超过30万台。1878年，电报业务和邮政业务结合到了一起。1889年，“邮政电报电话局”的成立把3种业务结合在了一起。乡村邮差变成了一个标志性形象，将其职业生涯中每天的行程加在一起可以绕地球7圈！1911年，一个法国人首创了世界上第一个航空邮政服务。

识字率的上升以及更大范围的中低阶层读者的出现，使得出版业的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报纸进入大量发行的时代，由于广告业的成长以及技术进步（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轮转印刷机，19世纪80年代的莱诺整行铸排机，等等），报纸价格持续下降。《巴黎人》日报的数量在七月王朝时增加了1倍，在第二帝国期间增加了4倍；到1914年又增加了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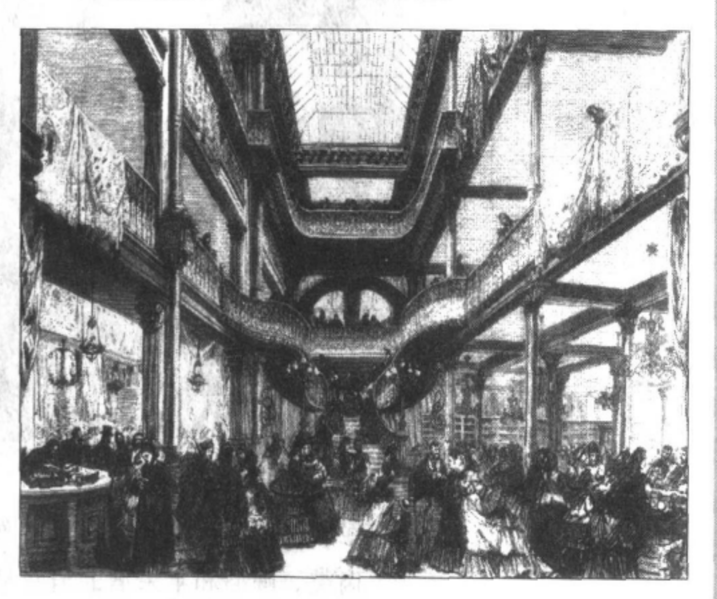
229

在“好市场”

门厅被改成了东方沙龙。从进门口起，他们就被惊奇、兴奋所俘获……从天花板开始，悬挂着图案复杂的叙利亚小地毯，在红色背景中很突出。接着四面挂着窗帘：绿色、黄色和朱红色的斑马条纹的窗帘来自卡拉曼和叙利亚；比较普通，摸上去有点粗糙，像牧羊人外衣的来自迪亚巴克尔；还有其他的地毯……有牡丹和棕榈的奇妙花纹，散发出梦中花园的神奇。

埃米尔·左拉在小说《妇女乐园》（1883年）中关于巴黎百货商店的描写，很好地捕捉到如何运用异国情调以新的零售方式销售货物。艺术和现实在有效地相互影响：左拉的描写依据的是1852年开张的巴黎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好市场”。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商场布置和陈列橱窗，却特意按照左拉凭灵感的想像来布置。然而即使是最高大最宏伟的后来者——特别是拉撒马利丹（1869年）和老佛爷商场（1895年）——在年度营业额上也远远落后于“好市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好市场”一直都是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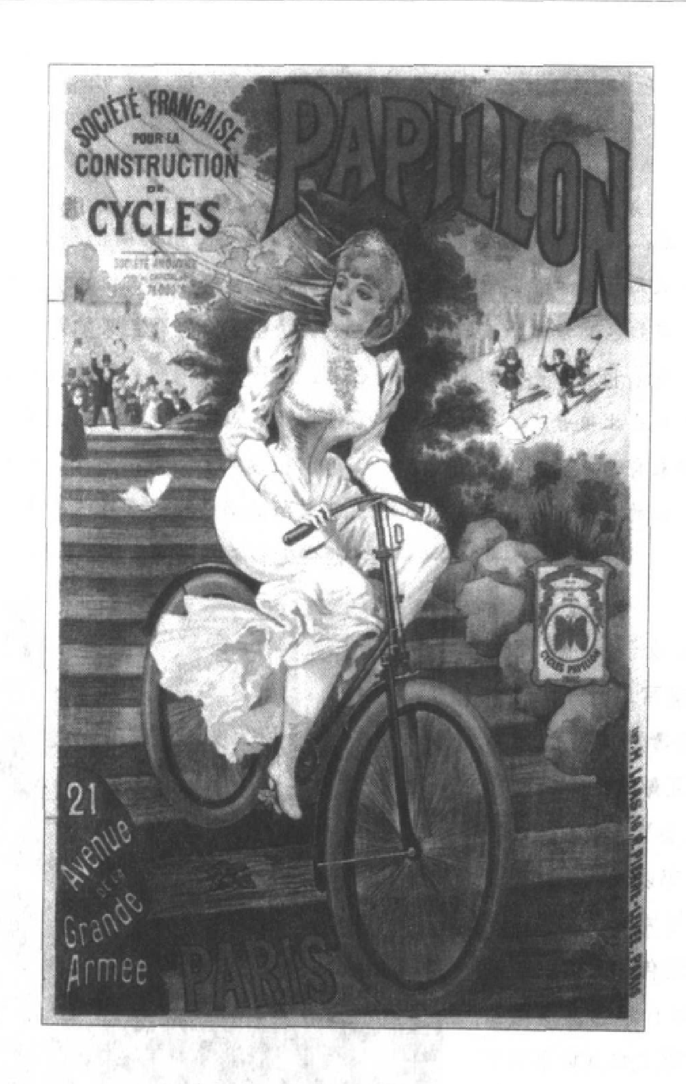
百货商场受欢迎的根基是经济上的：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更多的商品供选择；采取固定价格的做法，使得顾客为不必讨价还价而高兴。百货商场的出现也见证了由大众顾客带来的新的繁荣。然而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在这些消费殿堂中购物所带来的新鲜感和惊奇感使得商场对顾客的吸引力达到了极致。隐名夹杂在一群志趣相投的消费者中闲逛，橱窗采购，冲动采购——这些对商品消费都是很新鲜的体验，而企业家则用更多的想像力和噱头来回应这种体验。



巴黎“好市场”大堂楼梯。

这个数量直到现在仍标志着法国报纸读者人数的最高点。地方性日报也追随着这种增长趋势；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其发行量很少超过1万份达到2万份。19世纪60年代《小报》是第一个针对大众读者的定期刊物，其内容充斥着犯罪故事、连载小说以及人们感兴趣的消息，发行量很快达到了33万份；到了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百万份。广告是另一种快速发展的沟通形式。海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交流和说服的手段，在1881年开放的“广告粘贴法”实行后，得到了充分发展：葡萄酒、利口酒、专利药品以及所有形式的娱乐表演，都在最广泛兜售的商品之列。

这些沟通模式的变化标志着大众消费者的增加。这在饮食中是明显的，一般人消费食物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从19世纪中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些主要食品的消费，如面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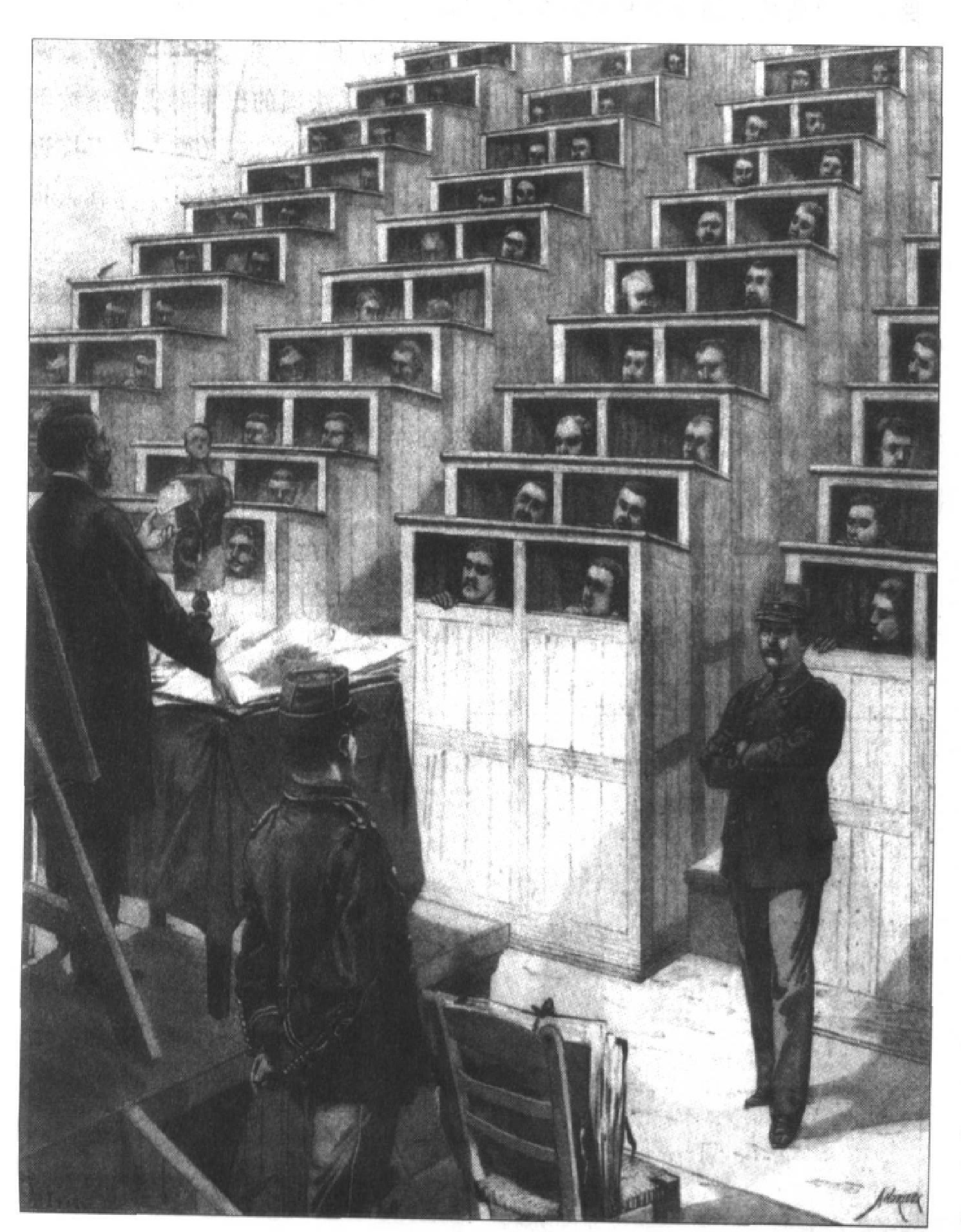
宣传“蝴蝶”牌自行车功效的招贴画（1900年）。儿童们在捕捉蝴蝶，一个年轻妇女以离开祭坛上新郎的方式庆祝自行车所能提供的新的独立性。

包和葡萄酒，增长了50%。然而，更显著的增长发生在其他大众食物上：肉类、啤酒和苹果酒的消费量翻了一番；其他酒增加了2倍；糖和咖啡增加了3倍。国民口味的多样化甚至通过使农民专业化而帮助阻止了农业人口的外流，如在下罗纳河地区种植水果和蔬菜使该地区获得了新生。更多的农业科技，例如使用机械收割机或化肥，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也使农民从1896年以前的农业萧条中脱困而出，成功地适应了新式的消费。

法国男男女女们的兜里有了更多的钱。在1914年前的20年里，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50%。为了满足消费者现金的需求，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增加了4倍。新型零售方式清楚地说明了生活方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这其中最明显的改变也许要数大百货公司在主要城市的出现；对它进行补充的是通过邮寄进行的按目录购买的邮购方式。世界博览会——类似1889年那样的于1855年、1867年、1878年和1900年在巴黎举行——有助于激起人们对新奇事物和时尚的关注。妇女的时尚成为大众而不只是精英阶层的关注点，并因为缝纫机在这个世纪中期出现而得到助长。19世纪70年代流通着600万件妇女的胸衣。资产阶级的使生活舒适的设备向下层社会传播：自来水，像样的卫生设施，煤气以及电力，使家庭生活发生转

变而具有了宽裕舒适的特性。

这个被称为“美好时期”的时代，与新式大众娱乐的出现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这时是音乐厅的全盛期。图卢兹－洛特雷克经常光顾的“半上流社会”——“红磨坊”，于1889年在蒙马特尔一带开放，它很快给世界带来了康康舞。其他维持长久的娱乐中心（“疯狂牧羊女”，“奥林匹亚中心”，“巴黎娱乐场”），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旅游作为一种休闲产业得到了发展，多维尔成为巴黎人周末短途旅游的去处，而蓝色海岸成了南部时髦的旅游胜地。便宜快捷的运输使中世纪的朝圣作为一种群众休闲复兴了。每年50万游客前往卢尔德；1908年超过了150万，那年是圣贝纳黛特显圣50周年纪念。体育运动同样发展成为一种大众休闲娱乐的方式：足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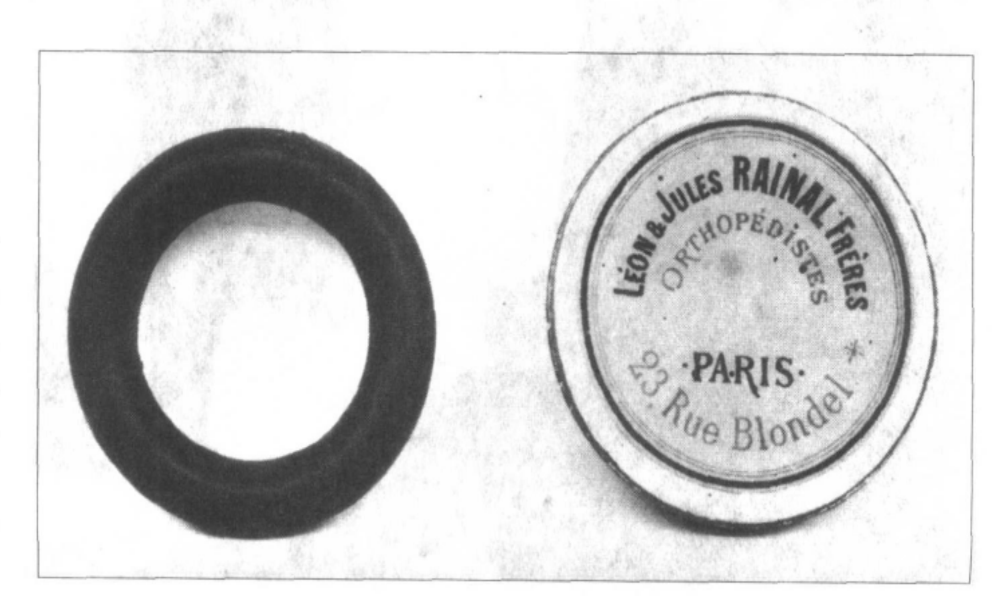


1903年在弗雷纳监狱举行的关于酗酒有害的科学报告会。什么是“有纪律的社会”（M. Foucault语）在管教部门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那里强调监管、人身控制和对个人是非观念的教育培训。酗酒被认为是恶行和犯罪的温床。

231 橄榄球、体操以及划船发展了全国组织，而著名的环法自行车大赛在1903年拉开了帷幕。体育运动通过增强本民族体质为即将到来的反德战争做好了准备，这是它赢得赞许的根源。体育中的民族主义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曾在1896年召集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理想中的国际主义目标，都以作为一个盲目爱国主义愿望——“给德国佬一点颜色看看”——的一部分而告终。

当时，法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还不能与其贸易对手相比，但所得到的经验仍是非常积极的。财富渗透到一般民众中，这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仍非常缓慢：1871年到1911年人口从3610万增长至3960万，增幅小于10%；而同期德国人口迅速增长了50%，从4110万增至6490万。路易·巴斯德对细菌学原理的发展，与在公共健康和卫生设施方面取得的进步一道，促使了死亡率的继续下降。“美好时期”的婴儿出生时就有着两倍于他们路易十四时代祖先的平均寿命。然而，法国的出生率仍在继续下降，从19世纪60年代的26.1‰下降到了战前的18.8‰（德国一直接近30‰）。这种缓慢增长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人口的老龄化，这使人担心法国缺乏其日耳曼邻居的活力。

对人口的担心激起了对于衰败甚至是种族衰退的忧虑，这在以大众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得到改善为特点的时期不足为怪。保守的群体行为分析家发现了大众政治和文化追求非理性和疯狂的“科学”证据。梅毒和酒精中毒被指为是对法兰西种族血统造成灾难性伤害的原因。女性同性恋、鸡奸和性变态，被煞费苦心地当成民族衰败的征兆。所有形式的大众休闲都受到了批评。如，不像是使用真实姓名的名为卢德威克·奥法罗维尔博士的人，严厉地谴责骑自行车消遣，因为它在女性骑车人中间激起了“生殖器的快感和情欲”。被天主教思想者责骂为“英国斗篷”的避孕套——英国



19世纪末期的控制生育的技术。自19世纪早期就成为法国男人备用品的性交中断器正在被新器具——避孕套和阴道栓剂——所取代。“新马尔萨斯派”团体散发大量关于新避孕法的说明书和小册子。

人反唇相讥地称这些硫化橡胶新的副产品为“法国字母”——使性行为看起来像是一种娱乐活动，而非生育后代的短暂序幕。可能特别令人烦恼的是，大众文化用以颠覆正常社会秩序的方式：“美好时期”小农阶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中较低阶层中的许多人有权使用，并且正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使用那些以前为精英阶层保留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上的进步。

政治和社会冲突

虽然名为“美好时期”，那个时代却远不是甜蜜和光明的。紧张和冲突 232 迫不及待地想要扮演与轻松娱乐、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相对立的角色。这最终注定了“美好时期”将继续不和谐地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痛苦中。

国际间的紧张状态是贯穿这个时期法国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由丧失 233 阿尔萨斯和洛林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从未被完全抹去。法德之间的敌对状态损害了自滑铁卢以来处理冲突以免发生全面欧洲战争的国际关系体系。随着新统一的德国成为欧洲的一股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主要国家间微妙的力量平衡开始被打破。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在欧洲缓慢形成两个武装阵营，他们或是防御同盟，或是进攻同盟。1879 年德国和奥地利签署的双边同盟由于 1882 年意大利的加入而扩展为三国同盟。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猜疑、恐惧以及对复仇的渴望使得法国在列强中相当孤立。1898 年发生在苏丹法绍达的一个偶然的殖民事件，差点将法国卷入与英国的武装冲突之中。实际上，英国显然是法国的一个备选的友好国家和同盟国。19 世纪 90 年代，法国与专制俄国之间的联合逐渐更加紧密并延伸至英国；1905 年英、法达成了政府间的“友善谅解”。曾经一度作为法国侵略行为一个可选择的发泄途径的殖民扩张，现在只能提高紧张和怨恨的程度，特别是当德国军国主义渐渐变得更加猖獗的时候。在 1914 年以前的几年中，欧洲事务就像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民族复仇的要求漫溢，涌入了国际事务之中。这个时期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政治上的颠倒是左派放弃了对复仇的要求，而右派则发展出了一套过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广受欢迎的作家保罗·戴鲁莱德组织了一个爱国者同盟，它起着政治压力集团和街头战斗民兵的作用。1899 年，在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葬礼期间，戴鲁莱德甚至差点发动了一个政变。老练的新闻记者夏尔·莫拉斯也发展了一种超越议会的右翼人民党主义的主张，令政客们感到很难对付。莫拉斯的报纸和政治团体“法兰西行动”甚至接受了三色旗——一个意味相当深长的象征性表示——以及从事恶棍般的街头暴力活动。这批新的“爱国”右派发展了一种针对腐败的中间派政治的

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

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是那些朴实谦逊的人中的一个，他的大名在辩论和争论中过分引用，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对姓名背后的真正的人的理解。不仅仅是德莱弗斯事件，德莱弗斯这个人也像前者一样，照亮并启迪着第三共和国的方方面面。

德莱弗斯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出生于牟罗兹一个被同化了的犹太家庭。他家经营着成功的纺织生意，他于 1871 年普法战争家乡被德国人占领后离开。他在巴黎入校学习，选择了军旅生涯，在著名的综合理科学校培训，最终在 1892 年被派到总参谋部。

关于他在岗位上进行秘密活动的叛变的指控并不能动摇他对法国的热爱之情，这是长期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的典型心情。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是给与犹太人一定程度的公民权的第一个国家。在 19 世纪最后 10 年中，许多犹太人为了躲避沙皇和东欧的镇压而移居到法国，这使得犹太社团的规模从 5 万人扩大到 1914 年的 10 万人。这股犹太人大量涌入的潮流，激起了许多法国人内心的反犹情绪。他们不仅怨恨新来者的宗教，而且包括他们的文化和民族身份，这比已居住这里的犹太人要明显得多。在 1894 年 12 月举行的仪式上德莱弗斯被正式解除军队职务，观看的人群中有人高喊“肮脏的犹太人”和“打倒犹太人”。德莱弗斯自己的反应也很典型：“我是清白的。法国万岁！军队万岁！”

德莱弗斯于 1895 年至 1899 年在圭亚那“魔鬼岛”原麻风病营中度过了四年劳役监禁，这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直到 1906 年他才终于得到赦免，重获清白；一年后他因健康欠佳被迫提前退役。然而，1914 年他再度从军，升至中校，并获得骑士勋章。

他于 1935 年去世（这几乎无人关注）；十年以后，反动的和强烈反犹的理论家查理·莫拉斯被判决犯勾结维希政府罪。“这是德莱弗斯式的报复！”当判决通过时，他在被告席上喊道。这个评价显示了这个名字与它背后毫不起眼和毫不张扬的爱国主义标签离得多远。





因德莱弗斯事件全国政界分裂为两个强烈对抗的阵营。先进的印刷技术使得“美好时期”的社会中政治宣传的范围很广泛。

沙文主义批评。这些中间派据称是由新教徒、犹太人、互济会会员以及“外国人”掌控的。

可以拼凑出足够的证据来部分地证明这种仇外活动。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中共有的对保卫共和国的理想主义的关注，被日渐增长的对个人财富的关注所覆盖。在1888年所谓的“威尔逊事件”中，总统茹尔·格雷维的女婿被发现正秘密地将政府高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1892年的“巴拿马丑闻”中，大量的共和国下院议员（包括著名的激进派政客乔治·克列孟梭）被发现接受贿赂以掩盖在费尔迪南·德·莱塞普斯的巴拿马公司丑闻中的腐败行为。不管是在机会主义者中还是在激进主义者中，列在恶棍名单中的大部分是新教徒。互济会会员也一样，因为互济会提供了一种与地方的及国家的权力基础相联系的政治交际活动的方式。外来的移民，尤其是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形成了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外国人社会。这 [235] 些外国人构成了劳动力总数的大约10%，他们同样容易成为种族主义者寻找替罪羊时的目标。

人民党右派对于犹太人影响共和国事务的指控，根植于右派长期以来的隐藏于深处的反犹主义的特点中。然而这种指控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莱弗斯事件。1894年，一个名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的犹太裔陆军军官由于被指控将所谓的机密军事情报泄露给德国人而被解职，并流放到在圭亚那的法国刑事殖民地。由于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一再试图掩盖，这个事件扩大为第三共和国著名的政治案件。将其放大的是新的大众媒体。1898年，作家埃米尔·左拉在激进报纸《震旦报》上发表了一封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标题是《我控诉》。在这封信中他抨击了军队的掩盖手段，并进而断言德莱弗斯是清白的。左拉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短暂的流放。但是，从1898年开始，一个人权社团集合了左派知识分子要求为德莱弗斯免罪。列队反对他们的是由新右派和亲教会权力政客支持的“反德莱弗斯分子”，这些政客抓住这件事将其作为攻击共和国的大棒。1899年德莱弗斯的赦免令和1906年对该赦免令的增补，本来被认为可以结束这件事了；但到那时候战线已被划清，且双方都固守之。

20世纪早期的政府，对来自右派的威胁极端敏感，它抓住了主动权并蹒跚步入了一场针对法定宗教机构的活动中。他们将攻击集中在学校教育问题上，这符合他们有关共和主义价值的一般见解。曾经在对德莱弗斯的攻击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圣母升天教义修道会，于1900年被解散了；1901年颁布了所有的教义修道会都必须得到政府授权的法令。1904年宗教圣会被禁止教学，下一步是第二年的政教正式分离：由1801年拿破仑的政教协约开创的政教相连的时代，就这样被终结了。数以千计的宗教学校被关闭，大约占初级学校的三分之一和中级学校的四分之一。共和国平稳地终



236 1900年，摄影为警察局的工作提供日常性帮助。这幅无政府主义者嫌疑犯的国际画廊式的照片是发给边境岗哨的，以寻求抓获1893年12月议会大厅爆炸案的负责人。

止这些机构的努力，被教皇不妥协的反对所破坏。他的前任在19世纪90年代鼓励过天主教徒支持归附——接受共和政体。德莱弗斯和20世纪早期的反教权主义法令终结了这一切，并有效地破坏了一个强有力的亲天主教徒政党的出现，即使该政党接受了共和国的框架和制度。

德莱弗斯事件不仅改变了政治重力的中心，也使它的调子变得粗糙。右派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卫护教会的传统中坚分子，另一派是法兰西行动的议会外势力和他们的同类。共和国的天主教徒在政治精英中已十分罕见。在右翼的用语中，作为共和国象征的玛丽安仍被冠以“婊子”的称谓。然而，天主教投票者却较少不妥协性，可能也较少有由德莱弗斯事件引起的精神创伤。有些人甚至确实渐离渐远了对教会的忠实。如在利摩日，从1905年到1914年不受洗儿童的数量从2%上升到 237 40%，而世俗结婚的数量从14%增加到60%。宗教的缺乏弹性产生了负作用，拉远了实践天主教教义与教会戒律本身间的距离，并使事实上的非基督徒人数在现有的巨大数量上进一步增加。天主教的下层社会也似乎比他们的领导者走得更远了，他们投已有政党的票——特别是机会主义派。这使得机会主义派向右转，随着反教权主义成为政党结合剂。他们允许激进派出现在第三共和国政治联合的支点上。这使其队伍获得了有限程度的政治稳定性。1899年到1905年只出现了两任内阁，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第三共和国的一个纪录。

激进派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了右派和反对教会上，然而，却使他们自己易受到来自左派的攻击。激进派和机会主义派对于“社会问题”傲慢的冷淡态度，为阶级斗争的发展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即使很多农民享受着经济全面发展带来的果实，苦痛仍存在于这片国土上。尤其是在南部和西部，小规模的农民耕作仍占统治地位。贫困使得很多农民流亡至城市，彻底改变了整个地区。在南部，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廉价葡萄酒带来的竞争，使得刚从葡萄根瘤蚜病中恢复过来的葡萄酒市场出现了供应过剩，这导致了1907年葡萄酒酿造者的起义。在贝基埃的正规军的兵变使得紧急局势更加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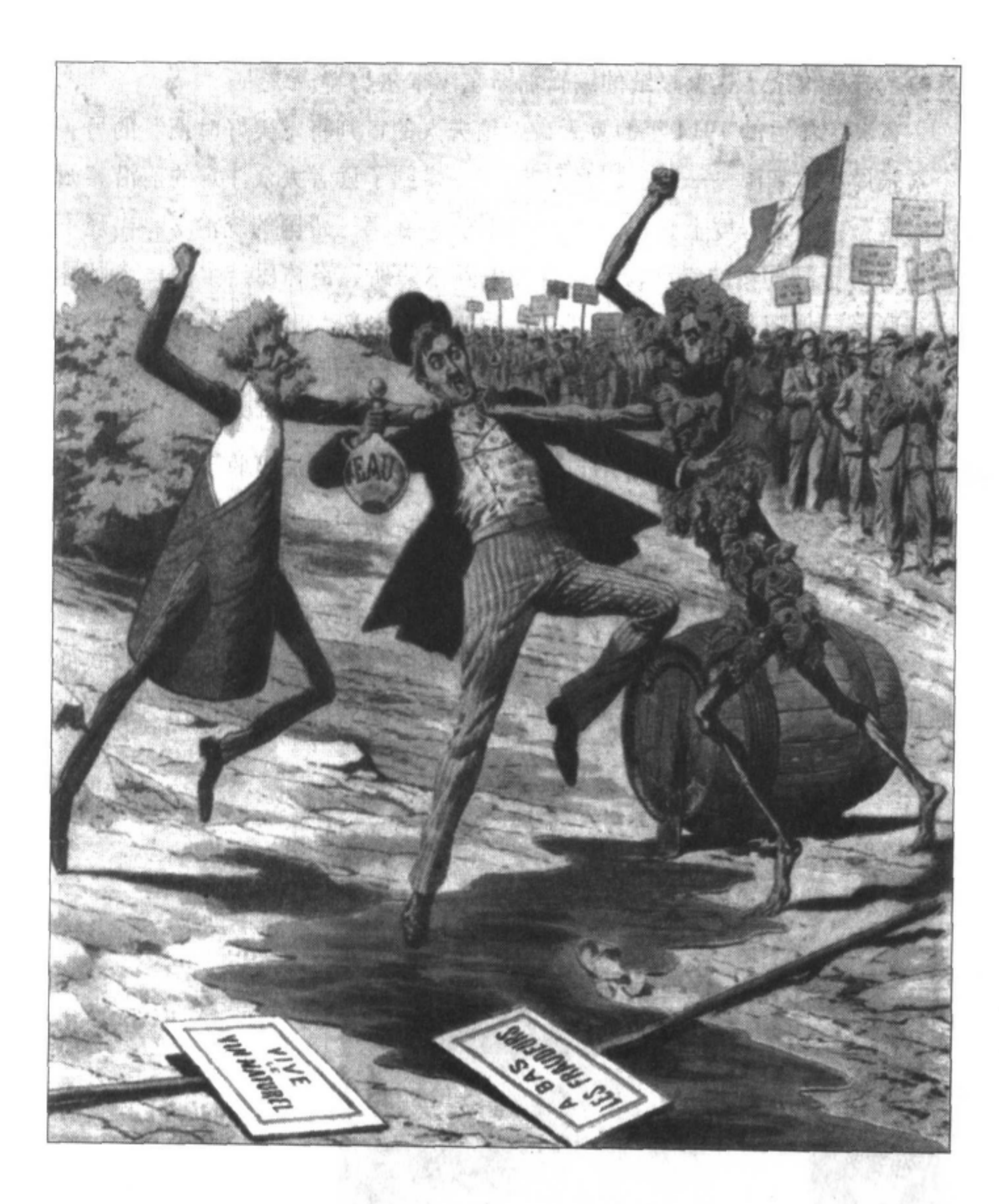
城镇的外观表面上是雅致的，实际上在工作场所和工人居住的市郊，还是隐藏着一个充满痛苦和贫困的下层社会。对于工人的社会保护终究还是来晚了，而且执行得不好。左拉著名的小说《萌芽》(1885)，以第二帝国时期的北部矿业城市为背景，描写了在富人中难以置信的情形；但是这种情形在第三共和国统治下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到了1914年每天的工作时间下降到了10个小时，但19世纪晚期整个行业都实行12小时工作制。虽然，谢天谢地，霍乱消失了，但是城市工人的死亡率和发病的水平还都远高于其社会中地位较高的人，以及他们的欧洲同行。到19世纪末，儿童死

亡率显著地下降了，但仍表现出巨大的社会差异：扩大的巴黎周围贫困地区中的儿童死亡率数字，是这个城市最富裕地区的两倍。第一共和国给予劳动阶级以土地；第二共和国是投票权；第三共和国则提供了学校，铁路和大众文化。但仍有许多事要做。

然而，社会上抗议的声音是令人惊讶地微弱。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在德莱弗斯事件以前利用了右派的分裂，并且从左派内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积极主义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中获得了好处。巴黎公社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它给某些人以鼓舞，它的被镇压则摧毁了巴黎人的战斗骨干；而且，它使很多工人疏远了在议会左派中寻找同盟。一个无政府主义运动兴起了。这个运动精通于"以事实进行宣传"，从事了一系列的暴行，特别是在 238 19 世纪 90 年代的早期。1893 年，一颗炸弹扔进了国民议会。1894 年，总统沙蒂·卡尔诺（1793 年—1794 年著名的"胜利的组织者"的孙子）被暗杀。尽管这些事件获得了很少的大众支持，但他们代表了一种对于议会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更加普遍的怀疑。1864 年的罢工以及 1884 年工会的合法化，扩展了工人活动的范围。与政治领域脱离的工会活动吸引了许多工人。地方层次的劳工联合会——地方贸易委员会和职业介绍所——的出现，提供了斗争的中心。很多好战分子偏爱直接的行动和革命的工团主义学说，他们力争一个可以导致政府倒台并建立起一个工人政府的普遍罢工。1896 年举行首届会议的法国总工会，通常是对抗议会操纵的。尤其在 1906 至 1910 年间，激进派政府部门强硬甚至是恶毒地对待群众罢工问题。激进派部长克列孟梭以赢得"法国顶级警察"的头衔为荣，他残酷镇压罢工行动。

好战的工人得到了很多组织的青睐。只代表了六分之一工人的法国总工会，发现自己在与一个公开的政治社会主义者左派竞争。这个左派也在根本上分裂了，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有 5 个主要的社会主义者团体。这其中最确实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茹尔·盖德的工人党，或称为法国工人党，嘲笑选举政治是软弱的改革主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学习社会主义的学校"，可以使工人理解议会政治的无用。盖德也将在地区层次上执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号召鄙视为"煤气和水的社会主义"，而这项政策是由其竞争对手保罗·布鲁斯领导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所提倡的。

社会主义在国家的层次上很难取得进展。社会主义者在 19 世纪 80 年代赢得了少许议席，并在 1893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大约 40 席。但一直到来自南部的议员让·饶勒斯，才帮助将这些社会主义派别塑造成了一股可观的政治势力。这位 1885 年的机会主义派议员，于 19 世纪 90 年代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者，并在 1905 年把这些不同的派别组合成"工人国际法国分部"。1906 年，这个社会主义派别获得了将近 100 万张选票，并赢得 51 个



1907 年 6 月 9 日《小报》上的漫画《酿酒业的危机》。一个奸商（即绝对禁酒者）受到攻击，旁边是在三色旗下抗议示威的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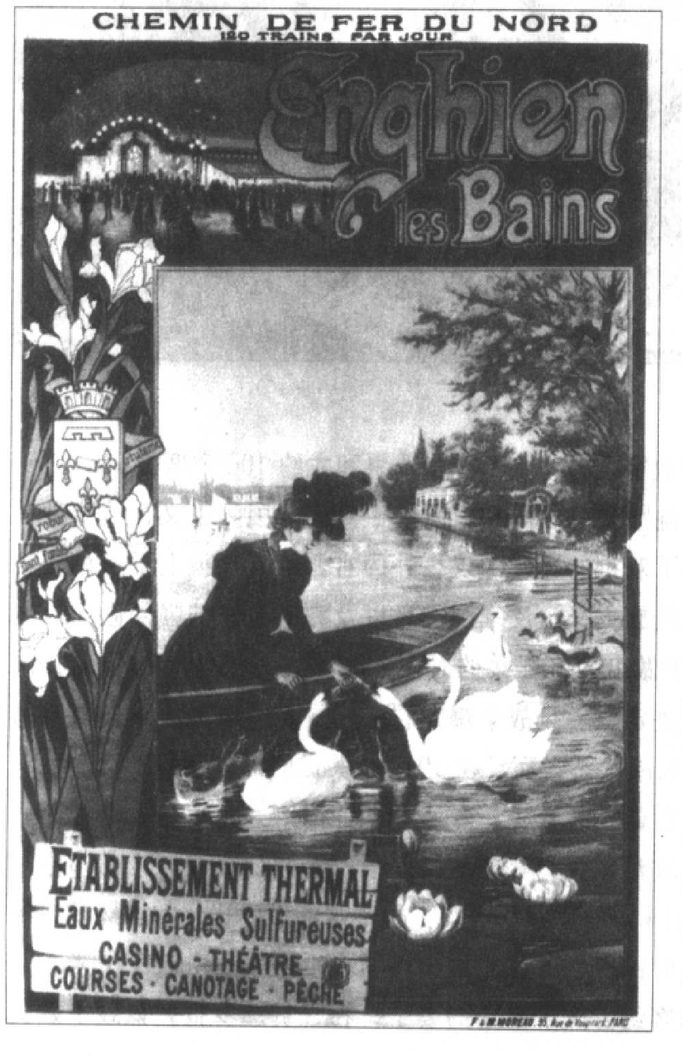
议席；1914 年，这些数字上升为 150 万张选票和大约 100 个席位。

随着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法国左派所骄傲宣称的国际主义，给这种社会主义者的进步带来了双重的怀疑。议会外的右派给自己披上了三色旗，而左派则增强了其反民族主义、反军国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强烈倾向。他们猛烈地批评 1913 年做出的将征兵的时段从 2 年增加到 3 年的决议；同年，法国总工会明确决定，一旦战争爆发它的成员将不参加战斗。饶勒斯也不相信这表面上的临战状态；而且在 1914 的关键时刻他的影响被消除，当时他被一个狂热的右翼分子暗杀。然而，虽然 1914 年共和国的前途似乎不确定地有赖于这场政治紧张局势的解决，吸引法国公众注意力的却不是 239 饶勒斯谋杀案而是 1914 年的另一起暗杀。关于这场不断恶化的国际危机的新闻，被一宗轰动一时的谋杀案的审讯从该国报纸的头版上赶了下来。据称，著名的激进派政客约瑟夫·卡佑的妻子，在《费加罗报》诋毁了她丈

夫的名誉后枪杀了这家报纸的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

在决定命运的1914年的夏天，卡佑夫人的审判将“美好时期”的另一个紧张局势的来源——即“妇女问题”——带到了读者大众注意的前沿。“妇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男人问题”。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下，出现了一种对男子汉气概的崇拜，这与自丧失阿尔萨斯、洛林后产生的民族耻辱感相联系。伴随着强健的，尤其是运动的沙文主义，出现了一种决斗形式的、近乎病态的对于个人暴力的爱好。在集体凭藉战场确立民族荣誉以前，决斗承认由暴力来决定单个男性的荣誉。在政治和社会精英中荣誉准240则是如此的流行，以至于最不可能成为决斗者的人也被吸收了进来，从和平主义者（饶勒斯）到衰弱的人（普鲁斯特）。著名的政客成了荣誉战场上的冷酷无情的常客：克列孟梭进行过22场决斗。这种过度的男子汉气概的行为预示着一个与妇女相关的危机，也暗示了一个跨越该国边界的问题。

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拿破仑法典》的家长式的僵化教条来决定。妇女应作为家庭的天使归于私人的活动范围内，而不是



19世纪末期，法国的温泉浴达到顶峰，数量超过1000家。恩日安勒班提供对呼吸道疾病和风湿病、关节炎的治疗。改进的铁路系统使巴黎患病的资产阶级可以坐火车当天得到健康疗养。对那些过夜的人来说，那里有包括赌博在内的各种激动人心的物质诱惑。

在政治、商业和法律的公共社交范围内。妇女不能投票，不能获得公职，不能充当民事法中的证人，不能成为陪审团的一员，也不能在没有她们丈夫同意的情况下工作。她们的财产在丈夫的管理之下，她们应顺从丈夫（丈夫在法律上只拥有对其妻子的“保护权”）。对妇女来说，通奸是犯罪行为；而对于她们的丈夫来说，则只是行为不端。确实，在第三共和国的统治下，妇女的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但大多数改革是不重要的和零碎的，如1897年公布的已婚妇女有处置她们自己收入的权利。1884年离婚的再次引入，是在同一方向上迈出的另一步。但只要了解到女权主义者对于妇女获得投票权的要求从未得到过广泛的支持，反而经常被视为是荒谬的，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规模和程度。在新闻、广告以及文学作品中，[241] 对于妇女的描画着重于她们在抚养孩子，从事慈善活动和满足其丈夫需求方面的社会角色。丈夫家中私有的贤妻良母式的“好女人”，与那些“坏的”或“公共妇女”——妓女（她们遭受着严密的，有时是羞辱性的，来自于医生和警察的监视）之间形成了对比。

当然，这种对更新过的妇女应专心于家务的观念的强调，还有另一个方面。首先，与农民和工人相比，它被更多地施加在资产阶级妇女身上。在劳动力市场中，妇女有一个安全和适当的位置。在农村，妇女在家庭农场上工作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战前官方的统计显示有将近40%的成年妇女从事家庭以外的工作，这个比例高于其他任何的欧洲国家。妇女通常从事卑下的、收入很少的职业：家政服务，在血汗工厂中制造衣服，文书工作和初等教学。在第三共和国的男性中引起更大忧虑的是资产阶级妇女开始进入公共领域，特别是进入那些大批政客从中退出的职业。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妇女获得了进入大学的权利；到了1914年，女性构成了大学学生数量的10%。19世纪80年代“费里法案”扩展了妇女的中级教育。19世纪80年代，很少数量的妇女获得过全面的医学训练；而在1914年，3%的开业医师是女性。1900年，第一个妇女加入了巴黎的律师业。

向更大程度上的妇女独立转变——通常与更多的离婚可能相联系——对于男性观点造成的冲击，要远大于单纯的统计数字所能显示的。妇女解放的增强和工人阶级组织的上升，与大众文化一起加深了民族衰落和耻辱的情绪。人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卡佑夫人的案件能把国际新闻从报纸头版挤走：就男性荣誉问题而言，一个手持冒着烟的枪的妇女是一种令人烦恼的女性力量的象征。审判竭力寻找一个该案件的解决方法，以迎合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她被裁定无罪，主要基于这样的假设：有预谋的凶杀对于一个来自有闲阶级的女士是如此的不相称，以至于她必须被判为是临时的精神错乱。在一个眼下正从事战争的“美好时期”社会中，这不啻于是对分裂和紧张局势的一个提醒。

第九章　变化中的法国：从一战到解放

[242] 1914年6月28日，一位塞尔维亚族枪手杀害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欧洲战争机器隆隆启动。在短短的几周时间内，在此之前的20多年中磨刀霍霍的两大武装阵营正式宣战。（各个国家以军事联盟的体系组成两大武装集团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事件就会导致所有伙伴之间的冲突。）由法、俄、英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加上比利时的参与，直接与德、奥匈、意大利组成的“同盟国”集团对抗。法国人在巴黎火车站欢送他们的战士上前线，并呼喊：“圣诞节在柏林相会！”然而，他们将陷入失望的痛苦。战略分析家原先预测的短期冲突变为4年全面战争的可怕灾难，给法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划上了深深的伤痕。

法国在战争中胜出。它实现了每一个复仇之梦，甚至夺回了在1871年落入德国之手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让德国付费来大大地扩张自己的殖民地。但这只是出征舞蹈式的胜利。战争给法国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个国家再也不像从前一样。“一战”及其后果残忍地粉碎了法国“美好时期”的幻想。在国际上，法国现在不得不承认受制于发展壮大的美国；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受到东山再起的德国的牵制。法国的人口再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榜首地位：拿破仑统治时期，6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法国人；而1918年后，12个到13个中才有一个，而且情况越来越糟。一战后的20年内，法国经济略有发展——但主要是复苏：1939年国家财富基本上与1914年持平。而其他国家则进步更大。法国社会生活没有大的变化；面对社会的不稳定，当权者毫无安全感地焦急地紧守着他们的位置。左右翼两党利益集团控制着法国政府，同时又尖锐地相互抨击。直到1939年，当德国发动的新战争进一步考验法国的时候，这个国家还处于僵硬状态，看来它仍被桎梏在自己造成的恶性循环中。1940年年中的丢人惨败，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历时最长的政权，黯然结束。在一支德国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由独裁者、传统主义者贝当执政的“法兰西国家”建立。

一战的影响

社会和政治的分歧成为世纪末的组成部分。然而令人震动的是整个法国于 1914 年夏天参加了战争。庞加莱总统唤起“神圣同盟”的精神，号召人们摒弃政治、宗教和社会分歧。议会里的社会主义代表投票赞成参战，243 甚至他们的领袖让·饶勒斯于当年 7 月 31 日遭到右翼狂热分子暗杀也没有吓住他们。8 月末，两名社会主义者（其中一位是经验丰富的老马克思主义者茹尔·盖德）加入内阁，折射出政治光谱的每一种色彩。至少表面



1913 年，社会党代表让·饶勒斯在一次集会中发言，反对通过增加征兵的方案。饶勒斯是一个职业军队的怀疑者，他支持建立防御性的、爱国军事力量。作为一个很有才气的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饶勒斯还是一个实力雄厚的演说家。照片中红颜色的部分强调了那时候聚会的革命特征。

上，战争在政治国度以外看似被普遍接受。工会未能成功地煽起过去所鼓吹的和平主义情绪。此前，军队司令官们曾估计逃兵比例达到 10% 以上；但事实上，逃兵仅仅 1% 多一点。看上去好像各个团体在政治国度中未经精英允许，就一言不发地把自己融入到第三共和国。

244 战争的本来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到 1914 年圣诞节，一条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绵延 700 公里的战壕建成。军事战略家对战争能够减少人口流动的预计，被灾难性地证明只对了一半：铁路迅速地将男人们送到了前

“马恩河奇迹”

“战士们，你的祖国的存亡取决于这次战役的结果……后退，将是不可饶恕的！”将军们频繁地发表这样的演讲。在马恩河战役（1914 年 9 月 4 日—10 日）开始前，霞飞对他的战士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表情十分严肃。

在西线战场上，交战双方都采用了进攻性的开局。霞飞把法军推进到洛林，很快就因为遭到顽强的抵抗而受阻。德国方面则发动了一个所谓的“封闭计划”，这个计划是对比利时发动猛烈进攻，以迂回包围巴黎。这个作战计划的目标是要迫使法国在 6 个星期内退出战争。

践踏比利时中立性的做法导致英国站在法国和比利时一边，而德国同时需要派兵去对付俄国。这样，德国的力量就不像计划的那样厉害。然而，他们还是把法军赶过了马恩河，向巴黎进军。9 月的第一天，德国军队距离法国首都 20 到 25 英里。霞飞采取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举动，他征用了 1000 个出租车司机，载着志愿者从巴黎地区驾车到前线。霞飞指挥军队向前推进，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德国军队又赶回到河对岸。他创造了“马恩河奇迹”：巴黎平安无事，战壕建成了，德国希望战争很快结束的想法被彻底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现在准备开始。



1914 年 8 月 29 日，被征用的巴黎出租车和卡车整齐排列在荣誉军人院外，等待向西线战场运送士兵。



以坦克突破有战壕的阵地。

线；但部队到了那里后，却滞留在原地一动不动了。科技的革新使战争变成防御而不是进攻：机枪手占据合适的位置就能抵御重炮轰击，比过于暴露的行军部队有较大优势。战壕作战成为交战的通行方式：长达二三英里复杂的战壕网络筑有混凝土工事，锋利的铁丝网林立；在重重防御之下，在士兵们的想像中总是处在月下的景象。 245

不幸的是，双方的将军们都没有思考过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最糟糕的是脱离掩护，他们作战——军事总部总是顽固地待在后方——仍然使用过时的进攻战略，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最优秀的一代人派到战场上送死。英勇和激情对锋利的铁丝网、铁锹和子弹几乎不起作用，死伤是惨重的：仅在 1915 年，就有 60 万法国人在战争中丧生。1916 年，德国人决定集中力量进攻凡尔登的战壕，他们料定法国人政治上决不会想到这座堡垒会失陷。的确，没有一位在 1792 年国家保卫战故事中长大的法国将军和政治家会想到丢失这座历史堡垒的故事重演。凡尔登战役于 1916 年 2 月 21 日开始，德国发动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战役持续到 12 月 18 日结束。法国指挥官贝当由于指挥成功而名声大振，尽管付出巨大代价（盟军

伤亡 40 万人，德国死亡约 50 万人）。士气在血流成河中受到严峻考验。1917 年又一次无效但代价惨重的进攻触发了军团兵变，贝当靠软硬兼施（27 人被枪杀，近 3000 人被判监禁）才恢复秩序。

246 兵变在巴黎听起来像一个警告信号，政治家们的理想像他们的将军一样破灭了。他们掌权的时间更短：实际上按第三共和国的风格，在 1914 年—1917 年间有四个不同的政府管理。企图在西线打破僵局的尝试，如同 1915 年灾难性的达达尼尔海峡出击，是不成功的。只有到了最后，政治家和他们的指挥官才找到打破防御僵局的办法。飞机得到使用（尽管主要用于侦察和少量的轰炸）；同时坦克也解决了最初陷入泥潭的技术问题，在 1918 年得到有效使用。最厉害的技术革新是——与 1899 年颁布的《海牙公约》相违背——化学战争。“毒云”（主要是芥子气）是造成数万法国人同时也是许多德国人死亡的元凶。离开战场的政治家对海军封锁德国的效

J·L·吕夫的木刻版画形象描述了“牢骚”场面：随着 1916 和 1917 年间发生的战地大屠杀，法国军队中的抱怨越来越多。军团兵变接二连三发生。



果寄予厚望。盟军的海上优势使德国国内民众的经济状况比法国人要差得多。

“让我们希望他们能坚持住吧！”在一幅有名的漫画里，一名前线士兵对另一人说道。“谁？”“老百姓！”“一战”在两个前线——平民和军队——进行。在大规模战争中，靠征兵组建的军队，在全国保住士气是统一整体，成为主要目标。做好宣传是政府战略的关键部分。报刊主编们很快就掌握了撰写新闻的要领。这场战争被形容为反对具有可怕的种族歧视色彩的“条顿人野蛮主义”的自卫；而法国“胡子兵”，或步兵战士，则被表现得无限地足智多谋，爱国而且愉快。战壕里的生活看上去也没有这么糟，甚至有报道称安装了中央暖气。“炮弹、榴散弹的爆炸……这么多笑话！”一位前线士兵在报纸中这样说。另一份报纸写他们如何“期盼进攻就像期盼过节。他们非常幸福。他们大笑，他们互开玩笑。”新闻审查确保新闻在1914年和1915年时打败仗的影响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对于广泛流行的“弹震症”的性质人们看法也很有保留。将军们认为这是“没有男人气概”，而医生们认为很难同意吃苦耐劳的男人队伍会患上“女人的”歇斯底里症的说法。 [247]

随着战争的进行，报纸的火药味减少。休假的士兵传播着完全不同的战壕战争的故事：寒冷，潮湿，狂轰滥炸，绷紧的神经，腐烂的尸体，明显的徒劳……来自战区的难民——自1914年以后有至少10个行政区完全或部分在德军战线后——也多少对宣传作了修改。巴黎于1915年遭到“齐柏林”飞艇空袭，并于1918年再遭德国重炮“大贝莎”的袭击。这让法国平民尝到一点前线的滋味：600名巴黎平民死于敌军行动。卷入大规模战争带来的财政和后勤方面的压力，使生活条件恶化：工业转入为战争生产，首先导致失业率上升；同时通货膨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短缺，排队购物成为常见现象；1916年开始实施价格控制，而1918年则开始实行配给制度。

战争的需求迫使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地干预经济事务。给士兵家庭提供的慷慨补助表明了战场上战争的严峻现实——国内战线较容易承担。固定价格制度和配给制也显示了极力取悦平民消费者的关心。供给方面的关键产业如铁路、钢铁、船运等，处于全面的政府控制之中：计划生产，加强企业间联系、劳动力分配，等等。为了适应介入这些新领域的管理工作，政府机构迅速膨胀，在不到4年中就扩大了四分之一。

士气虽然还没有土崩瓦解，但也为时不远了。军事失败，兵变，政治领袖分道扬镳，再加上支柱工业爆发大罢工引发的1917年政治危机，把克列孟梭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他提出“战争，战争，还是战争”的口号，推行半独裁政权，并且为战争做了最后的推动。斗争得到巧妙地平

衡：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有效地把俄罗斯逐出了战争，美国也加入了[248]协约国一方。1917年兵变之后，英国军队开始集结；德军从东线撤退，德国将领鲁登道夫于1918年进行最后反击。德国人意识到必须在美国援军到来之前发动攻击。随着德国的盟军在巴尔干半岛、叙利亚以及意大利的溃败，加上德国国内各大城市爆发政治革命，这次最后的出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鲁登道夫失败了，他的队伍被击溃。1918年11月11日，德国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一战的后果

1918年，法国面临沉重的战后重建任务。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重新回到法国手中，并为这个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带回了170万人口。但这仍然不够。法国在一战中共有130万士兵丧生，占所有主要参战国死亡人数的最大比例；还有300万人残废，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成为废人；近20万平民死于战乱。仿佛这还不够，1918年至1919年的一场西班牙流感又造成了16.6万法国人死亡。战争期间出生率下降，虽然未婚生子大幅上升聊以补偿已婚人群可以忽略不计的生育率。就如同作家德里欧·拉·罗歇尔后来在书中指出的，法国男人“吝惜他们的精子，但却不在乎流血”。1919年，法国90个省仅有3900万人；而在1914年，87个省就有3950万人。

法国每一个城镇和乡村刻满名字的战争纪念碑，见证了血腥可怕的战争的范围：在法国的3.8万个城镇中，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无人丧生。战争的后果在10个沦陷省尤为严重：马恩河地区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而其他5个省损失将近一半。物质损失也很严重：无尽的轰炸犁地，遍野尸浆浇田，大量农田变得寸草不生；战争共破坏了近100万栋建筑物，及难以计数的铁路和公路、许多桥梁、大部分工厂等；战争消耗了近百万只羊、无数头牛和50万匹马。

法国不仅仅是经济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它的战后重建工作也受到了巨大影响。法郎受到的影响最大。法郎自1801年起坚如磐石，并平稳度过了滑铁卢战役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动荡，但却无法与大规模战争的需求抗衡。一战期间靠政府支撑，法郎保住了五分之四的价值，但战后它直线下跌：到1919年，法郎贬值50%；到1920年，贬值80%。法国政府支撑法郎的能力受到战争中欠下的巨额外债的牵制。虽然个人所得税政策在1916年才迟迟实施，但却是千疮百孔的怯弱之举，仅够弥补法国战争消耗[249]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政府通过清盘黄金库存和大量国外投资，以及向外国尤其是美国贷款来弥补。直到1920年，两倍的间接税和3倍的直接税才

使法国有能力偿还外债。

战争对法国社会、人口以及道德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说明了法国人战后对安全的呼吁为何会如此强烈。克列蒙梭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莱茵河畔建立缓冲国的梦想——就像后卡洛林王朝的洛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在西部建立领土缓冲区，以及在东部联合邻国包围德国，看来很重要。限制德国经济潜力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不管是隔离德国还是让其财务赔偿，都会拉动法国经济重建。虽然受到英国和美国的阻挠，克列蒙梭还是采取了一些有效的举措：他成功地收回阿尔萨斯、洛林两省；通过新成立的国际联盟使法国成为煤产丰富的萨尔地区为期15年的保护国；实现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使德国军队人数锐减到10万人；德国——现在在魏玛共和国统治下——将接受战争罪指控，同时要支付财务赔偿。



巴黎歌剧院外面的长队——不是为了买票，而是等待煤炭定额。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后方战线士气低落，1917年又爆发了一场罢工。

对安全的渴求说明了法国在交战期间对德国的不妥协态度。盟国协商达成的《凡尔赛和约》遭到了美国上议院的否决，这样通过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1923年，法国短时间地统治了莱茵 [250] 河地区，并企图强迫德国尽快实施赔偿计划，这一压力导致了1924年关于赔偿的“道斯计划”签订。但困难仍在继续，甚至到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签订。此公约规定了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要尊重现存领土的政策。

但是，这仍然没能让法国确信其东部领土是安全的，因为当时魏玛共和国中右翼党派，复仇主义分子影响在增加。正是在这种沉重的气氛中，1929年法国决定建造马其诺防线——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据信攻不破的防御结构，起于瑞士终至凡尔登附近的蒙梅迪。

经济重建依靠的是从德国获得的战争赔款。虽然赔款进程滴水般缓慢，但法国经济在《凡尔赛和约》后的10年内恢复得很好。从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生产绝非畅通无阻：1918年战争工业雇佣的170万工人要适应和平时期的生产并非易事。另外，德国对北方的占领破坏了当地传统的重工业经济生活方式。法国经济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战争时期工业的现代化。新的“科学”管理原则，如泰勒理论，使法国的重要工业比1914年发展得更加迅猛。钢铁工业发展极为迅速，就连橡胶、汽车、飞机、石化产品、电气设备等重要的二类工业的发展也很不错。法国的飞机制造业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虽然后来落到了美国后面。到1924年，法国总体工业生产已达到1914年的水平。战争艰苦景况之后消费者需求的增加，对法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法郎的贬值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期，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一个竞争国都 [251] 要快：到1929年，工业生产与1913年的数字相比增加了40%，对外贸易增加了66%。与此相反，法国人口的增长却不活跃。战争期间大量婚龄成年男性的死亡，导致人口恢复的基数很小。针对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法国



针对士兵和他们家庭的宣传人口问题的明信片，1917年从凡尔登寄出。这样的宣传并没有使泄气的步兵们投入行动：两次战争期间，法国的出生率都非常低。在军队分发避孕套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



阿尔萨斯的一堂法语课。现在阿尔萨斯又重新回到了法国。这张1918年寄出的明信片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法国是我们的祖国"。一群欢笑的孩子伴着三色旗汇聚在一起。

政府采取了吸引移民的策略，尤其是吸引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的人；但很少吸收白俄罗斯人、比利时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战争之前法国大约有100万外国人，但战争期间又有50万人涌入，到20年代期间涌入的人口数目继续增加。法国继美国之后成了欧洲的民族大熔炉，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有250万外来人口——几乎占成年人人口的10%。

这样，法国政府就开始着手处理国家的人口问题，部分地动员移民成为劳动力。相反，他们将妇女的工作地点转移到厨房并鼓励她们多生育。战争大大刺激了妇女劳动力的增加，尤其是在军事工业中；同时也促进了白领工作的发展。战争时期的压力使大家对妇女当公共汽车司机、制造军需品的工人、鼓风炉工、铆工已经习以为常。虽然她们的工资还只是男性工人的一小部分，但妇女所享受的生活水平比起以前已经很高了。这一现象引起了男性的极大不满，即使是政治进步派中也有这种不满情绪。

令人惊讶的是，女性与移民团体一样对政治生活没有多大影响。1936 [252] 年，法国总理、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选择了三名女性加入他的人民阵



一战期间弹药厂的女工们。1917年，妇女在战时工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付出大量代价。

线政府。然而，与其他妇女相比，她们并没有更多的选举权利，左翼政府没有为女性做什么实事。激进分子和社会党党员担心拥有选举权的女性会选举宗教党派。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议案于1919年、1929年、1932年和1935年被议会否决。女性受教育的状况得到改善，但富有家庭的男孩则占据了中学和高中教育，危害了所有女性和工人阶级男性受教育的机会。

《拿破仑法典》的精神依然广泛地笼罩在“女性问题”上。当1917年一项将服装贸易行业的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5天半的法律通过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使服装行业的妇女可以在星期六为家庭采购。妇女到了1938年才得到她们的法律权利。而在此之前，妻子哪怕是获得一本护照这样琐碎的事情都需要得到丈夫的允许。当时的理由是为了使她们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下生孩子，以重振下降的法国人口。1920年，政府禁止出售避孕用品，并颁布了一项禁止堕胎的新法律，被人称为“天使制造法”。同年，法国开始庆祝母亲节，并为多子女母亲授予奖章（铜质奖章授予有5个孩子的母亲，银质奖章授予有8个孩子的母亲，金质奖章则授予有10个孩子的母亲）。

如果说女性相对沉默——女权运动尚在睡眠期，并在战争时期四分五裂——而他们的男性伙伴却不是这样。工人阶级仍然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在1919年，8小时工作制得到保证，但法国成年男工的生病和死亡 253 率比其他经济社会结构相似的欧洲国家要高，而且社会保险制度也较为落后。1918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14年的工资还要低五分之一；虽然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有所发展，但他们的工资到1930年时才达到1914年的水平。通货膨胀也对中低层阶级有所冲击。1926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庞加莱稳住了法郎，但它的价值也只达到战前五分之一的水平。这也许对出口有利，但却大大削减了那些靠退休金和固定工资生活的人的预算。土地方面的情况也很糟糕。农民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占很大比例。虽然农民的劳动产品在战争时期的需求量增加，一些农民也因此受益，但重返正常状态对他们不利。人口从偏僻的乡村大量流动到城镇，给农业经济造成很多困难，同时也弱化了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改善：1914年，一个农民养活4.2个人；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数字则为5.1。而美国的这个比例则由10.2人上升到14.8人。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国的农耕事业特别没有效率。

第三共和国受到质疑

尽管1918年后经济有所复苏，并且持续了将近10年，但是战后的法国依然是一系列的抱怨不满之乡。鉴于战后社会、经济和人口面临的压力，这种情况丝毫不足为奇。第三共和国玩弄部长席位的陈旧游戏仍在继续着。事实上，到1940年这20年间，共有40届政府，最短的只持续了三天。最主要的政党依然是激进党，但是现在它已经非常臃肿衰弱——这种描写同样适用于它的许多成员。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它战前的激进态度已经灰飞烟灭，现在打算在传统的反教会立场中掺入对小气的中产阶级、手工艺人和店主的支持。1919年，伴随着红色恐怖（任何激进党的左翼分子都被描绘成“牙缝里都藏着刀子的人”）完成选举后，他们和右翼组建了政府。

选民对右翼分子越来越失望，1924年大选左翼成功，支持建立了所谓的“左翼卡特尔”。然而，这个政府命运不济，很难完成结构改革。1924年到1926年任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发现自己陷入了逐渐滑坡的经济金融危机之中。资本流失带来法郎无力自卫，整个政府失去根基。1926年的中右联盟重振商业信心，但左派坚信“钞票墙”始终是左翼政府的障碍。“200家庭”——法兰西银行200家最大的股东——遭到了敌视，据说他们在货币市场和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巨大无边。

254

超现实主义者的声明

超现实主义（作为名词）是一种精神的无意识行为，个体通过它来表达真正的心理活动，无论是以口头言语还是以书面语言，或其他任何方式。它是一种内在思想的表述，而没有任何理性的分析，也超越审美和道德的约束。

（哲学定义的）超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中的某些联系是超现实性的，至今被忽略了，是在梦境的强大力量和思想自由表达的基础上。

这些有些抽象、晦涩的概念，是诗人安德烈·布雷东——公认的新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在1924年在《超现实主义声明》中所表述的。超现实主义者重视诗歌艺术和梦的艺术，重视超越常规理性形式的行为方式。在"一战"中，布雷东作为一个医生经常面对精神错乱的病人，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但是他希望能从潜意识中寻找病因，而不是仅仅观察外显症状。他希望确立新的艺术表达形式的基础，尤其是无意识写作或梦中的自发表述。

通过宣言，布雷东为与他在一起的诗人保罗·艾吕雅、路易·阿拉贡、罗伯尔·德斯诺斯和菲利浦·苏波，以及一些艺术家如毕加索、安德烈·马松、芒·雷和马克斯·欧恩斯特，确立了一个规划。超现实主义者就像他们最初向往的那样成为主流，达达派逐渐退出了主流。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特丽斯当·查拉领导的达达派作为一种虚无主义运动，其根源在于反对似乎接受一战大屠杀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达达派首先在苏黎士发展起来，然后传播到巴黎，它试图通过在所有领域中进行系统性冒犯来推翻传统的价值观。例如，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时刻，马尔塞·迪尚将一把尿壶（命名为"喷泉"）作为展览上的艺术品，使之成为一桩大丑闻。

布雷东意欲借机推波助澜以形成一种运动，一方面保留达达派的破坏偶像主义，一方面对人类的想像和体验也产生一些积极作用。对变革的追求导致超现实主义者首先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盟，然后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与托洛茨基派国际共产主义者结盟。

虽然超现实主义的政治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化为泡影，但是它对法国诗歌和艺术表现都有重大影响。超现实主义对20世纪的艺术以及日常生活有着最为深远的影响——自60年代起也没有少利用广告部门。



马格丽特在1929年的《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二期上发表了主要超现实主义者围站在一幅绘画前的照片。这些人发表了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声明，其中有诗人(布雷东，阿拉贡，艾吕雅，佩雷)、画家(达利，唐居伊，阿尔普，欧恩斯特，马格丽特)和电影制片人路易·布纽埃勒。

政治家被视为商家的囊中之物。虽然普通民众对“战争之外干得好的 255 铁腕人物”有很大的偏见，但是企业雇主士气高昂，雄心勃勃。里昂的一位化学药品制造商在战争中满意地说：“人们在为企业家战斗。企业家将来要获得经济的胜利。”1918 年以后可以觉察到这种思想。与以往相比，企业雇主的组织性逐渐加强：1919 年全国性的企业家联盟成立，企业家协会很常见。这些团体在政治领域扮演着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和说客角色。



20 世纪 20 年代剪短发的人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烧胸罩的人一样。虽然批评者担心将来会出现“没有性别的文明”(M. L. 罗伯尔语)，但它向世人宣告了妇女新的独立精神。钟形女帽——有些像战士头盔——再加上大胆的化妆和首饰，使效果更显突出。

法国社会在社会压力下分化。任何激进的变革都困难重重，王牌依然操之于社会精英和商人阶级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系日益遭受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政权体系能在一片批评声中继续有效地运作，的确了不起。挥之不去的绝望感部分来源于大规模战争的影响。亨利·巴比塞的反战作品《火》(1916) 成为畅销书，尤其是通过 1918 年后成立的老兵协会的和平主义深深地扎下了根。在知识分子中间也盛行政治冒犯和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运动。战争期间开始的“达达运动”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从中发展出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是艺术界的典范。让-保罗·萨特的小说《恶心》(1938)，是同样的反资产阶级口味的后开之花。对一种新型社会的向往，使许多参与这些运动的人转向左翼政治。其他一些人转入极端右翼行列。莫拉斯的影响流传至今的《法兰西行动》，给许多头脑清醒的右翼年轻作家提供了思想库。其他人中的小说家德里欧·拉·罗歇尔和狂热的反犹分子塞利纳，则从极右的观点批判现代社会。

不介入左派或右派政治的叛逆和抵抗运动，通常将参与者引向了个人享乐主义。1922 年，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备受谴责的（也是得到普遍阅读的）小说《假小子》，描绘了一位波希米亚式玩世不恭女郎的自由恋爱和女同性恋生活。这本书在严守礼教的人当中引起了道德恐慌。人们无休止地（通常是淫秽不堪地）讨论着短发、短裙和平胸与性的关系。虽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都以资产阶级的方式震惊了资产阶级，他们还是反映了社会上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冲突。战时男性死亡率造成独立女性人数增加，而且现在大量资产阶级的未婚女性和寡妇都参加工作。战后三年间，42% 的成年妇女仍然在一些有报酬的岗位上工作，她们占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二。模糊的性别界限——在关于弹震症（看来与讨论男性歇斯底里症相矛盾）辩论时的重点——在回到和平时期“正常状态”时并没有消除。显然，口袋里有了钱的妇女极力抵抗这些把她们赶回到锅台和床边 256 的运动。

这些变化都是大众文化中出现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组成部分。天主教的教士们面对宗教热情的滑坡，扼腕叹息：工人中的天主教徒不到十分之一；据说，工人阶级喜欢到电影院而不是去教堂。一战之前是法国电



收音机最初是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走进资产阶级家庭的新科技产品还有洗衣机、吸尘器、地板抛光机、电话和录音机。

影院的黄金时期，在二战前的岁月中它活力依旧：1933年一年的票房售票就达到2.5亿张。电影、收音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和留声机唱片（尤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着巴黎名人的文化时尚。爵士乐[257]不再仅仅是巴黎夜总会的狂热，而成为一种全国流行的现象；像若斯菲娜·巴克尔一样的舞蹈演员和歌手能够成为全国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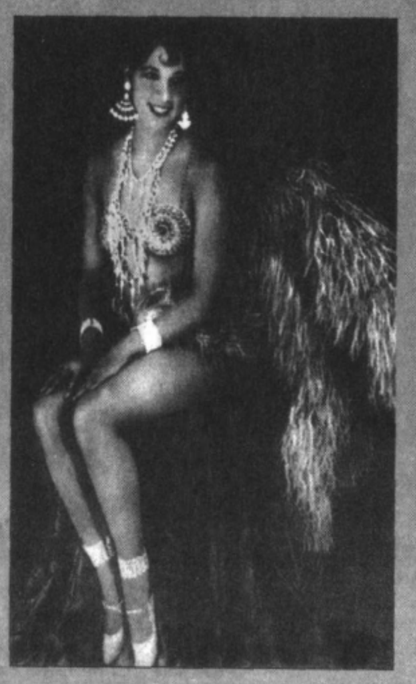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岁月里，传统媒体做的也很好。法国是报纸销售大国之一，新闻界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众需求的变化。这个时期出现了图片新

闻和连环漫画；体育报繁荣一时，反映出大众越来越喜欢观看体育运动。时尚杂志也开始发展，1937年出现的《玛丽-克莱尔》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帮助科科·夏奈尔等女装设计师把资产阶级沙龙里的女性时尚推广到了街头巷尾。当个人咨询专栏突然出现于报章杂志上，宗教护卫者担心在这个性欲泛滥和疯狂购物的年代里，天主教的忏悔会被排忧解难的阿姨大妈所取代。

这是那些麻木的政治精英们几乎毫不触及的发展变化。主要的政治家们年龄越来越大，他们生活在"美好时期"的年代，而非爵士乐时代。缺乏洞察力的象征是1924年"左翼卡特尔"将反教权主义当做现实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判断。他们试图通过攻击教会获得支持的做法，简直就是放了一个湿炮仗。越来越多的人对战前激进分子非常憎恨的宗教所持态度是冷淡，而非敌对。而且天主教精英慢慢也做出要支持共和的姿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天主教牧师同样投身战壕。1921年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而1905年因政教分离产生的问题于1924年得到友好解决。共和派对避孕和堕胎的态度得到教会认可。虽然一些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依然坚持对共和国的强烈敌对情绪，但他们的信徒越来越带有红色色彩。天 258 主教联合工会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末时有30万会员——而且从20世纪20年代就试图创建一个基督教民主政党。教会已不再是激进党喜欢求

若斯菲娜·巴克尔

若斯菲娜·巴克尔。她是男人吗？她唇线漆黑，皮肤焦黄，短短的头发像抹了鱼子酱一样贴在头皮上；声音尖利，没完没了的颤抖使得她的身体扭曲得像条蛇；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支振动的萨克斯管，整个交响乐的声音似乎都来自于她。



上面关于黑人爵士乐和舞蹈明星若斯菲娜·巴克尔的描绘，生动地反映了她在男性观众中激起的惊奇和困惑。少年时期的巴克尔就全裸或半裸地出现在1925年在巴黎开办的《黑佬杂志》上。一些资产阶级的胖子们暗暗嘀咕着"西方世界的沦落"。她光滑的发型促生了一个新的法语动词"巴克尔定型"——20世纪20年代流行爵士乐时出现的一系列崇美词汇中的一个（直到今天还有"爵士帮"、"鸡尾酒"、"爵士摇滚"，等等）。

巴克尔经常带着一只宠物豹，或在脖子上缠一条蛇，她彻头彻尾地扮演着一位异国超级明星的角色。她在法国音乐听众中赢得了持久的热爱，一直持续到1975年她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进一步提高了声誉，因为当时许多法国明星都向德国人妥协。

助的适宜怪物。

极端主义的发展散发出了传统政治所带有的不良气味。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议会外右翼势力的出现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1934 年已发展壮大到 6 万人——早在 1898 年就已成立。它对教会和国王日益唐吉珂德式的支持导致天主教皇（1926 年）和合法王位继承人（1937 年）都反对这一运动。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做“法西斯同盟”的组织，往往与准军事行动小组一起站在“法兰西行动”的“国王的蹩脚货”一边。他们强烈抨击第三共和国的失败，日益被传统右翼激怒。最具有威胁性的还是前退役老兵于 1927 年成立的“燃烧的十字架”运动。1931 年，陆军上校德·拉罗克成为领导，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组织的成员在 12 年内就达到了 15 万人，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一种“成年人的政治童子军运动”(R. Remond 语)，这丝毫没有减弱它的危险性。类似的组织都得到独立的企业家的资金支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水制造商勒内·科蒂。

议会外右翼势力发展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同样敌视“资产阶级民主”的强大革命左翼势力的发展。在 1920 年的党员大会上——所谓的图尔 259 大会——社会党分裂。大部分党员分裂出来，在布尔什维克的鼓舞下申请加入莫斯科发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申请一经批准，法国共产党就诞生



这张海报警告农民注意共产主义威胁。尽管维希当局不断进行仇外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但这并不能阻止农村选民，特别是来自南方的选民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岁月支持法国共产党。

了。犹太知识分子莱昂·勃鲁姆领导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仍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却是一支致力于民主改革的独立力量。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议会中都有代表。然而，社会党忠实于1905年的革命，不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而共产党以苏联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把争取议会席位只当做他们活动的一小部分。在工业前线，共产党工会法国总工会成立，以便与社会党相抗衡，这也反映了左翼力量的分裂。特别的是，共产党人反对三色旗和《马赛曲》，支持国际劳工的红旗和《国际歌》。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将第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类比作霍乱与腹股沟淋巴结炎瘟疫的区别：两者最终都有致命的危险。

20世纪20年代，议会外组织分裂成左派和右派，这给中间派相当大的活动余地。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三个新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极端主义的发展，即日益明显的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和国际局势紧张。

“这些天选举代表，”一家法西斯报纸揶揄地说，“只不过是把议会豁免权发给骗子、收贿者或危险的傻瓜。”1934年的所谓斯达维斯基事件，使得企业、金融的说客与政治家之间的紧密联系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加入法国籍的乌克兰犹太人亚历山大·斯达维斯基陷入市政府腐败事件中，害怕暴露令他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右翼媒体的本能反射式的反犹主义进一步扩大，因为他们怀疑激进派议会代表深深地卷入腐败交易，现在却想掩盖。1934年2月2日，右翼党派和法西斯党在巴黎游行示威，走向国民议会大厦，在那里遇到警察的暴力行动。混战中约17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政府倒台了，共产党的反右翼示威游行进一步导致了流血事件。

经济困难加速了极端主义政治的抬头。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的崩溃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长期的衰落，虽然这一冲击对法国的打击来得比较慢。事实上，在随后的两年中，政治家和企业家都认为法国是危机四伏的经济体系中的一片绿洲。然而，从1931年开始，法国自1905年左右开始的繁荣期明显地走向了结束。出口额迅速下降，工业活动减慢，失业率上升。经济暴跌在法国来得慢，去得也慢，1938年才开始出现一些经济复苏的迹象。这一年的生产水平要比10年前低20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的跌落（自相矛盾的是，这有利于那些工人，他们的购买力相应地有 260 所提高）对农业造成了格外严重的打击。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复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新情况也导致了更为灰暗的长期效应。死亡率自1935年开始超过了出生率。1939年的法国人口有4130万，仅比1918年后增长了200万。在同一时期，德国人口增加了1000万。

德国的威胁并没有消失。即使马其诺防线也没能带来法国自 1918 年就追求的那种安全感。它并没有像最初计划的那样，把比利时通过海峡的边境线包括在内。第三共和国在 1932 年做出这个决定，部分原因是财政方面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盟国比利时本身，这个同盟关系在 1936 年就停止了。1933 年，希特勒靠反对《凡尔赛和约》的竞选口号上台，给法国出了一个难题——尤其是他们与英国政府正式结盟，赞成绥靖政策。1933 年德国退出了国联，1935 年开始大举实行义务兵役制。1936 年，希特勒谴责 1925 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并占领莱茵区，使之再度军事化。法国人烦恼地但却懒散地袖手旁观。复仇女神看来正在发出召唤。

从人民阵线到法国的陷落(1936 年—1940 年)

261 紧张的国际局势加上国内法西斯主义威胁，把左派推到舞台中央。斯达维斯基事件所引起的动乱——虚假地，但却富有成果地被认为是法西斯


LE GRAND QUOTIDIEN ILLUSTRE
AUJOURD'HUI
VINGT PAGES 25 CENTIMES
LE NUMERO : 0 fr. 25
VENDREDI 5 JANVIER 1934
LA COLOSSALE ESCROQUERIE DE STAVI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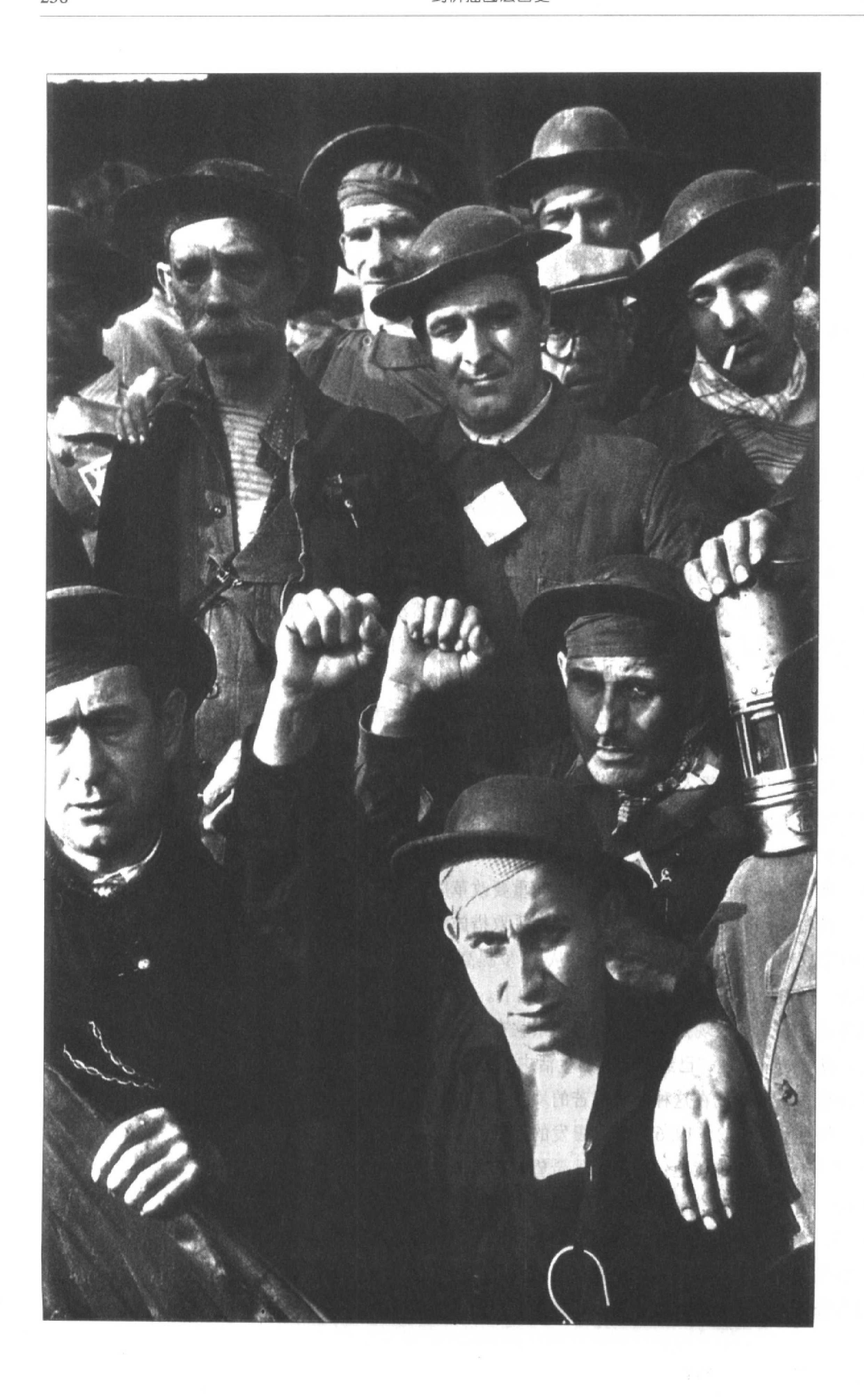
1934 年 1 月 5 日，斯达维斯基的欺诈活动被曝光；三天后，发现了他的尸体。尽管他的死最有可能被解释为自杀，但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为保护他在激进党中的高层同谋而设下的阴谋。

的一个阴谋——鼓励共产党重新考虑其立场。法共转向斯大林国际政策，确认了核心的变化。从1934年末开始，共产党号召同社会党组建联合平台——人民阵线——来反抗法西斯主义，从事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在随后的几年中，许多激进政党也加入这一运动，新联合的左派在市政选举中收获颇丰。同年共产党工会返回法国总工会；实际上它成功地接管了这个组织。到1937年，重新恢复活力的总工会拥有了400万名成员。手法巧妙的共产党人，过去正式反对“祖国”的观点，现在自己穿上了三色衣，而不是红旗；并像唱《国际歌》一样唱起了《马赛曲》。甚至贞德——“人民的女儿，被国王出卖，被教士烧死”——也享受了一段左派支持的好时光。“我们党”，共产党日报《人道报》宣称，“是永恒的法兰西历史中的动力。”

人民阵线运动在法国激起的回声以两种方式显示出来。在1936年的选举中，打着“面包，和平，自由”口号的联合运动拿到了摆在面前的一切，获得了358个席位；而第一大党勃鲁姆领导的社会党获得了222个席位。然而不幸的是共产党的进步遇到支持度不断增长的极右派的挑战。第二个方面，当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掌握了国家时，左派仍然没有掌权。当时的情况就像两百万工人占领了他们的工厂和车间一样，他们要求立即进行人民阵线改革。

左派被这场运动扯了回去；法国总工会的第一书记通过电话才知道了这件事情。勃鲁姆已经组成了一个由社会党和激进党组成的政府(共产党在议会里支持政府，但没有进入内阁)，他把工人领导和老板带到了议会，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抛出了一个社会政策。1936年6月7日，所谓的“马提尼翁协议”同意工资平均提高10%，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建立仲裁和调解机构，所有雇员享受两周带薪休假。其他重要改革随之而来：采取措施稳定粮食价格，作为对农民的支持与补助；采取措施增加银行的信用度（减少200家族的巨大影响）；把离校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4岁；开始重新整顿军备。法西斯政党也被解散，只得转入地下。

人民阵线在改革上表现熟练灵活。假期条款在渴望休闲的工人阶级中产生回应，勃鲁姆宣称他“已经在艰苦的生活中注入了一些鲜花和阳光”。[263] 然而他的政府很快就发现在这种非常艰苦的岁月里，要保持议会成员和群众的联合支持是不可能的。1936年9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1936年—1939年）使政府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像他希望的那样去支持共和政府，他就会失去他的激进党盟友。最后，他选择了一个谨慎的中立政策，然而这种政策使共产党人和许多社会党人不满。糟糕的经济形势更是否定了他的社会改革成果。限制工作时间以减少失业率的办法尤其是明显的失败，失业率并没有降下来。增加的工资也被物价的上升抵消了。工业也没有得到





由亨利·卡蒂埃-布雷松拍摄的《1936年精神》。这张照片说明了法国人每年享受两周带薪假期、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到40个小时的情景。这是“人民阵线”倡导的降低失业率的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政策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

发展：当1937年勃鲁姆离开政府的时候，工业产量比他1936年当选的时候还要低。资本的流失给货币施加压力，然而推迟货币贬值，这样勃鲁姆使他的政府错过让出口从法郎贬值中受益的机会。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困难，1937年6月勃鲁姆离开了总理的职位。有几任以人民阵线为基础的政府，包括1938年勃鲁姆再一次组阁的政府，试图保持政治战略不变。但是社会改革陷于停顿，庆祝1936年大选时的热情已 264 经消失了。要让共产党留在阵营中已经被证明十分困难：1938年他们号召的总罢工完全失败，失去了左派信誉。法西斯政党则改头换面后进入右派阵营。德·拉罗克的“火十字架”现在成为法国社会党，拥有近100万成员；而前共产党雅克·多里奥却组成了一个危险的带煽动性的法国人民党。国际形势也十分沉闷。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并公开拒绝了国际社会反对这种合并的要求。

后人民阵线的达拉第政府的屈服是不可避免的。在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中，法国和英国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合并，并且同意希特勒对捷

（第258页）1936年6月14日，反对派矿工身着工作服，在巴黎郊外的蒙特鲁日体育场内举行政治集会，庆祝罢工结束。“人民阵线”在工作场所鼓动工人斗争很成功，但对他们的回报却并不成功。

克斯洛伐克北部的苏台德区的占领。达拉第试图在人民阵线时代后重新整治法国的经济。1939 年，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制被延长到每周 48 小时，以激励雇主。随之而来的是紧缩财政政策。重新整顿军备，推动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并使军事力量做好与德国厮打的准备：看来冲突已不可避免。只有共产党对 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投了反对票。但是他们——像斯大林一样——抱怨西方民主制度无力与希特勒相比拼。1939 年 8 月，纳粹－苏维埃协定的消息像投向法国政坛的炸弹。当希特勒 9 月入侵波兰时，前景变得更加令人沮丧。

1939 年 9 月，英国和法国与德国的交战不带有多少 1914 年战争中的狂热军国主义，却带着审慎的迟疑，而且政治分歧十分明显。共产党人的忠诚度——该党立刻被剥夺了合法地位——受到质疑。右派对共产党人破坏性的担心，伤害了战争中的信任感。“宁要希特勒不要勃鲁姆”的说法在反犹太人势力中流行。1940 年初，丘吉尔的外交特使、英国外交大臣向伦敦报告说，法国的资产阶级“害怕得胡言乱语”。当双方都在进入军事准备的漫长等待时期时，悬念之风不复存在。“这儿什么都没有，”一个在马其诺防线上的年轻中尉在 1940 年 2 月给父母的信中写到，“绝对什么都没有。仅有的消遣是吃饭和睡觉。情况令人失望地放心。”

1940 年 5 月，令人失望地放心的局面让位于最黑暗的绝望，经过八个月的“欺骗战争”后，德国人发动了袭击。从 1918 年以来，法国的将军们就计划作战，以他们最了解的形式作战，也就是战壕战。马其诺防线就是按照这种设想建的。他们跟不上战略作战思想，现在是带领移动部队从后方到战场打击。一些战略家，如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和 J. F. C. 富勒；德国的古德里安，以及法国资历并不深的年轻的骑兵军官戴高乐，都认为坦克应在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同时应当进行空中袭击，闪电般炸毁敌人防御阵地，造成恐怖气氛。的确，1940 年的战事即将证明闪电战的新战略课程目标——闪电奇袭战。5 月 10 日，德国军队出其不意地通过了阿登山区——这里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法国最高军事指挥部认为现代军队不可能通过的地区，因此，这个地区既没有在马其诺防线的防御范围之内，也没有重兵防守。大约 1500 辆装甲车在古德里安的指挥下向海岸急速进攻。5 月 20 日，他们到达海边，并完全包围了盟军部队。盟军部队在敦刻尔克陷入一片混乱。老人占大多数的法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发现，要想对战事的发展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是不可能的。他们仅从前线获得情报就要用 48 个小时的时间。20 万名英国远征军加上 14 万名法国部队，靠一个包括许多从英国派来的小木船在内的小型船队，撤出了敦刻尔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意大利的领导人墨索里尼在这个时候向法国宣战，以便从即将沦亡的法国捞些好处。

最初加入逃亡者行列的是有钱人，他们开着时髦的轿车，带着各种细软上路；随后，开始出现破旧的汽车和带有劣质伪装的货车，人们天真地希望简陋的伪装能够躲过黑色杀手，即纳粹飞机的袭击；逃亡队伍的最后是穷人、逃兵、一无所有的流浪者缓慢地走着……还有步兵，满载物品的骑自行车女郎，以及勇敢的推着婴儿车的母亲。



大逃亡

作家罗兰·多热莱斯对1940夏天德军进攻法国时混乱和绝望所引起的所谓“大逃亡”进行了悲剧性的描述。当时，大约有800万—1000万法国人沿着公路逃往南方。敌人的飞机给平民带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多的直接伤害。对火车站和铁路系统的轰炸使北方城市陷入恐慌之中。逃亡的难民部分是由于害怕，部分则是出于对政府的盲目信任，认为根据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政府不希望北方的大量人口落入敌手。这一理性却陷入了官方优柔寡断的泥潭。政府试图在5月底召集并组织巴黎市区的抵抗，但是到6月10日，它已经决定把政府也转移到南方。这种做法加剧了混乱和恐慌。

滚雪球效应立即浮现，大量村庄和城市被无法聚集过正常生活的大批民众所遗弃。城市到处空空荡荡，被遗弃的猫狗满街流浪；而在乡村，无人挤奶的母牛哞声不断。在拥有2.3万人的城镇夏尔特尔，只有800人留了下来；而在拥有5.8万人的特鲁瓦，最后只留下了30人。与此相对照的是接收难民的城市人满为患，尽管慈善机构想尽办法接待这些逃亡者，但他们很难养活这些陷入困境、全身泥污、一瘸一拐的难民。在利摩日，大约20万人只能在街头和公园睡觉。波尔多的人口则从25万猛增到60万，甚至更多。要让这些混乱的人群平静下来，除非战争结束。在这些人中，特别是犹太人，已经开始想法穿越边境，进入中立国西班牙。但是对其他人，艰苦的返家跋涉也即将开始。

德国的突破给整个法国北部带来极大恐慌。近1000万的法国人，其中200万来自巴黎，开始沿着公路逃命。政府也加入了所谓的“大规模逃亡”。总理雷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表84岁高龄的贝当将军引进政府做 266 副总理，试图以此来支撑自己的权威。他还引荐49岁的戴高乐做年轻的战争部长。“他还只是个孩子！”一位年迈的总部官员评论说。然而，6月初，政府踏上了逃离路：第一站停在了图尔，然后是波尔多，最后留在了维希这个温泉镇。失败就在眼前，雷诺建议将政府转移到殖民地以继续战斗，而戴高乐梦想着撤退到布列塔尼半岛的最远端。然而，贝当对此毫无想法，他站出来组织了一个停火协议，该协议于6月25日生效。结果，德国军队——1871年他们的祖父曾是第三共和国诞生时的助产婆——成为这一政权的送葬人。1940年7月10日，议会代表们在维希的卡西诺赌场的

奇异环境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568 比 80，将创建新政府的权力交给了贝当。彻底失败的打击让人们忘却了第三共和国的优点——它在民主共和框架中化解吸收社会和政治纷争的能力。旧政权的支持者根本不允许申辩，激进党代表樊尚·巴蒂只能在议会解散的时候高声呼喊“共和国万岁！仍然万岁！”可能还有更糟糕的墓志铭。

维希：占领与抵抗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布罗什所说，法国经历的是一次“奇怪的失败”：意外、迅速而且具有毁灭性。德国人强加给法国的是墨洛温王朝式的残忍和平。德国允许法国保留殖民地和海军（一部分停泊在阿尔及利亚港口米尔斯克比尔的舰艇在几周后被英国皇家海军的炮火摧毁，但此事却已被人所遗忘），但是法军军队人数被压缩到 10 万人；另外的 150 万部队则被调到德国，作为人质监管起来。阿尔萨斯-洛林被德国吞并；在领土方面，法国只能占据很少的地区。最重要的北方和大西洋海岸地带由德军占领，而在法国南部则建立了一个孤立的“非占领区”。这块地区就是由贝当管理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叫“维希法国”。维希法国政府就设在南部温泉小镇维希城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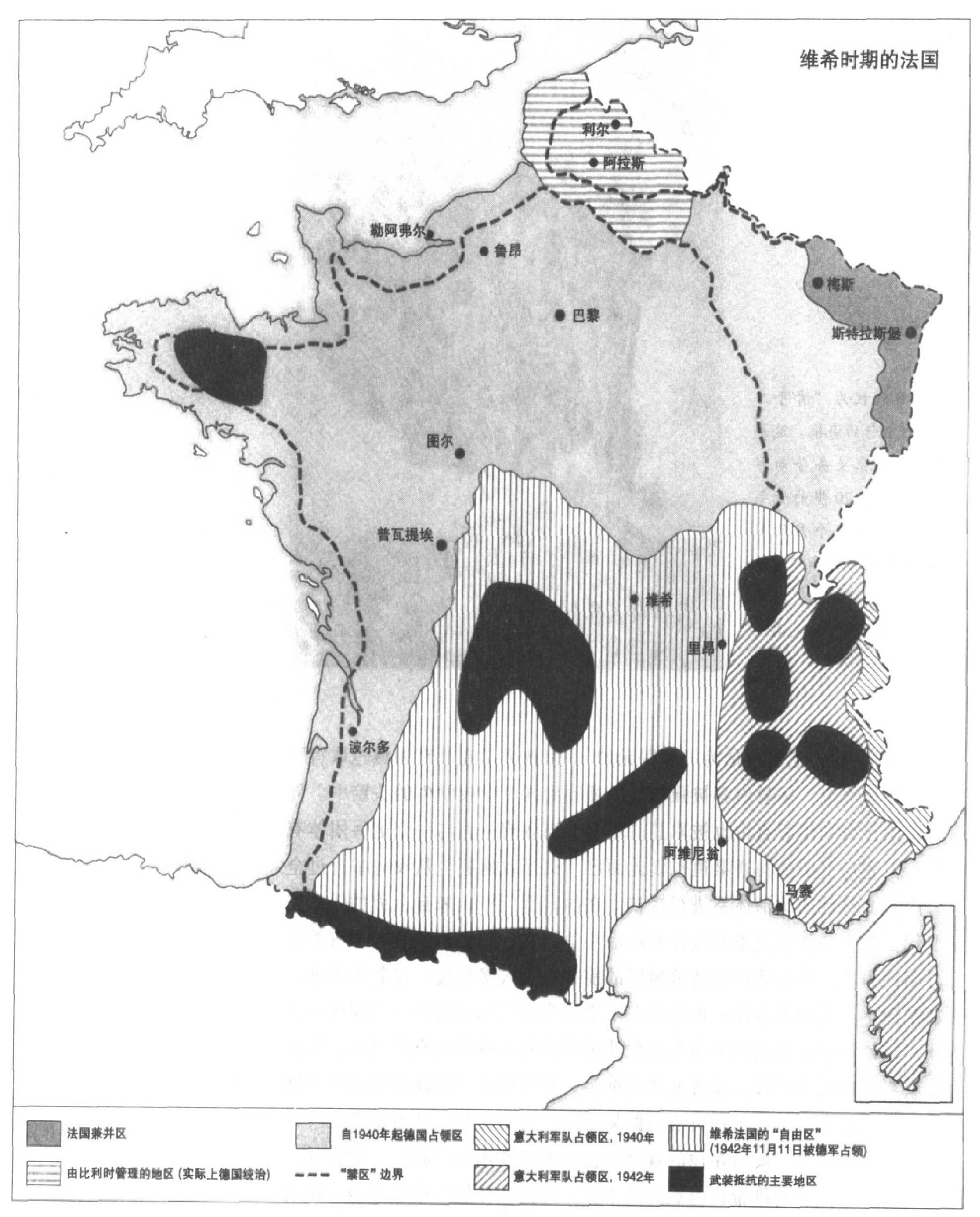
贝当宣布新政权的基础将是“工作、家庭和祖国”。但这只是他个人的意思。1789 年“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被维希更朴实的信条，所谓的“国家革命”所替代。其目的是以回归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名义，改正所有对法国不好的东西。维希政权像它的领导人一样以超越党派利益自居，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党派斗争最激烈最阴险的政府，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内部斗争上：揭发国家的敌人受到鼓励；每年官僚们都会收到将近 100 万份举报揭发个人的材料。这为寻找替罪羊撒下大网，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是主要目标：勃鲁姆，达拉第，雷诺和其他人，他们在利尧姆的一个政治法庭上接受审判，但最终不了了之，没有做出判决；其他被右派和极右[267]派在 30 年代就进行揭发的团体也受到打击。共产党人在此之外；共济会也如此。共济会于 1940 年解散，会员被从教师和官员等岗位上开除。犹太人同样如此：从 1940 年 10 月起拥有特殊身份，维希政权对他们进行最粗暴的监视。

通过这一系列清洗措施，维希政府希望恢复到以前传统的父权和专制的价值观上。罢工和工会组织都遭禁止。政府则建立了一些包括工人和雇主代表的工联主义团体，以便平衡劳工和资本的力量。然而这些组织更倾向于维护雇主而不是员工的利益。天主教会也被贝当政府引入决策班子中，那些高级教士对自己能够参与政府管理感到受宠若惊。他们惊呼出现



维希政权为“青年工地”进行宣传的海报。这是一种新的国家义务劳动形式。在南方，20岁的青年都要参加为期8个月的劳动，通常进行植树和环境保护等工作。在海报中，维希青年组织成员的后面是高卢武士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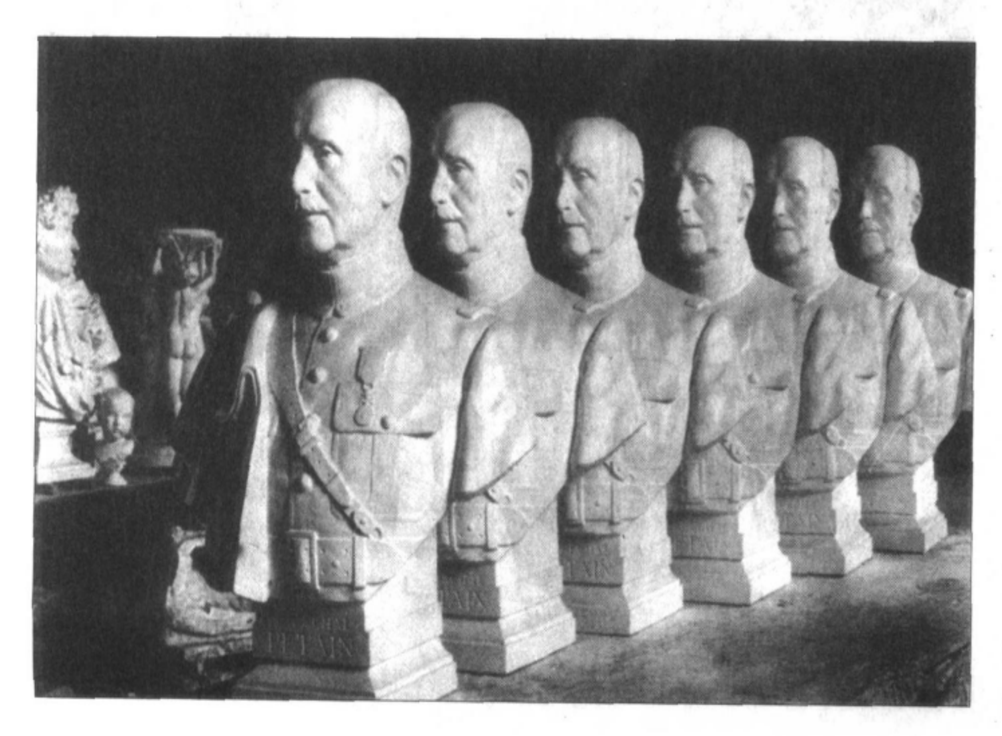
了“贝当奇迹”，把贝当称为“神赐元帅”。宗教力量在教育领域也取得了一时的显赫地位。宗教内容被强制性地灌输到国立学校学生的头脑中。同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被取消。尽管贝当政府一直与一个老兵团体有联系，但它与下层的沟通渠道也仅此而已。贝当政府甚至从没有举行过全民公决来为自己的政治体系进行授权。在国家部门中，来自上面的任命完全取代了选举。如果说维希政权有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也只是各种右派势力之间的争斗。例如活跃在北部地区的前共产党人多里奥，比起贝当来，更加倾向于与德国人合作；他甚至在东部前线组织部分法国人与德军一起战斗。结果维希政权内部充斥着类似波旁王朝凡尔赛宫的宫廷政治：谁能够使贝当元帅听着顺耳，或者元帅对谁笑，都会成为考虑政治前途的关键因素。贝当的总理赖伐尔把贝当与路易十四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是一个 269 更加神秘的领导人。贝当在他的敕令中使用王家惯用的“我们”的称呼，并且宣传自己代表的维希价值观无处不在，尤其在年轻人中有影响。贝当政权培养青春崇拜：“做纯洁的人。”“青年运动中的少年要进行指导。”“做男子汉，做法国人……”将军的政权还规定了严格的反同性恋法律，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第五共和国。



268 法国在1940年的失败导致领土损失，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再次被并入德国东部，阿尔卑斯山的领土归意大利，还要加上野蛮的权力再分配。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为“禁区”，由德国人占领或直接进行管理。维希政府的所谓“独立”，在1942年也被德军的粗暴占领打破。但是，在所谓的“丛林地带”，武装抵抗一直在进行。

贝当的家庭伦理法规还暗示妇女应该谨守传统的妇道；在国家革命中，女人属于家庭，应该承担起生儿育女的神圣职责。“母亲创造家庭，”正如宣传口号所说，“家庭创造法兰西。”大家庭享有更多优惠，这是对1939年实行的家庭补助的补充；与此同时实行的是使离婚更加困难的法律程序。有关堕胎的法律也变得严酷起来，1943年一名鼓吹堕胎自由的女性被处死。在对女孩子的教育中，家庭生活成为坚定的取向。当然，这样严厉的政策也有其理性的一面，因为当时法国大量的成年男性被德国人监禁，女性则被强迫进入各行各业工作，这就需要采取措施维护家庭。然而，妇女的工作环境则充满了制度上的歧视。

回顾过去，贝当称他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把已被忘记的法国价值观重新输入人们的头脑中，而是通过这样的道德观建设来抵制纳粹的恐怖统治。然而，不管希特勒是否命令驻法国的行政长官们执行纳粹式“洗脑”政策，这一辩解都是可疑的。而且，贝当说自己的举动能“抵制”德国人的行为，实际上一点效果也没有。德国人确实有在法国实行纳粹政策的企图，那主要发生在1942年11月。当时德国人占据整个法国南部地区，而贝当的总理、老谋深算的赖伐尔，则极力迎合德国人，积极推动法国在纳粹欧洲的框架下实施“新秩序”。没有什么比贝当政府积极反犹政策更能说 [270] 明问题的了。因为法国有强大的民族传统，特别是从1789年以来，法国一直是世界犹太人解放的先驱，所以这难以不令人感到震惊。但是，1940年维希政府针对犹太人实行的特别政策，则完全是出于维希政府的自愿，没



1943年，贝当元帅的半身像从巴黎国家博物馆的生产车间下线，无疑要置于法国各个城市的市政厅。维希政权的特点是搞以贝当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有受到任何德国方面的压力。外国的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来到法国就是希望躲避希特勒的迫害——首先成为围捕的对象。1942年6月，1.2万名巴黎的犹太人，其中包括未成年的孩子，被集中起来，关进一座由运动场改造成的临时集中营；随后，他们面临被驱逐的命运。这些人还被迫在胸前别上一枚黄色大卫星标志，以示自己是犹太人。在反犹狂热中，总共有7.5万名犹太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法国本土的犹太人）遭到驱逐；而只有大约3%的人后来返回了法国，这其中没有一个是儿童。除此以外，同性恋者和吉普赛人也遭到厄运。

从1942年起，在纳粹的授意下，维希政权的压制手段后来又逐渐转向非犹太公民。1943年，贝当政府建立了由约瑟夫·达尔南领导的地方秘密警察机构，专门打击国内的反对力量。该组织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有系统地采取刑讯逼供手段拷问犯人。他们不乏受害者，因为对维希政权的敌对情绪在1942到1943年间迅速扩大。但另一方面，经过1940年的大劫难后，包括北方人在内的大多数法国人，也确实需要采取某种对占领军妥协的态度，以使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对这种合作，现在依然是非难评。对德积极的合作者包括布列吞人，佛兰德斯以及奥克西塔尼的 271 “国家主义者”。他们看到自己在更加地区化的“新秩序”中的作用。当然，完全积极合作者的数量可能相当少，也许仅仅大约有15万人。



1941年8月15日，在穆兰举行的“黑圣女游行”。参加游行的上层教士都高度支持维希政权，因为教会得到比第三共和国要好得多的待遇。穆兰主教正领着游行队伍前进。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另外两个维希特有的团体：青年组织和地方民俗组织。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纳粹合作的赌注变得越来越高；法国的经济完全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遭到德国人的盘剥。贝当的“防御之盾”对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无能为力。到 1943 年，德国攫取了法国的 40% 的工业产值和 15% 的农业产品。法国人生产的四分之一的肉制品和半数以上的新飞机、汽车和机械设备被运送到第三帝国。法国成为德国战争原料的最大供应者；并且位列俄国和波兰之后，成为纳粹德国人力资源的第三大提供者。维希政权的强迫劳动体系正式建立是在 1943 年，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在战争期间，上百万法国人被转移到德国做苦力，此外还有 160 万人参加了纳粹军队。



犹太人从 1942 年起佩戴的黄色大卫星。维希政权卑躬屈膝地接受了反犹主义的要求，这对疏远犹太人与他们的第二故乡法国的关系产生了长远影响。

这些要求对已经衰退的法国经济造成极大破坏，法国的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同时，由于进口产品稀少而且昂贵，维希政府不得不采取配给制和工资控制。即便如此，通货膨胀成为普遍现象，物价在 1940 到 1944 年之间翻了一倍。虽然有黑市作为调剂，但法国人由于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仍然遭受了严重破坏。除了意大利以外，法国人的营养水平与欧洲其他被占领区相比是最低的。到 1943 年，法国的配给制只能提供每人每天 1200 卡路里的热量，这是造成营养不良的药方。因此，维希法国期间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缩短了 8 年丝毫不令人奇怪。

由于维希法国与占领军紧密合作，结果带来的是占领军对一个发达国家如此彻底的剥夺。维希政权实际上书写着自己的死亡证明。1940 年 10 月，贝当与希特勒在蒙托瓦的握手就是高昂代价的象征。贝当采取了被动的、防御式的合作，把法国的军事、警察、通讯和司法部门都交给占领军支配。而维希政府采取的压迫政策又导致反对派日益增多，它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除了受迫害的犹太人、共济会成员以及共产党人以外，反对派中又增加了一些从西班牙内战战场返回的政治难民，以及 1943 年以后希望逃避在德国强迫劳动的大量年轻人，更不必提所有那些认为维希政府的政策给法国社会造成危害的人们了。

在巴黎建立的“犹太人研究所”是个专门从事犹太人研究的“科学”研究机构，旨在研究犹太人在法国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这份海报中，犹太人被描述成癌症病人，吞噬着国家生活的每个方面。



法国义务劳动机构出台的强制劳动草案，又加大了抵抗运动的规模，而其发展原已放慢。在最初几年，维希政府遇到的反对力量还只是零星、小规模和个人性质的。这种无组织性主要归因于那些反对者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那些在塞汶山区的人正沿着路易十四时期他们的卡米扎尔祖先的模糊足迹前进；但这是个例外。从广义上说，没有记载提到过类似 1789 年到 1871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无套裤汉和他们的后代那样的革命派式的抵抗运动。抵抗者只是被迫临时发难，然后，在牢狱和错误中接受教训。包括各类政治层面介入的抵抗运动都是新鲜事物。在南部，维希地区 273 的传统精英与当局合作，所以抵抗者通常是左派；北方的抵抗运动更具有广泛的政治特色。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象征意义。“那天晚上当第一批



武器到达时，”一位勃艮第的农民后来回忆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窖里。尽[273]管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但还是唱起了《国际歌》。而这只是因为贝当唱《马赛曲》，所以我们就唱《国际歌》。”

1941年，希特勒对苏联发动进攻后，共产党游击队纷纷返回老家，他们以高度的热情进行工作，并且训练出更多的民兵。战后，共产党宣称自己的党有7.5万名“挨过枪子儿”的党员。尽管大多数的民兵组织还只是地方武装，只在一两个地区活动，但是共产党的“民族阵线”已经成为跨越边界，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国家范围的网络。从1942年到1943年期间，抵抗力量变得越发强大，德国则更加收紧了它对法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抵抗力量除了进行破坏活动外，还为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提供掩护，护送他们返回英国；此外，抵抗力量还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武装行动也更加普遍，而从林战，即游击队、难民和逃亡者在中央高地和阿尔卑斯山上丛林地带建立营地，在斗争中越来越重要。1943年，抵抗战士的人数大约是2万人；但到了194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4万，而到了夏天，抵抗力量人数已经猛增到了6位数。

抵抗运动在维希法国从来没有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多只有大约1%的人积极投入到抵抗运动中。抵抗力量还发行了自己的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战斗报》与《解放报》，发行量达到200万；读者则可能远远多于这个数目。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节目成为日益普遍的秘密行动，结果培养出了大量“扶手椅（后方）抵抗者”（R. Kedward语）。然而，要想抵抗运动真正有效，还需要获得全体国民的积极支持；抵抗战士要能够如鱼得水般地自由进行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紧闭自己的嘴，不透露抵抗力量的行踪就是对抵抗力量的最好支持。举报地下活动的告密仍然是很常见的现象，这表明法国依然分裂，国内仍然具有一些内战的特征。然而战争在发展，日益明显的默默支持正在向有利于抵抗运动的方向发展。

尽管获得日益增长的大量支持，抵抗力量的组织工作所缺乏的是总指挥。当时总指挥来自于海外，通过年轻的前任战争部长夏尔·戴高乐的班子来指挥。他在1940年5月—6月法国溃败的时候逃到英国，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中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他可能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在此阶段，他鲜有其他对他有利的东西。尽管丘吉尔把他看做是反对维希政权的法国武装抵抗运动领导人，但在法国国内他并不为人所知，也很少有法国外侨加入他的事业。他[274]最初尝试由他的“自由法国”运动在法国海外殖民地战胜法国军队，但最后失败了。1941年加入战争的美国似乎更乐于支持来自维希法国内部的反对力量，而不是这个性格暴躁而高傲的外来者；他们认为戴高乐有独裁野心。温斯顿·丘吉尔发表著名的授予戴高乐“洛林十字勋章”——戴高乐代

（第268页）在上卢瓦尔省一间偏僻的农舍前，“马基”的青年小组正在接受武器训练，学习使用盟国空投的步枪。

表“自由法国”予以接受——的讲话时说，这是在战争期间“分量最重”的一枚勋章。1942年，当盟国登陆北非法国殖民地时，甚至忽略了通知戴高乐。

戴高乐有能力使自己对盟军有用。他首先可以利用军事优势。尽管戴高乐在夺取维希法国管辖下的塞内加尔的战斗中失败，但是到1942年，几乎所有剩余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除外）都落入戴高乐手中。当阿尔及利亚的维希总督翻转自己的外衣走到盟军这边投降时，戴高乐体现出了他的优势：法国武装力量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都加入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戴高乐还小心地选择与第三共和国的少数政治家合作，如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樊尚·奥里欧尔等。就在“D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日的前三天，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自己为法国临时政府。

如果戴高乐和“自由法国”最终证明他们是对美英盟军有帮助的军事盟友，那么他们与法国内部抵抗力量之间的紧密接触就对他们更加有利。1942年1月，戴高乐的代表、前省长让·穆兰跳伞进入法国境内，他的特别任务就是与抵抗组织网络建立联系。在这次使命中，他克服了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分歧，到1943年5月，创立了一个统一领导组织。穆兰担任包括了所有较大组织的抵抗力量的国民大会主席。但不久以后，他不幸被捕，并死于被称为“里昂屠夫”的克劳斯·巴尔比的酷刑之下。穆兰的继任者是乔治·皮杜尔，他继续领导着全国抵抗委员会。这时该组织已经不仅是一个军事组织，而成为权力过渡组织；工会和各个政治党派在其中都有代表。政治协作是一个微妙的任务。戴高乐本人具有一些老式贵族的气质，这与抵抗组织的风格相去甚远，而且他的部下很多都来自战前的右翼。抵抗委员会号召在推翻维希政权后要实行“真实的经济民主”，然而，戴高乐被接纳进大会则成为一个里程碑。

戴高乐到1944年已经使自己成为不容忽略的力量。他为“自由法国”部队没能在盟军的1944年6月6日“D日”登陆战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感到悲伤和难过，尽管法国部队当时也参加了诺曼底战役。他的国内抵抗力量也被编入了作战序列中。在巴黎，抵抗力量在8月19日和20日发动起义，这使得德军不得不从前线调回部队进行镇压。盟军方面最终放弃施[275]压，同意法国军队在盟军指挥官勒克莱尔将军领导下参与8月25日解放巴黎的行动。那一天，法美盟军一道发动进攻，大量的法军部队在德·拉特·德·塔西尼的率领下，在普罗旺斯登陆，并推进到莱茵山谷，解放沿途的城市。与此同时，抵抗力量与盟军部队紧密合作，在不断推进的前线后面展开军事清扫行动。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这一传统的表演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看起来



已经把引起人们回忆的所有第三共和国的象征符号都一扫而光了。戴高乐继续召唤一个“靠它的人民来解放，靠法国盟军来帮助”的城市。也许这是一个不礼貌的假设，即别人可能认为这是分量不同的两个因素，也是不相关的。这就是通过将法国人民和法国军队置于推翻维希政权的核心，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神话第四共和国。戴高乐使法国社会以重获新生的心态进入战后时代。然而，这种心态很快就受到痛苦的检验。

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凯巴抓拍到了巴黎人喜庆的笑脸，因为1944年8月25日巴黎终于被戴高乐和盟军解放了。

第十章　战后的法国：扩张及其他

[276] “除了认真投入地去工作，为了生存去奋斗，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探望朋友并且热切地期待着自由之外，别无所求。”这是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的一些想法。他在巴黎度过了战争岁月，因而他或许比那些潜心于公开的合作或者是准军事抵抗运动的少数好战分子，更加代表了法国的大多数人民。

然而法国在自身解放过程中的参与所带来的对未来的希望，很快就消失了。自由比预期的代价要高。建立一个新的第四共和国的过程是痛苦的，导致了分裂，并且形成了主要战胜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冷战大背景的一部分。最终的战利品也是微乎其微的。第四共和国很快就习惯了议会之间的一系列争论。这勾起了人们对第三共和国的僵局与妥协的回忆。政治也被剧烈的殖民冲突日益毒化，先是印度支那（1954 年），后来是阿尔及利亚（1962 年）。1958 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僵局导致了宪法危机，第四共和国被第五共和国所取代。重新振作的戴高乐将军统治着第五共和国，并且出任了第一任总统。

有人认为第五共和国是如此严格地按照戴高乐将军的要求设计，以至于它无法在戴高乐离开后继续存在。这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尽管政治上不可分类的 1968 年“五月事件”敲响的警钟差点儿导致第五共和国的覆灭，但是这个政权还是在戴高乐离开后存活了下来（1969 年）。然而，中间派右翼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并不怎么感激戴高乐将军。政体的稳定主要归功于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中期的那一段空前的经济增长时期。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法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观点看法上的一些主要改变。

反责和稳定

“平静是根本不可能的，”西蒙·德·博瓦尔这样描述战后的情形，他是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的老朋友。“战争结束了，但它却仍然滞留在我们的生活中，像一具多余的尸体，在地球上根本找不到地方去埋葬它。”1944 年秋天和 1945 年春天的事件确实令人振奋：巴黎和一系列

277

圣－热尔曼－德－普雷的存在主义者的咖啡馆

“圣－热尔曼－德－普雷区成了美国大学的校园”，1948年夏天美国居民珍妮特·弗拉内轻蔑地写道：

> 弗洛尔咖啡馆是为那些穿着不合体的土蓝布裤子的可爱姑娘和她们留着艺术胡子的美国中西部男友服务的杂货铺。旅游知识分子的成员光顾巴克街的“国王桥咖啡馆”。这里过去坐满了法国存在主义分子，现在只有他们自己，经常讨论存在主义。



“两个怪人”咖啡馆，在圣－热尔曼区中心。

在法国解放和马歇尔计划后，大群美国人的到来将许多左岸咖啡馆改造成了旅游热点，这些左岸咖啡馆曾经长期支持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两个怪人”咖啡馆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中心，利普餐厅则是政治倾向更浓的人的聚集地。共产党团体有另外的场所，画家和雕塑家也在其他地方，如此等等。咖啡馆社会还连着一个包括夜总会、爵士乐场、饭馆、艺术画廊和小剧院的热闹的大杂烩，并一度成为这个多样化的知识阶层的表达手段和休闲方式。1944年以前，这些公共场所提供的是热情和陪伴。“占领结束前，1943年到1944年的冬天，每个人都到这里取暖。”一位作者后来回忆起弗洛尔咖啡馆，“二楼给人的印象是教室。萨特坐在一张小桌旁，正在写《自由之路》；西蒙·德·博瓦尔在另一张桌旁，写的是《所有人总是要死的》……靠着的是阿尔蒂尔·阿达莫夫，也在写，无疑是他的一个剧本……”



雅克·塞奈普的漫画。当西蒙·德·博瓦尔在桌旁写作时，让－保罗·萨特来到国王桥咖啡馆要一杯名为存在主义的鸡尾酒。他可以选择柏拉图－饮料酒、尼采－起泡酒和斯宾诺莎－杜松子酒调制的鸡尾酒。

让－保罗·萨特成为这场演出的主角，美国大学生往往要问服务员他们是否能坐在他常坐的椅子上。他和他的终身伴侣、女权主义创立者西蒙·德·博瓦尔共同发展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衍生而来的。存在主义者试图将人类责任的原则和行动建立在人类生存的原始物质基础上，而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之上。这一运动具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拒绝简单的答案，符合当时人们的心态。

咖啡馆的场景对存在主义者扬名有所裨益。萨特是自伏尔泰以来最著名的哲学家。但大众性的成功同样使他们看起来不易接近。起初，萨特和德·博瓦尔曾到过国王桥旅馆的地下室咖啡馆，他们在酒桶上写作。“萨特？”弗洛尔咖啡馆的老板后来说，“他是我最差劲的顾客。他好几个小时趴在一张纸上乱涂，面前只有一杯从早到晚都不续添的饮料。”



1944 年晚期，女法奸被剃光头在夏尔特尔游街。欢呼戴高乐将军通过的欢乐人群在三色旗下很快转为仇恨和敌意的人群。幸运的是对曾经与德国军队交往过的妇女的攻击并未持续很久。

276 省市的解放；国内抵抗力量和正规部队的合并；拉特尔·德·塔西尼的力量对德国心脏地带的渗入；欧洲对胜利的庆祝。但是这个时期轻松的心情很快就被更多沉重的事件打断了：1945 年 1 月俄国人抵达奥斯维茨，5 月 278 法国流亡者返回，两者相继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纳粹暴行不仅让人们了解到了大屠杀的惨无人道，也激起了人们的反法西斯情绪，这种情绪将持续几十年。1945 年 8 月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是用以结束对日战争的，但同时也给战争年代中许多人自认为为之奋斗的人道主义价值打上一个问号。1949 年以后，人们通过一些报告开始彻底觉醒：苏联其实也有劳工营和集中营，并且同样地纵容暴行。

看起来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对与维希政府相勾结的人和黑市商人的恶意攻击潮流，在因维希政府的垮台和德国的撤退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中积聚了一些势力。即使像爱德华·赫里欧这样的温和者，在看待通过大屠杀洗除国家有害要素这个问题上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疑虑。其实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坏。传言草率处决了 10 万人多少有些夸张，实际上是少于 1 万人的。对那些最主要人物的审判，如赖伐尔的死刑和贝当的终身监

禁，只不过是一座较大冰山的一角而已。大约三四万人因通敌受到审讯，其中许多人在几年内就被释放了。在一些野蛮的治安维持运动中，那些据称加入过“横向合作”的妓女和其他一些妇女，被剥去衣服，剃光了头。

尽管这样的行为腐蚀了自由的新鲜味道，这次暴乱的规模还是比法国 279 过去从宗教战争到巴黎公社所经历的所有其他暴乱的规模要小。在一开始出现力量真空的时候，特别是中期。政府采取了大量的预防性行为：市民从 1944 年 10 月起被解除了武装；并且有 10 万多人受到了保护性的监管。帮助建立新的地方行政部门的戴高乐的代表们，致力于治愈而不是加深这些仇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如果出现了无法控制的革命热情，将使得政府被共产党接管。因此在维希政府和解放管理组织之间存在着许多的连续性。虽然 1.1 万人因为通敌被解雇，大多数官僚机构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戴高乐将军作为一个“人们所赞成的独裁者”，运作一个具有全国统一性的政府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政府吸纳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此外还包括了一些第三共和国的显要人物。重建政府以及进行根本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呼声，反映了人民与维希政府彻底决裂的要求；同时也为结束这种相互揭丑的行为，并且鼓励一个新的开始，提供了好借口。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法国屈服于纳粹的优先权长达四年，这使法国经济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事实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进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是那些期待着战争结束以后人们的生活境况会有所改善的人觉醒的另外一个原因。仅有一半的铁路网络仍在运行中，50 万栋建筑被毁坏，而且原材料的供给严重不足。战争的结果之一是造成了许多东西短缺，面包配给制度一直持续到 1949 年，而且通货膨胀猖獗。政府利用雇主的愧疚心情（这些雇主中许多人曾经通过敌），把大多数经济成分（石油和电力，许多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法国航空公司，雷诺汽车，等等）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与上述情形相伴随的是国家在福利上的积极措施——特别是在车间、工会内，开始有了给人印象深刻的社会保险系统的创造。妇女第一次拥有了选举的权利。

然而，新宪法的确立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1945 年 10 月的公民投票表明 96% 的选民反对继续第三共和国的统治。但是要找到一个与第三共和国有明显区别的政权来取代它，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选举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前景。旧的激进派和右翼政党被大批杀害；现在全国最大的政党是共产党，他们作为 7.5 万名枪手在战时彻底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与社会党、一个新的激进的天主教组织以及由乔治·皮杜尔领导的人民共和党共享社会关注。戴高乐的领导地位凌驾于这些组织之上，但他对于建立一个更加总统化的宪法的呼吁使得那些主要的政治组织采取了对立的态度。戴高乐在 1946 年 1 月辞职——这是战术上的转移，然而却使他十多年

处于政治上的在野状态。旨在赢得 1946 年 5 月全民投票多数的第一个宪法草案的失败，导致了一个经过修正的宪法条例的通过，但这个宪法条例几乎调动不起人民的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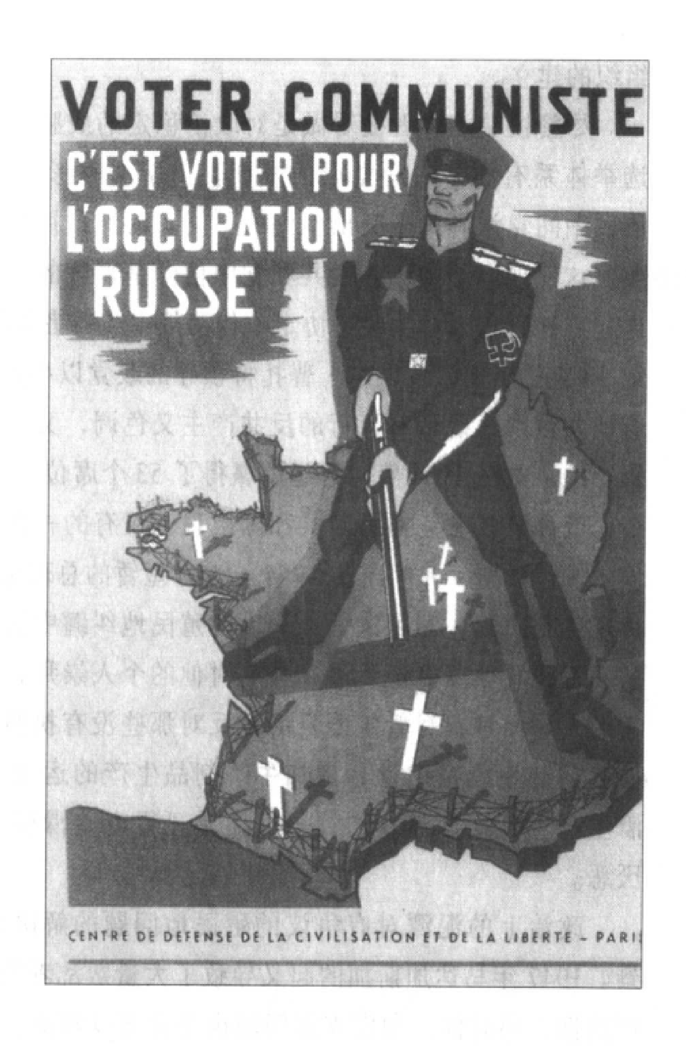
第四共和国宪法因与第三共和国类似而宣告终结。到 1958 年的 12 年中，有不止 12 个总理；对政权的控制在 3 个主要党派共产党人（法国共产280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的不同力量集团之间移来移去。1947 年 5 月，社会党总理保罗·拉马迪埃从政府多数派中驱逐共产党的决定结束了“三党”这个短语的历史，并且标志着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在政治上的边缘化，而它直到 34 年后才又重新进入政府。在冷战状态的影响下，法国共产党成了对新的政治安排的毫不妥协的批评者，这使得法国稳固地处于美国阵营之中。解放后的团结精神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迅速崩溃了。

非殖民化和第五共和国的出现

政治上主要是处于僵局，各党派围绕着中间党派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感到过左过右都会带来威胁。对右派来说，戴高乐将军就像一个批判议会体系的波拿巴主义分子(指主张政治独裁)。他反对关于宪法的第二次全民投票；然后在 1947 年 3 月，他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他取得了很大进展，在 1947 年的市政选举中法兰西人民联盟获得了 40% 的选票。但是他领导的大众集会以及他那命运决断者般的形象令许多



1947 年大选前在麦克风前的莫里斯·多列士。他自 1930 年起到 1964 年去世为止，一直是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在战争时期到莫斯科，但回国后在 1945 年—1947 年的三派联合政府中担任部长。他的影响力使得法国共产党成为西方共产党阵营中最强硬的一个。



1950年大选时"捍卫自由和文明中心"贴出的海报。三派联合政府的终结和冷战的出现，给法国政治带来了强烈的反共浪潮。

人感到害怕。最后，戴高乐放弃了，在1952年9月又一次退出了政坛。作家和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安德瑞·马尔罗后来回忆到："戴高乐将军发动我们全速向（意大利中部的）卢比肯河前进，然后告诉我们扔掉手中的鱼竿。"

"尽管共产党人加入政府，但其他住在政府的压力之下仍然岌岌可危"。1947年，共产党人最终因支持雷诺汽车公司反对政府削减工资的罢工斗争而被驱逐出政府。冷战使得人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恐惧，认为它是残 281 酷的政党渗入者，而莫里斯·多列士（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经在莫斯科度过了战争岁月）以及共产党总工会联盟对亲斯大林路线的信奉多少给了这种看法一些可信度。事实上，与斯大林相比，法国共产党对维持工人阶级的支持更感兴趣，而不是致力于夺取权力，并且他们完全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然而1947年，当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世界范围内鼓吹遏制共产主义时，法国的政治组织被迫在冷战的两个参战者之中作出一个选择。法国投向美国阵营的决定激起了法国共产党了无止境的敌意，但这个决定却使法国从美国的马歇尔援助中获得了大量好处，这对于恢复法国经济是至关紧要的。1949年4月，法国也参与了军事防卫联盟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的建立。

尽管极端主义者被看做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然而按比例选举代表的选举体系有利于中间党派的发展。出于选举考虑，也为了强调他们的自治，中间党派倾向于突出他们的不同。因此，社会党人保留了反宗教的一282面，这使他们不同于人民共和党中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党人。激进分子东山再起，并且在大量的政府协定中作为战术支持者而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皮埃尔·普扎特领导的政党以小店主心态为基础，攻击政府征收重税，既带有流行的反共产主义色调，又带有残余的反犹太主义色彩。这个党在1956年的选举中赢得了53个席位。

或许，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出现的仅有的一次政治生活新气象便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1954年5月短暂的总理生涯。赢得大量支持的经济现代化规划，和把法国从严重的殖民地纠缠中解脱出来的坚定努力相伴随。围绕着他的名声发展起来的对他的个人崇拜，使得他成为一个易受伤害的人。而且，尽管主要目的是反对那些没有执照的非法酿酒者，皮埃尔倡导的减少酒精中毒、增加牛奶制品生产的运动，在法国这样一个葡萄酒生产和葡萄酒消费的社会里还是显得有些滑稽。这使他遭到了人民的厌恶。

政治上的泥潭对有争议的殖民地问题的解决来说，是一个恶劣的背景。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起义导致了大量叛乱者的死亡，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候，印度支那问题也变得难以解决。在越南，民族主义者由胡志明领导，在日本撤退以后，于1945年8月建立了临时政府。然而，法国和越盟合作的可能性却由于殖民地当地的行政官玩弄越盟和日本占领军的举动而遭到挫败。在随后的敌对状态中，法国使用了通过各种秘密途径从欧洲走私而来的前纳粹德国士兵。这在法国引起了震惊，就好像法国对越南人施加了纳粹1940年到1944年曾经施加于法国人身上的各种痛苦。1954年，在越南将军武元甲（后来反对美国越南战争中的战略家）的领导下，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遭到了重大的军事失败。这使得印度支那问题不再仅仅是纯理论问题。

由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巧妙引导的谈判，帮助法国脱离了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这比无休止的拖延所造成的痛苦要小得多。孟戴斯还迎合了突尼斯的独立；并且开始与摩洛哥对话，这使得它在1956年独立。而阿尔及利亚(北非国家)依然是一个较大也较为困难的问题。自从1830年法国人的进入起，欧洲人口占了阿尔及利亚900万总人口中的100万。从1954年起，欧洲人少数派一直坚持抵制由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协作暴力的潮流。在巴黎，所有的主要政治组织，都在阿尔及利亚危机问题上产生了内部分裂；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内阁变化，又使发展一种持续的政治战略几

乎成为不可能。军事活动和两党暴力填补了真空。一场野蛮肮脏的战争形成了，双方都使用暴行。炸弹在法国本土引爆；而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军队开始使用刑罚作为反对间谍的标准武器。知识分子揭露了这种对人权的 283 践踏，但是许多法国人和欧洲的殖民者认为此乃权宜之计，而接受了这种情况。军队则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取得胜利。一些职业军人对于奠边府战役感到耻辱，因而希望这一次能显示法国军队的实力。

政府试图强迫殖民者进行的抚慰性改革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成功，而与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因为殖民者的不妥协态度而搁浅。在埃及，法国、英



一幅印支战争中常见场面的照片。先在印度支那，后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肮脏，指挥不力，考虑不周，反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导致第四共和国的灭亡。

国和以色列军队反对陆军上校纳赛尔的斗争还有其他的原因，但在法国人眼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纳赛尔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叛军提供了物质援助。斗争最后失败了，这让人很沮丧，但是“苏伊士危机”更强化了法国人完成一些必须做的事情的决心。战争不仅导致了法国政治上的分裂，还威胁到了法国的财政和经济稳定。然而，秘密谈判在 1958 年 5 月 13 日被殖民者发动的政变突然中断。右翼殖民者夺取了权力的控制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组织发现自己除了认可他们的行为之外无能



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中出现了炸弹爆炸和街垒战。包括广泛和系统化刑讯在内的残酷镇压政策都不能够控制暴动。

为力。马絮将军主持了殖民者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他对 1793 年 4 月的提及使得共和国“惟一且不可分割”这个口号更具爱国性。在阿尔及利亚，萨朗将军高声喊出“戴高乐将军万岁!”，戴高乐本人也宣称他乐意重返政 284 坛。叛军的将领派遣大批伞兵占领了科西嘉岛（法国东南部省名）；同时，在法国本土，不安的巴黎人恐惧地看着天空，随时担心伞兵会从天而降。

在这种内战即将来临的氛围下，主要的政治组织又明显处于僵局状态，政治组织中有自主权的人便开始浑水摸鱼。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满怀热情地认为戴高乐就是他们的救星。戴高乐那种命运决断者般的姿态看起来也找到了依托。他远离那些将军们，显而易见是不希望领导一个政变，因为这会使他对军队负有义务。他过去对德国的抵抗也确保了他能够同时得到左翼以及右翼的支持。因此他和总统科蒂密切协作，以维持门面上的合法性。1958 年 6 月 1 日，经过磨炼的国民议会同意戴高乐重新回到政界，并且给予了他六个月的紧急处分权。起草一部新宪法的决议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程序。第四共和国这种在宪法问题上的无异于自杀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戴高乐因 12 年在野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当戴高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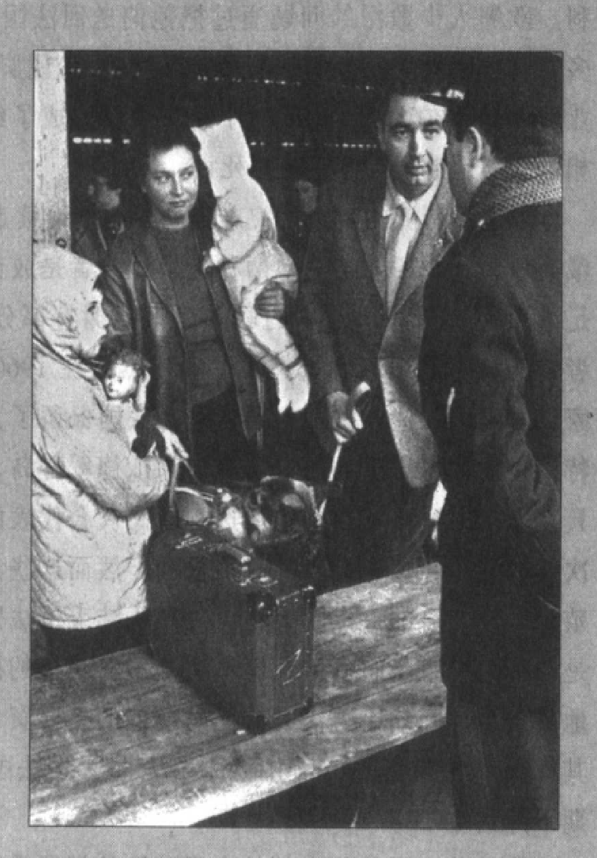
在6月1日晚上返回到巴黎的旅馆时，他对旅馆的门童说："阿尔贝，我赢了。"

然而，胜利也同时带来了责任。戴高乐起草的新宪法是严格按着他自己的尺度来制订的。许多左翼分子怀疑在这样的规定下他们是否能获得权力。权力的中心毫不含糊地从国民议会转移到了总统那儿：延续了戴高乐自己在1946年就倡导的路线。全民投票的实践也在不断拓展。基本的概念 285 框架结构是总统应该凌驾于混战之上，并且应该抵抗和平衡各利益集团，比如政党、工会等。新体系还给总统独立于议会决定对外政策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阿尔及利亚危机的解决主要是基于新总统的个人技巧。一开始的时候他和欧洲人少数派站在一起。在一次参观阿尔及尔的时候，他受到了欧洲

"黑脚杆"

法国在北非的非殖民化运动造成了大批人口流动，这可与更为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欧的移民潮相提并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约有130万欧洲人从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重归故国"。他们大多数是从阿尔及利亚返回，反映出法国在那里占领的时间更长；在1961年至1963年间，因阿尔及利亚战争即将结束，约有三分之二的"难民"留了下来。



形容归国殖民者的名称"黑脚杆"出处不详。最初他们被称为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最初被称为"当地人"，后来被称为"穆斯林"；但这种称呼在20世纪50年代也变得含义模糊。1955年以后他们接受了将"黑脚杆"作为对他们的称呼。尽管在全世界都有"黑脚杆"的聚居地，但大多数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还是居住在法国，他们得到法国政府的补偿。尽管他们认为得到的远少于他们应得到的，"黑脚杆"看起来并没有将他们的苦涩心情长久地带到其原籍国，而是满怀热情地创造新生活。大批"归国者"集中在波尔多－里昂－线以南的城市中。这批人年轻且相当有活力，使得这些地区人口组成年轻化并提高了出生率，也促进了当地经济。"黑脚杆"的涌入在原住民中激起的敌意也为时不长。这突现出经济环境在帮助移民团体的融入上的重要性——当时经济正出现腾飞。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的阿拉伯同胞就没有那么幸运。

人少数派的热情欢迎，他说道："我理解你们。"这是一个谜似的短语，它的模棱两可只有在最后一刻才能明了。他很快意识到对于起义的任何军事解决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多数政治解决的提议要价太高。把阿尔及利亚纳入法国，最终将冒这样一个风险：在法国国民议会中有可能出现穆斯林占多数的情况，因为阿尔及利亚出生率很高。另一方面，保留欧洲人少数派的权力，形成一个法国式的阿尔及利亚的解决方案，则意味着战争将286继续，并造成无法接受的巨大损失。确定没有其他选择后，戴高乐果断地行动起来。1959年9月，他宣布乐于接受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并且开始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结果在1962年签订了《埃维昂协定》，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

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导致了欧洲殖民者的对抗性反应。从1961年开始，他们联合法国有叛意的军官（例如萨朗）、右翼分子和不满的政治家（例如皮杜尔），成立了"秘密军组织"。该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进行恐怖袭击，包括针对戴高乐本人的一系列暗杀；此外还有1961年在阿尔及利亚由高级军官策动的政变。然而，戴高乐最后获得了胜利。欧洲人少数派的问题通过把他们送回法国首都而得到了"解决"。80多万名欧洲人——他们被称为法国移民（"黑脚杆"）——离开了阿尔及利亚，大多数在法国南部安置下来。战争造成了约两万名法国人死亡，与此相对的却是数十万穆斯林的死亡。

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大灾难推动了法国继续走非殖民化道路。1958年，戴高乐给予中西非殖民地两种选择：或者是放弃后续援助获得独立，或者是继续保持与法国本土的联系但只能拥有部分的自治。几内亚选择了前者，而其他的国家则选择了后者。然而在1960年，为了包含完全独立国家，协定的一些条款发生了变动，法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领土：海外省，特别是加勒比海上的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以及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具有完全的法国国籍，包括选举国民议会代表的权利；少数海外领地居于次要的地位，拥有较少的政治权利。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之一的一点附属物。戴高乐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的这一章节，而且是明确地结束了它。殖民地从法国本土获得的援助迅速减少，法国和殖民地的贸易也在缩小，因为法国发现他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其外部。20世纪50年代后期，第三世界占法国贸易的1/5，到70年代后期下降到1/20。

第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由于殖民地问题受到无止境的困扰，他们的行动范围也因黑暗的冷战岁月和对美国援助的依赖而受到了限制。但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能够去探求一种有计划的伟大政策。他对于欧洲的整合过程加以限制，例如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他使法国退出了北

约，发展了独立的核威慑，并且寻找到了无须屈辱地寻求美国批准的外交联合方法。在“盎格鲁－撒克逊”，他以用拇指拨弄鼻子为乐——就像1967年他在北美的官方访问中因为“自由魁北克”而哭泣。这种独立路线增强了法国的不断膨胀的自信心，而它的经济也推动了强国联盟。

“辉煌的三十年”

法国在1945年到1974年这段时间内，取得了比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 287 一个时期都更加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它的记录，与它的任何一个国际竞争者相比都不逊色。比较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特别是在戴高乐主义者之中。前者被指责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僵局以及缺乏政治干劲而伤痕累累；而后者则由于实行了更加总统化的宪法，使更大程度上

1958年6月戴高乐将军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士兵和老百姓，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向他热情欢呼。这幅照片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中有大量同盟者的见证。



的连续性成为可能，自然也就提高了政策的效力。20世纪60年代所形成的政治上的稳定和内阁的连续性——这与前十年较为动荡的日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为有效实施社会和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加有益的框架结构。然而，这种对照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第四共和国时打下的基础对第五共和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所做出的贡献，比戴高乐主义者所愿意承认的要大；维希政府早期所制订的一些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思想对第五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助益，也比法国人所认可的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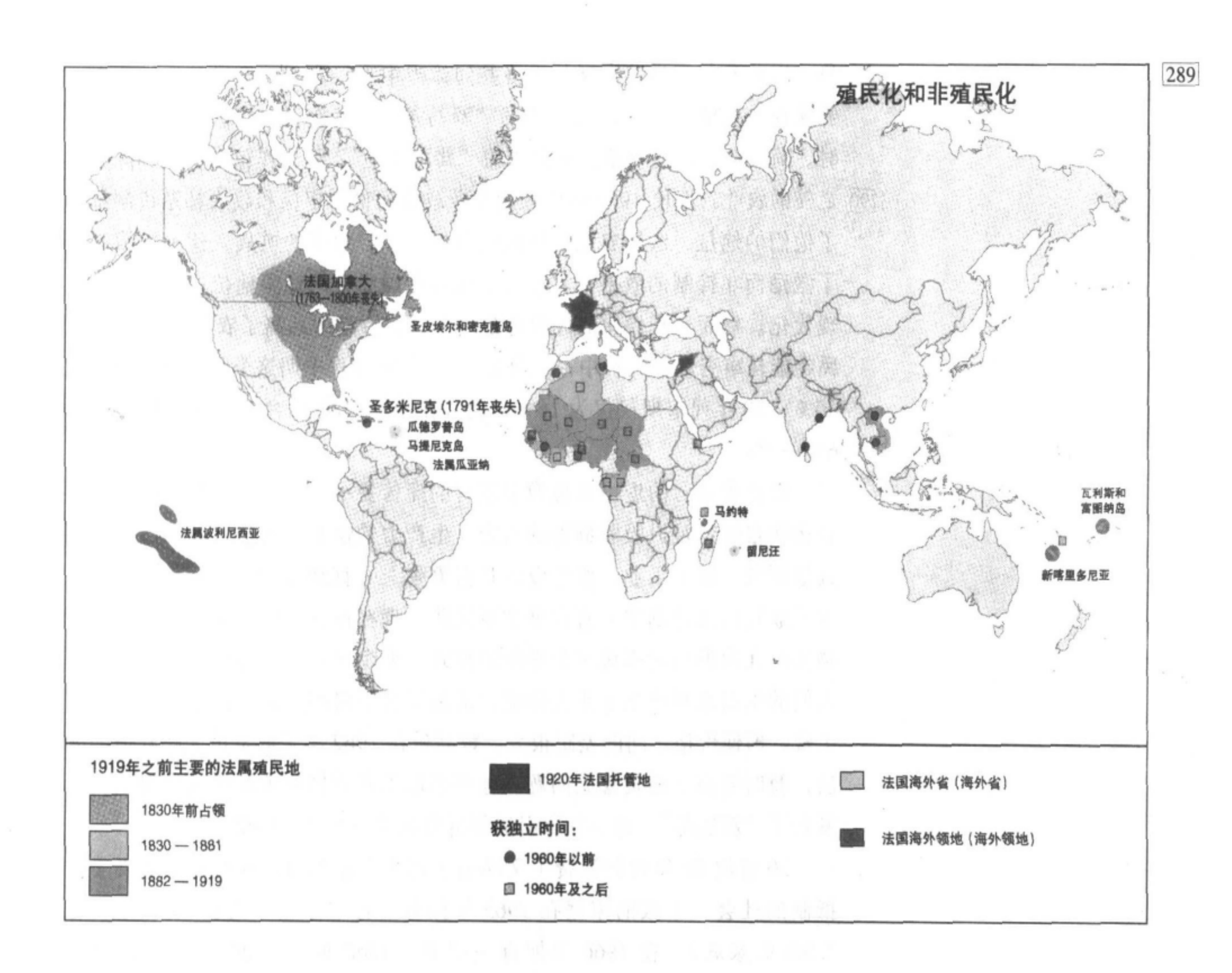
288

或许"辉煌三十年"时经济环境转变的最明显征兆——"辉煌的三十年"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结束——是国家人口统计情况的好转。法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这是18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46年法国人口总数是4030万人，到1958年末增长到差不多5000万人，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5600万人。医学的进步也开始对死亡率产生长远的影响：1946年男人的平均寿命是60岁，女人是65岁；到196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67岁和75岁；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则进一步增长到72岁和80岁。人口统计上的繁荣主要是因为战后出现了生育高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期的出生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比战前的标准要高50%，也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通过福利安排和大量的家庭补贴的形式开展的国家鼓励政策，对于生育高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生育高峰始于维希政府，早于国家福利政策的出台。人口出生率不断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健康的经济环境。

促进人口增长的其他主要因素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稍稍地降低了劳动力中妇女的比例，是外来移民填补了劳动力市场的这个空缺。维希时期，由于政府的压制，法国外来居民下降到大约150万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外来移民大量流入，这主要是由于有雇佣者的鼓励，因为他们需要劳动力的供给，特别是外来移民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因此显著增加了移民总量。到1975年，大概有400万外国移民，他们中差不多有一半人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特别是葡萄牙），还有50万人来自北非。外来移民占了劳动力总数的8%，产业工人的17%。

大量较为年轻的人口构成带动了需求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国家也在战后经济恢复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制订国家计划的决定，对大胆的国有化政策作了补充。这一计划是早期科涅克商人让·莫内的创造，他在1946年被戴高乐任命为该计划的第一委员。为了完成人们所认可的经济目标，政府、商界、工会被鼓励进行合作。1946年国家行政学院的成立，强调了在经济决策中对技术因素的优先考虑。"行政学院毕业生"成了传教士，他们的使命是在国家领导下恢复经济，这些人构成了一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要的技术智囊团。

289



第一个国家计划从1947年开始，持续到1952年，对被战争破坏的基础设施进行了重建，并且监督管理优先发展的工业的恢复情况。中心主要放在了生产上——煤炭、钢铁、水泥、拖拉机以及交通工具；消费者至今仍被放在最后。法国战后就得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大力援助，美国对法国特别慷慨，这有助于法国把这种发展进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到那个时候新结构出现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1951年与西德签订的煤钢联营条约，它是由莫内和人民共和党议员罗伯尔·舒曼提出的，它是欧洲共同体产生的第一步。

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1950年到1958年工业产量增长了80%，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以每年大于5%的增长率持续上升。农业也是这幅充满活力的画卷中一部分："拖拉机革命"有助于提高各种农场的生产力；拖拉机的数量从1946年到1958年增长了10倍。而这些成就达到新高度的一个标志就是法国准备让农业部门接受更大的国外竞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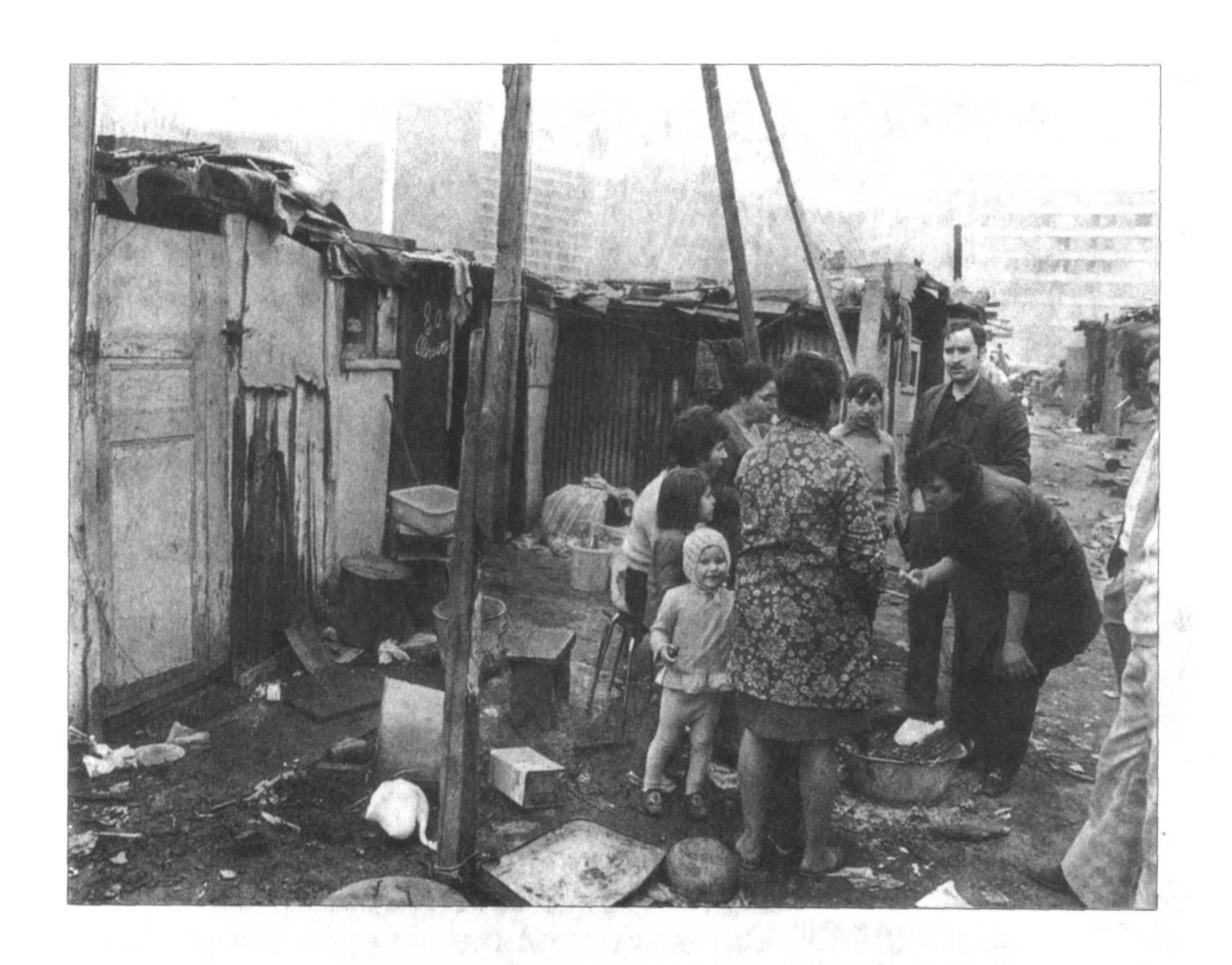
法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特别是在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建立起巨大的殖民帝国。在反对英国人的所谓"第二次百年战争"（1689年—1815年）失败后，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阿尔及利亚在1830年被殖民，但大部分法国殖民地是在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包括在印度支那耻辱的军事失败和在阿尔及利亚毁灭性的战争在内，被证明对法国来讲特别痛苦。

争，以此参与到迅速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当中去，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让农业躲藏在关税壁垒之后。1957年的“罗马条约”建立了由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组成的“共同市场”，将合作范围扩展到除工业290之外的农业。即使1962年的共同农业政策的价格担保和收入补贴机制维护了他们的地位，法国农民仍然面临着提高生产效率的挑战。这种挑战起到了激励而非抑制的效果，农民为了保持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进行了重组和现代化。然而，现代化的代价却是使大量的劳动力远离了农业。1946年农民在能从事劳动的人口中占三分之一，到5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下降到不足30%，60年代末期仅仅为16%，而且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不断下降到约占6%—7%。

农业劳动力的退出比想像中应有的痛苦要小一些，因为其他的经济成分运转很好，足以吸收额外的人力。生产力的恢复开始进入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除了工业，服务业也日益繁荣。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重工业在国家计划中一直占据主要优势，现在占主导的则是包括住房和食物生产在内的相对来说更为平衡的模式。那个时候，经济恢复已经开始对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后工会不得不努力运作来保持稳定的工资，即使价格之间的差距很大。戴高乐在1962年采取货币大幅贬值的方法，暂时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如发行了“新法郎”，每一百个旧法郎折合成为一个“新法郎”。

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主义冲击了这个在很长时间内对商业主义实行抵制的社会。半数的家庭在1965年拥有一台电冰箱（而在1959年仅有7.5%的家庭）；在1966年拥有一部车（1960年只有30%），一台电视（1962年是26%）；在1968年拥有一台洗衣机（1954年1/3的家庭甚至没有自来水）。在1958年到1973年间，电视的数量由100万台增长到1100万台，而汽车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从500万辆增长到1500万辆。消费主义的其他指标证明了改革的深度：1962年不足1/5的家庭拥有中央暖气系统，到1982年超过2/3的家庭拥有了它；超级市场的数量也从1960年的40个增长到1970年的1000个。1956年通过法律条款规定一年有3周支付工资的假期，到1963年增加到4周（最后到1982年是5周），这些措施鼓励了新休闲方式的出现。新型度假方式，如不妨害生态环境的“地中海俱乐部”开始成长；飞往周末度假地的习惯的增长，刺激了对建立第二个住处的追求。确实，第二住宅的数量从1954年的33万个增长到1975年的170万个。

新物质主义在知识界里掀起了浪潮，因而就有了对法国文化“共同修正”的严厉批判。多数的指责是针对美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化的法国成了这场激烈争论的主题。然而文化输入对法国的高雅文化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例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复兴的戏剧归功于大量以法国为根基的外国人，这里突出的是尤内斯库（罗马尼亚人）、贝克特（爱尔兰人）、阿达莫夫（俄罗斯人）、欧巴迪亚（巴拿马人），还有后来的彼得·布鲁克（英国人）。“荒诞派戏剧”对日常生活惯例提出了质疑；另一种艺术291形式也做了这种工作，如“新小说”的创作者阿兰·罗贝-格利耶特、米歇尔·比托尔和纳塔利·萨罗。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法国电影界出现的“新潮流”——特吕弗、高达尔、夏博罗和洛梅都是在1959年制作了他们的第一部正片——也是赞美而不是声讨外国文化。好莱坞的导演，例如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从新潮流的导演那里得到了称赞和尊敬。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人阶级住房的两种现状：一种是贫民窟，缺少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另一种是郊外的塔楼，毫无特点的破旧的塔楼住房。

在消费主义者的竞赛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取胜；可以说，既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大体上以勒阿弗尔到格勒诺布尔一线为界，西南部“没有”地区与东北部的“有”地区形成了对比。当面对竞争的时候许多小商业陷入了绝境——特别是纺织品，皮革和服装加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小店主也受到了重创，并且成为皮尔·普扎特所鼓吹的

292

两种“雪铁龙”

在20世纪50年代，新款的雪铁龙“伯爵夫人”的问世，激起了日常生活的符号学家、作家罗兰·巴尔特将现代轿车与中世纪教堂进行比较的灵感。“一个时代的出色创造，由无名艺术家充满激情来设计，适合作为纯神奇之物，由全体大众哪怕不是为了使用，只是为了形象而来消费。”他在接着描写值得信赖并令人爱抚的拉门和像许多圣品那样使人爱不释手的车内座位之前，写下以上的感触。



新款增强型雪铁龙“伯爵夫人”(左图)和雪铁龙“两马力”(上图)，各有自己的荣耀。

轿车在一个靠消费品显示身份的社会中是最高的身份象征。它停在路边，“像一个巨大的正在喘气的牡蛎，准备一口咬掉任何路过的行人的大腿”(M. Larkin语)。三十多年来，雪铁龙“伯爵夫人”款对任何体面的驾驶者来说，都是令人尊敬的资产。

与此相对照的是雪铁龙公司在战后年代生产的另一种主要用以挣钱的车型——“两马力”。1948年推出的“两马力”车在法国有其农业根源。它模仿1935年的“小小车”，可以装载两个农民，外带一袋110磅土豆，且比其他任何车型的价格都要低许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两马力”是“公爵夫人”的完全对立面，它为了实用而在美学角度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由于它很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便宜、实用、个人旅行的要求，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停止生产这种车型时已总共售出了700多万辆。

仇恨政治的中心力量。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任何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人都遭受着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底层人们的物质生活是残酷的。大多数住宅在战争年代受到严重破坏，在国家计划的早期又没能优先获得发展，因而质量很差。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半数的住房没有浴室或者淋浴，差不多一半没有室内卫生间。外来移民工人的居住条件最为恶劣，他们集体居住在城市边缘名副其实的棚户区。为工人提供的新住房主要指的



1945 年创刊的《她》捕捉到了战后国内热衷于消费和时尚的风潮。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销售数量达到 750 万份——到 90 年代中期发行量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1963 年 11 月号的期刊封面上的电影明星布丽奇特·巴多斯可能有助于发行量的增长。

是“廉租屋”，就更加没有生气，拥挤不堪，维护不周。消费社会所带来的 292 乐趣只是不成比例地使富人受益：仅有 40% 的工人能够离家外出度假，而却有 90% 的中产阶级可以这么做。后者还占据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位置。60 年代大学开始扩招，此时大众的一直在酝酿的仇恨即将沸腾而喷发。

1968 年五月事件

事后来看，要想把握几乎颠覆了政府和整个政治体系的 1968 年五月事件的一些起因，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让这种回顾式的分析模糊了这个事实，即发生在 1968 年的那件事是毫无前兆的和根本不可预知的。戴高乐宣布这一事件“不可理解”时，是代表大多数政治组织讲话的。它始 293 于巴黎市郊农泰尔的校园抗议活动，后来发展到在首都的街道上设置路障和全国范围内大批工人的起义运动；虽最终被解决，但费了很大的劲。而且这一事件充满了新的文化形式，他们凸显了现存政党政治的缺陷。但是，当权者们未能对经济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作出反应，并且将其吸收进来。



1968年5月索邦大学的教室里，资产阶级的儿女们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这一事件是顽皮滑稽和愚蠢可笑的混合。

更令人奇怪的是，1958年以后的政界看起来是走向传统的和可分等级的阶段，而非根据实验而定的阶段。戴高乐1958年执政以来的一个影响就是右翼和左翼泾渭分明地分化为两派，而不像第四共和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1958年，在宪法的全民投票和全国以及地方选举中，戴高乐主义者集体进入到保卫新共和联盟中，并且获得了四分之三或者更多的选票。就选举而言，戴高乐是第一个，然后是其他人。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中间派议员，像人民共和党人以及一些激进分子，现在已经被吸收到政府的多数中来。而且，全民投票也被用来阐明和简化一些关键的问题。

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一些让人生厌的问题现在已经过时了：宪法已经确定下来；随着人们对宗教的看法变得缓和，即不再是不可妥协，教[294]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进入了死亡前的阵痛中；殖民地问题也已经成为过去。经济问题在决定政治选择时更具有实质性。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选举地理——就好像我们所看到的，它来源于人们对1791年国内法的反映——从这时开始转换成新的模式。

包括孟戴斯－弗朗斯在内的一些左翼分子认为他们获得权力的门槛垒

得太高了。确实，如果想取得任何进展，左翼就必须更好地组织起来，并且能够更清晰明白地说出工人阶级的委屈和不平。1958 年宪法所确立的双重选举系统，使得左翼和右翼可能的候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竞选，因而选举协定就成为了政治生活筹码的一部分。1958 年以后，个人政治对于政治的简化也做出了贡献。戴高乐的支持者们把他视为神明，但这却意想不到地提高了其主要对手的声望。弗朗索瓦·密特朗在 1965 年的总统选举中（从 1962 年开始全体公民投票）仅仅因为把戴高乐带入了第二轮选举，便取得了很高的威望。1967 年，他联合了过去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大量的其他社会党组织组成了社会民主左翼联盟，并且在 1969 年将其转变为社会党。

密特朗是一位经历了第四共和国众多政府的资深政客，并且从 1971 年 [295] 起成为社会党的毫无争议的领导人。他从政党政治的个人化和重新布局中得到的好处比左翼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在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支持下，社会党在 1967 年选举中表现突出，使得联合政府感受到了一些压力。特别是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联合政府组成部分之一的独立共和党人的领导人），他公开表示了对政府政策有所保留。政府也因为无能地牵扯到肮脏的政治中而遭到批判。例如，法国特务机构和摩洛哥的秘密警察勾结，于 1965 年末在巴黎刺杀了摩洛哥反对派领袖本·巴尔卡。这个丑闻因为 1967 年法国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背景而遭到抨击。

1968 年 5 月，不满的最初征兆在大学里出现，而不是在工业部门里。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进入了大学，然而他们发现现有的教育体系根本就不能应付自一战以来已经增加了 10 倍的学生。巴黎大学农泰尔校区的恶劣条件激起了学生的激进主义，最终还包含了对美国在越南所作所为的不满。这导致抗议运动，并且由于警察野蛮的行为而不断扩大。工会号召展开一天的总罢工，与此同时在巴黎学生和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然后，几乎是同时，学生分散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起义；900 万—1000 万工人出来罢工，其中一些人占领了他们的工厂。

不可否认，在工人起义中有盲目模仿的因素，但是他们也是被自己的处境不平所激怒的，比如说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失业、差劲的管理手段以及缺乏想像力的工会的领导阶层。而且在那时工人也意识到了，他们享受到消费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们的上层要晚得多。工会的领导阶层像其他人一样被偷袭。法国共产党支持的法国总工会跟随共产党一起谴责这次运动，并且要求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但是其他的工会注意到了年轻工人的要求，尤其是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参加抗议的一些职业集团也把参与管理作为口号，例如医生、记者和电台电视台的工人。一些学生也接管了他们的学校，攻击国立高等学校教育中分等级机械学习的特点，要

求一种少一些独裁的教育方式，从而全面发展学生的个性。巴黎奥戴翁剧院的主管让－路易·巴罗对这次运动开放剧院。夜复一夜，这个会场或者是附近的索邦大学阶梯教室，成为任何愿意参加者的永久性的专题讨论会场和发泄不满的论坛。

1968年五月运动包括了许多因素。它疯狂的特点与来自于少数左翼学生和工人（托洛茨基分子、毛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支撑前者要求的是工人增加工资和更多控制他们自己生活 296 的更为物质化的要求。所有这些因素都由于警察过激的反应和残忍的行为而扩大。他们不加区别地袭击和使用催泪瓦斯，这既伤害了抗议者，也伤害了旁观的群众。

事后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最近25年中的主要的政治文化运动都是由1968年五月事件酝酿而成的。从长远来看，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原稿与左派观点中其他一些较少传统性的形式相比，确实可以说其重要性要小得多。和广告世界有密切关系的对于口号和公众形象的富有想像力的运用，使得传统政党的宣传方式看起来有些老套和过时。在各种政治过激主义名副其实的焰火展示中，政治文化的一些重要发展都变得清清楚楚。例如，从1968年起，女权运动、“绿党”运动和同性恋政治都从1968年事件中吸收了新的力量，并且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事件表明法国社会发生了迅速的改变，社会期望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超过了政治组织的适应能力。虽然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



天破晓时巴黎街头的战线。警察对动乱的镇压激起了一股对政府的义愤。



“五月事件”时的活动室。这里有许多分散贴在城中墙上的招贴画。

1968年五月事件包含了重要的长远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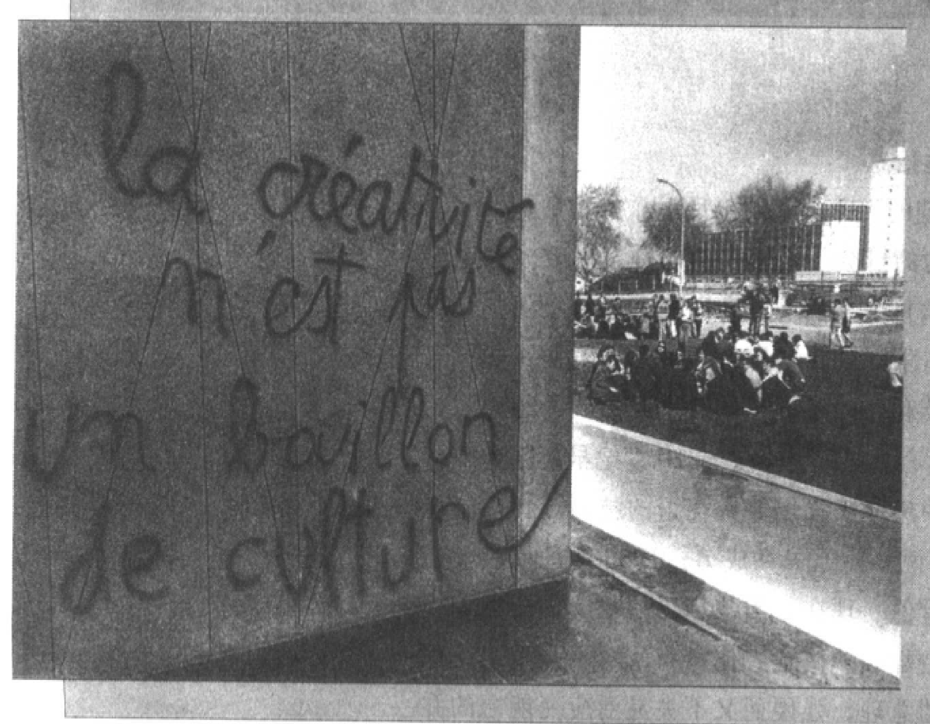
对1968年动乱的平定只是短期的而非长期的。反对派的力量是如此分裂，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机会。足够讽刺的是，对政体稳定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严厉地批判它的共产党，共产党把整个运动归于左翼的背离和中产阶级的冒险主义。戴高乐在紧张和压力之下几近崩溃，共产党人给他的不止是援助；从在阿尔及利亚时起就是他的忠诚支持者的驻在莱茵地区的马絮将军，增强了他的信心。作为一个具有20世纪早期精英教育和训练特点的人，戴高乐在交际中经常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技巧。1940年6 297 月18日在英国广播电台的著名演说，使他一举成名；1958年危机以及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表现都极有价值。现在，当他领导的政府的命运处于最低潮时，他利用媒体发表了不会辞职的决定。他宣布政府不会改组，他不会辞职，政策也不会改变。他的总理，强硬而又不失灵活应变能力的乔

治·蓬皮杜通过给工人增加7%到10%的工资，以及提高全国最低工资的方法，来解决反抗运动。戴高乐还要求进行新的选举，这个提议被证明是个巧招：使右翼反击力量在不坚定和分化的左翼的威胁下组织了起来。在6月底，选举使统一的右翼(现在重新命名为共和民主联盟)在485个议席中占据了358席。这是右翼在第五共和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所得到的最多 298 选票，远远超过了击垮左翼所需要的票数。埃迪加·富尔操控了对高等教育进行的一些改革，在大学中建立了良好的分权，并且允许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有些时候校园成了政治混乱的场所，但是不再有起义的发生。

尽管在1968年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戴高乐的那老一套中的大多数都失去了魅力。在维持政府存在方面，蓬皮杜的功劳和戴高乐差不多，但是后者几乎立刻将他的总理开除了，其动机显然是出于嫉妒。然而，这个老资格的政客继续走他自己的路，而不是听命于选民。1969年他提出就

“墙说话了”：1968年的巴黎

在1968年“五月事件”中，闹事者和左派攻击的一个特别目标是政府对传媒的严密控制。政府对电视的统治是传奇性的，如同批评电视新闻的人所描述的“政府在你的餐厅”：出版自由同样由于政府各部对出版者施加看不见的压力而受到侵害。对官方新闻的批判不仅存在于政治活动的内容中，也寓于其形式中。数以吨计的纸张被做成小报、传单、大字报、海报等各种能想得出来的宣传工具。更有甚者，公共场所的墙壁成为发表批评言论的原始画板，匿名涂鸦成为政治上的艺术形式。1968年5月的多媒体通讯交流与其说是确定了一个实用的行动计划，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政治语言。这种政治语言希望超越平庸和常规，并像涂鸦所写的那样“力量寓于想像力之中”。



“五月事件”在拥挤和设备简陋的农泰尔校园发端：在这儿举行了1968年的一场静坐示威。在此后许多年中，这里一直是学生运动的热点。

参议院和地方改革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威胁说如果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大众支持就辞职。公民投票的失败——53.2%对46.7%——并不必然要求他离职，但是他选择了放下手中的权力。1969年4月28日，他通过电台简短地宣布："我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责。这个决定将从今天中午开始生效。"他像1946年一样离开了政坛，但这次他再也没有回头看。他在1970年逝世。



1958年戴高乐的离职给巴黎日报《法兰西晚报》带来了销售最高峰，其销售量达到140万份（20年后仅售30万份）。这幅照片是由伟大的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雷松拍摄的。

在戴高乐之后还会存在戴高乐主义吗？确实，在他离开后还有第五共和国吗？乔治·蓬皮杜是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肯定回答的人。尽管他缺乏戴高乐自我张扬的嗜好，但他是个强硬的执政者，并且足够机智地吸收了 299 戴高乐遗产中的政治营养。例如，他保留了戴高乐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对外政策。他对欧洲的义务感也很强；他同意把有 6 个初始成员国的共同市场扩展为有 9 个成员的欧洲共同体（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于 1972 年加入）。

在国内，五月事件以后左翼力量的衰退以及接下来右翼的强烈反应，300 使他的工作在一开始时相对容易。法国自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长期持续繁荣也是如此。1959 年到 1973 年间，人均收入以每年 4.5% 的速度增长。蓬皮杜最低限度但却明智地对曾经为法国起过良好作用的国家体系进行了小修补，中央政府对某些领域的控制稍稍放松了（特别是对国有化产业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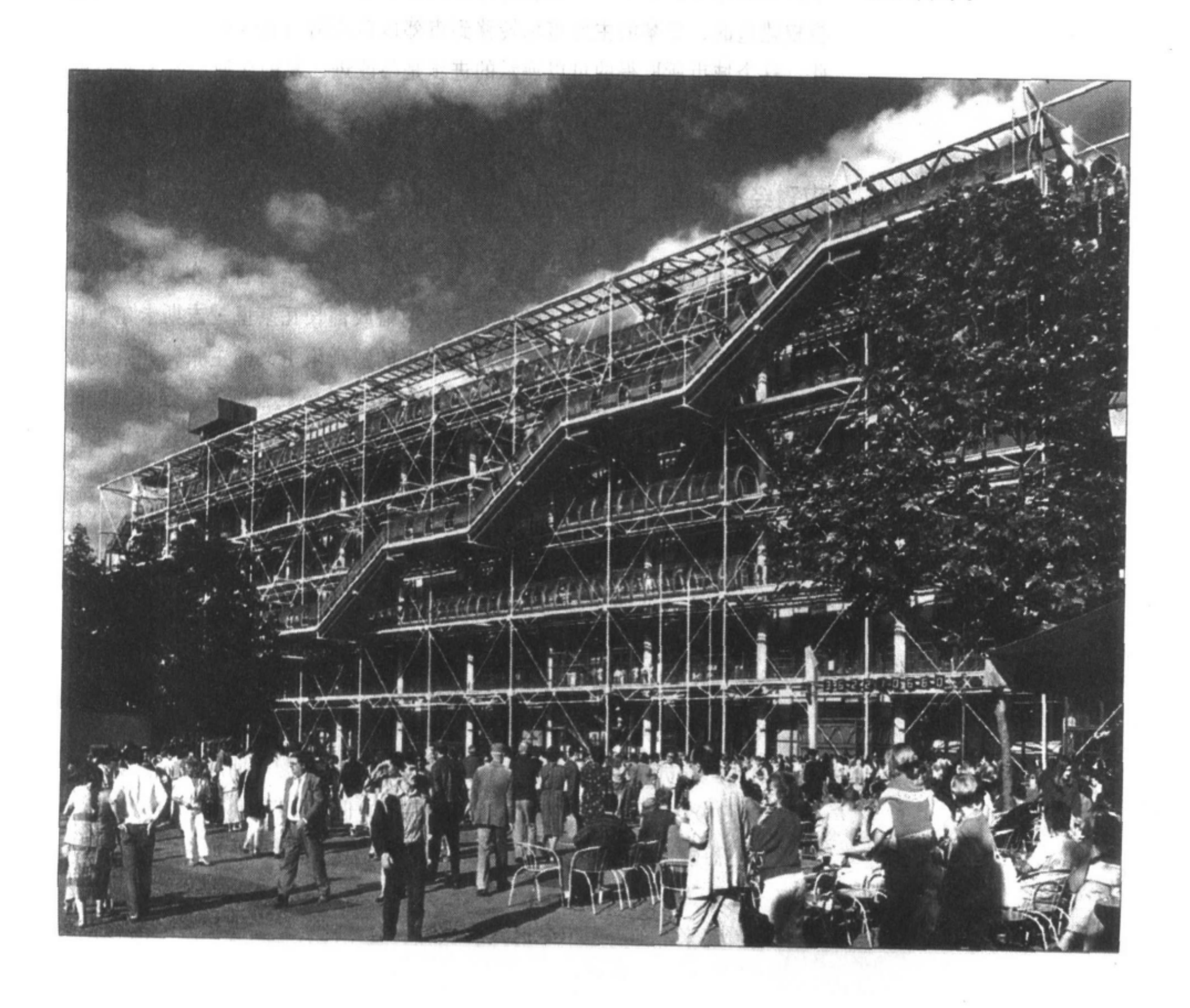
蓬皮杜开始意识到，并随后对地方主义政治内涵发生的逐步但巨大的改变作出了反应。非殖民化精神已经扩展到法国本土。1965 年，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米歇尔·罗卡尔呼吁政府“对一些大的行政地区实行非殖民化”，这个要求是地区分权思想的里程碑。在这之前，几乎不可想像高度集权的、有着雅各宾派传统的左翼会支持地方分权，因为支持地方权力一直是向后看的、传统的右翼的口号。蓬皮杜通过关于地方发展的稳健规划，占了亲地方主义的左翼的上风。自从 1790 年建立省级行政划分以来，各省第一次对某些经济任务放手，把他们置于省之上的地区层面的集合体的控制之下。某些主要的经济计划也起到了刺激地区发展的作用。例如，协和飞机工程背后的许多航空和航天工业主要位于图卢兹，而大量的石油精炼厂是在马赛附近的福斯，这从 1970 年起促进了地中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郎格多克（古时法国南部一省）沿岸的拉格朗德莫特金字塔形公寓楼成为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旗帜之一。这个地方曾经疟疾肆虐，消灭了蚊子的美丽海滩第一次变得完全适合人们居住。与私营企业相关的大量高速公路的建造，也有助于刺激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努力还集中在通信的另外一个分支电话系统内：电话线路的数量在几年内而不是在几十年内增长了 4 倍；1968 年仅有 1/7 的家庭有电话，到 1982 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变成了 3/4。

尽管蓬皮杜失去了戴高乐凭借个人魅力吸引来的一些左翼选民，他仍然维持着戴高乐发展起来的伞状右翼联合。在他的领导下这个联合成为令人畏惧的政治机器。他任用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沙邦－戴尔马（在战争年代，他曾在伦敦为戴高乐服务）作为他的第一总理是个明智的做法，这使得 1968 年以后的改革有了可能。由于沙邦－戴尔马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蓬皮杜在 1972 年用更加强硬且不妥协的皮埃尔·麦斯梅来取代他。政府职务安排带给人们的持续不安与 1968 年时很相似，这表明了蓬皮杜在公共秩

序问题上的独裁。任何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晚期去过巴黎的人都记得，那里时刻都充满了警察。抗议和游行还是可能被警察助手和内奸阻止。警察的权力仍然很广泛并且经常被使用。

然而，巴黎也是蓬皮杜对伟大的文化政治进行精心投资的中心地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戴高乐时代的继续。戴高乐的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在1962年引入了遗产法，从而使得所有的公共建筑得以进行 301 大清理。世纪的尘埃从诸如巴黎圣母院这样的文化纪念碑上剥落下来，展现出只有那些吝啬鬼才会去哀叹的整洁。马尔罗还计划向文化不发达地区传播高雅文化。1966年，他首先在勒阿弗尔开放了十多个“文化之家”或文化中心。马尔罗认为他们是未来文化的大教堂。他把这些视为传教的前哨，以此来散播特别是巴黎那些曾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的正统的文化遗产。他于1966年宣称：“在10年内，‘外省的’这个丑得可怕的词将不复存在。”

1977年开放的蓬皮杜中心被证明是法国最知名的博物馆和公共场所。大批参观者使这个建筑物的架构受到很大的压力，1994年被暂时关闭以进行大修，同时也进行重新装修。



然而“文化之家”却注定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尽管他们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促进了蓬皮杜所希望的地方分权，但是马尔罗在地方的“教化使命”背后的文化假定已经过时，而且精英化了。消费社会已经把许多高雅文化之下的假设撕成碎片。在消费者时代，电视、录音机、流行音乐电台 302 和其他的媒体都强调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是大众的而不是精英们的，是变化的而不是规范的。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创造力而不是消极地接受已经得到承认的文化遗产。在这里又是如此，对1968年事件的不够认真的探索，对于文化争论的条件产生了微妙但是重大的影响。

尽管蓬皮杜继续维持着对大约12个“文化之家”的国家支持，但是他个人更侧重于巴黎自身现代化和城市复兴的政策。纯化论者们绝对不会原谅他，因为他彻底改变了巴黎的轮廓：不管是郊区的未来商业中心拉德方斯，还是蒙巴尔纳斯和酒交易市场的摩天大楼，以及一些类似的发展。1977年开放的博布尔中心——后改名为蓬皮杜中心——是在他的任职下设计和授权建造的，巴黎的主要市场转移到市郊以后莱阿勒地区的现代化也是如此。这个城市所取得的可以展示的进步是与改进巴黎的交通系统和通讯网络的努力相伴随的——这也是蓬皮杜的继承者将进一步深入执行的主题。

应对经济衰退：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总统任期

1974年蓬皮杜突然死于癌症，又一次开放了政治舞台。在大有可为的戴高乐主义者雅克·希拉克的支持下，前财政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抵制住了沙邦－戴尔马要求代表真正的戴高乐主义的主张，并且获得了右翼的支持。吉斯卡尔（1974年—1981年任总统）强调了第五共和国的持久性，因为他不仅是戴高乐主义的共和民主联盟成员，而且还领导了他自己的组织——法国民主同盟。然而吉斯卡尔为了向逐渐被左翼吸引的全体选民施加他的影响，停止了他的工作，因为左翼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黑暗岁月以后现在又东山再起了。自1969年起，弗朗索瓦·密特朗把各个社会主义组织熔铸在一起，缔造了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党；并且在与共产党经过认真的谈判以后，和法国共产党达成了一个共同计划，其他的左翼集团也支持这个计划。

共同计划使得右翼在1973年立法选举中大肆利用“红色恐慌”。对于当权的共产党员、宪法危机、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等问题有许多隐秘的谈论。在1973年，联合左派已经接近胜利，但是1974年他们再度失利。结果相差甚微：吉斯卡尔获得了50.8%的选票，而密特朗是49.2%。这使得有些人认为，他们各自在电视上的表现才是竞选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密特朗看起来不如吉斯卡尔时髦和镇定。对“社会主义者风险”抱有恐惧

这一因素很有可能也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其他因素还包括工资在继续增长，失业仍在减少。然而，如果吉斯卡尔成功地在经济大发展的潮流中获得了权力，那么这个空前的经济繁荣期事实上即将走向终点。这将带来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构建经济繁荣的基础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率开始下降；从1973年到1981年工业产量停滞不前；失业者从60年代的20万人增长到80年代早期的200多万人。 [303]

但并不是只有法国陷入了经济问题，整个欧洲世界都在走下坡路。1973年4月的石油危机使得中东的石油价格增长了4倍。这对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对于法国来说尤其如此。法国不像它的邻国英国，它没有任何石油储备，并且四分之三的能源需求依靠进口（相比之下，英国和德国只有一半的能源需要进口）。西方国家再也不能指望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不与他们竞争。然而，在1974年的时候，如果仅把危机看成是一个点而不是结构上的转变，就有些过于简单化。政府试图把危机看成是短期行为，这恰恰导致了通货膨胀、失业率持续上升与经济发展迟钝并存的灾难性后果。总理希拉克试图通过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来获得经济增长从而摆脱危机。结果，20世纪60年代末3.3%的通货膨胀率，到了1974年的时候就跳到了15.2%。1976年任命经济学家雷蒙·巴尔作为希拉克的继承者，稳定了这种局势。通过采取节约和货币从紧政策，巴尔被证明是一个处理危机的能手。尽管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仍然很高，但经济运转良好；同时由于核能的发展，法国也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而且，法国正是在这几年中，其国家财富的排名超过了英国。

经济困难给总统吉斯卡尔关于推动“先进的自由社会”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云。作为一个有技术专家背景的冷淡而理智的人，他的行政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难被认同具有人情味。他在媒体上的形象很有教养，但在现实中看起来却是谦逊和愿意屈尊的。例如，他邀请清洁工去爱丽舍宫，并且主动和“普通”市民一起进餐。然而，他确实负责进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自由改革。他把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他的教育改革——特别是综合教育在中级水平的推广——旨在提供更多的社会平等机会。政府对电视和媒体的控制也放松了。

妇女权力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最后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即使在1945年她们被给予了选举权，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她们的社会地位还很落后。令人惊讶的是，西蒙·德·博瓦尔在1949年出版的划时代作品《第二性》在当时竟没有多少深远影响；直到1968年以后它才被重新发现，并且成为了法国当代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吉斯卡尔上任伊始，就任命了两位女内阁大臣：负责健康问题的西蒙娜·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一个理想家居展览上察看一个高压锅。德斯坦企图显示与普通人的接触，但却很少令人信服。

维耶和负责妇女问题的国务秘书——记者弗朗索瓦兹·吉罗德。两人都有效地帮助了已获改善的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1965 年，《拿破仑法典》中存留下来的限制被取消了，例如妇女可以在银行开设账户，也可以不经她304丈夫同意拥有财产。1972 年，出现了男女同酬的规定（尽管这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有效地实施）。“选择权”是妇女问题的关键。1971 年，来自普通民众中的 343 名妇女在周刊《新观察家》上签署了一个声明，号召对流产进行立法；她们承认有过流产经历。由西蒙娜·维耶通过议会指导创立的 1975 年法律，对她们的要求作出了回应。这使流产操作实施起来更加容易并且更具合法性，从而使偏僻街巷里的为人堕胎者销声匿迹。建立于 1967 年的一项措施基础之上的 1974 年法律，使得避孕更加自由。1975 年，离婚也自由化了。

吉斯卡尔的自由主义因为他对随意、自由的媒体形象的追求而得以巩固。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左翼内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出现了争吵，这使他的自由主义获得建立其可信度的机会。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吉斯卡尔在处理政府职位安排时面临的困难比他面对反对派时还要大。他在1976年免去希拉克的职务，这使他自食恶果。希拉克在他之后砰然关闭了大门，他把戴高乐主义者的共和民主联盟转变为保卫共和同盟。305 这个新政党名称的大写首字母使它看起来像戴高乐主义者。这遮蔽了一个事实，即希拉克把该党作为其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工具。其实在这个政党中原来的反对派巨头根本没有什么地位。保卫共和同盟比吉斯卡尔自己的法国民主同盟规模要大得多。1977年，希拉克参加了巴黎市长竞选，并取得选举的胜利，而这一职位原本是吉斯卡尔给他的朋友米歇尔·德·奥尔纳诺预留的。希拉克的影响足以使吉斯卡尔计划进行的大量自由主义改革受挫，而这些改革原本可能帮助吉斯卡尔赢得一些左翼选民的支持。吉斯卡尔不得不接近右翼政党，以此来确保他自己的政府联合计划完整无损。20世纪70年代末，左翼的复兴也使他的自由主义主张显得单薄。

此时，吉斯卡尔一度很轻松的总统风格变得僵化和专断了。在官方的宴会上要首先侍候他的习惯，以及放慢军乐《马赛曲》的速度并且少使用它的决定，显示出他对一些琐碎事情的关注。这让很多人厌烦。他的外交也变成令人瞩目的问题。他要求法国外交政策“全球化”显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姿态。然而，特别是在非洲，他倡议了新殖民主义的运动，这看来明显具有王朝的性质。1978年在扎伊尔，法国军队粉碎了反对蒙博托的叛军，在中非共和国支持并且帮助他们推翻了独裁的博卡萨。他喜欢亲近大人物，这也对他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博卡萨曾经给了他一些钻石作为个人礼物，吉斯卡尔对这个问题的回避给他在1981年总统选举中的失利带来了意想不到但却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时，吉斯卡尔的对手是围绕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重新联合到一起的左翼，而密特朗是吉斯卡尔的支持者所不屑一顾的“永远的失败者”。然而吉斯卡尔不得不在西方经济仍然不景气的时候参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尔虽然有效地稳定了国家经济，但是当1979年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时候，政府没有选择那些虽然很难实行并且很可能不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政策。甚至当经济不景气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们还是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只是坐等1981年选举的到来。而且，由于他所领导的联盟的性质，吉斯卡尔发现按着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来表现自己是很困难的。很不幸，他在世界经济给真正的自由主义政策留有余地很小的情况下出任了总统。他在1981年选举中付出了代价，并且不得不尽可能表现得体地把位置让给了那个“永远的失败者”——弗朗索瓦·密特朗。

第十一章　密特朗时代

306　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1年和1988年经选举，两度成为任期7年的总统，使他在法国政治历史上拥有不朽的地位。只有在20世纪政治之树顶端曾执政13年（1944年—1946年，1958年—1969年）的戴高乐接近于这个时间跨度。由于法国走向新的世纪之末——这也是一个千年之末，在第五共和国宪法之下的个人统治与上个世纪高烧般变化无常的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即19世纪末的第三共和国以及成为密特朗政治学徒车间的第四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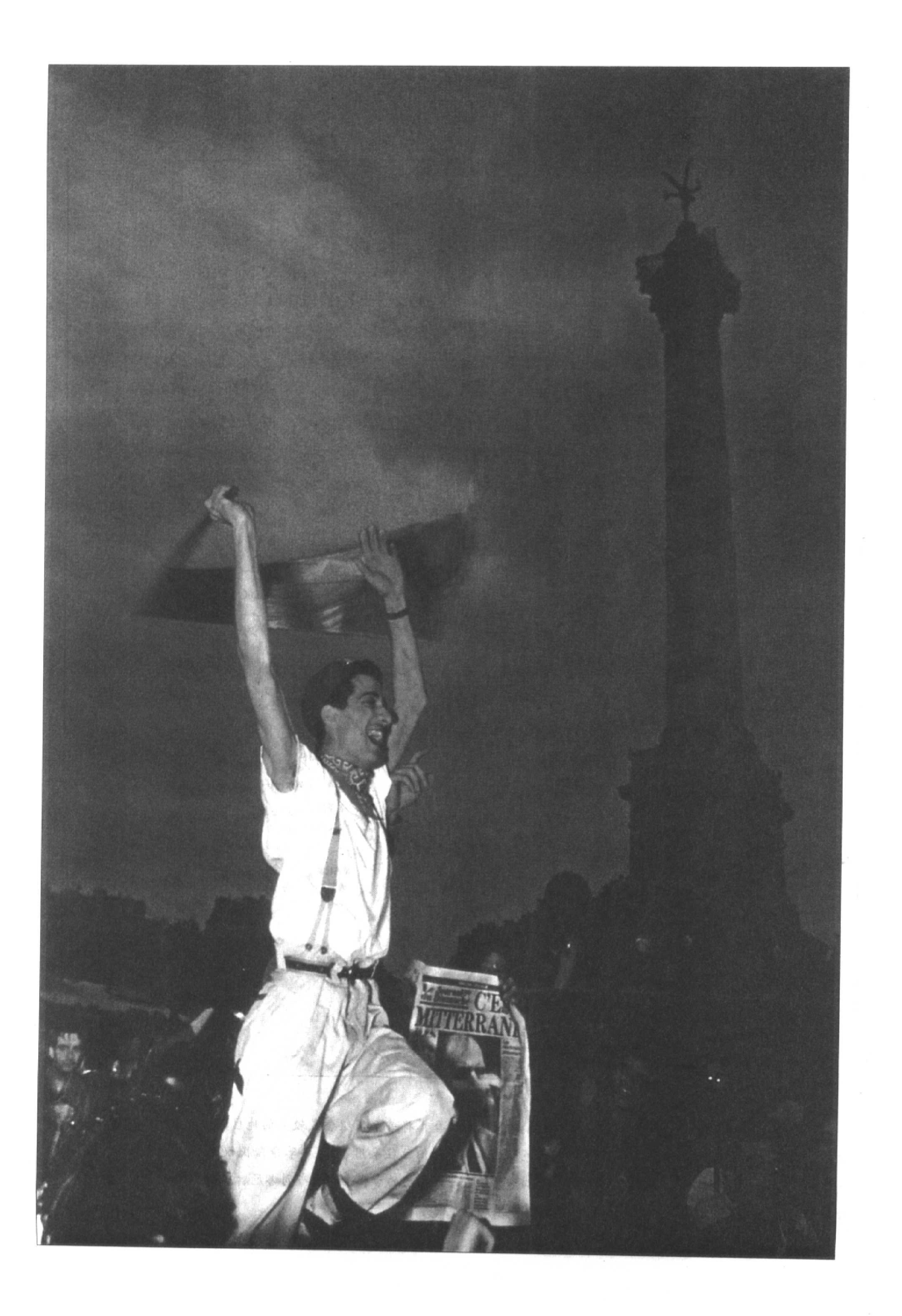
密特朗保住他的权力，是依靠掌握他早期生涯所学到的政治妥协得以实现的。尽管在维希时代他是一名公职人员，但他也是一名积极的抵抗运动分子，后来他常以此炫耀自己。当他在二十多岁时成为第四共和国政府的部长时，他所在的政党在促进政府联合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不断地利用了部长们走马灯般的轮换。尽管他的官场生涯表明他肯定是坚持左派原则的人，但他并不总是表明坚持那些原则。例如，虽然1981年他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但他却是很晚才转向社会主义的。尽管他的正直诚实自1958年以来在他穿越反对派漫漫旅程中得到肯定，但他在政治领域的地震变动中的适应水平和幸存能力，使他得以在1981年后成为总统。当时他不得不跨越政治标识，领导一个来自右派的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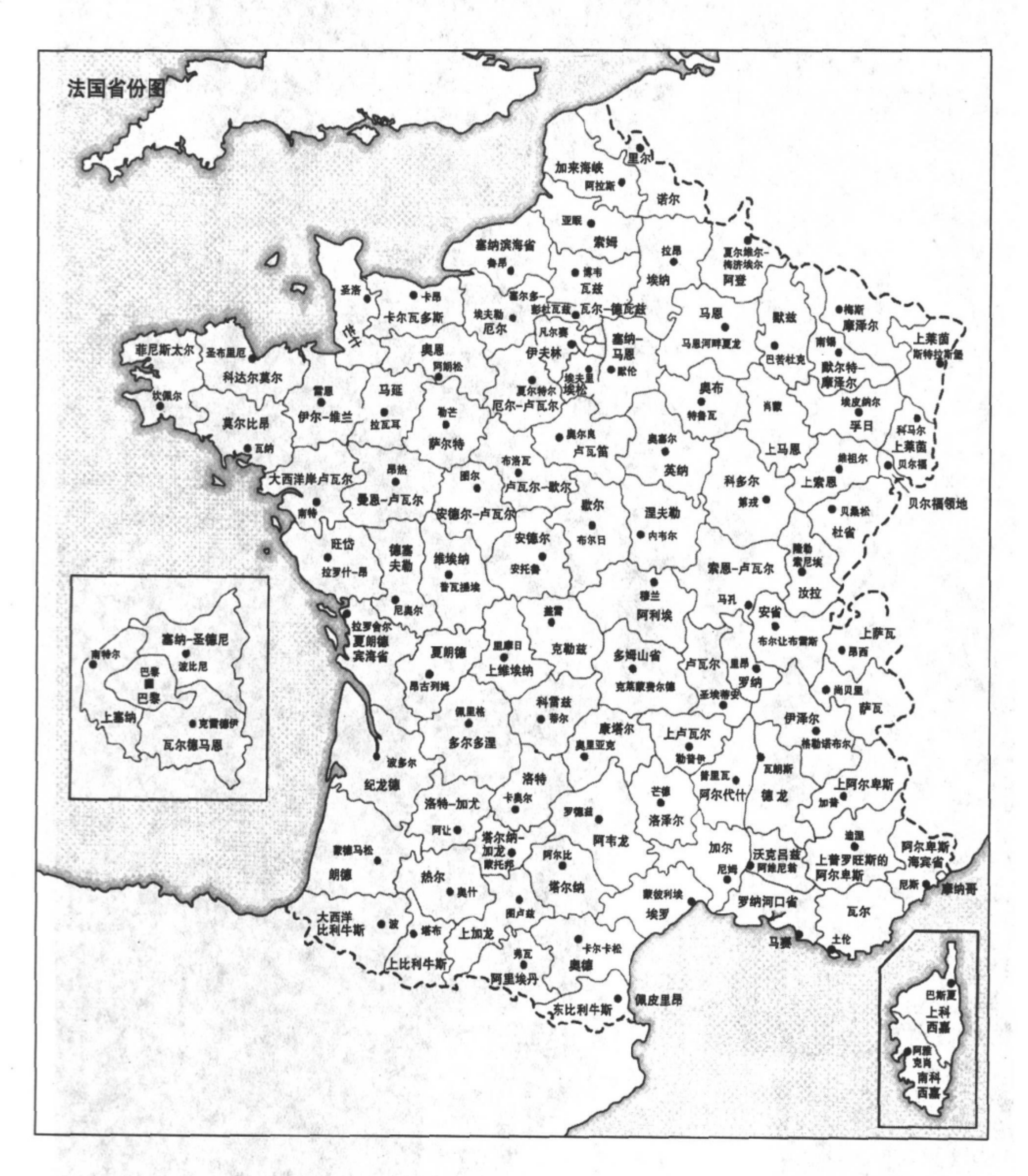
在这一点上，个人的命运和宪法的稳定结合起来了。尽管具有“度身定制”特点的第五共和国从最初就被证明是适用于总统制的体制，不管是对戴高乐（从1969年起的蓬皮杜）或是戴高乐派（从1974年起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更是向第五共和国的宪法安排挑战。他不仅以左派当选总统，而且后来从1986年至1988年（后来从1993年以后）继续以左翼党派的总统身份在右翼政府工作。同一个政体中左、右翼“共治”的新理论和两翼轮值的做法证明，他足以应付这样的挑战。

（第303页）1981年社会党选举获胜，激起了兴高采烈的情绪：大多数年轻人从来不知道左派政府。然而希望很快破灭了。

第五共和国的顶峰

从密特朗就任总统之初起，他就对历史和社会回忆十分敏感。他同意在巴士底狱广场举行庆祝社会党竞选胜利的盛大活动——这是传统的左派


C'E
MITTERRAN



308 1790年关于各省的设置和命名，令人惊异地被长期沿用。根据当地自然特点命名——埃罗省以河流命名，上比利牛斯山省因山脉得名；有些做了增加（如萨瓦省），有些作了细化（特别是巴黎的卫星城）。发展的趋势是加大组合，将若干省组合成较大的地区单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往往采用1790年革命国民议会（参见原著第12页）所取代的古代名称（布列塔尼、朗格多克、阿奎坦等）。

集会地点；并提前瞻仰先贤祠，那里埋葬着国家英雄。他在那里向维克托·舍尔歇致意：他是1848年在法国最终取消奴隶制度的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家。他还瞻仰了1914年被刺杀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以及抵抗运动的英雄让·穆兰。他还在爱丽舍宫专门招待他在第四共和国时期 309 的良师益友之一、年事已高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意义重大的是，他将《马赛曲》从吉斯卡尔曾致力达到的庄严肃穆的挽歌节奏，又改回到原有的军乐节奏。

这些重要举动就是要将共和派的回忆带回主流中，为激进的社会行动提供宪法支持。这种行动有别于第五共和国至今以来所具有的趾高气扬的右翼传统政治。密特朗通过任命曾为历史教师的皮埃尔·莫鲁瓦出任总理，表明了他对过去的尊重。确实，在密特朗的部长班底中有三分之一以及社会党议员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教师，以至于新的行政领导班子得到“教授共和国”的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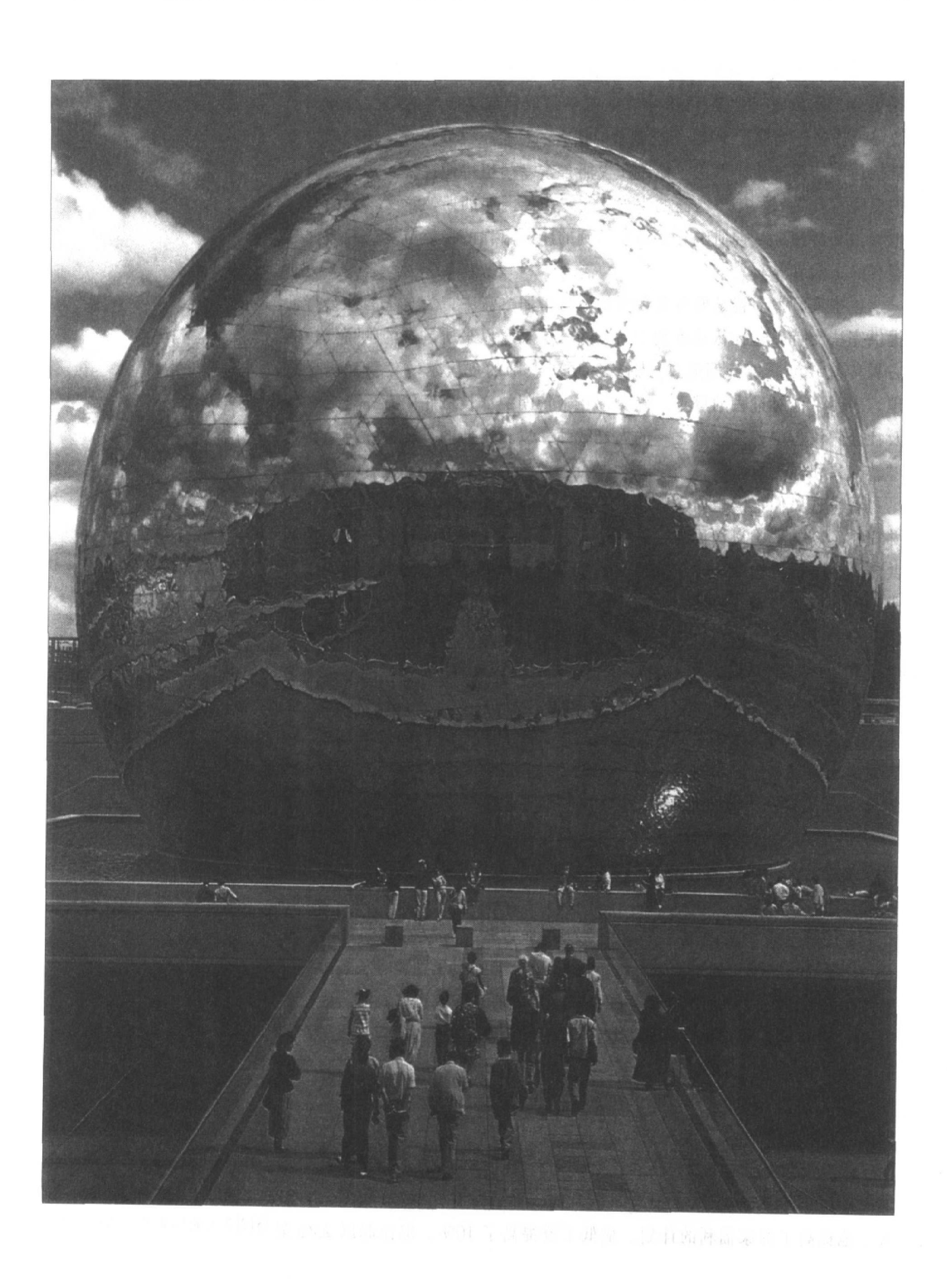
看来选民们也渴望向“教授共和国”学习。密特朗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安排了新的选举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选举证明了左派的胜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全国大选中一共获得了55%的选票，赢得了绝对多数。共产党只是一个小伙伴，获得9%的选票。这使得一些人暗自嘀咕，认为“共同纲领”只是为了他们的传统对手夺得工人阶级选票进入政权而已。然而共产党也获得了4个部长职务：这是一种拉拢法共在困难时期支持政府的权术而送给它的礼物。

莫鲁瓦政府通过制订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方案来实现社会党的竞选诺言，而当时的国际环境则是几乎所有西方政府在经济紧缩的压力下都在压缩开支。民权和人权发展到取消死刑（吉斯卡任期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1977年），缩小法院制定政策的权力以及放开无线通讯。1981年允许成立地方无线电台，1982年独立的广播当局成立，从而削弱了国家对此的传统控制。

与传统重要决裂的进一步做法是实行地方政府分权制。老牌社会党人，长期任马赛市长的加斯东·戴费尔于1982年通过了削弱省长权力的立法。作为拿破仑时代创立的政府在省里的左右手，省长被重新命名为“共和国代表”，他们原来拥有的许多权力被划给省里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席。市长和市政府的权力也加强了，1972年成立的22个地区议会有了更大的实权，特别是在经济和发展规划方面。曾一度在几年间内发生分裂主义暴力事件的科西嘉，也被赋予特别地位。

社会党纲领力图下放经济和政治权力。1981年的“奥鲁法案”提升了工人权利，可以集体谈判，使业务权利的天平偏向雇员一方。此外，广泛大量地提高了国家福利的计划。最低工资提高了10%，但比起以25%至 312

（第306页）球形影院。20世纪80年代在巴黎拉维莱特公园重建，是拥有放映有关大自然电影的360英尺巨大电影屏幕的娱乐中心。



伟大文化的政治

第五共和国历届总统都对雄伟建筑项目具有很强的使命感。20世纪90年代的协和广场是古老的天空守卫者，自戴高乐时代起就是颇受异议的传家宝。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铁路在开通了巴黎－里昂线之后，政府又扩大到其他线路，导致铁道基础建设的大量投资。

无论如何，是乔治·蓬皮杜为这些雄伟建筑奠定了基石，特别是有些项目就建造在首都。德斯坦继续进行这些工程。他在把其前任的某些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冻结后，将废置的奥赛火车站改建成博物馆，并同意发展拉维莱特公园和科学博物馆。这种倾向在弗朗索瓦·密特朗任职期间达到顶峰。这些由傲慢的无视任何批评的国际建筑界大腕们所规划的工程，往往伴随着大吹大擂的广告式捧场。

在1977年由英国人理查德·罗杰和意大利人朗佐·皮阿诺所设计的蓬皮杜中心之上，还要加上贝聿铭在卢浮宫花园的玻璃金字塔（卢浮宫因此也需要进行重大的重新布置），巴士底歌剧院和1989年在巴黎郊区的拉德方斯区建成的大拱门。他们的启用正好与庆祝1789年大革命二百周年相吻合。密特朗在任期结束前计划建一座新的国家图书馆，被称为"极其巨大的图书馆"。



拉德方斯是巴黎西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发的商业和居住区，大拱门如同该地区的王冠。这个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建筑，正对着通往星形广场的香榭丽舍大道。

公平地说，自戴高乐以来的历任总统都介入到兴建城市和开发文化遗产的计划中，这使法国成为最进步的欧洲政府。例如巴黎破败的马雷街区被改造成展示17世纪和18世纪建筑与设计的极好场所。密特朗也大幅度提高拨给艺术和文化的国家预算。

312 50%的幅度提高的家庭补助、住房补助和养老金，以及医疗福利的重大修改，又相形见绌了。每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至39小时，采用了第五周为带薪假日的做法。这是对“人民阵线”和第五共和国的休闲至上主义的显而易见的致意。

谁来为这无与伦比的大笔支出买单？政府引入了对巨富的财产税，并提高了雇主的责任税额；但这些做法仅具有象征价值，因为国家福利的承诺在扩大。密特朗和莫鲁瓦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政策，刺激经济扩张，从而消化吸收新的社会成本。政府想在巴尔的严格紧缩经济之后翻过新的一页，为增长而努力。为此目的，自由经济和权力下放伴随着自解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国家对经济控制的加强。国家加大对经济的控制，以便合理引导投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希望控制汇率，以促进出口并刺激生产。1982年立法通过了对5家大型企业以及主要的私营银行的国有化。国家在其他主要企业中的股份增加，以拥有大股东地位。至1982年底，法国最大的20家公司有13家已经实际上由政府控制。政府直接雇用的劳动力比例翻了一番，增长率为20%；外加政府在公共部门新增的14万个岗位，许多是设在著名的文化项目上。

“我被我们的胜利推动着；我们陶醉了。每一个人……预言1983年会出现增长。坦率地说，我缺少说他们错了的必要知识。”密特朗在1983年7月做出了直言不讳的忏悔。当时，1981年出现的莫大希望已经大部分蒸发，政府以强制的严厉态度做着减少损失的练习。社会党人以国家导向的增长来打赌，削减增长的进口并刺激出口。“教授共和国”在做他们的数学家庭作业时失败了。如他们后来沮丧地承认的那样，当时的经济环境对于这个设想几乎是完全不祥的。在法国的经济条件下，过强的购买力导致为进口多花钱而不是买国内生产的产品，因此贸易不平衡，货币疲软。在1981年、1982年和1983年，法郎被迫贬值。进口石油的价格飞涨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尽管法郎贬值，但在世界市场上可能还是定价过高，法国的出口因此而不具备竞争性。更为不祥的是失业队伍继续扩大，超过了200万人。

在这经济风浪中的密特朗，是超级政治幸存者和调和妥协艺术的老手，选择了不将自己绑在固执的社会主义桅杆上沉下去的做法。作为经典的一揽子强硬政策，特别是在1982年6月和1983年3月，他和莫鲁瓦采313 取了紧缩做法：冻结工资和物价，压缩公共开支，提高医疗服务费用，对支出增长封顶，控制汇率，等等。右派自然是幸灾乐祸，高兴得直搓手。1984年的“萨瓦里法案”使他们有机会一施拳脚，该法案考虑国家更紧密地控制私人——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天主教——学校。反对这一法案的人很少将其归功于过去的值得忏悔的斗争。的确，许多教会领袖对扑灭反教

权主义之火心存感激，对右派兴风作浪的政治首都感到略微有些不自在。在私人教会学校中，家长极为注重的是隐私权而不是天主教教义，他们当中的五分之四甚至都不参加天主教仪式。但这些学校却由于中产阶级的印记、慷慨的教师，学生比例和学术成就的名望，而受到青睐和追捧。在巴黎举行的联合了上百万人的游行——据某些计算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示威游行——迫使政府退让，取消了这一立法。

政府日益不得人心，在1984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上表现得甚至更为清楚。社会党人只获得了仅仅21%的选票。堪称噩兆的是，许多心怀不满的选民们既没有将他们的票投给左翼联盟党派，如法共得票很少，甚至也没投给传统的右派。一个新崛起的极右翼党派——让-玛丽·勒庞领导的公开反对移民但也明确反对犹太人的民族阵线党，成为发泄不满的坩埚。民族阵线党吸引了11%的选票，和共产党得票率相近。1981年勒庞尚不能获得足够的支持率以跻身总统大选，在1981年的立法选举中他所领导的党只获得了不到1%的选票。身为前布热德分子的勒庞精明地发展组织，在有大量移民的地区获得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南部地中海沿岸和一些较大的工业地区。他的种族主义观点给政治舞台上带来了新的愤恨不满和恶意攻击的腔调。

社会主义的神奇灯光看来在联合传统右派上取得了成功，并带来了妖魔勒庞。1984年时的形势很明确，要想使社会党在1986年的立法选举中哪怕是取得微弱取胜，也必须要更换领导。密特朗因此撤下了莫鲁瓦，代之以年轻的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洛朗·法比尤斯。法比尤斯通过进一步地偏离和系统性地离开1981年的社会经济纲领的方式振兴经济。共产党退出了政府，许多左翼社会党人也感到不满，因为法比尤斯试图靠盗取反对派的外衣来恢复政府名誉。降低通货膨胀和促进生产力成为头等大事。随之而来的是削减公共开支，压缩经费和从税收方面刺激私人工业。到1986年的选举时，法比尤斯靠自己的光芒，勉强表现不错。经济增长缓慢但稳步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5%（1982年高达15%），出口增长。失业率超过10%，尽管偏高，但提前退休和创造就业机制使之没有失控。

法比尤斯不仅帮助经济回到轨道，他还使社会市场经济观点在自己党 314 内和广大公众中得到普遍认可。剩下来的就是要看这是否能成为取得选举胜利的基础。随着突然成为时髦的极右翼党派，以及在民意测验中呼声很高的传统右派，社会党没有以1981年时左派的乐观主义方式来显示他们掌权5年的成绩。他们取得的胜利来自于使经济按照巴尔、德斯坦和希拉克思想运行得到的结果。这在1981年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盼望情况会得到改善的选民中，是很难得到有力支持的。



招贴画很不自然地将国民阵线领袖让－玛丽·勒庞与当时来法国巡回演出的歌唱家麦克·杰克逊并列。

勒庞的竞选口号是“法国人优先”，这意味着第二代移民是“外国人”，因而不是法国人。

向轮流执政调整

在1986年选举前很长时间，这个神秘的咒语就被预测到了。一个社会党的总统能够在权力顶峰与右翼占多数的议会共存吗？有的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前总理雷蒙·巴尔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那些处于位置比他更好，从1986年右翼获胜中受益的人，特别是法国人民同盟领袖雅克·希拉克和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则认为存在着“共治”的可能性。

315 在密特朗执政时期，共治在共和宪法的基本学说框架内是成熟的。自1981年至1986年，然后是从1986年至1988年密特朗主持的社会党改革期间，他愿意身居二线，让领导着议会右翼多数派的总理希拉克在前线打拼。然而，在赢得了1988年的总统选举后，密特朗利用宪法特权解散议会，举行新一轮立法选举。事实证明，这样做对社会党有好处。他任命了多个社会党总理，直到1993年。1993年右派在立法选举中的胜利，仍被视为是密特朗在继续掌握着权力，即使政府重新转回到右派手中。

在政党轮替的堂皇进步中，也有许多关于密特朗退位的言之凿凿的预

测，当他 1992 年被诊断患有不严重的癌症时传言更盛。这些都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三个因素导致他得以长期执政。第一，宪法赋予总统大权，议会搞阴谋无法终止总统任期，这是建立在 1962 年全民公决的选举基础之上的。第二，密特朗尽一切可能将对外政策视为其个人领地，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国际国务活动家的形象来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声望。首先，在 1981 年他表明对国外人权问题的关注，这与他的国内计划的原则性不谋而合。在国内经济政策上转向"现实主义"，正好与国际关系中向"现实政治"的发展相匹配。他批准在 1983 年乍得发生内乱时派遣法国军队的做法，令人回想起德斯坦轻率的新殖民主义。1985 年时，他甚至在爱丽舍宫欢迎波兰团结工会的刽子手雅鲁泽尔斯基将军。1985 年的"彩虹勇士号"事件——在它被用于抗议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之前，法国秘密特工部门人员在新西兰港口炸毁了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也说明了在保卫国家利益上总统丑闻所能达到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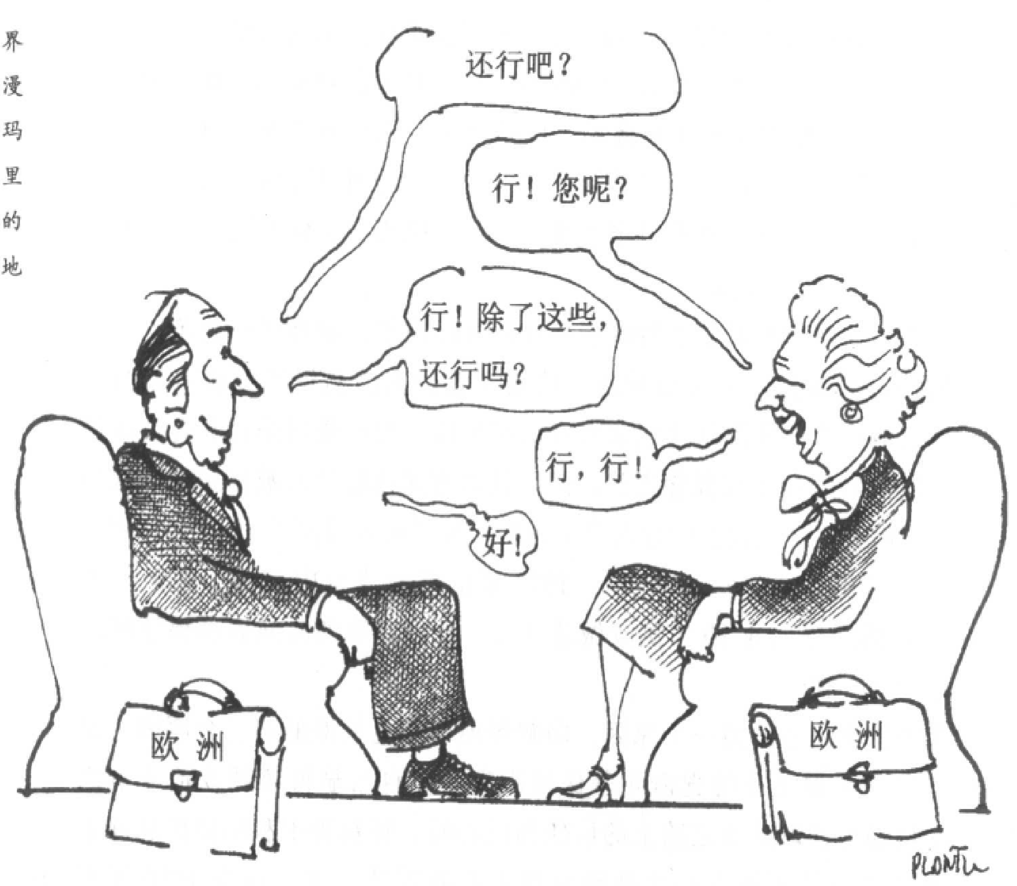
这些事件并没有贬低密特朗所享有的国际声望。他在对外政策上明显地转向地道的戴高乐主义的做法，使他在法国国内赢得了传统右派的支持。尽管他致力于欧洲前途的承诺对法国来说，走在戴高乐在联合失败的欧洲环境下的国家主权观念之前，但在其他方面证明他是戴高乐式的戴高乐分子（而且在国民议会中他常常比戴高乐分子还要戴高乐）。他的作用，以及法国派出军队，在 1990 年—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赢得了掌声。当 1991 年法国媒体为他 10 年执政做总结时，危机时期的时间表确保预测结果对他十分有利。

密特朗得民心的另一个原因，即解释他政治上长寿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使自己与喧嚣不止的党内斗争保持距离，使自己显得超越政治斗争之上。密特朗在摘取从政之路上的信任和民心时，特别善于利用历任总理来作为他的政府的不得人心之处受到攻击的避雷针。这一点在 1986 年至 [316] 1988 年希拉克任总理时特别明显。

某些人认为，在魔鬼般狡诈的运作中，密特朗于 1985 年在立法选举过程中引入了一定程度的按比例选举代表的做法。一个旨在缓冲左派票数下滑的新体制——应急体制，被证明是必要的。1986 年的低参选率表明选民对选举很不热心。尽管社会党人在造势方面表现得还可以，但是法国共产党却取得了自 1932 年以来最糟糕的结果，左派则被右派远远地甩在后面。在右翼阵营，雷蒙·巴尔代表着与自己名字相连的自 70 年代后期以来的各项政策；希拉克的戴高乐派对此具有强烈的波拿巴派情结；而重获新生的德斯坦则在中间地带发挥作用。三人之间的敌意和政见分歧破坏了右派的效率。按比例选举的做法使"民族阵线"获益，他们也分流了右派主流的一些选票。勒庞的政党获得 1956 年布热德分子获胜以来对极右翼政党来说

最多的票数。

尽管在地方选举中向右派倾斜已成定局，但新总理感到自己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中都受到打压。密特朗尽管继续发挥指导性作用（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但他还是给希拉克下了不少套，无疑希望在1988年总统大选时让他自己把自己套进去。时间的因素的确束缚了希拉克的行事风格，他幻想着1988年的机会。当时只有很短的时间让他有机会表现自己，他急不



1982年11月《世界报》登出的普朗图的漫画。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从心底里不和，但欧洲伙伴关系的礼节迫使他们需要不时地说些友好致意的空话。

317 可耐地利用他临时拥有的机会行事。他试图在对外政策上与密特朗保持一致，但又致力于推翻1981年的社会党纲领，削减财产税，进一步压缩开支，并投入批发式的非国有化和民营化方案。但是他所开创的道路受到了1987年股市崩溃的限制。希拉克与极右派不时地互送秋波，1988年大选时他需要他们的选票。勒庞成熟的种族主义，在他1987年关于纳粹的煤气室也只是一个“细节”的说法中已显示出来。这使他的党被划出常规右派。这一点在当时审判“里昂屠夫”和杀害抵抗运动英雄让·穆兰的刽子手克劳斯·巴尔比时表现得十分突出。希拉克致力于回应在民族阵线支持率背后所关心的问题，即对法律和秩序以及移民问题采取强硬路线。当1986年的法律强调更严格的居留条件来限制移民时，他号召粉碎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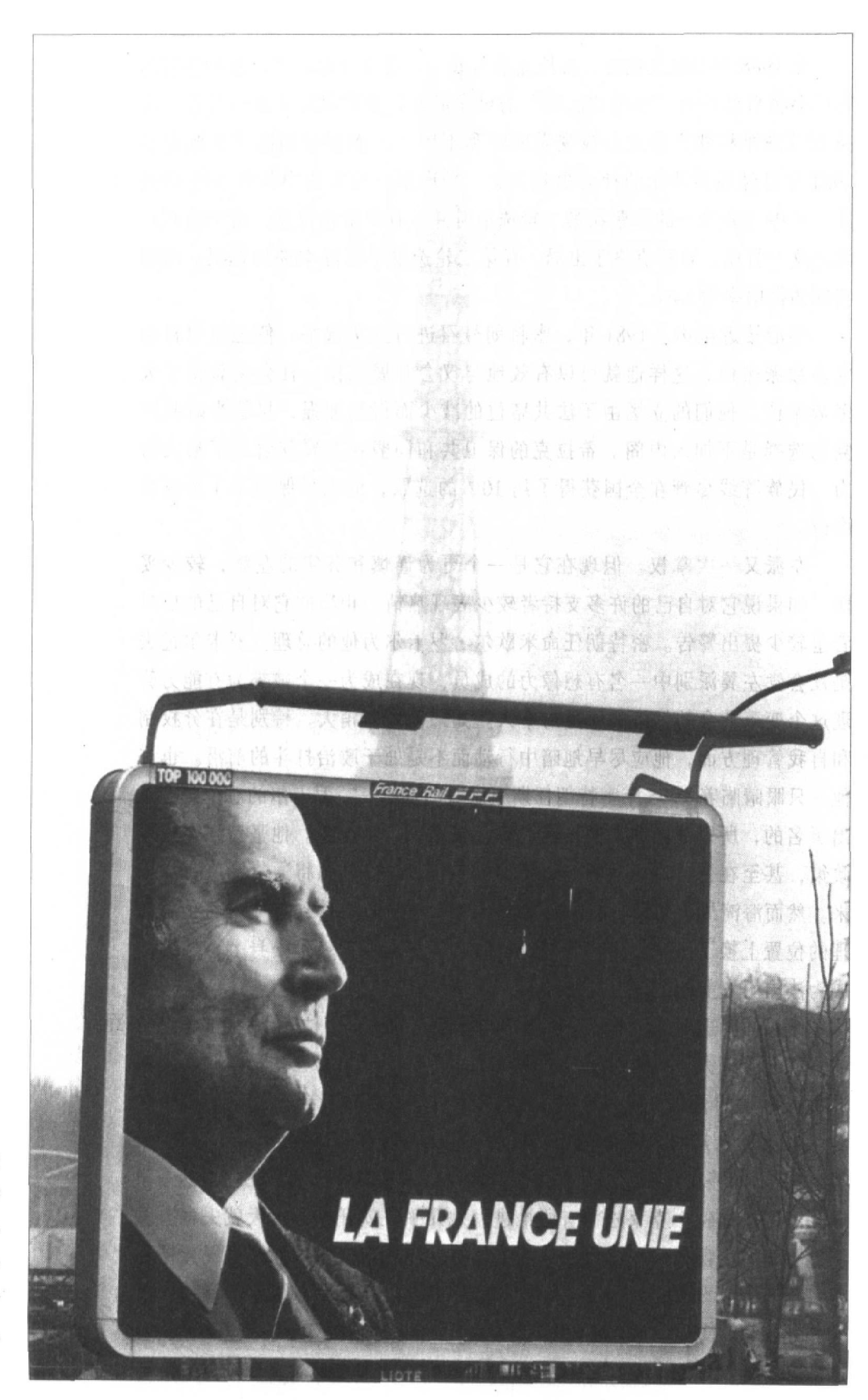
主义。

在 1988 年总统大选时，希拉克或多或少表现得冲动轻率。这使密特朗有机会将自己作为“团结的法国”的可靠形象，他到很晚才表态参选。希拉克对法律和秩序的关心被视做威吓和不民主，而密特朗则带头掀起自1981 年已经逐步淡化的社会福利主义。勒庞第一轮大选中获得 14% 的选票，其中三分之一的选票在第二轮选举时并没有投给希拉克。由于受到右派的这一打压，希拉克终于出局，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 46% 的选票；而密特朗的得票率为 54%。

共治接近尾声。1981 年，密特朗号召进行立法选举，使他获得社会党多数派席位，这样他就可以有效地与议会开展工作。社会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他们的立场由于法共席位的减少而得到加强，尽管当时共产党的选择是不加入内阁。希拉克的保卫共和同盟在右翼阵营尽了最大努力。民族阵线尽管在全国获得了约 10% 的选票，但也只保住了 1 个议员席位。

左派又一次掌权。但现在它是一个更为谨慎和务实的左派，较少妥协。如果说它对自己的许多支持者较少表现热情，相反的它对自己的反对者也较少提出警告。密特朗任命米歇尔·罗卡尔为他的总理。罗卡尔过去是社会党左翼派别中一名有想像力的成员，现在成为一个被誉为有能力管理这个变革社会的经济的稳重的个人。如果他野心稍大，特别是在分权制和自我管理方面，他应尽早地暗中行动而不是处于政治打斗的前沿。也许他一只眼睛瞄着 1995 年密特朗任期届满时的选举——罗卡尔的总统野心是出了名的，所以他以密特朗政策的忠诚代理人身分行事。他坚持强硬路线政策，甚至在公共部门遭到多数派的罢工反对；他试图将通货膨胀率降下来。然而海湾战争后经济的缓慢增长，使得密特朗在 1991 年 5 月将他从总理的位置上换了下来。密特朗的选择落在了埃迪特·克莱松身上，她因此成为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

结果证明这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选择。克莱松是一位有 10 年部长经历 [319] 的称职的管理人员，为数不多的女议员之一。尽管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女性选民人数比男性选民多，但在国民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一般都在 5% 左右。密特朗于 1981 年成立的妇女权利部（希拉克在 1986 年至 1988 年间取消），并不能够在此框架内使妇女在政治阶层中更具代表性。更何况这一事业并不因埃迪特·克莱松而有所推进。她几乎在就任的第一天就失言。关于她将日本人比做蚂蚁，以及认为英国男性同性恋较多的原因是民族同性恋癖而不是由于国际和谐的说法，被到处报道。克莱松作为密特朗的个人亲信，这一点也使他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她；她的信誉从来没有恢复过。1992 年 4 月，以财政部长贝雷格瓦取代她的决定，对她来说是仁慈的 [320]



318 1988年密特朗的竞选招贴画。密特朗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大师，他的右翼反对派支持反对移民的团体时，他打出了雅各宾牌。

解放。

贝雷格瓦无法控制日益增长的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如失业人数攀升至300万的高度。这导致了1993年立法选举中右派取得压倒性胜利。这确实是法国右派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反对派获得全国选票的五分之四，社会党跌至17.5%的低谷。这导致了共治，雅克·希拉克提名者和盟友、乔治·蓬皮杜过去的助手爱德华·巴拉迪尔被任命领导政府。社会党选票令人眩晕的失落，表明该党离它的基础选民有多么远。在遭遇这样的惨败后，米歇尔·罗卡尔要致力于重塑社会党形象时，密特朗的个人威望蒙受

蒙彼利埃的安提高纳工程

20世纪80年代，在年久失修的莱兹河岸边和蒙彼利埃老城边缘地区之间，耸立起一座当代城市建设中堪称庞大和雄心勃勃的建筑，由追求华丽的加泰罗尼亚风格的建筑师里加尔多·博菲勒设计。1979年由社会党市长乔·弗雷歇所带来的这个博菲勒的安提高纳工程旨在扩大市中心区，以便人们正确评价这是法国发展最快和最喧闹的城市之一。

近在20世纪50年代，蒙彼利埃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外省城市，随着呢绒纺织业和大片葡萄园的衰落，城市的财富也在减少。但在自从70年代由政府推动的地区经济腾飞中，蒙彼利埃受益匪浅。在法国经济中更多的是普遍地从农业和工业活动转向第三产业。蒙彼利埃作为朗格多克－鲁西永地区的行政首都，又是朝阳工业之乡，它充分利用朗格多克海岸发展旅游。90年代初期，该市人口达到25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口的3倍，是60年代初的两倍。

安提高纳工程尽管提供了办公和商业设施，但它还是以提供居住方案为主，主要是住房计划。它的设计将古典的对称与巴洛克的优美曲线结合起来，是后现代城市建筑的出色样板。



蒙彼利埃，博菲勒的安提高纳建筑。

沉重打击，跌落到从未有过的最低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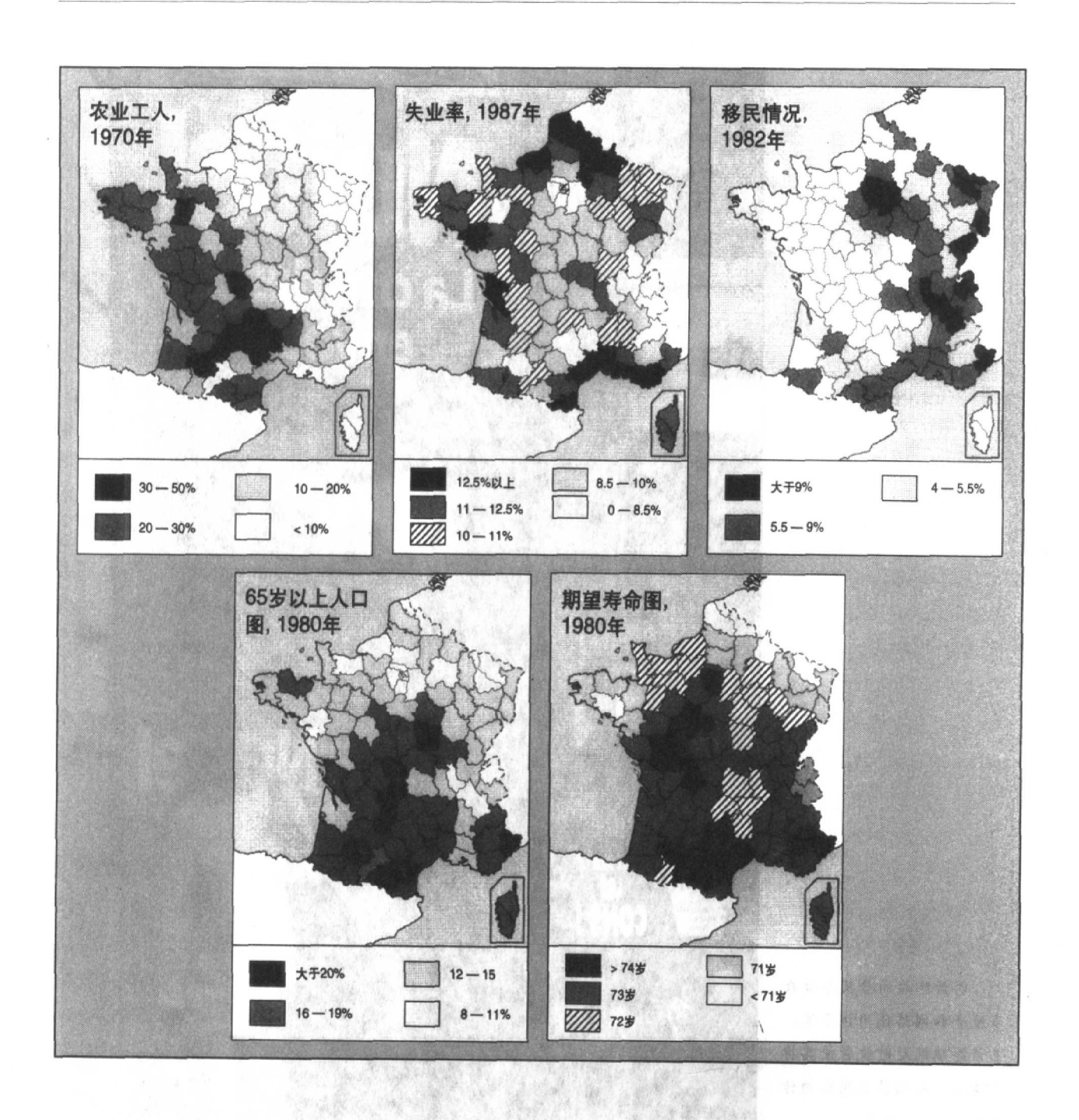
如同1993年右翼选民在传统右派和极右派中选择那样，左翼选票则被不断分裂。社会党支持率下降伴随着绿党运动的兴起，两个生态政党开始对选举产生影响。这个政治版图至少部分是因为1985年引入的按比例确定代表席位的做法而更加四分五裂。这也成为变化中的社会、文化形势的特征。

社会和政治形势

密特朗时代的法国并没有进行像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从根本上重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伟大改革。世界经济萧条在继续，随之产生了所有的附带社会问题。失业问题难以控制，居高不下：1981年失业人数超过200万，1985年则达到250万，无法使其下降。1975年的失业率是4.1%，到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时上升到10%。通货膨胀降低了，但整个80年代平均工资的增长实际为零。

为了与这种紧缩作斗争，“辉煌三十年”时期提出的进程继续在进行。从70年代后期起，信息技术开始对世界范围的贸易产生影响，并使国内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迷你电话终端”——一种接在电话网络上的图像终端——像电话本一样送给电话订户。这种新东西是越来越普遍的提供公共信息和私人交流的方式。1982年共有1万台电话终端投入使用；1997年时数量达到600万，总共接听了约10亿次电话。1980年的电视拥有量约为1500万—1600万台，而在10年中几乎翻了一番，拥有一台的家庭达90%。拥有汽车的家庭比例在1971年至1981年间达到61%—70%，并在继续上升。顶级车的市场在萧条最甚的时期生意也特别好，而餐厅饭馆看上去永远客满为患。在法国社会中，经济下滑肯定不是消费主义死亡的象征。

[321] 消费文化主要是城市性的。从事农业的工人比例不断下跌，在90年代早期大约占所有劳动力的6%（或更少），而在解放时为三分之一。农民在当代法国除了激动和思乡之外，在任何事上都排在后面。然而，他们忠实于直接行动的做法，如在城市广场塞满洋蓟和甘蓝，抢劫和焚烧英国绵羊骨架。这表明他们仍然是有影响的压力团体。如果说在农村生活的人数略有上升，这也是由于往返人口的普遍性日益增长所致——改善公路和铁路更便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些“新村民”，加上旅游者，至少会给许多乡村地区带来附加财富。这些人所能接受的从住处到工作地点的距离表明，这些比例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是工薪者——是经理而不是小商人或小业主。1945年三分之二的劳动者投身于工业或农业生产，90年代三分之二的劳动



力则在经济领域从事服务工作。

人口构成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40年代出现的生育高峰开始下降，这种发展似乎与轻易离婚和出现更容易使用的新避孕方法（特别是避孕“药丸”）等更加放纵的性态度有关。从70年代后期开始，生育率低于战前水平。成人所心愿的子女数量从2—3人降至1—2人。部分原因是幼儿被从祖父母和其他亲属抚养的地方接走等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带来的后果；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拥有良好的幼儿教育条件

走向2000年的法国。[323]在第五共和国时期，“两个法国”的痕迹依然存在——工业发达的北方，农业发达的南方和西部。然而，主要社会发展上的地理变化也微妙地出现：失业、移民和老龄人口。



电话终端的普及导致众多服务和网络使用该系统。电话终端的延时收费使其特别流行，从而造成报纸的传统收入来源的流失。

（60年代2岁至5岁幼童进幼儿园的占一半，而80年代达到80%或更高）。从另一方面看，更多的妇女投身于劳动力队伍也使拥有大家庭的愿望减弱。

家庭模式看来在流动。20世纪60年代结婚率下降反映了婚外同居现象的增加，结果是非法婚姻比例上升，从战后的二十分之一变为90年代初

期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离婚也更为常见，60 年代至 80 年代离婚数量 324 翻了一番，几乎三分之一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堕胎数量也差不多：70 年代中期约为 13 万例；80 年代末堕胎合法化，数量达到 16 万例。

然而，90 年代最突出的人口现象，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最为不祥的经济后果，即人口老龄化。40 年代和 50 年代婴儿生育高峰期的人开始老掉牙了。在 1946 年时每 6 个法国人中有 1 人超过 60 岁；到 1991 年则为每 5 人有 1 人。在今后的 10 年中这一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寿命延长，加之日益流行的为解决失业问题而制定的提前退休制度，表明在世纪之交的法国会出现更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在 2006 至 2010 年间，1946 年至 1950 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将过 60 岁的生日。

高龄人口意味着将来经济上非生产性人员的大幅度增加。一种可能的后果是妇女在劳动力中将持续，或日益增长地发挥作用。自 20 世纪 60 年

在巴黎的一条街道上挤满了做祷告的穆斯林。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有 300 万信徒的伊斯兰教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然而，阿拉伯工人却比他们当地的法国兄弟工资少得多，待遇也差。



代以来，妇女就业现象开始复苏。20世纪初约有40%妇女就业，自1945年战后有明显下降，在90年代早期的经济紧缩时期又上升到43%。雇主们常常雇用妇女，因为她们接受低于男性的工资，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尽管女生拥有会考证书的人数多于男生，但在经济领域妇女们总是在报酬最低的行业工作。她们在政治阶层中明显的代表性不足现象，也反映在最受尊敬的职业和商业及行政高层管理者方面。

民意测验和妇女失业登记过少，说明自70年代以来的高失业率对希望就业的妇女有着不成比例的严重影响。失业看来确实惩罚了最无助的人，例如妇女、移民和没有技能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在因萧条而下滑的重工业地区）都受到特别大的打击。许多工厂使用临时工，也使得原本容易统计的失业率进一步增加。在一个日益追求物质消费的社会中，需求欲望使犯罪激增。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犯罪率增幅为250%。即使按照警察局统计，这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不受约束的单身男性是最大袭击者；约一半以上入狱者年龄不到25岁，其中四分之三未婚。这一发展趋势引发了公众广泛的不安全感，各个党派的政治家都对此日益警惕。

公共安全差的状况是极右派崛起的主要因素，当移民问题被故意掺杂进去，就变成了有毒的仇恨鸡尾酒。自相矛盾的是，移民问题是在其下降[325]阶段（从70年代中期起）而非上升阶段变成为政治问题。法国经济长期以来依赖无技能或技能低的廉价劳动力，例如20年代通过移民实现了人口增长四分之三。据计算，法国人口在90年代初期确实有三分之一是第一、二、三代的移民。当然，90年代移民比例没有30年代那么高；到70年代才核查的固定人数大约是400万，约占总人口的8%。

移民问题对法国人来说，像羊角面包那样常见。它之所以成为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是经济萧条中移民人口日渐明显的文化可视性。过去的移民潮是通过移民们的工作，相对而言没有痛苦地被融合了。而70年代以来的大量失业，抽掉了他们在法国社会攀登的梯子。加之移民愿意集中聚集在从马赛至勒阿弗尔自北向东的一条线上，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非常显眼。近期移民浪潮并非来自白人——主要是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亚洲人和土耳其人——的事实，使他们极易成为靶子。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原因之一。几乎不用观察，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城市议会开始收到要求建清真寺的申请书。穆斯林社团致力于按自己的主张编织一个完整的团体，有时过分拒绝法国社会提供的融合和世俗文化的建议。80年代在青年主流文化的边缘出现了受到第二代阿拉伯年轻人推崇的“柏尔”文化。

20世纪80年代明显出现的对待移民团体的极端不容忍态度，可能应

当视为日益扩大的政治分裂版图的一部分。自 1945 年以来，社会变化产生了政治忠诚度的巨变。农民阶层的消失使社会党和共产党失去了某种意义的支持核心地带。同样，从北部到东部无产阶级大城市的解体，意味着前共产党据点的丧失。80 年代后期，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从 20% 降到 15%。法国共产党的明显衰败——从 1945 年的第一大党变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与极右派旗鼓相当的党派——表明他们在政治学方面比在社会学上还要无所作为。尽管法国共产党领导层被证明在调整政策、与时俱进方面毫无作为，但事实是社会变化摧毁了老旧的工人阶级。

因此临近世纪末之时，政治形势也日益模糊不清。密特朗治下的强化总统体制，伴随着新政治团体和新政治风格的涌现，特点可能相当多样化。国民阵线的老根可以追溯至 30 年代。与之相对的支持移民党派却是临时搭台：他们没有强大的当地传统。许多左派团体和组织推崇的是 60 年代，特别是 1968 年的价值观。女权运动就是其中一例。1968 年事件催生的女权主义者组成了政治压力团体。从许多妇女发现左翼集团的男性领导性别歧视特别严重的角度来看，“五月事件”的经验是负面的；但从提倡 [326] 团结一致和相互支持，提供文明政治榜样——游说，游行，艺术宣传和坦率挑战——打造特定政治身份的角度来看，又是正面的。70 年代和 80 年代女权运动的特点是分裂和沉溺于理论——还是 1968 年的遗产！工人阶级的感受追求与移民妇女结合是相当不成功的。同性恋运动同样也从 1968 年经验中吸取力量和灵感，尽管“同性恋革命运动阵线”的建立受到美国“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影响。虽然同性恋运动在主流政治中影响不大，但在密特朗任期之初的自由化阶段，却导致废除了维希时代以来法律书本中所有反同性恋的立法。反种族主义运动，特别是阿雷姆·德希尔的“SOS - 种族主义”运动，具有较大影响；其纲领中既有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内容，也有来自法国的经验。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出现的强大政治文化现象，是日益摆脱反动 [327] 的、贝当主义光环的地方主义运动。但法国许多农业地区生活方式的变化却给地方文化沉重一击——特别是语言。例如，许多方言俚语随着当地老人去世而烟消云散：80 年代后期弗朗什 - 孔泰方言、塔尔纳和康塔尔地区的洛林和奥克西塔尼的浪漫语言失传，就是这种情况。努力使用标准统一的法语历史潮流导致了他们的衰落，而视听媒体的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当政府接受了地区经济发展纲要，特别是自 80 年代起，这些传统语言获得了新生。在这些地区，国家支持学校教授阿尔萨斯语、佛兰芒语和布列吞语，与伊比利亚半岛相关团体成立的联合会一起复活了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甚至在此之前，地区主义就被左翼而不是右翼所关注。一个

极好的证明是对政府70年代末期在塞汶地区的拉扎克高原扩建军营计划的328反应。当地农民对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表示抗议时，左派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支持行动；在巴黎以至全国，举行了团结支持的步行示威游行。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立即采取的行动就是悄悄搁置军营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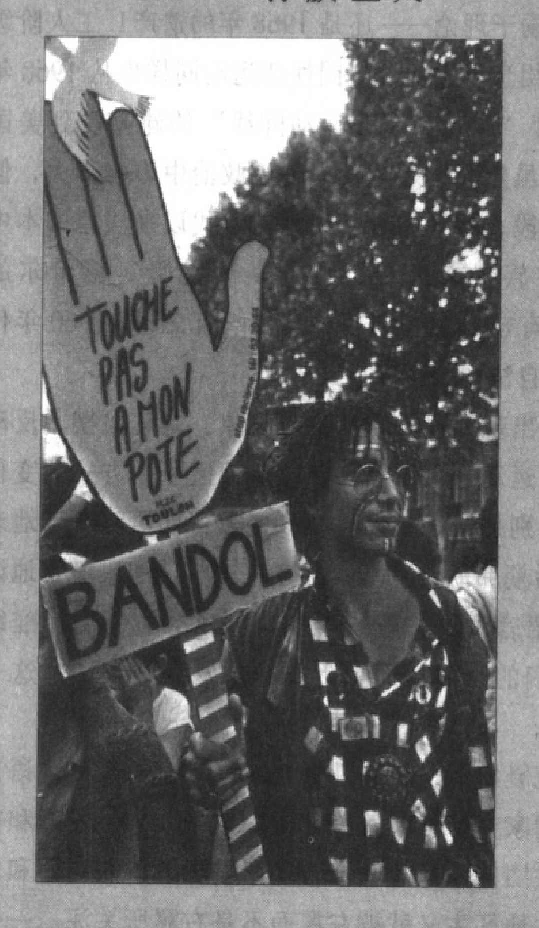
与拉扎克人运动同时出现的是1968年后左派生态主义的强大潮流。中央高地的确成为原积极分子"撤退"和改变生活方式的好地方。这成为触及日益增长的城市消费社会内疚感的强大绿色行动的组成部分。"绿党"运动的政治影响最初产生于1974年，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勒内·迪蒙就是以此作为参选总统的口号。这一运动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日益强大，得到1984年以后对政府风格的社会主义失去热情的选民们的大力支持。进军欧洲议会的选举使生态运动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强大的绿党建立联系，并发展壮大。密特朗不能肯定法共会成为其政治盟友，希望从左派中获得其他支持者，因此任命绿党领袖布里斯·拉隆德（他曾在

326

SOS－种族主义

"'SOS－种族主义'的法国是1789年的法国，是自由接触的法国，是尊重权利的法国。"反种族主义组织"SOS－种族主义"的主席阿雷姆·德希尔的评论表明了移民团体的主要诉求：在人权之乡拥有平等的权利。

"SOS－种族主义"是在年轻的移民团体于1983年采取行动，投入所谓的"柏尔游行"之后由德希尔在1984年创建的。他本人就是混血后代。这一事件导致一名年轻移民在巴黎郊区被枪杀。这激发了美国式的遍及全国的争取民权大游行，其目的是宣传年轻的阿拉伯人所处的歧视性的生存条件。"柏尔"一词按阿拉伯语的读法倒过来读就是法语"倒退"的意思，借此比喻往往是第二代移民的年轻人的身份地位。这一运动在许多大城市造成移民与警察发生冲突，它致力于在国家政治空白点上让舆论发出声音。请记住，这是阿拉伯在人感觉自己受到国民阵线领袖勒庞攻击的气候中所采取的行动。



德希尔像马歇尔一样聪明，该运动以一只举着的手掌为标志，上面写着口号："别碰我的朋友！"这是一个争取团结的组织，但也是宣传机器。它为立法游说，为种族歧视案件争取法律援助而斗争；通过报界宣传对主要问题的观点，改善公共关系。在90年代初期，该组织在全法国有300个声援委员会和2.5万名成员。



奥克西塔尼方言的涂鸦："我们要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这一来自南方地区主义者的号召表明每年夏天大量旅游者和日益增长的"外来人"——不管是不是法国人——的到来给该地区带来的苦恼：他们在最热门儿的地方购买第二套住房，致使房地产涨价。

1981 年参加总统选举）为环境部长，从而在 1988 年的选举中得到回报：他的选票获得了缓慢但却稳定的增长。绿党在 1993 年的立法选举中取得很大进展，将许多通常是社会党的选民拉入了自己的阵营。

文化身份问题

政治和文化自 1789 年起，在法国就难解难分地缠在一起。长期以来，以地理区域维系的社会文化团结、家庭背景和职业选择，决定了政治身份的特定形式。例如，旺代人无疑自孩提起就被打上 1793 年—1794 年第一共和国的烙印，因此亲教会，反共和，赞成右派。与此相对照的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是领导大革命并从大革命经历中取得成功的社会团体；他们倾向于反教会，赞成极端分子和社会党。极而言之，19 世纪和 20 世纪是"行动的党"对抗"运动的党"，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无论是学校、

殖民地还是宪法安排等问题，双方都是泾渭分明。

这种长期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特性，自20世纪70年代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的压力下被打破了。两种相互对抗的运动在起作用。首先所有传统党派都赞成宪法，并在宪法框架内工作。这种稳定性在法国近代历史上既是珍禽般罕见，也是新货般新鲜。第二点，与此相对照的是议会大厅之外的五花八门和五颜六色的政治场面。许多这类非传统团体，以政治承诺的新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新风格行事。与“绿党”、“同性恋党”、左倾分子或329其他东西相比，“左派”和“右派”看上去突然不那么重要。所以正是左派与右派自1789年以来首次同意在同一种宪法框架下工作，新的政治、文化形态出现了，对辩论的真正框架提出质疑。

理解密特朗时代政治和文化特性的上述变化的原因，或探讨可能产生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总体上探讨这些形式的发展。例如，似乎很明显的是，新的政治文化表达方式的流动性来自于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变化。公众获取信息历来是法国国家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有时是通过舆论管制，或更为典型的做法是通过教育和言论自由的共和体制实现。第五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上就进行过关于国家控制信息，特别是控制广播和电视的苦涩辩论。对戴高乐嘲笑记者职业的名言（称其为“抄袭者、造假者和谄媚者”），蓬皮杜以更为谨慎的评价回应：“法国电视自以为是国内国外的法国之窗。”1968年5月，许多最尖锐的讽刺直指受控制的舆论工具。新闻更像是向全国发布的一般性通告。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体制更开放，新的信息技术成为主流，国家大大放松了舆论控制。吉斯卡尔·德斯坦为此迈出了步伐，但密特朗执政时期变化最大。80年代早期宣布了影视自由；私人电台也得到许可；新成立的独立广播管理机构与政府拉开了距离；私营电视频道得到批准（1984年电视四台作为首家私营电视台开始运行）；电缆和卫星广播开始取得进展。

日益自由的电视在法国人民作为获取信息的媒体手段，并且成为大众娱乐的流行形式上，特别有意义；但某些人认为对国家是有害的。20世纪80年代的公众调查显示，法国人平均每天花20分钟阅读新闻，两小时听广播，3小时看电视。在此情况下，阅报时间减少尤其令人瞩目。在一个世纪前的德莱弗斯事件中，法国是世界报纸印刷业的头号消费者；而当世纪末即将来临时，它却成为欧洲第8位、世界第27位，与韩国和新加坡为伍。电子媒体的竞争力是衰落的主要原因。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发布个人需求的小广告方面，电话终端取代了过去报纸的作用。

新闻媒体上的变化反映了法国社会消费主义的增长。新闻成为像汽车、相机或蓝色牛仔裤一样可以消费的商品。这种文化的商品化开始对回

顾法国历史的方式产生值得注意的影响。如同我们设想的那样，法国过去的历史是公民身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的故事是个人体现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身份的方式之一。如何书写与解读历史证明，是记录20世纪末期社会和文化变化的非常有趣的标准尺度。

当1975年，即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开始时，全国最畅销书单上名列前茅的是两本历史书：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的《蒙塔尤》，讲述了14世纪比利牛斯山村一个名叫蒙塔尤的纯洁派异教徒的故事；另一本是业余历史学家皮埃尔·杰克·埃里亚的《傲马》，讲述布列塔尼的传统农民文化。但他们的领导地位并不像他们能够得到的那么非同凡响：在70和80年代的学术书籍中，历史书位居市场榜首。这一商业成功反映了所谓的编年史"学派"所带来的法国历史研究方法的质量和方向——历史学家与以此命名的著名杂志关系密切。编年史家们致力于历史作品的革命化。他们的重点从传统的国王王后和战役的重点中转移出来，试图重现从更广泛的时空体系进行研究的"完整的历史"——"长期的"，如同编年史大师费尔南·布鲁戴尔所说的那样。更进一步，他们试图将历史与其他人文科学，如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人类学（如《蒙塔尤》那样）、口述历史（如《傲马》那样）等联系起来。结果产生了60年代征服法国学院机构的历史作品创新形式，并使法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330



"我的法语很丰富"——1994年2月24日《解放报》的头条标题。这句不可理解的句子影射学校英语的老套结构："我的裁缝很富。"这一标题宣告政府对能找到相应的法语词语却使用外来词语（尤其是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的做法再度进行抨击。1977年立法反对英语式法语，但却很少被使用。

331

尽管1975年的畅销书写得也很好，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其获得广泛成功的原因。我们应当记住，传统上法国将历史视为知识分子确定文化身份的交叉路口。无论是勒鲁瓦·拉杜里还是埃里亚，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回顾失去的世界——尽管乡村文明有明显的缺陷与过失，但它是建立在永恒价值观基础上的。用这种方式，历史作品表达了怀旧的渴望，这也是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提及并且加以利用的。具有农耕生活经验的法国人日益减少，但却可能有上百万的人愿意分享。历史学家成为谈话节目的嘉宾、电视主持人、报纸的专栏作者。历史成为解读变化中的社会内部奥秘的方式。这种"新历史"引发了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辩论。那些右派共和党人对"事件历史"以及相关的日期和事实的消失深感不满，学校的教学大纲很快又返回原来的路线。

这一现象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时达到顶峰。这一事件导致与陈腐路线相连的政治纠纷：由特立独行的基督徒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努领导的亲教会的右派，试图将1789年革命与1793年—1794年旺代地区共和派军队搞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类似的还有密特朗总统和巴黎市长希拉克对1989年7月14日巴黎国庆节庆祝仪式的礼仪方面的矛盾。除了可以预想到的之外，在庆祝仪式上有三个特点很突出。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全国各政治团体都积极地和建设性地参与这些事件。这表明1789年所体现的共和派的价值观，为政治辩论和公民权提供了既定框架。

第二点，庆祝活动在城市和乡村都激起很大的热情。成立了大量的地方两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很多是在专业历史学家的鼓励和领导之下，表明人们渴望了解大革命时代的当地历史。这样，两百周年纪念成为寻根和确立地方身份的活动，这既与转向新的寻根文化政治一致，也表明了文化地位的不确定感。

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革命文化被商业化的程度。历史学家们举行有关大革命的报告会，出版关于大革命的著作；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制片人制造涉及大革命的节目；而企业家则生产他们的巴士底狱圆领汗衫、绞刑架耳环和红白蓝三色短裤。这些情况在巴黎7月14日之夜大332量活动的组织中，被以原封不动的方式拍摄下来。“巴士底狱日”通常是以欢乐的街头派对的形式进行庆祝，这次却被令人眼花缭乱的游行所取代。密特朗将协调工作交给了J.F.古德——广告界的头号人物。游行是



每周播出的电视节目“省略号”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化潮流风向标。节目主持人贝尔纳·皮沃成为文学指挥和文化领班。这里是他的一位嘉宾雅克·阿塔利——一度为密特朗的私人助手，也是个失势的欧洲发展银行行长、作家和历史学家。

个震撼人心的事件，从活动规模——消费程度和灯光照明等方面来看，庆祝活动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街道上人山人海，挣了超过500万美元的外汇。

“好好看看吧！像这样的场面你们再也不会看到了。”密特朗在1981年5月庆祝社会党获胜时先知般的评论，也可以用来评价两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后者代表了一个论坛，来自于法国国民生活主流的有关历史、公民、商业的各种不同构想在这里被汇总到一起。这也可能将是一种无法重复的方式。

尽管有关这个事件的方方面面都是积极和有趣的，但同时支撑法国民族性的一些基本设想很快就受到了考验。法国进入欧共体，这是密特朗顽强追求的结果，看来很可能对国家地位产生重要影响。欧共体委员会和欧 333 洲议会的广泛作用，伴之以单一货币和单一市场，支持“社会宪章”，这些对法国人和所有组成欧共体成员国的民族，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看来是与经济超级大国日本和美国进行有效竞争的先决条件。“法兰西是我们的祖国，”密特朗在他的1988年新年献词中多次宣称，“但欧洲是我们的未来。”1789年大革命纪念会庆祝国家团结，当时团结这一概念似乎正在讨论中。同年在东欧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德国统一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个不仅是关于新欧洲形象的重大疑问，而且对法国人能否领导这一事件提出了质疑。尽管看起来欧洲一体化可能会触发民族主义分子，甚至是地区主义分子的不利反应，但结构变化和文化身份变革的意识——即便是凶兆——在20世纪90年代的氛围中已经清晰可见。

如果说这是国际范围的真实情况，那么在国家的层面上则更是如此。1989年表现民族团结的庆祝活动，是在法国涌现出文化和政治多样化新潮流的时刻举行的。在大多数主流政治派别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口号依然可以作为社会价值的源泉而理直气壮地高高举起。但是在20世纪末的法国，他们也可能受到深刻的诘问。对那些排队领救济金的人或是在破败的工业城市中境况凄凉的移民邻居而言，何谓“自由”？对所有的少数弱势者，那些享受不到消费社会的经济好处的农民、穆斯林、年轻人和妇女而言，何谓“平等”？而在法国，随着“国民阵线”的崛起，甚至国民议会也成为不宽容和仇恨的政治场所，那么何谓“博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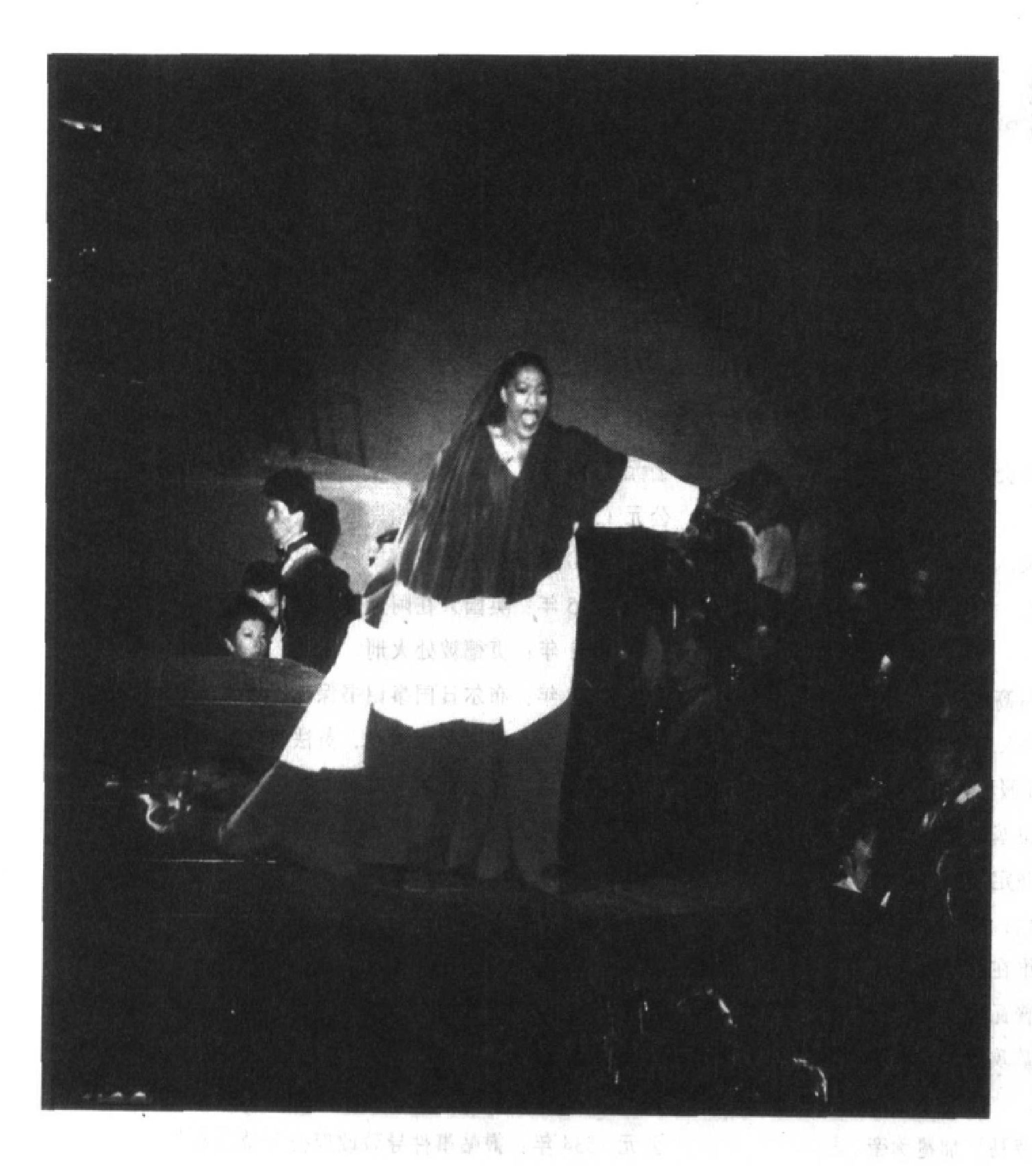
并不是法国变化多端的政治舞台上所有新的政治派别都对此提出挑战。例如大多数绿党都顺利地适应了政治党派的建立。当时，也还是存在着这些新生的政治和文化派别与主流政治派别疏远的日益增长的危险。1993年，左派在立法选举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之后，士气完全崩溃，使得这更加难以解决。在这一背景下，值得提及的是法国的知识界，自德莱弗斯



1994年5月，法国和英国工人庆祝海底隧道正式打通——表明欧洲共同体日益增长的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阶段。新的联系也触发了关于法英关系，以及打造欧洲身份的新的棘手辩论。

以来的关于民事和政治权利的口头勇士们，已经使自己摆脱了政治轨道。同样要指出的是勒庞错误地使用的语言——尽管往往是以无意识地东拼西凑的方式——接近传统共和党人关于民族团结的语言。“法国人的法兰西”，这一口号与19世纪共和主义者心中的文明使命理想相距不远。某些334人在1991年欧洲迪斯尼乐园开张时所表现的强烈反对态度，显示出对于文化身份的类似担心。同样，在艾滋病泛滥时，令人担心地产生了反对同性恋的舆论。

面临20世纪末，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尽力——有些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解决多元文化的问题和困难。法国自恃比其他国家都拥有更好，甚至是最好的少数民族融合的记录。共和党派多次战胜挑战，将社



美国非洲裔黑人女高音歌唱家杰希·诺曼披着宽大的三色旗外衣高唱《马赛曲》。这是 1989 年 7 月 14 日举行的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会上的高潮之一。

会、文化地位上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团体融入政治领域。在法国人身份的定义相对比较稳定、经济环境也顺利时，融合工作进行得最好。在 90 年代中期，随着难以摆脱的经济衰退，加上欧洲一体化前景的不确定性，上述条件都不再适用。伴随着政治和文化身份基础的变动，法国的共和派在世纪末渐渐临近之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大事年表

公元前 200 万年：早期人类社会。
公元前 3 万年：旧石器时代。
公元前 1 万年：冰川时期结束。
公元前 6000 年：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 1800 年：金属时代。
公元前 700 年：凯尔特人侵占高卢。
公元前 125 年—121 年：罗马人对高卢南部殖民。
公元前 58 年—51 年：罗马征服高卢。
公元 177 年：里昂出现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
公元 406 年：主要蛮族人侵并定居。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法兰克人发展其帝国。
公元 511 年：墨洛温的克洛维在巴黎建立法兰克人的首都。
公元 732 年：阿拉伯军队在普瓦提埃被击败。
公元 751 年：加洛林王朝执掌政权。
公元 771 年：查理独揽大权。
公元 800 年：查理在西部（罗马）加冕称帝。
公元 843 年：《凡尔登条约》分割查理大帝的帝国。
公元 987 年：于格·加佩成为国王，建立卡佩王朝。
公元 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公元 1159 年："第一次百年战争"（至 1299 年）。
公元 1214 年：布汶战役。
公元 1299 年：《蒙特勒伊条约》确认"第一次百年战争"结束。
公元 1302 年：三级会议召开。
公元 1309 年：在阿维尼翁建立教皇驻地。
公元 1328 年：菲利浦六世继承王位，建立伐卢瓦王朝。
公元 1337 年：英法百年战争（至 1453 年）。
公元 1346 年：英国人在克雷西大败法国人。
公元 1347 年：加来遭英国人劫掠。
公元 1348 年：黑死病流行导致大批民众死亡。
公元 1356 年：英国人在普瓦提埃击败法国人。
公元 1356 年：英国人俘虏"好人"约翰二世国王。
公元 1358 年：法国北部扎克雷起义。
公元 1360 年：英法签署《布雷蒂尼和约》。
公元 1415 年：英国人在阿金库尔大败法国人。
公元 1431 年：贞德被处火刑。
公元 1438 年：布尔日国事诏书保证王权对教皇权的控制。
公元 1453 年：卡斯蒂荣战役，英法百年战争的最后一仗。
公元 1470 年：法国首家印刷出版社在巴黎建立。
公元 1477 年：勃艮第大公、鲁莽的查理去世。
公元 1482 年：《阿拉斯条约》将勃艮第公国并入法国。
公元 1494 年：意大利战争（至 1559 年）。
公元 1515 年：法国在马里尼昂战役中获胜。
公元 1516 年：《波洛尼亚教务条约》确认国王的权力高于法国教会。
公元 1525 年：法国战败，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被俘。
公元 1534 年：揭帖事件导致政府公开镇压新教。
公元 1534 年：雅克·卡蒂埃率队远征加拿大。
公元 1539 年：韦雷－科特莱敕令将法语用于所有的法律和官方文件。
公元 1559 年：《卡托－康布雷奇条约》结束意大利战争。
公元 1561 年：法国宗教战争（至 1598 年）。
公元 1572 年：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许多新教著名显贵在巴黎丧生。
公元 1588 年：巴黎天主教联盟构筑街垒日。
公元 1589 年：亨利四世继承王位，建立波旁王朝。
公元 1594 年：西南部发生克洛堪农民暴动。
公元 1598 年：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
公元 1598 年：与西班牙缔结《韦尔万和约》。
公元 1618 年：对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三十年战争（至 1648 年）。
公元 1622 年：《蒙彼利埃和约》使新教徒占据的城市数量

削减到两个。

公元 1624 年：黎世留作为主要大臣进入枢密院（至 1642 年）。

公元 1630 年："愚人日"巩固了黎世留的权力。

公元 1631 年：第一份全国性报纸《法兰西报》创刊。

公元 1639 年：诺曼底爆发赤脚汉起义。

公元 1643 年：法国在罗克罗瓦战胜西班牙。

公元 1643 年：路易十四成为法国国王。

公元 1648 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终结。

公元 1648 年：投石党运动（至 1652 年）。

公元 1659 年：与西班牙签署《比利牛斯和约》。

公元 1661 年：科尔伯出任财政大臣（至 1683 年）。

公元 1667 年：王后权利战争（至 1668 年）。

公元 1672 年：荷兰战争（至 1678 年）。

公元 1685 年：枫丹白露敕令，废除南特敕令。

公元 1689 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至 1697 年）。

公元 1701 年：西班牙王位战争（至 1713 年）。

公元 1702 年：由追随加尔文的农民在塞汶发起卡米扎尔战争（至 1704 年）。

公元 1713 年：《乌特勒支和约》签署，西班牙王位战争结束。

公元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巴黎最高法院任命奥尔良公爵为路易十五摄政（至 1723 年）。

公元 1740 年：奥地利王位战争（至 1748 年）。

公元 1756 年：七年战争：法国在英格兰人手中遭受沉重损失（至 1763 年）。

公元 1775 年：面粉战争；因粮食短缺而发生的骚乱。

公元 1778 年：美国独立战争：法国支持反叛的殖民地抗击英国（至 1783 年）。

公元 1783 年：《凡尔赛条约》：法国获得一些殖民利益。

公元 1788 年：三级会议定于 1789 年 5 月召开。

公元 1789 年：（6 月 20 日）网球场宣誓：国民议会誓言新宪法未颁布以前决不解散。

公元 1789 年：（7 月 14 日）巴黎巴士底狱被捣毁，法国大革命开始。

公元 1789 年：（秋天）农民革命；废除封建特权。

公元 1792 年：与奥地利的战争爆发。

公元 1792 年：路易十六被推翻；第一共和国建立。

公元 1792 年：九月大屠杀：警觉的团伙谋杀了关押在巴黎监狱中的囚犯。

公元 1793 年：恐怖时期（至 1794 年）。

公元 1795 年：一个新的宪法政体督政府建立（至 1799 年）。

公元 1799 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

公元 1801 年：教皇与拿破仑签署教务协议，重建天主教。

公元 1804 年：拿破仑加冕皇帝；第一帝国建立。

公元 1804 年：《拿破仑法典》（民法）颁布。

公元 1808 年：西班牙半岛战争开始。

公元 1812 年：拿破仑大败于莫斯科战役。

公元 1814 年：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公元 1815 年：滑铁卢战败，拿破仑"百日"终结。

公元 1815 年：波旁王朝路易十八重登王位。

公元 1830 年：法国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

公元 1830 年："光荣的三日"（7 月 27 日—29 日）迫使查理十世逊位，波旁王朝灭亡。奥尔良大公路易－菲利浦成为国王。

公元 1848 年：七月王朝垮台。

公元 1848 年：第二共和国建立，路易－菲利浦退位，临时政府组成。

公元 1848 年："六月数日"，镇压巴黎激进派。

公元 1851 年：政变：路易·波拿巴篡权。

公元 1852 年：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总统自立为拿破仑三世皇帝。

公元 1870 年：法国－普鲁士战争。

公元 1871 年：巴黎公社；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德国；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

公元 1898 年：埃米尔·左拉发表《我控诉》；德雷福斯事件。

公元 1905 年：《法英协约》签署。

公元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1918 年）。

公元 1914 年：马恩河战役。

公元 1916 年：凡尔登战役。

公元 1919 年：《凡尔赛条约》签署；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

公元 1924 年：制定旨在德国赔款的道威斯计划。

公元 1925 年：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签署《洛加诺条约》。

公元 1929 年：决定修建马奇诺防线。

公元 1934 年：斯达维斯基事件。

公元 1936 年：由共产党、社会党及其他左派团体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建立。

公元 1938 年：达拉第签署《慕尼黑协议》。

公元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1945 年）。

公元 1940 年："法兰西国家"。第三共和国终结，贝当的法国维希政权建立。

公元 1944 年：联军 D 日登陆。

公元 1944 年：推翻维希政权。

公元 1946 年：第四共和国建立。

公元 1954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公元 1954 年：越南人在奠边府打败法国人。

公元 1957 年：《罗马条约》：建立欧洲共同市场。

公元 1958 年：阿尔及利亚的僵局导致宪法危机；由第四共和国进入第五共和国。

公元 1962 年：《埃维昂协议》赋予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

公元 1968 年：五月事件；学生和工会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

公元 1981 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1998 年再次当选）。

公元 1994 年：英吉利海峡隧道正式开通。

索 引

（索引中页码是英文原著页码，其页码已标在本书相关段落外边口。索引中正体数字页码为正文索引页码，斜体数字页码为插图注释文的页码，黑体数字页码为框内特附文章的页码。）

译者后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计划出版《剑桥插图世界史》丛书，并邀请我们翻译其中的《法国史》卷。在翻阅了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之后，我们便欣然，同时也有些揣揣不安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我们曾经长期学习和使用法语，前往法国的次数也都该以两位数计了。虽然以前也读过不少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和文章，但大多出自法国学者之手。而这次要翻译的却是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用英文撰写的《法国史》，不禁使我们兴趣陡增。

众所周知，法国和英国虽然隔着英吉利海峡，但两国之间的历史关系不仅密切，而且纠缠着种种割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两国的学者的看法就有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以本书作者而言，他自称是运用“民族的成见和偏见”，利用他本人“对历史记载的专业知识不可避免的匮乏”以及借助“撰写由读者去判断的新类型的国家史所带来的挑战”而写成此书的，其目的“不是提供一部社会和政府精英的政治编年史，而是一些应当予以反映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浅显易懂的篇章；它尊重地区和国家的框架，对各性别、阶层和等级的问题均具有足够的分量”。

确实，作者在本书中利用了大量的宗教、文化、社会、经济方面的相关史料，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充满地区和文化差异的法国史。作者探讨了诸如德国、意大利、英国和北欧等邻近国家和民族对法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民族性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描绘出一部生动鲜活的法兰西历史。此外，作者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如高卢人入侵及其后果、拿破仑的历史地位、二战中的法国以及战后法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演变等，都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有时，在该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看出作者采用了不少揶揄的口吻和笔调，令读者忍俊不止。不过，我们认为这并不妨碍读者把此书作为一部可以与法国学者撰写的法国史著作互相参照、互为补充的有价值的参考书。

如果我们对该书作者有所了解，就更易理解此言不虚。科林·琼斯先生是英国沃里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担任英国王家历史学会副会长（2000—2003年）。他长期从事法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相关著作数量颇丰。如：《慈悲与善举：1740—1815年蒙彼利埃地区对贫苦人的待遇》（1982）、《强制的慈悲：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时期的医院和养育院》（1989）、《剑桥插图法国史》（1994）、《伟大的国家：1715—1799年的法国》（2002）和《德·蓬巴杜尔夫人：一个情妇的形象》（2002）等专著及

大量论文，都充分反映了他对法国历史的高度关注和在法国史研究方面的出色成绩。

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得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张光勤主任、赵凌云编辑等的指导与帮助。一些在读的研究生参加了部分正文的初译，他们是：樊晓菊（第六章）、钱江（第七章）、陈垦（第八章）和李贺杰（第十章），已参加工作的杨晋参与翻译了第九章的正文和插图说明，中国青年教育学院的英语教员张庆华老师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校阅。此外，翻译时参照了国内学者有关法国史的大量著作和译著，特别是采用了他们使用频率较高的习惯译名，在遇到问题时，也得到多位法国朋友和学者的热情帮助。在此，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的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还存在许多问题，企盼各位方家及广大读者指正。